沈从文全集

27

沈从文全集

第27卷 ◉ 集外文存

SHEN CONGWEN QUANJI

一个人的自白
沉默归队
史无前例
谈话及其他
无从驯服的斑马
无从毕业的学校
履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8~27卷/沈从文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4-9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书信集-中国-现代 ③杂著-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785号

责任编辑: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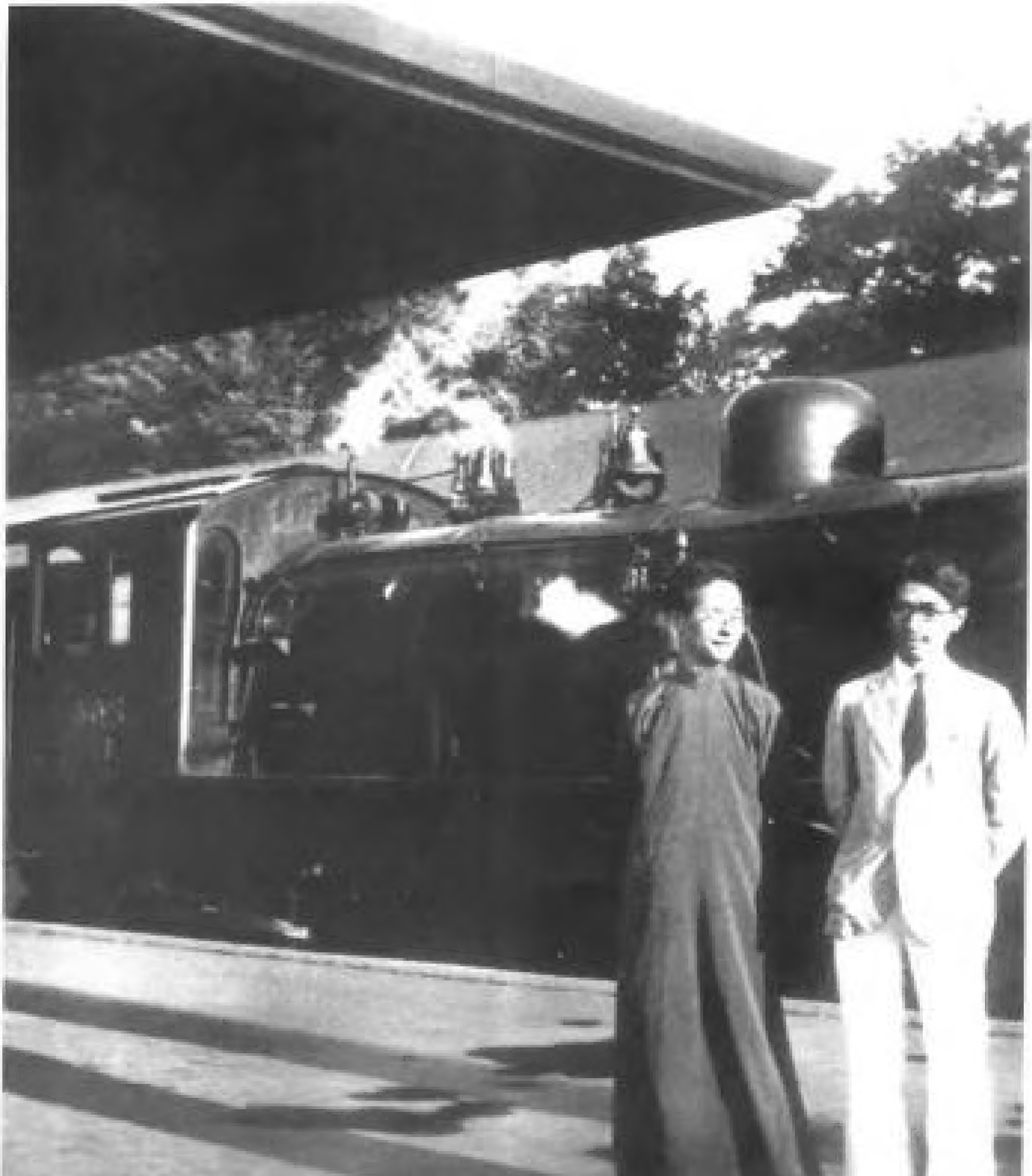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1948年在颐和园霁清轩度暑假期间沈从文计划"好好的"再"写个二十本"文学作品



1933年9月新婚后的沈从文在北平前门火车站为专程来参加婚礼的黄村生表弟送行

1936年沈从文所绘徐志摩遇难处

1949年1月末作者精神崩溃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把他接到清华园家中，给予细致入微的关怀照料。

沈从文1931年6月初访林徽因时在北平远园留影　徐志摩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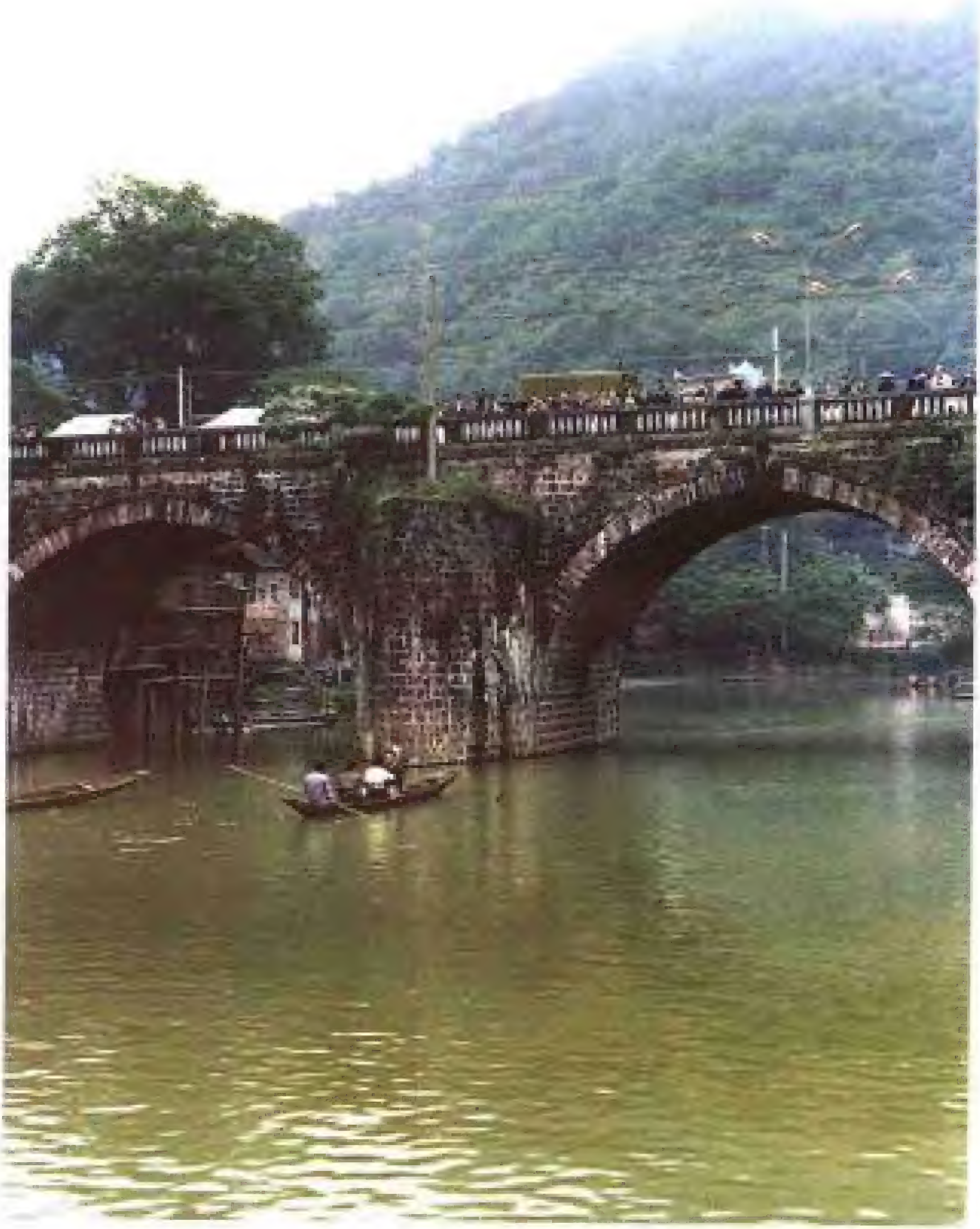
1981年初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演讲，许芥昱教授翻译

1981年2月8日诗人杜运燮夫妇来访

张兆和与沈从文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五十五年人生旅途

考古学家王㐨　　王亚蓉 摄

考古学家王㐨与作者间的忘年交长达三十五载，是沈从文晚年工作中最得力的合作者　　王亚蓉 摄



回归自然——沈从文的骨灰从虹桥下开始洒入绿色的沱江

本卷收沈从文1949年后留下的以史料为主的文字材料，包括：1949年病中所写的自白、历次政治运动中按指定要求写的材料、谈话和建议、杂文和文论、回忆性散文，以及文学创作试笔等。作者生前均未发表过。

全卷文稿分编为7集，其中：《一个人的自白》、《沉默归队》、《史无前例》诸集大体按时间顺序编辑；《谈话及其他》、《无从驯服的斑马》、《无从毕业的学校》和《忘履集》按文章内容与性质分集编辑。

目录

[一] 一个人的自白 1

一个人的自白 …… 3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

——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 …… 20

政治无所不在 …… 38

解放一年——学习一年 …… 49

[二] 沉默归队 57

自传 …… 59

时事学习总结 …… 63

我的分析兼检讨 …… 69

总结·传记部分 …… 76

总结·思想部分 …… 97

“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 …… 124

交代社会关系 …… 129
沈从文自传 …… 137
“反右运动”后的思想检查 …… 156
我 …… 162

□ **史无前例** 169

表态之一
——一张大字报稿 …… 171
表态之二 …… 174
问答 …… 177
关于服饰资料问题 …… 179
上交家中破瓷器的报告 …… 182
我为什么强调资料工作 …… 183
大连会议事情 …… 187
我为什么研究杂文物 …… 190
我为什么搞文物制度 …… 193
关于减薪事感想 …… 196
劳动感想 …… 198
我的检查 …… 200
文学创作方面检查 …… 208
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 …… 215
我到上海后的工作和生活 …… 223
用常识破传统迷信 …… 229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 242
陈述检讨到或不到处 …… 257

外调出版总署编图录经过 …………………………………………… 265
最后检查 ……………………………………………………………… 267

□ **谈话及其他** 281

关于说书 ……………………………………………………………… 283
【备考】今日文学的方向
——"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纪录 ………………………… 287
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 …………………………………………… 297
政协视察座谈会发言稿 ……………………………………………… 317
汇报八月后工作中已作、待作、拟作诸事 ………………… 321
谈谈游美的观感
——在长沙博物馆的谈话 ………………………………… 327
答《日本与中国》编辑部 …………………………………………… 331
答瑞典友人问 ………………………………………………………… 335

□ **无从驯服的斑马** 351

《武训传》讨论给我的教育 ………………………………………… 353
《我的学习》废稿存底 ……………………………………………… 358
一个知识分子的发展 ……………………………………………… 362
大好河山 ……………………………………………………………… 372
谈谈赣剧的《西厢记》和《西域行》………………………………… 375
无从驯服的斑马 ……………………………………………………… 379
自剖提纲 ……………………………………………………………… 383
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 ……………………………………… 385
新的旧事回溯 ………………………………………………………… 387

谈诗 …… 392
喜闻新印《徐志摩全集》 …… 395

□ 无从毕业的学校 403

我生长的地方 …… 405
无从毕业的学校 …… 407
回忆黄村生 …… 418
回忆徐志摩先生 …… 429
怀念郑西谛 …… 439
曲折十七年 …… 448

□ 忘履集 461

老同志 …… 463
中队部
——川南土改杂记一 …… 479
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 …… 486
创作计划 …… 509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 …… 512
青岛游记 …… 532
一、青岛绿而静 …… 532
二、青岛并不静 …… 538
三、记实——看海、看山、看市容 …… 549
四、记虚——新的海市蜃楼 …… 561
新稿之一 …… 569
文学活动计划 …… 580

一个人的自白

一个人的自白

1949年是沈从文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

元旦前,他虽预见到自己"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但当这个"结果"迫近时,1月,外界强大压力刺激,使他预感到二十五年用笔无法一搁了之,而陷于恐惧与绝望,终致精神失常。3月,曾于病中自杀,获救后被送入精神病院。且因病情时有反复,在北京大学的教职无法正常履行。8月,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至秋冬,病情渐趋平稳。

本集为新编,收沈从文病中所写自白性文字10题,实编入4篇,作者生前均未发表过。集名取自其中一篇的篇名。

《第二乐章——第三乐章》、《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和午夜》已编入全集第15卷,《四月六日》、《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和1949年11月的《日记四则》,已编入全集第19卷。

作者病中留下的零星杂感,见全集第14卷《艺文题识录》。

一个人的自白

第一段　引子

经过了游移、徘徊、极端兴奋和过度颓丧，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反复了三个星期，由沸腾到澄清，我体验了一个“生命”的真实意义。一切过去的重复温习，未来的检讨，我企图由一个在“病理学或变态心理学可作标本参考”目的下，写下这点东西。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

就我近一月所接触的各方面问题和事实看来，我已完全相信一个新的合理社会，在新的政府政治目标和实验方式下，不久将来必然可以实现。附于过去社会一切，腐败和封建意识形态，且必然远比政治预言还早些日子可以扫除。由于社会人民束缚的解放，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人力解放和情绪解放），配合了人民革命武力，且比武力赶先一步，向国内各个阴暗处推进，或迟或早，旧的社会分解与圮坍，是意中事。区域性的负隅自固，与个人的固步自封，只是暂时现象。或

扑灭，或改造，迟早终要完成。时代历史决不会回复到那个乱糟糟的旧形式上去。决不会回复到那个无计划的维持少数又少数特权存在方面去。“雨雪瀌瀌，见日则消”①，明朗阳光到处，凡事将近乎自然。这里若有个人的灭亡，也十分自然。

在这个分解重造过程中，因为一切得重新安排，重新调整，重新计划，于谨慎又谨慎的步骤下，人的牺牲还是万难避免的事。出于个人问题，对现实或承认，或否定，总之随处随事都必然会有广泛消耗与牺牲。一切平时与人民生活隔离的知识分子，既首当其冲，对革命来临以后如何自处，自然感到极大的苦闷与彷徨。这似乎可分两方面说：一是“生活适应”，一为“工作方式”。前者经过十年抗战，生活早渐渐与一般公务员拉平，作更新的分配适应，已不会感到什么困难。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如有吃有喝，在一个分配公平政治制度下，能看到社会进步，个人即再困难，也决不会消沉失望。至于次一点，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心理疙瘩，如非得政治设计作谨慎处置，这彷徨、痛苦，致工作进步停滞，是必然的。学校方面短时期一个近于无为的“照常”，可以说是最善的安置。负责方面如有自信可以将国家做好，对知识分子莫取压迫态度，实较贤明的措施。因为照近四十年教育方式形成的高级知识分子，应付工作的心理状态，工作的热忱实十分单纯。正因为政府既极端腐败和无能，还自私而贪得，裙带风正浸透全国每一大小机构，一直到学校。将学术当作点缀，影响到这部分公民，已形成“为工作”的单纯态度，“技术人”的态度。习理工的如此，习文法的也如此。社会如日趋于合理，这些人在“照常”方式下，将能得更多鼓励，即

可于一个极短时期中，与新政一切设施取得完全合作的步骤。这事在北方尤其容易。换言之，凡保留在学术工作岗位上的知识分子，过去廿年从未和四大家族特别势力有〔联系〕，思想改造实无多大问题。政治的合理与进步，改造或争取他们，比向其他官僚政客以及……任何工作容易。他们已近于一个“技术人”，只要有个工作环境，即可望进步而前。□□□□北方目下学生的容易运用，他们或多或少都尽了点力。学校的进步思想，虽由于少数所领导，至于客观知识，是这个多数给贡献的。

这些问题到此为止。我要说的也不过是因为自己是个从业员而涉及罢了。可是不过从业员有些不同处，犹如一个科学专家和一个文法部门的某种专家，大相悬绝。前者工作照常，后者则不成。后者在目前触着了一个“思想”问题。既涉思想，即有根深蒂固连续性，顽固排他性，不仅限于“当前”，还要检讨“过去”，防止“未来”。“过去”不免要从各种方式下受清算，办结束。这是个真正问题。极明显，有些人是有问题，从一个新的制度新的尺标衡量下，看得出来的。问题正逼迫着他，不能不寻求明白简单正确的答解，死或生。社会对于他一时或者还来不及注意，他自己却必然要注意找寻答解，死或生。

为寻求答解的正确，一切妄念幻象均得剥除，来看看什么是“自己”。这里即包含了生命过去。由过去释当前，线索或比较容易明白。

照普通说法，把人分成两个类型，内向与外向，相当简单，比阶级划分有时还适用，也省事。有时处理一些小问题，用这个分法，也居然能用得开。内向或外向有必然的限制。

一个年龄将及半百，生命已成熟，……生命全部发展虽相当复杂，不易从这个解释得具体，但由此追索，也可望如脱解连环，剥茧抽绪。建立一种个别的文学批评，从作品向深处追究探索，得到些新的发现。但决无可望将本质与生活经验共同形成内向或外向的种种，弄个清楚明白。任何忠诚坦白的自传回忆也……因为这实在是倒因为果。我如今要试一试把自己当成一株苹果树，来检讨研究一番。从由发生、接枝，到作种种不同的移植，又由于土壤不同，气候有别，以及偶然因子侵入（如在偶然中，一个枝子被路人攀折或衣服挂着受害），因而如彼如此，在廿年中同一株树结的果子如何不同。假定结的有好有坏，或者阳光充足，根柢营养又充分，结的却全是虫蛀变质的恶果，总有个原因！必然有个比表面问题深些的原因。

这种检讨对个人自然是一种痛苦事，但无碍于真实。因为事实已到决定这个树是自行枯萎，或他人砍伐□□□风雨……时候。一株真的苹果树，到这时节用的必然是“自然主义”或“道”来应付，枯萎或砍伐都好，两样结束只是同一件事情，生命的终结。应付它是顺天而委命。可是这株苹果树如有“思想”，苹果树如是一个“人”，这个人如恰恰又是“我”？新的时代要求于人的是“忘我”“无我”，忘掉或去掉那个小小的，蜗缩的，有限的我，而将“我”溶解于政治进程中，社会要求中，或者说，一个“为下一代合理、进步、幸福”大原则中。这要求虽已形成一种人的能力与精神解放，见于事实，成为国家新的建设基础，不可否认，不会更易，决定历史也产生历史。然而在许多人，尤其是近三十年学校教育造成的知识分子，到处分那个“我”时，少数虽能摆脱

一切，而接受新的，毅然独往，或追求预言，用生命去实证，表现忘我无我时信仰或认识之坚强。至于另一个多数，大致还是定向不明，□□有内有外，而外来风雨无时……或由于习染难除，或由于认识不清（从近三十年学校教育分工制看来，学校知识分子不易认清历史的发展必然性，是极平常现象），不免要作一种长期辛苦挣扎与断然抉择。他会受一切新的关系的吸引，也受另外一组旧的关系的束缚。接受“抽象”即十分勇敢、兴奋、激昂，摆脱“事实”可能需要作极大而长久的努力挣扎。照例总比青年慢一点，要比较缓慢，以及迟钝好些，因为……“我持”越强的人，越需要作较大努力。在这一点上，为否定昨日之我，值得作些全部分析检讨，“我”是什么？由何而来？结论不在自饰，时代已不需这种虚伪装饰，更不在自辩开脱，时代已不许用如此方式自脱。要真实，惟有真实，这棵苹果树才有个未来，或被决定既无助于人类生存进步，不如连根拔去，当作柴烧，付之一炬。或被决定还值得保留一时，重新移植，结点对下一代人还有益的果子。这检讨虽出诸自己，决定却属于外缘，“人”、与“时”、与“事”。我应当完全放弃我之为我处，委生命于人天。我已深深体会到人与人的不可分割性，相关性，连续性。“我”是否重要，在于对将来多数的人是否还有意义或影响。这点检讨本意也即由此认识而来的。

第二段　内向的形成

我是个内向型的人，长处或弱点统统由之而生。

凡说及“内向型”的人格发展时，一般心理学都曾作过

种种探讨和说明，有些什么特征，有些什么倾向，长处与弱点，以及在人事关系上又有些什么可能。精神病或神经病学，大致和这个型的人格更多复杂关连。这是一般理论。不过这问题的较深理解，还……即出自专门家，称引过若干实例，能对某一个体说得透彻的可能还是不多。因为人有类型与差别，大多数的群，用类型可以概括，少数的存在，有时却差别十分大。

由于家道中落，长时期贫困，体质孱弱无从补救。生长小乡城社会，若顽童群免不了日有殴斗事点缀于生活间时，败绩纪录用任何勇气总不易抵消。由于私塾制诵书习惯，读到七八岁时，四书五经及杂诗的温习，任何驯善孩子都必然感到担负沉重，而发生反抗。在小城市里，当时最受称道的教师，就是老而□□，在一种变态心理支配下，最严格无情，对学生完全如生死冤家，只能拥护孔老二，最狠心虐待学生，用特制楠木板，把触犯□□学生，按倒在孔老二牌位前，□学生伏在……上，任何小事也能激怒到□□□□□二十三十大板，打得个学生杀猪般叫喊，□□□□□。从这时起的我，一个具内向型的主要条件已形成，随同这个类型的特征也即起始见出。脆弱，羞怯，孤独，顽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家道日益贫困，且增加了这个对同年分，同小集团的亲友疏隔。于是永远有“不承认现实”的因子，随生命发展。但本身既拘限于那个小范围现实，自然向幻想作种种发展弥补。尤其是由之而来的屈辱，抵抗报复既无从，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动力来源。从此后使用到求自由工作上的仿佛“永无匮乏”情形说来，就可知这屈辱的积累，影响到

个人生命有多大，多深。也由此可知，一切发展必然是防御的，不是进取的。是机智，不是魄力。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

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你们女人中有作过小丫头童养媳的没有？作过□□小商店的小学徒，必须侍候许多人烟茶，并将一切小过失推置于她身上承担的职务没有？若有那么一个人，也会说得出相似不同痛苦生活经验。否定因之在我生命中生长。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旧家世"固然容易使一个纨绔子堕落，却帮助了我个人在困难绝望中挣扎。一面随环境流转、一面从学习上找新机会。

但是真正可学习的，当时实在只有一面认识人的关系的"丑恶"，一面认识军人对社会的"罪恶"。由辛亥以来形成的大小军阀割据……种种罪恶，即小军阀群的内哄，以及势力平分得到小小稳定时，各在小小防区内如何无情的兽性扩张来鱼肉人民。三年中只看到一片杀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上千被屠杀者最后手迹（用墨取下的手掌印结）即由我整理，保存到军法处卷宗里。我看过这种杀戮无数，在待成熟生命中，且居然慢慢当成习惯。一面尽管视成习惯，一面自然即种下永远不承认强权的结子。总觉得现实并不合理。这世界如不改造，实在没有人能审判谁。凡属审判，尽管用的是公理和正义作护符，事实上都只是强权一时得势，而用它摧残

无辜。说现实，我所接触的实在太可怕了。一个普通中学生，若在这个情形下受现实教育一年，他不疯狂才真是奇迹！我可受了三年五年这种现实教育。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捉鸟，捕鱼，猎狐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

体力既未得到好好发展，生活又在这么一个环境中，而且还长时期随同部队无目的的流转，生命——属于“思索”和“生理”的，却在这么情况下逐渐成熟，请想想，这应当是一种什么发展？从现实环境说来，我早应当被困难打倒了。可是没有自杀，因为在“否定”中有力量支住了自己。我也并没有堕落，内向型的胆小而贫穷，在那种生活方式中，实无从堕落。也因此，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乡下人，即或娼妓，品性无不十分善良，为的是我所见到的那个阶层，本来全是善良的。与外人的关系，甚至于近乎“家庭”的。因为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人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外一种可怕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还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还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

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

这份教育既在无可奈何中承受下来，外面环境又还永远在变，生命于是不能不随同流转。在各种失业情绪经验生活挣扎下，作无定向流转。到处是伤，却并抚治伤处机会也得不到。小客店的寄寓，长时期的落雨，陌生的人，无情的社会，我如一个无固定性的小点置身其间。“否定”在生长中，随“幻想”而生长，因为这是求生存唯一的支柱，二者合并作成一个抽象而强韧支柱，失去其一都不会继续生存，产生“未来”。若仅有前者，将必然早成为小军阀的炮灰，或因作土匪遭人枪决；有好些无辜而失业的年青人，都如此草草结局。若仅有后者，不是疯狂自杀，即早已作庙中和尚。两者既同时存在，我于是活下来了，在自己也不甚明白，他人实更不易设想境况下，飘流转徙活下来了。（这其中自然还有《孟子》上几句话：“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简单有力鼓励我在绝望中不至于胡涂死去。）于是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可不是你们生长于城市寄生于家庭，在生活上小小得失上作的那种微笑，完全不是！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我好好保留了三十年在嘴边，而你们高级知识分子在近几年中，却把这个微笑解释作“世故”。我倘若稍稍学懂了点你们城里人世故，今天不会如此自处。我因之在半世纪不断变换的环境永远在不同教育，不同××的人中，从不同印象中——却得到一个同一的称呼“神经病”。凡指摘我的，诋毁我的，并以自己生命或道德的完整进步自夸的，是不是也曾经在相同情形，那么

一种发展中受过试验，受过教育，并同样挣扎过来？还是因为侥幸生于小资产阶级环境中，得到良好的保护，以及其他更多知识环境的便利，才有机会能够给我以批评，以检讨，以审判？年青朋友都欢喜说人生如战斗，战斗方式自然极多，我很知道。可是可有一个人在十六岁到廿四岁间那么和人生战斗过来，在三十年挣扎中而取得更健康合理发展？或从理论上可得到更健康的结论？我想得到一个回答。

当时既一切俱无，朋友或工作，希望与等待，什么都无。维持生命除空气就只是一点否定精神，不承认精神。一面接受现实试验，一面加以抵抗，不断改造自己。我就用那点仅有机会，仅有空闲，读了一堆书，并消化了它，完全反复消化了它。有老庄和论孟，有韩柳和温李，有传统驳而不纯的叛逆思想，也有传统华而不典的文辞。加上个脆弱生命所遭遇试验，经验和书本知识，却共同在生命中作成一种动力，终于把我挪移离开了那个小小环境，转到了有骆驼、学生、京官和议员的北京了。

初初到这个大都市来，上街见到最多的就是骆驼，所得印象是充满风沙阅历而目光饱含忧戚，在道上却一步一步走得极稳。每天翻开报纸，照例是有关议员的意见和新闻。至于学生和京官数量虽极多，对于我却似乎是个抽象东西。和我离得极远极远。事实上什么都离得极远！学生中给我印……是三种人。

这是个有一百万人的大都市，由总统府到天桥，由京兆尹到小店员，我没有一处熟习的地方，没有一个熟习的人，没有一件熟习的事。手和心都空空的，寄住在杨梅竹斜街一个小会馆西厢房里。长夏的雨水，小《实报》每日新闻都有

坍墙砸人消息，住处房中既然湿霉霉的，墙上也一片水渍斑驳，似乎随时都可完全坍圮。同伴“满伙计”肺病已人第二期，喉头哑沙沙的，一个地主小儿子，即《雪晴》中队长的弟兄，这次同来北京求学读书，到地第四天后，就十分想家，念念家中的菜园和碾坊，老母亲和白狗。我想的却只是“当天”和“明天”，面前过日子就是一种严酷现实教育，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把日子维持下去，由当天到明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没有一本书可以指示。

会馆里四合院，住的同乡有卸职候差的科长，报考落第的穷学生，退伍的小军官，领少额干薪的挂名部员。夜里到处房中都有咳嗽声，从声音中即可辨别得出有多少是老病。住正房管会务的叶老表，长年躺卧在烟盘边，从不知经济来源方式下竟躺了十年，小火炉旁还经常炖有猪蹄髈下酒，二太太手上头上金饰也亮灼灼的。长班小二一身瘦瘪瘪如一片干姜，终日在各个房间里串动，即买两个烧饼也会从中取得一点“底子钱”，叫煤球时照例七十斤即抵整数。加上在门前摆个小烟摊，一家三口竟每天可吃蒸馍，还向穷学生放点大加二小债，三元五元出手时从从容容。

生命或生活，既为雨水固定在会馆中，似乎有所等待，其实等待的只是“不可知”。一面茫茫然半天半天站在会馆门前欣赏街景，一面又回到湿霉霉小房子中，看床前绿苔和墙上水渍。和面前世界完全如绝缘。即过去在乡下小河边山坡上太阳下作的梦，也不免受雨水影响弄得模模糊糊了。在这种景况下，回向过去，一片生活印象的重重叠叠，虽充满无可奈何，失业接着失业，各地流转，屈辱和饥饿，在各式不同情形下环境中，如俄国梭古罗卜微笑小说中的主角身份，

永远勉强用微笑抵挡一切无可奈何，到第三次微笑，才下决心迈过了桥栏，向水中跃去。事实上却比这一位处境更加倍恶劣，更不知如何是好。然而一面是青春生命力的无比旺盛，即从这一切不同景况中，也仿佛可以得到“学习”的经验。……且日益积累中形成一种比任何书本还有启发鼓舞的力量。另一面又有个多式多方田野自然的背景，和另外生息于其间那一群，尽管生活极端平凡、简陋，本性实在极端善良的兵士和人民，他们的小小得失哀乐，唯其与我已经离开，反而能更加深刻认识。到了北平新环境中，和这一切离远了，即这种痛苦回忆，竟也成为我生存的最大快乐和支柱了。这个发展既酝酿于成熟的生命中，自然会同时影响到后来的写作生活，一看即显然的。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和了真实和幻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也即由之而来。历来批评者对于这一点，都忽略了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唯有一个刘西渭②，能稍得其解也还不够。这个老友的文章特点是在……自得其乐较多，而对作者生活作品却无多兴趣。这也就是我对于批评永远不能心服，不感兴趣的原因。如果批评从“思想”着眼，用公式和一定形态加以范围，自然更不会得到要领，毁誉都若并无意义可言！甚至于搔不着痒处的赞美，比有意□□更还难受。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对于工作信心的加强，坏处即个人气氛的抬头，随之而下便不免顽固，坚信思维的庄严，从自由主义者名分下，发展而成为他人政争工具，当作靶子或盾牌。先是不自觉，到后来，则由负气而转增加负隅自固徧持，终于在自己所形成的□□孤立情绪中，完全无从自脱。这是有关思索写作的发展过程。目前来加以

检讨，说它是不见阳光的病态结果，并不过分。但这种不见阳光的由来，实有个更深远的背景，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却不是一般批评指摘所能见到的。

“失业”本是近四十年代军阀封建政治一个普遍现象。先是大小军阀的分区割据，对人民就业根本无所谓计划。不仅教育无计划，利用为狗腿子也不计划。军阀本身及所率领集团，即凡事只是随习惯而拖混下去。在集团以外，从不曾有个好好安排。到兼并时代一过，有个强秦一统后，又还是唯知有己，在极端包庇独占贪污自私情形中，少数分赃而多数无业，所以近四十年“失业”本是现社会万千人民一种普遍经验，不值得一提。不过我却是从小小区域里充分接受这种社会教育多年以后，又转到另一个完全陌生大城市里，来接受相似而不同，更漠然无情的社会教育。唯有相同经验的生命，方能明白这种教育影响到一个人另外一些问题上时，会有些什么不同结果。好或坏，反映到抽象人格具体行为两方面时，可能如何必然又如何。长处和弱点所自来，却由于同一源泉土壤，决非两种雨露阳光。是一个整体，并非零碎枝节。

为求生存，我得挣扎，于一切可能中作种种努力。求学既无可望，求职亦无可望，唯一是手中还有一支笔，可以自由处理一点印象联想和生活经验，来作求生的准备。但是，这对于□□求□生，□□□□□保持最低健康，不至于饿倒大马路，阳沟边，在同学同乡同什么小集团独占一切情形下，我想用这支笔突破社会习惯的限制，得到最低生活的需要，当时实毫无希望可言。

明白手中所操纵的工具无多大用处后，想去作作什么小

工，依然没有机会。曾到琉璃厂几个小石印店里去，请求收容作一个学徒，几个小字虽还看得去，因为无□□保，交涉就不成功。最多机会是去天桥或前门大街一带，跟随奉军直军什么部队的“招募委员”那支小白旗，明白大都市可以用一些□□骗人一套，把兵招来，向不可知地方走去，目下的伙食和将来的生命，都有了个交代。因为一直到北伐成功前夕，在北平前门外大街上，天桥附近，就时常还可看见那么一两个烟容满面的老军务兵油子，手执一个破旧小小白布三角旗，在路口停顿，旁边照例站了些闲散杂流，听他说话，宣传部队待遇和将来希望。照例还在技术上预先安排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同伙，作为受感化后陆续站到旗子下来，于是当真也就有三五个面容憔悴，眼神痴呆的年青人，外省前来投奔亲戚进退不……同样归于旗下，表示乐意跟随归营。一会儿，这面小白旗就带领了一小串失业人走去了。至于走到什么地方去，为候补炮灰，或为军□□转卖出关作小工，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我曾有过好儿次跟队的经验，茫然漠然走了一小节路，终于又离了群，停顿到路旁，眼看着那个死亡队伍远去。随即从前门大街茶食铺的点心，羊肉铺的羊肉，和一切铺子窗前的陈列，与广告的炫耀，或什么小铺子门前有喇叭的留声机放的《洋人大笑》片子，吸□□忘了一切也忘了腹中空虚，暂时忘了自己的失业和饥饿。眼前的就永远是不属于我的。一切存在和个人都若无关系。我希望即或是吵骂，能参加一份也好，可是前门大街人来人往虽相当多，想得到这点机会就并不多。只合完全游离于生活以外，作一个旁观者。比数年前在辰河流域小县城游荡情形还更单独，更无可奈何，为

的是大城市社会背景也如此陌生，凡是大门都关得严严的，没有一处可以进去。全个社会都若对于陌生客人表示拒绝。向前希望远景十分模糊，唯一还是回复过去，把那点过去属于自己的痛苦和寂寞，镶嵌在各不相同自然景物中，一再温习。尤其是儿时无拘束的生活，所保留的新鲜快乐印象，可以把当前的绝望勉强稳住。直到街灯放了光，什么铺子放话匣片，唱马连良《失街亭》，我的求生梦也消失了，才向会馆那个方向走去。

回到会馆里时，即装作业已吃饱的神气，看同院子里人吃饭，也看长班小二一家人吃新出笼的白面蒸馍。不多久前有人批评我说，我“对人生永远像个旁观者。一切作品都反映这个态度，缺少直接深入和迎战勇气”。我曾试假想过，当时如采取非旁观态度，不知应当是种什么情形。我能不能参加任何同住的那顿晚饭？我能不能随意动手去取长班家蒸笼中那个热气腾腾的白馒头？我能不能每天去会长那里靠靠灯，到吃饭时就不客气，起箸说请？很显然这不是一个勇气问题。旁观者其所以永远如在旁观，原有个现实背景缚住。一切作品都缺少对人生深入，只是表面的图绘。原因是人生在我笔下，是综合的，再现的。

雨季过后，在农学院读书的表弟，为想法付清欠账，把我迁入西城一个小公寓里，以为可以照报纸上需要，就近在几个报馆考考校对和书记。花了些报名费，结果自然没有一处成功。只看出这事完全是个骗局，同样是失业人，狡猾一些骗愚蠢一些的，于是报名费便成了学费，向大都市学习另外一种现实的第一课。

又到几个学校去报考，比如中法大学吧，考取后，到时

那笔宿膳费廿八元想尽了方法却筹不出，一过期，还得放弃。补习学校更多是当时穷学生开的合伙文化稗贩小铺子，没有钱，那里能随便进出？报上消息常说某某学校学生可以工读自给，到我来请求这个机会，带了自荐信去谒见当局时，想不到他们对于这种事都毫无兴趣，照例率直回答，没有这回事。只有一回在平民中学碰到个中年模样人，直接把信给他看，看过后点了点头，向我客客气气说了几句话，以为千里求学，意思很好，可以为想想办法。过两天居然还回了个信，说是“想过办法，已满额，将来有机会一定留心”。

到平半年唯一古道有情陌生的帮助，还是住西城时一个每到黄昏即摇铃铛串街卖煤油的老头子。因为买油熟习，过年时借过我两百铜子，度过了一个年关。这就是《边城》中的老祖父，我让他为人服务渡了五十年船。并把他的那点善良好意，扩大到我作品中，并且还扩大到我此后生命中，想尽一切方法帮助年青人，一切都作得十分自然原因。凡是曾经在我作品中那只渡船上，稍稍歇过一回脚，把生命由彼到此的，都一定间接得到了一点助力。溯源而上，会发现两百铜子即影响到多少人生命情感这么深。生命的连续性和传染性，实在惊人。但这么一种发展，自然不会是普通人所理解了。

相对照是我把所有初期作品上百篇，向一个著名副刊③投稿时，结果却只作成一种笑话传说，被这位权威编辑，粘接成一长幅，听人说在一回什么便宜坊□□客吃烤鸭□□，当着所去一群名教授××××说……一齐揉入字纸篓里。这另外一种现实教育，这对我的侮辱，还是一个曾经参加这次宴会的某××，后来和我相熟以后，亲自告我的。为了否定

它，也就把我永远变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吉诃德”！凡曾经用我的同情和友谊作渡船，把写作生活和思想发展由彼到此的，不少朋友和学生都万万不会想到，这只忘我和无私的抽象渡船，原是从一种如何“现实教育”下造成的！我如不逃避现实，听狭隘的自私和报复心生长，二十三年后北方文运的发展和培育，会成什么样子？不易想象。也必然不□□□□□□手中，落□□准备□□□□□的□□□□中。

本文稿首页有作者附注：“三十八年二月清华园老金屋子文稿二计十六页”。目前发现的手稿只15页。

手稿的修改字迹中，有一遍是用红色圆珠笔写的，字迹较模糊，并多处用“……”符号，表明还待展开写。现以楷体排出作者用红字插入的部分，以“□”代表模糊字迹。据手稿整理编入，篇名为原有。

① “雨雪瀌瀌，见日则消”　据《诗·小雅·角弓》为“雨雪瀌瀌，见晛曰消。”《汉书·刘向传》为“雨雪瀌瀌，见晛聿消。”

② 刘西渭　李健吾的笔名之一。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作者所指刘西渭文章，为1935年刊于《文学季刊》2卷3期的《〈边城〉与〈八骏图〉》。

③ 著名副刊　指1924年时的《晨报副刊》。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

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

科学的发现或发明，常有些“偶然触机”记载。虽由于偶然触机，影响文化史却相当大。文学艺术的优秀记录，常有相似情形。关于西南漆器的收集，截到现在为止，就个人所知，北大博物馆所有的十余器，还是一般工艺美术问题上未讨论到的事情。这些器物有助于吾人对西南文化的探索，事显而易见。但是这些器物的收集，即从个人的幻想触机而得。这幻想还影响到另外两个朋友[1]更伟大的探索与发现：即滇西大雪山的自然景物雄伟与清奇处，第一回由一个国画家保留了下来。古宗族么些文[2]象形字典，又由另一人积十年辛勤终于产生。这两种收获，在近十年个人工作记录中，实创造了一种新记录，值得重视。

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音乐和美术的爱好，以及对于数学的崇拜。从一个亲长口中，知道一切问题都和数学碰头，宇宙间至大和最小都可由数学测知，而一个新的进步的文化或文明，数学恰占有主要位置。真正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更离不了数学的处理。所以我尊敬数学甚于一切。

至于对音乐和美术爱好，来得实源远流长。从四五岁起始，这两种东西和生命发展，即完全密切吻合。初有记忆时，记住黄昏来临一个小乡镇戍卒屯丁的鼓角，在紫煜煜入夜光景中，奏得又悲壮，又凄凉。春天的早晨，睡梦迷胡里，照例可听到高据屋脊和竹园中竹梢百舌画眉鸟自得其乐的歌呼。此外河边的水车声，天明以前的杀猪声，田中秧鸡、笼中竹鸡、塘中田鸡……以及通常办喜事丧事的乐曲，求神还愿的乐舞，田野山路上的唢呐独奏——一切在自然中与人生中存在的有情感的声音，陆续镶嵌在成长的生命中每一部分。这个发展影响到成熟的生命，是直觉的容易接受伟大优美乐曲的暗示或启发。到都市中来已三十年，在许多问题上，工作方式生活取舍上，头脑都似乎永远有点格格不入，老是闹别扭。即勉强求适应，终见得顽固呆钝，难于适应，意识中有"承认"与"否定"两种力量永远在争持，显得混乱而无章次。唯有音乐能征服我，驯柔我。一个有生命有性格的乐章在我耳边流注，逐渐浸入脑中襞折深处时，生命仿佛就有了定向，充满悲哀与善良情感，而表示完全皈依。音乐对我的说教，比任何经典教义更具效果。也许我所理解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乐曲节度中条理出"人的本性"。一切好音乐都能把我引带走向过去，走向未来，而认识当前，乐意于将全生命为当前平凡人生卑微哀乐而服务。笔在手上工作已二十六年，总似乎为一种召唤而永远向前，任何挫折均无从阻止，从风声、水声、鸟声中，都可以得到这种鼓励与激发。从隔船隔壁他人家常絮语与小小龃龉中，也同样能够得到。即身边耳边一切静沉沉的，只要生命中有这些回音来复，来自多年以前的远方，我好像也即刻得到一线微光，一点热，于是继续摸索

而前。试从深处检讨，可以说正是一个受伤灵魂必然现象。社会给我的教育太多了，十二岁即已教会我能思索。一切由都市文明文化形成的强制观念，不是永远在螯我烫我，就是迷乱我，压迫我。只有一件事给我生命以力量和信心回复，即仅具启发性的音乐。为的是一切伟大乐章的组成，不是传统观念的强迫，却反映作曲者对于生命或情绪所作的自由解释。作者既有生命悲哀或欢悦，向往和倾注，有愿望受挫折以后的突进，以及对于人性脆弱的怅触感怀，由于生命经验复杂的综合，而经过重新整理排比，从一种形式中完全重现，即有鼓励或抚慰，重在将一个全人格溶解于音程中，回复其本来作用。这个心或生命，若与观念教育有关连，而受抚慰得平复的过程，又和音乐交替反应关连，就可知音乐教育我，实在比任何文字书本意义都重大得多。对于生命的欢欣，死亡的肯定，一个伟大作曲者，他也必然能理解，并理解到这种受伤生命皈依的庄肃，即用它当成创造的动力。

我爱美术有相似而不同情形。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就记忆所及，最先启发我教育我的，是黄蜂和螃子在门户墙壁间的结窠。工作辛勤结构完整处，使我体会到微小生命的忠诚和巧智。其次看到鸟雀的作窠伏雏，花草在风雨阳光中的长成和新陈代谢，也美丽也严肃的生和死。举凡动植潜跃，生命虽极端渺小，都有它的完整自足性。再其次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

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浸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

这种美术既和“职业”相关联，欲从事必自学徒作起，我自然无从参预。到后又知它与“教育”相关联，只有学生能有机会，我自然更无望参预。但我对于美术的理解和兴趣，前者很明显即比普通美术理论大不相同，也容易和一般鉴赏家兴致异趣。加上十年流亡转徙生活教育，自然景物与人生万象，复轮流浸润于生命中。凡百人事总于一个不同季候不同景物背景中发生存在，区域性独一性因之分外鲜明。个人生命即在这种错综繁复人生中发育长成，戏剧和图画的本事，因之保留无数不同篇页而永远长新。即缺少美术史的严格训练，爱好与理解，自然和普通人已经大不相同。和音乐关系二而一，我能从多方而对于一件美术品发生兴味，一个有风格有性格的优秀美术作家，他工作也似乎乐于有这种鉴赏者或评判者。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

这种爱好很明显，即到乡村，到都市，实没有满足学习希望的机会。“美术”虽与“人生”不可分，和“我”似乎会要完全隔离了。可是也正因为这一点，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为扩大知识范

围，到北平来读书用笔，书还不容易断句，笔又呆住于许多不成形观念里无从处分时，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于是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二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再加上一堆杂书，由《医宗金鉴》、《麻衣相法》、《法苑珠林》、《吕氏春秋》，与二十年实生活经验……就是这么一份原料，到学习能用笔有所叙述，想从原料中提出一点东西自由塑造时，文学运动的要求，又恰恰是“乡土回复”与“个人自由表现”理论流行，并得到社会认可时。作品因此突过必然的挫折，能够在刊物上和读者见面。

如果当时能有机会受一点美术史训练，来写美术欣赏，或有基本作曲训练，来用音符表现生命情感起伏与连续，我相信，成就都必然比文学来得大，来得深，也来得容易。事实上由于种种限制，却被迫得用写作继续生存，用生僵呆定发霉发腐文字，来把脑子里与颜色声音分不开的一簇簇印象，转移重现到纸上。初期作品的驳杂，无疑是这种尝试应有的失败。因为要表现要解释的，本不宜于用文字处理。就中虽有少数又少数短短篇章还稍稍看得去，大多习题实在浪费中。但批评家照例只重视作家位置，不计数过程，所以当苏雪林和韩侍桁两先生各从一个观点对作品批判时，即忽略了这些作品的试探性。韩先生想从作品中找寻“社会意识”，苏雪林又想从作品中找寻“人生哲学”或其他东西，当然都失望。其实如有一个人敢大胆简单的向我说：“这是一种样

品，从生命复合物中仿照文学提炼出的一种不成形东西，原料虽丰富，可完全不合时代需要。”我倒将报以会心微笑，全部接受。或者即因此改业，也说不定。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唯有这个批评家从作品深处与文字表面，发掘出那么一点真实。其余誉毁都难得其平。

自己的批评当然比外面检讨严酷，从作品不断试验检选中可以见出。就思想说，我的思想与其作种种不相干比拟，不如说至今还停搁在子部的农家许行和墨家宋荣子两者综合上。它实在相当旧，但也可以解说得极新。重要的是它近于固有的中国农民型与社会型，而形成一个现代文化中的新的复合物，在试探发展中得到一点记录。手中笔知有意识来使用，一面保留乡村风景画的多样色调，一面还能注意音乐中的复合过程，来处理问题时，是民十七写《柏子》，民十八九写《腐烂》，写《丈夫》，写《灯》和《会明》。这些文章当时实为大多数同学举例用。在学习上我起始注意到传达效果，由不同读者得到的反应。而自书本上，我从佛道诸经中，得到一种新的启示，即故事中的排比设计与乐曲相会通处。尤其是关于重叠、连续、交错，湍流奔赴与一泓静止，而一切教导都溶化于事件“叙述”和“发展”两者中。这个发现又让我从宋人画小景中，也得到相似默契与印证。或满幅不见空处，或一角见相而大部虚白；小说似这个也是那个。作者生命情感、愿望、信念，注入作品中，企图得到应当得到的效果，美术音乐转递的过程，实需要有较深理解。

民二十过了青岛，大海边的天与水，云物和草木，重新教育我，洗炼我，启发我。又因为空暇较多，不在图书馆即到野外，我的笔有了更多方面的试探。且起始认识了自己。人贴近都市，生命实永远见出格格不人处。都市无章次的动，和我生命中的动完全对立，使我存在如不存在。过去想入燕京大学国文系，考试失败，得分为零，现在来到国文系教书，还是得分为零。我应当回到我最先那个世界中去，一切作品都表示这个返乡还土的诚挚召呼。“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回到那些简单平凡哀乐中，手足肮脏心地干净单纯诚虔生命中去！我熟习他们，也欢喜他们，因为他本是我一部分。”但自然无从回去。欲勉强学作城里人，便照当时写都市见风格的《绅士的太太》和《八骏图》，改佛经故事为传奇的《月下小景》，而真正酝酿的，还是一次去崂山玩时，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那个人就说：“我完全相信。女人生命本来就是由信出发，终止于爱，恰恰和你们男子一切由思出发，终点为知；二而一，都接触了生命本体，了解了生命。方式可不一样。”其实这个人当时并没有说什么。这些话全是我从她一个微笑中翻译出来的。但是翻译得相当正确，从过去十六年生活中，得到完全的证实。

生命在成熟中，为自然景物、书本知识，以及一种幸福预期友情与爱情中培育，单一而沉默的逐渐成熟。十七岁以

前，过去受伤的心、受伤的灵魂，一面为新的环境及在发展中的一切而小小平复，一面那个“让我回去，让我回去……”的召呼，便依然若来自远处，又如来自近身。《边城》于是也在酝酿成熟中。

二十二年从青岛转回北平，我结了婚，身和心都仿佛有了着落，又仿佛依然还到那个原来地方去，且将用不同方式进行。这是一条多远的路，一种多麻烦的行程！九月结婚，十一月③《边城》写到一小半时，当真即向家乡跑了。《湘行散记》诸篇章，就是这次行旅的日常报告，是人在中途心在北平的一种记录。回到北平续写《边城》，又恰恰是人在北平心回乡下一种记录。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人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模型虽很小，素朴而无华，装饰又极简，变化又不多，可恰恰和需要相称。

那里的翠翠，秉性善良处，熟人一看即可明白，和当时的新妇实在相差不多。但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也就要成为预言。一切发展全如预言，在十五年后将用事实证明。塔圮了，船溜了，老船夫于一夜雷雨中死了，剩余一个黑脸长眉性情善良的翠翠，在小河边听杜鹃啼唤。一个悲剧的镜头如此明白具体。

试用爱美术和音乐的方式来写作，虽可收到一点点不同效果，用他来应接人事，尤其是都市中的复杂人事，当然有些费心，费力，而结果必无好处。那在家庭一个由“信”出发终止于“爱”，一个由“思”出发终止于“知”，也必然于

求适应谐和中有不易接榫处，得相互作不断修正，以及用更大克制来学习经验，方可勉强维持。其时经济上和时间上，都像是容许我把生命一部直接消耗到美术品的搜集上，因此有机会进而从北平市面还缺少商业价值，却具有充分美术价值的明清彩瓷和青花瓷平面小件器物，有系统保留一点印象。这种生命分散的形式，像是有使我离本日远的趋势，不能说是理想的，却可说是适合当下环境的。正常工作是教科书和文学刊物的编辑，后者工作实在牺牲情形中为他人服务，我作了一个新旧之间的桥梁。照北方文运传统制度，鼓励每一作者谨严把握工作，面对历史，人自为战，一些年青作家所得到的便利，应当有些和历史正面发展相关联，初期鲁艺学院文学部门的工作，这些作家即占了个多数。

战争来了，国家既在一切无准备情形中，接受了这个历史性严格试验，个人自然也免不了如此急剧匆忙，来应付面前现实。我得在七小时后离开北平，是八一三前夕一个朋友临时的通知。

但是，风向什么方向吹？实需要一种抉择。当时本有两条路可走，西南或西北。

出于过去生命所储蓄，所积聚，形成的愿望和能力，能向西北农村走，对我自然是一个大转机。因为多少年以来，即有一种看法，他人出国留学，我倒想看看东北和西北土地人事，从寥廓、朴素、简单、荒寒、陌生背景中，可以体验出更多不同的变化和生长。手中一支笔，也正好为一些新的课题而重用。西南都市我比较熟习，实在学不了什么。上海南京武汉都住过，早已感觉厌倦。且深深明白都市人事不易

适应，为改造自己也唯有向陌生处一方走。但在习惯上和家中人生活关系上，我终于随同北方师友，向西南跑了。于是一直到了云南，除在联大教点书，于滇池边两个村子里住了八年。

熟人到云南的，多有机会游山玩水，访奇探胜，以为既来云南，著闻于史志的点苍鸡足二山，路南石林大瀑，不能不寓目。又或因其他便利，还可向更远处走去，自然更容易得到许多动人社会景物印象。尤其是几个科学家的工作成就，值得敬羡，几个社会学家部分的调查，意义重大。我一家人却只守住昆明滇池旁一个小点上，和一群普通本地人及若干青年学生，发生亲密接触。然而这种无私心无蔽隔的相处关系，实在使我极满意。云南乡村中人民的勤快、朴质，以及多数农民和水边渔民在穷困中挣扎生活的方式，正是老中国人民共通的方式。在这里，我似乎已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本来。所以生活有一时虽相当困苦，因缺水少炭，必动员全家大小四人，去附近山上或公路边捡柴提水，接受现实并从之学习，生命竟觉得十分合理。即到最艰苦的后二年，一面眼见社会在战事变态繁荣中急剧变化，许多外来人转眼间都成皤皤大富翁，本地做小生意的，也金饰满手而洋服上身，相形之下，我们生活水准实已降到最低点。可是云南地方的天时，草木与人事，我们对于它既有了深爱，即再支持几年下去，也还可以活得健康而结实。

寓居云南八年，虽未离开过昆明百里以外，对于西南文化某一面，我却有了些由幻想，到假定，终于得证实的问题。即由西南文物的残余，为历史所忽略，亦未曾为现代学人注意过的东西，保留了点新印象，得到些新启发。

先是二十七年春天，乘汽车由公路沿湘黔国道入滇时，汽车常在半道停顿，增加了其他伴侣的极大烦恼。因此有很多机会，得在许多小乡村中过夜。这对我真是一分动人的教育！在黔滇边境一个小客店中，发现当地煮烤茶用的白瓷罐，大开片厚釉，竟完全和北平古董商认为"明代仿哥瓷"同一形制。又在一个小县城公用水井旁，看见个妇人用大瓷罐取水，铜环勾着罐耳放入井中，取水方法即还近乎古典。到把水提起时，看看罐耳蟠夔纽，竟十分精美，式样完全如宋制，刻画花纹尤奇古精巧。到昆明后，为办伙食用具，去青云街陶器店选择，忽发现木架上层，还剩余一批满是灰尘的旧货。绿釉黑釉陶器，都汁水浓厚，温润无匹，形制尤古秀动人。有四楞瓜式和带盖筒奁式，犹完全保存定窑风。有些鼠灰釉釉面毛毛的，胎质薄而带青灰，竟和传世越窑如嫡亲兄弟。绿釉青瓷则和"暹罗龙泉青"系列各别，转多唐三彩风味。还有黄釉加绿彩而具定式温雅的。还有黑釉小杯如唐式。所看见的在素陶上实可以排成一个新系统，如能收集百十种不同器物，陈列到任何现代陶瓷工艺博物馆，也将毫无愧色。然本地人照例很少注意这些事。外来学人最先对之发生兴趣的，只有梁思成先生伉俪，和思永先生。思永先生是安阳发掘主持者，就说过，有些陶器形制和商器相通。可见源远流长。

一面是仅此小小事物，即可见出古典传统与区域性风格的混和，一面是天时地利又如此美好，人事如此素朴，总令人疑心，应当还有些具文化特征的东西，可寻觅，可发现。其时有两个习美术的年青朋友常相过从，由工作问题谈到工作方式，因此极力鼓励他们向云南西部深入旅行。因为根据

气候和地理，又与印缅国境毗连关系，都可推测得出，这个区域必有些为历史所不具的文化残余，值得特别注意。即无从作纯科学性的探讨，就用一个艺术家或新闻记者身分，去从事作广泛认识，也必然有极多收获，比住在这个战时变态繁荣的内陆都会，有意义得多。这两个朋友当真就携带了点简单行李，和些些用费，向滇西作现代徐霞客去了。过一年后，他们的大雪山游简和么些文初步研究报告，就寄回昆明来了。

他们先用丽江作根据地，绕雪山探江源，前后作了八年徐霞客；一个习国画，竟在雪山边作了上千件雪山景物。一个由风景记录者开始，后来竟成为么些文字专家，沉沉默默八年努力，结果竟成为西南文化唯一的开荒者。那些游记和报告，增加了世人对于这地方剩余潜伏文化的浓厚兴味，而我还分享了朋友发现西南的光荣。这两个朋友都可说是云南人的好朋友，完成了一种庄严而艰苦工作！

随即又得从旅行中国西南十六年美人洛克收集有关西南民俗文物美术品一小部分，扩大了些见闻。又因与人类学者陶云逵兄同住乡下，得看到他在车里、佛海、丽江、中甸各处作人类学调查，所得器物图片千余种。三方面知识，增加了我原来所作假定与推测，并无谬误。

本人既呆在昆明学校，不易转移地方，因此估想：这个改装不久的中古城市，从木器家私和起居服食，还有些不脱元明中古时代的古朴。应当还有些为人所疏忽的事物，保留下来可资研讨。云南本以出铜锡器及象牙器著名，因此起始去民权街文庙街注意铜锡杂器，看看是不是还有些东西，可以认出它是“诸葛鼓”的远亲。或者把时代移后一点，尚能

缅想“南诏”文化。结果毫无所得。乌铜走银形制花样均不古。铜器中佛像和杂用件，上至明代风味为止。象牙工艺已根本无可观。再其次试去注意到本地刺绣编织物，露趾鞋和花围腰，虽色泽华美，鲜明，小镜片的点缀，形制却少古意。至于枕帕、裙脚、包头毛巾，扣花图纹，虽多秀美而雅洁，又似乎多南中国习见吉祥图案，远不如湘黔产品富于奇幻变化。昆明随处可见的，只是鹿皮背甲和白毛氆氇，除为实用潘光旦先生曾买过一件背甲，朱佩弦先生曾披过一片氆氇，此外竟少有人注意。偶然间，在一个本地人家中，发现了个殷朱素漆奁，形制竟完全如《女史箴图》镜前地上那个东西，边缘上有一点简单彩饰，却近于铜鼓边缘纹案。当时我心中嘀咕：“如果这是漆奁，里面还应当可以放镜子和粉。”试一掀开，不出所料，原来还有两层套盒！这一来，真是又惊又喜！因为“镜奁”一词虽人所熟习，还少有人注意过当时收藏镜子的位置。故宫嵌铜镜人木框方式不古，北方漆系中的犀毗、剔红、填彩、堆朱、描金各式器物，却多方圆大小果盒、盘碗，不见旧式奁具。川广两湖两江漆器，器材处理即已大异，虽有用竹篾编胎加灰涂漆的提篮捧盒，还保留一点古代簠簋遗制，统少古意。闽中漆器又多受倭漆影响，由朱黑改五彩，由罩金彩绘转为浅淡色泽，失去了古典美，却把纤巧俏薄学到。特别器物较好的还秀巧玲珑，漂亮美观，应市货便不免日趋堕落。长沙、朝鲜、阳高出土晚周及汉代漆器，试从器材和形制处分上考查，即可知已精工十分，入成熟期。惟应当还有些比较早期东西，可作参证，应当有些和彩陶、石镞同时存在的东西，至今为止，从地下发掘还得不到。我因此推想，具边远区域性的工艺品制作，因种种限制，

或有个传统形式图案，不易改变，由今亦可以会古。目下所见漆奁年代虽新，规范可相当旧。由于这点小发现触机，因此进一步，试向昆明旧货铺和文庙街夜市小地摊巡视，不多久即得到大小不同约十件器物。初步发现就证实了原来推测。

时间延长，我的收集也日益丰富，几几乎可说是凡能用较少的钱，能买的全买到了。但是许多旧家正厅神桌前，还有无数精美的器物，搁置在那里无人注意。外州县西部的腾冲、鹤庆、大理，东部的会泽、昭通，南部的石屏、车里，必然有更多样不同器物。而古墓古坟有计划发掘，且必然还可发现相似纹案于坟壁绘画和棺木髹饰上。

就已得到的器物说来，即可明白在器材处理上，有三四种不同形式，在图纹彩饰上可分出四种不同设计。有扁盒式二种，奁筒式一种。彩绘分纯几何纹朱墨相衬的，绘蛮人乐舞战争的，作花朵密集的，作马与鸟的（可能为金马碧鸡含义）。最后一种则为密集人像群，或王子出行，象车彩女罗列，并有鱼龙百戏，兵阵行进夹杂其间。几何纹的有彩陶纹案风，并和中国各地所发现汉墓砖绘彩相似。蛮人乐舞则充满地方性，王子出行则纯为印缅式。这类漆器在记录上虽通称它为“缅盒”，本地人却叫做“耿马盒”，似乎属于耿马土司区产物。但那个地方的一般文化，问及当地人，却决不能生产那么繁复多样的东西。

接着这种发现，我作过三种假定：

一、这种漆器从花纹形式上看，本来或比朝鲜发现蜀制漆器还早些。

二、这种漆器或为西南边民特具器物（如绘蛮女乐舞及

火烧藤甲兵)。仿汉式，而成熟于南诏以前。

三、这种漆器系印缅产，或受佛教影响而成。因王子象车兵阵行列，与柬埔寨佛教遗迹作风相似。尤其是大型漆奁多如此。但形式还是出于汉式。

本地人在应用上中等奁式多放置香料，搁置神座前作供物，所以照例成双作对(由印缅来益近情)。

大型奁有容量到一斛以上的，似多供献纳时顶于头上方便。(埃及、希腊、罗马古石刻上，似均有这类圆形器物于贡献行列中发现。不知是木制竹制或皮制。)

几何纹或乐舞花绘扁盒式，两面相同，初初不得其解，怎么放它？随后才知道，多用作装小用物或烟草烟泡，揣置于怀中。这种原因才把盒子作成两面一样花纹，在中国器物中是一个特色。至于颜色，较旧式的，多以朱墨二色为主，和韩非子叙述古漆器还完全相同。除二色外还有黄绿及金线的。较新的有褐绿底的，描金花的，形制实不古。

时同住乡下陶云逵兄，曾为中研院作人类学研究，在车里、佛海、丽江、中甸一带边区作过人类学考查二年，并收集过民俗学器物至数千件。谈及这类漆器时，才知道奁具式还有金银二种，花纹多唐代风，分藏式与缅式，雕刻分捶打、线雕与浮刻数种。接近康藏多藏式，车里佛海多暹缅式。至于髹漆稽粑盒，藏式多用木镟成，不用竹编，纹案不甚讲究，讲究的多在镶嵌。与藏式其他镶银器近，惟风格不尽相同。这点说明引起我新的探索兴趣，打量就昆明市所见其他髹饰物，作更多认识，得个比较。当发现惟有旧型小马鞍，有作相似纹饰。鞍桥部分几何纹，更繁复而多变化。这种纹饰除彩陶与汉墓砖以外，任何图录上均少述及，真可说是一

种艺术品。滇蜀小种马既在历史上有二千年知名，马鞍制作一望而知是传统作风。我从下乡骑马方便，及其他旧户人家，前后一共即见过有廿多具，印象十分深刻。花纹多如汉砖，用红黄绿三色作纵横几何绘饰，并拼合作人物跳舞兵阵兽鸟形。一切与漆盒相似。尤其几何纹排列法，三色横斜拼合作成花朵云物，设计全然相似。惟一般说来，马鞍制作实多草率。

更大发现还是能容三斗的大奁，上下四周人物繁复重叠，纯邋缅风，内中套盒却如唐镜花纹，壮与秀并。又得到一个仿铜器有提梁的朱墨二色漆篮，四只脚，中部透空，有盖活动却不能取下。设计真可说朴茂典雅，形制完全如汉器。又得一素漆圆盒，作殷红色，可注意处是里层墨绘海水，竟完全如汉陶上纹案，外面红漆上用细小黑点牵连成线，如汉陶针刻花饰。又得一黑漆大斛，用薄木片圈成，绘捕象图，二象奴作生摆夷④装，树如汉画连理柏，拙中见媚，极其生动。又得漆略泛黄，绘有八卦加唐草花饰扁碗式盒二种（或越南制）。又得错综满绘人兽云鸟，如绥远青铜器纹案组织扁盒二种，又作牛毛纹大小若干种。又得黑漆绘金花番莲一种（似印制），就中有几种香味极强烈，或本贮香料，或内胎有麝，不得而知。就漆质看，即以朱漆而言，也有四种色调。又有褐漆底作绿花的，绿底作小梅花朵的，才知道这部门器物，仅就手边所得，原来就包含了那么多不同款式，且每一种均有不同特点。即同作牛毛纹，也有四五种以上不同。几何纹饰更是花样翻新，风格特具，有细如游丝的，有粗线条红黑对照鲜明的。惟始终未发现具铜鼓纹饰的。又未见具铜玉器蟠夔饕餮形及串枝莲的，可知中原与印度影响都不多，而事

实上大多几何纹饰，倒和石器时代雕镂至汉墓砖相通。又闻腾冲一李先生府藏有数种花纹极古，可惜未见。越南博物馆有些，大的可容二斛量。华西大学也得到些，或不甚多。美人洛克在西南极久，对滇西特别熟习，有关西南杂民俗文物，曾得有数百箱，关于漆器尚未闻有特别记录。又有一蒋姓朋友，随军入缅，败退回国翻越野人山⑤时，曾俘获一着藤甲持藤盾尖矛野人，身上纹饰和武器纹饰，据云亦极和漆器中细圜形几何纹饰近似。

这点小小发现，引起我对于西南漆器更深的爱以及更多的关心，几几乎把陈列市上能买的全买到了。本意以为如能搜罗到三百种时，必可就手边所有，写出个比较报告，向对于这些器物有兴趣朋友，作个抛砖引玉的工作。不意洞庭湖边战事转紧时，昆明重庆两地，都成为大轰炸目标。学校宿舍附近一次投弹，一条短短文林街，一分钟内即死亡八百人，个人住处周围即毁去房屋三百所。我觉得这个工作已不易继续，因此把三年来得到的大小百十件漆器，四处疏散，凡是朋友出国结婚，要器皿装糖果茶叶烟丝的，或者对某一种发生好感的，都听之拿去一二件作个纪念。这些器物于是聚而复散，各自存亡于意想不到情形中。这回北大展览，就是自己存下的几个和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女士所保存的几个，实不足代表所见全部，惟有很多特点，似乎已很可提供专家学人作个参考。很希望有云南同学，回到家乡去，肯有计划用几年功夫，来对于这种漆奁与漆盒，并马鞍及其他髹饰物，与石刻、编织物，来作更广泛的收集，必可有更惊人新发现，从比证上解决一些问题，并提出些有关西南文化史新问题。尤其是如能够就川蜀接壤区域的木胎和夹纻器，与黔中接壤

区域的皮胎漆器，及迤西南竹胎或编藤器物，能作较多收集，必然还可得到一个不同印象，足供漆工艺史专家学人作更深一层的探讨。

三十八年三月六日

作者在本文手稿首页旁注："介于这个与自白中应还有八章"。

在16页背面注："关于西南漆器（未发表）卅八年二月廿毕事（未抄齐，来不及。）"

在末页后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

这里"解放"意为"解脱"。此后不久，作者曾自杀，获救。

① 两个朋友　指李晨岚、李霖灿。

② 么些文　今称纳西族的东巴文。

③ 十一月　作者于1934年1月上旬动身回乡，为农历十一月。

④ 摆夷　清代对傣族的称呼，民国以后仍沿用。

⑤ 野人山　缅甸北部胡冈谷地和枯门岭一带的原始森林山区，有较原始的少数民族散居。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日，战事失利后部分官兵分批翻越此山，辗转撤回国内。

政治无所不在

一　从近事看远景

我对于政治毫无知识，为的是“政治”二字给我的印象，向来就只代表“权力”，与知识结合即成为“政术”，在心里上历来便取个否定态度。只认为是一个压迫异己膨胀自我的法定名词。近四十年的政治现实，前一段军阀争夺割据，此兴彼替，变而不变。尽管说“政治高于一切”，实看不出特别高处。后二十年是四大家族连锁政治专政，自然使我对于它更感到绝望。但是如何改造现实？却离不开本位拘束，总以为国家有个历史担负，卸去它得要时间。流血方式从经验得教训，消耗多而成果少，不能不另想办法。抗日战争八年，人民过于疲累，要生养休息，更不能再用战争来解决矛盾。如把文学艺术作工具，进行广泛而持久的教育和启迪，形成多数人对于国家进步一种新态度，新观念，由矛盾对立到和平团结，是势所必然。既深信文字的效果，且认为凡事能用文字自由讨论，就可望有个逐渐合理的明天，带来些新空气，

新理解，足以将这个乱糟糟的统治现实加以改造。既知道现实政治不可望，却不知道另一种理想政治，千万人用三十年摸索教训，和苏联革命成功作榜样，与之作有计划斗争的，多么复杂和庄严，以及比一般艺术更艺术处。也期望能够配上一种进步努力，却照例受个人气质紧紧的缚着，还是在无知的孤立中存在。人离群而思索，生活在一些观念里辗转，那能不病？我的病的发展，即由于这个“无知”而来。

学习了十个月，从小以观大，方上完第一课，即“政治无所不在”。

我家中有两个孩子，都上了中学。

第二孩子虎虎，初中一年级学生，因请求加入少年儿童队，把自传写成给我看时，读到“父亲在解放时神经失常，思想顽固，母亲从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我告他说：“这个措词不大妥。等妈妈回来看看好些；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正如妈妈，即再进步些，也不相宜。”孩子就说：“大家都要求加入，明天得交去！我一个人若耽误了，下一期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招，怎么办？”说时大眼泪已挂在眼角，恰像是十个月前到医院来看我情形。我发现孩子眼泪外小嘴上还长了些细汗毛。他已十三岁。“政治”到了孩子生命中。我记起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诗句，赶忙说：“好好，把你自传意思写得更具体些，就交给学校中老师吧。希望你得到许可入队，向妈妈哥哥看齐，我再向你们看齐。”就这样，孩子和其他上千中小学生，加入少年儿童队，宣誓日并说：“要作毛泽东的小老虎。”

大孩子龙龙，是初中三学生，一个青年团员。入团以后，

五个月中开的会，比我大半生参加的还多。一天总有事忙着。提起工作干部，照例充满尊敬和崇拜，只想学干部忠诚刻苦为人民服务。我知道，政治浸入了孩子生命已更深。

新中国有万千青年，都将这样在中国共产党正确而严肃领导下受教育，成为新社会的健全公民。新的时代原是为年青一代而准备的。前人艰难奋斗开了路，奠下基，却由他们一代来接手，担当历史创造的快乐和幸福。

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极累还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所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帝王、官僚、大财主，怎么样糟蹋人民，和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

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这正是不大容易进步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起过，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转变，要有痛苦吗？痛苦能增加人认识……”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不多久，又都睡着了。政治在千万万孩子心中脑中如何生根发芽，我懂得很清楚。有了信仰也就有了力量。年青人和年青国家，是逐日在发展壮大的。在病中，在单独中，我体会出当真落后了好一段路。年青人跑得太快了，许多作父母的，大致都落了后，不急起直追，越来越不济事了。

十个月来沉默向现实学习，头脑实依然常在混乱中回复，不大知人我分际，及工作方向。但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家庭到社会，却明白多了些什么是“现实”，是“政治”，是“人生”。和现实政治接触，我必需承认，即作一个小学生，还是不满分的劣学生。手中一支笔，二十年用来用去，不过是将点点人事印象、书本知识，配合虚妄幻想，加以组织，无拘无束的写去。用笔既久，自然即形成一种病的发展，工作离于群的发展和要求以外，误人兼误己。误人犹不会太多，误己则作成致病因子。恰像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本来是人制造它，由人支配，到后却是机器生产支配了人。一到我不能自由支配文字，倒受过去文字所形成的气氛支配时，我

的病可知已耽误到什么程度！总结工作经验与工作得失，有愧于时代多矣，有负于良师益友期望多矣。

在此大时代中，任何个人都实在渺小之至。正如共产党党纲报告所说，凡属个人工作，都只能完成一小部分。惟人民全体觉醒后长时期的努力，方能使历史面目完全改观，人类关系日益趋于合理。个人工作即用力再多，成就再大，也不值得什么骄傲。打胜仗的将军，固然立过大功，但和马克思、列宁为全人类进步和幸福努力的成就比起来，自然就很渺小了。个人即十分渺小，凡是在参加工作，每个人总能完成自己工作一部分。越作得好越对社会有益。若工作和社会发展游离，或相反，便无意义可言……我记下这点大意，说明虽重在警惕一个党员，培养他对工作的谦虚和虔敬，其实每一个中国新公民，都值得记住。因为如果人人都能随时随事充满谦虚和虔敬心，来生活来工作时，社会进步即必然可以加速，少走许多弯路！

国家正由一群来自农村素朴领导者，小心翼翼，谨慎十分，把它从三千年老封建积成的腐败气氛，和近百年帝国主义的武力、文化两面侵略作成的贫困、屈辱、混乱与种种挫折中，翻转身来，逐渐带入一个崭新历史辉煌荣光里。全国人民都必需从一个新观点、新方式，来快乐参加，共同完成这个人类史上伟大庄严的任务！历史决不会后退，向前瞻，人类关系合理的远景，便如近在目前。中国除旧布新，由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转人新民主主义政治，进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将比预想的时间还可提早些时日完成。

二 由自己和他人看知识分子与新社会关系

革命解放战争，已快到全部结束时期。战事虽结束，由于变动太大，每个人在他旧工作旧观念上，求对于新社会新要求作种种适应，当然不容易。就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层，习惯了书房中的人生观，这个大包袱既累着自己，也影响社会。历史既决不后退，就需个人先能把自己作个全部检讨，来改造，来重造，忘去了个人小小恩怨得失，来接受新的社会要求。在这个改造过程中，有些工作即无从参加，也应当用个沉默态度衷心来拥护，来接受。即本身由于脆弱，不幸牺牲，也需要从大处看，全局想，不以为意！凡自外于这个共同进步目标，另有企图期望的，容易转成空想，动机即十分纯粹，对现实殊无补，对人民亦无益。人在国内，近于胡涂顽固自弃于进步以外。在国外，则徘徊观望不可久，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把国家看成人民共同的国家，荣辱忧患和每一人都相关，放弃旧立场，抛掉旧观点，来为人民服务，在新国家建设中，必有机会充分用出长处，个人也会生活得又尊严，又自由。或尚寄托依附于其他国家势力下，做胡涂梦，妄想用他国军火和中国人民的血，使历史倒退，即容易成为民族罪人。这不仅是个人一点认识，也是在重造自己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看法。人人都深信国家在一定计划中，将迅速得到进步。领导其事的，实具有充沛精力和坚固信心，用个极端谨慎落实态度在处理。万千少壮干部，正全体齐心，在用一种苦行者学习精神，把握问题，推进工作。年青一代，在这种热情鼓舞下，也无不热心忘我，力求进步，进而和广大人民行动

愿望相结合，来参加这个国家新建设。即另一些年近六十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学习空气中，也无不改换了旧观念，旧理想，有个新的觉醒，建立了新的劳动观。并认为向人民看齐，向青年学习，实自然而合理。这个时代的进步与变化，是从首都北京一域十个月来每一事每一处景象都可以看出的。

由于这点认识，联系到个人工作，便觉得过去一时对于社会进步的妄想，文学艺术的看法，生活方式的孤立，都实在和社会发展游离。一病几殆，是事理之常。凡事从新学习，来为这个新社会新原则而努力，已不再感觉是对于某种不同主张的屈服，实近于对真理的虚心。这点认识从现实学来一部分，从中共文件学来一部分。一册毛泽东文选和党纲报告，实帮助我启发我理解到许多问题。这是三十年中共存在和国家新生的枢纽。虽如由个人执笔，反映的却是基于一种人类向前向上进步理想，在中国和万万觉醒农民单纯素朴人生观的结合，也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生长的式样。由整风文献到政协纲领，发展都出于必然。延安文艺座谈记录，从基本原则出发，将文学或文化活动，认为泛滥无归是浪费，自由主义近于对社会进步要求的责任规避，很素朴的将一切文化活动引入政治，皈依政治，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新政治而服务。措词明确具体，远比一切教条文学合乎实际。这事由个人说来，不免有“闻道稍迟”之感。因为二十年工作离群，对人对事形成隔离既久，由于隔离形成的错误亦多。本身虽来自人民，在都市中厮混既久，已失去归队机会。但对于国内外相熟或陌生，过去和目前，曾经对我个人工作抱有点点好意，他本身又尚在这个新旧时代交替中，陷于彷徨无归的人，希望他们从我这个小报告中，能有个新的觉醒，

新的决定。一个老朋友说得好："从小资产阶级出身旧社会长大的人，照例是个用书房人生观看一切。读了一堆书，说了无数空话，和社会实际总不免脱节。过去即看得到一个上层统治实在毫无希望，还照例是不能面对现实，加人革命斗争。目前国家既已面目改观，如果不希望美国军火再落到多数善良和平的中国人民头上，不希望再见到过去那种无效率政治的回复，就宜于及早把旧包袱抛掉，用一个新态度，来迎接新的时代，新的曙光。国家已由万千人民用流血辛苦打下了个新的基础，在田地里，在工厂中，在一切企业机构内，他们都充满了生产热情，为建设新国家而努力，我们住在都市中，说空话过胡涂日子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理由放不下那些错误思想、拘腐态度，和不健康的人生观?"

这个学习总结，还给我自己另外一点启示，即是新的文学写作，值得重新思索。因为社会全面变化如此迅速，如此广泛，每一个节目的发展性，都和本土五万万人民幸福命运相关，和世界和平相关。旧一辈作家，不论是前进或保守，有过多大成就，于新的社会中，都俨然是在一个运动场里，需要用一种崭新规则，各自来创造他的新记录。也因之都不免要对于新的事物感到完全陌生。明日的优秀作家，必然是从近三十年新旧社会斗争，尤其是和近十年社会变化相关，或特别深人某一部门工作的少壮，方能从笔下反映出历史发展的伟大和真实。这些少壮作家，目下还生活在革命实践中，处理种种不同问题，迟些时日，自会从部队，从农村，从各种工厂和不同企业里，陆续写成他们的作品的。在学校里，习文学的知识青年，求工作有结果，有意义，仅仅解决了一个立场观念还不了事。在向传统有用遗产学习，取得一些处

理问题基本知识后，求真正进步，惟有向那些来自人民的作家看齐，直接去新的社会里生活，并学习他们把握工作，处分事件，为人民服务的谨严不苟态度，方宜于用笔。个人的工作已成过去。未来如还要用笔，必然是先作一个读者，一个群众，来看新作品，来学习如何用笔。

三 一点感想，一点希望

又从学习取经验，方懂得许多看来平常意义甚深的话语，即“人不能离群”，离群必病。“人不易知人”，总容易有所蔽，有所偏，且由爱憎不同而形成亲和与游离。“人不能离开政治”，但一个普通人，实不容易如政治家那么理解政治，适应政治。“人难成而易毁”，一毁即不易复。所以古人论处世，必“慎微善始”，时怀履虎尾涉春冰戒惧。治国事，则有“朽索驭六马”名言。总是提醒人遇事小心。在时代进展变革中，万千善良正直人民，为追求一个进步理想，在每个战场上，都有无数牺牲。在其他方面，自然免不了也要有不幸。惟个人如能凡事谨慎，配合集体临事谨慎，在新国家建设中，一定会更容易避免人的浪费，充分使用一切有建设性器材到各方面去，省事而经济。

在土改文献上，在新政协共同纲领上，都特别提起过保卫文物，和评判接受并发扬本有文化。而预期的文化高潮的来临，且是一般进步知识分子对于新国家的向往，为的是可望将半生工作成果献给新的人民时代。文化如仅指电影戏剧、民间音乐和版画木刻，人力物力条件足，即容易达到。至于文学艺术的普及兼提高，尤其是以器物为重心，一部劳动工

艺美术史的整理，并用它作媒介，希望新旧接触而发扬，表现到大型方面如建筑雕刻，小型方面如邮票徽章，无一不见出有个开国承家，坚朴完美，民族风格新气象，配得上这个伟大新时代。要达到这一步，恐就还要有好些人看远景不求近功来努力从事。为的是问题多，部门杂，且许许多问题都还无人走上研究工作第一步路。还需要一种素朴艺术史观，辩证的理解建立于造型美术的传统认识，向传统学习，启发更新一代的创造的心。老实承认在革命现实发展中，文学艺术已落于军事政治发展之后，配合不上。但当建设期来临时，却必然需要它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且和科学一样，进步的水准，将成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以及另一时代的中国人民，测验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政治现实的象征。也因此，更令人对于“临事谨慎”感觉言简意思深。

在毛选文章中和其他文件中，常提及“知识分子改造的艰难”。这从民九起始，经过大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抗日，一段长长曲折道路，才有文艺座谈会记录，将小资产阶级革命文艺论作成素朴的统一，也可以看出。全国解放后，知识分子若尚包含全国性更多方面的综合，谈改造，当然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所以如有人问我一年来学习心得，我想极正确的回答，应当是“我仅仅学习了明白‘改造’二字艰辛的含义。”学马列，从书本文件上虽记下些名词，实不易贯串。但是从实际和抽象学人生，明白了《易经》上六个字：“谦受益，满招损”，对于处世极有用。如把它和新的文件学习联系，到我情绪健康能重新用笔写短篇小说，来讴歌这个新时代人民进步的种种，对人民革命也稍稍有点用处时，大致就完成过改造一小

段路了。

伟大时代有的是万千人民作成不同的伟大贡献。我也应当完成我的一部分。即十分渺小，总是在学习下去，慢慢会完成的。我用的是和人稍稍不同的学习，得到些新的启示，新的理性。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北京一个节日

本文原无总标题，现总标题为编者所加，取自原稿中文字。

解放一年——学习一年

北京解放已一年。在这个地方进行的每一种会议，无疑都和国家新生世界和平相关。但这一年来，我个人却完全是在病的隔离中度过的。手中一支笔，是在冻结中完全失去了意义的。二十年工作离群，生活又拘束于一个狭小范围里的我，解放前后，外有窘迫，内多矛盾，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大病之后，和社会更形成隔绝与孤立。本来工作，已无什么意义。新的学习，接触问题既窄，自然还是虚虚泛泛，并不落实。

谢谢来自各方面给我的不同照顾，不同教育，让我明白“人”这个字辛苦含义更深一些，广一些，也复杂一些。更明白“人不能离群”，离群必病。“人不易知人”，因有所蔽即有所偏，容易形成亲和与游离，恩怨和爱憎。“人不能离开政治”，政治实无所不在，且影响一切，支配一切。“人难成而易毁，器难成而易毁，事难成而易毁”，一毁即不可复。所以昔人说律己，有“履虎尾涉春冰”之戒，治国家，又有“朽索驭六马”名言。一年来以人为师，以事为师，随处学习，

随事自省，随时忘我，有些方面像是进步极少，依然如旧，有些方面又像是理性稍复，方向较清。我想把能理解到的写它出来，或可从这个段落上提高一点点，再学习，再修正，再迈一步。

我的全部生命，是在一个生活变化比较多，而信念却单纯的过程中生长发育的。从十岁以后，即如完全单独进入社会。用一切动的社会当成书本从事学习。生长的却是一个文化知识落后，却有自然风景和历史抒情传说及素朴风俗综合的小小区域，在这个地方城市和乡村生活教育中，过了童年和少年。随后由于五四文化运动的余波，一堆新书把我诱引出来，到封建大都市北京，算算时间，前后即已差不多四十年。由于本质脆弱，一起始即用“沉默”接受外来的困难和挫折，在风雨忧患中向前。又因为信念基础，是奠于一个对土地人民和文化史的热爱广泛前提上，因此也就永远是挫折而永远从沉默中学习并接受。一切事说来，都不是城市里温暖家庭长大的人所能想象的。一个吃饱睡足的中等人家子弟，在大学在高中上课之余，用看电影消耗剩余生命时，也正是我或者和一个船夫一个普通兵士同忧患，生活打成一片来过日子，或是面对工作，既要克服困难又要战胜自己体力弱点时。一面是受区域性的楚人气质紧紧缚定，严格管制自己，一面是用习惯性的谦柔方式挣扎，学习，和社会不合理现实斗争，发展下来，自然即形成一种特别顽固又极端随和的矛盾性。长处和弱点又都同属于这种性格，反映到二十年工作中。正如一个共同相处二十年的熟人批评：“性格中实综合坚强和脆弱，骄傲和谦虚，大怀和小气，成熟和天真而为一。

情感深厚而理智拙劣，对实际权势淡泊，却富有知识上学习的虚荣心。理解人事相当深细，可极端缺少自知。想象十分放纵，举措取予又过于拘泥。”这种批评不一定完全对，但至少是一个熟习我的人一种客观的印象。全部工作或思想发展，都像受压抑生命和外在现实不断冲突，一种求平衡谋补偿的过程。在生活上既永远是受失败挫折，用微笑或沉默来接受来忍受，因此从小就一面幻念滋长，一面对自然景物有深刻理解和爱好。四时变化影响到草木虫鱼繁殖和衰谢，在我未明白人生哲学以前，未读诗歌和各种文学或自然科学书籍以前，就早教育了我，让我明白万有生命的彼此相关性、依存性和发展性。到把自然和历史知识积累较多后，对于面前的存在，因之就更感到一种和谐的亲切。且认为“使人乐生而各遂其生”的人类社会理想，是必然可以因时间条件地点不同，各以不同努力而异途同归来达到目的。这种人类大同的愿望，既是一致的，是生长而非灭毁，即必然可以从战争以外来用各种方式得到它，文学和艺术对于这个问题的推进，实有个庄严责任。五四即明确的提出了一个原则：“工具重造，工具重用。”为的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只能从矛盾中进行流血斗争时，文学艺术应为唯一能推进人类和平的工具。我的生存恰当这么一个时代，生活又恰如从奴隶社会到达现代社会。眼看到象征封建的极端落后区域用屠杀支持传统，农村的素朴安静变为一片荒墟，善良人民也大半转而成为呆呆木木……又看到大都市代表封建的旧京，大军阀杀来杀去，如鲁迅所咏“城头变换大王旗”，和代表烂熟商业资本的上海，人民血汗变成的金钱，象征了最大的权威和道德，这种权威的占有者和南京的政治结合后，

更如何堕落了一个上层社会，把它逐渐分解，成为一堆烂瓦破砖。我的生活和工作全程，又贯串了由五四到解放文学运动中小说一个部门。由于同在并存而亲切，由于相争相左而悲悯。且因之即形成一种极原始的朦胧的宗教意识，一切作贱屈辱将一律报之以无私友爱。缺少和人争权利得失的斗争性，却完成了另一种管理自己到完成工作任务上的律己性。幻想和情感结合，且竟十分自信，如涂抹颜色学习绘画，或排比音符去作曲，可以比较使用文字多些自由的去运用色彩或音符，一定能够更从容充分将个人生命中一些长处，融会到四时交替景象里，处理田园性题材，多方面的把握问题。绘画上的写景和音乐中的抒情，虽需要特别强烈的情感，在一种新的批评尺度下，不可免也还有个阶级意识限制，却容许在较宽范围里作不同解释，因之《田园交响乐》即和《茵梦湖》、《维特烦恼》①一类小说不同，并不因题材对象限制，属于历史过去而容易失去意义。它的独一性即因之而具延续性。不凑巧我理解的是自然。即一切人事，也照例在有自然背景中作种种发展。我能操纵的却只是一支骨杆笔，和几个单词复语，来从事写作，用绘风景画和作曲情感写人写事。

工作的第一期，恰是文学创作运动中，由鲁迅创始的“乡土回复”问题成为共通题材时，我因此占了些便宜、得到工作成果的鼓励，用笔也就比较正常得体。第二期问题却是社会大革命的普遍斗争，社会分解日益剧烈，农村崩溃，国内到处是血和火，我的性格中的脆弱，以及对工作中的自由主义态度，用笔因之离了群。试用到古典小说的传奇组织方面去，因之这部分长处发展下去，生活到某一时越孤寂，越转入唯心的苦闷和玄思，这方面即自然把握不到本质。虽因

手中笔较能作多方面试验，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都因谨严到拘迂程度，尽管生活和社会斗争已稍游离，可是为教书，为用笔为同学示范举例，还能有一部分反映社会分解面。即对于都市的堕落和诅咒，笔还有力，还会用。不过限于生活，接触面已狭窄。且同时笔已起始有一部分转入浮泛，幽僻，华靡，淫巧。换言之，笔一离开土地和人民，自然即慢慢失去了应有的健康性。这个发展是有个条件基因的。可是世界却正是新和旧斗争极剧烈，对于文学作品课题，越来越要求明确而具体，要从一个群的挣扎愿望上特别加强，不容许离开“人”的眼前活鲜鲜问题，去描写静的自然，以及用对自然观照法写社会存在。时代是前后经过两次大战，有数千万人死亡，来争取一个新原则时代。是人人要从文字中搜寻诅咒和讴歌，明确信仰和单纯人生观，面对进步或落后、正义和邪僻、是和非，得有所启发，有所表示，有所遵循皈依的时代。我手中的笔，用到小说方面，则越用越和现实隔离，而转成一种纯粹情绪观念的排列玩赏，早形成一种病的存在。即永远在修正错误中摸索而前，还是无从把握大处。写散文杂论，又用的是同一方式，受文体的发展限制，越写越晦涩，抽象。一直到意思如此如彼，读者从无相似印象。这么下去当然不免误人兼误己。误人犹不会太多，因为至多看不懂，搁下不看。误己则恰像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本来是由人制造它，控制它，生产必需品，到后机器日精，奢侈品的生产倒支配了人；到我搁了笔，再不能明朗健康的处理文字，反而受过去一时那一堆作品所形成的惰性空气控制时，社会发展变革已排列在目前，我却孑然孤立的存在。外感和内蕴相汇合，加上一个对现实政治的极端无知，我于是为个人预

言所中，在理性僵固情感混乱中倒下了。

对现实政治的无知，试加分析，也可说实在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逃避。因为“政治”二字给我的印象，是从三十年前即起始的。向来就只代表“权力”，和由士大夫的幕僚或教书人的智囊人事知识结合，又即成为“政术”。一部战国策和民国以来军阀割据，议会勾结，在心理上历来即取个否定态度，只认为“政治”二字对个人言，是个倾轧异己满足自我的法定名词。对团体言，则是压迫异己而膨胀自我的法定名词。从民二到民十六北伐，前一段军阀争夺割据，一个上层组织，永远是维持到一种由封建半殖民地分化下来的军阀豪绅兼买办政治，此兴彼替，变而不变。即以北京一地而言，从民十二起，军来[2]出城兼进城，我就看了许多次。等于羊屠户改牛屠户，杀来杀去，被鱼肉的还是真正善良人民。尽管大学校里的政治系专家名流谈政治学上说“政治高于一切”，但政治现实可完全是另一回事。有权而无知的统治，实看不出特别高处何在。大革命来时，又由于社会条件不成熟，随即是大牺牲，全国性的大流血，更增加我对流血可以处理中国问题的怀疑。一切社会分解因斗争而加剧烈，我的性格上本质上的脆弱和懦怯，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片面认识、现实社会的片面认识——更重要的是，安于从书房中一个小小窗口看社会的习惯，更把这个上层统治看成一个巨瘤毒痈，总以为无可救药，只有听其腐烂。而一种新机，只有指望在下一代年青生命中产生。空想的民主和自由，以为是可以从社会上各部门专家抬头，而代替了政客官僚军阀，知识能代替武力和武器，应用到处理国内问题上时，就可以达到的。目前一

切既有个历史负担，也就得在一份较长时间中求转机，急躁不来。我就那么对政治无识，而把工作寄托到学习试验意义上支持了下来。后十多年，眼看四大家族连锁政治专政，若干小饭团合成一个大饭团。抗战八年，人民牺牲了千万，却只作成这个饭团在接收时发财机会，成为中国统治上层。我一部分工作和全部工作态度，是和这个统治现实取个否定方式下来的。这种政治现实要不得，但说及如何改造现实时，我还是在一种盲目空想的估计中，以为得在流血以外方式找寻出路。总认为国家历史负担过重，卸去它得要时间。唯和平方能谈改造。抗战八年，人民实在过于疲累，要生养休息。即国内武力矛盾对峙，也唯有和平可以解决。如把文学艺术作工具进行广泛的教育，形成多数人对于国家进步一种新态度，新观念，由于政见政策的歧异，从战场转入议场的和平团结，为势所必然。

既知道现实政治不可望，却不知道另外一种理想政治，一个领导组织，用三十年流血教训，和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动员了万千人民，与一个腐败现实政治长期的斗争，如何复杂和庄严，以及比任何艺术更艺术处。也期望工作能配合一种进步的努力，却照例还是受个人气质束缚得紧紧的，在无知的孤立中存在。对土改，对文学从属于政治，对文运活动的政治效果，我都感到怀疑，说过些毫不切合实际的空话。特别对于现代政治中的强大武力和宗教情绪结合，所形成的发展或趋势，我认为是和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民主理想，实容易背道而驰。任何一种政治基础，若是建立于这种庞大武力上，我认为都容易转为军事独裁，只对少数人有利，和民主自由原则将日益离远的。因此还幻想过，在和平局势中，不

是什么两大对峙或一面独占，国家还应当有许多以分业为单位的组织，在一种不同方式共同原则下，为国家争技术贡献而不争权势获得。且认为这是国家民主和进步的真正象征。由幻想故事到幻想政治，可说是逃避现实的无限扩大。这种罗亭③式的空想空论，和现实接触后的破灭，说明了一件事，即对政治为完全无知。我应分完全沉默，作一个小学生，凡事老老实实从新学起。凡事从基本来理解，来认识。

学习了一年，从小以观大，方上完第一课，“政治无所不在。”

本文写于1950年初。据原稿编入。

①《维特烦恼》　指德国作家歌德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

② 军来　原文如此。疑为“军阀”之误。

③ 罗亭　俄国19世纪作家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的主人公德米特里·罗亭，其雄辩能力、对需要进步的热情信念，深深地感动了地方沙龙中一批年轻成员，以至娜塔利娅爱上了他。但当她要求罗亭实践自己诺言时，却令她大失所望。

沉默归队

沉默归队

CHENMO GUIDUI

1950年，沈从文的病情在继续缓解中，但仍时有反复。

当年3月至12月，他进入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初步接受系统的思想改造教育。

本集为新编，收1950年至1958年间，沈从文在组织安排的学习或政治运动中，按有关方面布置所写的部分检查及其他书面材料，共10篇。作者生前均未发表过。集名取自文稿中用语。

1950年6月12日，《光明日报》刊载《我的感想——我的检讨》，是作者1949年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短文，见全集第14卷；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我的学习》，是1949年后作者发表的一次长篇检查，见全集第12卷。

自　　传

北京解放已一年。一年来,在北京进行的一连串大事,无疑和国家新生世界和平都相关。我个人却是在一种病痛的回复中度过的。二十年工作离群,生活又拘束于一个小小范围里,工作不知节制,用笔也少检点它所作成的社会效果。解放前后,外多窘迫,内有矛盾,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大病之后,生存意义全失。新的学习,人事书本接触范围都极窄,某些方面或小有进步,某些方面实依然故我:

小有进步处是理性回复，明白由于万千人民种种不断努力，已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根基，领导者凡事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发展下去，社会必然可望日益趋于合理。旧社会所有人剥削人、人糟蹋人的种种，都不至于重复在新社会发生，而新的国家中新的人民，将是健康朴实，心怀坦荡，抱着弘愿和坚信，在一定计划中，分工合作，齐向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高峰进取，以丰饶人类生命为目标，克服应有挫折，奋迅而前，将历史带入一个崭新荣光里。这个远景实现虽还要些时间，惟觉醒后的中国人民，总会慢慢来完成的。

依然故我处是"政治"给我的印象实权力过大，易失协调。在变革过程中，人力物力易作成不必要牺牲。这种印象在过去，即形成我工作对于政治的游离，厌恶政治。在当前，因之即对于新的时代充满深爱和关心，个人仍不免粘着于一己。政治使人失去意义。

我的全部生命，是从一个比较复杂过程中生长的。从十岁起，即如完全单独进入社会。由于禀赋脆弱，使用"谦退"和"沉默"接受外来一切压迫和打击，继续于困难中向前。(二十岁年青知识分子，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官僚地主儿女，于近乎温室的学校中长大，欢喜说战斗，是不易设想学校以外的社会，有多少人求生存，求知识，需要用一种什么精力和忍受来战斗的!)一面受区域性的楚人气质束缚，一面用习得性的工作方式适应，发展下来，自然即形成一种性格，能孤立学习，不善合作同功。性格中且见出鲜明矛盾：固执又通脱，坚强兼脆弱，大方中有小气，成熟中多天真，重情分，处世知识却不发达平衡。对实际权力财富少兴致追求，对于知识上的进取心，却永不满足。想象纵驰，举措取予又异常拘泥。有热忱，少计划。对于自然景物和造型艺术爱好，都达到近乎病态程度，但经营经济事务，可完全不在行。对专门知识，异常敬重，因之于社会分工理想，觉得十分合理。对政治上的专门家，却容易看成苏秦张仪。即本来是个在文化方面有特殊贡献人物，一作苏秦张仪，还不免变成帮助强霸统治者奴役人民工具。这种人即事功赫赫，对人类贡献，自然远不如老庄荀墨。现代政治家意识形态，虽和过去时代大不相同，依然不如现代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对人类进步有

益有用，为的是前者扩大死亡而后者丰饶生命。这可说对于现实社会的规避，和对于阶级斗争的无知。但在另一面，也明白近五十年中国或世界人民追求进步方式，梁任公的影响虽大，实不如孙中山工作彻底；列宁的努力，比恩斯坦工作实更艰难；我个人从事工作，也并不比一个普通政治工作人员对人类进步全程为多贡献。为的是调排文字，组织思想，似难而易，个人努力可以成功。处分人事，主持行动，加上一个多变易的时代，必有个集团并善于运用集团方能成事。一个真正现代政治家所从事的工作，实无疑比艺术还更艺术。可是或由于环境限制，对近三十年社会发展印象，总以为唯和平方能进步，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不免走了一条争取学术思想独立的路，也可说即是妥协的道路。认为社会本是一个在变易发展中的有机体，政治现实极不合理，流血无结果，唯知识必可促进人和自然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一切专门知识如充分抬头，社会中的对立矛盾，也就可望不必经过正反斗争，方能得到那个合。这自然是知识分子的幻想，无基础，无边际，和社会现实从另外一个斗争规律发展不符合。这个发展过程，是必在正与反中广泛流血斗争，方能达到那个合的。我的思想，我的工作，和这份生辣辣现实一接触，统统失去了意义，取予进退，百无是处。到末后，即自然病倒了。

一年中随事学习，随时自省，将两者所得加以综合：第一点是明白人不能离群，离群必病。第二点是若为一己作计，游离和孤立，还是可做点事；若为全体人民设想，必需把个人一点点能力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用到更多数年青一代需要上去，我得想办法重新归队。归向全国人民所趋向的方向。用过去把握

工作追求知识的热忱和虔敬态度，来向万千人民流血苦撑所把握的原则，谨慎谦虚从头一一学起。弄明白新的国家社会发展过程，和向前的步骤，以及人和人关系重造方式及种种不同问题，也方可望明白自己能作些什么，应当怎么去作。

这次拟人华大四部，是个人一个新的学习起始。在新的政治文件中，常提到知识分子改造的困难，及改造过程的痛苦，对我应当是事实。以文学运动而言，从十二年有革命文学，十六年有大革命，直到三十一年，方有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将文学理论面向工农兵的原则方式，作成素朴的统一，达到一个新的起点，于党的发展，于文学的发展，都影响极大。政治革命由乡村进人城市后，由否定传统到建设生产，一些问题随发展而不同，理论或待修正，方式或要重新摸索。我的学习的第二步，大致是在这方面要明白文学创作的实践，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结合的方法，有若干假定。文学与政治结合、提高政治的现实，有若干假定。希望从工作实践中，来学习，来实验，看这些假定有若干能证实。而文学面向工农兵，从一个旧的传统中，又还有些什么可以取法，作成更新的综合，也是要从学习并实践中明白的。

我的天分经验都极有限，惟随事学习的耐性，或可补足许多短处。终于用笔自大的弱点，早被一本党员修养克服了。

一九五〇年二月廿一日

本文是1949年后，作者按规定所写并以《自传》为题的第一份文件。时已在历史博物馆任职，组织上已决定他即将去华北大学学习改造。

时事学习总结

我三月二号到拈花寺，用的是个真正小学生态度，从每件小事情老老实实学起。我会那么来生活，有本小书给了我一点影响，从那本小书中我明白国家的新生和发展，是从摸索奋斗和“不断修正”而前进的。或--直向前，或有时不免曲折走了些弯路，有一个根本原则不变，即“一切从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我想多明白一些，多学习一些，就照一个佟姓朋友说的“忘我”，和另一朋友说的“为人”，作了这里一个学生了。

三月六号开始学习文件，二星期中一共学习了六个。照情形说来，我从文件学习，得到的真正知识并不多。但从一个小小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彼此相关性，联系到个人对于国家的一点点认识，是有意义的。想作一个人民勤务员，还需要身心都结实一些。

把时事学习中的蒋军必败和过去印象联系，当时情况可

以概括说说：

一、国民党组织实已极堕落，由1928年[1]到1946年，都走的是下坡路，越来越腐败，越和人心离远。因复员接收，四大家族的连锁经济独占，更增加堕落和腐化，想新生，不容易新生。

但对日胜利，人心都思安定休息，实看不出这个上层机构于二三年间即会全部坍圮。至于想从内战消灭中共？势不可能。从美援得来的军火，只会糟蹋人民，别无好处。国家有个历史担负，问题多，要转好，和平实比战争容易有办法。

二、对于中共，情形实隔膜。只知道在年青学生中间得到的信仰，是普遍存在而且迅速生长的。军事上华北势力比较大，华南少基础。但从国民党的廿年宣传，和过去南昌、广州及国内各处的事变传说，使人不免因生疏而恐怖。

三、内战一扩大，人民必重新卷人炮火中。所以从政协看发展，实盼望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进行和平。且以为政治家如能把“思想”或“政见”的不同处，由战场转到议场，实在是国家人民之福。因为由和平发展转到面对现实，对所有政党都是一种考验，谁能真正为人民办事造福，谁就可以得到拥护。不振作的党，和说空话的政治家，必慢慢的会受淘汰。代替而兴的将是一些具有专门知识而又少私心的专家、医生、工程师、文学艺术工作者、计划经济和生产分配的专门人材。在各种委员会和人民代表监督下，为人民服务。对多数人民负责。把万万人民精力情绪都转移到生产提高和分配公平方面去。这种社会远景，虽然远，从和平当然比从战争容易达到。

社会发展和个人理想显然不合。我为什么会把和平当成一种信仰来看待？分析一下，还有个比较认识：

一、从中国历史看问题，武力过大易成为独裁。世界还需要和平，国内问题必须从战争解决，说不过去。

二、从辛亥看国内问题，卅年内忧外患，国力已消耗太大，一九一三到一九二六，军阀内哄除为帝国主义者推销剩余军火，别无意义。（学校中的自由主义和反内战意识，是从这一段时间发生的。）北伐因联俄容共而成功，使国家得一转机。接着是宁汉分裂，新的内战又起。接着是抗日，虽困难，终还是因为国家是整个的，把日敌拖垮。都说明和平是对全国有意义的。

三、从西安事变到政协，到军调，甚至于到解放军快渡江时，中共一贯表现都是从和平争自由民主。事实上也只有如此方可望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拥有强大武力的组织，尚有这个打算，个人当然更希望能实现和平。

四、抗日八年，国力耗损大，人材本已不敷用。国土新收复，长江下游、华北、东北接收生产工业多，事事缺少人接管。如政治问题可解决，任何党派真想为人民做事，都有事做。打下去，人和物一例在炮火中毁去，国家怎么办？到那时，国际方面要不受人支配，也不可能。到全个国家政治经济失去自主性，说自由与民主恐不可能。

五、二次大战结束，两大壁垒益分明。矛盾不易解决，又都怕三回战事发生。照斯大林说，世界还容许两不同制度存在。中国实在即还有一个机会，于对内和平中成为世界和平的桥梁。我并且以为如政治家真有远见和魄力，就必然敢正视这种现实，为国家谋长久之计。（当时毛主席过重庆，我

即抱有这种憧憬。)

六、左的方面事实和愿望都是和平，表现于一切文件上。直到大军渡江前，还有“一面打一面可和，这里打那里可和”语。我因之且深信和平必然可以得到。国民党改造可以由此出发，中共在和平方式上争民主，从现实出发，也不至于走向过左的偏差。国家问题多，廿年前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现实的发展，既成为如目前种种，我可说有了错误：

一、知古不知今，历史上的经验论并无必然性，怕武力过大易成独裁，可不知如果这种武力由人民革命掌握，有毛泽东思想运用，一切实事求是，谨慎处理，却可为真正民主奠下个基础。这个基础是能和“对人民有利”原则永远可以相印证的。

二、知旧不知新，明知北伐成功，是一个有人民拥护的少数革命部队，打垮脱离人民的队伍。我对新的人民革命，当时却少认识。

三、看远不看近，世界必然会从一种崭新关系上，不再感到战争威胁。或如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成功，或如斯大林所说，世界会容许有两种经济制度存在（由和平竞赛达到矛盾的统一)。可不知道要达到革命成功，必有个挣扎过程。不是农民武装革命，就无法将旧政治腐败政权解体。更不知道要达到和平，必有维持和平的独立自主条件。我对于这两点或缺少知识，或不曾正视内外矛盾之不可调和性，必从“反”方能转而得到“合”。和平是要在一个新的发展上方可望的。

一面对现实政治无知，一面把工作和社会游离，到外面

的变动世界，和我在两丈见方小房子中的观念排列完全不符合，我的头脑在种种迫促中，逐渐失去了意义和方向。一切都在否定中消失了。

新的学习最大发现为“无知”。用文件和生活教育自己，由“无知”到“进步”，当然还要些时日。对于政治，可能是永远也学不好的。

一、明白为人民服务，是从一切事实作去方有意义。观点、立场、方法，是同样要从实践联系来印证的。

二、人民革命与人民专政，是个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由土改解放了广大人民，方摧毁了廿年专政的四大家族连锁政治。这腐败而庞大的饭团机构，在短短三年中即完全解体，一面是正义和信心在人民，一面也是革命军事原则的灵活运用，既准确，又敏捷，且充满民主精神，为革命军胜利和蒋军必败主因。

三、由新中国的革命成功，新的责任不只是要和友邦苏联，共同维持世界长久和平的责任，且将进而对于亚洲各民族各区域被压迫人民，有帮助解放义务。国际主义的认识，用新的阶级友爱作为新的爱国主义，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这些是两星期来学习的一点认识，首先是把个人对于政治隔阂的空想，稍加廓清，且看出廿年用笔离群所形成的病的空想，必回归人民队伍，方能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

从这些文件条目中，实在还不容易理解某条某款的和其他问题相关意义。但从小组中同学看出的种种不同答案，以及一些问题和他本人思想联系时，旧的否定，新的生长的种

种不同式样，都给了我极大启发。国家建设正走上第一步路，准备为人民服务的一群，也正在学习向人民靠拢工作上，开始走第一步路。看看一些少壮健步如飞奋迅而前，一些年近六十的老少年，也投身于大革命，和万万人民同哀乐，略无顾恋情形，我把我自己，也变成群中一个小点，重新失去那个本来了。

五班三组沈从文

1950．3．27 拈花寺

这是作者在华北大学初期写的学习总结。第一阶段时事学习内容为“蒋军必败”。学员各自写阶段学习总结，在小组会上逐个讨论。此稿是为讨论准备的，文字较简略。据原稿编入。

① 本篇原稿有时写“民国”年号，整理时统一为公元纪年。

我的分析兼检讨

一　脱离群众的孤立性

现象：到现在为止，除民十六①和胡也频夫妇合作的三人会员红黑社，不曾加人过什么有社团性的会社。只觉得一切努力都为的是对国家有责任，对工作负责任。不是为少数人而工作。更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实际利益计，决不搞文学，尤其是不宜搞短篇小说，因为既发不了财，也极难见好。又文学集会中的拜生祝寿，不是为阿谀死者，即只是点缀社交，逢迎生者。对工作进步实际毫无裨益。对年青人尤无益有害。但对于一切工作中能深人独造的，在文学作家中，和自己即素不相识，不相叶，即或他是科学中的数学家也好，高原植物的专家也好，总之对于这个国家进步发展有实益有贡献的，却一例觉得可崇拜尊敬。和书本相对、工作相对，总觉得比和有些半知识分子空谈闲话有用得多，有意义得多。

形成原因：小时节私塾中的群的生活，既有强迫性，且毫无所得。单独和自然对面，和书本对面，以及较后和工作

对面，得到的抽象知识生命严肃感都多些。到不得已时和玄思对面，也比较多得些东西。如把孤立主义显著的表现于工作上原因加以说明，即从民十七后，文学作家的争吵离合实在太多，无原则无结论的攻讦誉扬，大都对人不对事。从个人认识说来，如此下去是不会得到很好效果。由于对工作看法不同，也为形成孤立一个原因。和政治斗争的游离，则有逃避现实意义，只能成为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文学中的观念革命家，无从在实际的战争中锻炼。

比较情形：这种孤立主义如认为属于意识形态的反映，即易成为个人英雄主义，且多少有些感伤混和。这就当然有个发展性：和军人流氓政治结合，会成为法西斯思想。和哲学结合，会成尼采哲学。和抒情玄思结合，会成蒙田、巴思卡散文。和天主教并一点男女错综结合，会成为纪德的小说。和隐逸游侠的中国才情结合，中国则由屈原、贾谊到弥衡、嵇康到陶潜、李白，或成狂狷，或变隐逸，或通游侠，同样是孤立、感伤，不合乎新时代对于一个工作人员品性的要求。从社会学说看来，也可说是一种病。致病因子各有不同，大多是由于身体精神受损害而起。或出于补偿作用，或出否定和反抗作用，因而如彼如此。有可能有时却出于一种信念凝固的作用，那就是当前的我自己。

得失：旧时代一辈，易负气轻生，难循俗媚世。和东方朔、谯周、冯道性格不大相同。难为势利所屈，但极易受一些优美原则和片言只语所寄托的善意感动。影响到我个人，却还有个地方性。在我一本小书《湘西》上，曾将我那一片小地方一种共通弱点为提出，警惕到几百万同乡，认为这是“负气”和“自弃”结果。影响到政治方面，则容易有“马上

得天下，马上治之”观念，少弹性，少膨胀性，少黏附团结性，少随时代的应有变通性。影响到社会方面，则一切容易趋于保守，对任何改革都无热情……以不相信不合作保持负气，凡事照例是容易独自为战，难与人同功，胜不为王则败必死。

我既是这个地方成员之一，多少也不免受这个地方性束缚。用一句俗话说是不达时务。

问题何在？如何改正？即“应当努力的，是肯虚心认识人事上的弱点，并有勇气改善这些弱点。”也用得着廿年前劝年青人的旧话勖勉自己，“在一个较新观点上活下来。”及对生命的解释，“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也正是共产党人生观说的“向前看”意思。“生活在任何困难情形下，总永远不气馁，把个人一点点力量，黏附到整个民族向上的努力中。”最先还是得从“忘我”学起。

二　脱离现实的空想性

现象：作品中不论改写佛经故事，或直接写农村人事，通过头脑，都一例成为抒情诗气氛。写杂论，便容易观念模糊。更因文体和一般所理解标准有个距离，即不免易为人从枝节挑剔，得不到大处，更增加游离性。即写社会现实，也容易成为与现实游离的情形。明明白白认识旧社会统治的腐败恶劣，笔竟避开不肯作正面批判攻击。明明知道社会向前的原则，为革命实践，自己却乐于坐在方丈斗室中读书，即一切争原则集群性的集会，也不常参加。到列名什么宣言，响应什么活动时，不明白这恰恰也是社会革命的现实，要如

此如彼，由人民各阶层因时、因地各作不同的斗争，方能慢慢证实理想，推进理想，也不参加。直到生活得失也与人不争，工作得失也与人不争。工作和本身实际需要日益脱离，发展到某种情形下，自然即成精神分解状态了。

形成原因：一有个自然主义及道家万物皆同的底子，从生活，从文学书和杂书注人影响到意识形态里。有个由于过去生活孤寂，日和自然景物相对，得到画面愉快的底子，再加上习得的美术知识，两相综合，影响到性情。又从生物学取得些知识，把生命当成为一种过程，从物质资料上不怕取得极少，却对文化知识充满强烈吸收力，溶解力，亲和力。储蓄于生命中成为能力和知识。就因为这种能力和知识，还能通过文字，组织故事，使年青一代对于社会进步增加认识和信心。便认为还能将文学本身也从这个转移传递方式中，得到应有的收成。这种空想主义因此日益扩大加强。

比较情形：如配合点游侠感情，和战国时社会条件，就易成为墨翟。如配合封建意识，和西汉北宋环境条件结合，则成为王莽，或王安石。和佛教及象征主义结合，则为禅宗，为密宗信徒。如配合禅境，诗人有王维……总之如彼或如此，大都是孤立感伤外还充满自我恋和自虐狂情形。一句话说即不切实际。理想或高尚，或孤洁，或热烈，或深致，或乖僻，总之脱离实际。更是一种病。致病之因有先天性也有习得性。先天性如我们常说的楚人性格，齐人性格，受传统观念或地方条件，空想似乎即有个普遍传统。但试加分析，还是习得性。反映一种物质的浸润。

问题何在？如何改正？存在决定意识，用新的存在来否定旧的存在。也就是思想斗争。自我斗争。但这种斗争有得

有失。因为希望用短期思想意识完全打毁长期形成思想意识，是不大可能的。而且有些基本上不可能。用外在的物来斗争那个内在抽象，那就得注意玉石同毁的问题。因弱点和长处常常是一物的两用，一事的两种说法。单用一个立场来判断，还不济事。主要是诱导转变长处到对国家具向心力的工作方向上去。空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特性，阶级立场的模糊，唯心的发展，不正确的论断，都由之而来。一部分小说如《月下小景》、七色魇等，充满了一种观念的注释性，反映小资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对人民健康可说是有害的。是能麻痹青年身心，或安于现实减少正视人生勇气的。

三　承认现实的无为性

现象：有些和前两项相通处，又稍稍不同。不大明是非，在政治上的有辩证性是非，更难把握。即因此见出一种对于政治感低能状态。对生存竞争，也永远取个犯而不校的态度。恰如一撮水银，随器物方圆，又不见规角，但即因外在如此，却增加内在的凝固性。如旧话所说“外随和而内不圆通”。或即成为遇事无抵抗主义，但也可以变而为顽固的拒他性。对人事均若缺少明朗判断，在工作上即易致误会，生隔阂。

形成原因：佛道杂书的虚无影响，有较大作用。年纪极青时，所见到的社会强权种种虐待人民现实，感到极端的嫌恶。本身生活际遇，又永远是逆来顺受。因此现实的种种和佛教所示的人生悲悯，常混而为一。因相互同在，彼此相争，彼此相忌，彼此相违忤隔离，而致彼此相残虐感到一种悲悯。

本质说来还是少向现实的斗争性，转入唯心的退避。

长处和弱点：对人少成见，易向抽象真理低头。有严格的自律性（即由拒他性而来），对事有博大精神，能看远景而不求近功。能为人牺牲，取决于一诺，有功成不望报作风。惟易成怯懦，少战斗性。对金钱名位少进取心。在阶级斗争中即和大多书生一样，便有超阶级意识反映。说无为还是有我。我执强而隐，生活因之必败北。

问题何在？如何改正？对压迫为无抵抗，对工作并不儿戏。自发性工作的完成，可以作成补偿作用。然苦行自虐则易成褊急失中，难于合众。群众路线不会走。用现代政治方式走群众路线还得学习。

四　和现实革命隔离，和文学运动的活动隔离

现象：对文学写作强调技术与艺术原则，有受佛罗贝②自然主义影响。因之对文运斗争从十三年《语丝》起始，即取不介入状态。对新的理想虽强烈，对新的实践少关联。随同廿年时代变化种种思想文学运动，及革命现实，不曾有计划经常具体反映于作品中。有时且相反，反映的是小资的幻灭感和洁癖。

原因：死抱住五四文学工作者原则，少变通性，在工作方式上还充分保留小手工业生产情绪，如鞋匠和成衣师傅，一切以便于工作习惯为主。文运斗争争吵过多，竞争工作表现少，也作成我不懂“政治艺术”为何事。因文运中和政治中彼此分合无常形，无定性，难于适应。不明政治斗争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接近政治的容易见小而不识大，有别扭隔阂。

问题何在？如何改正？由于隔离，正如农民性小手工业生产不明白机器工业生产意识形态一样。个人掌握工作斗争的单纯，无从理会阶级斗争的复杂。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如以《共同纲领》《文艺座谈》人民立场为准，只要工作下去，容易调整。如以阶级立场要求，可得用理论锻炼和生活实践同一进行。但事实上惟观念能摧毁观念，得有更充裕机会多读些书。现实也有帮助，多见些好榜样，作用大。可以使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逐渐明确。有错误处即孤立看事情，激而不和，难得其中。还是小资意识作祟。是小资必然性。

本文产生于1950年秋冬，是在革命大学思想改造过程中，一次个人检查的初稿。初稿其余部分与毕业前所交《总结·传记部分》内容接近，故仅节选初稿《我的分析兼检讨》一章编入。

① 民十六　实为民十七，即1928年。

② 佛罗贝　今通译为福楼拜，法国十九世纪作家。

总结·传记部分

幼时背景和发展

十九年前，我写过一本自传，叙述年青时受的教育，这个自传结束到北京为止。我是个封建军人破产地主家庭的子弟，九个兄弟姊妹我排行第四。在家中，在私塾，我是个不肯好好读书的顽童。私塾中虽被迫读了些经书，小部分四十年后还能背诵，可是真正的教育，是在学校书本以外。终于成年以前，就离开了家，在湘西二十八县转了好几年，作过部队中士、司书、收发员、税局小职员，还加上时常失业，各处流转，生活上饱饱接受一分不易形容、不可想象的教育。偶然和一个印刷工人接近，看过一些新书，思想上起了个新的变化，就被五四运动余波推送到北京城，进入一个永远不毕业的学校，学一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贯串了这一段少年青年期学习，有几点值得特别提提：

一、我的教育，从社会实际人事变动和自然景物，得到的知识比书本知识丰富具体。对于学习工作的固执态度，强烈的爱国情感，也就是从这个社会发展中落后和向前对照，

由刺激和认识逐渐形成的。

二、这种学习，是在一个有种种不同自然背景中完成的。一面是农村人民本质的素朴和善良，另一面是外来官吏、军人、税收人员的自私而贪得，凭强权霸道对农民作践。这两者在一种习惯下作成的地方落后和不断流血，我都十分清楚，影响到我的爱和嫌恶，也极分明。

三、使我当时挣扎转变，除了对于地方人事的无知、落后，感觉嫌恶和可怕，还有个新知识的诱导和启发。这知识是从三方面得到的：一、有个聂姓亲戚和我谈现代知识、哲学、佛学、数学、人文地理和子部学问，零零碎碎注人脑中，使我对于人类抽象知识领域忽然扩大；二，从一个军官处得读《四部丛刊》、《四库提要》和金石书画欣赏鉴别，使我对于文化史各部门有了较多较广领会；三，和一个排字工人同处，得读《新青年》、《新潮》、《向导》、《小说月报》等等，引起了生活思想根本的变化。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工人的新书报。在我一本自传末尾，我曾那么说过：

> 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

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

…………

为了读过这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这些三十年前的感想，支配了半生，成为我从事写作的主要动力。只有后面两句话不能完全作数，因为如指的是吃喝穿着，和社会对于这种工作成果给我的报偿，可就不能多所过问。因为守住前面原则，过日子的好坏，照例就不免有些无所谓处；至于生活挫折委屈，倒永远是逆来顺受，沉默接受，认为十分平常，不以为奇。如常常觉得全个国家都还在困难中委屈中度过，我一个人有什么大不了？我始终深信一切对人类有益的理想，无私心的努力，都必然具有一种生长性，能在一切年青健康生命里生长壮大的。也可能会因种种不巧，和偶然忽然而来的人事变故作成的风雨，摧残净尽。但是那种对工作的素朴热诚态度，总依然是国家向前社会向前不可缺少的。一个科学家这样献身于社会，一个文学家也必然这样。

第一段学习，既显明反映到此后思想意识中，情感中，工作态度中，归纳下来约为下面几点：

一、对自然景物特别爱好，这种爱和大都市风雅人的鉴赏风花雪月是不大同的。既正在童年中对于社会百工技艺、草木虫鱼动植生长新陈代谢过程，我都格外熟习，因之发生

一种特别的关爱。前者完全如像种种图画一样，和我青春情绪混和，后者且具有音乐感——一种极端复杂细致的情感，是一般人不易理会的。正如生物学家研究昆虫草木，我在生命最敏感的童年，既那么熟习它们的生长和死亡，这种教育到后来就成为我品性一部分。细心客观和友爱热忱的混和，把它转用乡村景物人事的叙述时，于是见出极大的作用。对于一般感性艺术的欣赏，也由于这个深而厚的底子奠的基础。但把两者综合到写作时，发展下去可就不一定是良好的作用。因为小说中过度用作风景画或静物题材，和作曲子发展过程，把动的人事成为绘画和音乐安排，即不可免慢慢失去本来的素朴明朗，转而为晦涩，为倏忽，不易理解，缺少共通性，也就缺少传递性，发生不良作用，和读者对面时，一切长处反而会成为短处的。

二、因为对于乡村人事的广泛接触，于是农民、船夫、兵士、小手工业生产者——一切被践踏和侮辱的阶层，他们生活性情的长处与弱点，本质上的素朴善良，以及由于被压迫剥削，把他们改变成种种退化堕落的式样，彼此间关系的变化，独自对于生活所抱有抽象或具体愿望，我理解认识都达到一个相当深的程度。因此反映到工作中时，照例是爱多于恨。写都市还能见出正面对统治的嫌恶，写乡村即常常不免用一种抒情诗方式，使之重视于作品中。分析到地方现实问题时，即为这个落后退化而忧愁痛苦，也只能寄托转机希望于未来。可是却不能明白提出什么是未来。

三、现实生活所见，既然是人民受作践的种种，另一面却是官吏军人横强霸道高于一切。权势和金钱即代表一般正义和公道。尤其是滥用权力到一切方面。到我明白权力不如

智慧，现实不如理想对国家、社会、人民为有益有用时，我自然就成为一个惟知识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和社会理想结合极紧密的科学各部门，都具有特别热忱。一个医生或一个生物学专家，一个天文学家或一个数学家，在工作上有成就，对国家进步有贡献的，我一例十分崇拜。为的是他的工作有助于“使人乐生而各遂其生”的远大进步理想。比较起来，这种人比我所见到的军阀政客老实得多。即因此，对于近三十年旧军阀割据独占，士大夫置身于其间的纵横取巧的政治，利害变化彼此相依存，永远是时而联合时而分化的政治，自然即无从作较深的理解，且对之发生拒斥、嫌恶和游离。只看成为社会进步过程中一种病象，明日必然会消灭无余的。也由于此，对于政治现实斗争中一些必然的存在，是毫无认识的。我的社会重造理想，只成为小说的空想扩大，和真正现实的一切，已十分隔离。我想的是过去农村和未来远景，对一个当前完全隔膜了。只理会到必把中国人民的本质上的一切长处和现代科学知识重新好好结合，国家方能够站得起身来。至于如何结合，如何实验，如何从错误失败中不断取经验，进而得到成功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种种发展，书本知识和现实存在，我完全不明白。也没有机会能够从一个我相熟的人明白。

北　　京

我既受当时的新文学运动余波影响北来，到北京自然是习文学，所读的新书，正代表五四运动发展的文运社运，对文学社会所抱的理想和要求。总结下来只是八个字：工具重造，工具重用。换言之，即如何把文字当成工具，在试验中

讨经验，弄好一点，用到社会发展进步所需要各方面去。我就守住这个单纯原则，用它学习，用它写作，用它教书，过了二十五年。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人和人关系全变了，这个对于推翻旧的，建立新的学习，把工作慢慢推进，不断从错误中修正的工作原则，照我理解到的问题说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可是却不可能全变的。不同处是如何用到崭新问题上去，如何和文艺座谈所悬望的素朴目标结合而已。文艺座谈学农工兵，写农工兵，为农工兵的文学目标，要达到它，还是需要这个单纯而严谨工作态度，才能见功。

学习掌握工具，充实知识，第一阶段由民十二到十六。那时候，《学灯》和《觉悟》已失去了五四以来本来的活泼，对文学已不能起领导作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峙各不相下，前者的人生文学和后者的社会革命浪漫写实文学，由我看来都是理论过于实际，要证实，还得一大群默默无言的工作者长时期的努力，方能真有成就。北方则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因刊载鲁迅、冰心小说，胡适、张东荪、梁启超等论文，罗素、杜威等讲演，具有全国性。但文学社团的门户极紧严，无名青年绝少露面机会，也就教育了我加强学习过程。生活虽极端困难，却用北京城的好空气和对于工作明日的理想，把生活支持下来了。因为旧底子好些，学习上从书本接触问题也就多些，广些。控制文字的能力，处理问题的技术，容易把古典华词和乡村语言打成一片，作种种不同实验，这个学习方式，和文字风格建立大有关系。从这种发展下去，和人民革命及现实种种游离，也有关系。

那时正是鲁迅小说提出回返乡土，成为一时写作风气时。同时许多年青作家，都在用乡村人事作主题有所试探。我的

笔和生活经验结合，试验机会也就多些，范围也就广些。过不久，因《京报副刊》、《语丝》、《莽原》、《现代评论》等等发刊，北方文学思想有个新的活动。创作上的门户之见，由周氏兄弟①见解而得到解放，由刊物多而得到解放，我和胡也频的作品较早刊出（丁玲时尚未着手）。但第一次作品的刊载，是投稿数十回结果，经过不易想象的困难和周折的。这事也教育了我，影响到我半生工作，再不以编辑的取舍决定工作的勤惰，以及民十八教书、民廿编刊物，领导部分年青学生习作和北方文运时，对年青作者采取了个崭新态度，修正了身受的不合理习惯，作了他们工作进步的垫脚石。这是工作第一段，结束时，我已有了两个集子出版。

北伐来了，北方的风雨逼人，不能不转移位置。学习告了一个小小段落，真的写作还等待起始。在这一个时期中，我认识的熟人中，影响大的，有林宰平和徐志摩。把握工作态度，林的影响深而久。作品中，十九世纪俄国作品影响启发多。

上　海

第二段学习，是从民十七到廿。北伐前夕，北方由几个作家自办的北新书店、新月书店，因印《语丝》和鲁迅杂文，新月书店因印胡适、罗隆基作品，在北方都站不住脚，移过了上海。北伐成功后，社会一新，新刊物需要扩大，上海于是有了个新出版业，成为商人投资对象。上海风气是只要有利可图即有竞争，由此凭空添了许多书店。这种新的扩张自然就影响到作家一方面，尤其小说作家，得天独厚。由于作品被书商用一个商品方式推销，作品出路已不成问题，作家

地位也随之而变，成为社会发展中一个新的指导阶层，具有娱乐兼教育青年学生作用。因此每一种新的文学刊物出版，小说必占主要地位，每一书店新开，有销路的书应数小说。我们就在这种刺激和鼓励中，各用工作和读者对面。我算是这个作家群中肯低头努力的一个，但文化商人究竟还是商人，投资必要利润，所以虽少不了作家，最受剥削的也是作家。就因为这个剥削制度既根深蒂固，截至卅七年为止，中国作家的版税制度，即并未能好好建立。有好些书店，对于这件事是永远不大负责任的，鲁迅生前即不能靠版税过日子。因此有些极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不是被迫改业，就是因工作得不到应得报酬，终于穷困死去了。必须把这种事实联系来看，我们才能理解近卅年始终支持工作下去的人工作的意义。

我的工作也就通过这一全部过程，从不能想象工作到二十年或三十年，会靠它能有点收入，从容生活下去。这对我其实也是一种教育，即不能唯物到为收入而工作，便从此不向商人争公道。如为收入计，大致不是作了官，就很早转业经商去了。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即这些老板，照例得通过一个有人缘的编辑来要作品，报酬通例是三元千字，到时可能少付些或不付。单行本预支一二百元，其实等于买绝。有些书店更坏的，即把他人译稿抄出，原稿奉还，过不多久，他倒占先出了书。又有些收受了稿件，书已印出，到作者询问版税时，书店即回一信，说明书无销路，倒欠若干得补还，使作者哑口无言。在这种情形下还是作家辈出，我并且成为大量生产的作家之一，原因有二：一有读者，二生活需要。时工作力正旺盛，又得到社会鼓励，因此有一时节，几个大型文学刊物，每月都有我的作品。但是生活呢，自然另是一回事。记

得十八年左右，和丁玲夫妇各有新著搁到四马路几个新书店玻璃橱中，成为市面悦目装饰时，我们去书店要点钱用，就一文不得。那天正值大减价，人来人往多，我们就在那书店看热闹许久。只觉得这也不妨事，工作上我总得对读者负责，至于付不付钱，那是你商人的道德或良心，如永远不付，也无法勉强。虽说工作态度是这样，应付生活实际，自然还是相当狼狈的。一面受物质限制，一面得求工作应有进步，和同时作家竞成就，结果若干作品到完成时，口鼻都不免要出点血。也以为还是不妨事。那么我用的是什么理想来迎接这个现实？简单得很，还是五四对文艺工作者的期望。总以为工作刚好起始，要为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奠个基础，使它成为社会重造一种动力，就得和战争一样，在据点上坚持不儿戏工作下去。困难或失败，都得接受。要工作成熟和进步，对读者发生普遍而良好影响，且鼓励更多少壮来从事学习用笔，不能不扎实工作，完成这个困难任务。自己即因此牺牲，文学史上旧榜样多，得向之看齐，无怨言。古人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而不有"，几句旧话，也增加了我在工作受挫折，生活永远败北的抵抗力和适应力。总认为自己要走的路极远，则一切摔跌通通不在意了。

到十八年秋，体力实在已支持不下去，因此由徐志摩介绍，转入中国公学教书，教习作。校长是胡适之，不多久，胡被政府压迫辞职，换马君武。和胡相熟是这时，私谊好，不谈政治。当时新月谈政治的是罗隆基、王造时等人，另是一起。照一般人说来，我应分是作家中幸运的。因从五四起前一辈如梁漱溟、刘半农，虽大多是忽然转入大学教书，成为名流之一。能这么教书且极得人重视。但到民十八左右，

国内情形实已不同，国内若干大学，教授只是一种学有专精的象征，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处。至于一个比较露面的短篇小说作家，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家，在各方面得到读者的好感，实在比一个国立大学的教授也就有意义得多！因为生活尽管过得十分寂寞艰窘，和上海出版家感情又特别不好。但是，一本书一个作品刊印出来时，应得的荣誉还是属于作者的。举个例说，丁玲当民十九把她一本《在黑暗中》成名作品售绝给某书店时，不过得洋一百元，也频刚为革命牺牲，作孤儿寡妇还乡路费尚不够。可是那本书在当时南北得到的成功，还依旧是作者的。我在中公教书，有得有失。生活稍稳定，在崩溃中的体力维持住了。图书馆的杂书大量阅读，又扩大了知识领域。另一面为学生习作示范，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从文子集》、《甲集》②、《虎雏》集中等等若干短篇，大多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学习过程中有个比较成熟期，也是这个时候。写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识有计划结合，从这时方起始。

十九年过武汉大学，还是教习作，半年后即回上海，仍和也频夫妇在一处。不多久也频被捕，为往返营救，不能不放弃了学校事情。

青　　岛

廿年过青岛大学，进入我第三段学习写作期。校长是杨振声。由民十六到廿六年，恰恰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短篇小说的收成期。巴金、老舍、茅盾、丁玲、张天翼、穆时英、施蛰存、沙汀、艾芜、魏金枝、靳以，都各有成就，成为国

内读者所熟习的名字。作品的多方面性既相互教育，也就教育了国内各学校教员和读者。公平说来，除少数又少数，一般对国家发展是有不同贡献的。因大多是正面表现社会，而有所不满的。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分析说来，也易明白：

一、永远守住五四旧原则，把握学习工作特别紧；

二、生活接触面比较广，题材稍能展开；

三、因综合消化古典力强，从传统方面得到些方便；

四、杂书杂识稍多，在体裁风格上也容易表现多方面性。

这自然还是和教书有关系，即一部分作品为示范而完成。为同学叙事习作参考而成。因之长处中也即同时有了弱点，即在设计上的过分注意，慢慢失去了本来的健康、素朴，和时代的变动必然日益游离。住的地方又恰恰是个风景区，直接人事极少接触，每天只是和大海晤对，海边天云扩大了我的幻想，也自然就影响写作范围和内容。这几年作品有《月下小景》集、《八骏图》集、《如蕤集》等等。

北　　京

第四个段落，是民廿二到廿六年七七事变。我由青岛回到北京。那年九月结了婚，写了《边城》、《湘行散记》、《记丁玲》、《新与旧》、《主妇集》等等。并把十年学习工作作个结束，编了本习作选，并写了个总结性序言③。把这个序言，和《记丁玲》引言，《边城》题记，三个文件并置，可说明我学习工作的过程及对工作态度，以及为什么写这个或那个。

说明这只是学习一个段落，新的待起始。旧原则得和新工作结合，待摸索，待试验。工作也孤立，也联系，和并世作家，对于用写作当成桥梁转入他径，或发财升官，我是孤立的。把工作当成社会发展一个部门，我工作和其他发展是有联系的。

因编辑《大公报·文艺》[4]，曾用编者名义，和国内文学青年通信，讨论写作一般问题。后来和《大公报》记者萧乾一部分信件，由巴金为印行，名《废邮存底》。这本书对国内一部分作者的写作，把握工作的单纯态度，是有过影响的。这时节，北方五四以来的领导作家，死的死去，息手改业的早息手改业。徐志摩、黄庐隐作了古人，鲁迅南行已久，钱玄同只教教书，再不想用笔，冰心作了母亲，俞平伯、朱自清虽还写点散文，主要还是在学校教书，闻一多已不写诗，梁实秋的批评成了尾声。北方因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罗念生等回国，新作家有曹禺、何其芳、芦焚、李广田、卞之琳、林徽因、毕奂午等露面，又因郑振铎、巴金、靳以等由南方来，文学活动有了个新发展，文学研究会最后一集丛书的刊印，巴金等编的《文季》，卞之琳编的《水星》，及文化生活社丛书刊印，良友《新文学大系》的印行，都在这个发展下作成。

我的学习工作，在这个新的空气下，也推进了一点点。工作还是老样子，不怎么变。因《边城》和其他一些短篇得到些鼓励，在体裁上的试验恰证明还值得人来用点心，只希望有时间把十个水边城市的故事，各用不同文体，不同组织来完成它。一切还是在一个学习态度下学习下去。其时主要工作是编教科书，和朱自清、杨振声一道工作。文学中有京、

海派论争，面并不扩大。因为当时说京、海也不甚成为问题，南北宗派主义虽仍存在，作家和作家间有隔离，少团结一致处，是事实，但在一群小说作家间，则尽管陌生隔离，却照五四习惯，只相互从工作态度和工作成果上表示敬爱，看不出从工作以外还有机心。文坛上有拉丁化讨论，集中在上海方面，因只重在政治作用，也就始终不见有作品可供我们学习。有大众语问题，也在南方比较活泼热闹，但提倡者自己却不努力，所以到实验时，北方作家反而持久些。主要是见解不同，还是南方作家和商业资本及政治斗争都结合得紧些，变化也就多些。北方作家却充满书呆子味，和教学关系深，重实践。教书人永远把自己当成桥梁，让年青人过渡，不是用年青人为自己往上爬的心情，所以同样是争自由民主，方式上自然就不同。同样是工作，工作态度也即不同。因争无可争，后来语文论战，民族统一战和民族风格等等讨论和争执，就只集中在南方了。北方文学青年，七七事变后过延安的比较多，对工作老实忠诚虔敬素朴态度，和接受中共领导后的对任务负责态度，和他们七七事变前的学习，应当有些关系。从他们的工作中，通信中，我也学了些东西，即凡事活泼热闹要人，持久沉默工作更要人。

昆　明

第五段学习，是廿六年到卅五年复员，整整十年。抗日事起，北平由孤城一战而陷落。在北平家中，待把所有新书报大烧特烧后，八月十号我就和北方几个大学里的负责人，同乘一列火车离开了北京。在天津得知上海发生战事消息，一群人还

是分别上船由烟台转济南、南京、武汉、长沙、沅陵，各住了短短时间，带着沿路空袭大火的印象，由公路到达昆明。

在武汉住了三个月，在武大图书馆工作。曾有人约过延安，说是可以充分得到写作自由，不大接头，无结果。在长沙又和鲁彦、曹禺等和徐特立先生谈过，问延安情况，后为一个着米黄大衣少壮把话岔开，因此不再谈。廿七年春天到了昆明，编教科书一年，随即转至联大教书。写了《湘西》、《长河》、《昆明冬景》、《云南看云集》、《烛虚》、《芸庐纪事》、七色魇等等。并总结第二个十年学习，编选集三十本。编到第十一集，因在课室中批评到重庆，稿件受审查，有四个集子不许印行，《长河》被扣，被扣的半年后方发还，集印的于柳州大火中毁去。这个选集因之搁下来未能进行。也影响我全部工作。

乡居七年，人事枯寂和明朗朗自然景物对照，生活单纯和地方由于假繁荣种种对照，是影响到一部分作品转入晦涩难解。初到曾和联大同事钱端升、陈岱孙等编过一周刊，又同林同济等编过一半月刊。广西方面刊物找对象骂人，总以为有个什么《战国策》派，其实全不相合。我不再写文章，问题也极简单，即到我明白刊物有一点政团意味或官僚关系时，我搁笔了。

卅四年是抗日胜利年，也是中国问题在荡动，国内引起大不安一年。昆明由军事接济根据地忽然成为政治单位，党派活动加强，学校于是由单调沉闷而骤然活泼起来，反内战。

我自己明白，从工作态度，从做人立场，在文学活动中，应当得到同学信任。但在人事应付上，来和官商社交，从社会矛盾情况里，在一些陌生人中间或明或显的团结或斗争，

实完全不济事。在写作是完全用不着这种机心的！人人为明日国内战事而忧心，大家谈和平，却寄托和平于政治上的平衡与调整。时民盟各派犹未分裂，联合政府名词在学校中呼声正高，《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昆明已常有人道及。一切为了和平，但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政治有联系的人，对于和平的认识和幻想可不尽同——本质同目的不同。前者惟知国家必和平方不至于糜烂，后者却重在分配政权并如何得到它，巩固它，此外不能提。书呆子盼和平虽不免有点盲目片面性，也只是希望工作不至于中断，并无特别利益可言。但一个政治人可就不同。

国家抗战已八年，华北河南山西，华中两湖广西，都直接受日敌炮火焚灼，人民死亡千万，川、滇、陕、甘各省，壮丁应役消耗也极大，必和平方能恢复元气。政协谈判，所谈在分配政权。东北新回到祖国，有偌大一片土地，若真的要为人民办事，有的是事情待人去做！所以问题如能如中共所希望，由战场转到会场来解决，当然是国家之福。四十年所见的政治，只是争权夺利，从不见对人民有真爱。因此在大家争谈政治时，我觉得这个国家真正的需要，如果还少不了政党，除第三者外，实在还应当有个第四党或更多的党，一切以人民真正利益为重，以训练专门技术为国家建设而服务，为和平民主的进步政治而服务。这种新型的集团精神，基本上即应当是争贡献而不在争获得。在争给予而不在争占有。在泾渭分清而不浑合一气。我还扩大抒情的理想，认为将来必有一天，这个国家的最高指导者，将是一群科学家，一切由科学出发，国家不是衙门，将是无数实验室，每一部门都是一些真正的内行，而营养学专家、医生、数学或园艺

学者、音乐家和画家，才是在一种更新政治体系政治理想中的负责人！至于谈社会，也得从这个国家各部门点点滴滴十分具体去理解，去调查研究，且深信中国需要生物学地质学者，比一些空谈家迫切。

我的话说早了些，和许多话一样，都不免成为清谈，和现实不相符合。也自然就成为拘迂之论了。因为一则政治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其次国家发展更不如我这个理想家的空中楼阁。由于时局转变还是向战争发展，从战争得和平，得转机。我的迂话说是党派应在一种新的政治局面下，争给予争贡献，为国家人民服务，虽幸而言中，但在当时却成为一种批评对象。且收到察渊鱼结果。

北　京

复员了，学校同事旧友多陆续北旋，我由昆明飞上海，随后又转北京。到上海不久，即闻李公朴被刺。过不多久又闻闻一多被刺，使我对于生命感到一种空虚。李为人不熟，一多则从民十三即认识，且同是新月写文章旧人，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联大都同在一系作事。在昆明那几年，因穷到卖图章生活，我还好事为到处找熟人揽主顾。卅三四年，在同事冯家⑤讨论翻译现代作品时，提起年青同学需要领导，那时民盟还不露面，我就说过我的性格恐不宜于人事周旋，如集团中应付人，他作来可能有作用得多。到他已经在行动时，想邀我入民盟，还和某兄⑥特意下乡来谈了一次，没有结果。原因极简单，我认为我还是只宜于写小说，能处理文字，可不善处理人事。到上海后，相去十年的老友大都见了面，巴

金、郑振铎、叶绍钧、李健吾……大家不约而同，国家需要和平。一切得从和平着手。一多为和平牺牲了，和平应当还有一线希望。回到北平，在教授会中，看看同事多已白了头。云南十年流寓，彼此还不觉得老大，但回来看看，可大不相同了。七七事变日本廿七架飞机轰炸南苑时，和百廿架飞机大炸南京，九十架飞机炸武汉，又昆明第一次轰炸，及末后一次轰炸，都在印象中清清楚楚。十年中有千万人民流血，世界上好些区域，且有更残酷的战争，方得到这个胜利。要保持这种由牺牲得来的成果，除和平无他望。相熟人中逃出北京时还是初中二的学生，都已长大成人。历史在向前进展，中国前途实令我忧心。因为只有北京，即可知中国问题实百事待理，百废待举而百弊待除。记得下飞机那天正是教师节，上街去就被特探搜查身体。从天安门过身，却见到两架坦克炮口裸出。政治矛盾待调协统一，军调时犹在进行。各方面都有和平呼声，中共也还在极力进行，承认这个协调为可能，为有望，所以从报上看看鸡尾酒会有某某出席，总令人有轻快感。

就在这个情形下，我来重理旧业。政治上问题待解决，我无能为力。文学上的争自由，在这个五四发源地，总还可以注入一点理想，并反映现实中万万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为整理这八年对日帝抗战种种得失，纪念死者，和建设一个在世界上能站得住的中国，我们这一代总还有些责任待尽，且必须为年青一代的垫脚石。大家都已转入中年或暮年，生命的有效使用，至多还能有十年八年，也得受自然规律限制，先是机能失调，终于全体废毁。但是个人可以毁灭，国家总不能再糜烂！我们这一代即或由于受历史负担，一生在痛苦中挣扎过了，下

一代实在不应当还如此悲惨。总之，为了明天的国家，为了更年青一代活在这个国家幸福合理一些，个人工作只能看成国家发展一个环节，一个小点，得各尽所能，把工作继续下去！不问现实中有多少矛盾，我却深信和平必然可以来到的，全国人民愿望，都认为政治矛盾用在议场上终比战场合理，我以为中国如真有伟大政治家，自己如不存心从人民死亡中取得不当利益，必然是把和平为第一件事。

回到北大，我仍教习作和散文。我自己工作态度还是不变，永远学习。不过向现实学习，也就越发不易理解。真正别扭处，或许还是不太明白现实，尤其是城市政治、报纸政治的时有张弛，和同一名词、一问题的能动性。即如自由与和平，在一个和政治有游离的人，从习惯看来，他是国家向前发展一个根本原则，名词是凝固的，具体的。这里要用那里也得用的。但在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人看来，就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有时实，有时虚，有时这里要，有时那里又不要。有时说要可并没有要，有时说不要可偏偏要。这种能动性永远不是一个平常人能体会。我和现实政治既不碰头，自然在教书问题上也发生了矛盾。时代动荡，已到只要一个歌、一首朗诵诗即可代替一种希望，我谈的却是朗诵诗如何才可望成为一首诗。大家都在溜冰，或学习溜冰，我的小手工业生产还停顿在制木屐钉鞋情形中。这种隔离，自然是无可弥缝的。

我的工作本是短篇小说、写作或教学、始终不离开。比较能领会一个短篇之所以为短篇，基本条件是什么，必从什么过程上来掌握工具，方能好好使用工具。明白不能单纯靠孤立理论指导，必在工具掌握，能处理和实践，只有一点，即工作还得在有试探性方式上，各就长处来发展，再用一个

相当长的时间来检查得失。大学生的四年习作，老老实实把握叙事能力，得到它，新的思想，新的问题才可望加以表现。要广泛接触人事，理解人事，方能成为新时代的叙录者，说明者。有思想方能处理表现思想于一切不同故事中。为的是小说部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已配合社会需要不来，完整故事已失去了需要，必然由一种特写代替。而学生的学习，如一半得由实践取经验，用几个优秀记者的作品作范本，可能更易得手。谈的问题和诗一样近于废话，大时代在动中，北平附近的炮声，已日益清晰可闻了。

解　放　后

北京解放后，国家转入一个新阶段。向社会现实学习，我的生命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离开了学校所熟习的问题，转到午门国立历史博物馆仓库中，搬砖弄瓦工作了将近一年，再转华大、革大。就沉默学习，沉默改造，沉默接受。十个月的训练，慢慢的整天也可以不说话了。一个人忘我并不容易，但在学习中总要慢慢的取得克制之方的。

试从这个简单叙述，回溯一下自己工作发展过程，从读《新青年》时代起，即注入社会重造，人和人关系重造的幻想和热忱，支配了我生命一直向前。把个人身受的一切作践，都看得如教育中一个章节，万千中国人既身受过，对于我也正可增加生存严肃感。永远只想用无私和友爱来回答这个社会的无情。且深信文学可由个别不断努力，如十九世纪的俄国情形，异途同归，将国家和历史促进一步。托尔斯太或契诃夫，屠格涅夫或高尔基，总之，各以分定将他所见到、所

得到、所感到的国家的种种，充分反映于作品中，既丰饶了俄国的语言、文字的知识，从社会人事，从自然景物中，引起年青一代对于这个国家更深厚的理解，更深厚的爱，更直接间接助成了本国革命的长成，也能提示更多方面问题于革命领导者，补救计虑认识所不及。更重要，即是能将这个民族各方面的本性长处好处，和制度中的弱点和劣点相对照，一律置入俄国特有背景中，作为世界年青人和文学家一种向前的鼓励，一种对于这个国家的理解和热爱的独一工具。俄国作家既那么对世界尤其对中国有过贡献，一个中国作者，能那么认识文学、理解文学，并希望个人工作和国家历史发展如此作成密切的亲和与联系，把握住一个单纯原则，来从事这个极端复杂工作，也就十分自然。我就那么工作下来、学习下来，也生存下来了。恰如一股小小溪流，由茹泽涓涓到一脉长流，到大河，到大海，通过了一切阻碍和困难，矛盾复矛盾，居然和一片汪洋溶会，由卅年万万人民血汗并流作成的革命大流溶会。只有一点可说，可发现，即个人十分渺小。

新时代已将社会重造，人和人关系重造，过去以为有关这件事，只是比较少数理解这个国家重造原则的人，肯牺牲努力来说明来呼吁的，现在已为全国人民努力的方向。即在文学方面，过去孤帆独征的探寻工作方式，也起始在文艺座谈共同纲领对于文学艺术所提示原则上，对于年青一代工作给以各种鼓励和方便。集体生产用在小说方面虽还待商讨，用到戏剧电影舞蹈音乐方面，所作的实验都有了成就。且无疑还有更多样伟大成就在发展中生长。我的学习还只是开始，作一个读者一个观众而开始。

《庄子·大宗师》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从工作，从生活，我很明白劳我以生对于我具体意义，且明白由此勤劳辛苦对于人的意义。还剩余一点点精力和杂知识，待把它综合用到一二种具研究性工作上，完成一小部分，体力耗竭，来不及什么“佚我以老”，就得休息了。但在休息以前，总还是要不断学习，不断工作，不敢懈怠，不能懈怠，一个人是只有死去方能说是真正休息的。

作者1950年3月初入华北大学四部，编入第5班第2组。后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12月毕业。

本文是作者在毕业前所写总结的传记部分。文中《幼时背景和发展》一章结尾处归纳的三点发展，系从另一初稿中摘引补入。其余均据原稿编入。整理时仅改正个别笔误，原稿中地名、省略用语及引用术语欠准确处，未作修正。

① 周氏兄弟　指周树人（鲁迅）、周作人。

②《从文子集》、《甲集》　即《沈从文子集》和《沈从文甲集》。

③ 总结性序言　指《从文小说习作选》一书的《习作选集代序》。编入全集第7卷。

④ 编辑《大公报·文艺》　作者和杨振声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自1933年9月23日刊出第1期。自1935年9月1日起，该《文艺副刊》和《小公园》合并为每周4期的《大公报·文艺》，由萧乾负责大部分编辑工作，作者仅编《文艺》的“星期特刊”。1936年4月起，《大公报·文艺》全部由萧乾主持编辑工作。

⑤ 同事冯家　冯指冯至。原名承植，字君培。现代诗人、作家。

⑥ 某兄　指吴晗。闻一多、吴晗曾同访桃源新村，邀请作者加入民盟。

总结·思想部分

家庭成分个人成分

我的家庭是封建军人破产地主家庭。祖父清代作过云南昭通镇总兵，贵州总督①，年青早死。死时没有儿子，祖母从叔祖抱了个次子过房。叔祖由贫农成地主，几个叔父后来又成为贫困农民。住家名黄罗寨，离县城四十里。共有四叔父、一伯父、二姑母，全已故去。

照家中理想，我父亲还是从军。庚子时随罗姓提督守天津大沽口，和外军作战战败，罗自杀殉国。父亲把家产荡去。不多久，就带了维新变法后的《大陆杂志》、《东方杂志》、新申二报②、照相机和化学药品回到家乡了（我家住城中）。辛亥时和苗人领袖唐力臣同谋起义，事失败。后因竞选下省会议代表，不成功，离开家再向北方跑，作事十年多。因读医书，民十二后返回家乡作军医终生。为人正直和平，在作军医时，得人爱敬，知名于时。

我在小学时家道即已中落。九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四。

既不曾好好读书，家中随后也读不起书，小学毕业那一年，即自食其力，在沅水流域二十八县和川东一带，随同一些杂牌军队流转。作过中士、司书、收发员、税局小职员。转了大几年，受了份不能设想的困难教育，居然在那个可怕环境中，也读了点旧书。后来又跟一个排字工人读过《新青年》等等新刊物，思想上起了个根本变化，就被五四余波，推送到北京城。照我十九年前写的一本自传说的，是进到一个不毕业的学校，学一课学不尽的人生的。原则是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为“工具重造，工具重用”而努力，目的单纯明朗。快三十年了，工作枯燥而困难，我接受了这个原则，工作下来了。通过个人学习，由十四年起始在北方各刊物发表习作。十六年过上海，十七年起始教书，最先一个大学是私立吴淞中国公学。十八年离校。十九年过武汉大学，冬天回上海，因胡也频被捕事，为经营挽救不再返武汉。廿年过青岛大学，廿二年离开。廿三年到七七事变，我在北京。抗日事起，我从天津转烟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沅陵，各住了一些日子。廿七年春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教书共七年。卅五年七月复员，在北大文学院三年。北京解放，在午门博物馆研究半年，还兼教北大博物馆专科近代工艺美术三小时。今年三月初，入拈花寺华大，四月转革大。

我的工作主要部分是创作小说，在学校教书，也教的是这个部门和中国古代小说、散文，及一般叙事文。生活主要来源是薪资和稿费。还有点版税，数目不多。

个人成分，或可属于农民型转化为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作家。意识形态中充分反映农民型的本质，保守，顽固，为人机警而不诡诈，熟习人情而永远天真。有理想信仰，缺少

现实政治常识。对人对事热忱，惟因此反而不免吃亏受屈。

我的人生观形成背景和工作关系

我生长地名凤凰厅，到现在为止，还是属于少数民族苗区。地方二百年前方设县治。旧的统治本门满洲人，后来才是外省人，再后一些时候才是戍卒屯丁上升的本地军人。由于地方落后，宗教中的巫师，还和封建前期的巫的地位相去不多远，宗教仪式混和娱乐场面，还能够得到群众，为落后人民服务。

地方官吏强权和人民根本利益有矛盾，显明对照。幼时所看到的种种，对个人生命有永久影响。地方人事恶劣，人民本质实极善良。农村由平静到分解过程，我看得很清楚。个人既生长于一个破旧家庭，由此分化而出，挣扎生活和学习，和人民中的船夫、农民、兵士、小手工业者，情感易相通。地方风景好，且是《楚辞》发生地点，这外在种种，一律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用种种不同印象，浸人脑子中，影响到我个人性情人格发展，自然十分深刻。简言之，即具有充分楚人气质，接受原则易凝固，欠通脱。和政治游离及强烈乡土爱情感，即由于这种气质的反映。对人对事通可见出。

生命挫折多，随事易涉空想，且一律和一种牧歌抒情传统结合，因此即写农民，也多不免带着乡土回复的感情，引人怀念过去，意识明显；启发未来即有些抽象模糊。是小资和农民土地爱气质结合的一种形式。一面是明白外来的花洋布、煤油和其他消费品，本地的官吏与鸦片烟，把地方完全

堕落和退化，手中笔还是无从正面接触现实，只对于人民的素朴和善良有所讴歌，警惕到年青一代，要重新想办法，可不曾为提出一个具体明确的主张，并且为这个主张而奋斗。作品充满了试验性的勇敢，和谨慎细心，自由而偏左发展，惟始终不曾与政治上的理想合流。个人有些罗亭型，幻想恣纵少实践。管理自己极严格，对人却少斗争心。生活体念既属于人民一面，农民的保守固执和地方性的楚人负气，不达时变，不善于拐弯，情绪别扭处一经综合，自然是易孤立，难合众。尤其是对工作态度上，显而易见。对抽象优美远大原则，易接受，但这个原则如在另一方面现实中，得弯弯曲曲的发展，我即无从适应这种现实。有时且不免发生怀疑。过去卅年永远守住五四原则，和政治现实不调和，和人民革命游离，就是这个原因。

情绪基本虽近于农民中无产阶级，文化和知识基础，却是封建资本社会的个人自由主义的理性和观念。最初由三方面得来——

1. 从一个亲戚明白现代知识中的哲学、佛学、数学……

2. 从一个军官处得读《四部丛刊》、目录学和金石图录知识、子部杂学问；

3. 从一个印刷工人处得读《新青年》、《新潮》等等。

影响最大的是第三部分。但工作向前发展时，无疑三方面知识都影响到工作半生。

到北京最先认识林宰平。争工作贡献，不争权力得失，取予之际有些见得拘迂处，勇于求知，接受挫败永远沉默向前，以及应世拙劣处，和认识林有关。

其次和徐志摩相熟，对事对人热忱无机心，影响大。

和胡适、杨振声、巴金相熟，对人宽厚不求全，有影响。

读书影响：中国部分史部和杂子书、佛经、中古小说、章回小说，在文体结构理解上，都用过一点心，并且有较多方面影响。古典文字的谨严、素朴、壮美，和乡村人民的俚语俗谚，有计划揉和或综合，作种种新的实验，来证实五四所提出的“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原则，实支配我用笔学习的全面。有关思想表现与业务得失的批判，离开了这一点，是得不到要领的。工作中既充满了凝固的信仰，永远在修正中向前，所以对一些浮光掠影的批评，历来缺少理解，无从接受。

又因为稍有些近代杂知识，作品中也就照例反映出中古传奇的形式，和近代理性的点点滴滴。在写作意识上，找不出明确阶级意识的证据，却有些似旧实新的东西，就由于这种综合，所作不成熟的多样性的习作结果，后来作品文字由明朗转成晦涩，文体组织由健朴转入幽僻繁碎，也即由于这种种发展结果。

外国作品，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翻译，北欧作品，影响大。与其说影响，不如说启发。契诃夫短篇的多方面性，和其他处理事件方式（尤其是佛罗贝忠于文字，为问题而服务一生用笔态度），对我发生教育作用。主要还是凡属叙事一切作品的优秀设计，由《史记》中诸传到魏晋杂传，唐宋传奇到《笑林广记》，国外作品凡是能看到的，组织上的种种长处，差别处，特别理解得深而细。反映于工作中也显明。长处是多面性，短处是无阶级立场 即或写现实社会的腐败面、退化面，还依然用的是俄国或法国十九世纪作家的意识形态，

来作种种反映，和现社会有了游离，疏隔。即写现社会，仍无从配合这个动的社会，动的政治哲学，反映最活泼生动而有发展性的一面。

受俄国十九世纪作家影响更大处，还是那个时代俄国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抽象地位和实际作用，以及作家本分责任。因为照个人理解说来，俄文学小说部门的成就，把俄国史向前推进一步，把俄国土地人民性格和愿望，忠忠实实从各方面反映于作品中，使世界对俄国土地人民多有一分认识、理解和爱与同情，不是一二人十年八年虚虚泛泛的来从事可以完成。必然是许许多人分工合作努力的结果。托尔斯太或契诃夫，屠格涅夫或高尔基，贡献各自不同，各有千秋。我认为中国文学中小说部门参预历史前进的方式，也应当取的是这种方式。共同沉默努力争贡献，还只会感觉地面太广大，肯参加工作的人太少，发掘或表现中国各方面不够，那有什么为小小利害得失争吵的必要？只觉得文学和社会发展结合，求有良好而广泛影响，绝不是对内三五小集团为个人利益而争吵，还应当面向世界成就看齐。尤其是近三十年只能用鲁迅一篇阿 Q，送到国际读者眼中，让人认为这就是中国最高成就，觉得可惋惜。为学鲁迅，也就必须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忠于其事，且存心准备为后一代垫脚石，对这个社会各方面来理解，来认识，来表现。强调不离工作岗位和技术掌握，及多方面性实验，就是这个原因。方式可能笨一些，发展可能慢一些，在社会变动是非不明过程中，也会因种种不幸，将一个人工作成就和工作能力，完全牺牲，也只好听之，不能在意。因一切向上的理想，总不可免和其他方式作成的习惯有扞格枘凿处，工作即因之失去意义，文学史旧榜样多，

他人接受过的我也应当接受。至于事事圆通，随时随事求自全自利，倒不免成为不三不四的样子。政治即支持了他，他的工作实并不曾将政治推进一步。文学对社会发展的本意，反倒失去了。但是对于能够事事圆通的人，也并不轻视，因为在某一点情形上，这种人的唯物思想，很显明于人于事都有利的。

这种工作态度到目前说来，不免有超阶级性。如果是超阶级性，试作分析，有个客观的原因，即近二十年文学运动中的社团斗争问题。社团包庇性教育了我，使我对社团的组织怀疑。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创造社的对立，同样有个事实。《小说月报》民十起由茅盾编辑，即提出文学与社会关联，大多作品即只能发展到自由表现为止。创造社由成仿吾正面提出文学与社会革命的联系，理论严肃，到现在看来还有意义，可是却产生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充满青春浪漫性创作。理论主张和实际表现照例并不一致，因之是内外都不免有矛盾。内部的不断分化，到这个工作和商业利益有联系纠纷时，更容易见出。我也就从这个现实问题上有所学习，把自己和时分时合、不易把握的现象游离，选择了个寂寞困难的独自作战方式。也种下我此后二十年不加入任何文学社团重要原因。

十四年到十六年左右，是北方的《语丝》、《现代评论》争问题时，几个刊物都有我初期习作。因为当时一个小说作者如有所争，对象只有两个：

一、同时几个作家的优秀纪录。就他们成就水准，赶上他。（当时国内作家，一般说来是用鲁迅、叶绍钧、冰心、郁达夫……等人成就，当成最高成就的。）

二、世界短篇优秀纪录。最低目的向之看齐。

十六年大革命来临，我还是只想从学习掌握工具，认为工作是和社会联系的主要方法。我还在学习用笔，待走的路尚远。

十七年过上海，文学集团多，论争多，分合多，无从加入。但理论所提起的反映两种社会现实，一对统治上层知阶官绅的嘲讽，二对下层社会的赞颂。我作的实验，却比人其实稍多些。大部分习作是自由主义偏左，且在逐渐中发展推进的。但缺少政治认识，工作还是完全孤立的。孤立的追求理想，追求工作进步，追求工作和社会发展结合。只觉得工作既寂寞，又艰难，更得努力作去。

和胡适之相熟，私谊好，不谈政治。那时候和胡谈政治，反对南京政府的有罗隆基、潘光旦、王造时，他们谈英美民权，和我的空想社会相隔实远。也不和梁实秋谈文学，因为那全是从美国学校拿回来的讲义，和我的写作实践完全不合。当时我个人只有两件事待尽责任：

一、作品反映社会，就能够接触到的加以处理；

二、从这个方式教书，告同学如何学习掌握技术，持久努力下去。

我的打算极简单，将用新成就摧毁旧势力，只有一个方法，即好好工作，到最后，让年纪青体力强的再接手下去。在工作岗位上好好跑完廿世纪前一半。

当时大革命流血之后，上海有斗争，还十分激烈。北四川路的公共汽车，即常有被打事。学校中搜查宿舍的军警，把学生中藏有马寅初的经济学和红封面《呐喊》的人，也一再质问。我所见到的文学斗争，却正是《萌芽》、《奔流》和

创造社的《太阳》③，及张资平、陈豹隐编《乐群》（乐华?）对垒时，梁实秋在《新月》和鲁迅大骂时，都只是用一些空疏理论作战，对写作实际却无任何帮助。既无从理解，自无从将工作配合。

这是个大流血时代，加上个从小看到的流血印象，相互掺合，和我的农民本质不合，和习得性的小资知识理性也不合。所以朋友多革命，我不参加。但有关工作业务的态度，还是自由而偏左。直到十九年，由武汉返上海，也频邀入左联，我答允的还是愿帮忙，可不入伙。原因简单，如大家争工作对国家长远贡献，为一个理想而向前，我乐意执鞭；作尾巴作什么都不在意。如争的还是小团体近功小利，我做头目也不加入。因既无能力也少需要。也频等被捕受害，左翼受挫，大家一时热烈忽而消沉，上海商人见风转舵，都转而印行儿童文学。被捕的无人肯出头经营后事，还得透过一些比较中间者为努力（当时徐志摩、李达、张志让都帮过忙），也就影响到我个人此后态度和工作态度。认为社会改造得从长作计。如热闹即出面，困难即缩头，再配合商业需要来适应现状，政治变化无定形，作家恐就得变来变去才好。一个政治家如此离合无所谓，一个作家怕不好办。所以不加入，非退避，还是作小说，则可以得到较多自由，将理论所不及的，革命受挫以后读者所需要的，尽一点力。

一面是文学左翼分合变化多，争持多，难于理解；（如创造社新旧之争，如太阳社对鲁迅离合，如生活书店的复杂性，一直到后来语文论战。）另一面是写作实际及基本理解，各有不同。从此更不免游离于论争以外。直到二十六年，由民族文学、农民文学论战，社会论战到拉丁化，集体创作，

大众语，凡有政治性的活动，都少接触。即当时自由主义的国际作家联盟的笔会，也不加入。一句话，我认为这不能解决文学中任何现实问题。它能使人成名、露面，以至于升官发财，绝不能产生些结实优秀作品。但一个从事文学的工作者，如自己不能提出些作品来实证问题，倒说作品无所谓，我是无从理解的。到现在为止，文学中的政客，一生从不曾好好在工作上有多少努力，只用一作家名分而向上爬，我还是缺少理解；这边爬过了又向另一边爬，我还是缺少理解的。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即北方的领导或学习方式，是五四传统方式，凡事都得从本身工作实践上努力，老实素朴热忱沉默来从事用笔，才能够鼓励更年青一代继续努力。一切进步理论、理想，作种种有实验性实践时，又必然受地点条件相互影响。这一段时间，我在青岛和北京，地方和商业及现实政治流血，都隔离日远，和学校中的争自由民主与联合抗日问题比较近。所以有关这一段个人工作得失，都应当从七七事变后，北方青年作家过延安工作态度，及其发展得失联系批判，不能以当时京、海派表面之争批判。

我只觉得对日是件大事，一切牺牲都得接受，都得忍受。写作从这方面落笔，接受生活困难也从这个基本认识而来。自然还只是个人主义孤立看事，对政治未来缺少明确远景，且对阶级立场毫无认识。廿六年丁玲由北京过延安，曾见面，不作同去想。到武汉又有人提及北行，无结果。过长沙，和曹禺、王鲁彦、萧乾，似还有黄源等同过徐特立处谈天，谈下去，忽来一着米黄大衣少壮，把话搞乱，大家都觉得话已不接头，即不再谈。但从徐所谈：“需要青年能去的

去，不能去的各在岗位上尽点力，还是一样的。抗日时间长，不是一年两年!”曾为王鲁彦主持的《力报》约写十篇文章，谈湖南问题，讨论到青年问题，把王鲁彦饭碗给砸了。我明白不能也不宜于在长沙空气下写文章，后来即不写什么。只另写一劝家乡子弟参军抗日文章，对湘西说说话。到云南后又写过一本小册子《湘西》，序言上即明白提及，地方待重造，待改造，要年青一代习于看远景。对苗民问题说的话，直到现在，还可参考。但到此为止，我对中共还是极少认识。只是在一种对国家问题前景上，由于强烈爱乡土情感的扩大，成为一种爱国主义而已。我的生活意识，还是一种纯粹小资阶级个人自由主义气氛中，工作下去。对阶级斗争的实际，是完全缺少严肃深刻认识的。所以到新四军问题发生时，我无意见可言。当时如左翼安排得好，我应当是个有用的外围。少联系，因之直到现在，笔无从用到更合需要方面去，却来写这种永远写不对的总结。即如何检讨自己，就还缺少认识的。

到昆明住乡下。一半时间在城中联大教书，一半时间和家中人住乡下。被邀为附近学校帮帮忙，共教过四处：一难童学校，二华侨中学，三本地县中，和一私立中学④。这些难童华侨和边区子弟，我们实近于相互教育。因为从来不拿钱，并且生活打成一片，对他们印象还好。他们的热情、朴质、好学，也给我一种好印象。云南乡村的素朴面，和边疆民族工艺文物特殊风格，使我爱乡土情感扩大深入了许多。又曾鼓励两个朋友过云南西部旅行，都有过极好成果：一个在大雪山、鸡足山、点苍山作了八年山水画，一个专研究古宗族么些文，和民俗艺术，两人回来谈起云南西部问题，都

如传奇。另有个植物学者，在大雪山作高原植物的研究，新的发现更是有口皆碑。乡居同住还有个在印缅暹边境作摆夷研究的社会学者，在那里曾作过三年考察。把这些个人努力成果，对国家的真实贡献，和昆明市当时种种腐烂现实对照，使我觉得中国问题还多。抗日是不能中途停止的，要国家好转，还是得有许多许多人，肯一步一步走去，从认识、研究出发，慢慢作去！云南乡村土地的生产力和明朗朗天云对照，极易引起人“大好河山”情感，只想来如何努力，唤起地方更年青一代对地方的爱，提醒出种种被疏忽了的好处，是一切真正爱这个国家的人、理解这个国家的人应有的努力，也是我个人一种责任。这么来谈国家问题，自然比在学校圈中和三五同事在社交中和本地官商谈政治，意义不同得多。就因此，工作理想自然也不免和城市中人的打算日有游离了。

随后中日战事发展，向上逼迫，大家生活越来越艰窘。那时节同事中凡和重庆稍有联系的，都可以从别方面有些经济上好处。另外和本地官商有点沾染的，也可以把生活过得稍从容些。同样是在联大教书，过的日子可不大相同。正仿佛和这个人对“政治”有无认识而定！个人一面是坚持穷困，和眼前生活作战，一面就还得和腐败种种作战。直到一部分稿件被扣被毁，家属中一个人因病，因穷无从治病而疯去。即因这种坚持穷困，疯的无从救药，我自己也几几乎死去。从各方面接受了现实困难和挫败，这也就是一部分作品，从此日益失去本来的明朗健康，转而成为晦涩不可解原因。

生活完全如隐居，除联大三校原来熟人外，只在乡村中

和一华侨教员相熟，友谊也比较密切。这人那时正在那个小县城里作织袜厂、肥皂生意。一切恰如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中所表现的理想主义者，凡事充满了实践精神，教女工认字，为女工福利设想，克服了许多困难。失败后又再想办法，总永远不气馁。也好义，也好利，但在义利取舍之际，却舍利而取义。正如广东商人精神和社会革命理想结合一种人格，因对之特别发生好感。以为如在云南地方培养社会革命种子，这才是革命者实践好榜样。中国要有转机，只有这个样子的人，在各种问题，各种事业上来扎根，来牺牲，才会慢慢的有个转机！即就这点认识，也可以见出我对革命认识的缺少，不明白北中国延安一隅或国内各处，城乡到处都有不同的工作者，在克服更大的困难而服务。且不知政治的另一面现实性，所以当这个朋友进到城里，去城中作有政治性集体活动时，我倒觉得奇怪。我认为只有极端枯寂而沉闷的工作，在万分困难中进行，对一切腐败取个不妥协方式，才是革命。革命是绝不能掺和混同于社会组织以内来进行的。我不能理解政治的多样性，如作家会中进行的跳舞会，和官场商场进行的社交政治，和革命有什么关联处。因此有朋友约入民盟，即因为政治活动的现实性我办不了。时正是政协争分配名额时，到处都闻有所争，这事对我为不可解。因千万人流血牺牲，是为了国家独立和自由，那是为少数又少数人争官做的？争官做如为的是有大抱负，想把国家搞好一些，那平时取予之际即义利不辨，到当政怎么会能爱这个国家？但现实政治，那里是我那么一种人能理解的？政治斗争是凡事都有个下手处的，凡是可用的方式都要用到的，我却一点不知道。

照我当时看法，从个人看全局，为国家争民主与和平，从和平民主的现实中争贡献，才需要第三者。这时节的第三者是中间路线有力集团，包括未分化的民盟全部的。如只在争出席人数，和爱国有何关系？时人人谈政治，谈和平，国内任何一方面都需要和平，中共则那时从和平谈判进行联合政府为最坦白诚实希望。我觉得第三者之争如只在争个人出路，争出席人数，国家事在这种情形下将无可为力，面必然日益恶化。只有两个办法待选择：一，中共有足够武力推行原则，进行战事到底，别的不必商量。如不能那么办，就不能尽靠这个第三者，还应当有第四者、第五者，从争贡献方式来为人民服务。为明日在考验下能真正为人民办事，得人民拥护的政府而服务。辅助这个政府，将官僚、军阀、大饭团贪污政权逐渐粉碎，进而为专家分工各司其职的科学的理想民主集权。我的认识也就是我的信仰。因为实在不能想象，社会分化进步到将来时代，一切事离开专门知识，还会有纯粹做官的一种人统治专门机构，能够得心应手！我的认识自然是片面的，因为只明白国家必需要一种什么样务实的政治，国家方有转机，却对如何实现这种或那种政治的斗争，完全不明白。真如二千年前印度《百喻经》故事所说，一个愚而无知的富人造楼，想造三层楼，告给木匠，只要第三层，可不用一二两层。我对于国家将来，也不免有那么打算。把写小说处理文字组织故事方式，来看待一个国家，以为这个第三层楼，是可以由社会各部门热情工作者的成就积累，即可望将政治推进而慢慢实现的。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可以想见。千万人的行动作成的种种发展，又如何有机配合到社会每一部门工作中，作不同式样或明或暗的斗争，我完全无知。

三十五年复员北回，先到上海。十年旧友多见面，各已进入中年，大家都为内战担心。为万万人民，也为本身工作，盼望和平不至于完全绝望。一般人均盼和平，目标虽不尽相同，要和平实在相同。那时旧政协已破裂，军调犹继续进行，国内第三方面既不济事，一般希望转寄托于马歇尔身上。国人不问有无政治认识，总有一点共同常识，即打不得。国家问题如为政治主张有分歧，由战场转人议会，实在比较合乎人民需要。收拾局面比较容易有办法。要紧的还是应付国际。在对日问题，在对世界和平问题，中国才有资格说话，才能够站起来说话，也才有人肯听话。如战事不可免全面展开，牺牲者还是人民，毁灭者还是人民，受损害最大的还是大多数人民。主要还是对外，完全是现实的，打敌人要靠实力，认友好也得自己能好好的站起来。总之，内部矛盾应在战争以外想办法。

对政治还有无幻想？是有的。理想并没有失去。总相信国家明天一定会好转，专家代替官僚的政治，必然会实现。而政治设计中最高部门，必有一天用的是营养学者、计划经济专家、都市设计专家、农学家、医生和文艺工作者，来代替纯官僚政治。对南京的政治感到绝望，因为看了四十年，从一切方面都看不出光明面。但对中共却无知。只以为真正的转机恐还得在十年八年后。作家有作家的方向，即把工作指向这个人类社会合理的目标而向前。和现实的种种既日益游离，自然不可免一切希望都只会成为绝望的感伤。

写作的态度还是不变，但环境实在已日益为难。教书也失去了应有意义。我还在课堂上告同学一个小说作品，生产过程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同学中却只能用朗诵诗参加晚会了。

北京附近的炮声越来越近了。

对于写作，我抱的愚公移山态度，和小手工业生产及训徒方法，到这时都发生了问题。觉得这个国家在变动过程中，文学既只要朗诵诗就可满足一切，我的剩余生命，用到工艺美术探讨，或者还可为国家保留一点文物，也为后来人节省一点精力。更主要还是把历来美术史用字画作中心的观念，加以修正，转移到从工艺美术作重心方面来。这工作作了两年，北京城外炮声响了。

在云南时，朋友邀入政治，我说应付政治现实既毫无能力，且缺少认识，我的长处恐怕还是只限于写点小说，或编编刊物，用一个本本分分工作态度，来把五四所提出的原则推进一步，别的只好让贤了。回到北京，因此编了两个刊物。初来编《现代文艺》⑤，是月刊性质，由徐盈介绍的。老担心和政治有关联，怕受人利用，只一期就不干了。其次是天津《大公报·文艺》⑥，因和报纸关系是抗战前旧识，为发发稿，不久即改由北大同事冯至发稿。又，天津《益世报》副刊《星期文学》⑦。《平明日报·文艺》⑧则由一北大同事发稿，曾经用我名义。用的态度还是廿三年旧方法，自由主义。

一来即被一群新闻记者包围，访问谈话胡乱刊载，这里有意把我放大，那里又有意把我缩小，党派活动中找目标作攻击或誉扬对象，其实看错了人。只感觉到问题麻烦而可怕。战事正全面展开后，问意见我没有意见。因为别的不明白，却明白因战事发展，每一度钢铁崩裂中有无数生命牺牲。中国如真有伟大政治思想家，是应当能设法避免这种牺牲的。在华北局势日近孤立时，从上海方面又有个新的第三方面“新路”活动，似用资委会钱昌照和一群留学生作骨干，来北

方游说技术合作，以为可作新的和平桥梁。这个组织和美国关系，和南京关系，到北方来又有些什么真正计划，我全不明白。既不介入活动，也不列名赞同。可是过不久，这个活动在上海在北方都成为被攻击对象，我为这事又成为箭垛，受了许多不应受的气。这一切只教育我一点，即政治的是非不明性，和达目的不择手段性，包庇和徧持性。有些人的平时作风，是那么翻云覆雨对人对事，到凭倚实力有点政治上权力时，还不知对于所生疏不叶的人，要糟蹋作践到什么样子！我想我既和政治现实那么游离，受作践受牺牲对国家也无补益，内战还在扩大，我既无丝毫能力否定一切，或过一个比较少政治牵连和人事复杂的学校去住两年，或者还可勉强把工作继续下去。待把几个在计划中拟完成的中篇小说完成，我大致就得如庄子所说的休息了。新的时代有的是少壮新青年来进行新的工作，我已尽了我的能尽责任，休息也十分自然。十年来生活本来已经很累了，和城市中政治人争吵本非所长，能用笔时尚不知如何学人去纵横捭阖，到手中的笔完全如冻结，活下来也就等于一种死亡。这有个更长远的原因，即三十年前我生活所见的，所受的，我明白一个无辜的人被虐待被作践是种什么情形。强权是什么我很明白。我曾在芷江县怀化镇地方，眼见过无数无辜人民，在军事变动时受牺牲的可怕情形。并眼见一个年青农民，在身边五尺外受苦刑，这人即在逐渐中昏去。过半个月后，这个人已被赎出，在一个葛姓药铺门前，抱了个孩子沉默看街，问他总不作声，只是笑笑。又眼见过许多苗人，因小小事情牺牲，也总是特别沉默。又看过一些疯人受了许多虐待后，也总是沉默。我就从这种种得到了深刻的教育，即凡是有权力在手的，

总不可免要误用权力，使一些人在无可奈何情形下受牺牲，也即因为这种权力误用或滥用，作成国家不经意损失。这社会一天有这种武力武器的统治，就会有无数善良的人民和有用理想，在各种不同情形下受糟蹋，受牺牲。想把人类关系重造，就必须待从武力和武器作成的空气以外想办法。我深信国家明天会达到这种进步情况的。我想把我三十年来所见到的社会的无情、残暴，和个人所受的贫困饥饿，和比这个更大的挫折，一律看成社会的病，人的无知，回报之一种完全无私的友爱。把这种情感反映到生活中和一切工作中。三十年过去了，社会的发展，有了个新的突变，北京城内有炮弹落下了。

入华大入革大前后种种

北京城得到和平解放，是世界上一件大事，也是历史上一件大事。

解放后，北京城百七十万市民，都在向新的社会学习，各有不同的方式，接受新的一课。我学习沉默而忘我。而且是用一种新的感觉来印证历史的。经过种种辛苦克制，慢慢的把自己稳定下来了。只觉得一无所知，沉默正是一种爱国的方式。因为明白国家问题多，凡事千头万绪，都得有人从错误中讨经验，不经意的疏忽总不可免，当其冲牺牲的，也无可如何。国家经过近百年奴役，三十多年挣扎，尤其重要的是近几年解放战争，为追求一种人类趋于合理的原则，已牺牲了万千人，方把一个国家新的基础奠定。一切新的工作都在发展，无从停顿。人手那么少，事情那么多，万千人都

在新的位置上无日无夜忙碌，我算个什么？我的原有工作已告一个结束，没有继续必要了，应当完全放弃了它。国家问题大，个人实渺小，人和人间的小小恩怨得失，至多十年二十年大家都不免受自然规律限制，失去意义。衰老的死去，归复于土；新生的茁起，向前发展，迎接新生。想让比较年青一代，活在这片土地上健康、幸福并尊严、自由一些，一定还得这一代来通过一些困难，照鲁迅诗中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把自己当成一个垫脚石，都得为一个多数人利益设想，放弃了自己。新的社会一切从实际出发，我既没有什么大能力，这点剩余生命，用从劳动人民观点，来把一部工艺美术简史理出个头绪，多少总可以减少一点下一代人摸索研讨的精力。更重要的还是学习“忘我”。因此在午门博物馆库房中工作了半年，每天和一些铜石砖瓦对面，把一千件漆柜门搬来搬去，几千片明代丝织物翻来翻去，也增长了不少知识。最有用知识，即是库房中还有人工作了三十年！

因此一来，和社会实际，自然一切都隔绝了。由亚澳工会、政协、文协……我和国家大事发生的关系，是这些会议的照片送到博物馆陈列时，派我来写说明。这工作也很有意思，国家事情多，大大小小总要人肯去作，会唱歌的唱歌，会写作的写作，能干的就担当困难麻烦的，我不中用就写写字，作点力能胜任的。幸亏三十年前写小字本事还未尽忘去，方能勉强完成任务。先还妄想能有时间读读书，会让业务更有效果一点。但过不久也习惯了，书读来读去，只会更加把人读迂腐胡涂，头脑既已不能得用，倒是劳动劳动好。

不过这种忘我还不够，二月里有朋友到我住处来谈天，认为思想还不大好，或头脑不大清楚，最好学习学习。我就

到了华大，又转革大，参加学习。曾到一个老朋友处去看看，告她我已去革大。她奇怪“你怎么也去”？我只笑笑，心里想：“北京城虽已和平解放，北京人的改造还刚起始！”这老朋友就不知道我的学习是为什么，为党，为国家，还是为我自己？国家经过千万人挣扎流血，刚有了个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凡事都可一下转好。新旧交替之际，明明白白最重要也极麻烦一件事，即人的问题，人不够用！知识分子改造，如何改造？改造又如何？都是问题。一切机构人的精神都还配不上社会需要，能力和思想更是问题。国家既正在作种种努力，将知识分子重新安排，又费钱，又费事。人人都明白处理当前业务已发生困难，在岗位上学习又不大彻底。但是一提改造，平时即以前进自命的，多少都还有些趑趄不前情形，如我转到革大学习，对国家能有点微益，且多多少少能使他人可放点心，我没有理由不去。就从这个方式下，我入了华大又转革大。到学校来是那么认识学习，学校中一切生活，就自然凡事容易习惯了。

初到华大，听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倒只为他着急。因为不像是在处理国家大事。只感觉国家一定还有困难，不然怎么会这么来领导新教育？除了共产党，从各方面工作，爱这个国家的人还多！即不是党员，牺牲了自己来爱党的也还有人！这种讲演要的是什么效果？华大如真那么办下去，那么领导下去，照我理解，对国家为无益。

到革大听刘校长⑨报告，要大家把学校当个自己家庭来弄好一点，我倒想还是当国家来弄好一点。我的学习也就从这些理解来进行。我觉得“学习改造”和“改造学习”是中国一个问题，也就从这个问题上，来理解来认识个人及全体。

照我自己说来，用的是一种立体学习方法，因为在一个群中的种种，是可以理会许多许多事情的。越学得多，理解得多，生活也就自然得多。但半年学习，理论测验我大致常在丙丁之间，明白政治水平十分低。而且明白那么出问题回答的反复测验，慢慢的，把一点从沉默中体会时变，有自主性、生长性，来组织文字写点小说的长处，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耗蚀了。有时还不免着急，到后就无所谓，工作既无益于人民，长处恰是短处，结束也蛮好。到这里来学习，看看什么事都有领导，且在一种计划中进行，可是照学习方式，是消耗不了一个人全部精力的，搁下来总不是事，因注意注意小处，看还有什么事可作，看来看去，只毛房没有人打扫，就不经许可，当成我的业务之一了。一面工作一面思想思想，倒真能够长人思想。温习卅年所读的历史，和工作全部，觉得新的工作才真是学习。因为这么一些平常事情，放在人的面前，可就没有人肯动手，自己一动手，就知道还是要用比写小说相等细心、耐性和谨慎，方能把任务完成的。从这里学习理解革命，领导方面如何突过一切困难，万千人如何牺牲，并且从每一部门工作中去理解，去认识，去处理，这里那里，点点滴滴，仿佛极小极不足道处，都有的是人去用心。凡事都在一个党的领导下进行，那么有条理和步骤。终于就把历史改变了面貌，为五万万人民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从发展看，必然还要把半个世界的亚洲被压迫、奴役，和被历史旧观念所束缚的人民，完全解放过来。从这种种来看国家和我自己，就觉得只要对于人有益，什么事都可以作得下去，而且作得很好了。因为一个国家的向前发展，在万万千千工作部门中，都要的是沉默无言的工作者，充满无私热情去服

务，绝不是三五自以为有思想、有抱负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空疏谈论，或孤立的思索可见功的。由此一来，在这类工作中，把思索也放弃了。

学校布置下来的改造思想方式，一部分是坐下来进行谈话。对于这种集体学习生活，所需要的长处，我极端缺少。相互帮忙，我作得特别不够。学下去，也不会忽然转好的。而且学下去只是增加沉默，越加不想说话的。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了。

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作得不够。为的是到如今为止，还不理解胡乱批评人，对于那个人有什么帮助，弄错了会有什么恶果。自我批评呢？还学不好。只觉得，工作对人民既无益，手又不得其用，对新的社会又缺少理解，客观或主观都无可保留，原来的工作，即不妨当成历史看待，听其消灭为合理。把两只手转用到服务方面，觉得既切合实际需要，比写作或者还有意义。

至于理论学习的理解，照例和本人一切学习联系，全部生活过程联系，发生改造作用。每人有不同的接受综合过程，且必然和本人业务实践相关联。也惟有反映到将来业务上，才能明白是否有点进步，单独的来作普遍反复谈论，我还学不好。

对上大课和理论认识，个人感觉到时间太多。因如果接受的是原则，实在用不着那么多时间。如接受的是理论的综合联系，那应当有更多一些时间看书。有好些问题，讨论实在不能代替书本的。

对工作干部，由上到下，只和炊事员接触较多。他们沉默服务的态度，必然对我有长远影响。因为为人民服务，从

儿个炊事员工作态度上，我理解的是两方面：一面是中国的新生，国内有千千万万人民，都和炊事员一样，正从中共领导下，各在不同岗位上，老实刻苦细心谨慎的参加国家新的复兴工作。这是翻身觉醒了的一面；另一面是中国还有更多数的这种善良朴质人民，待从土改中，从其他教育启发中，把历史传统所作成思想观念束缚和生活贫困，加以解除。我明白我还有些责任待尽，即工作能力的回复，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

对同学关系，我作的不算好。主观上认识应尽的责任即未尽到一小部分。因直到目前为止，我有种牢固不易变更的习惯，认识人理解人是看全面，注意长处、特点，值得从鼓励中加以发扬的，我会从一言一语中完成的。至于弱点，从日常谈天，即可得到大略；我理解得已相当多，可是还不能作到用一个无产阶级立场来批判他人，来要求他人。所以不能作如何批判。更主要可能是我自己学忘我还并不完全成功，还会在不经意不自觉的情形中，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自己既少进步，对同学，自然更容易忽略了。

我的学习认识和对于旧的批判

从学校学习，我明白不完全是书本上的条文，却是新的领导政权将根据这种动的政治哲学，把国家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带人一种新的历史发展中。过去对政治，只以为是一种由纵横和霸权结合而作成的产物。并从近数十年国家情形讨经验，对于凡用武力和武器自足自恃支持的政权，必作成恶性专制，总是对少数为有利，把多数人民作鱼肉。且由于历

史传统的弱点，随中央集权而来，照例不免是贪污腐化。就基于这种认识，我以为专家的实践知识，和文化工作者，他们对于国家的现实意见，和国家的前程远景，应当永远成为现代政治集权的安全瓣。没有它，国家多数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以及由此而来的进步希望，是无保障的。真正一个多数人民的利益，也无可希望有保障的。临到明日国际问题的处理时，也将完全失去自主性，成为依附状态，国家的独立与和平，不免为具文，为空话。就因为这种忧虑，过去我认为文学宜讴歌一种人类向前的理想，可不宜从属于变故倏忽的政治。一个文学作家如仅仅为一时政策而服务，虽得到这种政治所支持，所鼓励，可无从将政治推进和提高。现在方明白，我的工作孤立或游离于革命斗争以外，即由于这种错误认识而来。手中一支笔既日益离开人民的斗争，转而成为观念的排列玩赏，即写实也早近于抽象。越来越失去应有的健康，为晦涩、病态，和感伤。生活一离群，自然更容易致病，而发展为和一切隔绝。

在革大学习半年，用一本社会发展简史作纲，展开到各方面，联系近二年政治实施、各部门进步表现，已深深明白个人对于政治的无知。因马列政治哲学以阶级斗争为主，以无产阶级作领导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施、和毛泽东的伟大思想一结合，所作成的发展，不仅是从实验中要把中国人民命运全部改造，还必然要将担负解放亚洲方面历史的任务。更明白人民民主专政，对全民政治的自由和民主，具有多大一种气魄和作用！这种种，都是过去蔽于一隅的知识见解从来不曾想到的。昔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我实应当说：学，然后知错误。近半月因写总结，有机会把自己一部分作品重

新翻阅看看，才知道过去还以为对人民为有用有贡献的工作，现在看来在一个动的社会中，历史伟大的变革过程中，人民革命向前发展中，可以说毫无意义可言，是应当随同旧社会一齐埋葬，才不至于还有不健全影响的。

中国的民主学习，四十年已过去了，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有万千人流过血。这些人也都对于国家有热爱，对于个人或家庭有梦想，然而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都各在种种不幸中牺牲了。国家虽已新生，为了旧中国历史社会的沉重担负，还得经回更严重的试验；对国外，为应付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威胁和压力，对国内，则为收拾残破封建生产，及土改一大堆问题。国家向心力的形成，还待从各方面来推进，一切工作好的还要求“更好”一些。凡从种种痛苦中挣扎过来的，工作过来的，还需要将所有精力贡献出来。年老的也得老当益壮，事事示范，把年青一代造就得成为一种崭新的中国青年，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想到这一点时，我自然就健康了许多，也单纯了许多。对于自己似乎也稍稍有一点新的认识了。五月时因参加北京市文代发起人会，有记者问起我的学习和工作，我曾写过一点意见答复。有几句话摘引出来，或可补充一下这个检讨所不及处：

从全个国家发展看，人民文化的普及，需要实在特别迫切。延安文艺座谈纪录，把文学极素朴的引到政治上去，使文艺面向工农兵，由普及再提高，……对国家明日建设实在极重要。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如不

建立于全中国广大人民思想、观念、情绪、精力的解放上，是不会坚固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如不建立于劳动人民的政治意识的完全觉醒，使工业生产达到国家工业化程度，也是不可希望实现的。国内文学作家，能共同守住一个新原则：为人民服务，用工作推进国家建设和进步，对人民贡献必然是多方面的。

检讨个人工作，二十年来用笔，实不免和人民的要求与发展步骤游离，越来越远，笔下也就越写越零乱。小说则由明朗转成晦涩，在体裁上的试验，即小有成就，实无益于时代。个人工作且由负气自大而孤立，在许多问题上，和现实不接头，见小而失大，错误是显然的。

想想近三十年来万千革命者为国家争自由，为人民争民主，所有努力和牺牲，通过了多少困难，才把个新国家基础奠定，个人即不中用，也应当向他们取法，来重新学习锻炼，好好的学做一个人民勤务员，把所有一点点杂知识，交还人民，配合到国家发展需要上去。

国家真正的新生，是由万千沉默无言的工作者，充满虔敬和热忱，无私而忘我，从不断学习修正错误，并把点点好处扩大，各在异途同归意义上，完成工作任务的。这里有工农兵，也有科学家，和一切沉闷单调辛苦困难企业职务上的同志。学习靠拢人民，我得把工作态度向他们看齐，先学习沉默归队。

有人问我，你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人在群体生活方能健康。从人和人的关系上，和有发展性的学习方式上，也从大厨房终日工作不息的炊事员同事工作态度上，都可得到不少启发，学会了单纯直率来检讨

自己，再回归工作岗位，为万万勇敢单纯中国人民，在新时代参加建设战胜困难的过程和哀乐而服务，对于我实在十分自然。

本文是作者在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前所写总结的思想部分。

据原稿编入。整理时仅改正个别笔误，原稿省略用语及引用术语欠准确处，未作修正。

① 贵州总督　作者祖父沈宏富 1863 年升任贵州提督，不是总督。

② 新申二报　指上海出版的《新闻报》和《申报》。

③《太阳》　指太阳社的《太阳月刊》。1928 年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之间，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作者以为《太阳月刊》是创造社的刊物。

④ 私立中学　指桃源新村的建国中学。

⑤《现代文艺》　实为《现代文录》，1946 年 12 月出版第一集。

⑥《大公报·文艺》　实际是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⑦《星期文学》　实际是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从 1946 年 10 月 13 日的第 10 期起，由作者主编。

⑧《平明日报·文艺》　实为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由周定一编辑。

⑨ 刘校长　当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是刘澜涛。

"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

优点：并无何等优点。虽在工作上对于业务知识尚肯认真研究，看人还比较全面，对事还比较识大体，能从国家远大利益着想，都是一个国家工作干部应有的态度。对业务热忱，对工作同志有热情，也是应有的态度，不算什么优点。

缺点计七项：

一、所学驳杂，大多是文学史、美术史零散知识，用来作国家博物馆名副其实的设计员①，是不大够的。对于中国文化史知识，古器物知识，都只一知半解，无系统，少条理，从在本馆三年来工作上，从最近参加五反运动古物检查鉴定工作上，即可见出。

二、脱离群众，在工作同志中，有二年以上同事还如陌生少交谈的。特别是对每天同在一处的技术组工作同志，我应有的责任，对他们的鼓励和帮助，都不够。

三、怕负责任，因知道的不多，工作即有怕困难不负责任处。特别是需要对付人的事情，能力不强。因此对人对事，

都极端缺少斗争心。间或还爱说些毫无补于现实的空话，也是一种怕负责任的表现。

四、理想空洞，不切实际。对个人工作，对博物馆前途，虽还有些理想，除其中一小部分，可以从个人学习中或用笔可以证实，其余大部分，必须国家在一定计划，一定时间中，大家共同努力来完成的，我就毫无能力说服他人，或建议国家，来达到目的，证实理想。

五、不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改正自己错误，与同志共同把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提高。只以为既同在一处，凡好处自然可以彼此相互学习，不好处也可以因学习而避免，纠正。胡乱批评人易犯错误，也可能作成无可补偿的损失。对自己，则因为处处事事都在用一个严格要求的标准在努力，些些好处是应当的，坏处则极力改，空说一套于人于事无实益，因此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曾好好运用到检查自己和改正别人工作上。特别是批评别人，国家大事既一切隔阂，十分生疏，无多意见可言。对工作同志，平时即只注意长处多于注意短处。

六、在学习上贪多务得，不切目前应用。政治学习则只想多知理论，业务学习则只想深入史部各问题，近于好大喜功，不切实际。只死板板的想着一个国家博物院设计员的责任，应当是全面理解问题，掌握材料，方能处理问题完成任务。特别是在发展中的博物馆任务。不仅仅是如目前凡事抓瞎对付情形，必须实事求是去认真研究理解，才对得起工作。也就因此，不免常常把一个文物局长或博物馆长脑子里还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也拿来空想，且为自己业务学习不足有所借口。

七、在政治学习上水平不高。不善于发言，不会用所学、

所理解，来启发工作同志。因所学不同，体会亦不同，说话难相通，易失本来意思，所以更不想说话。从政治文件上学习，觉得既有了人，发言多有道理，需要的是更多的人把理论实践，我因之认为个人能作一事，比说十事或有用具体一些。但在许多方面，政治水平的标准，常是用一个人发言多少而定，所以个人政治水平实在不高。

以上七个缺点，实充分反映出我的毛病，这些毛病还可以概括成四点：即思想落后，脱离现实，自高自大，懦弱无能。因思想落后，所以对业务学习，则贪多务得。因脱离现实，对政治即为极端无知。因自高自大，所以既无多大能力，更无一点势力，居然常把一些国家负责方面不大考虑的问题，也放在学习中来注意理解，研究。因懦弱无能，所以一切理想都只是空想，无从实现。能用笔，还可从文字中表现，笔一搁下，什么都说不上了。

毛病根源，和我出身的家庭成分，及个人过去生活工作，都有关系。我生长于湖南西部一个小县城，我的出身是一个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我的祖父是满清时代的官僚，因长于打仗杀老百姓，作官找了些钱，死掉了。父亲是从乡下抱过房来作大少爷的。最初也还只想继祖父事业做官。辛亥革命虽还进步，参加起义，但始终不脱大少爷脾气，破了产后作公务员行医，死掉了。我在成年以前就和一个小流氓一样，随同地方军队在湘西十三县东跑西跑，鬼混了几年，才跑到北京来写小说，一写就是廿年。因写小说混到大学，又鬼混了廿年。往上爬的思想，和一般小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是大同小异的。我的流氓教育得来的知识、信念，只是关着门用笔胡写罢了。为什么能这么写？因为有读者。越爬自然越脱离

人民，越孤立，越不能和人民革命事业一道发展，却慢慢的成了维护旧民主、旧社会、旧统治一个义务帮凶。工作对人民事业、对青年，有害而无益。特别是教出了些生活空虚华而不实的学生，再去各学校为人之师，误人子弟。教出一些小作家，去用同样态度写作，点缀了过去时代奄奄少生气的文坛。对人民，我实在只有过失，毫无贡献可言。解放后，我爬无可爬了，才转到博物馆工作，其实还近于混，一面是体力上有问题，一面是思想上有东西，七种缺点就是混的表现。过去和现在不同地方，只是过去的爬和混是显明的，有定向的，这种显明定向，即走向如法国纪德、英国威尔斯一流资本主义国家的伪自由主义作家一样道路。现在的爬和混，是沉默的，无定向的而已。虽走的是向人民的道路，但是许多旧意识渣滓并没有去尽，随时，随处，随事，还会浮泛到行为中来。理解和信仰，都还不能一一和实践结合。

三反运动给我的教育：

三反运动在北京在全国轰轰烈烈进行时，我正在川南内江县第四区参加土地改革，作糖房问题调查研究工作。工作完结回到重庆，曾听过西南军政委员会程子健同志一个启发报告，对于土改工作同志，返回北京后，就将转入另一战场，有所准备。回到北京第二天，即由文物局调至古玩业检查组，参加文物检查鉴定工作，前后工作约二十天。土改和五反给我的教育，即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凡事都在严密计划中进行，健全的组织，素朴谨严的刻苦工作作风，以及在组织领导下工作者的忘我热情工作情况，使我感觉到，认识到时代实伟大而严肃。毛泽东时代新的国家、新的人民的面貌，

更是清楚分明。我所见到的，虽只是一小部分，但依然能理会到国家的向前发展，是在全国各个地区，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有万万人民在用同一方式，把时代推进的。且认识到任何工作都需要集体力量来完成。个人存在实在十分渺小，能够在工作中尽力完成一小部分任务，少犯些错误，对国家人民也就少受些损失。另外一事即觉得时代在迅速发展中，一切工作一切事业都在展开，待进行，人实在不敷用。在各个文化企业部门，在博物馆，每个得力的工作人员，都需要从政治上提高，把精力和知识无保留的用到工作中来，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特别是在首都的工作干部，必须事事起示范作用。因为在国内各地每一小小乡村，在世界上每一个兄弟国家，每一个待解放被压迫的民族，都把中国的北京，当成创造中国奇迹，改变世界面貌，具有无限希望和热爱的一个地方。每个机构，每种工作岗位上的负责干部，既分有了这种荣誉，同时即担负更重责任。如何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把工作搞得更好些，和人民需要，政治需要完全配合，是个人应有的努力。前述七种缺点的逐渐克服，进一步与工作同志能在团结合作努力中，共同得到进步，完成任务，是个人此后时时刻刻都应当联系到思想中，运用到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情。

本文写于1952年，原无标题。作者在手稿所附便条上写有“这大致是五三年或五×年一个检讨”字样。

据存稿编入。

① 设计员　当时作者在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任设计员。

交代社会关系

按下列问题在另纸顺序详细填写，应真实、详尽，
不得有所隐瞒和保留：

一、你的亲属、亲戚、朋友中，那些是私人资本家？你和他们的关系如何？你为他们做了那些事情？他们为你做了那些事情？参加工作以后和他们的关系如何？

亲属中无资本家。

二、除上条所述而外，过去和那些资本家发生过关系？经过情况如何？参加工作以后，还和那些私人资本家保持关系？有些什么联系？

亲戚中计有：

1. 爱人之二姐夫周耀平，原上海新华银行经理，现在上海人民银行华东区放款部任副处长。1946抗战胜利复员时在上海曾见过面。1950到北京开会时，曾来看过我，时我在病中。友谊好。业务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

2. 爱人之大姐夫顾志成。闻曾在上海开过中福药房（似尚作其他小小商业投机，资本也并不大），复员过上海时，始见面，住其家约十天，彼此极生疏。解放前去台湾，或和流氓官僚资本有关，不得而知。

3. 姐夫田学增，在张家口盐务局多年，抗战时间在上海作生意，复员时在上海见到，时正破产。只闻在连云港有些煤，情形也不详悉。有二子，均在交通大学读书，和我家中二孩子表兄弟情感极好。

4.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生活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新月书店，都印行过小说集，有些系卖稿，有些抽版税。在英有一小说集子名《中国土地》，译者英人白英，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授，及外文系学生金隄。得到过些版税。日本也有一个日译文小说集出版，译者松枝茂夫，不相识，似东京帝大一教授，没有拿版税。

曾有一小说集稿在解放前之北平中正书局印行，书名记不清楚，似名《王谢子弟集》，内容记不清楚，似旧稿再印，为当时负编辑责任北大同事朱光潜索去。

5. 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七年曾为天津《国闻周报》写过长篇小说《边城》、《记丁玲》、《小砦》等作连载。因与其编辑相识，后即为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不久，刊物由萧乾负责。一九三八到云南时，尚为在香港出版之《大公报》写一有地方性作品《湘西》连载，后由开明书店印单行本。一九四六年复员回北京时，《大公报》又约编《文艺》，不久即由冯至发稿。

6. 复员时，回到北京，天津《益世报》约编文艺副刊，每星期一次，事先言定，不受限制，不作宗教或政治宣传，

由秦晋接头。

7.《平明日报》记者萧离约编平明文学，实由周定一负责发稿，周系北大国文系同事。

和《大公报》胡政之王芸生相识，少过从，彼等到京时请吃饭，则参加。《益世报》刘豁轩到京时，也邀约吃过饭，平时均无来往。

8. 书店中出版家和编辑较熟的，有开明书店之叶绍钧，徐调孚，相熟较久。又在云南时，常到开明书店借取版税，因此和当时在昆明经理卢芷芬夫妇熟。

9. 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曾为作主，从版税中扣存伪法币壹万元作股份，现在值几何，不明白。因为从不拿过红利。一切由朋友作主，事问巴金可知。

10. 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时，住乡下，认识一北大教育系毕业，时在呈贡中学教书，兼营肥皂织袜小工业商人，名梁发叶，有二年日用肥皂均其供应。又一房东李姓，其人曾正在作酒精生意，邀入股，不参加，后且邀入干股，保有利益，也不参加。有普通来往，无经济联系。其女系爱人寄女，且子又为学生，1947 年尚托人为带止血特效药白芨末及二罐头来。

三、参加工作以后，新认识了那些私人资本家？个人和他们发生过什么关系？

解放后，曾为章乃器邀至其住处看过两次瓷器，系千家驹相约，千与章同住，章本不识。

四、通过业务上的关系，和那些私人资本家发生个人之

间的关系？他们为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你给他们做了那些事情？

曾托过一常到博物馆卖书之商人为卖书，书名《南海陶瓷》，系还旧债，书卖不去。后又用一影响元人杂①掉换一本《高丽陶器研究》。卖书人姓名不知，书店也不知。以上均1951事。

五、其他重要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约限于两个方面：一作家，二学校同事。

作家中较熟的，十年到廿年的，有徐调孚、叶绍钧、郑振铎、巴金、章靳以、李健吾、陈炜谟、董秋斯、丁西林、杨刚、陈源、高植、谢冰心、熊佛西、洪深、老舍、曹禺、萧乾、陈占元、司徒乔、马思聪；同事中较熟的，有杨振声、冯文炳、罗常培、冯至、向达、卞之琳、袁家骅、常风、朱光潜、杨周翰、王逊、金岳霖、冯友兰、张奚若、梁思成。

其他重要社会关系，如指的是社团，具政治性的，没有。如指个人，有徐志摩、林宰平、胡适。一九二五至二六熟徐，直到其死（1931），友谊好，至学校教书与之有关。一九二五识林宰平，过从多，情谊好。一九二七至二八熟胡适②，私谊好，过从不多。因所搞政治和哲学，我兴趣不高，我写的小说，他也不大看。我后来搞的工艺美术，他更不明白。但私谊甚久。解放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尚寄托希望于马歇尔作和事老时，个人尚以为胡还爱国家，或可为国家内部和平有贡献。后为蒋请美援，即近于为虎作伥。但直至其逃美，个人尚以为可劝其不要再受蒋利用，将来可为国家作点事。为中美关系好转时，帮人民作点有益于中国新社会的事情。

向人民自赎。到美帝侵略朝鲜，仁川登陆，并表示用舰队封锁中国海上交通，侵占台湾时，对于凡在美国住下受敌利用，深觉厌恶。和胡适也完全要断绝一切联系。

从一九二七以来，和青年作家相熟较多。大多是工作比较落实的，一部分是学生。其中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进步多到后来成为共产党员，落后的即成国民党员，如解放后传闻在广州被枪毙之李辉英，即系在中国公学时学生，当时实相当前进。一九三一在青岛大学时的学生，则多较左。一九三三在北京编副刊，和北方年青作家接触，多较左，后多过延安。

和学校中教文学的生活上接近多些，思想上仍少共通处，因个人在过去始终认为学校中应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看南京官场中搞文学运动的，只是官场中的点缀品。但和上海搞文运的，也少联系，以为同爱国家，只有各尽其力。个别友谊好的有巴金、叶绍钧、郑振铎、丁玲、芦焚。个别有扞格实由于工作态度不同的，有胡风。个别不相识，彼此工作亦若不相关的，有鲁迅、茅盾。彼此虽不相熟，但对其工作当时仍抱有好感的，有阿英、沈端先等。

六、思想检查（阶级立场、思想界限。）

在工作岗位上，我从 1926 到 1947，用一个旧的自由主义作家工作态度，写了许多小说散文，工作态度实永远如孤立而僻，因之和人民革命是脱了节的。特别是和人民革命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学运动斗争，是少联系的。我只知道从旧社会争取个人工作的自由，充满了从工作上有以自见的心思，工作中一部分，在某一时期曾有相当进步性，对旧社

会具否定性，但是和随同人民革命而发展的文学要求愿望，殊少符合处。因之只知将个人工作推进，却从不曾从政治需要上去检查工作得失。更不能配合政治情况，作深一层理解，为人民远大利益服务。有时注意的又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如对当时有些不可理解的分化斗争（如上海文学左翼的争吵），反而更形成深一层隔阂。当时京派海派之争，也即由之而来。

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种种问题，也多是从个人出发，而有所认识，是片面的，而且有矛盾思想。虽痛恨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特权，并讨厌在宗教侵略下教会大学所培养的种种洋奴，如吃洋饭的官僚、买办、资本家，以及充满洋奴习气的医生、看护、传教师。但对于其中一部分专家，总还是相当尊敬。认为这种专门家对于国家发展进步，还是不可少的，有极重要进步性的。因为我不能想象一个国家要站得起来，是不要专门人材的。促进一个国家的近代化的条件，自然科学中如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农业矿冶、地质医药等等，都不可缺少，没有它说近代化，就不可能。这种纯技术的对专门知识的尊重，也即影响到我个人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以为必把学习处理文字的能力，和对于问题的理解，加长学习时间，专心一志搞个二三十年，才有可能把工作面对社会发展和历史需要，才能够完成文学革命任务。才有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向旧社会搏斗，而代替了旧有一切，形成一种新的推动力量。才配称作灵魂工程师。它不仅仅以得到政治支持即成功，它还得用真正优秀作品支持政治并推进政治！这工作不能说“我信仰”即可完成，也难望从社交方式中的酬酢跳舞中能完成。

我凡事既多只能从社会表面看问题，只见到长时期的内

战，时而若势不并立，时而又若可言归于好，时而分化，时而联合，处处都反映情形混沌而复杂，种种矛盾，在当时政治上负责任的也就对一个明日发展难作肯定性回答。以为由于历史担负过于沉重，短时期实毫无转机。国内矛盾必须从和平中谋解决。社会矛盾既十分尖锐，和平无可望，我的理想主义也更加转成一种虚妄的幻念，甚至于以为中国如此长期流血，即由于中国实在还缺少真正伟大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必需有这种人，敢从流血以外想办法，才有可能把国家领导到内部完全统一，而将帝国主义百年势力一扫而光！

另一原因即我过去认为十九世纪欧洲或俄国作家的贡献，都是十分具体的，是各有极高成就，影响到社会发展极大的。中国也需要这种能坚持工作坚持信仰的作家，从一种万壑争流方式上，异途同归把时代推进。必写出强有力的作品，对旧社会加以否定，对年青一代，形成一种素朴强健的人生观，对国家将来才有益。我的最大错误是把个人工作和社会群体活动联系不够，却又希望于另外一时，对群体有良好影响。我的理想由虚妄转入极端病态，纯技术观和对于旧社会的妥协，人民立场因之无从建立，而一切努力，且不免成为旧统治的点缀品。我的工作和工作态度，对当时进步青年，虽不能起麻痹作用，对于比较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即不可免发生极坏作用。不能用文学当成阶级斗争的武器，却支持了改良主义者意识。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我的错误认识既完全不同，越来越矛盾，我到结果是再不能用笔，再不能思索，只好放弃了工作，放弃了自己。

解放后，病体始终不能复原，和原来的专业及原来社会，已如完全割断了联系，和新社会的一切也无多联系，只觉得

一切十分陌生，十分隔绝。在博物馆工作，就事言事，就只希望手边能够多有些书，多有些对于古器物的知识，便于明天能更好些完成任务，因为明白“爱祖国文物”及“接受优秀传统”，都不是空口说的空话、只有能掌握丰富知识，并具体理解问题，明白传统优秀伟大何在的工作者，才能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一切研究都为了可启发国家新一代的创造心。……从博物馆的工作业务提高，到沉默无言，我实有一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对工作的狂热和深信，在比较顺利环境中，即必然容易形成一种自以为是，主观片面，脱离群众的情形；在比较不利的挫折中，又不可免作成对生活对工作的幻灭、绝望。即或是工作为的是一个明天多数人民的需要，但由于处置工作态度上，表示意见方式上，一种生硬处，且常常把主观上的良好愿望，转而给人一种固执自私的印象。这是必须亟待改正的，方可望少犯些错误，不至于使人民事业再受损害的。

本文是 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后，作者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的内容。原稿为连续书写，按顺序分成六项。为便于阅读，编入时将此表填写要求用仿宋体排在文前，填写规定内容用楷体分项排在作者所写文字前。

① 原文如此，疑有笔误。

② 一九二七至二八熟胡适　作者与胡适相识不会在 1927 年，因为 1928 年初作者南下上海，实际是 1929 年经徐志摩介绍相识。

沈从文自传

我本名沈岳焕，离开家乡到北京后，改名沈从文。初写文章时用过“休芸芸”作笔名，一九三〇以后，又用“上官碧”笔名发表过些作品。我的主要工作是小说写作，生活收入靠稿费，到学校后兼靠薪金，书籍出版时也可得到一点版税，但是数目极少。一九三三秋天在北京结婚，爱人张兆和生了两个孩子，第二个生下刚满月，抗日战争发生，一家先后到了云南昆明，我到西南联大教书，爱人张兆和也在云南乡下中学教了六年书。复员时转入北大国文系。从一九二六起直到解放前夕，我主要工作是写作，自己学写，教人学写，写作方法和态度，完全是受十九世纪欧洲作家的自由主义影响。和我写作发生稿件经济关系的，主要有以下一些活人：《现代评论》的丁西林、赵其文，新月书店的罗隆基，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小说月报》及后来开明书店的叶绍钧、徐调孚，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文艺月刊》的左恭，《现代杂志》的施蛰存，《文学月刊》的傅东华，《国闻周报》的王芸生，平明出版社的巴金，及在上海、香港编《大公报》的杨刚、萧乾，在昆明作刊物编辑的林元、熊锡元、熊剑英等人。

因为一遇到生活上周转不来，就得向这些编辑借取稿费或版税。此外还有当时的光华、现代、生活、大东等书店老板。我大部分习作，是通过这些负责的报刊编辑出版的。

印行的一些作品，解放前从来没有得到应得的物质报酬，也没有能力和人去争，并且还认为极其自然。有些稿件在付印时又烧掉了，难过一阵就算了，还是继续坚持工作下去。原因简单，我的工作理想是终生从事写作，在习作过程中只能尽我个人能尽的力，忠于我理解到的问题，把它写得文字通顺，事情也尽情理一些。只记住十九世纪世界上许多作家的写作态度，特别是契诃夫。依照五四文学运动要求于一个作家的努力方法，认真尽力做我所能做到的，只希望通过长时期努力，写出些作品，对于新的中国短篇小说，在文字语言和内容两方面，或多或少有些新的表现成就，对后来接手人发生一点推动作用。能做到这样，我得到的报酬已够多了。作不到，我得不怕困难多努点力。同时作家如鲁迅、冰心、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丁玲等人的成就，也不断刺激我在工作上的一种竞争心，以为每条路都是到罗马的，大家相熟或不相熟并无关系，只要各自努力，会各在试验中共同把生产丰富起来。至于成就得失，不应当用吹嘘的方法争取，应当交给时间或历史，国内外千万读者，自有比较公平的判断。也因此我认为这工作并不是几个编辑以私见取舍，或商人给我几个钱的事情。因此工作在不易设想的困难寂寞情形中，还是支持下来了。我早就发现我自己，虽能用极力耐心和劳动克服工作上遭遇到的困难，但是毫无能力适应社会人事上的变故。形成这种种不是一天的事情，计有三方面的影响，支配到我的工作和信仰：一是一大堆书本，二是由小到大的社会环境，三是在生活思想上对我有影响的几个人。

我工作上的得失，思想意识所受的限制，和这二方面的影响，关系极其密切。

一　书本的影响

书籍对我发生的影响，比人的影响大许多。

我并没有受过现代中学以上的教育，所以严格一点说来，还算不得一个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的许多好处，我都没有。因为学无专门，看的书就比较杂，年纪青头脑消化力强，医卜星相什么都翻翻，早打下个“杂学”底子。接触生活又比较广泛，社会上许多事物也引起我的浓厚兴趣，也引起我的永远恐怖，因此五四余波到我家乡湘西时，新报刊启发了我求新知的幻想，才跑到北京来学习写作。过北京由学习写作到教人习作，杂学底子更扩大了范围，即以小说而言，从千六百年前译的印度佛经故事，到十九、二十世纪的世界名著，凡是我能有机会看到的都看看。看这些或那些，又都是为了写作。我写的小说，教的是小说，来往过从的朋友和学生，谈的也是小说的内容或问题，这么十年、二十年延续下来，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自然也是小说，不是其他事情了。

我认识中国历史和社会，也是通过小说或近于小说的记载而来的。《史记》、《汉书》中的传记，诸子中的杂故事，直到唐代以后的《李娃传》、《莺莺传》、《长恨歌》、《金瓶梅》、《三言二拍》、《红楼梦》，我看来都觉得比论文动人得多。我认识俄国而且爱它，也是通过一堆小说作品，其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给我的教育最深刻。读文学作品既然能够得到许多关于人的知识，产生一种向上的力量，因此更刺激了

我"见贤思齐"的心情，希望自己也慢慢的通过个人毕生的劳动，能够写出一点比较成熟的东西，不仅对于在发展中的中国新文学有点益处，并且还有机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广大人民认识中国和爱中国的桥梁。以己度人，我认为是应当作得到的。文学在某一方面能作到的，比帝王或政治家所起的好作用有时还更普遍、持久。因此更逐渐产生一种主观幼稚的空想，以为世界由于各种社会习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以及民族自大成见和其他种种原因，形成的无形隔阂和障碍，如果从政治外交上的努力，始终不能完全得到解决，甚至于还加深这种隔阂时，文学艺术应能够起点好作用，帮助人彼此情感相通，能够由相互仇视防御转为相互尊重了解，经野心家、商人、宗教狂一类人煽起的坏影响，由文学把它去掉。使世界人类所谓周期性的战争威胁，转为持久和平。工作自然十分艰巨，但是显然会有一定成果。因此我认为凡是搞文学艺术的，用个三几十年的学习准备，时间不算太长。只要忠于工作，工作就会有或多或少的贡献。社会变动大，也会不可避免使工作完全失败，这也是世界文学史常有的事情。有些作家的工作(如歌德、托尔斯泰)，固然能活得极其光辉，也有些作家在生活上完全败北(如曹雪芹)，我个人渺小得很，不能不更加认真努力下去，用工作来锻炼自己，在工作上付出全部劳动力，并学习接受一切失败的痛苦。也不企图用其他简捷方法取得成功。

二　环境影响

我生长在湖南湘西一个小县城里，出身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中，那地方主要特征是苗汉杂居。入过四个私塾和两处公立学

校，才勉强从小学毕业。一再更换学校，因为受不住学校枯燥无味的旧书拘束，尽逃出学校接受另外一种环境教育。学校外天地极广阔，山河树木，乡场田野，事事都比当时读的书本好得多。城乡一切经常发生的斗牛课马，打架唱歌都产生于不同背景中，我一律把它收入印象中。小学毕业不多久，我就投入生活，在沅水流域过了几年极困难的流浪生活，见闻接触更加广泛。这种种很显然都对于后来写作发生影响。作品中一部分近于风景画，就由于这种影响。作品中对于有权势的官吏行为，常采取一种否定态度，对普通小市民特别是旧社会所谓“下贱人”，搞小手艺的或甚至于卖淫的，却充满了一种感情，也是这个环境影响形成的。由于我自己就是个平常人，在小市民中长期生活过来，有时甚至于求作一普通小市民也作不到。

其次是属于环境中另外一种人事影响，引起我逃避或否定的倾向。我生活在苗汉同居的地区，从极小时起就常看到当地统治者用种种理由，大规模屠杀当地苗人，只觉得十分凄惨可怕，也不可解。辛亥以后，地方各个小军阀在长期相互火并中，此伏彼起，一面还是继续这种残酷愚蠢的统治。做官的不问大小，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十个大字：“杀人、抓权、找钱、赌博、吃喝”。此外像是再没有什么理想，什么幻想。这种现实环境实在太可怕了。我到的一个部队里，一个书记处六十多人床上就有四十支烟枪。五四余波到了那边远地方时，一些新书报鼓励我挣扎和这个可怕环境离开，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又看到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等军阀此来彼去。掌握政权的还是武棒棒，内战打来打去，大帅督办一大堆，大都是有几十万人马在手下，对国家事从不怎么关心，对人民更十分残忍无情。这种人得来万千造孽钱，平时都放在外

国银行，失败下野后就带了一群姨太太和马弁往租界一跑，让另外一伙来搞。当时北京还有一大群国会议员和官僚，过日子我看来也极离奇，大多数都像很有钱，北京城的饭馆、戏院、妓女堂子，都像为这些人开的。家中妇女有经年在牌桌子上讨生活的。还有一大群吃教饭的半洋奴，那种对外人的谄媚，以能说洋话当洋差就若高人一等的洋奴派头，……处处都使我希奇。我本来是读书来的，还以为全北大都是半工半读的学生，到北京后才知道一部分大学生只是整天在宿舍玩牌、拉二胡，活下来也是一个"混"字。所以能混下去，首先是有几个钱。在这种情形下，使我更加觉得"权"和"钱"真是要不得。也更加觉得"知识"有意义。在军阀议员成天在报纸发通电宣言时，我只觉得这个社会恐怕得重新改变过来，才有希望。只有把这些军阀、官僚和附属物、寄生物去掉，换一批专门家，一群扎扎实实的工作者，来从科学和工业着手，才会有希望转好。政治既像永远是一群横强霸道的人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活动，看不出什么光明，我的超政治理想因之而起。

北伐成功，社会起了巨大变化，万千青年人都向武汉参加革命去了，我没有动，我不参加。南方事真相无从得知。随后不久就是马日事变，只听说有万千人牺牲了，政治又回复到一种新军阀"大吃小"兼并情形中，从各方面看都看不出什么好转机会。我只觉得社会还必然在继续崩溃变化过程中，我的工作刚开始，如果还能有一点点作用，应当是争取工作的自由，给读者提起一点对于未来的希望，一点"明天会比当前好"的希望。至于究竟要怎么样，社会就好转起来？我也并没有明确方向和目标。因为首先对社会既缺少具体分析，对眼中所看到政治，自然也只形成一种恐怖、厌恶、逃

避的情绪。真的逃避是无处可走的，自己在本行工作中，却产生一种超政治的幻想，越来越浓厚。

一九二八[1]到了学校教书后，生活逐渐成了一个半知识分子。其时学校中改良主义者的民主自由思想占较大比重。这些知识分子，平时虽不和国民党妥协，但是也不对于人民革命有何认识，只觉得当前不对，内战是国家不上轨道，降低国际地位的消耗，而倾心于英美式个人民主自由。我在这种环境中熏陶下去，和新的社会现实于是日益隔开了。以为争个人用笔写作自由，极其重要。意识倾向不自觉也逐渐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

我一面对人民革命的实际和理论缺少认识，一面只从都市中接触到的文学论争看问题，觉得争自由应当是作者共同的工作，敌对方面是官僚统治者，和旧社会的种种，不应当是作家火并。其次是文学革命应当是个长时期的努力，鼓励作家扎实持久的努力才有效果。即或彼此工作方法小有不同，应当从"条条路可以通罗马"的认识上，用作品竞赛，不应当用吹捧方法提高自己打击别人。当时的《洪水》、《太阳》等刊物作风，和后来胡风等作风，我都少同感。如《太阳》当时对鲁迅的态度，就使我陷入一种混乱，不易理解。先是把鲁迅骂得极其厉害，过不多久，又说得好上了天，觉得政治上这么办也许有他的作用，从文学创作这么办，恐不大好。因为作家这么写他的小说，实在来不及。好坏没有一种比较客观的论断，结果容易使人取巧，反而容易抬头，真正老实努力的人，倒成傻瓜了。从总的成就来说，不是道理。我只从极少数作家中的方法来判断左翼文学，因此我更觉得孤立单干，比集体或者还可多作点事。所以不仅不加入左联，也

不是梁实秋同道。

对国家问题则因为看到国民党内部也总是争来打去，无个了结，官僚换来换去，全差不多，因此格外相信专家和专门知识。以为国家的堕落是逐渐形成的，真正的转机，只有政治上到了各种专家来代替官僚执行政权，才会用科学和工业的进展，代替内战的消耗。如果真有什么政治家，能够这么来治理国家，把人民长处好好发挥使用出来，把军队作为国防武力准备，不作内战牺牲，把不同政见的解决，努力想法放到议会中来商讨，不放到战场上，我将无条件拥护，为之服务。我的狭窄经验局限了我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所以直到抗战胜利复员时，虽明知国民党政权腐败与无能到了顶点，还是不大相信有什么新的代替者，在短时期中就可除旧布新，使这些理想一一实现，把国家历史命运完全改观。

三　人的影响

一九二〇年左右，我在湖南保靖县一个杂牌队伍中作书记。书记处约六十个职员，就有将近四十盏鸦片烟灯。这些同事给了我一种教育，就是看不出一点前途。其时我有个姨夫聂简堂，也在那地方一个庙里休养，同样是吸鸦片过日子，可是读了很多新旧书，头脑极新，谈的总是世界上种种新问题，极力主张年青人向外面跑，多看看世界。和部队中那些司令长官、参谋县长、绅士阔佬对照，让我觉得这完全是两种人。这是第一个影响我思想发展的人。

过不多久，五四运动余波到了湘西，有群长沙排字工人请到湘西来办报，我有机会从一个排字工人赵奎五处看到

《新青年》、《向导》、《创造》、《小说月报》、《觉悟》、《努力》等等。从这些报刊我初步接触了文学革命思想和目的。这是第二个人对我的影响。这结果使我终于离开了湘西，到了北京。我记住文学革命两个目标：一是健全纯洁新的语言文字；二是把它用来动摇旧社会观念基础。我想从事文学创作，先学习掌握工具，再来好好使用工具到应该用的方面去。这自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首先碰到的是生活，当时可没办法解决。

因写作通信，我认识了林宰平先生。他约我谈过一回话后，增加了我学习努力的勇气和信心。还影响到后来极久。他说：

"一个人活下来并不是为吃、穿，平时能够不至于饿倒冻坏就得了。顶重要还是如何努力多学些有用知识，多做点对社会国家有益事情。要写作，也得终生作去。"

话虽然也平常，却作成了我的支柱，帮助我在一种不易设想的困难挫折情形下，依然把"学习"维持下来了。

这时期我还另外认识了一些朋友，重要的有董秋斯（当时名董景天）、张采真、夏云、北大的左恭、陈炜谟、冯至、杨晦，及不曾正式上学的胡也频、丁玲、陈翔鹤。有些人直到现在还是比较熟的朋友。彼此年龄接近些，可谈的自然也多些。这些人政治方面都比我成熟，时当"三一八"前后，学生集中到天安门再分散游行时，我有时也随同他们在队伍中散散传单，喊喊口号，游行作用却并不明白。我头脑中只有一件事情重要，即如何提高写作能力。大革命一来，这些朋友大部分都过武汉去了，有的后来牺牲了，有的参加了组

织分散了。我却继续在北京不动，自以为要走的路还远得很。我明白要完成愿心，只有通过本人真正顽强持久的劳动，此外没有其他省事方法。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从一九二五——一九二六我认识了郁达夫和徐志摩，在写作上得到了些帮助和鼓励，生活也有了些变化。北新、新月起始印行了我几个小册子，得到的钱并不多，究竟像是有路可以走下去了。因为前后又接近了些教授阶层人物，如《现代评论》的丁西林、陈源，新月的罗隆基、潘光旦、叶公超、闻一多，彼此人员相熟了，基本上还是两路。由于过去教育不同，当前社会地位不同，写作目标更有显明距离。大革命到来时，知识分子有了新的分化。年青的多跑往武汉，有的牺牲，也有的成了国民党的活动人物。我所熟的教授阶层，也有分化，妥协的作了官，受英美民主自由思想熏陶较久的，就留在学校里，进行改良主义的活动。(有的人直到西南联大和复员后的北大、清华，还始终在抵抗国民党的党化政策的。) 我当时和胡也频、丁玲在上海，几个人只想办个小刊物，自谋出路。以为如果能直接把作品送到读者面前，就可少受资本家的许多气。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一和实际接触，自然就完了。刊物出一期就难以为继，只有另想办法。我于是由徐志摩介绍认识了胡适之，到他（当时）负责的中国公学教小说习作。也频夫妇则由陆侃如介绍，过山东中学教书。我教书也只像是一种名分，因为自己读的书毫无系统，教人习作又少经验。不过因此有点固定收入，可多学些，也可把写作提高一些。学校同事有黄白薇[②]、罗隆基、高一涵、袁昌英、郑振铎等人，学生有张桂（原名桂屈）、刘宇、李连萃、胡素英等人。随后又转到武汉大学去，同事有闻一多、梁实秋、李儒勉、

孙大雨等人，学生有杨克毅等。大家都学文学，而且都在写作，对文学认识和写作目标，显然还是不同。时白色恐怖还在进行，武汉江边常有大群年青人被屠杀。冬天回上海，和丁玲、也频见面，不多久，也频即被捕，因和朋友想办法，得徐志摩介绍找蔡孑民先生，又找邵力子和李达夫妇等想办法，后同丁玲过南京去和左恭、曹孟君商量办法，没有结果。回到上海不久，才知道也频死了。活的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于是只好陪丁玲把孩子送回家去。一周转，我的武汉学校去不成了，上海做作家也不容易，因此又由徐志摩介绍过青岛大学去，校长为杨振声，中外文主任为闻一多、梁实秋，同事有游国恩、方令孺，学生有臧克家、王林（原名王弢）和一个山东人刘某某比较熟习。卞之琳、巴金都来住过。陈翔鹤在青岛时相过从。写作一部分多为配合教习作短篇结构举例用。因此用各种方法写，用印度故事改写的《月下小景》，大部分是当时作的。一九三三又回到北京，和杨振声、朱自清共同编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因写文章和王芸生相熟，又为《大公报》编《文艺》。因编辑刊物，和年青朋友接触也比较多些。时巴金、郑振铎、冰心、林徽因、冯至、朱光潜、芦焚、靳以、曹禺等都同在北京，大家常在一处。(《大公报·文艺副刊》后由萧乾、杨刚接手，抗战后还在香港出版。)

这些人共同的影响，是在一个较大的统一战线方式中，进行写作竞赛。个别思想并不相同，但在工作中却不像上海方面作家间矛盾大。我在几年中印行了好几本书。主要是还把过去十年习作，印行了一本习作选。时在作家中争群众的方法极离奇，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争自己努力写作，却离开作品争群众？因此在序言中和另一中篇名叫《边城》的序言中，都提到

个人的主观见解，乐意参加写作竞赛，不参加我不明白的有政治性论争。在一般影响下，我的生活习惯倾向，不免染上了一点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的作风，和些清华、北大的先生们喝喝茶，听他们谈谈这样那样。但在作品思想倾向上，并不是他们一道，却反而比较左了一点。一面并不觉得绅士们写作会有什么成就，另一面也不大懂上海左翼作家争文学运动口号的实质。至于对国民党所提倡的民族文学，则看不起，以为那些人动不动大开舞会，其实只是挂个作家名义，骗骗自己，骗骗人而已，尽管一切把持，什么也说不上。过上海时，曾去看看丁玲，问问生活情形。后来闻她被捕时还到处想办法，以后，又去南京看过她一次，时住狮子桥，正生过女孩不久。廿六年她到北京见面，也关心她的工作，我可决不会进步到和她同样革命。熟人中如王一之、张鼎和(爱人的堂兄)在革命，我有同情，可不是一道。总之，凡是在政治指导下用集体力量在进行的艰巨工作，和我个体生产写作的习惯，不大相合。我当时既然不愿意放弃我的写作，就不会明白那些工作比我的工作还重要有意义。只记住丁玲在南京时的嘱咐，不要在国民党下边做事，我觉得对，就不做。我自己还以为是在为国家作努力，始终不曾和旧势力妥协的。

抗日事起后，我和清华、北大许多教授同时离开北京，同行的有张奚若、钱端升、陶孟和、梅贻琦、朱光潜、叶公超、周培源、邵循正、赵太侔、俞珊等一大群人。部分由天津转烟台、济南、南京，再上武汉。我和萧乾等借武大图书馆编教科书，又转沅陵，借我哥哥家中住下。再转昆明，家中人于次年也到了昆明。我于一九三九年入联大国文系，直到复员，再转北大，直到解放。同事中有冯至、闻一多、罗

常培、唐兰、朱自清、杨周翰、卞之琳、袁家骅等较熟，学生中有吕德申、汪曾祺、王忠、姚殿芳、诸有琼、陈柏生、杜运燮、朱德熙、李荣、金隄、赵全章等……。在昆明时，除教书外还曾参加过几个刊物的编辑，处理文艺部门稿件，重要的有《自由评论》③（由陈岱孙、潘光旦等共同负责）、《战国策》（由林同济、何永信等共同负责）。《自由评论》先数期似由个人出钱，后来是其他方面。《战国策》由缪某出钱。起始时本说明反蒋独裁，自由用笔，个人负文责。后来一面知道经济来源有问题，一面受牵连责备而离开。

在联大时，照学校传统习惯，本来在课堂上都可批评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抵抗学校中的党化政策。因此写作中也可反映这些思想。可是却常受另外一种攻击，以为我是国民党一道。一面受国民党图书检查限制，在桂林出的书毁去几本，另一面却老受小刊物攻击，以为是国民党帮手，在两夹攻中我觉得实在不可解。联大有的是国民党教授，如姚从吾、陈雪屏、贺麟……，我是不是他们一道？他们知道很清楚。至于桂林那些左翼作家，不敢攻击当面的统治者，却来说我反动。因此一来，增加了我的孤立感。我很奇怪我的处境。到处说争自由，以为对付文字容易，对付人实在不容易。什么都不加入还好些。写什么都不讨好，写恋爱小说吧，照当时教英文的同事中欢喜谈到的乔依思心理分析派的小说写恋爱吧，结果还是不对，我又成了“黄色小说家”。到复员前夕，大家关心国家前途，忧虑内战，盼望和平，进行民主运动时，重庆方面由政治协商到毛主席亲来重庆进行和平商谈时，有人约我加入民盟，我却以为中国应当要个第四党，以为国家、人民服务为政治目标。凡是能引导国家走向和平建设的就拥护。另外和几个人一接触，就知我谈

的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实际政治我一点不懂。只想回北京还是编编副刊，写点小说比较合适。我既对于许多事情缺少了解，也不希望人对我有较深了解。思想意识于是又回复到一九二五前后情形中去，还是写我的习作，过十年八年看看。对付文字，我觉得只要体力支持得住，任何困难都可克服。至于对付人，和人勾心斗角，变来变去，争权夺利，我毫无能力，没有本领。

回到北京即在北大国文系教习作。又编辑过《益世报·文艺副刊》④及和周定一同编《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和杨振声、冯至等同编《大公报·文艺》，又曾和徐盈、林徽因、朱光潜六人同编一次文学月刊，⑤由徐盈介绍，出一期即停。尽管社会在大变动前夕，我还只是从报纸上看到和平谈判在进行中，打打又停停，可能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调停努力中，还可回复和平，得到解决。我盼望和平，只怕打下去把国家地位越打越低。

写作呢，我觉得从一九二四到一九四七，前后二十余年中，我看到国家一系列的大变动，有千万人卷入到各种革命斗争中去。直系军阀奉系军阀的结束，孙中山先生的死，李大钊先生等的牺牲，北伐，宁汉分裂……杨杏佛、戈公振、胡也频、张采真到闻一多的死去……同时又眼看到许多人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作了国民党蒋介石手下的帮伙。特别是最后那十来年，知识分子的分化日益剧烈。以比较相熟的作家而言，闻一多的死去，和叶公超、陈雪屏的作官，这一面分化既如此显著，另一面却是由政协到军调，政治现实的和平协商从未完全绝望。我既缺少和恶势力决绝斗争的气概，也不能和新旧官僚完全同流，对于政治上的分合不定，更增加对政治的不理解。即在相熟教书阶

层中，始终也缺少一种对问题看法的一致处。现实政治的分合变动，使我无从理解，无从把握，使我增加孤立感。另一面却由于个人劳动力比较强，且始终抱住十九世纪世界文学家努力成就的印象，以为作家和社会发生关系及影响社会，主要应当是靠个人生产劳动，既不能靠他人帮助，也不应受拘束。所以即到社会变动最剧烈时，我还固执的认为作家应当有他最大的用笔自由，才会产生好作品。他的工作不是普通宣传员，勉强他去作许多人都可完成的任务，极不经济。我还认为唐代的陈鸿、白行简、蒋防、李公佐、元稹，到清代的蒲松龄、曹雪芹、李士珍、李伯言，以至于鲁迅，和外国的契诃夫、莫泊桑……这些人的工作成就是真成就。用作品取得读者的认可，而不是用其他方法。而这种作者，他在工作上的努力，应当得到认可。⑥

同时在一切场合中，我发现对于应付他人我毫无能力，与人合力同功感到十分困难，独自为战管理我自己，即再苛刻些也可以作到，因此更只想付出巨大劳力来学习，并且永远在克服困难修正错误中工作下去。但是同时也就不免有和旧社会中的某些人某些事，取了一种同化堕落倾向。

这其间，是否还有另外一些人事影响，使我工作方式日益趋于孤立，生活态度则日趋妥协？有几个人在我生活上思想上，是有一定程度影响的：

例如我的一个兄弟，就是一个军官。平时我们感情很好。初从黄埔毕业时人还进步，后来回到家乡，生活就日趋腐化堕落，终日吃喝赌博，我对他行为虽少同情，就从来不曾好好的规劝教育过他。抗日时，因为在前线作战负过伤，又因为非国民党直系，失了一阵业，我还为他找同乡杨安铭介绍，到训练总监去作个上校科长。并且认为他能够不参加内战，

就是好的表现。南京解放前回到家乡，听说起义参加地方解放军，以为他真有了进步。后来又听说因事被枪毙⑦了，很为惋惜，以为许多人二十年来专和共产党作对，杀死了多少人，还在作事。他又从来不是什么蒋介石亲信，好好教育还可为国家做许多事，怎么也胡涂死去?

其次是胡适，他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觉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动也不怎么知道，所提倡的全盘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感。但是以为二十年来私人有情谊，在工作上曾给过我鼓励，而且当胡也频、丁玲前后被捕时，还到处为写介绍信营救，总还是个够得上叫做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至少比一些贪污狼藉反复无常的职业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当蒋介石假意让他组阁时，我还以为是中国政治上一种转机。直到解放，当我情绪陷于绝望孤立中时，还以为他是我一个朋友。

第三是在抗日时期，我认识两个国民党高级军官，一个是乾城人杨安铭，后来作训练总监，因为同乡，还介绍我弟弟去作事。一个是范汉杰，只是在沅陵一个人家吃饭同过一回席，还介绍了几个学艺术的青年到他身边去作事。两个人当时都给我一种印象，竟以为是些有修养不腐化的军人，还通过几次信。

第四是在西南联大，民盟起始活动时，虽同是多年熟人，我也不愿参加，还以为没有什么作用。到北大后，我虽没有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同事中朱光潜、杨振声、周炳琳、崔书琴都是国民党，陈雪屏还是一个小头目，我和他们在一处并不觉得难受。胡适之虽再也不谈什么文学了，我的写作态度，我的教书方法，都像是在配合他的行动，点缀蒋介石行将崩溃的回光返照政权，毫无积极作用。搞第三条路线的

《新路》在北京大肆活动时，我虽不参加，却认为对国内和平会有好作用。学生反饥饿活动高涨时，我住在颐和园里写些不相干的小品文。并从一种家乡情感出发，写纪念地主官僚熊希龄的文章，认为是个人材。

到平津情况紧张时，竟只想回到家乡去隐居，或到厦大或岭南大学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平津炮声一响，神经在矛盾中日益混乱。只想到胡风代表左翼，郭沫若说我是黄色作家……这些人一上台，我工作已毫无意义。情绪一凝固，任何人来都认为是侦探。

解放一来，我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工作转到历史博物馆时，我的存在只像是一种偶然。一切对我都极陌生。虽然每天还是一些熟人在一处吃喝，工作时也似乎还肯出力，事实上即家中人也一点不熟习，好像是客人偶尔在一处。同事就更加生疏了。一天要我数钱、拔草，就照做，但是一点看不出这对国家有什么意义。对我自己，头脑极沉重，累极时想休息又不可能，实在只想哭哭，以为既然并不妨碍别人，但是听馆中人向家中说这很不好，也不敢了。见什么人都吓怕。⑧

对于自己存在，只感觉得一种悲悯。我需要休息，没有得到休息。恐怖在回复中。白天一样和人说笑、吃喝，事实上我再也不会有一个普通人能有的自尊心，和对于工作应有的自信心了。社会变了，我的一切知识既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一天在博物馆库房中数数铜钱，也觉得什么都是一样。觉得生命这么使用，倒也很好。但是也很奇怪，我究竟是谁？要我数铜钱的人得到什么？对国家有什么意义？想理解，无从理解。另一方

面是感谢伟大的党在许多方面给我的照顾，优待，宽容。让我慢慢的工作能力回复过来。让我慢慢理解到，每一项工作都要人做事，工作都在发展，必需有人从长远作计，来建立新的国家。我既然在博物馆工作，就凡事学习吧。在学习中什么都容易由不懂慢慢到比较懂，只有对于人觉得不易懂。许多同事在一处，我可说简直不懂。许多事也不懂。许多名辞在我情绪中永远引起一种恐怖，如像反动、特务，因为使用界限没有一定。又常听人说某某思想好不好，我都不大懂。许多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满有办法的人，现在还是有办法。有些本来极本行的教书的，却认为是为反动服务。以馆中工作说来，许多应当做的事不做，不必做的事做来做去。如登记，明明白白许多东西时代名称都必须用点心研究，才搞得清楚的，一提研究就说是脱离政治，胡胡乱乱的把数目字报上去，反面说是到时完成了任务。明明白白国家博物馆的陈列，要起教育人民作用，可是馆中有时竟把业务提高当成脱离政治。作预算从来不在一二月前准备，总是在三天前交下……许许多多对于馆中真正有益的，对国家真正有益的工作，总不容易见诸实施，用一种混和哄的方式交代工作的，反而做的有成绩。人的事情既然很不好懂，我只有退回到个人学习上去。

有两本书对我极有益，一是刘少奇先生的，其次是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懂的未必多，可是对我很有帮助。有一人的两句话对我极有帮助，即丁玲告我："凡是对党有益的就做，不利的莫做。"这话正和我所需要的简明指教要求相合。我就那么工作到现在。有三次组织调我离开馆中，都是先说好了后又没有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我实在不会和陌生人办交涉，怕因事意见一发生争持，会把好意变成坏结果。在馆中的经验

已给了我很好的教训。一是到辅仁，记得当时学校竟不鼓励学生写作。其次是写历史故事，怕和历史专家见解有参差，难以为继。第三是去美术学院，一考虑到和同事对于艺术认识上的距离，我就吓怕。用在人和人之间的精力比工作本身的消耗还大些。我的热心努力可能反而会出毛病，不易收拾。即在馆中，一到什么错误发生批评检讨时，我就只想简化它，大事情我既做不了，也没有什么能力，或改在群众工作部作个起码小职员，可能会少些事情，一切都好一些。

这篇自传是按上级布置，于1956年3月写出。现保存下3份不完整草稿，均有多处修改痕迹，可知各稿都不是上交的正式文本。

据3残稿衔接整理编入，标题为原有。

① 作者于1929年秋才开始到中国公学任教。

② 黄白薇　指当时任中国公学教授的女作家黄素如，笔名白薇。

③《自由评论》　疑为《今日评论》之误，下同。《今日评论》周刊于1939年1月1日创刊，作者曾参预编辑其中文学作品。

④《益世报·文艺副刊》　系《益世报·文学周刊》之误。

⑤ 文学月刊　指1946年12月出版的《现代文录》，实际由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冯至、徐盈5人署名编辑。

⑥ 以下录自第2份草稿的后续内容。

⑦ 作者三弟沈荃，职业军人。1949年春脱离南京政府国防部回到家乡，11月参加凤凰和平起义，1951年冬被判死刑，1983年获得平反。

⑧ 以下录自第3份草稿的后续内容。

“反右运动”后的思想检查

我到博物馆工作时，头脑是混乱的，只觉得过去工作全完了，个人糟得很，毫无是处。工作也极生疏，不知从何作起。工作自然不会做得好。

到革大学习时，最有影响是李维汉①一次讲演，要“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好好作事，相信党。党是在领导整个中国的，不要因为某一领导干部不成，即不满。”我相信了他的话，回来学业务抓得更紧了些。我认为政治有了领导，我是搞研究工作的，国家博物馆的明天任务重，文物研究底子薄弱，为了配合政治发展要求，我越学得多，学得好，越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多作些事情。我就只想为国家多作点事，别的不大考虑。但学的方法大有问题，只是就手抓，并无什么严密计划可言。综合文物问题还少有人用心，物质文化史中艺术文物制度和工艺部门，我兴趣好些，因之学得也稍多些。但事实上说来，结果还都只是一知半解，不扎实。也可说边学边用，凡事近于对付。努力原因试进一步分析，除了一面

明白成果对国家有益，另一面或多或少还近于想要从这个新工作上，忘却我在写作上的错误和失败，作为一种补救，稳住自己。学习业务工作，不能照自己意见进展，我不免常常着急。同志意见有分歧，感到孤立，无可说话的人，不好办。自觉既人微言轻，还是低头努力好些。因此除了对韩馆长搞工作方法态度有不满处，极少对于别人有什么意见。工作是近于单独摸索的。

参加土改将近一年，眼看到惊天动地人民大翻身，对我影响是更加感到个人渺小。在一个过年晚会上，曾答应一些本乡年青干部，要把他们“工作热情带回到北京去，一人作三人事情。”回来时，即参加三五反，和张兰晖同志等，共同担任检查本市文物业工作廿多天。当时的确是用的一种战斗精神来进行工作的。忘了疲累，十分兴奋。也一面有机会学了更多知识。参加敦煌展作说明，也用同样热情去为观众服务。但是自己学的还是不够深。我以为，在我岗位上，为完成政治任务，就必须学的更深入具体。自以为工作热情高，学习深入，正反映我对政治的信仰和认识开展。我当时是这么认识我和政治关系的。还自以为是对的。

不久，有一件事使我受到极大挫折，即出版我书籍的开明书店，有一天忽然通知我，所有书已无多用处，奉命全部烧去。听到这消息后，我相当难过，也觉得可惜。因为有些书是五四以来还算写得比较好的。有的还被国民党扣留禁止印行过。解放后，许多坏书还流行，怎么却把我的全部烧掉？这么一来，以后自然再也无勇气写什么了。即或这样，我还只是以为党对我理解不够，依旧努力工作下去。不过因此写

作信心已丧失无余。所以过了些日子后，中宣部乔木②同志写信问我工作，后来由严文井同志为商洽，约我专写历史人物卅种时，已商量好还是写不下去，因为到执笔时，即想起焚书事，引起工作失败感。于是依旧留在博物馆不动。后来又要我去财经学院教国文，也是商说好了，到后还是怕去；怕学生反对，怕和生人不好相处。直到第三次让我到美术学院，我的工作失败感依旧好好保留，因之不动。实在不知作什么即对国家对党多有些好处，怕错误不好办。

在馆中工作也并不搞得有什么成绩，不过总以为越学越多，明天对于国家总有用处。学的又是综合文物，接触面广，可为各方面工作需要服务，从国家说也上算，可以节省年青人许多气力，也可以省别方面许多钱！经过楚文物展，全国文物展，有机会多学些，也有机会为国际朋友服点务，我工作信心也稍稍恢复了些。这时对丝绸问题积多了些常识，心想铜玉陶瓷既有人作，我如能集中精力摸摸丝绸，扎实搞几年服装史，对各方面帮助也将更加具体。特别是为将来国家丝绸博物馆可以打一个好底子，减少年青人摸索！但是工作头绪还是乱，不能集中。这有其客观原因，也有主观毛病。主观的例如从不曾好好把计划提出请求党的支持。不曾商量过领导。学习近于孤立的单干。客观原因即馆中整个空气，不像个研究文物机构。不能从长远作计有所准备。

参加政治协商会后，我思想情感活泼多了。社会接触面更广了些，许多年来的熟人重新有机会见面了。许多会参加了，对政治认识也稍深一层。但由于自卑和怕错事的心情，依旧占据思想中主要地位，总还是以为我既是个文物研究员，

感谢党、报答党，不能说空话，还是把业务知识加深切合实际，此外就不知作什么更好。这另外也有个原因，即几年来眼看到一些民主人士有些空空的，能说会道而实际知识并不高。新社会工作要扎实，搞文物研究更不能从空处搞，我要像个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不能不提高业务知识。其次即常和国际友人接触，有时是参观，有时教书，谈的问题全靠具体知识。我以为要完成这政治任务，也必然是拼命努力。我还以为这么配合政治来进行工作，应当得到党的支持和鼓励。因为事实上不这么办即完成不了任务。

大鸣大放时，我谈的还是对于业务推进提高的一些建议。由于既怕事又缺少野心，只想脚踏实地搞工艺史和文物制度，好便于帮助生产和历史研究工作的推进。其次是我不大相信这些民主人士，因为好些人多年来即认为是马路政客，玩政治，而并不真正相信共产党。所以好些记者要访问我放放炮，我无炮可放。我不赞同那些混水摸鱼的人。只希望深入业务，把研究所得，推进文物研究工作。我的野心是知识加多，可多做点事。

到反右斗争时，我初初实在缺少认识，经过一系列斗争会，才明白问题之严重。不然即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但是许多熟人都成了右派，我思想中不免有种错觉，只担心以为我也属于右派。又家中大孩子，本来人极老实，入团多年，且已入党，在学校忽被划成右派，心中十分难过。后闻不加处分，心才安定。

我从小生长在军阀时代，见闻经验，总觉得权力只能作压迫人损害人的事情，而知识却可改变世界的面貌。因此早

早即有“放弃权力追求知识”的一种思想。我的写作工作可以证明追求知识的渴望。到了新的社会，权力在人民手中，已不同从前。正因为如此，一切有用知识才更加能够才尽其用。这事我知道。但是我对权力怀着恐怖感，却并未完全去掉。而对知识迷信，则有增加。我总以为文物研究工作搞得好，对新的国家历史科学的建立和生产创作，都有大帮助。一切研究都是为了丰富新的文化内容。

几年来，我在工作上总不大安定，去留不定。这有两种原因：一是党中朋友对我的期望，总像是认为我用笔三十年，还能写作，不写可惜。二是研究工作由于我的史学底子不厚，成就信心也不大。我常表示愿意离开这里，回到写作工作岗位上去。但是到可以去时，我又不去，一则考虑到全国搞综合文物研究工作的人太少，我在这方面究竟还有些常识，应当为国家把知识用出来；二则久不用笔，性又迟钝，怕写不出像样文章；再其次，即自卑感占上风时，总觉得一无是处，文物知识不过一点点常识，写作文笔又还是陈腐老一套。自信心一失，自然即把握不住，不知如何是好了。总之，即对工作信心不高，且少稳定性。自卑感占上风，怕打击，怕出乱子。因之，即有点点力量，也还不曾好好运用到党对我的要求上。

因为血压不定，神经不大健全，只希望今后在工作岗位上，人我关系简单一点，莫太复杂，好把剩余生命全用到国家需要方面去。党如认为我还可以写作，我即写作；认为我搞工艺丝绸对国家还有好处，我即继续进行研究下去；认为两者都要人作，我又都能作，我即努力来用工作报答党对我

的信托。我为人才具平常，头脑也相当简单，组织人事的能力又毫无。过去思想错误处，要一一改好，还得从头脑恢复中慢慢转好，实在不会从一般分析方式即得到真正的跃进。过去写作对人民无益有错误，补救它也得从新的工作中来证实。让我工作，头脑还担负得下。写思想检查，实在担负沉重，不知如何是好。

据存稿编入，标题为编者所拟。

① 李维汉　时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长。

② 乔木　即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我

我是一个有典型性的旧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的各种特征——毛病和弱点，在我卅年生活变化中，都或多或少可以有发现机会。解放前，在工作中表现的本来是狂妄自大，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程度。解放后，却变成十分懦怯、空虚、浅薄、渺小，凡事拿不出一定主张。前后如完全不同两人。其实也可说是本来性格中的两面，此伏则彼现。狂妄自大一经失去，随同而来必然是空虚懦怯。

由于狂妄自大，过去在写作时，常以为个人工作成果，不是用普通尺度可以衡量，应当拿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短篇小说史上几个杰出著名作家竞争短长。因此工作也要不计年月，不问困难，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在工作中我还充满自信，以为一定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艰巨伟大任务。但事实上是工作还不到一半，就停顿了。作品未成熟，即中止。内外各有原因，内在思想心情的变化是主要的；其次，由于社会有了根本改变，文学要求也有了基本改变，我的工作停顿是必然的。

我的作品虽常用人民生活作题材，部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形，其他大部分作品，都缺少人民立场，只能供旧社会旧知识分子欣赏，在旧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市场，对人民革命实无促进作用。我的生活比较复杂，虽来自民间，却因为到都市一久，如同迷失了方向，再也回不了原来那个乡下。同时朋友多从事革命工作，并且有许多都在前后三十年中，牺牲于革命斗争过程中，我却始终缺少革命觉悟和勇敢，又缺少对于“集体”的认识，只知用“走单帮”方式的工作方法，干我的创作。因此，而在“改良主义者”刊物中，成了一员相当得力的伙计。在前后廿余年，写了一大堆华而不实的作品。由于内容无物，自然经不住历史检验，大部分现在自己也看不下去。我思想孤立而愤世，对旧社会主导思想，虽取的是一种反抗讽刺态度，但并未完全与之决绝，工作方法始终不脱离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争自由的范畴，进步性就并不大。我还有些作品，不是充满病态，即相当庸俗，对青年人曾散布过不良有害影响。我虽痛恶帝国主义者对祖国的侵略、军阀官僚的腐败，以及对假洋鬼子不满，还和许多旧民主知识分子差不多，在廿年前，曾一时迷信过英美科学技术的进步，用一个胡涂天真的脑子，幻想到本国将来，如果“专家执政”，必可人尽其才，才当其用，国家会真有一天完全不同，民主自由将有一个新的面貌实现。我的迷信正和旧式江浙老太婆对于南海观世音救苦救难期望一样，在历史现实发展下，不久即破灭无余了。经过八年抗战，和几年解放战争，从现实中，我懂得了人民解放的意义。我的自大和个肥皂泡一样，破灭无余，明白工作之糟实不可言。总的说来，比起并世大作家如茅盾、老舍、巴金……诸人作品，简直有天渊之别。

解放后，因为既无新的生活基础，自然再也不会写出什么像样作品，所以连“作家”的空架子，也不复存在了。只好转到博物馆作点小事情，凡事学学。多谢党的帮助教育，才学懂了些儿古文物常识。但是九年来一切还不过是停留到常识阶段，说是“学有专长”，完全不可相信。具体工作我做得实在极少，只近于寄食吃闲饭。虽参加过革大学习、土改、三五反、反右等一系列运动，政治思想进步在表现上还是不大看得出来。特别是在许多场合必须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现时，我由于口齿笨拙，文字也久经荒疏，总是显得相当落后，措辞不甚得体。我的政治文件学习，也不如业务学习来得顺手。只认为政治已经有个基础，党在各种工作中正领导国家前进，每一工作部门，都有久经锻炼品质优秀的老党员在领导负责，正所谓大处有了正确方向，政治已挂了帅。属于技术范围，只是次要部门，我们照党要求来努力，总不会错。国家博物馆的工作，如真的学习苏联，完成明天任务，必需通过高度业务知识，通过文物和图表，来解决一系列历史问题和文物制度问题，才能够完成此后任务。作大事我既无能力，就作个“螺丝钉”，努力搞些小问题，配合工作要求，也可补救补救许多年来和人民革命脱离的错误处。博物馆既是个新的人民文化事业，基础薄弱，事情繁杂，而且问题多，我的史学底子本来不好，只有点杂文献知识，全国搞比较文物研究的人还不多，我来扎实用几年力，是应当的。从博物馆长远处看，这种打算也是对的。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适当分工是常态。馆中领导工作，宜掌握大处，研究工作也不可能有万能博士，在党的指示下研究工作如能够分别进行，实在省事省力而易见功。只是如用近半年来才提出的“红透

专深”的要求，对我来说，我的看法自然就不大全面，而工作更不大能符合国家新的要求了。因此思想要变，才不至于落空。

正由于在业务研究上，和政治学习上，缺少统一认识，即在业务研究上，也还缺少一定方向，一定规划，所以学的多是皮毛，深入也就很不够。我的知识正如毛主席所谓“假里手”，并非“真内行”。表现到陈列工作中，知识也不免枝节零碎，去“专”和“深”都离得相当远，更不容易做到“深入浅出”四个字。这是由于起点认识不足，影响到研究业务工作的一面。

其次，社会变动既然极大，我的生活变动也大，一时不易适应是必然的事。过去写作是长时期个体工作方式，和社会发生关系，只是一些作品，不是个人本身。即在学校，和系中同事过从也极简单。习惯既成，当然不易改变。加之，我原是从乡下来的，乡下人朴讷气质还未脱尽，和人相处，除业务上交换意见，实在无话可谈。因此在新的工作上，工作本来是集体的，如何联系群众，帮助同志，我总感到相当困难。许多人即或八九年来同在一个房子中办公，因为生活不同，还是不大相熟。凡对外对内，人的往来，都只是业务关系。终日在千百种文物问题中转动脑子，越搞且感觉到所学所知不够全面，因此对新人，新事，新社会，自然日益隔绝，凡事只能通过报刊去体会，热情显得不高也是必然的。我的业务是古文物问题，工作中自然免不了有严重“厚古薄今”倾向，虽然厚古是有意，薄今非存心。因为对古文物在发展演变中种种问题，材料理解得日多，自然日益深入。对当前活生生社会一隔绝，当然无从把握。即在工作上有一定

热情，是为了解决“今”的问题，如对外生产服务，对学校服务，对国际友人服务，总之工作中，自然不能如一个作家那么对现社会理解得深刻明确！还有，即由于业务分工，我懂的只是文物问题，其他知识并不多，因此也反映到工作态度上。例如部分懂的问题，就有意见可以表示，但是对本馆整个工作，却不便过问。因此在陈列工作中，容易见出对于全面少关心处。在研究方面，则易给同事一个孤立搞研究自高自大的印象。特别是对不大相熟的同事，容易形成这种印象。不善于主动和人亲近，不善于帮助比较年青同志，都可说是我个人毛病，也可以说，恰恰正是旧社会、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虽然在工作和对人关系上，曾有意努力克服“个人主义”抬头，结果还是顾此失彼，免不了要由自己戴上这顶帽子。因为不善于和生人亲近，在本馆搞团结工作也不怎么好，同事虽久，无法亲热。

我也有严重“经验主义”毛病，例如有几回，善意鼓励同志学业务，却得到相反结果，好意变成坏结果，从此一来，因为怕事，就再不主动帮助同志进修业务了。又如对馆事大处，曾提出过比较具体的意见，但办不通时，我也就不大争持自己的意见，此后也不再提。有什么贴大字报说我，即或不对，我也无能力和人作争辩。这都是一种生活暮气的表现，体力衰竭的表现。在生活中或业务研究中，即或有时还热情，灵魂深处实处处为暮气笼罩，既缺少一个革命家应有的豪迈，也缺少一个新知识分子的头脑健全。

九年来，在各种运动中，我虽参加，多似乎被“推”着前进，而缺少自觉的“力争上游”。即有种种机会，也不会如何利用机会，学会靠拢党和人民。总之一句话，越来越怕事，

无能。因此发言措辞即不易得体。写检讨语句生硬，词不达意，且容易在字句间引起误解。虽然本意拙诚，却难达到所希望效果。正像是由于社会变动过于巨大，卑微灵魂实在不易适应。也仿佛头脑已经有了相当严重的硬化，所以在向前努力时，或者倒反而只能给人一种退后印象。有些事情，若能容许我单独自己思索，还可望慢慢搞通，若系由外来用不同措辞批评，头脑一乱，前功尽弃，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更加退缩于小小蜗牛壳中去。

即因此不善适应新社会要求，个人对业务，对本人当前和未来，都缺少应有肯定的态度，常表现出犹移不定无所适从样子。好像是个早失定向的风筝，无舵的船只，长在空中海中飘飘荡荡，拿不出做一个新国家主人翁的凡事主动态度。这种自觉感所需要的认识和勇气，我都还在寻觅中，并没有完全回复过来。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一种精神分裂退化的现象。未老先衰，而微带白痴的呆相，常反映到许多方面。总之，是一个过了时的旧知识分子——或追不上时代的半知识分子一种形态。是一个还有微薄空洞幻想，却缺少必需精力去证实，又缺少新时代人勇气和坚强的旧知识分子。是一个充满弱点别无能为的日益庸俗的旧知识分子。是一个在目前还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旧知识分子。是一个才具本来有限，不过因缘时会，在历史过程中露了露面，终于还是平平常常老去的一个旧知识分子。

“红”要对革命有认识和信仰，且能用一种素朴的实践方式，接受一切考验和任务，始终又能守住一个党员的原则完成任务，还要……许许多多能力和长处来担当大事。“专”要对业务真正深人，综合文献实践知识，提出于本业有益的贡

献或发明。两者条件我都差得远。我的灵魂十分渺小，知识也琐碎不足道，所以值得卑视。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没有，当然更说不上其他了。

我的文字运用，也属于旧时代旧知识分子型的。在过去以为还有些独立风格或性格的，现在说来，其实只是充满一种自作多情的病态，一种矫揉造作、繁杂而少条理的拼合物，决不是新社会人民所需要的。用这种旧文体，也决不能好好反映新的现实，表现不出时代的素朴的伟大。即这时来写对于自己的批评，也容易见得思想混乱，不易为多数人所了解。

我可说是旧时代一种虚伪和种种丑恶的混合体。虽一时还不至于完全老而无用，成为时代的累赘，但种种表现，都已差不多可以证明是一个退伍行列中人物。好可怕的存在！本身已是一种“古董”，人在历史博物馆中工作，求在工作中不见出“厚古薄今”的倾向，那能办得到！那能避免！

我就这样打开我自己的肮脏灵魂，原来藏在一个衰老肉体中，现在却让他晒晒太阳。要烧掉这一切，才能得到新生。我想应当可能还有一点点希望。古代传说凤凰到时自焚，就能得到新的生命。我生长的地方原就名叫“凤凰”县。和那小地方人去共同劳动和同享苦乐，会有凤凰重新孵化的一天！

这篇自我批评写于1958年“红与专”学习时期。据存稿编入。

史无前例

史无前例

HIWUQIANLIE

作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 1966 年 7 月至 1969 年 6 月受冲击。仅以截止到 1968 年 12 月计，“曾初次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查。”受冲击期间，被迫写的材料主要有：业务工作检查、文学创作思想检查、政治历史人事方面的交代等。

文革中的全部检查、交代材料以及表态、申诉性文字，均由当时运动领导机构长期收存审查，事后有部分发还给作者。由于材料内容多重复，本新编集选编其中 20 篇文字材料，集名为编者所拟。

作者违心写出的检查、交代和表态等材料中，含有当时对自己、他人、单位、事件、作品的贬义叙述或称谓，多与史实或拨乱反正后组织上的正式结论不合，但为保存史料原貌，编入时维持原稿写法未作纠正。

表态之一

——一张大字报稿

我是上月中旬和馆中几个领导同志一同调去集训[1]的，因身体关系，上星期被调回来参加学习。回来后，看过三半天大字报，才明白馆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正确领导下，已搞得热火朝天。像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诸同志好意来帮助我思想改造，就为特辟专栏，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我应当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首先想到的是，一切批评总在治病救人。我若真是牛鬼蛇神，自然是应当加以扫除的。

但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事实上我本来在群众中就并无什么威风，也不善于争取任何威风，只想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平平实实做一个文物工作者。前十年，我的工作主要是在陈列室和库房里，就是最好的证明。痛苦的是若照毛主席所说，凡

事应当“实事求是”，来作一点解释，我的神经和心脏实在不许可。因为目前低压总在110～120，高压在190～200左右；我说这个数字，年青同志目下是不会明白的，因为缺少实践经验，到将来衰老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至于其他同志对我的种种揭发批评，我在此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感谢。说得对的，都要一一加以虚心考虑，坚决改正。有不对的，也值得我深深警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善于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在一处共事，虽说相处已十多年，表面相熟，事实上并不相熟。主观上我已够小心谨慎，非常怕做错事，总还难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以至于比诸同志所说严重得多的错误，我深信是能一一改正过来的。

至于对馆中的事情，领导上面的矛盾问题，我历来是不大明白的……②同时也让像我们这种从旧社会来的臭知识分子，假专家，假里手，把灵魂深处一切脏、丑、臭东西，全部挖出来，得到更彻底的改造。在这个大革命时代，个人实在十分渺小，实在不足道！求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一定要好

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个人一点点知识，也才会有使用机会，且不至于像三十年前从事文学创作时那么害人，误己！

沈从文

本文写于1966年7月，原无题。据原稿略作删节的文本，曾编入岳麓书社《沈从文别集·顾问官》一书，于1992年12月出版。

据岳麓书社发表文本编入。

① 集训　1966年6月，包括作者在内一部分人，曾被集中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集训学习的人，除作者外均为馆内领导。

② 此处删节对其他问题的表态内容约400字。

表态之二

我的性格本来即属于一种“内向型”，不善于同人应对。过去廿多年写小说，工作本身即易养成“单干户”作风。即或在学校教书廿年，和同事即少往来，学生中也只有少数比较相熟。到了博物馆，一面由于生活上变动过大，人多陌生不熟，另一面为业务所束缚，每日不是在陈列室，即是去冷清清库房工作，和本馆多数工作同志，接触面便自然缩小到一定范围。有不少且十年来还不知姓名。这还是工作上的影响。此外还有人事上的忌讳，更作成我的越加脱离群众原因。大约在反右以后，闻有一次什么检查会上，孙××同志，因为我曾经向他说过：本馆有许多研究上空白点有待解决，比如玉的研究，若有兴趣，我可以对他作点帮助。本于研究上应培养“一专多能”工作人员的原则，我说的话，实充满一种无私热情善意。不知为什么他在检讨时，竟说我“存心毒害他走白专路线”，这真应了“吃一堑长一智”的说法，引起了我的极大警惕，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对陈列部年青同志说什么“帮助”的话。即明白知道在分段负责陈列工作上，

涉及文物问题甚多，作说明想要说得明白简要，文字恰如其分，更必需有综合知识。某些文物方面的使用，不经过认真有系统学习，决不能把陈列作好，但由于前事教训，再也不敢向他们荐议，看某某文即可得到正确解决。还有更重要的，是怕犯“争夺接班人”错误，因之建馆以来，到馆中的同志，许多连姓名也无法知道。除了美工组在画塑方面，需要问我意见，接触多一些，我也无从和陈列部年青同志多说些话。我搞的丝绸问题，和其他几种文物综合性知识，都比较广博，对本馆大改陈列时，在选取实物上，卡片说明上，这些知识都十分扎实有用。我年龄已到六十五，血压高随时可以死亡，为工作便利计，却也无从向馆中正式建议训练一个比较得用的助手，接下这一份杂知识。外因也迫使我和陈列、群工各组年青同志，隔离生疏。（据韩馆长说，馆中群众、美工、陈列、保管工作各组约计六十人。）我不能和他们接近，并不是自想高高在上，或自甘孤立独处，外缘条件加上内因束缚如此，我也无可奈何。这也就同时是外面来人提询问题我乐意回答本意。因为记住这是“为人民服务”。有组织上介绍信来，我不必担心什么“有意毒害”或“争夺接班人”问题。

正由于内向型性格，加上新的忌讳，近十六年来，我除了和政协学习小组约三十个同学，由于每星期二三次学习，有些接触，属于社会活动，此外即只两三家直属姻亲私人来往。这一部分实由于个人性格、体力关系，一部分也是和客观环境位置有关。我虽明白这么下去实在不成，但解决它，充分用出我的点点长处，恐怕还得馆领导同志作种种具体帮助。我不是一个乐意作真空瓶中人，也明白不可能处于真空状态。但内外因的改变，依旧还要承认尚有个体力年龄自然

限制条件。血压和心脏随时在威胁到我，使我失去了照毛主席指示的深入工农兵进行改造的物质条件。目下唯一可希望的（这也不免纯粹出于主观愿望），即另外一时还有机会抢时间把这点有限剩余生命，有效的应用到如下几件工作上去：

一、本馆大彻底修改陈列时，在新的画塑处理上和阶级斗争、生产发展、物质文化发展说明上，尽点绵薄之力，我的杂知识可供年青同志使用。

二、几种新的工艺史或专题教材，经过审查，如还有认为有需要改编时，我的杂知识还可备顾问，供咨询。

三、未完成的《服饰资料》不论是由我负责修改说明，或由另外某一年青同志重写说明，提法上科学性遇到有未能解决问题时，仍不妨问问我。

四、我还应当抢时间，将未经很好整理过的上千种明代绫锦花纹，去粗存精，选出花纹健康具有民族气魄，并可供纺工部、二轻工部新的丝绸、毛纺、地毯及其他新生产参考需要的，用一个不太长时间，整理出来。或加以印行，供应广大社会需要。或加以复原，携带到有关生产工厂作短期流动展出，供老师傅选择应用。搞这个问题，深入到一定程度的，国内还不多，并且也并不好搞，我这点常识若使得上，应当充分使用出来，才对得起这一份可以利用的优秀遗产。

这份公开表态估计写于1966年7月，原无题。据手稿编入。

回　答

我曾说过：

“对于本馆陈列，不宜作全盘否定。”有同志批评，以为说得不对，我认为并没有错。这问题应当实事求是来看待，才能比较接触实质。

第一，我们目前否认的是内中帝王将相位置过于突出，而农民革命阶级斗争得不到应有突出。或表现得不够令人满意。不够突出、不够令人满意，有的属于思想问题，也有的属于技术限制。一律否定，是否实事求是？

第二，我们历史博物馆，虽然应当突出历代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主要动力。但历史前进应反映在具体事件上，因之继之而来，必配合生产发展史的种种，科技发明史的种种，以及物质文化史的种种，也就是目前陈列柜中东东西西，我们能全部否定？是全部撤除，另换别的？还是有选择的应用，重新安排，并在说明上多下功夫，重作解释，比较切合实际？

毛主席一再告我们看问题要全面些，一概否定和全部肯定

都不是马列主义者应取态度。还有一个实事求是态度。对于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摊子，也可以检验一下个人对于客观存在事物认识的水平。“全盘否定”和“破中有立”并不是一件事，“破中有立”是总的文化革命精神。到本馆具体陈列上，若一概取全盘否定态度，那么，当前就必须停止开放，免得使观众继续中毒。既继续开放，可知是对本馆陈列，并未全盘否定的。

关于《金瓶梅图》问题，大家恐怕提错了。本名应当是《清宫收藏双百美图》，事实上这部画图，是在馆中图书室可以公开出借的一部书，并且长年搁在美工组，因为查阅明代生活材料，随时要使用到的。内中包括许多明代社会有用资料，即劳动人民形象也比较具体。《服饰资料》始终未引用过，只在说明中引了些衣着首饰，重在说明问题，可以核实一下，便可明白情形。

认为不妥，加以删除，就成了。说是有意放毒，不是实事求是。

本文是作者文革初期对于部分批评的公开回答。据原稿编入。

关于服饰资料问题

同志们批评我重点，总的说来是《服饰资料》一书，说这部图录是未出笼的大毒草，揭穿我这个“滥竽充数”的假专家、假里手，是完全对的。我本来并无什么真本领，有的只是一些关于衣服问题的常识。常识其实也极浅薄零碎，并不踏实，何况思想没有改造好。不过这个工作是馆中通过，并得到部里同意，由馆中出面，我只负选材和文字说明，在本馆（或国内）说来，是“由无到有”一回新的试探，正如毛主席《实践论》曾说过：

“……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许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达到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这个图录目前说来不够成熟，且在取材上和说明中都有错误，可说是在意料中事情，我实有责任待尽，不能推辞。但是明白了错误何在，就应当是从反复实践中可以改好的。

这个图录其所以成为目前这个样子，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我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我算算这十六年中自编的几种图录，和协助其他方面编审的四五种不同性质的工艺图录和教材，都没有能够依照主席定的标准作去，总是往上看，为知识分子干部服务。虽然搞的问题都是历代劳动人民工艺美术部门的成就，并且在说明中也考虑到比较多数人能懂问题。只是由于立场、观点、方法不正确，因此把成就摊出来时，总还是不对头，不过硬，不可免顾此失彼，易犯或大或小的错误。服饰图录是最显明的例子。引用材料，说明文字，都不是工农兵方向，而是专家或干部方向。内中帝王将相虽不如陈列上那么突出，可是才子佳人中的“佳人”，便占了较大分量。这个在新社会，若系公开发行，自然只能起散毒作用，不可能起什么积极良好作用。其所以如此，还有个外因，这个工作任务交下来时，出版方面要求明白，第一是为国内特种工艺老师傅生产象牙、玉石、黄杨木等雕刻妇女形象供参考（主要就是唐宋明清妇女形象），并为古代歌舞剧作参考；第二是对外作礼品用。我的说明虽然也企图用些较新的观点，分别加以批判，并且也有些较新的发现。可是文字的烦琐，许多地方都近于支离附会，正如有意引人走人歧途，只符合资产阶级欣赏趣味，而对于老艺人也几几乎全无用处。内中虽有不少历代工农生产形象，并不能补正这个书的缺点。浪费了馆中许多人力物力，

我觉得全是我的过失。

不过这既然是个“由无到有”的工作，是否可用一分为二的办法，和主席《实践论》对于新工作的态度，不妨严格批评我个人工作上的不称职，可不要完全否定这一本书？因为这种资料性东西，至少是历史博物馆搞陈列即有用的。内中多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从各方面收集来的。说明虽泥沙杂下，内中也多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完全否定是不合辩证法的。比较正确的对待，应当是过一时，重新组织一点人力，突出政治，运用毛主席思想，针对出版要求，加以严格审查，在群众共同协作下，抽换增删，逐渐使它达到比较满意成果。至于文字说明，假如组织上认为我思想上和业务上两不过硬，决定另换一人主持，也不会感到丝毫难受。我应当承认工作上的错误，和思想上的错误，接受应有的处罚和教训。由此深一层明白今后任何工作，求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都离不开毛主席的指示。

本文写于1966年夏，标题为原有。

上交家中破瓷器的报告

昨见大字报，所以响应号召，带了家中作参考用的几件破瓷器①来，若有需要，我就全带来。

此外收藏主要是纸张，较好的，已送本馆三百七十多种，另外的多送了故宫，和其他公家。家中只留下三几张作样子。我的习惯即是凡是买的较好东西，有用文物，通送公家。例如馆中陈列的《阿房宫图》也是我的，一个谢条也不需要。此外还送过故宫、山东大学、吉林师范、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天津工艺学校、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等等。我既研究陶瓷花纹，总得要些真假破烂作参考。家中除了点瓷器样品，别无收藏。因为并不需要这些东西。

沈从文

本文写于 1966 年夏，原无标题。

① 破瓷器　作者为少花钱，为研究而买的古瓷器多有裂纹或缺口。

我为什么强调资料工作

我是个不称职研究员，多年来对人民毫无贡献，却享受了各种优厚待遇，实对不起人民。万分对不起人民。主要过失是强调资料工作，而并没有把它搞好。历博陈列，应以毛泽东思想红线为纲，说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一切文化的创造者。但是，我总把这件事当成馆领导的责任，首先是几个馆长是主要负责人，应有真正深刻的认识，其次为陈列主任及各业务部门主任。研究员的职责，从习惯上说，即是明白材料、鉴别材料、分析材料、批判材料，在应用时建议能不能用，并如何用它。比如说，《潞河督运图》重要处，可以明白南粮北运的情形，到清代是种什么情形。主要是从隋代开南北运河以来，到清代还使用它剥削压榨南方农民，年运粮至数百万石。有了这点基本认识，即可建议应陈列两个部分，一是千百船夫如何沿河拉船的劳动状况，二是这大量粮食如何囤积处理的情况。《清明上河图》情形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南粮北运是相同点，但船只式样有区别，不同于清代，所以也可把各式船只作重点。据史志记载，当时公家约

有运粮船二千三百余艘，总运数达六七百万石。特别是分段还设有闸门，节调水位，约二十余处。搞研究的就有责任注意，宋人《上河图》中虽有局限性，不曾具体表现水闸制度；清代《南巡图》黄河和其他部分，却可以见到十分写实的水闸制度。若陈列谈到宋代廿三个调节水位闸门制度时，虽无直接材料，至少还可引用时间较后的材料，作为附属材料参考。这些杂知识的应用，个人认为就是研究员应有知识和应尽责任。陈列时，不可免要形象材料，要用它，必先得懂它，不能临时抓。必心有成竹，才可望在陈列上的科学性得到具体体现。（我常说的馆中工作有些不过关，即指这类事情而言。）又如宋代农民起义中，统治者滥用民力，照权臣朱勔出主意，在南方大运花石，凡是人家所有的奇花异石，都派人破门毁墙挖走，若这种暴政要作为农民起义主题画的附陈品，或连环画中的一幅，求生动活泼而又有科学性的表现，自然也就得多懂些宋代南方街市情形，宅院民居情形。宋人画中反映种种不同的街市宅院和平民形象，知道多一点，具体一点，当然比什么都不知临时抓瞎似为省事合理。我注意它，也就是为了馆中要应用它。没有这种调查研究，我们怎么希望搞好陈列？这些事想依靠什么科学院专家实不可能，他们毫无兴趣作，也不好作。①真正解决还是自力更生，从学习摸索。这种工作既费力又难见好，更无名利可言，因为除陈列上需要，其他都用不上。我不怕麻烦的，辛辛苦苦的，来为内容组作准备，得到的却是一个“牛鬼蛇神”名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实事求是，若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方法，完全一律加以否定，我认为是违反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方法，也不合辩证法的。

举这一个例，可以明白好些问题。比如要李之檀在业余时间中把交通工具中所见车船乘骑冰橇筏等等随时留心勾下，也正是为了陈列上的“未雨绸缪”，到时一查即知。我们图书室卡片制或期刊目录索引制，工作组同志都承认实在少不了。越详检查越方便，对工作大有好处。怎么同样的工作，用为形象的参考，对美工组和内容组都十分有用的资料工作，便成为一种过失？本来是应当鼓励的大家都肯定的工作，反而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我认为若主要只在是为打击我，那就不必说了。若同志们真的能照毛主席指示要来说道理，摆事实，李之檀的工作应当受鼓励。也应受批评，即说是初初做来做得不够细致，不能如图书室卡片和保管处文物卡片箱有条理。但是要知道一个人业余工作，为公家储备那么些资料，比其别的人专搞自留地来说，大家试想想，究竟谁对？我认为之檀工作是对本馆有益的。若美工组多有几个如之檀肯这么留心的，显然对将来本馆大修改陈列时，面临到一系列现实形象问题求解决，好些事即可以迎刃而解，不必要临时去这里问，那里请教了！

再举一个例，如绘元末农民起义场面，起义人民如何和统治者爪牙搏斗，如何攻击庄园，人民的材料、官军的材料（包括军营制度，军乐等等）、地主庄园的材料，先有个准备，岂不是比临时抓省事些？毛主席告我们“不打无准备的仗”，并且总说调查研究的重要，照我理解，和这十六年在馆工作，大部分都是为了一个崭新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应做的工作，正因工作涉及范围太广泛，个人史部学底子又较差，因之作的点点滴滴，零零碎碎，不成系统。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历史博物馆研究工作人员而言，已只能做到“对各部门都

有一点常识”为止。充满朝气的年青同事，在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对于新的改陈工作，一定做得又快又好是理所当然的。但资料工作很好的进行，据我个人目前认识，还是有必要做下去，才可望符合新的社会要求。照目下情况说来，我们这方面底子是实在太薄弱，而不是太充实了。由薄弱到充实，不是一年二年所能办得到，是要从实践作去才会见功的。

大家不是把资料室几万个卡片一律当成“牛鬼蛇神”看待吗？这个笼统提法，似可研究。若真的全是牛鬼蛇神，那就不必保留，可以一火而尽。但事实可不是这样。内中不仅有许多阶级斗争史材料，也有更多能说明生产发展史的材料，科技发明史的材料，物质文化史的材料。保管部门同志，若不是作过综合研究，是不可能明白清楚的。所以我主观设想，革命工作委员会，与其要我写思想材料，使得我头脑沉重到几乎发狂，却什么也写不出，对国家说实在极不经济，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趁我脑子和心脏还得用时，争时间一天来为整理一两个卡片箱，名目错误，时代不对，以及问题就我知道的写到卡片一个。要说劳动，这倒也真的是一种劳动。我自己知道，再过一二年，即欢迎我来作，精力也不许可了。

本文是文化革命中作者的申辩材料之一，写成于1966年8月22日，作者另注明“廿三交”。

据手稿编入。

① 编入时此处删节文革中习用语句，计22字。

大连会议事情

沈从文廿三

有人写大字报说我曾参加过大连会议，我应说明一下。

这是周扬黑帮有计划布置的一次创作会议，据近日公布材料，真正参加的全是党内名作家和各省作协负责人，我非党员，事实上又已十多年未写小说，联系不上。只是最后一次邵荃麟、茅盾作总结报告，东北作协（或大连市长，已记不清楚）做主人请客，我适因政协有一批人在大连休息，才被邀请吃饭，并听了一次总结报告。邵与茅盾二人南方下江口音本来即听不懂，座位又远，所以说完以后，只懂“要扩大写作范围”，至于如何扩大，写些什么，我都不明白。会后吃了一顿晚饭，饭后即转到另外一座大楼屋顶舞会，只见红绿灯彩十分热闹，可能当地文工团和戏剧界均参加。我一人不熟，且从来不欢喜这种热闹场面，因此不到廿分钟，就由一青年杨同志送我下电梯回家了（这就是我参加的全部过程）。

这个会的内容，我一个党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何况我久已离开写作，十六年中一个短篇也未发表过。即听到说有“扩大写作范围的建议”，毫无现实生活的我，也引不起重新执笔来写短篇小说的妄想和兴趣，因为血压高，心脏不好，既下不了乡，而且年龄和青年距离一大段，在本馆，和群工组、内容组同事十年还彼此生疏少说话，下乡去农村那有资格？主要还是思想滚在死人东西中既十多年，早被万千种绸、缎、瓷、漆花纹迷住了。这些东西已占领了我兴趣全部。服饰资料还在次要地位。

原因简单明白，因为馆藏上千种丝绸，故宫藏上万种绫罗绸缎，我大抵都经过手，兄弟民族纺织品也以千计，留下了深刻印象。明白有不少品种的花纹、织法还可供新的生产作参考取法。并且有许多花纹，现在看来还相当新鲜，我一脑子想的，只是如何照五八年到浙江一带带些绸缎下厂，给老工人看看，有什么还有用，再调些来看看。因为旅大附近即有几个染织厂！学这个，主要就是希望它在生产上可以服务，使“向优秀传统学习”得到落实。据我所知道的情况说来，这种工作直到目前，还是对生产有启发作用，可以避免、纠正流行市面那些畸形怪诞花纹的。我体力若许可这么作，觉得这么为生产服务是应当的，即辛苦些也是应当的。

我因为又比较熟习陶瓷花纹，知道有好些散朵花都十分鲜美、健康，充满民族艺术特色，而且十分适于批判的转用到夏季印花衣料上，若能好好整理出来，供应给国内新作印花瓷使用，也必可收显明良好效果。我认为我这个想法不是空想，是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种打算。

老话说，人心不二用，我过去虽写了廿年小说，解放后，

经过学习已认识工作对人民无益有害。工作岗位一转移，很自然便放弃了。新的迷恋自然也会作成新的错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待从不断学习中得到改正。至于有关大连会议的事实，知道的大致便是这一些。

本文为1966年8月，作者对群众大字报质疑的答复。稿件页眉有“已交留底”及“廿四交”字样。

据原稿编入。

我为什么研究杂文物

十几年来，我因为征集文物，明白好坏，也明白价值。我有能力收买，并没有作，主要原因，是不想自己占有这些东西，公家东西见得越来越多，个人收藏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所以当五反以后，古文物非常不值钱时，我连一个小带钩或铜镜也不买。（广东中大几个教授，以贱买贵卖方式进行新式倒把时，我觉得很不好。）我间或有点稿费，家中又每月为我抽出一部分钱买书，我有时也买点非文物（无货币价值的文物），如零碎丝绸锦缎，如有崩口不值钱的瓷器，供研究资料。因为公家虽然东西多以万计，但这些东西却无多价值，公家不需要，例如很多漳缎、漳绒晚清衣服或材料，即因此多被各省市来京戏剧团体买去。事实上到晚清纺织物有创造性却正是这些东西。怎么办？我尽可能来掏腰包买点吧，但是家里又放不下，且十分讨厌这些陈旧东西。我因此一面收买，一面送给学校作参考资料。送的机关计有工艺美术学院（瓷、丝较多），长春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历史教学资料室（陶瓷杂项都有），上海华东师范学院（杂项都有），北京市工

艺学校，天津市工艺学校，吉林艺术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学院，湖南博物馆（最贵重的挑花全送去了）。有的学校一面还托我买集各样文物，总照例是自陪车钱，到处奔跑。大致以长春人民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学院收集的规模最大。

当时热心原因，简单之至，学习了为人民服务。诸学校有此需要，我又比较熟习问题和价钱，当然热心效劳。说复杂一点，即我有这么一种认识：教通史用一个厚本本压得学生透不过气来，而书中说到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学生不知道，事实上教书先生大部分也不知道（至今可能还有许多历史教授不知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即“干”与“戈”，是个什么样子？武王伐纣用的和秦汉相争用的有什么不同？（照我想来，许多搞博物馆做事多年了的，或许还说不出正确答案。作历史画专家，也闹不清楚。）但是通史中提到阶级斗争史以外，便是生产发展史，科技发明史，物质文化史一系列事事物物，东东西西，都必需有具体知识。不从实物上用点真功，作几年调查研究，是不可能理解的。既缺少基本理解，如何去教人？岂不是近于自欺欺人？作陈列误用材料也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像这样下去，永远无希望有一部毛泽东时代的令人满意新通史产生。一定要有人肯作螺丝钉，从大处看，从小处做，来用些较新方法，做些探索工作，辛苦寂寞一点也无妨。（且必然是十分辛苦寂寞，因为所谓正统派并不承认这种实践学问是新通史知识来源一部门，或新基础。因为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有种种证据都得结合实物作辩证解释。）但是，我坚持学下来了，做下来了。因为学习了为人民服务，明白这个工作对国家有益，可推进新的历史教学，更可以改变历来用文人画作重心的美术史研究和写法，可望慢

慢转而改成以劳动人民艺术成就为中心的美术史。这些史，那些史，照我的学识底子说和年龄说，都无希望可以参加了。可是却有机会把这种新工作向前推一把，让那些能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年青一代人来完成。这也就是我在博物馆工作，对杂文物制度和工艺美术学习兴趣比较广泛的原因。为名吗？这工作根本不可能出名。为利吗？无利可图。为向上爬？越学越感到不足，那里还会有向上爬的心情抬头？过了六十的人，除了希望把所学有益于人民部分，即早贡献出来，什么野心都不会在一个衰老的心脏中引起兴奋。加之心脏不好，白天有时也不能不躺下。在这种情形下，除学习文件记着主席告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去联系另外文件学习深入一层体会，我的心脏和头脑，实在都早已累过了限度。视觉经常也模糊不清，眼部浮肿。前几天，一同志因为在斗争王镜如时，见我低头欲睡要我站出来，她不了解，那个时节正是我头部十分沉重无可奈何时，受体力制约过大，学什么随学随忘也是同一原因。

沈从文

八月廿四

本文是作者在文化革命初期上交的申辩材料之一，写于1966年。据手稿编入。

我为什么搞文物制度

在横扫一切旧文化……燎原烈火中，历史博物馆旧的一套陈列，自然也在横扫之列。新的陈列主要必然是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史为纲，配合出土文物陈列，说明随同阶级斗争不断发展，促进生产发展史、科技发明史、物质文化史等等。我搞文物制度，原因就是反映阶级斗争要场面，而陈列上又不可免有一大堆不同性质文物，既陈列，就得明白问题，具科学性和发展观点。不能不有人去作较深入探索，不然搞画塑难于生动，缺少历史时代气氛。做说明，交代不清楚，易错误。馆中年青人多不乐意作，实在也不好作，但是有一二年老力衰的同事，来用点心，对于一个国家历史博物馆而言，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毛主席著作中常告给我们实事求是。所以我搞丝绸，搞陶瓷，搞漆器搞家具等等杂项，既费力，并不见好，也无名利可图。这类专题稿，有的是约我看的。说这个，不是自以为事事在行，只证明到目前为止，教美术的还是以封建文人画系统，而不重视古代劳动人民在艺术上的成就、创造和发明。我在这方面还用了点心，有了一些常识。

我既然是在新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作，来比较有系统注意古代劳动人民在工艺上的成就，方向应当是不错的。若能学习好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古代文化的看法，不仅在陈列上可望得到较好的配合，而在新的生产上，也还可望起启发借鉴作用。

我的工作并没有搞好，是事实。因为陈列系统是一条总黑线，全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我也只能起配合歌功颂德作用。但工作“方向”和“方法”似应一分为二看待。方法若完全加以否定，将等于图书室不用藏书卡片，十万八万书如何去查？保管部卡片箱也是个现实例子。

补救我的错误，应当是好好学习主席著作，一一重新检查我所学的这些问题，改进工作上的错误处，破旧立新。从今后大大修改陈列时的工作实践，去求解决。

我并不鼓励什么年青人来钻研这些死去千百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虽然属于社会科学范围，但是整理材料研究方法，实在说，却用的是技术科学的功夫。一切是从具体出发，不从抽象出发。一个国家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像我这样老而无用的人，肯勤勤恳恳实事求是为馆中作点基本功，从长远看，还是有需要的。一个有全局眼光的馆中领导人，会支持这种看法的。就目前说，这是我馆一个薄弱环节。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三面红旗来进行改陈时，若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搞出一二十大型形象场面，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充分体现出新陈列的伟大现实性，我的许多有关某时某事常识，大致都还配合得上去。

照目下日夜写材料情况说来，我头脑和心脏，实在担负不下去。组织上若认为我已是历史沉渣，再无什么用处，我

也不敢作任何请求。若认为所学一部分，特别是劳动人民艺术成就部分，将来艺术院校教材重订，我或许还能提出些有益建议。本馆得陈列大型农民斗争场面及文物如何配合，我的常识还有使用机会，就请求让我少写一点我脑子里实在没有的事物，一天写一回，而多考虑些具体事件。对国家说实在比较经济。因为如此一来，机器可以用得稍久一些。

一个没有政治野心，也缺少权势欲望的人，一心只想尽这点有限余生，来为博物馆点点滴滴尽一点力，来报答人民，报答毛主席对我的厚恩。要我说反共我有什么理由？我有时也有些不切实际空想，即以为若有机会动动，充满热情来赞美歌颂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建设的成就，至少是还可写出些能感染人的诗歌。或去生产单位，比如一些新的陶瓷单位花纹设计部门，用我的实际长处，来补救我纠正我思想上的错误，岂不是对国家经济得多？

八月廿六

本文是作者在文化革命初期上交的申辩材料之一，写于1966年。据手稿编入。

关于减薪事感想

前天午饭期间，宣布黑帮分子每人按家中人口计，月各支生活费十二元，我觉得这么办极合理，没有感到丝毫抵触情绪。因为多少年来，我吃的，穿的，无一种不出自劳动人民。卅年前不听主席的话，好好为人民服务，前后廿多年中，专写些反动坏文章毒害青年，腐蚀青年，冒充“作家”，其实只是个高级文化骗子。在大学教书约廿年，教的也不外是这一套资产阶级思想骗人东西，反动本质，十分明白。到馆工作十六年，还依旧是高薪特殊阶层。搞的研究工作，全近于为死人服务，配合陈列，只能起美化历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用，不可能有其他进步意义。而对于劳动人民如何创造整个历史文化，虽然有所接触，也还只是一知半解，缺少深刻调查研究。我既然专搞工艺美术史，虽十多年来，对于丝绸、陶瓷、漆木竹石金属加工等等，都分门别类，用过一点心，理出一些头绪，并拟学习用主席指示的《实践论》求知识方法，反复从实践中去求证，去封建糟粕，取民主精华，使优秀传统还可达到古为今用目的。由于学习主席思想不深不透，

业务能力又不够高，所以十多年来并拿不出什么显著成绩。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现在群众意见还给我以生活出路，我表示诚恳感谢。还想不必按三个人口计算，只需用两个人口就很够了。从此以后，只要我体力还能工作，就照这样待遇，来作一个勤杂工，专门打扫本馆各个毛房工作，也将尽力所能作去，绝不会感到丝毫不愉快处。我将从新的工作新的生活中加强自我改造，成为一个新人，紧紧跟上去，少犯新的错误就好。

沈从文

一九六六（八月?）

本文为作者上交的表态文字之一。据手稿编人。

劳动感想

今天劳动体力担负感觉重了点，但一面在烈日下拔草，一面想到几亿农民的长年辛苦，像我这种不劳而食的知识分子，真是惭愧欲死。因为一切吃的、用的，那一种不是用辛勤劳动做出来的？我虽然生于小乡城，来到大城市，多少也接触了些小手工业者，脱离人民过了六十多岁，过的完全是寄生虫的生活，不以为耻。从长期劳动中才能谈得上思想改造，深一层体会到劳动人民对我的恩惠。人类一切财富文化同出于劳动人民，也有了较深一层体会。过去在本馆，我总觉得一般普通清洁工有一二专人即可以办了。现在我却觉得即在正常时期，由馆领导带头来作这些工作，也是完全应当的而且必需的。因为比起万千种生产劳动来，可以说是最最轻微一般性的。所以此后我要争取各样都作作，动动手。希望能实事求是，主要是通过劳动，深一层体会劳动的伟大，便于改造人生观。其实说来，所作的事那里算得什么劳动。想想五六亿人民都是长年贴身土地，为生产而劳作，我只有惭愧，别无可说。

我的家乡是在一个苗族自治州地区，若心脏不至于临时出问题，我希望能有机会回到家乡“腊耳山”去住一年半载，因为过去那里是个荒山，属湘黔边界苗区，近年在党领导下学大寨，由人民共同努力已完全变了样子，新的湖南大学闻将迁去，我再也不想去教书骗人，但手中笔若还得用，将可用到讴歌这个地方人民的一切新成就。

本文是作者在文革中按规定上交的思想汇报之一，写于1966年8月末，并注明“卅一交”。

据原稿编入，标题为封套原有。

我的检查

我由于思想上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解放以来，在博物馆工作，不仅无成绩可说，还犯下了许多严重的过失，应当向党、向人民请罪。经过群众大字报的揭发，和我个人近来检查到的，概括作三个方面，交代一下问题。

一

一、关于对外服务的放毒作用，几年来历史戏的演出方面计有：

郭沫若的《屈原》、《虎符》、《蔡文姬》、《武则天》；

曹禺的《胆剑篇》；

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

孔尚任的《桃花扇》（电影拍摄来谈过材料）。

这些戏多是歌颂封建社会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的并且十分坏，是毒草。我对于服装道具均提过材料。这些戏对于新戏改均起过阻碍作用。戏的演出越“成功”，我的帮同

散毒影响也越大，罪行也越深。因为和主席文艺应当面向工农兵的最高指示是不合的。是把封建遗留物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的。是推广颂扬封建文化，十分反动的。

二、十多年来，对高等院校历史文物教学资料室的建立，经我协助过的，计有：

1. 长春人民大学历史教学资料室；

2.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学资料室；

3. 上海华东师范学院①历史资料室；

4. 吉林艺术师范学校美术史教学资料室；

5. 南京美术学院教学参考资料；

6. 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系教学参考资料；

7. 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有很多是我送的）和其教学资料；

8. 中央音乐研究所陈列室古代乐舞绘画部分资料。

有的规模并且相当大，如一个小型文物博物馆。在当时，是认为对于配合通史教学和美术史教学，以及生产参考，都有一定帮助的。事实上我这些工作，只是努力扩大封建文化的地盘。收集文物资料越完备、越精美，对年青人的迷惑性和危害性也越大。同时还糜费了国家许多资金。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无益有害的。和主席思想是相反的。凡是封建文化越浓厚的地方，新的文化艺术必然都受它的影响约束，得不到应有发展。过去的京戏改革不能动，就是这样。还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即在中央文化部支持下，景德镇设立了一个陶瓷博物馆，故宫前后曾为拨调了千多种宋元明清名瓷，我还另外建议文物局补拨了一些瓷器。原意以为“让瓷器回老家”，对那个地方五万个烧瓷工人，必可增加自豪感，并且可

望在生产上起推动作用。结果起的却是一种束缚作用。成为本地一个包袱，有开支而不能提高新的生产。反而不如毫无传统束缚的几个新瓷区，得到迅速的进展。我的十分浓厚的复古主义感情，是在许多地方都起过坏作用的。在这几个单位上，格外显得突出。

三、关于协助生产丝绸方面，计有：

1. 南京云锦研究所；

2. 苏州宋锦生产合作工厂；

3. 东北柞蚕丝绸厂，及北京印染厂等等。

因为新花样改进设计变化不大，外销有问题，五八年我曾带故宫藏明清锦，去苏杭南京各地展览过，并加以介绍。近年来荣宝斋和上海九华堂印行的画册画卷用的锦面，就多出于苏州宋锦合作社产品。所谓“古色古香”，多是由于仿清初花锦而成。只是供封建遗老遗少赏玩，毫无新社会的新鲜活泼气氛。至于南京大花锦，更不宜仿明式袍料幛子锦，因为都是封建帝王贵族使用，生产上已无利用价值。我的展出名为“古为今用”，供生产参考，只能起放毒作用。反而束缚了他们的生产革新的勇气。柞蚕丝绸厂搞的材料，滥用民族形式，印花绸子怪模怪样如印象派绘画，是完全不对的。

四、提供不健康妇女病态形象供生产上应用的，计有：

北京市绢制人形生产合作社；

北京市工艺研究所象牙雕玉部门。

我都劝他们搞搞资料，注意明清之际部分。事实上这些材料多是南方封建地主文化产物，纤巧柔弱，十分病态。包括康熙时绘刻《耕织图》在内，并非当时农村真实情况。我把这些封建残余物，都当成宝贝看待，加以推荐。

这种种，都证明我是个封建文化的热心推广者，是个艺术思想上的保皇派，越学得多，懂得多，犯下的罪行就越大。一切努力影响，只是想拉住青年向后瞧，走回头路。而不是照主席指示的向前看，迎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红太阳，创造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资产阶级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我的用意虽重在“古为今用”，但影响却很不好，我的错误是明明白白的。

二

由于平时对于主席思想学习不认真联系实际，联系工作，对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是十分迟钝的，逃避的，少主动性的。对于文化革命运动的认识，我是逐渐加深的。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一、入集训班以前，报刊揭发“三家村”邓拓、吴晗时期，由学术问题转入政治问题，先是缺少应有认识，更想不到本馆陈列也和三家村有密切关系。主要原因是邓于建馆时指挥陈列，我和他在工作上无任何接触。素来对于他的杂文不感兴趣。对邓本人艺术鉴赏力也没有重视。只觉得邓是个“露才扬己”的人物，利用特权地位，搞艺术买卖，近于市侩，不大合符党书记的身份。至于吴晗写《海瑞》，这戏根本未看过。我认为当时社会吹捧过甚，是在捧“市长”的场，捧“史学权威”的场，是旧社会恶习惯的继续。所以姚文元文章出来时，《解放军报》编者按认为“大毒草”，我觉得是

把吴文作用估计过高。到吴晗自己声辩文章出来，被群众继续揭发批评后，才明白他的戏是“借古讽今”，表示对党的不满，和《燕山夜话》联系，情形更加显明。至于得到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支持，有更大阴谋，还是前所未闻的。

二、入文化部集训班时期，是中宣部揭发周扬等黑帮反党罪行进入公开时期。去集训班是临时通知的。到时和馆中几个领导人同去，只觉得这次集训学习必大不同于过去，但也并不感到什么特别紧张。因为人数众多，本人既不是三家村黑线上人物，也非周扬亲信，且从来不和人争权位，争名利，又并非什么“学阀”“权威”。解放前，我的廿年写作生活，对人民革命无贡献，已经全部被否定，只觉得工作失败了，努力补过吧。解放后，转入博物馆搞文物，工作近于冷门，我却充满作“螺丝钉”热情，一切努力用心，都只是为馆中作基本功。受主席指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所支配，所鼓励，即有机会转业教书，或作专业作家，依旧不离开工作岗位。为名为利通说不上，因为最初待遇并不超过一个中学教员。我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至于工作的错误，也不至于到如何严重程度。最大毛病将是脱离群众，官僚主义。

三、从集训班回到本馆，我成了黑牌子人物，给我极大冲击。但先些日子，已听说过科学院和几个大学，许多人都受过相同或更大的冲击，所以忽然成为革命对象，接受革命现实阶级教育，认为理所当然。一切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监督下，进行学习和劳动，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堪。只是睡眠少，心脏过度劳累，有些支持不住。但是，终于还是支持下来了。写材料，总是就我能认识到的写。发言语无伦次，水平低，

反映过去政治学习的不认真，罪过大。同时也由于冲击大，头脑形成精神崩溃状态。只明白一件事，工作又搞错了。

今就馆中大字报部分揭发，和我个人这一月学习、检查、反省，日益认识到我在解放以来，由于思想上的政治不挂帅，工作通没有作好过。我的脱离群众自以为是的唯心主义，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方法，我的生活上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随同年月逐渐加深，而沉陷到难于自拔地步。我对于封建旧文化的迷恋，转到各方面，越学得多，越有人相信，起的坏作用，放毒影响也将越大。一切努力，都是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创造条件，而对于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实在毫无益处。就是对馆中拟作的基本功，搞的综合文物研究工作，若不用主席指示的方法去分析，缺少阶级观点，最后必然走到邪路上去。最明白的一个眼前例子，就是《服饰资料》工作的结果。主席在各种工作指示中，总指示到一切应当面对工农兵，我搞的工作，却没有注意过。总是为少数人，为资产阶级，有的甚至于只是为我自己需要。文化革命运动把“破四旧”特别提出，我搞的一切，都在应当埋葬扫除之列。再也不能用它来欺骗青年，麻醉群众，作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了。

旧学的全落了空，成了待扫除的垃圾。新的将一切从头学，从头作，来进行思想改造。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发展中，接受群众对我的严格批评。我自己也必加强学习，对我一切的错误，就我认识到的，作无保留的揭露和批判。但限于认识水平，和对于主席著作学习的不落实，不认真，不善于运用，加之受体力限制，我的改造工作，进行得也格外艰巨，痛苦也格外深。这将是难于避免的事情。

三

我思想上的反动性，反映到八个问题上：

一、《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十一种自由主义坏作风中，差不多每一种我都犯过。……

二、在研究工作中，我好大喜功，不实事求是。……

三、对于主席文艺思想的认识，解放后才有机会比较有系统的来进行学习，解放前是谈不上的。……

四、我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严重脱离群众倾向。因之对于集体的认识也十分差。……

五、我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抗拒。……

六、我的蜕化变质，为陈腐的封建文化大卖其力。……

七、我工作中无计划性作成的浪费。……

八、我思想和现实脱了节，灵魂深处且有修正主义的根子。最明显是表现于对修正主义代表文学家如爱伦堡等作品有一定的兴趣。以为写作上如真的能实现《主席语录》261指示的百花齐放，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我还将可望有机会照社会主义对于文艺的要求，使用手中的笔，来歌颂祖国人民在主席思想号召下起来的青年人新面貌。我总是充满信心和妄想，认为在体力许可下，手中的笔还可以作些文化工作。但是许多年来，我却近于在等待中过去，从不主动争取下乡下厂，积极接近工农兵。先学习工农兵的种种好品质，改造自己，去掉自己的浮夸性。当文化部作下乡四清动员报告大会时，把参加四清的干部任务，提得极高，认为是受党的委托的工作，也是改造自己的极好机会。我就

没有主动用一个普通干部名分去报名请求参加。我怕苦也怕死。凡事一个“我”字当头，什么进取心都挡住了。我由于思想空虚，不知用主席思想来改造自己世界观，一面是在个人书桌边作白日梦，一面是在群众中的自卑感，如同一对双胞胎在我的丑恶的灵魂里同时并存。资产阶级的烙印深深打到一切言行中，反映到每一件事情上。也打到对于工作盲目自信的空想中，反映的是没落资产阶级一种极不健康极其反动情绪。直到我进人黑帮分子行列时，还缺少应有认识，以为解放以来我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对于工作是抱着一种积极忘我无私态度去进行的。完全不明白客观印象，我是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毫无好处的人，是作官当老爷摆臭架子的懒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分子，是牛鬼蛇神，是应当斗倒斗垮斗臭的一个不折不扣寄生虫。

我逐渐明白了我的种种罪行，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只有在人民面前低头认错。并从今后思想改造中，劳动锻炼中，加倍努力，才会得到人民的原谅。

本文写于 1966 年 8 月，是作者文化革命初期第一份业务工作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检查。其后经分别补充，又形成更大篇幅的检查稿。

现据较简短初稿编入，并对其第（二）节的一至七项删简为保存提要。标题为原稿所有。

① 上海华东师范学院　系上海师范学院之误。

文学创作方面检查

我十来岁时，是个小流氓，从私塾逃学和赌博、上山乱跑，得到最高乐趣。从旧式眼光看来，我是不成材的“败家子”，好在家里早在破产情形中，靠当卖典借过日子，无家可败。勉强维持到小学毕业后，家中对我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就让我随同本地小军阀队伍出去混日子。旧社会军阀割据时代一切坏事都看过接触过，先是无动于衷，随同大伙混日子。混不下去时，又转换一个地方，在一条上千里的沅水流域飘来飘去，有一顿无一顿是常有事。亏得年纪轻，支持得住，也不知道什么叫灰心绝望，主要就是一个“混”字。五四一来，《新青年》等报刊到了我住的那个小小乡城，年青人或多或少都受了点影响。我正当成年时，感觉到继续在部队中鬼混不是办法，因此充满幻想，跑到了北京。以为可以照报纸宣传的半工半读学点什么，活下来对社会有点益处。幻想虽多，野心并不大。身体瘦小，口齿钝拙，打不过人，说不过人，加以长时间处于受虐待失业流浪卑微地位，自然便养成一种胆小怕事，自卑、懦弱性格（这种性格直到现在还并没

有改变多少)。因此到北京后，在长期失业中日子实在混不下去时，许多熟人都过广东考黄埔参加革命，我却因为在部队过了五六年，依旧留在北京不动，过着有一顿无一顿的生活。只希望做个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或作家。以为只要能活得下去，我就能把学的慢慢提高。就是写作，野心也不怎么大，只是以为能守住五四文学革命要求，作个打前站的尖兵，在短篇小说一部门搞些试点，至多能像旧俄契诃夫那么写一辈子，在这方面留下点成绩，文字处理和艺术风格上，在旧的标准上和新的要求上，有些新的突破，就很够了。写得好，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应当换个方法再试试看。写得不好，也不用失望灰心，同样换个方法试试看。国家那么大，社会问题那么复杂，旧的文学还占有极大势力，照我当时的认识，想要推翻或否定旧有一切，必需在写作方面有百十作家，不问成败得失，在试探中努力学习下去，用个二三十年时间，并不算太久。因为真的要想打倒旧有的二三千年传统文学势力，不付出一定代价，是不会有真正结果的。要代替旧有的章回小说《三国》、《封神》,或《今古奇观》，必有新的大量作品，在文字上和处理问题上，都有新的启发或教育，以及吸引读者兴趣的大量作品产生，才能实现。新的文学理论要得到证实，也得从作品实践上作长期努力。

我就那么抱着一种简单信念，从一九二三左右起始进行我的自我教育。到一九二四左右，写的小文章才有机会在报刊上发表，报酬之低仅仅稍高于帮人抄写稿件。因为照当时情况，抄写稿件大约三毛到五毛一千字，我的写作得到的报酬，最初不过七八毛钱一千字。但是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从此以后，我算是靠投稿可以勉强活下来了。一九二六北伐

前后，我已印行两个小册子，内容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说不上。收入虽然极少，职业方向上是肯定了。所以到武汉政府时候，北京已住不下去，相熟朋友邀我过武汉时，我却过了上海，因为上海已经有个新出版业刚刚抬头，刊物多，书店多，作家却并不多，我有了较多机会把工作继续下去。这也可以说是“人弃我取”，能力强的都作了大事，比较上当时写作可说是没有多大出息的工作。书店多赚了钱扩大门面，作者可真穷。在上海直到出过七八个小册子时，生活还是十分紧张，收入实抵不过一个中学教员。有了个转机，就是大革命后上海私立野鸡大学忽然增多，到处要人教书，才能骗学生报考。我因朋友介绍，才去吴淞中国公学国文系教散文和小说习作。事实上只能说是骗人，误人子弟。因为我学的就缺少系统，懂的更不多。但是这个新的职业，却对我前半生工作有极大影响，就是平时为同学写作举例示范，扩大了我写作习题的范围，前后两三年中，我大约写了成百个短篇，主要都是供同学参考用的，因此什么题材都使用到。泥沙杂下，有好有坏。对我自己说来，写作还只是一个学习过程，文字运用和题材处理学习过程。我得从工作实践上取得更多经验，才可说是在做“作家”！因此我从来不加入过什么文学团体，不是什么社员会员，希望把学习时间放长一点。

一九三〇转过武汉大学，还是教散文小说习作。冬天回到上海，因为左翼作家胡也频被捕，当时上海左翼作家都不能露面营救，我为奔跑了一阵，没有结果，后来胡也频牺牲证实后，才设法把他不到三个月大的孩子送回家乡去，我的职业也弄掉了，在上海住了半年，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又转到青岛大学去教书。因为教书时间少，个人可用时间较多，

前后两年中，我又写了许多短篇。书读得多了点，文字也成熟了些，写的问题也更加广泛，我成为一个流行作家。

一九三三我回到北京，主要是编辑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我结了婚。回过一次家乡，因此用家乡背景写了几本小书，背景比较熟习，文字也比较成熟，随同上海方面书商一折八扣书的流行，我的读者范围也更加广泛了些。但事实上还是不出学校中的大中学生及部分职业青年。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写作，供小资产阶级阅读。由于内向型性格，虽在好几个大都市住过十来年，并且还教过书，都市生活是并不熟习的，接触面是极其狭窄的，即在同事范围中，熟人也并不多。因此和群众脱离，和生活脱离。有关这方面题材的作品，大多出于幻想的、臆想的，有一定文字技巧，内容是空洞无物，缺少社会基础，更缺少明确前进思想的。我比较熟习的是湘西农村人事，特别是沅水流域小城市小集镇各阶层的人物，我比较接触得多些，他们生活感情种种问题也熟习些。写到他们时，总同情于穷人劳动人民多些，对于那个上层多有所讽刺，在卅年前给读者印象因此也比较好。但是事实上我的思想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因此对于农村的描写，很多歪曲。有丑化部分，有过度美化部分，也近于一种小资为逃避社会现实，不敢面对现实，用农村故事抒情而有所努力用心。若联系各个作品和当时的社会加以分析，我的写作思想是不健康的，反动的，缺少现实意义的。在文字技术方面日益成熟，艺术风格也可说已作到多样化，可是思想水平却不高。其中一部分并且是相当反动的。十分反动的。对于青年读者只能起麻痹作用的。

因为自小体力不如人，胆小怕事，又不善于在多数人面

前说话，所以无向上爬野心，也缺少这种能力，因此容易和群众脱离，和实生活脱离，和社会脱离，部分作品转为幻想抒情，也和本人性格情感有密切关系。

我的作品主要部分，多是在一九三〇到一九四〇前后十年间完成的。一面是永远用个“打前哨作尖兵”对于短篇小说和散文采取个学习试探态度，另一面是这十年和此后十年，社会和历史正起着空前剧烈的变化和阶级分化，我还是老一套搞下去，因此到后来写的作品自然无人要看，在学校教散文习作，也不免误人子弟。所以解放后不久，所有作品就全部毁去，我的工作也全部报废。我那时已在革大学习过一年，又参加过土改、三五反，对于自己写作上犯的极大错误，有了初步认识，并且曾经写过较长检讨分析，在报刊上发表过。得到书店通知时，并没有感到太大难受。明白我的工作已告了结束，骗人、害人、误人的空头作家，在新社会是不容许存在的，所以带着向人民补过赎罪心情，老老实实凡事从头学起，从头作起。到博物馆作个普通职员，在库房和陈列室来回转了十多年。在陈列室作说明或看守都觉得很好，能得到为人民服务的经验和快乐。有工作热情，可并无其他野心。尽管别人以为我是什么专家权威，我自己在任何情形下，都只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研究员，一个说明员，一个有常识较多的文物工作者。因为明白通史或文化史有许多空白点，特别是关于劳动人民的成就，必需有人能够带着一种新的探讨精神，来从文物方面下手，再联系文献，综合问题，分析问题，必可望得到许多新的知识，新的结论。凡事近于新的创始，总不可能就可望取得成功，一定会犯错误，走弯路，再从失败错误中讨经验，随时加以改正，十年八年摸索下去，

会逐渐明白某一部门问题，和另一部门问题的相互关联性。由个别明白整体。我就是这样学习用毛席对于新工作的指示应有态度学下去，作下去。只希望能在中国文化史劳动人民成就部分作点基本功，别无更大私心杂念。至于其他什么野心，更说不上了，因为年龄已到了只想为人民做点有益有用之事，而对于名利权位不感兴趣时。所以到一九五七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五四以来作品选时，当时许多同时从事写作的作家，都连续印行了一二十本集子，我经出版部门一再劝促，才印一个本本，并且在序言中对新的读者表示了十分歉意，认为是完全过时的陈货，并且还多是二四十年前的习作，从这个选集中只有一件事还有用，就是从这个样品一般选集中各个不同篇章，明白我这个"打前站作尖兵"的工作，在前后十多年中作了什么样试探性努力，得到是些什么结果。不是数说成绩，而是暴露弱点，和在发展中的人民革命事业脱离，终于为时代所抛弃的原因。虽然在序言末尾，还希望能鼓起勇气，在毛主席的鼓励下，重新拿起笔来，和万千年青一代作家，共同来讴歌新社会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作的种种努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但是受体力限制，我这个愿望，是始终不曾实现的。组织上给了我许多机会，拿不出什么成绩。主要原因，是旧的工作能力，荒疏已将近二十年，新的作品要求，我把握不住。加之体力受自然限制严酷，心脏已不大抵用。

原以为搞综合文物研究工作方法，一部分和自然科学比较相近，客观分析重于主观发挥。新的工作即或并不怎么好作，作来犯错误会少些，即时改正也容易些。经过这次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长期学习，长期检查，用主席思想作为尺标准绳，重新来对于个人工作加以分析检查，加以衡量，才比较深一些明白，过去写作思想是反动的，这十几年搞的文物工作，基本上也是错误的，远远落后于新社会要求。由于个人世界观没有得到好好改造，对于文物缺少作阶级分析，总是有意无意在“厚古薄今”，而不曾作到“古为今用”。思想方法上有问题，因此工作越作得多，错误也越多。在前一次那个关于业务上我的错误和罪行检查，还只是就大处而言。至于平时言行上的错误不谨，自然就更加多不胜数了。

本文是继业务方面检查后，对写作方面的一次检查，写于1966年秋。由于运动的发展，1966～1969年期间，对文艺思想和写作方面，作者又补充或重写过多次检讨。以1966年冬一份分章写成的检查稿为例，首页注明共100页，总篇幅估计达4万字。故本文实为早期较简短的一份检查。

据手稿全文编入，篇名为编者所拟。

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

我到北京以前，在湘西沅水流域各县，飘流转徙过了大几年不易想象的困难辛苦生活，努力挣扎才离开了这个地方，带着对于这个地方统治阶级贪污腐败给我的种种痛苦怕人人事印象，和人民勤俭朴厚好印象，来到一切陌生的百万人大都市里，孤零零的谋生活、求知识，新的困难情形是可想而知的。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可以活下去。问题十分现实。因为每天总得有一点什么吃的填到胃中去，才能支持。到处去找职业，都没有结果。原来报纸上宣传的“半工半读”制已过了时，到报馆去询问就没有回答。只笑笑，意思是“你这个乡下人，怎么就信以为真，远远跑来冒险?”想卖报，也受报贩限制，各有行帮，不易加人。想到鞋店作学徒，无中无保也无从收留。……当时还有些职业补习学校，都近于骗人性质，也得缴一笔讲义费和学费，我那来这一笔钱？任何职业的大门，都像是对我这个真正乡下人关得紧紧的。

现实社会摆在面前，是直、奉军阀轮流当权，大小内战

不断发生，帝国主义者侵略加深。由于各有帝国主义者作靠山，各有军火供应，大帅少帅只知拥兵自重，鱼肉人民。农村破产日益严重，市面百业萧条，到处是乞丐。大学校里经常欠薪到二、三年，无人过问。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求作家庭教师的广告栏日有增加。各个国家机关，都在那里拍卖或抵押管辖范围内的产权，作为逢年过节发薪二三成的唯一来源，政府也不过问。因为政府本身也是朝不保夕，得过且过！这就是军阀时代的北京。直、奉、皖当权时情形都差不多。

幸得东西城大学区附近，当时都有许多“公寓”，成了我和我差不多情形下千万穷学生及失业青年的大救星。因为北京越来越穷，空房子多，就有人把这些空房子承租下来，把大小不同的院落，分隔成许多小房间，分租给学生。北大历来有个自由听课的传统，因此附近公寓就住满了这种穷学生，靠同乡、同学彼此支援接济，把日子混下去。一切都用赊账制度，租房、包伙食、订报、买煤球，无一不用到。我们欠公寓的账，公寓又欠煤铺、小菜铺、粮食店的账。习惯大致还是从清代科举时和入京候差小京官沿袭下来的，入民国后有了发展，特别是北大附近北河沿、沙滩、中老胡同、银闸、蜡库一带，几几乎全是这种公寓。有时不开饭就饿一两顿，不升炉子就让它冷一些，或到学校阅览室去取暖。一切成为习惯后，也就看得十分自然！我能够活下来，就靠这个习惯。当时五四文学运动已进入低潮期，一群打倒孔家店的学生，多已得到各种公费出国或搞文史研究转入各大学教书。报纸不敢乱说话。副刊表面上学术性加强，如谈什么人生观，而战斗性却日低。副刊中文学作品，也失去了对广大读者的鼓

舞兴奋作用。并且为少数集团把持着，如《小说月报》被文学研究会把持，《晨报副刊》和《觉悟》、《学灯》都为少数人所把持。创作方面弄得恹恹无生气，理论方面也缺少新的东西。新书出版也不多。任何有名作家都不能依靠写作过独立生活。新的转机是后来《京报副刊》和《语丝》的发刊，鲁迅先生的大量有战斗性的杂文出现于这时期。

我当时的语体文程度，标点符号的运用还弄不清楚。古文底子倒是有一点，能看各种旧书，可是离开家乡原是对旧生活一种反叛，所以即或生活毫无出路，手边除了一部《史记》，还是下决心不读其他旧书，不打量走回头路。我深深相信，新文学可以作为武器，用来动摇旧社会的基础，新文学作品必然将代替旧有的一切诗词歌赋和礼拜六派的各种玩意儿。一定得坚持下去。到北大旁听也是这个态度。创作知识的来源，除了生活底子外，不外上海和北京几种杂志和报刊上文章，和商务、中华一些翻译小说。新俄小说和欧洲几个小国家小说，正起始由鲁迅先生等介绍给读者，部分是王鲁彦等从世界语译的。凡是能到手的，我总看个够。影响较大还是旧俄十九世纪一些作家和法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契诃夫的短篇，都德和福洛贝尔的小说，对我影响显然都比较大。国内作家则鲁迅先生写的乡村回忆故事正流行，我明白，由于生活实践，从这方面发展，我必然容易得到进展，我可写的事还多。因此现实生活虽过得十分狼狈，一脑子幻想，却支持了我，总以为只要能活下去，努力下去，明天会有个转机。并深深相信得战胜面临一切困难，包括生活上和知识上的困难。我估计到的是，解决生活还比较容易，因为有一口饭吃就够了；解决知识上的困难，

却还得通过艰巨的和长时期的努力。因为底子太差而理想却远大。当时流行的孙俍工的《小说作法》一类书籍，我看来实在毫无意义。总想突破前人纪录取得崭新成就，必需通过自己摸索出一条途径走个二三十年看看，是否能够真正有所突破。初初发表的习作，只是一些零碎小品文，没有什么方向，也说不上思想性。只近于编者偶然填篇幅用上的。第一回在《晨报副刊》发表的小文，共得七毛多钱，约合五毛钱一千字，却使我十分兴奋，因为证明这方面有了生活出路。事实上是白日作梦，大部分投稿还是如石沉大海。因此好些回在前门大街或打磨厂、天桥一带，我都跟过一个不知名的什么部队招兵委员拿着那面小小白旗后边走了一阵，心中旋起一种十分悲痛复杂的感情，又终于下决心离开了。没有被诱骗成为直、奉军阀的炮灰，只是始终不忘记来到北京的原因，是受五四运动文学革命影响离开军队的。

在生活上经常空着肚子情形下，对自己进行的思想斗争，心情是相当沉重的。但是再困难也并没有把我难倒，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似在一九二四年左右，《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因刊载鲁迅先生的讽刺诗，和报馆意见不合，改任《京报副刊》编辑。《晨报副刊》换了人，先后由徐志摩、瞿世英负责。原来一批作家都不再写文章，每天主要篇幅虽还有什么罗素等讲演刊载，空出几千字的篇幅却等待新作品填补。在这个机会上，我的初期写作的散文和小说，才正式到副刊上登载。照当时习惯，每到月底还把副刊装成合订单行本分销国内，数量虽不过二三千册，分布范围却相当广。我因此成了第一批“职业作家”，每月有了一二十元收入。过不久，《语丝》、《现

代评论》、《新月》都用了我的小说。在大革命前夕，我就在北新和新月各印了一个集子，北新的名《鸭子》，新月的叫《蜜柑》。除努力掌握文字，接近口语，内容是幼稚的，轻飘飘的，思想性不高，艺术性也少特征。但是已反映出一点问题，就是题材涉及方面比较广泛。只是一种试笔性质的作品，各印了千把册，由于时代变化太大，很快就被读者忘记了。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因为相隔了四十年，手边也没留下样本。

几个大学里，如农大、中法、清华、北大、燕京，同乡熟人从事革命的甚多，也有同住公寓的，我也经常和他们一道上街游行散传单，却缺少对于政治上应有认识。熟人中有无政府主义者，有极左派，也有西山会议派，我什么也不参加。还有许多文学团体，如"未名"、"莽原"、"浅草"……我也不参加。时社会在变化中动荡激烈，凡是有点政治头脑的，多向广东跑去，参加了大革命。我却缺少这种热情。只想守住原来那点信念，希望能有机会好好使用手中这支笔，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去磨炼，使它慢慢成熟，可以作为动摇旧社会基础的武器。总以为文学作品的完成，得通过个人的笔，是历史上古今中外无例外事情。它是一种宣传新思想的武器，但和一般政治宣传品究竟不大相同。也不必相同。它的存在得耐久一些，它的产生也困难一些。

我可以说是有创作理想却少政治常识。对政治认识，以为当时在北京那些国会议员，终日在俱乐部花天酒地，或在议会里吵架，就算是政治上成功的人物。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况，知道的却不多，事实上可说全无所知。还有个客观原因，即我母亲和一个妹妹也到了北京，得靠我生活。因此留在北

京不动，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和英美派的自由主义也少共同点，只可说是一种土生的、顽固的“个人主义”性质的。事实上就是对旧社会虽极其厌恶，对新的人民革命却极端无知。却依旧迷信五四文学革命提出的那个过了时的原则，以为希望用文学作为动摇旧社会的基础，必需用更新的作品代替旧有的一切。只有用自由竞赛方式，自然淘汰方式，才可望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若用社团活动方式，根据五四以来的经验，极容易形成少数几个强有力的人的市场独占，有独特性格和独特见解的以及无所依傍的就不易抬头。这也是当时一种事实。文学社团之多，就反映这个独占趋势是存在的，不服人心的。到后来几个报纸主编，邵飘萍和林白水，因为写文章触及军阀忌讳，前后被枪毙后，大学里的英美派也感到一种压力，不能在北京居住了。在北京的几个新书店和刊物，随时有被查封的可能，也陆续迁移到上海租界上去了。每天都听说公寓里有学生被搜查、被捕事情发生。我虽有家属，不怕检查，可是也经常被盘问，再也无法住下去了。因此只好冒险和家中人跑过上海去，以为傍近书店和报刊，生活出路会容易有办法。胡也频和丁玲也较早过了上海。事实上那方面熟人也多些。

我和家中人去上海，可能是在北伐军到了武汉以后，因为当时有朋友邀我去武汉工作，走不动。我的母亲和妹妹都是在“马日事变”前后在湖南常德居住，看到家乡革命情形的。后来写的一些涉及革命的故事。有的就是她们谈起的。内中有《新与旧》、《菜园》、《过岭者》等。虽对大革命有一定同情，但写作上的基本态度，还是原封不动的“自由主义”，因此对革命缺少较深刻的理解。对自己工作，也还缺少

应有认识。贯串全部创作生活的一个极其单纯理想，正如后来印行选集序言提起的，只想在小说写作上做一名前哨尖兵，打前站，试在各种不同题材上和艺术风格上作些试探。不图“成功”，也不担心“失败”。“但开风气不为师”。总以为这个工作应当是用廿卅年打基础的工作，所以不争一时得失。和人民革命游离，和群众脱离，都和这种盲目的主观理想和企图有关。即或不是有意识的反动，也是十分迂腐的。另一面也即反映出我的工作有逃避现实的趋势。而发展下去，就日益明朗化。这和客观环境有一定关系，和个人过去生活经验及性格也有密切关系。楚人在历史上就是长于幻想和抒情的，我生长在一个饭碗大的万山环绕的小小山城里，到如今这个县城就还不过两万人，和人事接触极浅，和自然接触却深。到大都市几十年后，许多方面还像是个乡下人，处理现实生活缺少世故和机心。因此生活上老吃败仗，工作上也总不容易对客观世界作有效适应，而永远却受一种幻想或理想支配。工作上的错误，生活上的败北，正如主席语录124指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就是这样一种人，在社会上混了个二十多年，在“文坛”上混，还在大学里混，直到全国解放，我思想上才发生基本变化。直到这十几年的思想改造学习，才深一层明白过去工作上的错误的严重性。失去了许多向人民靠拢的机会。手中一支笔，训练了二十年，到头来实毫无用处。过去对自己工作的过分自信，和解放后对自己的完全否定，都还由于没有学好辩证法的认识论。解放后，由驾轻就熟的短篇小说写作，改为从事文物研究，劳动文化研究，实带着“补过赎罪”心情，因此一个人只想学五个人的，也乐意做五个人的工作，以为这样便是靠拢人民，

为人民服务。现在从“破四旧”的提法说来，我学的作的又落了空。不仅落空，还无形中成了封建文化的宣传者和代言人。

本文是作者在文革中分章写的检查交代材料之一，写于1966年末。首页作者旁注“二文艺思想部分”。

据手稿全文编入。

我到上海后的工作和生活

到上海后，第一回印象就是地方大得很，码头上乱哄哄的，黄浦江中满泊帝国主义者的大小炮舰，炮衣都已退尽，炮口对着江岸。租界上全是外国人的势力。寄托在这种积有百年帝国主义者恶势力下，还有无数的下野军阀，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流氓，形成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上层。弄堂房子里住满了人，街上人来人往也乱哄哄的，北京那种“静”全看不到了。到处都是钱在起作用。我十分厌恶这个商业都市，前后却住了好几年。租房子特别贵，一般得耗费收入三分之一以上，才有个住处。向二房东租个住处，还有许多保证限制，得预交三月房租等等。一切家具都得出租钱，生活的紧张是不言而喻的。幸亏从书店得了一笔稿费，才把住处安顿下来。武汉方面已起了剧烈变化，蒋介石已在南京定都，白色恐怖正在大规模进行。从前在北京相熟的同乡和朋友，渐渐得到消息，农大学生多回家作特派员，大部分在马日事变牺牲了，计有詹、廖、唐等等，农大方面熟人死的特别多。

一部分在南京作了官，另一部分则逃回上海租界住下，潜伏下来。

时彭浩徐（汪精卫派）原在北大教政治，《现代评论》编辑之一，和胡也频、丁玲、我有些相熟，这时在上海办《中央日报》，要胡也频编副刊，出不到几期，我到了上海后，和熟人一劝他，就辞去了，以后再也没有来往。

时上海小投机商人，看到北新书店印行新文学书籍和办文学刊物经营得法，即可大赚其钱，因此都来开书店，办杂志。计有现代，光华，大通，大东，开明，东群，春潮，不下十多家。规模比较小，带点同人性质的，还有水沫，金屋，新月以及创造出版社等等。趁热闹都来印行新书。不久神州国光社被改组派控制，也大量印行新书。彼此加强这方面竞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每期都各有一万册以上销路，都要小说装门面。此外新的文学刊物《现代》、《文学》、《新月》、《洪水》……都各有大量篇幅供小说作品使用，最能吸引读者的也是小说。事实上新作家作品比较站得住的却并不多。在这种情形下，我便成了这些新出版商人可以利用为赚钱工具之一，从中分润到极小一部分报酬。我为解决家中三人的生活，就根据这个客观要求和个人水平，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先在各个刊物上发表，后来不多久又陆续编辑成集子出版。有一个时期，差不多几个主要大刊物都有我的小说陆续刊载。七八个新书店都印过我的新书，到处门市部都有我的集子陈列。可是日子却依旧过得十分紧张，许多劳动都全被出版商人剥削了。许多书店都营业日上，我们作者却还是难于维持一个中学教员的收入水平。这是一般读者料想不到

的。中国第一期的“职业作家”，大致就是这么工作下来生活下来的。当然这里也有不少人发了财的，如林语堂、张资平、张恨水等人。

为解除这种困难，因此和胡也频、丁玲来办《红黑》，受排挤失败。出了五种丛书，也收回不了本钱，依旧失败了。到1928①年，才放弃了这个妄想，找个固定职业试试看。我随后就由徐志摩的介绍，到了吴淞中国公学教“散文习作”。胡也频和丁玲，则过山东教国文。我在学校教书可以说完全失败。因为不会说话，无口才，只能用另外一个方式求补救，就是写“习作举例”。自己用各种各样不同方法，来写不同故事，作为同学参考。我也通过这个工作，取得许多写作上的不同经验。所以当时什么都写，而且文字风格常有变化，就是受这个客观需要影响。有乡村回忆，有幻想，有社会现实穷富的对照，有恋爱小说。恋爱小说占分量似比较大，有的是写得极露骨的黄色小说，但写作态度还是比较严肃，和当时一般作品不怎么相同，却缺少一定中心思想。因为照本人思想情况说来，实尚停留在“试笔”阶段。书名记得有：《入伍后》、《阿丽思中国游记》、《都市一妇人》、《虎雏》、《从文子集》、《从文甲集》等等。这些作品历来都只当成一个“习作过程”看待，所以在读者还没有忘记以前，我自己早已把它忘掉了。这还是解放以前就这么看待我这份工作的。所以到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印行我的选集时，选入的并不多。基本上还是根据一九三五年良友公司印行的《从文习作选》选出的。

我虽在《小说月报》写文章，可不是“文学研究会”的

会员。虽在《新月》出过好几本小说，也不是“新月社”的成员。和罗隆基、潘光旦、胡适都相熟，他们的政治活动却没有参预，私人来往也不多。同学中也很少特别相熟的人。比较来往多的，还是在北京就相熟的胡也频和丁玲，董秋斯和蔡咏裳等三五人。丁胡虽已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董蔡是地下党员，但彼此之间也无来往。我住在吴淞乡下，正因为人事上十分简单，所以才有空闲用到写作方面去。从来不到什么学校去讲演，最不习惯在陌生场面上说话，内向型的性格束缚得我紧紧的，即有机会在多数人中出点风头，也不希望露面。上海十里洋场，是个吃喝玩乐的地方，我什么也不会。前后住了好几年，只到过一回跳舞场，还是一个亲戚介绍我见邹韬奋时去的。我写的小说触着的问题似乎还广阔，事实上生活范围却极窄狭，比一个普通大学生还不如。因为始终没有打入上海社会任何阶层里去。即作家圈子也是小小的，和同时大多数作家都不相识。上海小报最长于造谣惑众，有一时文坛消息不免常有我的名姓，如何如何，事实上大都胡说八道。南京做官的熟人有一些，却无来往，因为彼此不同道。我不欢喜洋人，也不大欢喜说外国话的洋学生，所以常是我小说讽刺对象之一。

当左联成立，胡也频邀我参加时，即因和许多人彼此陌生存有戒心不曾加入。但是当时和以后，总还是觉得左翼要我帮忙乐意尽力，搞组织工作我实缺少对付人事的能力和机心。对文艺，当时的想法是上海文坛总是争吵得十分厉害，却不能明白谁是谁非，这方面很显然还待澄清。不如不声不响写点作品出来看看，比较实在。这也就是我写了些比较接

近反映现实短篇的原因。说是当时即如何理解革命，鼓吹革命，还是不上纲。因为我和革命斗争现实太隔远了。大约因为写过几篇这种作品，胡也频懂得我性格思想也多一些，所以他被捕以前，还向我提到，有个从江西来养伤的湖南军官，想和我谈谈。当时没有说是谁，后来我猜想可能是陈赓，因为解放后不多久，忽然有一天有人用汽车接我到北京饭店去见过一个年青军官，要我看画，并说早就知道我，没有机会见面。还说他是我一个同乡姓曾的保送过黄埔军校的。他就是陈赓将军。可能一九三〇当时组织上对我还是在争取团结的，懂得我也比我自己懂得还多。我却缺少政治觉悟，始终只想作“单干户”。这么发展下去，又继续十多年，工作和人民大众要求自然日益脱离。不自觉的成了反动派的点缀品。

至于丁玲后来说我“只想作教授，向上爬”，就现在记忆分析，说的不是事实。从以后发展也可证明。我不是作官材料，同时也不是作教授材料。因为在学校就始终不曾好好教过书，也从不在这方面努过力。不会说话限制住了我向这方面发展的野心。我也并没有把作“教授”看成什么光荣。“向上爬”更和我作人性格不相称。我并不想升官发财，也缺少这套本领。我的主要希望，还是如前所说，为整个文学运动短篇小说部门作尖兵，打前站。只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搞出点新纪录，供同时和后来人参考。工作即或寂寞辛苦些也不在意。如说对文学有野心，这就是最大野心！我得不断努力从作品上突破社会目前所有的纪录，也得突破自己取得的纪录。我把创作孤立起来看待，和社会发展孤立起来看待，

这是我的大错。是由于对政治无知，对人民革命少正确认识，而思想又极端脱离社会现实的反映。从以后发展，更容易看出倾向性是脱离人民，向个人主义道路上走去，为势所必然。

本文是作者在文革中分章写的检查交代材料之一，写于1966年末。据手稿全文编入。

① 1928　作者1929年因办刊物亏损，才经徐志摩介绍，于1929年秋去中国公学教书。

用常识破传统迷信

现在提出一点点材料，供诸位审查。这并不是我工作重点，只可说工作中，由于常识积累得来的一份副产物。但却可“即小见大”，看得出若善于运用这份常识，是对于今后古文物（特别是人物画）鉴定方法，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可望把过去附有帝王题跋、名流收藏、专家鉴定形成的假象或迷信，完全加以有力的否定，具有“破”的作用。而且还能得到启发，可应用到其他工作上去的。我这个工作，显明不是为帝王、“权威”服务，而相反，正是扫荡他们“权威”方法之一。工作发展，对于新的中国美术史的写作，许多传世名画位置将重新排列，起一定影响。我深信唯物的“常识”必将战胜传统的“权威”。因为工作方法是遵照主席《实践论》的求知方法，反复求证，调查研究，所得综合文物知识，才能综合运用到工作上去，得到逐步进展的。我深深相信，这个方法若用得对头，在新的中国美术史，中国文化史研究中有一臂之助。

文物界鉴定方法，可说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的问

题。目下说来，还是以封建帝王的赏鉴为主的专家“权威”占一面倒绝大势力。试用唯物论来“破”的工作，还未真正开始。

我工作重点是对于劳动人民文化成就的研究。至于对于字画鉴定，只是有一般常识。不过经常是从一个新的唯物的常识角度，去注意留心，搞研究，求理解，得到点滴心得，才明白这个新方法还可以为“破迷信”做好些工作的。

我到馆中工作已十八年，直到几年前，文化部聘请几个字画鉴定专家“权威”来本馆鉴定字画时，我还只能列席听听，并无发言权。到故宫去鉴定名画时，我即希望列席，也无从参加。去各省鉴定“国宝”时，我曾请求同去，馆中却用“不好照料”为词，不得许可。事实上，就是并无一个人承认我有资格参加鉴定工作。不相信鉴定工作除传统方法以外，还可借助多方面文物常识，来鉴定名画珍迹，也还有些些道理。有时并且还可提出崭新证据，具体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使得这些专家“权威”觉得借助其他方面常识来鉴定字画年代，还有点道理事，我记得只有一次。即在本馆看一幅明清间妇女肖像画时，几个专家“权威”猜谜子一般，或以为明，或以为清，又提不出任何证据，在桌边转，无法决定时，我得便插言说：

“照坐的栲栳圈剔犀交椅看来，是明代常用物。妇女便服衣裙大花朵看来，也是明代喜用而清初已不多用。特别重要是领下那银绊扣，万历时坟中有实物出现，清初雍正画南装宫妃领下还可发现，乾隆时即已用短柄纽扣代替。(康熙时即

已起始！）试从这几方面推测判断，这画必成于万历前后。"

记得当时"权威"之一××点点头说："这也还有点道理！"其实说来，这那里是一点道理问题？基本上是工作方法问题。前者是专家"权威"解决疑难时猜谜子唯心论方法。后者却是唯物常识解决问题，并战胜了"权威"！即使如此，到后还是几个轻视客观实际材料，迷信传统个人经验的专家"权威"，得到旧文化部支持，全国跑去。我想自备费用跟去学习学习，也办不到。

这也不足奇怪，因为不仅是这些搞字画的专家"权威"，对于一般文物常识少兴趣，即搞博物馆的同行中大专家"权威"，看不起文物常识、不相信常识能解决问题、推翻迷信，情形相差并不多。

东北博物馆藏有一批"刻丝"，是老官僚朱启钤用高价卖给张学良，东北失陷，放在伪满洲博物馆。由于骗钱，当时朱某就把许多明清刻丝年代尽向上提，或宋或元，乱说一通。在伪满时，就印成精图，无知日本人又乱说一通。到解放后，这个图录[①]经各地艺术院校争购，高价到达三千元一部。我时在故宫丝绣组作顾问，从东北调原物到故宫，打量作丝绣馆主要陈列品。调来一看，才明白绝大部分号称宋、元时代作品都极可疑，有时简直十分荒唐，因此原物退还。但是专家"权威"还是自以为是，当成"铭心绝品"，交付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业已制成彩版。并作有长长序言，分期断代，说得个天花乱坠。出版社送给我审定，才暂时压下。本人来时，我告他所定时代不可靠，不值得彩印，免误己害人。并具体指出，说是宋代作《天官》一幅，衣上花纹只乾隆时

流行。另一《喜到春来》幅，上面有小鞭炮，更那里会是宋？又一幅定元代刻金佛像，事实上也是乾隆时作，因为故宫还有相同的十多轴。又有幅色彩格外鲜明的《三秋图》，上有“崔白”二字，即定为北宋，不知还有制作色彩完全相同的织锦在故宫，就只作明清间物。……时代有的相差六七百年，通不明白。却根据那么一份知识，来叙述分析刻丝在中国南北的发展，洋洋数千言，那能避免“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经过一再劝阻才不印行。我们并不宜完全否定有丰富经验的专家鉴定。但在很多艺术部门中，丰富的常识经常可纠正专家“权威”之失。同时还可否定许许多多“皇帝御览”或题诗题字的胡说造成的迷信。

故宫就还有这么一个例子。五八九年，花七百元买了个据说是宋代“天鹿锦”卷子，乾隆在卷后题了长长的诗，大大的夸赞了一番。故宫院长和专家“权威”都异常高兴，以为是“原物回宫”，十分难得。丝绣组调来一看，不免哈哈大笑。一个高中毕业学绸缎不到三年的女同志，就看得出原来根本不是“锦”，只是一片“残绣”。大有可能，还是明代太监衣上剪下的残料。只是明代才大量应用这个绣法到衣裙帷幕间，专名叫“洒线绣”。鸟兽水石构图形象，在明刻《大藏经》封面使用锦绣残料多的是。这一来，中学生的常识，把皇帝鉴定或有意作伪也戳穿了。原物回宫，除了笑话，有何意义？

即使事实如此，文物常识的作用，在国内所有大博物馆文物鉴定工作中，还是不能抬头，发生应有作用。主要还是什么徽宗题字，乾隆题诗，和什么名家法眼收藏，以及现代文物研究路线下所特别重视的专家“权威”，共同形成的习惯

势力，占绝对上风。而国内教美术史编美术史的，又以讹传讹，一律照抄。有些能言会说的，还在这个荒谬错误鉴定基础上，骗人说是在用马列主义和主席思想有所阐发，批判承继遗产。那里看得出主席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搞调查研究的深刻含义，和具体实践可能取得的诸多成果？

美术史内容的落后，是和文物研究的方法上的落后，有密切联系的。单独组织一群教授来解决，十年八年也不会得到应有进展和新的认识的。比如谈山水画的发展，如永远摆不脱大恶霸地主董其昌南北宗胡说，还依旧老一套以唐代王、李，五代荆、关为起点。全不明白从战国汉代以来，出土文物金、铜、木、漆、陶、丝，工艺品中反映出山水而成为后来影响发展的东东西西，不下千百种。那里会明白山水画史的发展，主要贡献却是广大手工艺人！事情其实也十分简单，只要把西汉以来大小不同的铜陶博山炉一百个，一一解剖绘成平面，再把五十种汉代漆器上的山云绘成白图，还把十来种金银错器绘成白图，排排队，就将对于山水画的起源和发展有崭新认识。从这些图像上不仅可以看出山头有团尖，而且许多不同皴法，也可以一一引例！这件事在一个文物工作者说来，只是极普通常识，但是却从无一个人肯稍稍费点力，做点比较归纳分析综合工作，得出一定结果。到他搞字画鉴定或对山水画陈列作说明时，手边现成材料不知使用，倒反而回过头来，去向美术史专家“权威”请教，迷信南北宗胡说。主要原因，就是有较多文物常识的人，也不会利用常识，也不重视常识。不明白，他若肯用常识去破除迷信，还可作多少事。其实只要稍稍善于学习，趣味眼界放宽广一点点，不要紧紧捆在考古系或美术史系听专家“权威”那一套，敢

于怀疑，敢于发现，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在文博系统中的专家“权威”迷信，就已经扫荡得差不多了。事实上工作还差得远。甚至于可以说，有许多工作还并没有起始，也极难措手。要定下个较长期工作计划，有一批人扎扎实实的来进行清理工作，到一定时间才会见功的！以字画鉴定而言，许多专家“权威”即或早已死去了，至于留下的错误影响，还是原封原样不动分毫的！

试举几个在绘画史或美术史上重要有名画迹作者年代来看看，就可明白这种人云亦云的荒谬影响，如何深入人心！

一、《洛神赋图》，大都人无异辞，肯定是东晋名画家顾恺之作品。陈列时，专家“权威”既这么处理，写美术史的，也就大做其文章，盲目称赞。

二、展子虔《春游图》，大都又肯定以为是隋代名手展子虔作品。因为上面有皇帝题诗，著录分明，名家鉴定！写美术史的，又不问青红皂白，依样葫芦，完全认可，引例总少不了它。

三、韩滉《五牛图》，因为死去专家“权威”赵子昂有那么多题跋加以肯定。现在的专家“权威”，就不惜花大几万港币，从香港买回来。还以为为国家做了件好事。看看下文，就明白做的是什么蠢事了。

四、《韩熙载夜宴图》，根据传说，作者更像是有根有据，难于怀疑产生时代了。其实从小处看，就大可怀疑，肯定时代较晚。

尽管受重视的专家“权威”，把这几卷画全定为“国宝”，我还是想用常识，试来提出些问题，判断它不是顾，不是展，

有的简直还是假东西，就是那个《五牛图》假处格外显著。

他们的根据不外一见于著录，二有皇帝名流题跋，三经过现代受重视的字画鉴定专家“权威”的认可，即共同形成不可动摇的尊严。但是我却想试来用学习《实践论》求知方法，搞搞调查研究，从人物衣着、车马装备、桌子板凳、坛坛罐罐等等平常事物发展变化出发，来比较综合一番，看看是皇帝和专家“权威”有道理，还是一些普通常识凑合拢来有道理？

一、我说《洛神赋图》的产生，最早可能只在隋唐之间，比顾晚过一二百年，是基于如下常识判断的。

1. 洛神穿的衣服，不是汉晋式样，近北朝时。头上双鬟上耸发髻，史志明载起于东晋末，流行于齐梁，名“飞天纷”。顾如何能预知其式，并画于洛神头上？（一般作神像画，总比本人早一二朝代，才合规律。）

2. 男子侍从和驸马二人，头上戴漆纱笼冠，是典型北朝式样，比顾时代晚上百年才出现。至于顾的时代流行小冠子，文献记录可以和实物陶俑互证。

3. 侍从之一挟两折毡，应即北齐颜之推说的齐梁时髦贵族子弟所流行的棋子方褥，北朝石刻礼佛图和敦煌壁画也有反映。东晋还不流行，东汉石刻更少见。

4. 驸马二人执弹弓前导，应是唐代制度，系贵族车乘出行，用弹弓压迫行人让路。唐制多本于隋，以前即无所闻。东晋时贵族受老庄思想影响，多驾牛车，更用不着这种警卫。

5. 双鬟髻只限于妇女使用。图中冯夷击鼓，却把冯夷当成女人，但又着男子鼓吏短装，不伦不类。是显然不明白双鬟髻用场的后来人所作。（从这种不应有错误看来，画还有可

能产生于五代以后。因为唐代敦煌壁画作龙女天女，有用双鬟髻的。此外唐稿《朝元仙仗图》和王建墓石刻，也用双鬟髻，反映的是所谓“仙装”、“伎乐器”的。）

6. 二船夫衣着完全是北朝时北方劳动人民装束，裤管膝部加缚，具时代特征。敦煌画和龙门石刻均有反映。由汉到晋无此例。

总上六点常识看来，《洛神赋图》最早只能产生于隋唐间。说出于东晋顾，完全是胡说，没有物的根据。

二、我说展子虔《春游图》，只可能是晚唐人喜作的《游春山图》之一，（宣和画谱载有许多种。）也是基于常识判断的。而且用更少事例即可解决。

1. 骑马人和跟随人衣服幞头是晚唐式，和初唐即不合。隋更无相同形象可参。敦煌画多隋衣幞头可证，隋陶俑也可比较。

2. 马匹装备不对。一看即可知比传世《明皇幸蜀图》晚。北朝马多剪鬃，唐更重视，或整整齐齐，或三花五花。惟晚唐或宋绘马，才如此草率。

3. 山石笔姿柔弱，不类张彦远所称展画山石特长如“冰澌斧刃”（即融化冰雪或斧斤削斫）。张见多识广，下笔极有分寸，不会妄说。还有如下材料可证张说可信。

4. 敦煌隋代绘壁画，如维摩变小样，山石多具张称许展画的“冰澌斧刃”姿态。又宁万寿孝子棺上石刻山石，也作此式。可见是南北朝流行方法，并非偶然出现。（传世游春图敷色方法也晚。）

例并不多，可是衣冠马匹难作假，时代性极鲜明。试作些比较，徽宗题字再真，乾隆皇帝题诗再多，也不抵事了。

这画是花了几百两黄金买来的。事实上解放前我就在玉笥山房看过，作过一小文[2]，举出不少例证，没有引起一个“行家”或专家“权威”注意．主要原因就是从专家“权威”看来，我对绘画是不当行，方法也不足取的。

三、我疑心韩滉《五牛图》完全是假的。即或有大量赵子昂的题跋，买来花钱再多，还是假的。

1. 最明显有力证据，这五匹牛的全貌，有四匹可以从清代彩绘《孔子事迹图》上发现，不同处只是在事迹图中缩小了许多。事实上应当是《五牛图》中四匹是根据《孔子事迹图》放大伪托的。一加核对，就可明白。

2. 四牛中有一只还带鼻环，原来在事迹图中，那是一只负辕驾车牛。

3. 有一匹迎面而立，腿臂粗拙，臃肿失形，原来在事迹图中是一只骆驼。腿臂失形，正因为原是骆驼！

4. 也不妨假说，有可能就是赵绘戏题韩作，有如下几点可证：

甲、在赵跋中即露出口风意思。乙、元代企图重儒学巩固他的封建野蛮统治，许多地方学宫孔子庙都重铸祭器，至今还有流传。有可能当时就绘刻了不少《孔子事迹图》。赵见图而戏摹出五牛，托名韩滉。至于清初绘图，又系摹绘旧本，配上满汉文合璧，事情也说得去。

5. 也不妨这么设想，五牛本出于韩或赵旧作，反映到事迹图中，是当时宫廷画师，有意讨乾隆欢喜而画上去的。可是一驾车带环，那有那么巧事？一简直如骆驼，难道因为原画像骆驼，事迹图才改成骆驼？一切说不通。假的还是假的！

这又是从常识出发，用比较法核对核对，就可把这个花了好儿万港币才买回的假画，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的一例。事迹图是故宫旧藏，当时专家“权威”如肯随意翻阅翻阅这些所谓“不入品”的材料，岂不是就可以从它“太相同”处而有所发现，敢于怀疑？

四、《韩熙载夜宴图》因为有个传说，作者更像有根有据，不可怀疑了。其实时代也较晚。这里将试从日常用具常识出发，来作点探索工作。

1. 首先从喝酒用的金银持壶注碗来看，是典型北宋式，而且是北方所习用的。因壶下有棱碗着温水，共成一套，当时名“注碗”，北方各种瓷器均有发现。南方青瓷未见过。

2. 宋画《文姬归汉图》临别时，用同样酒器。

3. 传世胡瓌《卓歇图》（其实是《文姬归汉图》临别场面有所增饰，产生时间也可能晚在北宋末），也持同样酒器。

4. 另一盗出国外《文姬归汉图》，送别场面也用同样酒壶。

5. 宋人绘《洛阳耆英会图》，又是用同式酒器。

6. 别的饮食具高足敞口，和南唐二陵出土此时青瓷式样不同，这犹可说画上是金银器，不是青瓷。

7. 另一卷，还多一段床间布置，床前有一条案，上置镜台，是典型宋式。下铺大花串枝牡丹锦，时间更晚，必北宋《洛阳花木记》、《牡丹谱》等记叙“洛花”盛行时，才会反映到锦缎上。

8. 画中男人多衣绿，和宋人说的“南唐降官淳化时还一律衣绿”相合。如系未投降前李煜派人到韩熙载家写生，将不可能全着绿衣！（在另一文中，我认为这画是北宋时北方画

家在南唐投降以后若干年依据记载传说画成的。)

9. 靠背椅式样也晚。照传统称呼，这是典型“太师椅”，因为靠背平直展开，如宋代官僚平翅冠帽式样而得名，并不是太师才能坐的！这么一来，说它是北宋时宫廷画家依据传说主题而作，也就不会大错了。

此外如传世《簪花仕女图》也晚，因为元和时装那种发髻不作兴戴花，宋代才流行男女戴花。唐代妇女不戴金项圈，画中却有人戴，还是清式！还有个人衣上花缬唐代不会有，画中却用上。又还有故宫曾陈列的题名契丹画家胡虔作的妇女，头上却戴唯有元代才流行的罟罟冠。这都是对皇帝题字、名家鉴藏的迷信结果。

总之，用文物常识来订证名画时，会发现许许多多问题，正如用马匹装备来证画马时代，似不失为一种唯物方法。若善于应用这个武器，是可望把封建时代帝王、名流和作伪商人，以及现代所谓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共同造成的迷信，共同造成的假象，一一逐渐加以廓清，对于新的中国美术史许多引例，都要改变说法，更必须重新考虑的。

目下全国还有成千上万所谓“国宝”名画，都有待重新鉴定，重新估价。仅以故宫博物馆而言，就闻还有八千人物故事画待整理。如破四旧中“破旧文化”一项，并不是把这些画一把火烧去，还是要照主席指示的，剔除糟粕，取其精华，作为社会主义现阶段写美术史或搞博物馆拿来加以利用，新的鉴定工作方法，就值得注注意。肯定是因此一来，总有许许多多过去所谓“国宝”，只不过是“参考品”或“处理品”！有的还是一堆毫无价值的破烂，则事无可疑。

正因为这些文物界的专家“权威”缺少常识，轻视常识，方法陈旧，兴趣狭窄，也还有可能有不少重要故事画，原本时代较早，而被忽视贱视的。特别是工艺画，或田家风俗画，后摹故事画，内多重要材料，可供历博陈列参考应用的，如生产形象，工艺操作形象，生产工具，医疗卫生工具，车、船、马匹交通工具，关津、桥梁、驿运、茶纲、仓库、磨坊，或中外交通，民族生活，以及一系列日用家家伙伙，见多识广，就可更进一步使这些材料活用起来，得到应有位置。不仅有助于新的美术史的编写，即新的历博改陈，这份具体常识，又何尝不可以发挥出更大作用？

工作也平常，也艰巨。说平常，你常识若比较丰富，那么用于破除上千年来所谓皇帝名流和现代专家“权威”的传统鉴定，还他一个本来面目，随手都可以举例，提出意见，供诸商讨，即可使这方面千年来形成的乌烟瘴气，造成的各种假象，一一廓清。也艰巨，就是习惯势力还极大，迷信还极深。因为一般文物工作者，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去对待这个问题，并不怎么费力。若凡事认真的用唯物论去调查研究，去分析综合，首先就得扩大学习面，这就是要付出极大劳动才会得到结果的。若本人学的方法还依旧是传统老一套，或只局限于考古系、美术史系那点点东西，这个仗想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搞不好，还大有可能，不三五回合就被打败，成为专家“权威”旧势力下的俘虏。

因为即使照上面所举数例，对于几个格外著名的传世诸画，提出的新的时代判断，明白传统鉴定方法如此不足信。但是我这些意见，都是要对文物常识相当重视的人，才会引起应有注意和重视，而得到认可的。并且若果你这边固然用

常识打破了“权威”迷信，而在全国许许多多方面文史工作者，还不免是在那个传统势力迷信下作俘虏，作助手，还不自觉，这个仗就不大好打了。

一九六九年五月重抄

原作于一九六八年八月

本文是文化大革命中作者申辩材料之一。现据手稿整理编人。

① 图录 指《纂组英华》一书。

② 小文 作者1948年写的《读展子虔〈春游图〉》，1949年4月1日在上海《子曰》丛刊第6期的《艺舟》副刊发表。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同时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教陶瓷。因为北大博物馆系那个供参考用的陈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赠的，同时还捐赠了些书籍。

到馆不多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学院”学习，约一年之久。临结业前，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自愿填写。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作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询上级，看作什么工作好，就派我去。因为既学习了将近一年，有大半年都是在饭后去厨房服务，和一个老炊事员关系搞得很熟。已对为人民服务不分大小有所体会。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

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

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表示，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因此，即回了博物馆。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同时来的同事比起来，知识都比我扎实得多。有的搞了几十年陶瓷，如傅振伦。有的熟习汉事有专著，如马非百。有的还专史学考古，如孙、姚、王、李诸人。按习惯，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我正因为无知，第一记住“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①第二记住“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性”，第三学习《实践论》，人民日报社论上介绍说“若一切学术研究工作，善于用实践论求知识，反复求证的方法去进行，必可得到新的进展”（大意是这么说的）。又学习过《矛盾论》，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就懂到的点滴，试运用到文物研究，也一定可望取得新发现。明白“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这些原则当时虽还孤零的记人印象中，但试来结合到我对于文物的学习研究上，得启发就太大了。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人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

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

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的就比较落实了。

大致当时从组织上看来，我的工作似太沉闷了点，（或者别的原因）为照顾我情绪，又让我去当时辅仁大学教三小时散文习作，为廿个学生改卷子。不多久，又给我机会去四川参加土改。这期间，我曾写了个《我在文学创作上错误思想的检讨》②，可能是由《光明日报》发表，香港曾转载过。土改工作是在内江县三区产甘蔗出白糖地区，剥削特别严重，蔗农生活多近于农奴。我在总队部专搞“糖房的剥削调查”工作，工作前后约五个月，受到一次终生难忘的深刻教育。本来用意，也有可能希望我就材料写一中或长篇小说。末后因为时间短，问题多，懂的事还不够全面，无法着手，只好搁下。

回到重庆，总队总结发言时，还曾让我就问题作廿分钟发言。我表示完全拥护党的政策③。

回到北京，因参加过土改，对个人写作思想错误，有深一些认识，在学生中还主动自我批评了一次。不几天后，又调我参加文物行业的三、五反，约工作一月，更近于“作

战"。当时全市似约百二十多家古董铺，我大约记得前后即检查了八十多家。馆中同事参加这一战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这也显明是组织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实践学习的机会。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却十分兴奋愉快。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我的综合文物知识比较广泛，也比较踏实，和这次组织上给我的教育机会特别有关。主席伟大无比著作《实践论》提示求知识的新方法，试用到我本人学习上，得到的初步收获，使我死心塌地在博物馆作小螺丝钉了。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

因此，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作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二百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一百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点认识：教书好，有的是教授，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作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

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

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我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学习下来了。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宫直到六四年后，除非什么要人贵宾来参观，高级研究员才出面相陪，平时可从不肯为普通观众作说明的。本馆也有这个习气，惟在专题展时稍好些。陈列改上新大楼，情形不同一点。但是有点基本认识并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陈列的同志，真正明白从作说明员中，同时还可以学许许多东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并不深透，再进而结合文献去印证，去反复印证。所以经过十年八年后，说来说去，永远无从对某一问题的深人。因此到改陈时，就多是临时抓抓换换，而并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的也就是他，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别人一切近于由无到有，却学了那么多，方法、原因又何在？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

正因为那种领导业务方法，不可能使业务知识得到应有的提高，许多同志终于各以不同原因离开了。因此一来，外

机关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会离开了。因为我相信我学习的方法若对头，总有一天会得到党领导认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责任加重是应当的。

博物馆到计划搞通史陈列时，碰到万千种具体问题，都得具体知识解决，不认真去一一学懂它，能解决吗？不可能的！没有一批踏踏实实肯学习的工作同志，用什么去给观众？问题杂，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搞好，还是一个“学习”。所以我继续学下来了。以为我只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其实是不明白陈列说明中所碰到问题的多方面性。一个研究员在很多方面“万金油”的常识，有时比专家权威还重要得多。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活是党为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二、我总想念着在政治学院学习终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三、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许多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得出头绪，而对新的历史科学研究领域实宽阔无边。而且一切研究为了应用，即以丝、

瓷两部门的“古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作。所以当时个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难，也毫无丝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只是感到过去写作上“自以为是”犯的错误，愧对党、愧对人民而已，哪里会是因为地位待遇等等问题？

大致是一九五三年，馆中在午门楼上，举行“全国文物展”。我自然依旧充满了热情，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展出时间似相当长久，因此明白问题也较多。

后来才听说主席在闭馆时曾亲来看过两次。看过后很满意。问陪他的：“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他们回答：“有沈从文……”主席说：“这也很好嘛……”就是这一句话，我活到现在，即或血压到了二百三十，心脏一天要痛二小时，还是要想努力学下去，把待完成的《丝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一一完成。若果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错误，降我的级，作为一个起码工作人员，减我的薪，到三十，至多五十元，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我心脏支持得住，手边有工具书有材料可使用，工作还是可以用极端饱满热忱来完成。而且还深信，这工作是会在不断改正中搞得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老老实实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搞调查研究，有些认识是崭新的，唯物的！我应当用工作来报答主席，报答党。

同样是一九五三年，似九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我被提名推为出席大会代表。我参加了大会。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时，主席和总理等接见了我们。由文化部沈部长逐一介绍。主席问过我年龄后，承他老人家勉励我“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我当时除了兴

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因为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实上在“一二八”时，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战后，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其中一部《长河》，被删改了许多才发还，后来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毁去。解放后，得书店通知，全部作品并纸版皆毁去。时《福尔摩斯侦探案》、《封神演义》、《啼笑因缘》还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说了。我的遭遇不能不算离奇。这次大会经主席接见，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万分感激而眼湿。给我机会在写作上再来补过赎罪。照我当时的理解，这对我过去全部工作，即无任何一个集子肯定意义，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于重新得到许可出席为大会代表了。不至于再勉励我再写几年小说了。

这勉励，只增加我感激和惭愧。这经过，即家中人我也没有说，只考虑我应当怎么办。由于学习了几年主席关于文艺的许多指示，从工作全面去考虑，照“文艺面向工农兵”的原则，我懂的多是旧社会事件问题，而对新社会问题懂得极少，即或短期参加过土改、五反，较长时间却在午门楼上陈列室、文物库房、图书室。若重新搞写作，一切得从新学习。照我这么笨拙的人，不经过三年五载反复的学、写、改，决不会出成果。同时从延安随同部队，充满斗争经验，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壮有为，聪明才智出众超群的新作家又那么多。另一方面，即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同级研究工作人员，多感觉搞这

行无出路，即大学生从博物馆系、史学系毕业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许多旧日同行，学校同事，都认为是不可解的！

工作不可免遇到许多困难，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出于本身的。来自外部，多由于不明白许多工作是崭新的、创始的，带试探性，不可免会走些弯路，必须不断改正，才可望逐渐符合事实，得出正确认识。正应合了前人所说“民可乐成而难创始”，必见出显明成绩后，才会得到承认。例如我搞绸缎服装，馆中同志初初即多以为是由个人兴趣出发，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直到我写出篇有关锦缎论文时，同行中才明白，这里面还有那么些问题，为从来写美术史的所不知。且就这一部门举几个小例，就可证明搞绸缎可不是什么个人兴趣了。

一、本馆建馆时，派过两位同志去上海征集文物，化一千五百元买来一部商人担保是北宋原装原拓《圣教序》。这部帖据说还经由申博专家代为鉴定的。拿来一看，不必翻阅即可断定说的原装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封面小花锦是十八世纪中期典型锦，什么“担保”谎话，什么专家“权威”鉴定，若有了点锦缎常识，岂不是一下即推翻？

二、传世有名的《洛神赋图》，全中国教美术史的、写美术史的，都人云亦云，以为是东晋顾恺之作品，从没有人敢于怀疑。其实若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

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还使用。从这些物证一加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那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

三、东北博物馆藏了一批刻丝，是全国著名而世界上写美术史的专家也要提提的。因为在伪满时即印成了一部精美图录，定价四百元，解放后在国内竟卖到三千元一部。六三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拟重印，业已制版。东北一个鉴定专家在序言中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内中年代多不可靠。有个“天官”刻丝相，一定说是宋代珍品，经指出，衣上花纹是典型乾隆样式，即雍正也不会有，才不出版。其实内中还有许多幅清代作品当成宋代看待。

四、故宫几年前曾花了六七百元买了个“天鹿锦”卷子，为了上有乾隆题诗，即信以为真。我当时正在丝绣组作顾问，拿来一看，才明白原来只是明代衣上一片残绣，既不是“宋”也不是“锦”。后经丝绣组一中学毕业工作同志，作文章证明是明代残料。那么多专家，还不如一个初学丝绸的青年知识扎实。为什么？故宫藏丝绸过十万，但少有人考虑过“要懂它，必须学”的道理。至于那个青年，却老老实实，看了几万绸缎，有了真正发言权。

五、故宫以前化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乾隆题诗认为隋展子虔手迹④，既经过鉴定，又精印出来，世界流传，写美术史的自然也一例奉若“国宝”。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装冠巾

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此外如著名的《簪花仕女图》的时代，韩滉《五牛图》的伪托，都可提出一系列物证，重新估价。过去若肯听听我这个对于字画算是“纯粹外行”提出的几点怀疑，可能就根本不必花费那以百两计的黄金和十万计的人民币了。其中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助”，结果就走不通。而常识若善于应用，就远比专家得力。

就目前说来，我显明还是个少数派。因为封建帝王名人收藏题字，和现代重视的鉴定权威，还是占有完全势力，传统迷信还是深入人心，谈鉴定字画，我还是毫无发言权。可是我却深信，为新的文物鉴定研究，提出些唯物的试探，由于种种限制，尽管不可免会有各种错误，总之，工作方法是新的，而且比较可靠。破除迷信是有物质基础，不是凭空猜谜人云亦云的。将来必然会发展为一种主要鉴定方法。

我在前面随手举的几个例子，只在说明，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主要是求补过赎罪。搞的研究，不是个人兴趣，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的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为毛泽东时代写新的中国文化史或美术史，贡献出点点绵薄之力。

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许多大小错误，曾

初次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一定还有不少未提到处。我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必然也还有待不断改善，并反复检讨和自我批评。现在只是就主席勉励我写作，我没有照指示作去，依旧留在博物馆的前因后果，前后思想，就个人记忆到的说明一下。这里自然包含一点希望，就是可以明白我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权威”，而我的学习，却近于由无到有，用土方法，依照主席《实践论》的指示，搞调查研究，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迷信”、传统“权威”，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一切努力，都是在对专家“权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

我希望在学习改造中，心脏和神经还能支持，不至于忽然报废，而能把许多待进行、待完成的工作，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完成一部分就好！

一个人血压总在二百以上，一天还有一二小时心脏发痛，搞工作的愿望即再顽强，总还是不免要受体力限制，感到生命有限，难以为继。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⑤作助手，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六三年政协大会，我曾提案建议，将京郊上方山藏明锦⑥，经过故宫派人看选过的约一千七百种，调来北京。这案通过后，文化部或故宫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调来，现存故宫

丝绣组。那么一份材料，内中当然包含许多问题，必须加以整理，才能说明白糟粕和精华。若由对问题陌生人去清理，一年半载中恐怕搞不出结果。若让我去参加，至多有十天半月，即可将问题弄清楚，明白来龙去脉，写出简明报告。也算是完成一件工作。所以我希望在不久将来，得到解放后，⑦还能抢时间，先解决下这个问题。

照我个人认识水平，破四旧中的“破”，除对旧文化中特别有由于帝王名人、专家权威、狡诈商人共同作成的对于许多旧文物的价值迷信，以为是什么“国宝”的许许多多东西，并不是一把火烧掉或捣毁，而是用一种历史科学新方法，破除对于这些东西的盲目迷信，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我的工作若或多或少还能起点作用，就继续作下去。我估计，数年前旧文化部聘请的几个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在国内鉴定的所谓“国宝”，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检查一下，可能还有上千种都是可以证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当作“处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参考品”而已。

如我这个工作，在新社会已根本不需要，已不必要，在工作中又还犯了严重过失，就把我改为一个普通勤杂工，以看守陈列室，兼打扫三几个卫生间，至多让我抄抄文物卡片，我也将很愉快、谨慎、认真，来完成新的任务，因为这也近于还我一个本来面目。在新社会就我能做的做去，正是最好补过赎罪的办法！我吃了几十年剥削饭，写了许多坏文章，现在能在新社会国家博物馆作个陈列室的看护员，或勤杂工，只要体力还顶用，一定会好好做去，不至于感到丝毫委曲的。如果在新指示推动下，本馆工作将进入人事精简时期，商讨

到职工去留，从客观说，我的所学，在新社会博物馆工作中已并没有多大需要，从我体力说，又实在担负不了工作任务，只近于指指点点说空话，凡是要用体力解决的我都已办不了，高血压又已定型，身体报废不过迟早间事，为了国家节约，把我放在第一批精简人数之内，我也将愉快接受。即或不做事，到馆中新的改陈要遇到一系列常识问题不好解决时，还是会就我头脑中记下的、理解的，一一提出。外单位美术教育若有新的教材，照新要求应从“劳动文化”着眼，以劳动人民成就贡献占主要地位，求措词得体有分寸，感到难于下笔，要问到时，我的点点滴滴常识，大致还得用，一定也会就记忆到的、理解到的一一说去。在完全尽义务情形下，把工作搞好一点。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于有许多预期为国家为本馆可望进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大致多出于个人主观愿望，不大会得到社会客观需要所许可，因为社会变化太大，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

正因为对世事极端无知，我十分害怕说错话。写这个材料出来，究竟是不是会犯大错误，是不是给你们看了还可请求将来转给中央文革，当成一个附带材料？[8] 因为若不写出来，即或我家中也不大懂得我这十多年在博物馆，究竟为什

么而学，学的一切又还有什么用？

沈从文

1968.12　北京

本文是作者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之一。曾编入《沈从文别集·新与旧》一书。1992年12月由岳麓书社出版。

据《沈从文别集·新与旧》文本编入。

① 作者历来不会准确引用政治术语。即使在文革中易获“篡改”、“恶攻”一类罪名情况下，他在转述政治理论文件原文，或于行文中试用文革语汇时，仍只能做到大致仿佛程度。下同。

② 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以《我的学习》为题发表了这篇检讨。

③ 作者曾在一封家书里谈到这次发言情况：“……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廿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廿分钟，说一半时，却有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

④ 即《游春图》。作者1949年发表的《读〈春游图〉有感》，认为可能不是展子虔真迹。

⑤ 女孩　1959年作者将已故三弟沈荃女儿沈朝慧接来，作为女儿抚养。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被赶回原籍。这里提到的信可能是那时候所写。

⑥ 明锦　指庙宇中所存明代《大藏经》用织锦装裱的经面、经套，近数十年间大量被盗出国外，已所剩不多。

⑦ 实际上作者被宣布“解放”的时间，还在七个月之后。

⑧ 本文原稿是作者获“解放”以后，发还给他的材料之一。可见未能如愿转给中央文革。

陈述检讨到或不到处

我名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快廿年了。并无任何一门专长，只不过是个常识比较丰富的文物工作者而已。一个国家历史博物馆，问题多，杂事多，对内，对外，要的常识也格外多。所以我始终不离开。工作十分琐碎寂寞，通无所谓。文化大革命以来，被称为反动专家“权威”，快三年了，要承认，没有这个资格；要否认，没有分辩能力。血压长在二百以上，心壁磨损已无复原希望。写检讨，写来写去只是消极认错，积极性却在相对消耗，不是办法。因此写这个信，陈述一下检讨到和不到处，供上面参考。

我是个五四以后旧文人，卅年中写了几十本坏小说，在旧社会起过一定有害作用，对于促进新社会的产生，无丝毫贡献可言。解放挽救了我。经过长期学习，几几乎每年都自写份“自我检查”，而用一个“补过赎罪”心情，在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陈列室和库房转了整十年。一切常识就由于这个实践基础上得来的。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虽

有个作协会员名分，在博物馆则算是“研究员”。除了六二年在参观井冈山时，写了几首旧体诗，发表于《人民文学》，此外只在最近写了首《巴黎红五月》（被小将搜去了）半新不旧诗，还像个样子，别的全说不上！事实上，我整十年中，实心安理得极其乐意一面学习，一面作个普通“说明员”，进行自我改造的。即或在某些公众场合，为外面集体观众介绍商讨某一专题性文物问题时（例如外来大专史学系或陶瓷学院、丝绸学院实习生介绍材料，或带丝绸去宁、苏、浙为工人展出协助生产时），也首先不忘说明自己身份位置，只是一个“普通说明员”，“普通工作人员”，既不是什么“专家”，更不是什么“领导”。因为除做事外“名”和“权”对我毫无意义。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过去在写作上我“自以为是”，犯过极严重错误，在新的工作中，总希望不再出乱子就好。即或遇事相当谨慎，并且永远是用《实践论》指示求知识的基本方法，去反复求证。实物不足，再结合文献去相互印证。由于学习主席著作理会不深，应用到工作实践上，只是点点滴滴，特别是个人过去史部学底子极差，因此实物接触虽比较多，而到结合文献互证时，取得的成果，还是极其零碎。且不断的会犯提法上或结论上错误。学习为人民服务，虽热心有余，但认识不足，例如正当新历史戏流行时，我对于好几个新历史戏，如《屈原》、《蔡文姬》、《胆剑篇》、《文成公主》、《武则天》等等服装道具，都提供过材料。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工作组时期，说我是“反共老手”，后来群众改成反动专家“权威”。直到如今。

照我自己认识，过去写作上所犯错误，除五〇年即写过

较长检讨[1]公开发表，且经港报转载外，此后还不断在别的方式上，一再检讨过。这一次又向革命群众作过几次较深刻书面检讨。关于近十八年工作中的大小错误，又另外检讨，举出大小六十事例。有不够处，也难免有过分处。比如检查中自以为是“蒋介石王朝的点缀品”，和事实即不尽符合。五四年从香港《文汇》或《大公报》传来消息，即提起过，我“所有作品，在台湾均被禁止”。受禁止显然即可说明问题，对他们不利才受禁止！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人作品，似即并不闻有同样遭遇！所以说，我一切作品都有利于国民党，给三四十年代人说来，似不可信的！

我生长于湘西苗乡小县城，虽来到大城市已半世纪，还在几个大学鬼混了二十年，乡下气质始终并未去尽。对工作还有热情和耐心，能克服学习方面的种种困难，最初即一无所知，到一定时期，总可望把它搞通、学好。做事从不走捷径，投机取巧。但应付人事，却极端拙劣，无知无能，毫无机心，不会处理，不明世故。比如本馆有五位馆长，十八年来就有好几位馆长家中，我始终还未到过一次。即此一事，便可知我那里会对馆中“争权”“争位”有什么野心兴趣？

“能处常而不善应变，能任劳而不善任怨。”缺点显明，无可讳言。因此弱点，在冲击中报废，也十分自然。

比如说，我搞的综合文物，是种十分费力不讨好，科学院或大专院校史学家照传统习惯，从不承认这也算得是什么学问的。至多叫个“万金油”，毫不觉得重要的。只有我自己明白，一切文物制度常识，若比较丰富踏实，对各方面都还有帮助。除本馆陈列说明应用得上这种“万金油”，其他专题性博物馆，如军事博物馆古代部分，除兵器本身外，如何应

用作战，以及如何作战宿营，步骑配合……都得从形象取证！此外乐舞博物馆，服装博物馆，陶瓷、丝绸博物馆，有需要时，我的常识，都或多或少可提供些资料，配合服务。此外常识当成副产物，至少还可用于两方面：

一是大专院校文史系教古代文学或史传文章，会遇到一系列东东西西，说不清楚，注不明白。查书无可查，查到了还是不明白。事实上博物馆却有上百万实物睡在库房中，无人过问。教书的永远是停顿到抄来抄去阶段，从来不会有人想到郑玄、刘熙博学注不清楚的事物，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认真学习《实践论》，能有所会通，就会把它弄得十分明白清楚。而且还可以成为“常识”。记得为解决科学院文学所注解古典文学的麻烦，即曾正式向何其芳建过议，要正视这个问题。从所中抽调个年轻研究员，来馆中学习，或带着问题学，或广泛学，有二三年时间，帮同他搞点资料，用处大而多！不重视，因为前无此例。事实即是老办法抄书，极省事。新方式，一样一样学去，较困难。所以也可以说这份副产物虽有用，还不得其用。这里也似乎即有唯心唯物两条路线的斗争！

其次，即用来破除历来传统鉴定字画旧方法形成的一切老迷信，用处更大。不问是什么“徽宗”“高宗”“章宗”“乾隆”的皇帝题字作诗，还是近千年来的名士专家题跋鉴定，一用衣冠器物制度常识作新的综合分析判断，许多名画珍图产生的年代、作者，就成了问题。或许有的“国宝”，便成为假的破烂，成为“参考品”或“处理品”。这从实际说来，我用的新的唯物的鉴定方法，正是破除帝王名流专家“权威”迷信最有力的工具，工作是值得鼓励，值得推广，还可望从不断充实改善中，成为毛泽东时代用《实践论》为学习求知

识基础，来破旧文化中字画鉴定法积习迷信十分有效的。是用土方法战胜洋教条旧传统一项新试探。工作本来是进取的，向前的，同时也近于革命的。可是若尽把我向反动专家“权威”名分上推，我既毫无能力来作任何分辩，也不可能来和这种传统荒谬进行斗争了。不过心里殊觉得“真可惜，这一冲，别人可不当回事，我这脆弱神经可全崩溃了。许多对于打权威共同提高所作的努力，全完事了。对国家说，似不大经济！”因为据我所知，训练一个文史教授或专家，还比较容易，训练一个“有常识”的文物研究员，而这份常识又纯粹奠基于一个“物”的基础上，实在不容易。这从国内文博现状也可以明白的。学院式学考古，懂金石文玩的人，有的是。有文物常识能有所会通，应用到工作上能有所发明，有所发现的可并不多。

据我所知，文物界鉴定字画方法，是有路线斗争的，目前还是在旧式唯心论或经验论专家“权威”占一面倒势力。一切听他们的意见，浪费了许多国家钱财，收了许多时代有问题，作者有问题，又或从个人趣味出发，用高价收了许多不必要的文人写意画。皇帝全死了，专家“权威”也死了，他们共同对这幅画作成的荒谬鉴定，却并不失去作用，无人敢于怀疑。

前几年，旧文化部花了许多钱，聘请了几位海内著名字画鉴定家，去全国鉴定“国宝”时，我只除了看本馆藏画，可以列席，过故宫看重要名画，即请求列席，也不许可。至于跟着全国去学习，更无可望了。即明白知道，一谈起“南唐”、“宣和”、“绍兴”等等装裱、隔水、引首、册页面等等，必然会要牵涉到绫锦时代、名目问题，无从含胡。有关这部分材料，我应当有较多发言权，不见过不明白的，也应分让我有机会看看。

因为明明白白国内懂这一行，学这一行没有几个人。何况我去对他们工作有显明帮助，还是不让我去。主要理由就是我不懂字画。事实上，有千百种专家“权威”不易判断时代的画幅，特别是人物故事画，或有车乘马匹日用家具的山水卷子画，从衣服制度和身旁携带日用家伙等文物常识，都可以得到许许多多有力旁证。可以帮同判断出相对年代。

例如马匹装备，从头到尾，都充满时代特征，更容易并合其他材料，判断年代。即或只是一只孤立的鹰，鹰脚下站的那个锦垫，若上有花纹，也即是一种线索，还可以估计出年代！但要的是对这样那样都“有常识”，若极端轻视常识，那自然就只好大家围着画猜谜子了。就我所见，《洛神赋图》、展子虔《春游图》、韩滉《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有的花了几百两黄金买下，有的还派了人去香港花了若干万港币收回，目前都当成“国宝”看待。用我的常识来破，时代作者就都不可靠，都有问题。有一画还假得十分可笑的，即受专家特别称赞的《五牛图》。

正因为旧文化部领导人，只知重视专家“权威”，而轻视文物“常识”作用，所以从不要专家也认真学学“常识”。记得历博十多年来曾举行过一系列文物展，对于古文化史有千百种新材料出土，千百种新问题发现。我长时期在陈列室作说明员，就从无一个什么“艺术家”或“专家”或大学文史教授向我提过一个问题，大多溜了一转，就不见了。似乎什么都不必学，一看即懂，这是可能吗？

例如故宫有个鉴定字画大专家，有一年，把一幅元人画戴罟罟冠小画，照什么“御题”“御览”称作契丹画家胡虔作品，陈列出来。我曾好意告他：

"这不会是胡虏。"

当时就悻悻然说:"你怎么能断定它不是?"

"因为帽子不是。"

"胡虏时女人就不戴这种帽子?"

我明白他一面是不承认我对字画有发言权,其次是相差三百年契丹和元蒙妇女帽子的区别他毫无兴趣,就不便告他"那帽子用的是什么材料做的也知道",不再说下去了。

这小小事例,并不妨碍这个专家的真正长处。但也可以看出,用《实践论》求知识方法学来的广泛文物常识,作为有力的武器,来攻打文物界字画鉴定"权威"顽固堡垒的工作,还未真正开始。工作也还十分艰巨。因为首先是搞文物工作的人,即还有大部分不知重视文物常识,依旧迷信"权威",绝想不到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事事物物,若分别明白它个别历史发展性,和彼此相关性,用来鉴名画,打权威,判真假,定时代,是种有力武器。用得其法,即或不起主要作用,也还可以起辅助作用。若搞文物的还多不知手中有武器可用,至于写美术史的,居多手中只是一支笔,除了结论照抄,自然就更说不上特殊眼光了。这人文笔越好,即只能越会夸大胡说,更加引人走入迷途,扩大艺术批评中唯心论市场。这市场,且因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设立,而加速扩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斗争,还是很不容易进行,可能还得经过些曲折,并不是短时期即可见功的。

若我早日得到解放,短时期又不至于被高血压心脏病收拾报废,幸而能活得稍久一点,抢抢时间,挑几十幅被专家"权威"奉为"国宝"的名画,试用土方法学来的文物常识破一破,就这

个领域的唯心唯物作一回较量，看是谁有道理，即可证明严格遵照主席《实践论》所指示我们学习知识的方法，得到的常识，将显示无穷威力。而所谓一堆皇帝和专家“权威”的鉴定，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推翻，还它个本来面目。

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行三年，各方面都取得全面胜利。艺术方面八个样板戏剧歌舞成就更为世界所公认。惟在文物系统方面，直到如今为止，多只听说某某金石专家“权威”，某某字画鉴定专家“权威”假公济私，营私舞弊，低买高价售出，一经揭发，便搞垮了。从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私生活破，固然也是一种扫荡。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名家法眼”权威性，还是并不曾动摇分毫。甚至于在他们死去以后尚有长远影响，附着于那些名画中，流毒下去。

如条件许可，又有需要，我希望能作个小文，先试来破一破。他们私生活已有了大量揭发，不待说了。即谈本业，从讲道理出发，也一定会把一些帝王名士、专家“权威”对于若干名画共同作伪造成的假象，用常识判断为“呀呀呜”，这个破便大大不同了。这是不甚费力即可作到的。

若把我本人尽长远搁在反动专家“权威”名分上，这种破的工作，是不可能进行的！

本文是作者上交的申诉材料之一，写于1969年春。

据发还原稿编入，原无标题。

① 较长检讨 即《我的学习》，1951年11月11日发表于《光明日报》，11月14日香港《大公报》转载。编入全集第12卷。

外调出版总署编图录经过

大约是一九五六左右，在人民大学教书苏联教授尼几希诺夫①来馆参观陈列，馆中派我作说明。每天只参观二三橱柜，询问得极详细。前后约看卅天才完毕。记得遇到橱柜中陈列文件，如曹植、李白诗和别的文集，还得为一一解释内容意义，和他们在文学史中地位。初初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看得那么细致。

后来不久，就调我去出版总署，参加《中国历史文物图谱》②工作。计由如下诸人组成编委：

一、出版总署金灿然，

二、苏联教授尼几希诺夫，

三、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崇武，

四、历博沈从文，

五、业务助手谢家仁（北京市师范学校教师），

六、另一在出版总署工作的女同志

到后才听金灿然说，系由苏联教授尼几希诺夫建议，就历博陈列编一图录，专供苏联中学历史教员和史学系大学生看。建议得到总理同意，来进行这一工作。我们分工是我作文物说

明，王、谢排历史秩序，金、尼、王、我、谢等共同商讨，通过后，即继续下去。照尼意，要求不必过高。一切从现实出发，因为基本上照陈列作去，已能满足需要。但工作一进行，就发现了问题。王对历史提法要求高③，他专搞明史，自己又写不出适合要求的简明扼要说明。特别是文物难于结合，得从陈列以外找材料。例如用吐蕃会盟碑，拓片，缩小到三寸左右，一片模糊，说明不了问题。动不动就和金、和我发生争执。当时我不明白原因，不必生气事为什么也生气？后来才知道他肝病严重，不久就死了，工作无法继续。反右时，停顿了一阵。出版总署拟印廿万册，据闻纸张也准备好了。部分稿件送科学院通不过。所以后来又改组编辑委员人选，在文化部开了次会。记得有吴仲超、郑振铎、张政烺和我等共十二人。由张政烺为责任编辑，组成一中国历史图谱编辑工作室，在建国门内科学院一楼中办公。有五六个专家，他们全国到处跑，到处摄影搞材料。但是几个人对文物知识除铜器外，别的都不在行。如把江西南昌博物馆藏伪成化瓷盘（实是雍正时作）当真成化。作说明更难中肯。我名分上还是编委，事实上已不过问。这图录大致只能中途搁下。

本文是文革中作者按专案组指定问题所写专题交代材料之一，写于1969年4月左右。据手稿编入。

① 尼几希诺夫　当时中文译名实为尼基甫洛夫。下同。

②《中国历史文物图谱》　1956年曾用《中国历史图说》为书名进行编辑工作。

③ 要求高　作者的隐晦写法。指力主在所编书稿文字中，必引用许多马列经典论述。

最后检查

最高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

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

实事求是的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

首都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位领导，历史博物馆大联委和革命战士：现在给我机会，让我来说说我的问题，检查我政治历史和业务思想的过错或罪行，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大一次教育。我表示衷心感谢。因为时间久，问题多，又限于个人思想认识水平和身体情况，这个检查肯定是不够全面的。不够处，不透处，不对头处，盼望批判纠正。有必要时，希望过一阵再作补充。有过就改，我觉得是完全应当的，必需的。特别是像我这种思想极其落后的人，若不要求自己分外严格，是不配和亿万中国人民共同进入无比伟大光辉七十年代的！

一　我的简历

我生长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州的凤凰县，是个极小山城，到现在还不过二万人。地方小而偏僻，四围被山包裹，文化落后。照老话说，影响到人性情，即“心胸狭隘，眼光浅短，性情保守。”就一般说，有一定道理。我并不在例外。我出身于破产官僚地主家庭。十五岁在本县小学毕业后，就离开了家，在本乡军队里作司书，转业又失业，在一条沅水上下游十多县，混了五年不易设想十分辛苦的日子。收入最多时，每月从未超过

九元钱。因为受五四运动影响，在一九二二年①廿岁时，努力摆脱那个可怕旧环境，空身跑到北京。想半工半读，当然办不到。想卖卖报，也不成功。就从标点符号学起，学写小说。希望能在这一方面作个“打前站的尖兵”。不想成功也不担心失败。经过学习上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都克服了过来，大革命前，就印了两个小说集。一九二七到上海，正值新出版业兴起，相互竞争，利用作家赚钱。我正年青力壮，工作抓得比较紧，于是，不到几年，就成了个流行“知名”作家。就这样，还是不能维持一家三人的生活，因此才去私立大学教书，教的也是这一行。除一九三四到三七，这一段时间不在学校，此外前后约二十年，始终是一面写作，一面教书。前后换了五个大学。解放后，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直到如今，又整整二十年。

二　我在廿年文学创作中所犯的过错或罪行

我前后四十年具体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解放以前廿年，主要是搞短篇小说。写的是小说，教的是小说，看的是小说，谈的还是小说。长远用个学习试探工作态度，先后印行了六十本书。内容绝大部分是乡村故事，小部分是浪漫幻想和对于大城市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带讽刺性故事。从时间说，可分三大段落：

1、由一九二四初学用笔到一九二七大革命，前后四年，是第一阶段。印了两本习作，对社会毫无什么影响，给读者留不下什么印象。

2、由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抗战，前后约十年，是第二阶段。我一面教书，一面大量写作，工作能量大，有好几年，几几乎南

北重要文学刊物，都登载过我的小说。上海十多家大小新书店，都出版过我的新书。文字也因为长时期工作实践，而越来越成熟。加上后几年在北京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报纸销路广，读者多，影响也因此更大。作品放毒作用，也因此加大，加深。

3、从抗战后一九三八，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系教书，到胜利回北平北大，到解放，前后又经过十年，是第三阶段。这十年，一面是个人身体不好，心情消沉，家中有一亲戚，发疯死去；一面是客观社会变动剧烈，难于适应。我在写作方面，可说走了下坡路。平时作品和付印新书，又经常有被禁扣事。除小说外，我还写了些抒情散文，和书生气十足的时论。前一项，多是在乡下田野间沉思默想的结果，文字越来越生涩，读的人已不容易懂。后一项无一定政治观点，只近于随感即兴文章，凡事主观唯心，思想混乱反动，十分显明。回到北平后，还继续有所发展。

我前后廿多年搞的文学创作，主导思想，完全一贯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思想、观点、立场、方法，进行工作的。因此写农村，容易美化农村。写农民，又容易歪曲农民生活现实。我的文字技术越成熟，题材越多样化，影响社会读者面越广大，我的毒害青年群众的罪过，也越加深。我即或也写过了些同情革命的作品，故事多从友朋经历，加以假想完成，浮光掠影，实在不深不透，情感也不够饱满。全部作品主要倾向，本质意识，是极端害怕现实、逃避现实、脱离现实。近于用不现实幻想麻醉自己，毒害青年。

我本来不懂政治，甚至于基本政治常识就极端缺少。也并不搞政治投机。抗战后十年中，在昆明和北平，都写过些时文

杂论，思想意识是反动的。一面对于现实政治的极端无知，一面却自以为是，主观唯心，夸夸其谈。这就不可免犯了许多大小不同过错。比如在昆明，联大同事大谈民主时，我就曾写过一篇《我们要个第四党》，一切从假想出发，把本来就附属在大资产阶级下，十分软弱无力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作用估计极高，以为今后应当自尊自重，好好团结起来，在两大之间，起平衡作用。谁真正爱国家就拥护谁。这个不切实际文章，虽然被国民党禁止发表，过不久，并且在昆明出的《扫荡报》，还大骂了我一阵。事实上，我那文章的思想本质，还是唯心的，落后的，反动的。是倾向于议会政治，对它有一定程度迷信的。

回到北大后，我又写了好几篇文章，内容调子相差不多。有的还更坏，更反动。西安延安不分。对国民党固然不抱什么希望，对人民解放战争，也同样报着怀疑悲观心情。对伟大领袖，也犯大不敬，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我廿多年，始终一贯顽固主张“争取写作自由”，“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在国统区某一时候，虽还有一点点意义，从总的说，就只能在蒋介石统治下万恶腐败政权起点缀作用。作家不参加进步政治，正是这个卖国贼求之不得的。我始终不加人过什么进步或反动文学集团，永远是个“单干户”。但是，却正如伟大领袖指示提到关于小生产者的长处和弱点，工作虽能勤勤恳恳，受的局限性却极大。明明白白反映到我的思想和工作中。因为作品多，思想性不强，实质上在社会起的坏作用，可能正是十个或更多国民党作家所作不到的。我的写作，表面上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事实上，实受一种反动妄想和更大野心所支配，就是工作的结果，很有把握，十分自信，将把十九世纪旧俄作家契诃夫的地位，取而代之。总而言之，我想的总是自

己工作的进展，而不是中国亿万人民的当前和明天的命运。因此，对人民革命，解放前，就始终缺少应有的深刻认识。正如毛主席最高指示，一个人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就是个没有灵魂的庸人，或灵魂肮脏的混蛋。

我编了官僚资本作后台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多年，又编过其他一些副刊，就是作了这些反动报刊的伙计和帮闲。也就不自觉的间接作了窃国大盗蒋介石反人民工具。尽管根据一九五四年香港报刊消息，我的一切作品，在台湾就全部被禁止出版，（此外在国内的其他作家作品，如巴金、曹禺、茅盾、老舍，均未闻有相同禁令。）这个消息，虽能说明我和国民党始终不是一道。我的作品总倾向，必不利于国民党，才会有这种禁令。但是，并不能因此把我在写作中脱离人民的种种严重过失，就一笔勾销。

解放后，我曾写过几个信给党中央，承认廿年写作脱离人民的种种，悔过认错。五〇年又写过一份自我批评[②]，约五六千字，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香港报刊还转载过。党虽不咎既往，从我总的历史发展看待我，廿年来，不断给我以思想改造教育的机会，参加政治学院学习一年后，不久就参加四川土改半年，一回北京，又即刻投入三五反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的生命就是党给抢救回来的，一切都是党给我的。组织上还对我加以种种特别照顾，并且给我以极高政治待遇。五三年文代会，让我出了席，伟大领袖接见我时，还勉励我再写几年小说，使我深深感动，终生难忘。五四年又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大会，延续十多年。但是，我自己，总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过去在写作中所犯的严重罪行。也因此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认为是一种完全的失败，结束了写作的妄想。用一种极

其单纯的“补过赎罪”的心情,心安理得的在午门楼上陈列室里,做一个螺丝钉。只希望在新的集体工作中,能少出点差错,就很好了。工作十分琐碎寂寞,也全不在意。凡事由无到有,才逐渐积累点滴常识。正因为虽反复学习主席文艺思想,却不能够好好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因此,廿年来做人方面尽管极谨慎小心,学习业务方面,也不敢马虎。可是,思想改造抓得不够紧,有关党内阶级斗争文件多看不懂,因此新的过错,还是不断出现,无法避免。

三　我近廿年在文物工作中所犯的过错或罪行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受了一定冲击,家中前后查抄了四五次,因为压缩住处,工具书全部散失,除深深感到恐怖外,对于运动伟大意义,实在缺少应有认识。一切从个人出发,求理解,就是不懂。还以为近廿年我并不反党,不反对主席,热爱新社会,热爱工作,既不徇私舞弊,又少个人野心。对我冲击,多不经济!因为文教系统训练一个教授,比较容易。至于图博系统培养一个有丰富实践知识的文物工作者,实在相当费事,费时间!特别是因为我的一个内亲张以瑞,在体育师范学院被谋害后,反被谋害他的人诬为叛国自杀,一时无法澄清,更增加我头脑纷乱。经过长时期学习,又得到家中两个学工的孩子和搞文学编辑工作的爱人帮助,才慢慢明白事情较多些。才知道这是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革命,防修、反修一件大事。是在全国进行一件极其严肃,又格外复杂的阶级斗争大事情。规模之大,真不能令人设想!斗争既十分尖锐复杂,不可免会有各种牺牲。再回头来看看个人所受的冲击,就未免太小,太

小，太不足道了。而且革命群众揪我，向我敲警钟，是完全应该的，十分合理的。也等于第二次对我的挽救，可即早刹车。从这点认识出发，来反复检查自己这廿年的工作，用主席文艺思想一一核对，才逐渐明白认识，由于个人旧思想没有得到较彻底改造，并未能建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新的业务上，稍稍加以清理，近廿年中，至少就有四个或五个方面，我都犯了较严重错误。

第一个方面，本馆黑陈列中，对于突出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关绘画加工，我都出过不少主意，扩大了历史陈列中封建统治者的影响。这些不同画像，分布于两楼十分显眼地方，并且极其引人注目，我是有一定责任的。

第二方面，是当封、资、修复辟，为修正主义鸣锣开道而产生的大批新历史戏，前后出笼时，我为协助演出，曾十分热心，提供过一些有关服装、道具、人物形象资料。计有郭沫若编的《屈原》，《虎符》，《蔡文姬》，《武则天》；曹禺的《胆剑篇》；田汉的《文成公主》；和梅阡改编歌颂叛徒的《桃花扇》。这些戏，究竟那几个是毒草？目下似乎还少定论。这些戏引人向后看，则事无可疑。前后演出了好几百场，演出越成功，我的服务帮忙的罪过，也自然越大，越严重。

第三方面，是五三年后，琉璃厂文物业经过三反，市面古董极不值钱。国内一些大专院校，因为求教学便利，建立文物教学资料室，曾有七八个大专院校历史系，托我收集过大量封建文物中的陶、瓷、铜、玉、漆、丝。有的文物室规模之大，竟和中等省市文物博物馆相差不多（例如东北人民大学，就和青岛市博物馆差不多）。当时还认为较好解决了历史教学问题，扩大了文物学习范围，对研究中国文化史，能

起促进作用。收购不足，常把私有的也捐上。现在经过学习，才有了些较新认识。这种工作，明明白白是在扩大封建文化的阵地。是引青年人向后看，不是向前看的办法。不仅无功，还是过错。应当在我分上记一笔，才合情理！

第四个方面，是关于协助工艺美术院校专题教材的编写、校订工作。文化部、高教部六〇年召集的教材编辑会议时，我并不曾参加。只是会后落实到工作，教书的实在搞不下时，才问到我。我又以为既是中央布置的工作，就有义务帮帮忙。赶忙向故宫和本馆联系，成立个工作室，给以种种便利。并十分热心的，为提供介绍大量有关图录、文献，和图像资料。前后完成计有中央工艺美院编写的《中国丝绸花纹简史》，重庆美院编写的《中国漆工艺简史》，中央、重庆、南京三院各编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又景德镇瓷器研究所编的《中国的瓷器》和《景德镇瓷器》二书。一共七种。前二书已付印，未公开发行。中三种，均油印试教过。后二种均出版，经我校订，有我作的序言。本来用意，是通过这些材料，可以让学生比较有条理具体明白我国工艺各部门的历史发展不同成就，明白什么是“优秀传统”，可作借鉴，达到“古为今用”目的。可是，经过新的认识分析，这些教材，也不免容易产生副作用，形成“厚古薄今”的影响。而且内容取材，是面向专家干部，不是面向工农兵，方向大有问题。反映我受驯服工具论的毒害，实在已经相当深。我只知道旧中宣部属于党中央，那知道两个司令部问题？

至于第五方面，是另外两份由上面下交重要工作，都近于党对我政治水平和业务知识双重的考验，我都不能较好的把任务完成，不是交白卷，就是交黑卷。更加深深觉得对不

起党，对不起人民。前一份工作，是五七年调我去出版总署，和苏联专家尼几希诺夫等五人，用本馆陈列作根据，同编《中国历史文物图谱》。对象是苏联中学历史教员和大学历史系学生。如照原来要求作去，是可以如期完成的。因为到具体工作时，比原来要求计划偏高、求全，而五人工作小组意见又难一致，使得工作经年后，终于停顿。（后由科学院、故宫、历博、文化部另成立十二人委员会，由科学院七个研究员作具体工作，另起炉灶，编了十年，还是难于完成。）后一份工作，即《中国服饰资料》，是由我馆陈乔主持，由我个人负责选材料，写说明，美工组绘图。障碍既较少，进展也较快。但是，试用新的要求来衡量，内容自难令人满意。从时间计，不到一年，可以说是个试探性未成熟的工作。从内容看，也可以说是个未出笼的“毒草”。内中帝王将相不算多，才子佳人中的妇女形象，占分量比例未免过大。说明也芜杂枝蔓。经过这两回工作实践的考验，充分证明，我虽有的是挑重担子的勇气，可是，不仅政治水平太低，业务水平也还不过硬。一年时间内不能较好完成这个任务，是必然，不是偶然。

这不过从一大堆事件中，仅仅提出五个方面比较重要事例。事实上，我这廿年在本馆业务工作上，犯的大小错误，绝不只是这几个方面。群众对我敲警钟，等于及时挽救我。我应当诚心诚意表示感谢。因为明白了错误，才可望针对错误，认真加以改正，对人民事业，才叫做负责。

四　经过三年学习，对我过去错误或罪行的分析认识，和此后努力方向。

我这一切过错和罪行，都并非偶然产生，实在和我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分不开。

1、我出身于破产官僚地主家庭，虽然十五岁就离开了家，阶级烙印还是相当深，剥削意识还是相当浓厚。反映到此后生活中机会不太多，反映到作品中，却影响较大。

2、我生活发展也可说“不大平常”。因为从标点符号学起，不到十年，就粗制滥造完成了五十个小说集子。从小学毕业，转到大学里教书，一混又是廿年。从这两件事看来，个人向上爬的思想，实整个支配着我的身心。在任何时候，总是为了工作而忘了其他，也包括忘了自己。这种极有危害的个人自我奋斗的思想意识，不仅反映到解放前二十年从事文学工作中，也还继续反映到在历博二十年文物研究工作中。从好的一方面说，凡事由无到有，认真落实搞调查研究，用个三五年时间，在某一部门或若干部门，都有了发言权。得来的知识，也是比较唯物的。但是，从坏的方面说，一切忘我努力，其中还是有一个“我”。好强争胜个人突出的“我”。因此，工作方式就不免极端脱离群众。从客观看来，更不可免会成为“白专”。容易见得个人突出，而不善于和同事一道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

3、我是个非正途出身的文化人，也非学校出身的文物工作者，并没有受任何旧框框成见所束缚，也不受任何做学问传统成见所束缚。又来自社会底层，比较熟习的，也是旧社

会小城市小市民、小公务员、小商贩生活，和小城市水码头劳动人民生活。但是，一入大城市后，用不到几年时间，就混入旧社会上层文化系统中，一混二三十年。过的生活虽比较简单，同事同行相熟就并不多。凡是时髦玩意通不会，而且前后在五个大学里工作，有四个学校就都在乡间，和市面距离极远。不过，究竟是在旧社会上层文化系统中混，接触的大多数是英美派或欧洲学院派伪自由主义者。读文学译著，除中国四部书中的子集一部外，十九世纪欧洲和旧俄作品占比例又大。因之，思想意识必然还是受有一定影响。也可说，实在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十分显著，十分浓厚。

这三个根源，反映到个人工作，就不可免出现如前面检查到的各种违反主席思想的过错或罪行，而不自觉的为文艺黑线效了劳，服了务。业务方面学得越多，对外服务越热心，过错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就是虽学习了主席文艺思想，也体会到它的无比伟大，却永远没有较好的用作指导，应用到一切具体工作上，日常行动上，和思想改造上。经常还抱着一种错觉，以为廿年来在业务上已尽了一个研究员应尽责任。业务虽不够专，但较博的文物常识，总还是比较踏实，配合得上目前需要，不完全算是“齐人滥竽”。又并没有什么权利野心。所以文化革命运动以来，成了冲击对象，初初实缺少应有认识，而且是长远怀着一种恐怖印象过下来的。经过反复学习，反复检查，同时也得到家中人的种种帮助，认识上才逐渐有所提高。再试从一个产业工人或一个贫下中农角度，来看我算个什么货色？进一步学习和检查，才觉得错误或罪行的严重。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我作事，就尽作错事，作坏事；不作事，又简直成了一个文化官僚。实在对

不起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经过长时期反复思考，使我认识到，我的思想、觉悟、品质、能力，严格说来，都不配在新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占据研究员位置。所以打量③正式请求降我的级，减我的薪，今后最好改作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不要再搞什么研究，只做一点一般抄抄写写资料工作，兼经常搞点卫生间清洁工作，拿点生活费，都毫无抵触情绪。相反，倒可望不至于再冒充专家内行，害人误事。

我体力既受了一定限制，已失去正常工作能力，思想水平又不高，搞的研究工作，正如革命战士指出，方法且大有问题。为人性格又极端庸懦无能，胆小怕事，能任劳不善任怨，一受冲击，长远即感到害怕。努力消除影响，还是不易回复工作信心。所以到本馆精简机构时，如把我放在第一批精简名单内，我也乐意接受，免得变成年青人前进的绊脚石。（虽然本意是作他们的垫脚石，不是作绊脚石。）

即使免职退职，我还是将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好好学习下去，工作下去，有一分力，出一分力，有一分热，放一分光。加强自我思想改造，由赞美人民革命事业出发，来把部分对人民还有用的知识，无保留的贡献出来。由于长时期高血压心脏病，我的可用生命已有限，报废只是迟早间事。我对于主席的热爱和尊敬，对于新国家的热爱和期望，将是永远的。我过去糊里糊涂粗制滥造写了六十本书，在新社会完全被否定，是理所当然，一点不觉得可惜。解放后，我另外还搞了些研究工作，多属封建文化范围，对新社会也无多意义。只写了几百字，觉得还能代表我近廿年的一点心情，那就是六二年春节，在江西革命圣地井冈山茨坪招待所红楼上，

写了一首《井冈山清晨》五言诗，和一首为上山青年五年纪念《庆佳节》五言诗，算得是一生最有意义的劳动。因为几首诗得到的较好反映，我因此还抱有一种妄想，今后如能有机会，使用这个文体形式，来赞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领导下，亿万人民共同在前进中的一切光辉成就，一同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运动中取得的无比伟大胜利，我一定将继续努力作去！

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沈从文

一九六九，六月

本文为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解放”前，所写的最后一次检查稿。同年9月作者在一封信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形：

> 我已于六月里正式解放，在一个团结会上宣布的，手续似乎比所有熟人简单许多……三月前，写过一次字数不多比较完备的检查，主要是过去写作上的思想反动，分别在三个排会上谈一次，就通过了。得到解放。

据手稿整理编入，标题为编者所拟。

① 一九二二年　实为1923年。

② 自我批评　指《我的学习》一文，实写于1951年。同年11月11日发表于《光明日报》。

③ 打量　原稿旁又写有“决心”二字。

谈话及其他

谈话及其他

TANHUA JI QITA

本集为新编，收作者在不同场合的谈话记录、发言及建议文稿等，共10题，实收8篇，除【备考】《今日文学的方向》外，作者生前均未发表过。

《一个长会的发言稿》和《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已分别编入全集第14卷和第12卷，本集存目。

关于说书

一

说书的风气，是从唐代庙会中发展起来的。到宋代就正式成为一个群众娱乐节目，分门别类十分复杂了。宋以后几个重要长篇小说和无数短篇小说，都是从这个方式下产生的（如《水浒》、《西游》、《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等等）。本来一部分说佛经，一部分说通俗故事。故事又分有韵和无韵的。有韵的变文，发展下来为明弹词，即是长叙事诗（唱本小说）。无韵的即为小说。后世说书，用小说的比较多。

旧社会说书从庙市转入戏院已几百年，南宋时杭州的瓦子（瓦舍游艺场），即是早期的戏院，当时听众多抗金人南侵的义勇军，因此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五代史评话》等等即从这个群众背景中产生，特别受欢迎。也发展了各式各样的说法，出了许多名家。而这种著名的人民艺术家，照例是为群众十分爱重的。比起由封建统治者由家庭宴会需要发展下来的词曲昆曲，只为少数欣赏的艺术，有个根本不同。

最大不同处即有发展变化，而又永远照顾到多数，十分通俗化。

二

这种说书的风气，直到现代还是中国小城市最有普遍性群众娱乐教育节目之一。南北各不相同，每一地方又还有种种不同说法，用的乐器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相同，即为群众服务，而又为群众所欢迎。说的故事且随时能加入新的成分，最容易配合人民需要，是提高人民文化和政治教育一个强有力工具。

《老残游记》所叙的这一段说书故事，正好反映清代末年山东济南大明湖一个说书的人民戏院说书情形。写的不只是当时著名的、为群众爱重的王小玉表现艺术，也说其他方面。如大鼓艺术当时即是由于能综合各方面长处得到成功的。如因为艺术上的成功，本来是民众剧院，当时封建统治最高的抚院，和代表文化最高的学院官僚士大夫，也都先有定座，可见出人民艺术在当时即已将封建性的昆剧打垮，取而代之。

这一课又直接说到它的成功表现。

三

说书的发展，在晚清，大鼓书的地位，即已奠定了现代说书的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吸收众长，推陈出新，有创造性。

四

本课叙述的方法，也恰像是王小玉说书的形容，是分层次一段一段发展下来的。所说的王小玉说书发展过程，正是本课叙述方法过程。从平叙耳中所听目中所见的，引起黑白妞这个人在群众中的地位（第一段）。其次从他人口中听来梨花鼓和黑白妞如何学习得来长处（第二段）。

三、写当时书场情形。写抚院预先定座，写卖烧饼油条的有一二十个，都是为不吃饭的人有所准备，可见当时群众对于王小玉印象之深，及二姊妹作用之大。

四、戏院情形。未上场以前情形。

五、六、七，引入正文，写黑妞和伴奏的。如作画，（一）画出黑妞素朴家常。（二）形容长处。（三）群众反映。一面赞扬，一面为白妞衬托。预先提出下面还有更好的。

八、九、十，（八）写神情。（九）唱。（十）形容发展到高点后，陡然结束，余音回味。

十一、书生反映衬托。总结似的形容，三月不知肉味。（古人说哀思豪竹，又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指歌喉。这里引孔子语有双关意。）

五

结束。

这个叙述描写文，写到说书的长处，有发展性，由平淡引人本题，逐渐达到主题，高点，陡然结束，令人有余音绕

梁感。黑白妞的长处，其实也即是这篇文章本身的长处。这种表现法，是近代文学少有的。这种表现法更有一点特别重要，即它的现代性。现代叙事报导文学，有值得取法处。

作者曾在大学中文系执教多年，本文为仅存的一篇讲课教案，约写于 1947～1948 年。

据手稿编入，篇名为编者所拟。

【备考】

今日文学的方向

——“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纪录

时间：十一月七日晚八时

地点：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纪念堂

出席者：朱光潜　沈从文　冯　至　废　名　钱学熙
陈占元　常　风　沈自敏　汪曾祺　金　隄
江泽垓　叶汝琏　马逢华　萧　离　高庆琪
袁可嘉

袁〔可嘉〕：今晚我们举行座谈会一方面在向文学界的前辈们介绍“方向社”这个文艺团体，一方面想就“今日文学的方向”这一问题作个集思广益的讨论，尤其希望在座的前辈们给我们启示和指导。这个论题牵涉甚广，我们虽然没有拟定很细密的讨论的纲领，但我们希望能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今日文学的方向何在？这是说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着眼。（二）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又如何？这是说从文学与创作者个人的关系着眼。（三）从美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又将得到什么结论，这是说从文学是一种文字的艺术着眼。这儿三者的区分自然是完全为了讨论的方便，

它们间的基本的关系是互相包含的，而非互相排斥的。我们特别愿意声明：这儿所谓“方向”不仅指应该不应该的取决，而且是指这样虽好而那样更好的选择。同时，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只在替我们自己找方向，决无意指导别人。现在就请诸位先生发表高见。

钱〔学熙〕：一提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文学观，我们就想起马克思与弗洛德〔今通译“弗洛伊德”〕。最近 Slochower 在“*No Voice Is Wholly Lost*……”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与弗洛德的道路是今日文学的出路，也是今日人类的出路。我个人以为不然。马克思和弗洛德都是从研究病态出发的，原为医病，但逐渐他们把病态看作常态，以为每个社会、每个个人都有这种毛病，非吃这药不可。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人并非时刻在性的激动之中。对于病人，他们这二帖药都极有用，但对于根本无病或病根不深的人与社会，是否也要他们吞服这样强烈的药？我觉得很可怀疑。

就生命的活动来说，我觉得只有二个大的方向：一是向上，即所谓的“要好”；一是向下，堕落放纵，或坐立不安。所谓“要好”就是想在自己所选定的范围里把前人不曾分得清的把它分清楚，前人不曾合得紧的把它合得更紧密，也就是分析与综合二种能力的培养。有人说，所谓“美”就是从不同中求得和谐（unity in diversity）。一个向上的人随时在更多的不同中求更大的和谐。生命既只是意识活动，这样的努力使意识增加，生命也就更丰富，也就是美的增加。当每个个人都做到这个理想，宇宙即有大和谐。《易经》上的许多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些的。

金〔隄〕：弗洛德的目的在治病，似乎没有说每个人都是

病态的。他的态度是否对病人治病，对无病者防疫呢?

钱〔学熙〕：他简直认为这防疫针非人人都注射不可。我认为健康的人是连防疫针也不必打的。

冯〔至〕：他们（指马克思与弗洛德）是以为他们的路是正当的路呢，还是大家应该知道有这二种路子呢？如果指后者，知道一点自然是应该的。

钱〔学熙〕：他们认为他们的是唯一的，正当的道路。

金〔隄〕：实际上这就是文与载道的问题了（马、弗都代表一种“道”)。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也许可以说得更确切一点：即文学是否必须载道呢？目前有人认为文学非载政治底“道”不可，不知诸位先生的意见如何?

冯〔至〕：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文章都是载道的文章。如韩退之的文章，杜甫的诗。作家对某一种“道”有信仰，即成为他自己的信仰。至于应否强迫别人同“道”是另一问题。

废〔名〕：金隄所说的是指作家对社会的态度，不指作家自己的“道”。我以为文学家都是指导别人而不受别人指导的。他指导自己同时指导了人家。没有文学家会来这儿开会，因为他不会受别人指导的。我深感今日的文学家都不能指导社会，甚至不能指导自己。我已经不是文学家，所以我才来开会（全场大笑)。历史上哪有一个文学家是别人告诉他要这样写、那样写的？我深知文学即宣传，但那只是宣传自己，而非替他人说话，文学家必有道，但未必为当时的社会承认。

一个大文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才、豪杰、圣贤。无天才即不能表现，但有天才未必即是豪杰。有些人有天才而屈服于名利酒色，故非豪杰。如是圣贤，则必同时是天才，是豪杰，三者合一乃为超人，不与世人妥协。

袁〔可嘉〕：所谓“天才”是否即是从美学著眼，所谓“豪杰”是否从心理学着眼，所谓“圣贤”是否从社会学来看的?

废〔名〕：可以那么说，但我不喜欢那么说。

冯〔至〕：废名的话比较亲切些，可嘉的有点抽象。

金〔隄〕：二个文学家的方向可以不同，废名先生承认吗?

废〔名〕：好的文学家都是反抗现实的；即不明白相抗，社会也不会欢迎他的，如莎士比亚。有哪一个天才、豪杰、圣贤不是为社会所蔑视的?

江〔泽垓〕：文学是否载道，完全看“道”的定义的宽狭如何。“道”如果是广义的，则文学家求不载道亦不可得。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力〕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废〔名〕：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废〔名〕：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二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钱〔学熙〕：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对的，那末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

冯〔至〕：“这确是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

朱〔光潜〕：我把文学看得很简单，文学即是说话。一个人把所见到的说得恰到好处，即成为文学。每人所见的即是“道”。人人所见不同，有广狭，有深浅，文学因此也就有高

下之别。文学反映人生，人生甚广，各阶层的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只有不同才能产生丰富。大家凑合起来，人生乃更完整。现代文学的毛病是把一切看得太简单了，太公式化了。马克思与弗洛德皆如此。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反映人生，政治是人生活动的一部分文学自然可以与政治有关系，但不能把一切硬塞在一个模型里。

废〔名〕：朱先生的话很是。我觉得目前文学界空气沉腐。第一次欧战前的欧洲文学，特别是俄国的小说，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辈都受其影响，但并没有都走这条路。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实：中国文学史上确有第一流的文学家是听命于政治的，如忠君的屈原、杜甫，但仍能在忠君之余发挥他们的才能。另外亦有文学家虽反抗社会而不成其为文学家的，如周秦诸子。大概而论，周秦以后的文学家听命的多，不过他们的天才大，感情重，所以不妨碍他们成为文豪。文学的界限甚宽，只要自己能写、别把这些看得太严重了。

朱〔光潜〕：文学的发展往往是兴衰交替的。从某种文学的初期到它的正式成立，路子较宽，为多数人所了解。慢慢的人们讲求技巧，路子渐隘起来，而成为 decadence。如中国早唐与晚唐的诗，南宋与北宋的词，它们的分别即在此。新文学在开始接受西方影响时，路子较宽。欧洲文学目前在 decadence 之中，我们如只学隘的，似不合适。

冯〔至〕：我的意思正如朱先生所说的。目前我们所接受象征派的影响恐怕是不很健康的。

朱〔光潜〕：荷马的作品如今读来我仍感兴趣。现代诗人的晦涩虽好，但不太好。语言的功用应在使人了解。

废〔名〕：二位先生所谈的怕是另一个问题。我自己从经

验了解晦涩问题的产生，这实在是时代的问题。从前的人写诗如走路，现代人写诗如坐飞机。叫一个只会走路的人突然坐飞机，自然觉得不惯了。

朱〔光潜〕：现代文学家是用显微镜看人生，但普通人手上并无显微镜。

冯〔至〕：将来也许大家都会有的。

废〔名〕：我再举一件事来解释。民国二十年以前，我写过一些小说。当时温源宁先生说我的小说很像当时英国的吴尔芙夫人的，又问我是否喜欢艾略特？我说他俩的作品我一点也没有读过。我当时只读俄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和莎翁的戏剧。后来读了点吴、艾的作品，确有相同之感，这实是时代使然。“普遍”一词实在难说，现代的作品不普遍，中国古代的作品又何尝普遍呢？象征派是向来有的。

冯〔至〕：这怕是文学的开始与结束的分别。

废〔名〕：这是天才的问题。

冯〔至〕：但一个人的性格也会受时代的影响。

沈〔从文〕：虽是同一时代的人，但性格还是有分别的。

冯〔至〕：我虽喜欢现代一部分的东西，但总觉得有些问题。

袁〔可嘉〕：我想，时代二字很迷糊。不如改说是由于文化的关系。我们实际上不能说诗与文化（poetry and culture），而只能说文化中的诗（poetry in culture）。我以为现代诗的晦涩性可以从二方面来解释：一为现代文化的高度综合的特性。贯串现代各部门知识的是这样一个发现：一要都是过程，是活的有机体，与别的事物都密切相关。它不仅发生作用，接受反作用，而且有相互作用的情形，因此一切学问都变成研

究某些因素或另外一些因素间关系的学问（study of interrelationship）。唯心与唯物的人们实际上是同样违背现代思想底主流的，因为他们都把“心”与“物”看成死的东西。实际上所谓“心”与“物”都只是动的“能”（energy）而已。哲学上的过程哲学，物理学上的 field theory，心理学里的 Gestalt 派，社会学中的文化模式的理论都是这个表现。最具体的是目前一部分学者所从事的科学统一的工作（united sciences），即设法将各种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现代人所要了解的东西确实太多了。现代文化既如此复杂，现代的诗如何能不复杂？我有一个感想，觉得多数人对文学的晦涩十分敏感，对于身边许多别的事物的晦涩似乎很肯宽容，譬如说，大家都使用电灯，但电的道理对于我以及许多像我的人，恐怕是非常晦涩的；可是我们一进门就捺亮电灯，有几个人问过自己呢？也从没有人去请教过电学家或电灯匠，为什么电灯会亮呢？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其次，现代诗的晦涩可以从现代诗是对于十九世纪浪漫诗的反动上去了解的：浪漫诗是倾诉的，现代诗是间接的、迂回的；因此习惯于直接倾诉的人就不免觉得现代诗太晦涩难懂了。

就目前中国的文化现状说，我承认这类诗是并非必需的。但如果有一部分人比别的人们走在前面一步，而已深深感觉现代文明的压力，而开始有所表现，似乎也是不可厚非的。至于大家是否都该那么做，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现代化的一个严重的弱点出在些冒充现代的人的身上，但这是人的弱点，而非这一运动本身所必然包括的过失。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不向前走则已，如果还有发展的话，从简单到复杂怕是

必然的途径。

冯〔至〕：文化的发展也可能从复杂走向简单的。

废〔名〕：袁说的话很对，但太抽象一点。诗人是小孩子，不必等到文化成熟再动手作诗的。

钱〔学熙〕：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是真实生命的真正表现。各个生命的流向不同，但如确是真正生命的表现，无论其为颓废的或向上的，也都是各载其道的。文学的兴衰，诚如朱先生所说，是历史上的事实。每一时代的先驱人物，倾其生命之流，不仅开创新的内容，并且开创新的形式。有人徒见形式而不见新形式所根据的新内容，只顾技巧，而造成 decadence。艾略特说过“如无大的技巧，忠实不能存在”(honesty cannot exist without great technique)，里维斯发挥它而说“技巧是忠实的工具”(technique is a means of honesty)。至于现代诗的晦涩实在不能一概而论。艾略特的晦涩确实有他特殊的经验做背景的。有些不肖之徒只模仿他的形式，于是就坏了。

废〔名〕：仅仅是形式的模仿确是不成的。诗之从简单到复杂倒是一种趋势，从前如此，新诗亦然。你们看胡适的诗多么容易懂，但到卞之琳以后就难懂起来了。另外还有一点：一般说来，文学有二种技巧，一是写实的，即是照相式的，要把当时的实经验生动地表现出来，而每一个经验都是特殊的、具体的，因而比较难懂；另一种是回忆的，如冯至的十四行集，这类诗比较容易懂些。

沈〔从文〕：旧诗可不是这样分的。

废〔名〕：旧诗也是如此。

沈〔从文〕：旧诗只分抒情的、言志的，与叙事的。

袁〔可嘉〕：沈先生所说的指主题的分类，而废名先生所

说的则根据技巧的不同而分。我觉得废名先生的分类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我可以换二个名词，那么废名先生所谓写实的即是戏剧的，关键在表现上的逼真与生动；废名先生所谓回忆的即是沉思的，把经验或事物推到一定的距离（时间的，同时是空间的）之外，诗人绕着它们思索而成诗。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显然属于沉思的一类，而非戏剧的。沉思的诗是静止的，戏剧的诗是动的。

朱〔光潜〕："修辞立其诚"恐怕仍不失为写作的要义。

废〔名〕：我还有一点感想：中国新文学很成功，新诗尤其成功，好诗的分量虽少而质实在很好。新诗中至少可以选五十首出来，足以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好诗相比。散文小说的方向很好，成就却不算优异。

沈〔从文〕：我看未必尽然。

（这篇座谈的纪录因来不及请各位发言者校阅，文中有错误处由编者负责。）

——纪录完——

本文原载于1948年11月14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107期，距12月17日北京大学五十年校庆及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仅一个月左右，在历史和个人人生都面临大转折前夕，几位教授和一些文学青年、助教、学生相聚，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学术空气下，师生平等地讨论"今日文学的方向"，在北京大学历史上亦属罕见。沈从文在会上的发言，集中于政治和文学关系的议题上。现将当时发表的纪录稿全文编入备考。

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

我参加西南土改，隶属土改工作第七团，工作地区在川南内江县第四区，工作时间共计九十四天。工作分配在中队部调研组，注意的是和当地农民经济关系密切的糖业糖房问题，希望透过重点乡蔗糖的生产，认识内江农民千百年来所受的残酷压迫和封建剥削，因此对于蔗糖生产过程和土地人民关系，认识得比较仔细，但对于全面的理解，即不够深入。四区全区五十六个糖房，我亲自到过的，就不过五处。由人民银行和税局帮助，得来的生产数字，有些不大一致处，也无从向更可靠方面找材料校正。加之过去对于农村经济又不在行，这个报告不可免会有错误，深盼得七团工作同志指正。特别是对于内江糖业问题素有研究的韩德彰同志，他的全面具体的报告，能早日提出，必可修正我的错误和疏忽。

生 产 概 况

内江是中国一个砂糖生产单位，所有生产品除本省消费

一部分，其余多运销国内各地。长江中部和下游各省市，都有内江糖上市。北京的南货铺，“内江糖”也早成一个常用名词。制糖原料用甘蔗，种类有大芦蔗，小芦蔗，脆蔗，爪哇蔗，美国蔗，印度红蔗……等等。四区主要品种栽的是大芦蔗，特点为易长大，易照料，土好坏可种。（明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就提起过蜀中荻蔗，可能即现在的大芦蔗。）其次是目下在努力推广中的印度红蔗，特点为出糖多，品质好，可连收五年，不换种。内江县共分十一区，蔗糖生产以白马庙区占第一位，四区只占第五位。仅以四区本年生产数字而言，即约二千万公斤。烈士乡六十五岁老农李三星说：“本地二十年前，遍山都种蔗，土地使用比近年多得多。过去糖房开工，第一次大约要两个月，第二次要三十天，总是忙得很。大地主肖辉重开糖房，当时垄断原料，从起火到停火，曾延长时间过一百天。”一九五一年四区五十六座糖房，开工的计三十六所，平均起搞一个月到四十天左右，数字如下：

芦蔗	一千八百万公斤
白糖	四十五万九千公斤
结糖（即黑砂糖）	四十五万九千公斤
露水	四十五万九千公斤
人民收入	约七十八亿零三百万元
国税收入	约二十三亿四千零九十万元

据老农张大心、中农兼糖房经理高云祥等估计，这一千八百万公斤甘蔗，照一般生产情况计算，万土出蔗八成，即占用四区熟耕地约二千万土。

一万蔗土平均用一百二十个全劳力，共得用二十四万个劳动力。

一万土要用五个牛力，共得一万个牛力。

这些芦蔗成熟后，送到糖房去加工制糖，每一糖房经常得用二十个人，四十天工作，还得费二万八千八百个劳动力。每一糖房碾榨蔗汁每天要用十五个到二十个牛力，四十天工作，还要费牛力二万一千六百到二万六千。

四区共计一万零九十八户，一九五一年，蔗农计四千一百三十六户，占总人口户数百分之四十一。这个蔗农数字只是一九五一年春通过糖业合作社，由人民银行贷款蔗农的数字，没有把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计算在内。无土地的雇农和靠剥削为生的地主也不计算在内。实在蔗农和总户口的百分比，必然要高过四十一。因为四区除村镇工商业住户及贫民，和村中贫雇农工商业户外，所有农业户口，无有不种芦蔗的。

原料生产占有土地面积，照本地种蔗习惯，是轮换栽种，至少即使用到四千万土地。占有土地时间，由二月到十一月，又比一般农作物时间长，参加生产农业户口，至少且到百分之四十一。因此四区糖业和糖房影响到本区农村经济，几乎是全面的。

一九五一年四区蔗糖生产和过去不同处，即糖房经营管理已全部归人民自己管理，劳动成果也全归人民。碾榨采用钢轴的计十一付，（系由人民银行贷款购办，每一付连同运输装置费用，约一千四百万万元。）采用比较新式手摇离心力出糖机的计九部。（每机从钵中取出半结晶黑糖，约十分钟即可摇出白糖三十斤，缩短生产过程约七天。）

从唐宋人笔记称“蜀中糖霜”起始，到川南解放为止，约一千年来的内江蔗糖，原料生产和加工，都出于伟大的劳动人民手中。但一切劳动果实，却统统被地主阶级剥削掠夺，

占为己有。四区大小地主六百三十八户，内江县城在解放前曾有七十六个银行，此外钱庄还不在内，都是用蔗农真正的血汗养活下来，维持下来。寄生在大都市中的人，平时只知道吃的糖是甘蔗作成，可不明白吃的原来全是农民血汗。这种血汗转入地主阶级手中，是通过三种剥削方式进行的：即纯封建性土地租佃剥削关系；近似中古时代半封建乡村手工业剥削关系；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银行钱庄高利贷剥削关系。

地方情形

内江四区本属川南典型丘陵地带，无高山大河，土地特征是小小山冈起伏连续，经过多年劳动人民的开发，可耕面积多已成熟耕地。气候入冬少霜、多雨、不常见雪，夏季酷热而有阵雨。山沟低地多开垦作梯田，冬季储水种稻，高旱地主要农作物即种芦蔗。明宋应星著《天工开物》称荻蔗制糖，举蜀中生产示例，可知至少由明代以来，内江经济农作物就是芦蔗，制糖过程，技术上古今还相去不多远。四区农民既积有长时期生产经验，因此对于蔗类品种优劣和土地性质，雨量多少，都十分熟习。在若干不同品种中，大芦蔗栽种特别普遍，实经过长期选择的结果。但农民的经验主义易趋于保守，在品种改良反映意见上即可见出。

近年政府为农民长远利益设想，经过长时期调查研究，拟提高蔗糖产量，极力推广印度红蔗，希望于五年后普遍栽种。从本年起始，并且经由东北运到大量豆饼肥料，作春季农贷分配给农民。惟据部分老农意见，还有如下几点，使得

四区生产计划，需要稍有变通：

一、印度蔗出糖多而且好，种下后且可连收五年，不必另种，不耽搁土地，省时省工，但必须好土好肥料。如在瘦土薄肥条件下，芦蔗收成却可望比印度蔗好些。四区如巫萍乡等处有部分土地瘦薄，或不宜种印度蔗。

二、印度蔗下地虽可收五年，最好收成还是第三年。种苗用全蔗，不用尾芽，耗费量也相当大。芦蔗用尾芽，比较经济。每年种虽麻烦，但可以调动土地，万一遇到气候上大变化，不致全部受损失。

三、本地牛草必须用芦蔗尾叶，印度蔗尾叶有锯口伤牛，牛吃不得。这些意见不免有些保守思想掺杂。农民担心的肥料已由东北运到。惟牛草供应，可能会留下部分土地种芦蔗，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区农民对于种蔗虽积累了丰富经验，惟制糖生产技术，实在相当落后。如用它和我国东北、粤广及福建、台湾新式生产比较，内江四区的生产方式，实在还停滞于中古时代庄园式乡村手工业状态中。人力物力的处理，都极不经济。特别是生产技术如碾汁、漂白、晒干过程，既落后又不卫生，不设法改善，是不容易适应新社会要求的。保守落后原因，从表面现象看是限于自然环境。全区交通都依赖由阡陌发展而成的小径，物资转运且全靠人力，农民住居多分散于山坳冲田间，每一小乡有一二糖房，即为适应原料集中和人力调剂而起。从本质看，原来这种种，实和川南内江区大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地方村居分散、孤立，和交通上的长远蔽塞，即完全有利于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而被维持下来。这种剥削的残酷性和落后性，也正是中古时代庄园工业

的特征。地方即十分富裕，农民却可怕贫困。土地中每年的劳动果实，通过层层剥削，几几乎全部都转入少数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手中，农民全体，却始终陷于半农奴状态，过着孤立隔绝无衣无食的日子。例如本地人说来平常，外来者不易相信的一件事情，即年产二千万公斤芦蔗，百万公斤砂糖的区域，种蔗农民子弟，过去竟有不曾吃过糖的。贫农张大心，帮地主做了二十年地，孩子们害病要点糖作药引子，向地主家去想办法时，还挨了一顿恶骂。贫农陈周氏，带孩子生活，住在一个崖洞里，两年只烧对时火，每天吃豆糊一顿。因贫穷而无办法，有生育十八个孩子，到后只剩下两个的。桂花湾一雇农，帮肖家做了五年长工，一年只得点烟钱，因劳苦过甚竟如半痴。四区过去八百户地主的不劳而获寄生生活，和内江县城的七十多个银行，其他许多高楼大厦，就完全建筑在这种对全体劳动人民长时期超经济的极端凶狠残忍剥削基础上。

地主的封建剥削，和社会的极端落后相互映照，情形也为其他省份少见。多年以来，我们就听说四川社会封建落后，理解的实在极抽象。这次从土改的斗争中，才比较具体认识到落后性的各方面。大地主通常必兼有旧社会统治者各种名分，官僚，军官，乡保长，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袍哥，恶霸，经理，皇经坛会首……及其他会道门匪特头子等等身份。这些名分本来有些是相互矛盾，不能并提的，这地方的地主阶级却能集政治、经济、宗教、流氓及各种封建统治势力于一身，在一乡一县独霸称尊。如贾家场大地主刘建邦，一个人即兼有七种统治头衔，骑在人民头上数十年。解放后，乘美帝在朝鲜仁川登陆时，还率匪万人，自称“反共救国军总司

令”，向人民进行反击，焚烧区公所，致四五区区长以次干部死亡达数十人。如新民乡大地主艾延年，借建设公路为名，勒索人民无所不至，家中糖房平时养猪即过六十头。在内江被三万群众斗争了四天，还不向人民低头。烈士乡大地主肖辉重，作伪保长时，借拉壮丁害得许多人成孤儿寡妇，他自己倒发了财。修理私用枪支，也向人民摊派款项，这些枪后来还借给土匪拿去打解放军。家有洋狗，平时老百姓从门前走过也提心吊胆。大地主肖云龙，家中使用大斗小秤，好几十年人都不敢说话。这些都是在斗争中被人民正式提出控诉，承认的事实一小部分。四区五十六个糖房，土改中经人民控诉证实，其中竟有五十五个都属于这种恶霸不法地主所占有。且有地主占据五所糖房多年的。直到解放后，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以前，这些地主阶级的威风，就还使得乡下老百姓不敢说话。糖房的封建剥削，因此也原封未动。解放前虽然就有了蔗糖生产联营合作社组织，地方银行且作生产投资，其实完全是地主对农民耍的花样。同时更近于地主间一种分割原料的阴险协定。因此一来，本村生产，即想转卖邻村糖房也不可能。至于当时的农贷，更是有名无实，一切都对于地主阶级有利，对人民为无益。土地问题不解决，什么办法都是空的。当时农贷名义上为鼓励生产，本质上不过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共同用老实农民作对象，加强进行封建剥削另外一种手段罢了。

生产品的特征

这种具有浓厚封建剥削性的庄园式工商业，在中国长江

流域，共计有五种农业生产遭受束缚，使中国农村破产，农民无以为生。长江下游江浙二省有丝茧行，滨湖区有米行，湖南安徽浙江有茶庄，长江上游西南区，就是油坊和糖房。这种深入农村，压榨掠夺农民血汗的机构，虽属乡村工商业性质，实和土地的封建剥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油坊和糖房比较，糖房剥削且加倍厉害。

油坊生产原料本地人名油粮，主要是桐子、茶子、菜子、芝麻、花生。桐茶生产比较分散，油坊资本家因此多就乡场市镇、渡船码头收集原料，如和城市油号、钱庄联络好，资本能周转，又善于掌握行情上季节性的起落，且会从报纸上探消息，能操纵市价，即可坐收暴利。但油类原料大都比较容易保存，也容易转移，桐茶菜子花生芝麻又便于自由零售，花生更因城乡一般需要量大，且能代替粮食，不大受油坊限制。农民出售生产品时，因之在时间条件上还可稍有选择余地。特别是比较富裕的中富农，如经济稍可转圜，必不轻易脱手。油坊主或行庄中人，为向大行庄交定期货，彼此一有竞争，即不能不提高收购价格。

芦蔗生产情形却不同。除极少部分可供食用，大部分都只能作制糖原料。到期必砍伐方能空出土地另种庄稼。产量多，又十分笨重，一砍伐就得处理，决不能运回家窖藏。从栽种到收成，占土地时间约十个月，比通常农作物久，使用劳力和肥料也比一般庄稼多。并且照糖房习惯，原料十一二月虽已入糖房，三星期后可出糖上市，向例必到次年转露制结糖时方结账。换言之，即因生产品的限制性，一切问题都得靠糖房解决。但是糖房主人，却照例是一个聚敛无餍存心歪狡的大地主。掌握了这种生产工具的大地主，在本乡不仅

对中贫农民可以为所欲为，即富农小地主，有大部分剥削果实，从加工过程中，也陆续转入大地主手中。最简便的方法，即把农民本分上应得的糖款，用糖房名义存入银行，坐生利息，再为农民作保，把款项借出，拿一笔手续费。这类事说来，都常常使人不大相信，可是事实上却十分平常。在土改文件上，我们常看到有“封建剥削”字样，是常因地点条件不同，有其复杂内容的。一般多指地主阶级的单纯土地剥削而言。川南内江区的地主阶级，则通过三种形式，向农民进攻，方完成了典型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后经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直到这次土地改革，劳动人民从一系列斗争教育中慢慢觉醒，并经由党的领导，一再整顿清洗组织，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激烈斗争，才算把这个压在人民头上千年的东西打倒推翻，进而全部消灭了这个阶级。

下面是三种通常、普遍的封建剥削例子。

土地剥削的“先称后种”

有关川南地主阶级和农民租佃关系，提到租佃名目和内容的，有三个文件比较具体，且可互相补充：

一、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人民日报》的报道；

二、林采著《川南田租剥削概述》；

三、内江区土改学习资料《川南租佃》。

三个文件都提起“铁板租”，即死租，呆租。顾名思义，听来也十分吓人。因为租额高可到土地全年生产量百分之八十，天旱水涝还不能短少分合。但在内江四区土改过程中，两个重点乡和其他十八个小乡，农民租约都少发现铁板租。地主阶级既有其阶级本质，非剥削无以为生，心越狠也就越可从劳动人民身上压榨更多血汗，没有采用铁板租，必另有

原因。

四区租佃契约中最常见，表面温和，内容复杂，老农都认为“㣻火”厉害的，是“先称后种”。办法是先定押、交租，再种地。四区烈上乡斑竹村老农张大心，一九四四年向大地主肖云龙租田时，有一张典型契约可作参考：

租地二万六千土，预交一年干租，合八千八百斤老秤芦蔗。

田十二箩挑，预交一年水租，合四石五斗黄谷。（即十二箩挑四斗。）

另下稳租押金三万。（伪法币，当时可在本乡购买黄谷二十一箩挑。）

照租约上的办法，已够凶狠了，另外还有个附注，每年应交纳如下生产：

一、甘蔗头头一百斤
二、水糖二十斤
三、花生一斗
四、园麻一斤
五、酒米一斗

此外尚有习惯不上佃约，可是按时得送上门的，有佃鸡和田鱼，鸡要肥胖的，鱼要顶大的。豌豆蚕豆成熟时得送新，逢年过节要送茶食点心，地主家挖土边时有义务劳役，办红白喜事除送礼外也得帮忙挑抬，地主入城则帮同抬滑竿扛行

李什物，地主儿子中小学毕业还得报喜！总之，田地里生长的动物，只不要蚯蚓，植物只不要火麻，其余都要。地主花样多，农民提到这种事情时，为人老实不会说话，只说："龟儿子地主歪得很。"这句话里就包括有千年愤恨和委屈。

从这张租约上也可看出，农民颗粒未收，就得付出那么多物资，地主方面则不费丝毫劳力，即可凭空收入那么多东东西西。其实还不止此。照向例农民定租时多在年底，过了年，地主就可去和糖房办交涉，预卖本年生产，叫张大心来点头，承认到期交货。因此一来，一片土还未下种，在两个月内除收一笔押金外，还可收双份净租。要佃户到糖房点头，还包含一种策略，原来那块土名分上虽有二万八千蔗的产量，其实每年收入还不到八成。既用预售办法迫张大心点头，到时就得照佃约交租，不能推托。另一面却又明告糖房，土地只出蔗八成，用意即阻止张大心向糖房贷款时超过生产量，免到时妨碍地主信用。

先称后种对于地主阶级的超经济剥削利益，显然比铁板租还有保障，所以内江四区多采用这个方式。到时如交租不出，地主即说：

"一块上好的土地，都被种坏了，扣押折价还租。"

因此即夺去一部分佃，转给别人。如交租时知道农民还有剩余，地主到年底时又会说：

"去年写字时弄错了，把土边全加在里面了，应当另外算才公平。"不加自然不成。

伪政府时代，币制变动极大，改来改去骗老百姓，地主从中也可渔利。如张大心一九四四年佃押三万，当时本值黄谷二十一箩挑，到一九四八年，地主肖云龙就把张大心叫去，

假作好人，以为钱不值钱了，还是改写照折黄谷有保障。一改写即成押金黄谷四斗，这一来二十一箩挑的黄谷即等于白送地主。再过半年，正预备从押金“黄谷四斗”计算夺张大心的佃，解放军来了，才把这种向老百姓进攻的恶劣手段告个结束。

糖房剥削的“岔垄”

地主阶级第二种剥削农民工具是糖房。四区五十六个糖房，平均分布到十八个小乡里，是加深一层陷农民于半农奴状态，同时也更加形成地主阶级在一乡一村中封建恶势力的生产工具。

糖房剥削方式极多，最常用的表面公道事实极不公道的是预卖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岔垄制。

四区的租佃习惯，农民种地既得先投一笔资，方有地可种，有屋可住。这份支出通常比下年收人还重，蔗类生产又费劳力多，用肥料多，占土地时间多，农村经济周转，直接或间接的高利贷，即因之形成。间接方式即农民用田地中生产向糖房抵押贷款。四区五十六个糖房，解放以前几乎全部掌握在恶霸和不法地主手中，农民向这种糖房借贷或预售定期芦蔗，那有不忍痛吃亏的道理。假定贷十万蔗款，到时田地如有十二万，那多余二万蔗，糖房必一律收下，到次年转露时方付款，折价却照年终交蔗时计算，不另付息。如到时只有蔗七万，欠下三万，即名“岔垄”，得作欠款，且由糖房代保，向银行贷款填还。糖房却从中再扣一笔手续费，银行

又预扣一笔息金。因此“岔垄”欠款如是五万元，大致即得借款六万。

这种转手的高利贷，又多定比期归还，有三天一场起息的，有半月一月比期的，利息至少是三分，多些即借一还二。贷款必有抵押，如用另外一种青苗作抵，折价必照市场上极低价计算。有人家田中禾已垂头，急于需用款项而举债的，下月还清，利息还是照例四成。其实这种贷款多是地主本月或前一月剥削农民得来的。居多还是农民自己稳租的押金。糖房老板和银行钱庄经理，如非地主本人，也常常是地主的经济顾问和代理人，一切剥削都充满了狡诈欺骗方式，老百姓却限于事实，心里极明白，可无从自脱。

如家中劳动力多些，又天幸收成较好，还有些多余生产可售给糖房，约定付款，糖房必就牌价极低时付。约定付糖，即付成色差水分多的糖。不肯收即拖下去，拖来拖去你急他不急，使农民无可奈何，还得转请地主来讲好话，才能结账。秤斗出入差数也极大。种种无赖都久成习惯，平时农民开口不得，土改中才一一清算。

还有糖房主动放下少许定钱购蔗的，到时如市价低即放弃定钱，另外从别处收买；如市价高过定价，即迫促农民到期交货……有纠纷上区里打官司时，不问有理无理，总是农民判输。

糖房也有赔本破产倒闭时，通常不外两种情况：一兼作商业投机，或在乡镇上作砂糖投机，因彼此相互竞争，在兼并中大吞小，周转不灵而失败，于是宣布破产清算。糖房欠农民，照例折成摊还；农民欠糖房，即一是一二是二，必须

了清。直接受损失的还是农民。二即地主拆烂污，有意把物资转移到城中去，在年底借故宣布破产，农民更无办法。烈士乡一个地主，就借故被抢糖房倒闭，农民吃了大亏，他自己反而捞了一笔横财。

银行钱庄的高利贷

地主阶级从土地租佃纯封建剥削方式上，从糖房“岔垄”方式上，以及用种种欺诈掠夺手段，积累财富日益增多，农民在种种情况下自然就日益穷困。但一面既财富日增，另一面劳动力又还存在，可进行生产，也就依然还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对象。为进行有计划的向劳动人民的进攻，封建剥削的第三个环节的银行钱庄，于是普遍设立。解放前，内江县城中，即有七十多家银行和无数大小钱庄，共同以农民为进攻对象，大做空头生意。为便于市场投机，和农村高利贷相辅进行，过去连一所完全小学也没有的小乡镇，倒常有银行钱庄活动。

高利贷名目方式复杂，四区常用的是论比期“驴打滚”，三天一比或一月一翻，利上加利。新民乡有个贫农，向小地主借了九元，还债七年尚未了清。农民既十分老实，又不识字，不会打算盘，被地主唬住，到后把土地三万一下交给了地主，才算勾账。许多大地主的田地，也就是用这种重利盘剥方法得来的。许多“员外”样子的地主，平时面团团的在家纳福，表面上好像十分善良，其实都是剥削人民的里手内行。

一点问题

从上面二种典型剥削，使我们认识到川南内江区地主阶级的真正面貌。封建剥削其所以能长久束缚人民，是通过田地租佃，糖房生产和银行钱庄高利贷三种剥削方式完成的。川南内江区农民解放前生活、实完全陷于半农奴状况中。以四区烈士乡农民说来，许多品质十分优秀的贫雇农子弟，未成年即得参加主要生产劳动，却毫无读书认字机会。有些十四五岁孩子，身体发育还不及北方十一二岁孩子……这都是受地主阶级这种联合进攻的结果。解放后，内江县七十多家空头银行，和分布村镇乡场中的大小钱庄，都全部关了门。经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及土地改革一系列的斗争，田地加于农民的束缚，也全部永远解除。糖房生产改由人民经营管理，加工过程中的交换比数，过去一万芦蔗不过换糖百四十公斤，付糖或折价时尚有种种刁难，勒揹农民，现由人民经营，万蔗已可换糖二百十五公斤到二百廿五公斤。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土改没收缴收阶段未能完全解决，即糖房产权的处理问题。

照土改法令政策指示，一切有益于人民的乡村工商业，都不能乱动。面粉房，染坊，油坊等等统属乡村工商业范围，理应受人民政府保护，免妨碍生产建设。一到乡下即明白，有关土改法令政策及领导上其他一切指示，都十分重要而且极端正确。事事为人民长远利益设想。乡村工商业在土改中一动，就不可免会有不可设想的困难发生。惟根据个人对于内江糖房问题的认识，糖房似有两种不同情形存在：生产方

式如已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情形（如资中地方原料集中用机器大规模生产），且同时属于民族资本，受合法保护是应当的。如生产方式始终尚停顿学中古时代庄园手工业方式中，过去且曾全部掌握在恶霸不法大地主手里，长远成为奴役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而这种生产工具本来，又完全出于人民血汗积累，土改虽在基本上已结束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糖房的所有权，尚必须根本解决。或由农会请求，作为赔偿劳动人民损失，或由人民法庭宣布属于恶霸非法地主产权加以没收，再正式交由当地农会接管。这个问题直到土改田地没收阶段时，还未作最后决定。目下不知是否已经处理。

又关于糖房生产技术的改进，也还是一个问题。根据一九五一年生产经验，凡碾榨由木轴改换钢轴的，虽改装时得费人民币约一千四百万，第一年蔗汁的增产量，已可将垫款全部归还。全区五十六个糖房更换钢轴，迟早必可于一九五二年度完成。手摇式离心力出糖机，能缩短生产过程约一星期到十天左右，出糖虽比较快，成色却比较低。但五十六个糖房如一律能更改，在生产技术上，总还是提高了一步。七团工作韩德彰同志，解放前即就内江糖产问题作过长时期调查研究。这次同在烈士乡工作，讨论生产改善问题时，曾以为现有土地既已完全属于人民，糖房也应当完全属于人民。人民要求没收糖房，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目下生产方式实在太落后，人力物力都不经济。全部生产改善，一时事实上还谈不到。如能用原有糖房生产制造糖清，再集中这种半成品到内江一个新式糖厂去加工，内江糖的品质，将一改旧观。这点意见个人认为实十分正确，且照顾到参加糖房生产的农民各方面利益，值得地方政府参考。

从土改工作中几点体会

通过半年来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土地改革文件学习，通过三个月来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参加对川南封建地主阶级的激烈斗争，通过从工作中对于比较一般的土地问题，和比较特殊的糖业糖房问题的调查研究，个人有如下三点认识体会：

一、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历史上既十分正确又无比伟大的一种政策。土改政策的实施，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上获得解放，在一个一切为人民长远利益着想的人民政府帮助鼓励下，发展生产，农村生产提高，购买力提高，从而使工业获得了广大市场，为中国工业化即打下个稳固基础。国家政权的巩固及稳步前进，也必需要这么一个基础的！土地改革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一系列的激烈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一面消灭了一个必须消灭的腐朽贪得懒惰寄生阶级，一面也是对于全国广大人民进行一种深刻的政治教育。必通过这种教育，方能使广大人民觉醒，进而用作主人公资格态度，来担当改变中国历史面貌，改变人类关系的伟大庄严任务。土地革命的如期完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四个朋友成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就必然可照共同纲领，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和平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由此推进，运用马列主义，运用毛泽东思想，从苏联建设接受种种有益经验，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必然可希望比预想的时间提早即可实现。

二、《实践论》说，认识必通过实践方能完成。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改变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斗争中。[①]《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又论及土地问题，提起农民时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式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远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的市场，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原料，与吸收最广大的工业品。又说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基础，因为工人和兵士当前和今后的来源，也还是农民。土改文件中则一再提示到土改只是民主建设的起始。一切工作都得适当照顾到农民的实际利益。个人从这次工作实践中联系政策文件学习，才深一层具体理解到人民力量的无比伟大，以及这些文件的深刻思想性、正确科学性，和丰富的政治内容。

三、在诚实而聪敏的翻身农民和刁狡诡诈地主阶级进行的激烈残酷斗争中，在民主建政的艰巨过程中，在经过启发教育觉醒后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表现中，在领导组织党团青年干部和农民干部，艰苦朴素，谨严认真，热情忘我工作作风中，我一面看到旧时代的灭亡，一面还看到新国家的成长壮大，深刻感觉到时代的伟大，和历史进展的严肃。

从这三点认识体会，回过头来检查一下我自己，就看出个人实在极端渺小而无知。过去几十年孤立工作的摸索挣扎，总是为己者多而为人者少。涉及国家社会问题，虽有些主观愿望，反映成为一种片面的、模糊的、向前的“看法”。事实上除了手中一支笔某一时还能够用用，此外即毫无“办

法”。一些看法既充满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情感，一到实际问题上考验时，也就必然是一个不习惯，终于脱身事外。也曾希望国家应当有个面目一新的局面，等到这个局面当真由万千人民流血努力加以证实时，我向这个新时代的讴歌情绪，倒变了质沉默下来了。也自以为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乡下人，能理解我的只有乡下人，但回到乡下去看看，才知道乡下早已改变了，乡下人也进步了，我倒因为住在城市中反而掉了队，把一个新的人民时代乡下人的资格也失掉了。分析一下，还是由于阶级意识的限制，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狂热、感伤以及片面看事的习惯，孤立工作的习惯，所形成的自私、小气、护短、懦怯、矜持种种毛病弱点的混合发展，不可免使我由一个完全虚伪的旧民主自由主义者，转面成为一个旧社会旧制度的调和妥协者，进一步且不自觉，转而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再即变为一个头脑木然的现存主义的维护者，一个对政治对新事物极端无知的庸人和懒汉。三个月在乡村中的工作和学习，起始敢检查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在过去和当前对人民革命都毫无贡献可言。特别是当那个“时代的伟大和在进展中的历史严肃”种种景象回复到我意识里时，记起在乡下过年和几个青干农干提出的保证，要把从他们学来的艰苦素朴，谨严热情无我的工作作风，带回城市，成为个人经常检查工作的标准，也成为个人重新用笔的对象。因为从工作实践中我所接触到的，虽然只是一个五万人口面积的小小区域，但是我理解到，同时即有五千万人口区域，有万千青年干部，在用同一方式同一工作作风进行工作。全中国且有近五万万人口的区域，有百万千万的青年国家干部，用的是相同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在伟

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坚定乐观努力沉默而向前。

一九五二、四月

本文始作于1952年初参加土改工作期间，完成于回到北京后不久。据手稿编入。

① 作者引述政治文献时，多凭印象而非原文。故此处整理时已删去其引号。下同。

政协视察座谈会发言稿

同志们：

我是在午门博物馆搞文物工作的。这次出去专看文物发掘、收集、保藏、研究和作用。一切问题何在？工作重点计三项：

一、博物馆和文管会现状；

二、历史科学工作者教学材料问题；

三、博物馆业务是否还需要展开一些，对于某些重要生产研究机构帮点忙？

这次政协视察主要在湖南，加上先前一月又在山东江苏各处看了一个月，共计看了五个大博物馆：是山东、南京、江苏省、上海、湖南，一个太平天国纪念馆，一个山东图书馆，三个文管会，两个师范学院历史系文物参考室，并且和四个师范学院教授作个别接触交换意见。用的方法是从陈列室到库房，接触的人是由馆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特别是面对群众的说明员。看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详细情况我想写给常委会，这里只谈谈可供各位注意的问题。主要情况是到

一九五六年底为止，搞历史教学的是一个摊子，还是只能用书注书，不会结合文物作历史研究。但是事实上却是他即或教国文，由《诗经》到《红楼梦》，也有了一大堆文物可作辅助教材！向历史科学进军，恐怕要落后。另一面是文管会和博物馆呢，几年来无论在收集和发掘工作上，都有了惊人丰富发现，除少数陈列，大部分都搁到库房里，由于缺少搞历史的研究工作人员，报告写不出，或写出提不出新问题，少精彩。陈列室的文字口头说明，水平都不高，亟待改善。个人认为造成原因是这两个摊子，照习惯一个属于教育部或高教部，一个属于文化部，平时工作少联系，必须想办法改善。值得赶快研究一个改善办法，十二年向科学进军，属于历史文化部门才不至于落空。

我想就总的情况报告一下：

一、这几年各地发掘工作是有惊人成绩的。我们都知道楚文物的重要，能解决古代长江流域的文化成就和一部分战国社会制度，其实长江下游的发现，也十分惊人。由史前到宋元，都有万千种东东西西为我们提出了南方物质文化史的新线索。在一群年青考古工作者辛苦努力工作中，为国家做了不少有益事情。值得表扬，值得重视。例如南京博和长沙文管会，很出了许多解决历史问题，丰富我们知识的重要文物。

二、其次，好几个文管会的文物收集工作，也有极好成就。在共同努力中，为国家保全了无数文化财富。特出的例如上海文管会，仅铜器一项就到四千多，据徐申玉老先生说，比故宫现存的还好。真可说惊人丰富。山东方面，在王献唐老先生领导下，也把工作推进得相当好。长沙方面，收集了

汉代残漆器，就研究价值说，是不下于发掘品的。

二、研究整理工作，可相当落后，远远不合社会要求。这事到各地写发掘报告时可以知道。东西重要十分，报告却不精彩。在研究上可说虚有其名。大博物馆对于陈列说明，文字和口头说明，由于缺少研究，有问题，不具体。有的研究方法还停顿到玩古董情况，有的根本还不好好准备人力。也有的人材使用不得当。如长沙博××，因为人事上的原因，把个担任了五年的考古××工作队长调到办办杂业勤务，极不经济。一般发掘工作人员一天只是忙，把东西挖出来，就少看看机会，更无读书机会，直到要写报告时，才临时把东西取出来推测时代。不读书，不知道全国其他文物××，这报告当然不易精彩。

在学校一方面呢，历史系所用文物资料，实在少得可怜。出土文物尽管已有百廿万件，有些什么对于中国物质文化史提出了新线索，全不知道。工作还是停顿到用书注书程度。国文系教学用文物，自然隔得更远了。照我们看来，由《左传》、楚辞、唐诗、宋词、《红楼梦》，不搞搞文物有许多地方是教不下去的！

四、说明员很有工作极热心、学习态度极好的，如山东和南京江苏省博物院。但是碰到困难，就是业务水平太低。不是不肯学，是没有好好的教，反映的是研究工作不够。领导认识也有问题。工作人员待遇有的也待改善，必须尽早设法改善。如苏博，有的不过二十元或二十多元一月。如太平天国纪念馆一个研究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本来可以作副研究员，还能译英法文，事实上却常用来办办杂务，每月还只七十元。长沙博，那个考古队长月只七十元，其他一般发掘工

作四五年的，也只六十来元，工作那么繁重，那么有成绩，只不过比百货公司站柜台年青工作人员差不多。

五、锦绣生产参考资料十分缺少，待帮助改善。

从这五点看来，有个显明值得注意的问题：博物馆还不能发挥应有能力，继续那么下去，研究工作还是落后于现实越来越远。至于学校中的直观教学，距离要求也极远。向科学进军的研究工作，更说不上。必须尽早赶快改善这种种落后情况。

从这点认识，因此我想向文化部、教育部高教部负责同志，作如下三点建议……

本文是1957年初作者草拟的座谈发言稿。原稿三点建议部分缺失，而实际上作者在进一步补充后，写成了1957年3月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此发言以《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为题，编入全集第31卷。

汇报八月后工作中已作、待作、拟作诸事

一、《服装选》稿结束，送出版社后，假中政协为安排至大连休息一月，在那边廿六天。事实上是把部中原来指定由我审校《中国工艺美术简史》稿件，校改完毕，计约卅四万字，图约三百幅。等待和教材编辑组张仃院长商量，决定是否付印（大致是用“内部发行教材”印行）。这个书的编辑，是两年多以前，文化部特别召集了全国工艺美院院长、主任、讲师、助教约廿人，到京开会决定编写的。原书编辑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孙之佛、罗叔子二先生。此外还有其他专系教材四五种。指定我和陈之佛先生二人负责审定。陈先生前年故去后，各书即由我审校。书由南京艺院讲师罗叔子编写。这次校改，为第四次，大致不久即可付印。（已印出的计有丝绸纹样史、漆工艺史等。其中部分材料由我供给。）

二、手边还搁有同样性质《工艺美术史稿》二部，一为四川美术学院讲师龙宗鑫同志编的，约廿万字。一为北京工艺美术学院讲师王家树同志编的，约十多万字。龙稿待改定文字，有可能当内部教材出版。王稿还待为补充些材料重写。

（目下还无人着手的，有金属艺术加工简史，牙玉竹木雕刻，景泰蓝和画珐琅等。）另有杭州美院邓白教授编《陶瓷艺术》约四十万字等待校定。

三、财经出版社原约定本月十号去校正《服装选》说明文字，看最后清样。近因中华排版延期，改为廿五号送稿校定。俟校定后，社中拟打七份样稿，分送部、局、馆及北大翦伯赞、民委会萨空了及科学院专家阅读提意见，再综合首长专家各方面意见，斟酌修改说明文字，再送部局作最后决定是否可以付印。原定十月初印出事，势必延期。要求一严，改动可能较多。

四、去年全国政协大会中，我曾提有议案数件，其中之一建议如何改进广东工艺教学，改进外销陶瓷生产。这个提案通过后，人大常委已转国务院交由轻工业部和文化部和广东省斟酌办事。广东人委同意我的提法，除扩大省博物馆陶瓷部分，前不久并派有省工艺研究所和专为生产外销瓷的枫溪陶瓷工厂，及研究所美工同志九人，来京作一月进修。摹绘部分花纹返广。目前轻工业部陶瓷处，又派人来商洽，去广协助工作人选。拟邀故宫冯先铭，或朱家溍，工艺美院雷圭元或梅健鹰，和我一道去看一个月。看学校，看外贸商品展，看枫溪瓷厂。我觉得为协助教学改进工作，协助外销陶瓷改进生产，能有机会去看看，并在生产工厂和老师傅同住半月，具体些明白各方面情况，对于今后协助各方面工作，也比较容易配合，并深一层明白应出些什么图录供教学和生产使用，并且知道我自己有关工艺知识，还有多少可以供生产改进参考。因此回复轻工业部陶瓷处同志说："如十月中政协出外视察，我乐意再去广东。如非视察时间，要我去，最

好由部中和本馆领导商洽，得到馆中许可，我才能去。”我如果能去，还是去看看好。因为政协前后提案约廿件，内容不外三个方面：一、关于文物研究工作改进意见。二、关于艺术教学改进意见，三、关于工艺美术品如何古为今用，改进提高生产有利外销意见。所有提案（只有一二不成熟，难于实行。）多已由国务院通过，交由有关部和省市执行。编辑教材工作，也和建议有关。求把这一系列工作，作得较切合实际要求，对国家有益，趁我体力还来得及时，多下工厂看看，多和教这些课目的先生有些接触，再回过头来下库房把所学的加深学学，帮同年青人学学，本于“一切研究都重在有助于新的生产，丰富新的生产内容”，这样一个目的作去，会可望把工作配合作得更好一些，对国家有益一些。

五、待把《服装选》稿校毕，即拟将杭州美院邓白同志编的《陶瓷艺术》稿四十万字，和四川艺术学院龙宗鑫编《工艺美术简史》二十万字审查看毕，送还工作组，可能得用两月时间。

今后即看部里、馆里需要情形而定。我主观估计，可作的事有如下一些：

1. 继续由馆中或外调配备一二人，用三五年时间，完成服装史工作。并另配备一二人，兼整理明清绸缎花纹，为将来“服装丝绸博物馆”打个基础，作点准备工作。也可供生产参考。（关于丝绸研究不赶作，此后年青人来着手，似不大好办，因为名目也叫不出！）

2. 专摘工艺美术中花纹和造形，为正在全面发展的各级工艺美术教学中，各部门新教材作些准备。帮同年青教师，把各有关教材一一编完。不大好的，为细心充实材料，——

改好。他们无从下手的，或指定一二比较得力助教，由我想法和他们一起，为编出初稿，再来改正。（年青教师自己单独来作，不大好作，因为见得不多，懂得更少！）

3. 或就目下各方面生产需要，充分用用我在工艺美术部门的花纹常识，来为编十来集可供教学、也可供生产参考的工艺图案集。（我常识较多，工作也有许多方便处，不甚费力，即易见好。）

4. 协助馆中美工组，为把关于历代交通工具中车马船轿等形象材料加以整理，编些专题性图录，供各方面参考。

5. 协助美工组，为把历代兵器和兵器应用编个专集，供内部学习参考。

6. 协助美工组，为把历代乐舞形象材料整理出来，供内部学习参考。

7. 将馆中藏明清漆柜门编一专集。（内中材料极重要，印出来远比四王吴恽或扬州八怪作品有意义。）生产教学都有用。

8. 协助保管组，将“带钩应用”当一小专题加以整理，编个小册子。（这些小问题，也得有综合知识，不然保管组到登记时，说不出所以然。）

9. 协助美工组，先将服装史中历代劳动人民形象整理集中，编个专集。可以配合工具陈列作新的说明。不经过一定劳动，说明也难深入。

10. 照原先计划，暂时将各事搁下，集中使用一二年，将拟完成长篇小说写出来。（因为有些材料还有用，即写成后不能出版，也还有用。）

11. 回到我家乡半年（二三月也好），协助自治州副州长

龙再宇，试为把苗族吴八月等抗清材料编一电影剧本。他久拟写这个剧本，有些问题不易着手。有些清代历史事件，社会风俗气氛，龙年轻，掌握不住，家乡七十岁以上老人，生存的又已不多，只有我还知道些点点滴滴，可帮同他把工作完成。

这些打算，都只是就一时能想到，并估计能力还作得到的而言。虽尽力作去，这些工作事实上能完成多少，已难于把握。因为近来血压总在一百八十（低的一百零八），心脏冠状动脉硬化已成定局，无好转希望，心总是隐痛。坐桌前较久，头即沉重眼滞，血液供应不良，无可奈何。惟解放十多年，在党教育鼓励下，既然把杂文物学了那么多，其所以什么都学学，又总是为了有用到新社会各方面的可能，所以还是希望趁体力来得及时，一切尽力作去。就当前和今后社会需要作去。

如部中馆中对我希望，认为把这点剩余生命，尽可能多用到对文物研究方面，来推进博物馆工作，我就把工作重点，转放到文物制度上来注意。如认为一切研究以推动生产重要，我的一点关于工艺美术常识，对今后教材编写，和花纹改良，又还可以为国家作出点贡献，我就把工作重点放在花纹图案方面来再求深人一下。如照组织上估计，我写出的小说，大致还过得去，不至于成“毒草”，而这工作比较上说来，又比近年搞的文物工作，还会有较好成绩，那我就再在这个工作上试来努努力。总之，知识能力都有限，特别是体力受自己限制比较严酷，即或总想为党为国家多作点事，能作到的实在已不多。如何作去可望少犯点错误，而对国家有益，实希

望在党领导指示帮助下，才能明白的；因为即以近十年在政协十多个提案建议而言，虽大多数见于实施，但效果究竟如何，实不得而知。作对了的是否还可以或必须深入去了解一下（例如对于改进景德镇瓷生产上的建议）？已作的，是否有必要再尽力协助一下，使工作更完美些（例如协助各学校编写的各种工艺美术教材）？有些过去近于研究上的空白点，我试来摸索进行的，是否方法上还作得对，还值加强深入，重新配备一点人力来共同从事，并从工作中加速培养几个接班人（例如搞的绸缎花纹研究和服装研究）？这种种，限于我个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史部学和文物知识水平，虽主观上总想把事情作好，但客观说来未必作得好，且深深吓怕把事情作坏。所以把这些问题写出来，盼领导从客观上效果，来为考虑一下今后工作，我说不够处，过些日子再来当面说说，作些补充。总之，生命受自然限制较大，可使用的时间究竟已不多，如何来使用，对于党，对于国家就更有意义，效果就更好，我实希望听听馆中和部中党领导的意见。

沈从文

本文写于1964年9月15日，是作者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文中称《服装选》）初稿完成后，正待排印送审时期，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向文化部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领导写的报告。

据留存稿编入。

谈谈游美的观感

——在长沙博物馆的谈话

诸位同志：

这次我们来到长沙，主要是来学习的。三天来，得侯局长的特别照顾安排，住的吃的都非常好。又承馆中各领导热情支持，给予学习的便利。更重要是得高、熊二同志，二老师和各部门业务同志，都放下日常工作，给我们作学生的，以深厚热情的帮助指导，让我们进行学习工作，使我们明白不少需要明白的问题。实在是深谢万分，非言语所能表示。一面觉得这次学习得益之多，一面却只希望多学一点，对于我们今后组中的工作，肯定是十分难得，会起长远影响的。

高、熊两位老师，却要我和同志们谈谈去年在美参观约一百天的印象，不免使得我心惊胆战。因为这次来长沙主要就是到贵馆来学习，来"拜老师"。在国外虽停留百多天，到过十来个有名大学，看过些大学和公立博物馆的有关中国文物藏品内容和研究情况，事实上真正像是"走马观花"，一半以上时间，都消耗到由此到彼行车的路上。在美国境内，就一共约乘专用汽车走了五千多英里超速公路，和一些相别四

五十年的老朋友谈天的机会就极有限，加之老朋友大多是搞文学的，多争着向我提出些我已无“发言权”的现代文学当前问题，还希望我说明为什么放下那个大有前途的工作，却来搞这些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我初初告他们在历史博物馆陈列室，作了整整十年说明员，对人对自己都觉得还有益，说明三十年生命并不白费，他们最初还不大肯相信。他们还认为我对写小说干得很不错，怎么却狠心放下这一行改了业？实在令人难于理解。国外正还有人用我作品做博士论文研究，我怎么自己倒老早打起“退堂鼓”来，多可惜！因此先后在十几个大学作了十多次谈话，约有一半虽谈的是二十年代前期到三十年代，我学习文学用笔的经过种种和社会背景，说明不再作“空头作家”的理由，十分正常合理。

另外还是找机会谈谈近卅年我的新工作的种种。如我搞杂文物三十年所有的一些常识问题，由内行听来当然不免有点“卖膏药”意味。因为说老实话，我在历史博物馆虽真正工作了三十年，六十岁以前十年中，且总舍不得离开陈列室。还记得十分清楚，那十年中博物馆每一次特别展览，我还总是由起始到结束都必参加。如敦煌艺术展览，辉县，郑州展览，麦积山和炳展寺①展览，楚文物展览，全国出土文物展览，我无一不参加，且向来京展出的专家诚心学习，把内容学懂后，就为一般观众作说明员。后来去故宫作丝绣组顾问，又为布置陈列，陈列完成，又经常去作说明。还先后带了几百种明清锦绣，去苏州、杭州、南京各地展出作说明，每一地必三四十天不离开工作室。所有老朋友都觉得我有了严重“职业病”，说的一点不错，因为事实上有了这种职业病，却在这个十年浩劫中，不仅身体健康维持下来了，业务水平虽

始终不易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本事，文物常识倒像还对付得去，特别是卅年来，得到国内各方面同行的无私热情的教育帮助，和最近社会科学院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工作组刚好把一份有关中国服装衍进的问题，一部带试探性常识性的图录，初步完成。出国前就服装绸缎及另一专题，作了二百彩色幻灯图像照，所以我就争取机会，试在几个大学利用具实感性的图像，作了六七次常识性谈话，另外还用另外一份专题性资料，也作了三四次谈话。从这些谈话中，我得到一种印象，这种专题性的问题，尽管问题较专，听众原来又缺少基本知识，若有彩图三五十种相配合，若无得力翻译，最好是写个简要说明，译成英文，谈个四十分钟，必依旧能引起观众一定兴趣和理解的。如能先有个讲稿，由翻译事先得到，熟习一些专门名词的含义，效果自然还更好。兼谈绸缎花纹衍进，问题虽多，也依然能令人满意结果。如谈衣服首饰，“多作具体说明，少作文献称引”效果或更显明。使我深一层相信，在国外大学里谈中国文化艺术，需要的不是什么抽象理论，最好是用具体材料作解释，少作抽象引申。比如说，高、熊两位老师，去谈“楚文化”或“屈原文学产生的背景”，你只须说这是中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产生的物质文化背景，所用生活的器物的种种，他的产生时代，约在耶稣降生前三世纪前后，他生前活动地，在现今中国中南部扬子江流域中部，古云梦湖泽地区，那时正是楚国由全盛期转入衰落期，物质文化虽得到高度发展，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挫折，日趋于分解崩溃中，但艺术上的成就却辉煌灿烂达到一个高度繁荣情况，下面就是从近卅年来考古发现当时的面貌一部分，同时也就正是这个伟大诗人

华美无比感情××文章产生的原因。……在这种引申下，把楚墓中有代表性的起居服用器物图像，逐一映出，这么拿到任何一个大学去讲演，都将博得广泛持久的成功印象，远比目下的零零碎碎的各省拼凑一些文物作对外展出为成功。

据1981年4月的谈话稿编入，标题为编者所拟。

① 炳展寺 疑为炳灵寺之误。

答《日本与中国》编辑部

1．此次访日的感想。

印象很好。可惜时间极短，缺少研究，发言权不多。但是对于文化出版物之丰富，在具体应用事物反映艺术，所达到的标准，实十分佩服。

2．日本人认为沈先生对历史十分有研究，比写作更有名。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历史的?

这是过誉，不敢当。我事实上干什么都还认真，有耐性能持久。但是由于内向型性格限制，社会变化过于迅速，也太大，由于缺少变通适应能力，所以才就方便改了业。说写作和研究都无什么真正值得称许的成就，分别说来，放弃写作是客观变化不得已而改业；转入文物研究则因新的国家重视文物。

特别是改业早，有机会在文物各部门总是十万八万的过手经眼，当时记忆力又还好。正如过去搞文学，凡是几十年前的乡村人事景物都能记得特别清楚，且能用文字加以适当

的反映。后来搞文物还是应用固有长处，一脑子都是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所以用“凡事不孤立”的一个原则，在应用上也十分方便，不太费事，就有关文物制度特征，并分析问题，是搞了一点工作。事实上写三五千字短篇，大致还是比搞文物小论文省事一些。但社会变了，我的写作很容易犯自由主义倾向，容易出问题。搞文物则实事求是的谈问题，安全感比较保险。

因为在历博时间较久，文物各部门都有点常识，可并不真正有什么专深成就，外面传说，近于过誉，照中国古话说虚名过实，易致不祥。所以我从不敢冒充什么专家。前后虽编印过关于镜子、漆器、陶瓷、丝绸，都近于资料性的图录。即最近已印行的有关中国衣服大型图册，也不够说专精，引言中曾明确提过。内中许多待商讨问题，有待中国真正专家进一步商探。重订本明年后可付印，内中拟增加一百个彩色图，就是香港各大学教授提出意见改正的。

3．此次想在日本参观什么文物？

4．沈先生从一九二三年开始从事创作活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是创作全盛时期，全盛时期的文学观及人生观是什么？

只这几年我文字才比较成熟，但距我理想所要达到的目标还远。我原本希望能受较少限制，学习五十年，再来好好写几本书。但是社会迅速的变化，我的内向型性格能低头工作，不善于适应经常变动的新要求，所以停了笔。好在能适应这种社会要求的作家，年老的还多得是，年青的不愁没有

人。而国家在建设中，一切事都得有人十分认真耐烦去低头十年廿年去探索，因此乘方便我就入了历史博物馆，不知不觉就过了卅年。直到1978年，才有机会调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其实我文献学问极薄，知识不够踏实。只对文物若干部门的发展历史还有点点常识而已。从不敢冒充什么专家，也根本不想以先生自居的。我所有的都是常识。

对徐志摩先生的印象如何？

徐先生对我一生工作鼓励和帮助极大极多。他是个真正的诗人，为中国新诗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而且显著的贡献。

对于"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沈从文文集》的感想。

共拟印十三卷，包括各方面的较重要评论文章①。

只是作品中一部分，值得一读的恐并不多。此外四川还拟五本，可能选的完整些。北京选印四本。我在这方面发言权并不多，因为看的作品并不多。

请介绍台湾乡土文学产生及发展过程。

试分析原因，或应当说是对祖国怀念一种受压制的反映。总的倾向是值得重视的。我很希望有机会能够陪陪那些在台湾在美国的中国作家，各处去看看新中国各方面的新成就。我认为统一问题盼望在生前就见到。因为这不是少数人的意见，实在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

5．沈先生的人生道路上所受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什么？

我读书较杂，各种不同时代、不同文体都感兴趣。也似乎懂得好坏。对于唐人传奇小说，觉得处理故事极高明。三曹李杜诗也深深佩服。近廿年写了些五言旧体诗，无疑就是

受三曹古诗的启发，因为和我写叙事、写景要求相近，作来也容易。

本文是作者1982年随团访日，参加中日复交1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对《日本与中国》编辑部于9月30日书面所列诸问题，起草的回答稿。

据草稿整理编入。标题为编者所拟。

① 花城出版社后来出版的12卷本《沈从文文集》，仅收作者的创作。另外编辑出版了两卷本《沈从文研究资料》，收1983年前他人发表的主要评论文章。

答瑞典友人问

访谈时间：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九、十、十一日

来访友人： 瑞典作家汉森（Stig Hansén）先生

瑞典汉学家倪尔思（Nils Olof Ericsson）先生陪同并翻译

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王先生陪同

记录整理： 沈虎雏

汉森：我能到北京见到您很高兴。

第一次见到您的作品是七年前，那是从旧书店里得到一本旧杂志，一九四九年的，介绍世界上的主要作家，其中有沈从文，并有《萧萧》，这是最早译成北欧语文（瑞典文）的您的作品，这是它的复印件。

现在有了马悦然教授译的《边城》，这是瑞典杂志上的广告。

听说《边城》有一部电影，我还没有看过，倪尔思看过

的。

从文：香港还拍过一个，五十年代拍的，大陆还没有演过，名叫《翠翠》。

汉森：《边城》是您最成功的作品吗？

从文：是比较欢喜的习作。是一种试探，用各种不同写法。可以算是代表作。

汉森：您是怎样写《边城》的？

从文：开始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每星期发一章，一面写一面发表，事先没有想好写成什么样。

《国闻周报》不是文学刊物，但有朋友在那里，他要一点文学作品。五四以后那时候，白话小说怎样写没有一定，每人自己摸。我从不同方法去试着写，写一篇就改一种写法。不成熟的，所以叫习作。

汉森：那是不是认为不成功的？

从文：不是。

汉森：《边城》发表时，写完了吗？

从文：没写完，每周一章写出来寄去。

汉森：以后用过这个办法发表别的作品吗？

从文：没有。我短篇多，中篇、长篇少。

汉森：在欧洲短篇小说不很多。沈先生认为短篇长篇哪个好？

从文：一般有纲目的适合写长篇，有一点东西的要写短篇。

中、长、短篇没什么好不好，内容决定它，适合写什么就写什么。

汉森：您的大部分作品是短篇？

从文：长篇只有《长河》，没写完，只写到三分之一。

汉森：为什么没写完？

从文：抗战时因对国民党的批评，作品被删去许多。另一个原因是抗战中生活不安定，教书，到处走……

汉森：第二部分开始写了没有？

从文：没写。我写短篇写惯了，不像人家那样有计划。

汉森：中篇大概有几部？

从文：早期有几部，《边城》算中篇，《神巫之爱》算……

汉森：有作品发表的年代目录吗？

兆和：有，但不完整。

汉森：抗战时期比较不容易发表作品，有没有写了没发表的？

从文：短篇有。

汉森：我在一个书上看到巴金先生为您收藏了一些作品。

从文：我们过去互相赠送。文革中我的书没有了，巴金的还没散失，后来我们印选集没有原书，有些书是巴金又送还给我们，也有些是从香港找来的翻印本。

汉森：还有没找到的吗？

从文：很多东西丢失了！抗战时期到处走，书都丢了，稿子更没有了。

汉森：图书馆中有吗？

从文：有。现在一些编书的朋友都是从旧杂志上查的。

汉森：香港印过沈先生的全集吗？

从文：只有十二卷的文集，不是全集。

汉森：什么时间出版的？

从文：一九八二年开始出第一卷。

汉森：（看香港版文集）香港出这些书，是先和您商量还是自行决定？

兆和：他们有特约编辑。从文已不搞文学，不过问。但他们希望收入的，有些他不喜欢就抽掉了。有些他们也没听从，还是编进去了。是邵华强和凌宇编的。

从文：写作十年时，出过一个习作选。

汉森：（看《从文小说习作选》）这里写的是“习作”，早期作品自己又不太满意，那到什么时候的作品是最满意的？

兆和：他自己说过到三十年代成熟。

汉森：他还看自己的作品吗？

兆和：有时翻翻，在过去有很长时间我们的书都没有了。

汉森：对《萧萧》，您自己认为怎么样，作品好还是不好？

从文：还不算好。当时提倡写乡村。

汉森：您为什么写《萧萧》，有什么目的？

从文：没有目的。城乡的关系，城里人看女学生顶平常了，乡下人就不同。

汉森：您开始文学创作时，为什么要写，什么目的？

从文：要生活，要吃饭。

汉森：您在家族中是不是第一个从事写作的？

从文：是第一个。地方也出了许多年轻人，向北方求发展。

汉森：没有目的，在解放前是否也受过批评？

从文：是啊，说我没有思想。

汉森：您自己是什么看法？

从文：《习作选代序》、《边城题记》……（写了我的看法）

汉森：《人民画报》上有个介绍美国金介甫写的博士论文（看论文），能不能借看几天？

从文：可以。

汉森：什么时候第一次认识金教授？

从文：一九八〇年第一次，是得博士以后。

汉森：看了论文觉得怎么样？

从文：我没全看过（译文）。他是费正清的学生，写的不全是从文学角度。

汉森：还有什么别的外国人研究您？

从文：有白先勇的学生的硕士论文……

汉森：可否举出自己的十个重要作品？

从文：《边城》、《丈夫》、《萧萧》、《贵生》、《顾问官》、《长河》、《从文自传》、《常德的船》、《鸭窠围之夜》、《沅陵的人》……①

兆和：他二十岁一九二三年离开家乡，一九三四年母亲病了，回家探亲中一路给我的信，整理出来后就是《湘行散记》。

汉森：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他见过的？

从文：熟悉的。不止是见过。

汉森：哦！《湘西》、《湘行散记》中的人物都不是自己创

造出来的？

从文：不是。

汉森：您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城市里，只前二十年在湘西，但大多数作品是写湘西，而没有写大城市……

从文：（对城市）不熟悉。还有感情上的，对城市是讽刺的，看不惯。

汉森：沈老常说自己是乡下人，是不是说乡下人比城里人好？

兆和：不是这样，乡下人有乡下人的弱点，他知道得很清楚。但他感情上比较倾向乡下人。

汉森：在瑞典有位著名的作家，一生大部在城市，但从农村出身，他的最重要作品也都是写农村。

他有时写了一部小说，但过几年重新写同一个题目，两三次，每次都不一样。沈老有吗？

从文：没有。

虎雏：以《主妇》为题写过两个短篇，并曾打算第三次写，没有写成。

汉森：您的自传有《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这一章，请问为什么大书比小书重要？

从文：就是乡下小城市，花样多，比书本给我的知识要多。

汉森：您开始读的第一部文学著作是什么？

从文：曾孟朴的《孽海花》。

兆和：是现代人写的旧故事。

汉森：大约多大时？

从文：十几岁②，在芷江时。

汉森：早期看到的还有什么好的重要作品？

从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有些字都不认识。手边有什么就看什么，没有选择机会。

汉森：看的第一部外国作品是什么？

从文：狄更斯的，是林琴南用文言译的《贼史》、《块肉余生述》……

汉森：读过俄国的作品吗？

从文：那时候没有机会，是来北京以后才有机会。

汉森：到北京以后认为哪个俄国作家的作品好？

从文：当时……都德。

兆和：俄国作家的作品他非常喜欢。如契诃夫，有些小说像《顾问官》是学他的方法；散文他喜欢屠格涅夫，他的散文受影响。

从文：托尔斯泰很喜欢，但没受影响。

汉森：法国的呢？

从文：莫泊桑。受影响的一个是契诃夫，一个是莫泊桑。

汉森：当时还读其他外国作家的著作吗？如英国的。

从文：不认识。

汉森：中国作家中受谁的影响？

从文：没受影响。

兆和：郁达夫？废名？

从文：少。写乡土文学受鲁迅影响，是受启发，不是受文风影响。当时受一点郁达夫和废名的影响，早期，但很快就不一样了。

汉森：当时认识的朋友中有哪些中国作家？

从文：陈韦谟，学英文的北大学生，当时翻了许多东西，也写过小说。

汉森：其他的中国作家呢？

从文：那多得很！有冯至、郁达夫、胡也频、丁玲、黎锦明、徐志摩、闻一多、陈源、凌叔华……

汉森：沈老一生有自己的看法，作品有独立性，而不是看别人有什么。当时许多作家朋友，你们讨论不讨论怎样写作？

从文：讨论，（谈）新诗。

汉森：您受他们影响还是保留自己的？

从文：没有影响。

汉森：有没有试一试影响别人？

从文：没有，因为他们都是有大学根基的。

我的朋友们各人有自己的成就。我这种摸索是很苦的过程。

汉森：一辈子能保留自己的独立看法，这样的人很少，您是不是从小就这样？

从文：乡下人。我们一起写的人很多，写下来的没有几个。

兆和：他以此为生。

从文：另一方面是要摆脱湘西的（旧军队）生活，要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

汉森：您寻找自己的路，在这中间怀疑不怀疑能找到自己的路？

从文：不怀疑。干不成就当警察，再不成就当瘪三。

汉森：（指白先勇学生的论文）他这题目是《沈从文作品中死亡和水的作用》，这人觉得水和死亡具有较重要的作用。

能不能谈谈沈老和自然的关系？

从文：有一篇写我的作品和水的关系。

汉森：您童年就遇到大量死人，能不能谈谈死亡？您最小见到死人是什么时候？

从文：辛亥革命，九岁。

汉森：您二十岁知道了祖母的身世，有什么感想？

从文：没有感想。看到杀的人太多了，麻木。主要杀苗人。

汉森：关于苗族祖母的事，是事实吗？

从文：是事实。凌宇的传记其中也有错，但不是主要事情。

汉森：您出生的日子是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别的书有些是十一月，哪个正确？

从文：12月28是公历，十一月二十九是农历。那一年这天是十二月二十八。

汉森：当时看到那么多人被杀，习惯了，是不是还难受？

从文：不难受。当时不难受，是麻木，但印象很深，影响到终生对滥用权力的厌恶。

兆和：他说宁要知识不要权力。

汉森：关于您从军，有几个说法：一说家里穷了，一说姐姐死了，自己要去从军，又一个说是妈妈要您去的，哪一个正确？

从文：主要是家里穷了，家里对我绝望。父亲出走，二姐死去，妈妈也看开了。同时那地方家家当兵，正是为了镇压苗民，从清朝起是重镇，是军事城市，当兵是一条出路。

地方又迷信，最大的房子是庙宇。

汉森：是佛教？

从文：不止佛教，还有苗巫，从楚国起就有，巫不一定是苗巫。

兆和：《湘西》的《凤凰》中讲到了。

汉森：我看过您一个译成英文的小说，描写了军中的残酷故事，一个军官女儿病死了，埋了，又被人挖出来，那是事实？

兆和：那是《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是商会会长女儿。

汉森：见到这个残酷事情，有什么想法？

从文：残酷事每天都看到，太多了。

汉森：那小说最后一句说："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沈先生自己对战争有什么看法③？

从文：土民对杀人看得多了，很平常……

汉森：我看过马悦然先生一篇文章，说您一九二九年就接触到了佛罗伊德的学说，是怎样接触到的？

从文：我一个亲戚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作助教，他介绍的。是一九二四或一九二五年。

汉森：受了他的什么影响？

兆和：多少受一些影响，如他很早的文章中就有"潜意识"这个术语。

汉森：当时北京其他作家是否也接触到佛罗伊德的思想，

或受他影响？

从文：当时没有，后来才有书出版。是夏云表弟在教书，他有一些书。

汉森：马悦然教授说沈先生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先锋派的作家。

兆和：请解释一下“先锋派”？

汉森：就是自己创造一些写法的作家。

从文：我是没受别人影响。

汉森：当时您的作品和别人不一样，其他作家也是这样看，他就是有自己的道路。当时是用自己的风格去写，别人是不是讨论过您的写作风格？另外，沈老是怎样认识自己的风格？

从文：我是在写作中试验，没觉得什么了不得。别人是分左派、右派。

兆和：当时就有人讨论他，如在台湾的苏雪林写过《沈从文论》，比较全。左翼则多从立场上批评他。

汉森：一九四二年毛的文艺座谈会讲话，沈老在什么时候看到，有什么想法？

从文：没看到，解放后才接触。

汉森：您去过延安吗？

从文：没有去过。徐特立一九三七年在长沙曾约请过几位作家谈话，他说抗战是持久的，能够去延安的我们提供方便，不能去的我们也要在后方做团结工作。

汉森：解放后接触了，有什么看法？

从文：说得很对，但是做不来。

汉森：您二十年代末和胡也频、丁玲合办刊物，怎么开始搞这个工作的？

从文：先是大家生活都没有出路，都是开始写作，发表困难，就想自己来办刊物。到了上海后有了条件，就办起来了。

汉森：三十年代也办过吗？

从文：是替报纸编副刊，不是自己办。

汉森：沈老作品和其他作家不一样，如写男女关系，别人写汉族的传统，如巴金写的是靠人介绍，非常复杂，沈老的《边城》写的是苗族的习惯，是比赛唱歌来定情。

从文：现在去还有，他又没有文字。

汉森：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很理解。但当时是否有汉族的人受不了，说他是黄色的？

兆和：说不好的有，不是说《边城》黄色，而是说猎奇。

汉森：像《雨后》和《柏子》呢？

兆和：有的，有人批评说是黄色的。

汉森：但沈老也有自己的看法吧？

兆和：他有，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说不是为你们写的。

汉森：您的作品中有妓女、土匪，一般人都是持批判的态度，您自己对这些人有什么看法，例如抽鸦片的……

从文：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这样，吃烟用大秤称，不算回事。

汉森：我印象是您不是为了谴责批判这些人。

从文：就是写出来。还是带着同情的。

汉森：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

从文：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落泪）。

汉森：想谈谈解放后的工作。我不太熟悉，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文物有兴趣的？

从文：小时候就对这比较熟悉，刚来北京时，接触也较多。

汉森：从事文学创作时，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没有失去兴趣？

从文：一直有兴趣，收集了许多漆器、瓷器、绸缎……

汉森：关于文物，五十年代写过些什么？

从文：写了几本书，丝绸图案，《龙凤艺术》……

汉森：（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谁出版的？什么时候搞的？

从文：（谈此书的曲折过程）……

汉森：（看台湾删去作者署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盗印本）台湾发表您的文学作品改不改？

从文：只《联合文学》上发过，没改，但金介甫的文章被改了。

汉森：您一九八三年回过湘西？

从文：一九八二年五月。

汉森：留下什么印象？变化大吗？

从文：变化不太大，因为人不容易变化。

汉森：生活习惯还和过去一样吗？苗族的。

从文：没有大变化。

汉森：沈老回过湘西几次？

从文：一九三三年在北京结婚，年底回去探望母亲病。

一九五六年底以政协委员视察回去过。一九三七年抗战中路过沅陵，未去凤凰。一九八二年是最后一次，两人同去。

汉森：沈夫人您觉得和想象的湘西是否一样？

兆和：去的地方很少，沅水流域看的不多，只看了几个点。是黄永玉请去的，他的家还在，可以把从文保护起来，少许多应酬。

汉森；沈老旧居还在，有很大变化吗？

从文：没有多大变化。有人分别住着，县里准备收回来。

汉森：北京买不到沈老的书，您有什么看法？

从文：印得少。多年不印，需要的人就不好买了。不好的，打斗的书印了许多。

汉森：昨天下午访问了汪曾祺，他说现在年轻人有沈从文热。

（对兆和）您第一次见沈先生是在上海？

兆和：我是他学生，一九二九年，在上海中国公学。

汉森：上的什么课？

兆和：讲现代小说，我选他的课。

汉森：是第一次？

兆和：他从来没教过书，只读过小学。那时写文章生活很困难，后来徐志摩推荐给胡适，说他写过那么多书。

因为是作家，选课的学生很多，他来了在黑板上写了准备讲的，却讲不出来。后来又擦了，又讲……还是讲不出来，大家不敢笑。最后在黑板上写：

“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回身就走了。

汉森：以后听过许多课？

兆和：他不会讲课，讲得不好。后来他在黑板上写出讲课提纲，慢慢一点点讲了。下来我们都笑他。

他写文章，不会像有经验的教授那样说出一套道理。他只是为学生改稿子，同时自己又示范，写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

汉森：是一九三三年秋天在北京结婚的？老大什么时候出生？

兆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老二是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一，一生下来就打仗。

汉森：您当时的工作是什么？

兆和：三十年代没有，只在青岛大学做过半年图书馆工作，同时在青岛玩一玩。后来在云南教中学的中文、英文，教过好几个学校。

汉森：解放后呢？

兆和：还是教书，在师大附中，后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一九五三年起，一直到文革中刊物停了，去干校。一九七二年退休。

汉森：什么时候去干校的？

兆和：一九六九年。以前就是搞运动，机关所有工作都停了的。我是一般干部，没有受冲击。

汉森：你们是一块儿去干校的？

兆和：不是，本来按规定老弱病残不去，只有我们干部去，九月下去的。但后来林彪的一号通令，把各种人都送下去了。

汉森：在干校怎样，有机会接触吗？

兆和：除非他生病，要我照料。我在湖边上，要走二十里泥路进城，再坐一小时的长途汽车。

汉森：从干校回来时，书都没有了吗？

兆和：没了，只剩少量他看重的文物图录，没有他自己的作品。

汉森：现在恢复到原有的一半吗？

兆和：旧作多半都是朋友们送的，后来收集的。

汉森：很高兴能直接谈。过去看到一些文章谈沈老，没有这次直接交谈明白。十分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

① 作者临时列举，未必准确反映自己的认识。其中《常德的船》和《沅陵的人》均是《湘西》的一章，《鸭窠围之夜》则是《湘行散记》的一章。

② 十几岁　作者1921年夏在芷江有机会阅读文学作品，时为18岁。

③ 根据汉森所述，他阅读的是《从文自传·清乡所见》一章，记土著军队在榆树湾以清乡名义滥杀无辜农民的情形。汉森所问的“战争”，疑指文中说的“清乡”。而《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则是作者据《清乡所见》结尾记述的一个事件，另外创作的短篇小说。该小说写作时间比《从文自传》早数年。

无从驯服的斑马

无从驯服的斑马

WUCONGXUNFU DE BANMA

本集为新编，收作者1951至1983年间留下的杂文、抒情散文及文论稿共13题，实收文章11篇。作者生前均未发表过。集名取自其中一篇的篇名。

《抽象的抒情》已编入全集第17卷，《凤凰观景山》已编入全集第12卷，本集存目。

《武训传》讨论给我的教育

解放了三年，我也学习了三年。从国家全面看，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伟大，实在比目前一般人所提到的还要高过得多的，因为我们如眼见近五十年社会的种种，尤其是近四十年军阀官僚政治的腐败无能，媚外惧外，和地方上土豪劣绅小官小吏如何作践人民，都必然理会到我们的社会，曾经是在一个如何可怕情形中过下来的。人民革命经过三十年努力，从极端困难中打垮了日帝国主义，解放了全中国，产生了个没有贪污的崭新国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百年特权，一下铲除，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大事，是史无前例的。更重要还是在这个新国家基础上，由于毛泽东正确思想的领导，国家的一切发展，很显明是为一年青一代中国人准备一个更美满幸福环境的。为达到这个目的，目下就有千万人各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努力。尤其是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工作更艰苦沉重。从这个发展过程中，来看看我们个人过去对于

国家的看法，仔细检讨检讨，就不免犯了许多错误，都走的是改良主义具妥协性的道路。一面妥协于十分腐败现实政治中，虽不同化，却已习惯，享受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的自由主义。另一面，即对社会国家还有些好理想，对社会有些新见解，或大胆作了些预言，可是终不脱书生之见，注意的是点滴片面，而不及注意掌握全面。尤其是看不到社会的蜕变，必从流血斗争□□，知识分子这种思想，分析说来，还不外“自私”二字，为己谋者多，为人谋者少。即凡事退缩，也并不与人争名利，还是出于一种自私自保意识。对国家发展，对人民革命发展，都掌握不住全面，看不到全面。也因此而更容易犯错误。特别是生活越孤立，越和社会隔绝，越容易犯错误。这人是文学家也好，是科学家也好，越有社会地位，就越会受反动统治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挡箭牌，缓和革命向前的工具。个人虽若生活得十分自由，其实对国家真正的进步理想，即不免发生冲淡作用、阻碍作用。我个人就可说是这种人中一个代表，一个很好的范本。对政治，对革命，是极端无知。长年关在一个二丈见方小房子里，一脑子的理想主义，一点不切于实际。只知道社会得变变了，可是到真的为万千人，用流血斗争在努力着手作种种试验时，用实践来促进这个历史的变时，我可为流血感到吓怕，终于在炮火声中疯下来了。这一来，自然什么都隔绝了。从《武训传》的学习文件检查我们个人过去，用一个共产党员立场来检查一番，个人就很容易受同样批评。这是一点。

其次，是电影《武训传》问题。我没有看过，所以无意见。但事先却看过李士钊的画传①原稿，是在革大时，记得

曾经还要我写点序言，没有写。我对于这事的感想是另一点上。这电影听说费去三十亿[②]，说明上海影业还能够投资，也反映电影还可以赚钱。同时却又听朋友同道说，戏本太缺少了，有作用的好文学作品太缺少了。这部门印刷增多了，读者增多了，至于一般水准，实在说，可配不上时代要求。分析检讨一下，事在意料中。全国解放了，国家在动中，在发展中，远非过去官僚时代可比。过去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都各在行政上担负了一堆工作。每人都一天在忙忙碌碌。另外年青一些的，也有更多事待作。还有在旧时代的作家，又或因工作忙，或因生活还有些和新社会要求不十分溶合，手中一支笔不知如何使用，都似乎停顿在那里。

问题也就在此，目前情形下，《武训传》如从政府领导方面看来，不满意，事实上却又有上千万观众，要从电影小说中得娱乐和教育，怎么办？是听之下去，还是想想办法。如总得想办法，那就得看看两年来文教政策，是否已十分完美或有些偏颇？是不是有些顾此而失彼？是不是也还有些事，因为陷于主观，把一些本可以为国家好好用的力量，都消耗浪费了？在政治上谈团结，经济上谈两利，都见于实行。文学上如何发动有□人力，是否已好好作过？如说已作过，又用的是什么一种方式？三十四年[③]为团结，毛主席当时就还亲自跑到重庆去实行和蒋介石谈判。为经济互利，刘少奇还去天津。文学上的事，是不是尽如一个《文艺座谈》熟读，或如其他近似学习方式，即可鼓励更多能用笔的来用笔？领导全国文协的或北京市文协的，是不是也检查检查一下工作，

如何才不至于把领导工作流于官僚主义？是不是已尽了应尽责任？是不是有些到如今还隔着的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对这问题还应当有个较深刻伟大的看法，才合乎马列，合乎领导？别的事不用说了，只试看看今天《光明日报》上一位白村作的诗评④，引的那些是什么诗，陈安潮评的某君文章⑤，这种诗，这种文，还在印行供应市场，更相同的作品其实还多得很。另一面，有些有用力量，却搁置到那里听其耗费。真实点说来，即这么办对国家也大不经济！伟大的毛主席说知识分子改造，是必需的，又说是得慢慢的努力。这自然是对于一般知识分子而言。至于知分中的文学作家，改造更是迫切必要事。但如何来把有用力量贡献出来，恐就不是机械的一经学习改造即可见功。如能见功，有些事就不至于如当前情形了。当前事实上，即有许多老文化工作干部，写不出作品能配合时代需要，而数以千万计的观众或读者，却迫切需要通过文学戏剧电影的形式来教育提高自己时。这种事实是值得领导文化工作的同志严正注意的。能严正公平而无私的来注注意，有些事就好办多了。

《武训传》的讨论给我的教育即这两点。重复简括说来，即个人过去工作，即走的是改良主义者道路；其次是由于《武训传》电影的讨论，使我觉到这问题对目前文化部领导工作，有值得再认真一些检查一下工作，如何团结如何鼓励作家努力把精力解放出来必要。

最近常听人提起“历史”，说凡事要联系历史。我们正在为殷周古物作陈列，想起历史上的周公握发吐哺故事也大有道理。故事虽未必可信，但至少却反映周公当时为了国家忘

了自己的精神。不知道是不是当前也还有用?

本文按内容线索，写于1951年6月2日。

据原稿编入，原无题，篇名为编者所拟。

① 画传　即李士钊、孙之俊合作的《武训画传》，1951年1月出版。

② 三十亿　人民币旧币数。1955年改新币时，旧币30亿合新币30万元。

③ 三十四年　即1945年。

④ 诗评　即1951年6月2日发表的白村《评〈野狼湾〉》，对诗人徐放的诗集有所批评。

⑤ 文章　指同日发表的陈安潮《〈国际家书〉的语言》一文，对李又然的《国际家书》语言生涩有所批评。

《我的学习》废稿存底

…………

一个预言性的和童话一般美丽神奇的时代，已由于万千人民在一个领导下，为同一目标而努力，三十年的长久斗争，真的已如海上航行的船只，慢慢的从地平线上出现了。我们用什么来欢迎这个时代？

就文化领导机构的领导方式说来，和在领导计划中所作的有关出版公私兼顾种种设计说来，及对于青年干部作家的培养方法上说来，无事不见出负责方面从各方面设想考虑的周详。凡符合人民所要求，为多数人民所喜爱，而又对于全部文化发展有长远利益的，都无不十分注意到。尤其是从人民群众方面看，对于文化干部各部门工作成就所寄托的殷切希望及热烈鼓励，无论是一般观众和读者，或在工厂、在部队、在农村，都可说已到达了一个历史从来所未有的情形。一切还只是发轫，去全面展开的建设期还远，就已非过去任何时代文化人所能梦想。比如说，一个成功的作品，一个乐曲，如为人民所接受，三五天内就可成为全国人民所熟习的

事物，以及半个世界人民所接受所熟习。请想想，这是个如何景象！

就解放后所能见到一部分文学作品说来，在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年青一代新作家，从农村从工厂从部队生长起来的文化工作者，在短短数年中的许多成就，尤其重要是它的普遍成就，都在新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

惟伟大时代对于文化要求的伟大成就实过于迫切，翻翻看几个具全国性的文学艺术刊物，和重要日报文学副刊，不可免会觉得有进步启发性的评论，有现实鼓动教育性的小说和诗歌，特别是配合人民觉醒社会变化，生长对于爱祖国文化号召，有启发性的深入而通俗的介绍与报告，不能讳言，质和量都还显得不够和伟大时代要求相称。一个批评家或一个作家，一个组织领导者或一个文化记者，如希望把他的工作表现，能和国家人民要求结合起来，一支笔似乎还得从不断学习中，浸透了一种诗的感兴，方能更好的完成人民所托付的任务。这种诗的感兴，以个人私见，是需要对祖国文化各部门学习理解的不断提高，方能表现高度政治觉醒下人民对于祖国对于世界文化的反映。中国人民友人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政治评论，和法捷耶夫的文学报道，所表现的对于文化史的深致理解，以及由于这种理解，而对于现代苏联文化对将来人类的重要责任和伟大贡献的认识，也就格外明确，由此作品中于谨严细密论据里，充满活泼异常的表现技术。我们文化工作者，实在值得特别注意。

又在“政治高于一切”、“一切从属于政治”、“文学艺术必从属于政治，为广大人民服务”原则下，领导方面如何即可以使政治本身从不断修正偏差中，成为一种完全的艺术，

似还值得从工作者全面加强一下新的检查和联系。政治重斗争，乐曲则重和声。斗争意义极复杂，有一规律可循，即从矛盾中求同一，求统一。和声则重在从不同中求谐和。乐器应用各有不同，音程各有不同，指挥调度有方，知善用所长，则惟其不同，由彼此相需相关联原则，作成的大乐章，使人听来反而容易有个一致性，如万壑争流，齐向理想奔赴如恐不及。如处理不得法，只知在整齐节奏中求形式一致，则任何优美乐曲，演出时将只是一片嘈杂，不易得到应有效果。或者因某几种乐器性能过于复杂，不易使用，即以不适需要为词，自足于较原始的三五种简单乐器，求演出较复杂的乐曲，自然更无可希望。文化上的领导，如何使人人材当其用，得其宜，各在一定岗位上尽其所长，虽劳而不怨，也是一种真正伟大的艺术！政治艺术最高的成就，应当是演出指挥者和作曲者共同长处都能深刻领会而集于一身。从全面政治设计说来，毛泽东伟大思想是那么运用到三十年人民革命全程里，历史发展适如一个乐章发展，在这种堂皇壮丽无以复加的大交响曲指挥下进行的。文化领导比起来只能说是一个乐章断片，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是乐章中相当重要显著突出一个部分。如何来更完满的完成历史任务，使每一种乐器每一个奏乐人都用其所长，是演出者责任，也是导演者责任。

这也是我一种学习，即从新的观点立场上，客观认识文学艺术为政治目的而服务，所触着的一个现实问题。三五年后随着土改完成，农产提高，重工业建设逐步进行，文化高潮的来临是必然的，不会要等待到十年八年后的。从全面说，如何来迎接这个人民盛世，必有个更多方面的准备。这个现实问题实待商讨，待解决，待团结动员更多人去用生活学习

实践，再用笔表现出来。从个人说，我的过去把工作，把生活，完全孤立起来所犯的错误，在工作中自高自大，脱离群众，游离于人民革命以外的超阶级胡涂思想，都需要从不断清洗，检查并修正错误中，学实事求是，向人民学习，再把工作面向人民。

一九五一、六月廿六写

八月十二重改

1951 年 11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作者检讨性长文《我的学习》。本文则是早期起草的另一残稿，原稿共 13 页，现仅存 10 页以后部分。从写作的时间和作者思绪上看，与 19510902 的《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长信有部分相近，而《我的学习》发表稿，则是在当年 9 月以后另外撰写的。

《我的学习》编入全集第 12 卷，《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编入第 19 卷。

一个知识分子的发展

上一个月，我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听到传达周总理关于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和馆中同事，都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心情。加深了一层个人在这个新时代工作的责任感。因为自从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天安门上面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一天起始，全中国人民都为这句话所鼓舞，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按照一定计划，进行建设祖国的工作。试想想，六亿双勤劳的手，在为同一崇高艰巨目的，而进行忘我的劳动，一年接着一年发展下去，凡是不合理的事都总可望逐渐合理，必然做到一切力量都集中使用到把中国真正站起来基础越久越稳固壮大工作上面，对中国，对世界和平力量，这将是一种多大的事情！这次又因参加政协，昨天听过陈毅副总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后，回家路上，在车中，和年过七十，在本世纪初期，和帝国主义者办过交涉极久的叶恭绰先生，谈起近五十年来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问题时，他说，有两次关于国家重要消息使他流泪：一回是孙中山先生宣布辛亥革命成功，另一次就是毛主

席在人民政府成立时，说的“中国已经站起来”。因为都和反帝有关，和对于国家新的转机有关。我想凡是年在六十上下的知识分子，和叶老先生具有同感的一定不在少数！新中国成立了六年，我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在党的不断教育和帮助中，和亿万人民一道，从一种崭新工作态度中，沉默进行工作。随同社会发展，经过革大学习，和土地改革、五反，几回全国性重要运动的参预，一面认识到社会在起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另一面也体会到个人生命，在随同社会革命亿万人行动斗争的浪潮，起着不断的变化。全中国亿万人在进行的生产建设，引起社会面貌的改变，是正如彭真同志在上次北京市文代会上所说的，一分一秒都有所不同的。

至于我个人呢，说来变是变了，不过由于工作性质和体力关系，比起许多朋友来，不免落后了一大段。譬如朋友中巴金、老舍、曹禺、冯至诸同志，几年来都为国家人民跑了许多路，作了许多事情，还写了许多对人民有益的好文章。我却真像个退了伍的老兵，长时期蜷伏在天安门里博物馆研究室和库房文物堆中，只是浮浮泛泛的学习了一些文物常识。旧有的熟习的东西，慢慢的都生疏了，新搞的业务却博而寡要，表面上也算是个文物工作者了，事实上只是个凡事一知半解的“假里手”。又由于史部学底子极其薄弱，政治理论水平低，学习业务尽管还发迷专心，到应用时可毫无条理。一切表现都落后于社会现实的要求极远。翻来覆去，工作始终脱不出一般常识范围。工作学习上虽有些外在障碍，思想方法不对头，应当是主要原因。加之旧社会带来的情绪意识，扎到头脑角角落落，平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有机会还不免向上泛滥，发生对旧工作的失败感，和对新社会的退缩

感。外来启发鼓励，我缺少深一层考虑，自然也难于理解。心中即或时时刻刻想到革命过去的困难，和目下全国范围内亿万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建设劳动，以至于党对于我个人的工作上的处处照顾，鼓励，思想上的帮助，我必须不自外于人，来好好的工作，把所有力量全用出来。个人对社会关系虽那么理解，但是，运用到工作实践上时，总还是好处少而毛病多，经不住逐件检验。凡是馆中共同完成的事情，我照例作得极少，通过个人完成的，又多是轻而易举极其表面的。小事作得比较谨慎，大问题却把握不住。旧知识分子思想作风还占优势，新东西就不易抬头。特别表现在工作作风粗率，和对群众关系的疏远，不善于自我批评，能任劳而不能任怨。虽有热情而不够细致。在某些研究问题意见上，不看时间地点，坚持片面主张，近于顽固。对于自己过去写作思想倾向上的错误，也不愿加以彻底分析批判。因此尽管存心努力要从工作上向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行动看齐，事实上能学到的，恐怕只是极小极小一部分，做毛主席小学生的资格，还隔得很远！例如由于思想无条理，有时写点关于业务上问题的小文章，让大家看得懂，就办不到，学不好。唯一的一点思想情绪发展，就是过去三十年，完全从个人出发的写作态度，自高自大，脱离人民的工作作风，处处见出不过问政治的老牌自由主义作家的顽固自信，现在看来，已明白真是幼稚胡涂之至。这完全是自私、狂妄。仔细分析，这种缺少正确阶级立场超然独立的写作态度，这种不分好坏的伪自由主义，正是半殖民地化的中国大多知识分子一种类型的反映。我过去许多年来，虽写了一大堆作品，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在主题内容上，还接近人民感情，风格上也有些新意，大部分作

品都不成熟，情绪且极不健康，对年青人说来，坏影响实多于好作用。一部分作品且会产生麻醉毒害作用，引起许多年青读者安于当前那种腐败透顶的社会，和人民革命斗争游离，胡胡涂涂混日子下去。近几个月来，报纸上常见到各省市取缔荒诞、淫猥、反动的小说报刊消息，我有许多作品，事实上就属于这一类性质，在旧社会毫无进步作用，在新社会更不宜于存在。我在写作中所犯最大的错误，还是本来从人民群众队伍中生长的，到后却把自己孤立起来，轻视群众集体的活动。本来不懂政治，由不明白而害怕政治，在抗战胜利结束前后，正值国内政治情况特别复杂尖锐时，我却关在二丈见方的小书房里，完全凭个人主观感想，写过了些十分浅薄胡涂，具有不良影响的文章。例如在一篇没有刊出的论党派的文章中，一面说国民党前途无希望，另一面却认为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其实既不熟习国民党，更对于共产党缺少认识。我所见到的国民党腐败面，不过是孔祥熙一流人出洋相，和我接触到的其他一些亲戚朋友堕落贪污的情况。至于共产党情形，却可说丝毫不知。谈文学，只以为胡风就是代表。因此做八股似的，提出一个荒唐到家的结论说，明日真正能够担当天下大事，调和国内外局面使国家向前发展的，只有一个能折衷于国内实力派，又能折衷于世界两大阵营的"第四党"，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集团，能够有办法！我虽并没有"天下舍我其谁"作帝王师幻想，但在写作意识上，却不免以在云端里诸葛亮自居。既不过问对读者的影响好坏，也并不考虑在抗战八年中，饿得瘦瘪瘪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大能耐，多大抱负，能够负起责任，适应国内外复杂局面。越写越和现实脱离，也自然越和人民对我的期待离远。记得

当时有人批评我时，我还奇怪，你们口口声声争自由，怎么就不让我自由表示对国家明天的意见？我那里明白，在复杂尖锐阶级斗争中，知识分子真是软弱之至。在当时情况下，知识分子如果真的成了支配国家命运的领导者，不到五年功夫，恐怕所有一点民族工业，都会被美帝商品倾销搞垮，五亿农民一部分得饿死，一部分也只好回复到半农奴凄惨状态下去。有真才实学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建设时，在科学和工业及一般文化领域中的推动作用，我并没有估计错。可是现在才明白，国家建立尽管是离不了科学和工业，可是决不是单纯几千个科学专家排排队，就能把一国科学和工业搞好。以中国情况，若缺少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毛主席坚强正确领导的人民革命，联合工农进行的持久阶级斗争，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旧社会推翻，把以蒋介石为首腐败透顶了的官僚地主政权，连根到底粉碎，把盘据到中国一百年长久的帝国主义者势力整个扫荡，给知识分子开辟一条为人民服务的广阔道路，任何第一等天才的真才实学，就毫无发挥的余地。不甘心守住条件困难的大学实验室或图书馆，就只好跑到上海去什么外商银行、洋行、药房，帮同外国商人骗中国人的钱，分一点点人民血汗。或从蒋介石下边讨个一官半职。对个人生活算得是出路，对国家前途，那里是什么真正出路？他和旧社会统治阶级越接近，也就必然越加和大多数人民苦乐离远。在那种基础上说爱国，说治国，都完全是梦话！

还有一种科学家，过去以为能写出很好的法文英文论文而自豪，却不肯用中文写它。从个人说来，当然也算是一种出路。可是老百姓养活这种对国家人民毫无情感的知识分子，于中国前途发展，有什么用处？我虽并不写这种论文，也并

不以为政治上必须依附英美找出路为合理。可是我的思想意识，当时却也不免相当倾心于英美资本主义社会方式下许多东西。我在国内出版的一些书籍，序言上总不忘记要提一笔，不希望有更多读者。并且隐隐还以此自傲。好像一个唱戏的人，明明白白非靠观众不可，却在戏院门前挂一块牌子，写上“没有人买票，也到时开锣出台”。可是当朋友把我几个故事译成英文，在英国出了个小册子时，我心里就依然还只希望多卖些。基本情绪和一些用外文写论文的科学家有什么不同？其实我写到的故事，大都不是中国近半世纪社会变化中重要事件，更缺少对祖国人民在现实斗争中表现真实的热情。这些作品在国外越流行，也只是越增加读者对中国不正确认识。即或爱中国人民，也不能体会中国人民更可爱的地方。在国外读者面前，造成对祖国人民健康的发展和痛苦的挣扎，有所歪曲和粉饰。所以我这种写作思想、作风和影响，现在细想起来，真不免毛骨悚然，实在还远比用外文写论文的更加要不得，对人民不起。

我虽然出身于湘西边上一个小城市，并不是“袭先人之余荫”长大的，由于生活发展，到几个大都市学校中胡混了二三十年，逐渐被都市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浸润，成为一个半知识分子，后来并且发展成为一种和人民日益远离，也和许多真正正派、前进、对国家前途充满热情的知识分子游离，而在一种近于病态自大、顽固而又情感脆弱的情形中发展下去。凡是这种性格，照发展规律说来，如蒋介石不倒台，是迟早会容易由思想意识的反动，逐渐进而为行为反动的。所以到后来，虽并不曾被蒋贼拉下水去，可是也真是到了坠落危险的边沿。北京解放，人民才重新把我挽回到人民队伍

中来，学习把工作一切从为人民出发，重头作起。

因为有这么一种过去，我的写作生活，在解放后自然是难以为继，并不奇怪。新的社会正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人民群众斗争发展中生长，再不需要我写的那种空空洞洞的新传奇故事，更不容许这种对年青人明白有害的作品继续发生影响。新的事物我全不熟习，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得到党的帮助，我转到了一个自己和友人都料想不到的新的工作岗位上。前几年，除了极少的几个相熟朋友知道我在作些什么事，其他方面的联系，全都断绝了。

新的工作既极其生疏，也相当单调，体力又不大好，以我那么一种性格的人，居然能那么工作下去，许多人恐怕都不容易想象。我自已呢，倒以为极其简单。国家大事情我通不知道，党一再告我们，工作无论大小，都要人好好的做下去，都是对国家有用的，工作上生活习惯上自然都不免碰到困难，还是用一个“接受”态度，努力克服下来了。先还只是从个人出发，以为只要在职务上不尸位素餐，像个文物工作者就够了。自从美帝发动侵略朝鲜战事，并公开表示用武力强占台湾海峡，支持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后，我想我这么下去可不成。我如果真的这么沉默下去，倒有利于蒋匪和帝国主义者，好借此造谣宣传，共产党如何如何压迫作家。这些历史渣滓，是不会懂得中国人民心理的，更不会想到一个三十年来什么都不相信的沈从文，现在就深深相信中国必需有个共产党来领导，才会把中国搞好。我这点信仰的建立，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共产党给了我们眼见一系列对国家大事安排的伟大成就上建立起来的。

我一九二三来到北京，在北京城里，我看到曹锟的贿选，

张作霖入关，溥仪出宫，孙中山先生北来，“三一八”事件，李大钊先生牺牲，以及北伐前后北京的种种，看到大革命失败后相熟朋友前后的牺牲，看到“一二八”后上海吴淞闸北，被日帝国主义者炮火对中国土地的蹂躏，看到北京东交民巷和上海租界，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的气焰，和各种不同洋奴的丑恶。我还看到抗日战争开始，日帝国主义者第一次在北京上空出现的轰炸南苑的飞机，和抗战胜利结束前夕，最后到云南上空轰炸中国人民的七十六架飞机。……我另外还看到在蒋介石政权下的社会各种腐败的现象，抗日时期的虐待壮丁，复原时期的接收贪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三年的解放战争，瓦解了美帝所支持的蒋介石腐败政权，建立了一个每一件事都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而切实努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并且在运用一切方法，把全体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动起来，为建设祖国而劳动。现在更鼓励所有知识分子，把一切有利于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全体人民事业好好结合起来。一切真正有用的专门知识，都有机会充分得到发展，使用到人民最需要的工作上去。每一个人的劳动，都是为中国全体人民实现一个“更好的明天”而准备，每一种工作的成就，都显明帮助到其他部门工作的发展和提高。一切先进工作经验，在最短时期都可望成为全国共同学习的模范。我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活到这么一个崭新的社会中。我是一个充满幻想头脑的人，而过去对国家社会许多幻想，现在差不多都可从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一定计划中，通过千万人共同劳动中，童话般一一实现到我的面前。一条黄河可以想办法管制起来为人民造福，一条长江也可望同样管制起来为人民造福。我活到这么一个时代中，有什么理由不拥护中国共产党？

我难道还能够坚持个人过去写作上那种极端错误认识，自外于人民，反而长此沉默来为台湾蒋介石残余张目？几年来，我能够在我并不熟习的新的工作中，学习为人民事业服务，就因为我觉得在这么一个伟大时代里，即做一个极普通的公民，也比在旧社会做一个误人子弟的作家或教授好得多。

听到传达周总理对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后，我有说不出的感情，就是试从工作上分析检查一下自己。几年来我真正为人民做的工作，实在太少，远不如人民对我的期望。而得到的优待已太多。我由于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抓得紧，业务学习又太杂，现在有机会让我来多做点事情，本领可不够。我还待进一步整理自己一下，准备来在党的教育帮助下，才可望把所有一点小小长处，配合国家需要，更好更多为国家作点事情。要重新努力，学习使用手中这支笔，来为劳动人民全体创造出的成就颂扬讴歌。三十年前我就知道西山有个大铁厂，直到前天才有机会看见石景山钢铁厂高炉和炼焦炉，在一大群年青工人劳动操作下生产情况。我早就听说北京郊外国棉二厂，是祖国在建设中万千个新工厂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昨天才有机会看到几千年青男女工人，守在崭新机器边，非常热情细心的把青春劳动，贡献给祖国人民的情形。使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真实的崇敬外，还想向这些一生中可能只有机会偶然见过一面、永远不会相识的年青朋友，提出一个保证："今后要把工作态度永远向你们看齐。"一定要学习你们的耐烦和细心，为建设祖国忘我的劳动。我深深知道，祖国能够如毛主席说的真的站立起来，不怕任何风雨，不怕包围封锁我们的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压迫，稳定坚决一直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前进，是由于祖国有亿万和你们一样的青年，

在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守在各种各样不同工作岗位上，用了个完全同一的信心鼓励着工作热情，日以继夜的为祖国而劳动的结果。我不仅要向你们工作态度看齐，还要把我几年来从祖国文化遗产中学到的一切，特别是属于工艺图案中健康优秀的部分，好好发掘出来，和你们工作成就加以结合，让亿万人民，享受你们劳动的成果，也享受祖国过去累代纺织工人的劳动成果。而从这个基础上，年青美术图案设计工作者，还会有万千种健康美好的新花朵，创造出来配合你们的工作。

这是不是做得到的？我相信是完全做得到的。因为活在伟大毛泽东的时代中，凡是合理的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总会迟早可望实现的。我们要解决台湾问题，让台湾人民脱离美帝的武力支配，蒋介石的残酷压迫，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还盼望那些远在国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于新的国家种种，受帝国主义者长期宣传所蒙蔽，不明白真实情况的朋友和学生，应当去掉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赶快想方设法回到祖国来，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工作。祖国需要你们少壮比我们还重要。

本文作于 1956 年。据手稿编入。

大好河山

一九三七年八月里，日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疯狂行动，引起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时，接着北京芦沟桥事变，上海方面"八一三"战事也爆发了。就在这个期间，我和北京文教界中一部分同人，由北京过天津，由山东转南京，又由南京转搭轮船往武汉。一路上的空袭警报，和逃亡难民在车船上、码头上的混乱，正由炮火焚烧到的地方逐渐向内地发展。我们也就是带着这种影响的向后撤退的难民一部分。

船沿长江上驶时，大家在舱板间眺望着宽逾十里的广阔江面，但见波平如镜，两岸烟树齐平，和淡紫色天际相接，溶成一片，临水城镇房屋和江边寄泊船只，嵌到这个背景中，都和画里一般。但是从古人著名绘画中，却找不出任何一幅画更能够这么给人以"大好河山"的深刻感人印象。有一个习历史的老教授，年纪近六十了，是北方人，生平还是第一回坐江船，看到长江风景，情绪更加激动，靠在栏杆边，一双老眼湿莹莹的，向我们宣称说：

"中国一定有办法，绝不会让帝国主义强盗长久得势！你

们看看，这么一片大好河山!”

大家没有一个人回答，可是却完全同意这个老先生的意见。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说“大好河山”，用的虽只是一句平常习惯的旧话，意思却是极其复杂的。因为这船上有学历史的，学文学的，学科学和政治外交的，还有学植物和水利的。都各用所学问题几十年的困难和当前情景联系起来，各有体会，各有痛苦。但其中却又包含两种基本共同心情：一是对日帝国主义者的深刻仇恨。明白由于蒋介石的腐败政治，投降政策，和帝国主义者的对中国阴谋，才有“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和“八一三”。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人民虽已群起抗敌，无如准备不够，一片大好河山，许多地方恐不免要暂时沦陷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手中。另外是从这条浩荡万里的长流的历史发展来看，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仅肥沃了两岸土地，哺育了亿万中国人民，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民，由于一代复一代的劳苦辛勤，建立了无数的美丽城镇，还发明创造了无数重要文化。对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也有了近一百年历史。人民为保家卫国，群起抗战，迟早会把一切来自海上的强盗赶走！并且大家都共同体会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正像黄河长江一样，真正是源远流长。奔赴到海是它的目的，也是自然规律。尽管中途会有种种阻碍，是水，就始终要流到大海！而中国人民，在任何强权压力下，也总会站立起来！帝国主义者强盗的船只，虽可以在短时期开到汉口，开上三峡，迟早会为人民的力量赶走，也正和长江的激流冲走一切残株败叶一样！中国的有创造性的文化，是和江流一样，不仅曾经丰富了民族的文化，也会在另外一时，用更光辉的成就，来丰富世界文化内容的。——这些信念，

是在任何一个逃难的中国人脸上也可以看出的。

时间过了二十年，世界变了样子，一切玩火冒险家，都有了一定的结局，明白记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篇章上。由于人民的力量，不仅日军国主义者完全失败，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也被人民完全摧毁了。中国历史更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封建地主、官僚、军阀和寄生于帝国主义者经济势力下的买办、流氓，都被人民在几回运动中消灭后，人民在完全属于自己的国土上，起始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文化观和文化基础。以对于河流态度而言，无论是那一条河流，过去一面蒙受它的福利，另一面也不免要受它的威胁和损害。特别是黄河，淮河和长江。解放几年来，我们政府就动员百万人民，史无前例的，起始把较小一些的河流，用科学方法有计划管理起来，利用到农业和水利生产上去。从这种工作经验上，就为我们培养一种新的希望和信心，黄河和长江两条大河，都可以在另一时，想办法来分段控制，使它完全符合人民生产发展的要求。

长江目下依然每天都有属于中国人民自己所有的船只，上下航行。每到假期来临时，年青学生放假回家，坐了这种江船，在舱板上眺望江面景物时，依然会对于江面和两岸景物保留一种“大好河山”的感人印象。但是和二十年前我们在船上提起这四个字时，真是多么不同的一种感情！

…………

本文手稿估计写于1957年左右，似未完成。原稿无标题。

据现存手稿编入，篇名为编者所拟。

谈谈赣剧的《西厢记》和《西域行》

从报上消息，得知江西赣剧团已到了首都北京，和广大观众见面，对专业内行和爱好戏剧的观众，都可说是个好消息。这两个戏都是四个月前我在江西南昌时看过的，故事情节细处虽已经难于一一记忆，可是《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西域行》中的班超在西域与北犍支的斗争，和班昭与弟五伦面折廷争等几场戏，至今犹明明朗朗留在记忆中，不易忘记。只觉得戏表演既十分认真出色，唱腔更清新典雅，悦耳动听，可说是地方剧在二百方针下出现的两朵大而新鲜的好花！现在这戏来到北京演出，凡有机会欣赏这两个戏的，都必然会留下个好印象。

全国作协去冬组织了个江西参观团，让我们在江西旅行了好几个月，跑了上万里路，经过几十个县份，看了许多，学了许多，印象最深刻收获最大的，自然是政治思想认识上的提高。在几个老革命根据地参观了许多革命遗迹，访问过好多当地老英雄和老干部，因之得进一步明白早期革命工作实如何艰巨。到了这些地方走走、住住，再来读毛选中某部

分文章，才可说理解得已略微深刻了一些。同行中有好些是从延安长大的，也对此有同感！像我这种从不离开大都市的知识分子，经常听人说起的毛主席思想伟大的意思，过去体会只不过是从大处概念出发，其实是认识不够深刻的。只有到了井冈山的桐木岭、茨坪、大井村、黄洋界，瑞金的叶坪、梅坑等等地方参观后，才能有较一层体会！其次是看江西生产建设。革命成功后，江西生产建设，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备，成绩显著。主要自然应归功于领导方面的稳步前进，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上下刻苦素朴工作作风，以及响应党的号召，从五七年起，即大量输送青年优秀工作干部上山建设新山区，使生产得到真正跃进的工作办法。我们既在山区看到许多这种可爱可敬的青年，同时也还在人数以万计的某种国营工矿自动化机器旁，看到这种可爱可敬的青年。看到国家对于接班人进行的教育，和他们对于工作的严肃热诚，因之使我们对国家明天，更充满了信心和雄心。第三是文化艺术建设工作，在戏剧歌舞方面，各地方也都各有不同成就。我们不仅在出瓷器的景德镇，能够看到极精彩的新式歌舞，和底班齐全唱做双绝的京戏。即在井冈山的茨坪，也有机会看到本地和外来歌舞团各种精彩的演出。一般年纪都还不到廿岁的青年演员，有瓷业工人也有农民，有从上海教会学校出身的上海姑娘，也有从北京某初中刚毕业，即奔赴井冈山的双生姐妹，人尽管来自东西南北，目的只是一个，即为响应党的号召，建设老革命根据地，无保留的准备把一生最可贵的青春，献给了艺术事业，献给了党和人民。有个歌舞团和我们在井冈山一道庆祝干部上山四年节日后，又在赣州碰头，看到他们每日经常进行的业务学习和繁重的演出，永远

是精神饱满充沛，证明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说的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无条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学习去服务，精神面貌将必然会起显著变化的指示，实如何正确中肯。我还听文化局同志说，由于人民需要文化娱乐，全省每县，至少都有一个有一定水平的剧团，分别演唱地方采茶戏，京戏，祁阳戏和越剧，经常到处总是满座。由于一般观众水平都相当高，也刺激了演员的业务上要求不断提高。以南昌说，则观众水平之高，使得到那里演出过的盖、梅二老均有同感！

这次到北京来作观摩演出的《西厢记》和《西域行》，即江西地方戏中近数年新发掘保存下来的两个品种，腔调节奏感极强，既适宜于抒情，也能在壮烈故事中叙事，两个戏在故事情节处理上，就各有不同的崭新艺术成就。《西厢记》根据董西厢，采取以莺莺作主体的处理，不失为一种新的大胆尝试，其实倒是真正古典的安排。《西域行》中班超和班昭兄妹二人的处理，一则以团结弱小，孤立强敌为活动中心，一则以在宫廷中与保守派作斗争支持班超工作，虽和汉史叙述有出入，仍不失为在历史现实主义基础上一种新的尝试。几个主要演员对于剧情的体会既相当深刻，唱腔又典雅清新，因之得到成功不是偶然的。我对于戏剧本来是个外行，惟外行有外行好处，即是无成见，因此无论是福建梨园戏的《陈三五娘》，广东戏的《关汉卿》，苏昆的《十五贯》，北昆的《李慧娘》，此外川戏、湘戏、绍兴戏……凡是充满地方特色的好戏，我都乐意看看，得到不同的感受和教益。由此觉得赣剧中好的部分，和国内这些拔尖戏比，可以说异曲同工，各有千秋。这次来北京演出，首都从业戏剧歌舞音乐的专业行家多，和我差不多的戏剧爱好者也不少，他们鉴赏水平既

高，消化接受力又强，从这两个戏的演出中，必然可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和不同感受。其次一个问题，即旧有的著名的古典名剧，如《西厢记》一类作品，究竟应当如何去演出；新排的历史戏，究竟应当如何去处理。我个人认为单独作理论阐发，也不易具体让一般读者理解透彻，若能从几个为大家熟习的戏文演出上来商讨得失，也一定更具启发性和说服力。因此我除了乐意再看看这种戏外，还希望从报刊上看到些专业行家对于这种戏新的批评，便于提高个人欣赏水平和能力！至于历史戏服装布景的安排，我也想将另外找机会就近年演出的几出成功的历史戏，谈谈个人见解，请教专家通人！

五月十九

本文作于1962年。据原稿编入。

无从驯服的斑马

我今年已活过了八十岁，同时代的熟人，只剩下很少几位了。从名分上说，我已经很像个“知识分子”。就事实上说，可还算不得正统派认可的“知识分子”。因为进入大城市前后虽已整整六十年，这六十年的社会变化，知识分子得到的苦难，我也总有机会，不多不少摊派到个人头上一份。工作上的痛苦挣扎，更可说是经过令人难于设想的一个过来人。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般，还是依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情形，心情上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对人从不设防，无机心。且永远无望从生活经验教育中，取得一点保护本身不受欺骗的教训，提高一点做个现代人不能不具备的警惕或觉悟。政治水平之低，更是人所共睹，毋容自讳。不拘什么政治学习，凡是文件中缺少固定含义的抽象名辞，理解上总显得十分低能，得不出肯定印象，作不出正确的说明。

卅年学习，认真说来，前后只像认识十一个字，即“实践”，“为人民服务”，和“古为今用”，影响到我工作，十分具体。前面七个字和我新的业务①关系密切，压缩下来，只是一句老话，“学以致用”。由于过去看杂书多，机会好，学习兴趣又特别广泛，同时记忆力也还得用，因此在博物馆沉沉默默学了三十年，历史文物中若干部门，在过去当前研究中始终近于一种空白点的事事物物，我都有机会十万八万的过眼经手，并明白它的时代特征，和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的联系。特别是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为正统专家学人始终不屑过问的，我却完全像个旧北京收拾破衣烂衫的老乞婆，看得十分认真，学下去。且尽个人能力所及，加以收集。到手以后，还照老子所说，用个“为而不有”的态度，送到我较熟习的公共机关里去，供大家应用。职业病到一定程度下日益严重，是必然结果。个人当时收入虽有限，始终还学不会花钱到吃喝服用上去。总是每月把个人收入四分之一，去买那些“非文物”的破烂。甚至于还经常向熟人借点钱，来做这种“蠢事”。因此受的惩罚也使人够受的。但是这些出于无知的惩罚，只使我回想到顽童时代，在私塾中被前后几个老秀才按着我，在孔夫子牌位前，狠狠的用厚楠竹块痛打我时的情形，有同一的感受。稍后数年，在军队中见那些杀戮，也有个基本相同的看法，即权力的滥用，只反映出极端的愚蠢，不会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使我记忆较深刻且觉得十分有趣的，是五×年正当文物局在北都举行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时，或许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局的负责人和专家，都出了席。我所属的工作单位，有几位聪明过人的同事，却精心着意在午门两廊，举行了个

"内部浪费展览会"，当时看来倒像是很有必要的一种措施。事先没有让我参加展出筹备工作，直到有大批外省同事来参观时，我才知道这件事。因为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我还记得第一柜陈列的，是我从苏州花三十元买来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一部分是图像，画的是些奇奇怪怪的云彩。为馆中把这书买来的原因，是前不多久北京图书馆刊正把一部从英国照回来的敦煌写本《望云气说》卷子加以刊载，并且我恰好还记得《史记》上载有卫青、霍去病出征西北，有派王朔随军远征"主望云气"记载。当时出兵西北，征伐连年，对于西北荒漠云气变化，显然对于战事是有个十分现实的意义。汉代记载情形虽不多，《汉书·艺文志》中，却有个"黄帝望云气说"，凡是托名黄帝的著述，产生时间至晚也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这个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重要性，却十分显明。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明代抄本，至少可以作为校勘，得到许多有用知识，却被当成"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过失看待。可证明我那位业务领导如何无知。我亲自陪着好几个外省同行看下去，他们看后也只笑笑，无一个人说长道短，更无一人提出不同意见。于是我又陪他们看第二柜"废品"，陈列的是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还织得有"河间府织造"几个方方整整宋体字。花绫是一尺三左右的窄筘织成的，折合汉尺恰是二尺宽度。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敕相近。收入计价四元整。亏得主持这个废品展览的同事，想得真周到，还不忘把原价写在一个卡片上。大家看过后，也只笑笑。我的上司因为我在旁边不声不响，也奉陪笑笑。我当然更特别高兴同样笑笑。彼此笑的原因可大不相同。我

作了二十年小说，想用文字来描写，却感到无法着手。当时馆中同事，还有十二个学有专长的史学教授，看来也就无一个人由此及彼，联想到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丝绸生产区。南北朝以来，还始终有大生产，唐代还设有织绫局，宋、元、明、清都未停止生产过。这个值四元的整匹花绫，当成“废品”展出，说明个什么问题？结果究竟丢谁的脸？快三十年了，至今恐还有人自以为曾作过一件绝顶聪明，而且取得胜利成功伟大创举。本意或在使我感到羞愤因而离开。完全出于他们意外，就是我竟毫不觉得难受。并且有的是各种转业机会，却都不加考虑放弃了。竟坚决留下来，和这些人一同共事卅年。我因此也就学懂了丝绸问题，更重要还是明白了一些人在新社会能吃得开，首先是对于“世故哲学”的善于运用。这一行虽始终是个齐人滥竽的安乐窝，但一个真正有心人，可以学习的事事物物，也还够多，也可说是个永远不会毕业的学校。以文学实践而言，一个典型新式官僚，如何混来混去，依附权势，逐渐向上爬，终于“禄位高升”的过程，就很值得仔仔细细作十年八年调查研究，好好写出来。虽属个别现象，同时也能反映整个机构的……

本篇是作者的一篇未完成的遗作，写于1983年春，1992年首次入编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贵生集》。

据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1版文本编入。

① 新的业务　即作者1949年以后开始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工作。

自剖提纲

性格内向型，能思考工作，不善于和人打交道。

一生忧患多，挫折多，十分胆小怕事。

嗜好少，外务少，书本消耗了大部分生命。除了廿岁以前在小乡城长大，生活转徙流离，明白部分乡村和内地小城市人事。到大都市后，和人事接触，即限于知识分子范围。十分狭窄。懂的文学知识，除工作实践，即从书本得来。

不懂政治，怕在政治上犯错误。无向上爬野心和能力。对人无能力，不善于在不同业务、不同意见群众中进行工作。处理家务能力也不强。

搞工作不怕困难，不怕失败，还能持久耐烦。也无什么事业上的野心。想的只是一切尽力作去，会慢慢克服困难，取得进展。搞短篇小说，只是照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理想和目的，如何努力掌握文字，接近语言，能不受旧的格式、思想拘束，反映新的社会种种。不考虑什么“成名成家”。只希望能在这一部门工作中，进行学习试探，搞个三几十年，作个“打前站的尖兵”。也多少有些幻想，那就是比契诃夫、莫

泊桑工作，搞得更扎实一点。（照五四当时从事写作的说来，还不可能有"职业作家"，契诃夫和莫泊桑，又算是世界上写短篇故事较著名的，用他们成就作为对象，想超过他，已算得是十分大胆妄想。）

由于长期写短篇小说习惯，所以在工作中小有成就，不会"自满"，工作失败，也不"灰心"。总是继续作去，并且不断在摸索中改正错误。这种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也影响到后来搞文物研究。有得有失。

由于不曾受过正式中等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一般出身于大学文史系搞创作、搞研究的人多不相同。可能大不相同。所得进展和结果，因此也显著不同。

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免有孤独感。

对生活要求不高。到大都市五十年，旧社会大都市里各种娱乐事，就通通没有学会。作品中写到许多事情，都并不是从实践中得来，只是想象推衍联系。

写作花样多，作人和过日子，实在极其简单。脑子用到工作上，极其复杂，也能应付。人事上最怕复杂，最怕在小事上争论，在不相干问题上争论。

本文写于1967年秋或冬。内容和形式，不像是准备上交的检查稿，原无标题，无签名。但此文在后来的查抄中仍被没收审查。

据原稿编入，标题为编者所拟。

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

到丹江后，血压经常升级到240，长日心脏隐隐作痛，而头脑有时一闪昏沉，更令人无可奈何。这个240的意义，惟医生和我自己明白，此外即家中人亦难于理解也。十月中，中和为寄此刊物①来，明白我对刊中所印彩图必感一定兴趣，有些启发。料不到由针灸疗法得到启发还更多。试用个转移忘我方式，来解决随同这个240而来的种种压力和痛苦，把本刊部分杂文物一一看过后，根据十五六年作说明员的经验，为应对从各种不同角度提出的询问必须明白的常识，学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和方法，作点条理工作，并用个多年已成习惯写来且不费力的一分大字体②，随想随写记录下来。世有解人，或能不以头脑发昏胡言谵语见诮。世无解人，亦已焉哉。

半世纪以来，到大都市里，总像是在“作傻事”中度过。凡事多近于沙上建屋，随潮必毁，毁后又复重建，仍难免毁去。生当明时盛世，在此难得好环境中，正是认真读书思想

改造好机会。总还是对于四旧中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刀刀枪枪……像是有责任待尽，真是愚不可及。这些问题，即或还有些意义，也应分是“考古专家”、“史学权威”、“学部委员”等等责任范围，绝不是作说明员的所宜妄参末议。我则为了减去这个240给我的具体压力，一切从说明员常识出发，还痴心妄想，以为这些点滴常识的连类并举笔记，或许在另一时能代替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考卷，得到“说明员及格”的证明，尽可能早些回到陈列室原有那个位子上去。

这么设想，自然是近于不切现实，十分无知。可是至少是这么作，这么想的过程中，“240”这个数目字对于我体力上和情绪上带来的威胁及影响，便失去作用了。所以说，这是我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

本文是作者在丹江写于小纸片上一系列杂记之一，原附于《人民中国》内，写于1971年冬。同期所写其他杂记，大部分属于物质文化史《文物识小录》类型短文。

原稿无题，篇名为编者所拟。

① 刊物　指《人民中国》日文版1971年第10期。作者在此刊内所发表的文物图片页边，写了大量小字批注，并贴了许多大小不等纸条，扼要记下他准备进一步阐述的见解。

② 一分大字体　此杂记写在幅面仅16×9厘米的一张小纸上。

新的旧事回溯

一切神权的形成，正面尽管无论说的如何庄严堂皇，背后都是使尽了集中了人世间当时所有的巧妙的欺骗、权术或策略而形成的。包括最原始的巫术和宗教，都是或多或少一样的依赖巧妙的欺骗，而建立了它的威信。中外无丝毫例外。即出现得比较晚的道教，世间不少读书人，都以为它的基础完全建立在一种最高、最智慧的高妙纯粹哲学上。事实恰恰相反，基础却是十分现实的生活上，生活中又更基本的房中术里。为什么老子特别受人尊敬？后来愚蠢不过的读书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大知识分子，就这么来阅读《老子》。对于《老子》作任何探索的人，包括了现代的大哲学家××在内，全是闭着眼睛猜谜，永远不明白谜底是什么。以后倒是一些极接近骗子的少数道士、方士或较后些些的道士，在口传中或多或少得到了一点秘密，也同时明白，从字面上来研究《老子》，注解《老子》，引人转人迷途。所得结论却是什么素朴唯物主义，事实上也可以够素朴了，够唯物了，可是谜底原来是另外一件事情。五千言书①中所说一切，全是和史书

的彭祖长处有关，是最最适当而明确注解，司马迁看得懂，刘向父子也看得懂，而最早注解《老子》的河上公也看得懂，只有最著名精通《老子》的王弼，却完全是个书呆子，只懂字而不懂内容真正的含意，引人转入迷途。

用儒学作为底子，一个假正经的读书人，根本是不懂《老子》的。只有《参同契》[2]的作者和注者，才是懂《老子》的人。此后《黄庭内景经》[3]和《阴符经》，才是懂《老子》用作品并继续用象征语言注解《老子》的真正内行。用儒学眼光从字上探索《老子》，永远得不到什么是素朴，什么是唯物。儒家的哲学是一种"世故哲学"，是建立在阿谀逢迎的基础上，有利于过寄食生活，可说是一种高等帮闲哲学，有利于在帮闲地位上做官的哲学。一切所谓儒术真传，基本核心都是在掌握有绝对实力的帝王身边，指点这些人如何做人，如何做官，如何在任何残暴愚蠢的统治下都可以做官向上爬，或混饭吃生儿育女。是一种真正不折不扣的"世故哲学"。所谓精义，都永远离不开这种"混"的技术的巧妙运用，高级的上哄下骗的混日子哲学。礼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犯逆鳞……一切公开的或隐蔽的道统心传，都奠基于对强权形成的霸道残暴和绝对愚蠢无知的恶势力的绝对认可，并维护这种政权的扩大和持久。此外对奴隶社会制或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人民，则是绝对极端的无情，被任何正义和压迫所激起的反抗和否定行为及思想，都一律认为是大逆不道，完全加以否定，与之"不共戴天"的。因为这种种，不仅会动摇他所依赖的帝王绝对无上的权威，同时还动摇了他们不劳而食已经二三千年的社会特殊地位，否定了他们本身存在的全部意义。取消他们以各种彰明昭著或十分隐蔽的"世故哲学"为

基础，谄媚奉迎为手段，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取得特殊势力地位的一切特权，甚至于存在的可能。所以所有儒家一生最害怕的就是叛逆，是不尊礼法，不尊由孔老二开始一生尽力宣传的孔教，甚至于看成比法还重要许多。因此对于刘邦的约法三章并不怎么重视，而对于坑了几十个腐儒却永远不平。把虚伪极端的礼数，一面哄着绝对残暴愚蠢的帝王，鼓励他们的生前死后，都乐于陷到极端奢侈糜费得来的快乐满足中，另一面，却又把人民永远紧紧的束缚到一个“礼”字上，一言一行都受约束。本来只是“以礼辅法”，到后来却发展成比法还厉害十分，烦琐万倍的有形无形条条框框，把人民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归纳到完全奴隶心理状态中。发展到清代，近二百年封建社会末期，人民还是人民，而做官却必在一切上奏文件上，明白写上奴才某某——任何大官都这样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后来读书人津津乐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有意作伪，把人民的一切共同劳动成果的发明功绩，却谎言归功于古代的几个圣贤名分上去。第一个氏族长或奴隶主的黄帝，就什么发明都是他个人或臣下作出的。而养蚕织丝的成功，照《尔雅》所称，明明白白是在许多不同地方，用许多不同草木叶，经过长久失败、成功的不同经验，总结这种经验，才明白柞蚕生命力特别强，宜于野放，不必过多人力照料保护，就可得到一定收成。另一种吃桑叶的蚕，生命力却特别娇弱，生产力又特别丰富，必须摸熟它的脾气、习惯和生命发展过程，胃口又特别××，要的是大量年青妇女，一面十分耐烦精细的照料到它，另一面还得不断改进它的主要食料的生产能力，使得为抵抗自然的挫折，一般野生

的原生品种桑叶大都粗硬干枯，纤维多而叶片小，在逐渐驯服培养长期过程中，改成叶片肥润、柔软好吃、产量又多的品种。这两方面的经验积累，都必然是经过长长的时期，细致的观察和不同试验，才逐渐达到完全掌握了两者的发育规律，因而在原始社会，即和六畜五谷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成就一个重要部门。四五千年以来，不断的在发展中，不仅对于中国作出极重大贡献，对于世界人类生活文化，也同样作出无可比拟的贡献。而识字读书人，却把这么一件大事情，轻轻的归功于传说中的黄帝一个名叫嫘祖的妃子，一直沿袭下来。还在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孔老二门徒，极其巧妙的让他的主子，把这位传说中女人，封上什么"青陵圣母"的名号，迫使养蚕的敬奉为一个女神。又为便于掠夺全中国劳动妇女的劳动成果，周初就定下一条法律，限定一切能养蚕地区的成年妇女，每年必按照法律，把一定尺寸的长短宽窄织成的绸子，上交两匹，和每一成年男子上缴粮食两担，共同成为政权的经济基础。皇后也就装模作样，仿佛十分慎重其事的，在王权所在的京郊设立一个祀蚕的神庙蚕坛，在周围栽了几十株桑树，自己到每年春天，蚕事开始的季节，也必尊重儒家为制定的礼制，吃几天素食，换上件有象征性的青衣青裙，来亲自采采桑，养几天蚕，表示对于这个青陵圣母蚕神的尊敬，和蚕事的特别重视。前者是彻底的虚假，而后者却是完全的真实。因为国家的经济基础，维持一个庞大无比的镇压人民、保护王权的武力和官僚机构的一切消耗，妇女分担了一半的责任，就是织绸织布。没有食的不能维持政权，没有穿的同样也会发生困难。这就是礼和神的存在基本原因。这里就有子所不语的神和力和怪。唯一没有的只是

一个乱字，因为这个字是和奴隶社会制和封建社会制的继续，有显明矛盾。孔子老子做官，比什么人都熟习，一个乱字，是会把一切存在的权——完全建立在对于创造一切文化的劳动人民极端无情的残酷剥削的政权，将一下子推翻摧毁的。所以胆战心惊的处理天下事，困难危险如“朽索驭六马”，也可说恰恰是孔子及其门徒的真正心里话。没有王权，依附王权而存在的较早所谓公卿大夫和较后的官僚，那里能生存下去？

本文写于 1975 年左右，仅见初稿，系快速潦草记下的思绪，原无题。

据初稿整理编入。篇名取自作者在保存草稿信封上写的题目。

① 五千言书　传老子所撰《道德经》，亦称《老子》，共五千余言。

②《参同契》　全称《周易参同契》，道家著作，东汉魏伯阳撰。

③《黄庭内景经》　全称《太上黄庭内景经》，道教经名。

谈　　诗

近年来，文学中的“百花齐放”四个字，在“诗”方面，体现得特别突出，显得相当繁荣。各省市文学定期出版刊物中，和日报副刊上，都必匀出一定篇幅，安排了些新诗。从各种不同试探中写成的新诗，表现上都可得到极大的自由，不必受什么一定框框套套的束缚限制，无论什么作品，都有的是机会和广大读者见面。对新诗，可以说是近半世纪以来少有的好运气，诗作者因此受到极大的鼓舞，出现过许多不同格式的新诗，还出版了许多专集。只是就我个人接触到的看来，其中有一部分，我却不大看得懂了。有时还不免感到一点别扭味，和四十多年前读李金发先生诗时印象差不甚多。不同处是它的文体简化，不容易懂。诗的发展情况像是日益和小说散文不大相同。小说散文一般要求总比较客观，以读者“多数能懂”为大目标。诗人的追求，似乎多以本人能“自得其乐”为主，对于“客观”效果可不大在意。我看不懂是必然的，十分合理的。我得承认社会“现实”的确是“变”

了，“向前”了，老、中、青三代的“诗人”，思想感情也起了基本变化，大大的一同向前了。

我看不懂的主要原因，应当说是我“思想保守而落后，不学而无知”。所以某些新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正如同第二期草卓公布的简体字，经常出现许多字，临到末了，总是“一笔带过”的方式加以处理。省事倒省事，可是不仅难于认识，也难于猜想。尽管某些人说是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事实上文改委员中我很认识几个人，他们就有许多字不认识，改得过于草率简化，难于认可。于是不多久就终于取消了。

至于新诗是不是有相同的命运？据我想，大致是不会有的。因为不像“文字改革”影响到大几亿人应用问题。目下新诗的影响，似乎还只限于“诗人”和“候补诗人”范围以内。将来也难望出现奇迹。总的说来，读者是相当窄狭的。加上个似新实旧“意识流”的提示，三个字既缺少一定界限，虽能鼓舞一些作者“见猎心喜”，在用笔时也更能得到“自我陶醉”的快乐，十分显明，作者再多，影响却依旧不会怎么大，甚至于作者本人用笔兴趣，也不会如何久。读诗日多，见事益广，他那个“欲求缥缈转幽深”的创作欲，一定会产生变化，觉得这么封闭式的“自得其乐”，实在“难以为继”的。所以我们外行也不必为这个问题白担心，即以为将“泛滥无归”。人的生理上就有个调节规律，膨胀张度到一定时候，一定程度下，便自会觉得“路走不通”，将发生转化，另寻出路的。

正如同佛教的“禅宗”，尽管某时有信仰，不着一字，或当头一棒，或以手指心，即能使人悟出道理所在。吸引过万千信士弟子一心皈命顶礼膜拜，香花供养，奉为真得心传，

孔夫子正统派也利用它，但事过境迁，也依然一切完事。特别是科学家还在报刊中不着边际的人人赞赏特异功能时，不久前，我有个八岁大的小孙女，星期天照例要来看爷爷奶奶时，一进屋就大声说：“我有特异功能。”逗得一家大小不免哈哈大笑。即或是自得其乐的开自己玩笑，可是却说明这四个字听多了，很显明是可以具有传染性的。

这方面倒像有例可沿，如像五四以来新诗差不多，由于过分简单，以赤裸裸的天真态度写成的《尝试集》[1]为例，还不到五年，就稍稍走回头路，出现了郭沫若、徐志摩的诗歌，增加了读者的想象力。

…………

本文作于1981年。当时应荒芜先生要求，为其诗作《纸壁斋集》写序，曾试拟过几稿，均未完篇，《谈诗》为其中篇幅较长的一个。

据现存两份草稿整理编入。

①《尝试集》　白话诗集，胡适作，1920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

喜闻新印《徐志摩全集》

一九八二年的冬天，承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李祖泽先生相告，徐志摩先生的全集，将于一九八三年付印出版，要我写个小文作为纪念。李先生还告我，这个全集是依据抗战前夕业已制好的纸型付印的，虽算不得最完备的底本，可算得是最早结集一个底本。特别有意义，就是集中全部篇章，都经过徐志摩先生的夫人陆小曼女士，亲自一一校核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

计算一下日子，志摩先生不幸逝世已整整经过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变化之大，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所未有，也难于用文字形容万一……①万千英雄伟人，名流××，都几几乎可说在这个持久不息的特大旋风中，或成尘成土，且有的人即或本身还存在，活得威名赫赫不可一世时，或由于固持偏听，自以为天下唯我，或由于巧佞奉迎，趋炎附势，弄巧反拙，即已遗忘在历史进展主流以外，成为笑话。即或

"人心善忘"，不着一字，依然将在下一代遗留下许多麻烦问题不良影响的。总的说来，这半世纪的社会动荡，是付出了数千万人民的鲜血和痛苦，在历史上加以点滴著录，也永远使人闻之惊心动魄目瞪口呆的。可说是三千年封建，形成亚细亚式残酷的总结，在人类发展史上为离奇不经，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却又若十分自然，有其无可避免的灾难。前一段的牺牲，是恶邻强加于我的，对于中国人民作了错误的估计冒险结果。我们且终于战胜了侵略者，为新中国打下了个良好的基础，解除了帝国主义者一切强加于我的束缚。后一段的牺牲，却近于政治上违反进步规律，缺少远见，于二十世纪犹出现"造神运动"的荒唐设想所形成。这个历史性大悲剧，人民既吃尽了苦头，国家付出了极大代价，元气也因之大大亏损。但是也恰如老子说到的"物极必反"，才有一个"拨乱反正"崭新的得之不易局面出现。为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悲剧，正式文件上既常使用个"全面混乱"字样作概括形容，可知影响之广大普遍。至于文化上的损伤，比较上就显得小而又小，微乎其微，太不足道了。死去的，就死去了，能幸而免居然还活下来的，如何继续活下来，活得像样合理一些，对社会有意义一些，我以为不仅仅是国家负责人的事，同时也是值得我们深深思索的一件事！

我今年已活过了八十岁，同时代的熟人，只剩下很少很少几位了。从名分上说，我已很像个知识分子，就事实上看，可还算不得一个正统派"知识分子"。但进入到这个大城市，前后既已整整六十年，这六十年的社会变化，影响到知识分子的苦难，我也就总有机会摊派到个人头上一份，可说是个

经过种种难于设想的痛苦挣扎过来人。照我的性格而言，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因此奇迹一般，还是依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格上却板质僵固，对人从不设防，无机心，做事却还认真。一生既无什么雄心大志，更少意外侥幸奇遇幻想，就某一方面说来，可以说是个完全彻底唯物主义者，一切就当前生活所许可的情形活下去，学下去。从另一方面说来，还应分叫作一个十分庸俗平凡，甚至于懦弱不抵用的小人物，什么胯下之辱都无所谓，任何困难挫折，都激发不起我的不平感，任何自以为有权据势的人，都可以把我踹在脚下，来一个永世不翻身的诅骂，我总是用沉默接受这种现实。我从人的好处学习了许多，而且应用到处世待人和工作上的持久热情，同时也从坏人明白许多愚蠢自恃，阴险狡猾，行小欺骗，搞小动作，阿谀巧佞，谄上骄下，和一生如何向上爬得高高的技术，对我写作中却因此得到不少便利，应用时，就懂得加以概括，在不到一百字内，就可以为画出个十分生动逼真的、十分传神速写像。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情形，情绪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对政治上的“务虚”始终缺少应有理解，但对于国家现实，却充满感情，从大处看，深深相信国家新的负责方面看来，从近三十年的处理问题上所得的痛苦经验教训，今后绝不容许人为的有意识的“造神运动”重新抬头。凡事只有从现实出发，并乐意用商讨方式，坦白诚恳接受各方面对国家有益有用意见，希望把国家搞好。既不维护过去的失策，也能正视当前的困难，还抱有团结第三世界的责任感，且应当打起精神，深信内部遗留下的一切困难，都可以从新的理性认识

出发，排除任何必须排除的障碍，能较好的组织十亿人民来共同努力，面对世界复杂险恶多变的伏流暗礁，以及国内科技落后、生产落后、人事企业管理落后的种种问题，一一加以克服。凡事与民更始，竭尽全力争取个十年二十年的国内安定团结，使整个国家逐渐得以进入真正文明进步大国行列。

近来一再强调提出“知识”对于建设国家的重要性，就是一种十分明确的信息。知识的含义，当然包括方面十分广泛，文学艺术只是其中一个部门，但求达到和国家社会生产建设的普遍迅速发展相适应，且能得到世界的认可，自然并不比体育竞技于短时期即容易见出显著成果。却必须采用和体育竞技相同的公平严格的筛选淘汰方式。明白只有扎扎实实的坚持下去，让有能力有实力有文采有见解的青壮一代，在新的比较自然条件下成长。过去三十年对于前一代作家排斥异己“惟我独尊”的意识，应当明白这种现象，对文学艺术的正常发展，实在弊多利少。至于“百花齐放”，看来却在逐步实现。因为说实在话，那个走到极端，便影响到八个样板戏的一切惟我独尊，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会形成文艺正常发展的束缚，绝不会带来真正和社会发展相称的繁荣景象的。文学领域中的市场独占，定于一尊的情形，至今还在各大学少数教师中有一定势力，事实上在多数青年一代学生中，已感到相当厌倦。给人以近似“造神运动”的厌倦。前不多久，某种大专院校文学教学集会中，竟有人以鲁迅为“中国唯一圣人”的，这种妄言诞语，也可说是由于精通“世故哲学”的结果，却不是什么研究马列主义的结果。鲁迅若还生存，也不会接受这种超时代的精巧阿谀的。这种提法虽

不曾为预会同人所接受，但在某些大专院校现代文学课目中，一学期四十多节课题中，还经常占去一半学习时间，这样下去，对于学生就能达到真正思想的提高？稍有良心的教师，也不会承认这种文艺上的“造神运动”能见出什么人为奇迹。且显明只会见出愚昧的效果，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学习的效果。有心人都明白这一代的青年，直接间接受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刺激，多形成一种对社会不良现实的否定和反抗态度，或消极颓废，或放纵无所谓，求恢复其做一个正常人的勇气和信心，已绝不是陈旧方式可以就范收效。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多呈不大正常的现象，这难道都应当由他们负责吗？电影电视上殴打报复反复出现，流行定期刊物，也乐于从市场价值争夺群众，还有庞大无比的出版，充满兴趣来推销《七侠五义》，新式窦尔墩黄天霸也不断出现于大型文学刊物中。开放社会带来的许多新玩意儿，虽还只限于一些较大都市，但是随同开放产生形成的新问题，却在更广阔的较偏僻的州县里，也逐渐发生了影响，甚至于比大都市更容易受影响。成堆的问题，岂是老工作方法的开几回奖惩会能见功？

我深深相信，国家的实际上一切具体困难，都可以克服的。最难克服的，可能还是习惯上情绪上的意识作用影响，似抽象也具体的一些问题，所产生的阻碍消极作用，正在社会中层泛滥浸润形成的一种腐烂作用。中国俗话说的“英雄难过美人关”，我们所得的痛苦教训已够深了，或许不会再出大毛病。至于精通“世故哲学”聪明出奇的人物，求其从任何学习上得到改造，使之对于“阿谀逢迎”，“谄上骄下”的技巧失去作用，失去市场，实在太难。若这种反复无常，投

机取巧的险侧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鼓舞得重用，国家的明天，可就实在麻烦，任何好理想，好计划，都必然无从进行得令人满意！以至于只能得出相反的成就。这问题或许只是个人无根据的杞忧，还是有目共睹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可以说不必唠叨，人人心中有数。我说的也许离题太远，其实似远实近。

听熟人相告，两年前，在西北某地，曾参加过一个有关文学人物评价问题的商讨会，会上曾提及几个卅年代作家的情形，内中对于徐志摩先生的作品成就得失，就有较大的分歧。“正统派”以为这个人只是个“花花公子”，轻浮是他的本质和特征，成就实在说不上。还写文章骂过共产党和左翼作家。“非正统派”则以为诗歌散文有光辉特征和鲜明成就，且影响相当大。为人则热情爱国，且在旧社会从不曾做过什么文化官。说浮华轻佻，多是当时小报上文坛消息所乐于反复刊载的，和他真正相熟的人印象恰恰相反。这种商讨会有点“百家争鸣”意味，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也可说有意思的一次商讨。但当时预会的人，绝大多数肯定都很少和徐相识，或认真读过他三五部作品。因为他死去已整整半个世纪，作品传世已很少很少了，即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图书馆中，经过近四十年的社会变动，能保存的也不会多了。当时预会的年在五十左右的教师占多数，内中三四十岁的教师，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有读过徐志摩任何作品，甚至于对这个人名字也十分生疏。后来又商讨另一位“知名作家”，虽因曾经明白投敌，作过敌伪大官，所以不予考虑。但过不多久，作品却已正式由国家出版社翻印出版，令人难于索解。

据我记忆所及，二十年代末期，骂左翼文学笔下最刻毒的，应当是鲁迅先生数第一位。研究专家倒很少提到这一点。杀戮共产党最残忍狠毒的是国民党中某些要人，这些人才真正够得上称为“反共老手”，目前不仅在政协有的是受重视的成员，至于当年在两大之间纵横捭阖，反复取巧的，更大有其人，也多同样在新社会组织中成为重要成员之一部分。若就近两年新例，则国家负责人，还极其热忱坦白的，希望蒋经国能回到大陆来共商国事。一个所谓“花花公子”，写过一两首诗骂骂共产党，能起过什么大不了作用，是谁也难相信的。

这次徐先生的全集得以付印，真使人不免感慨系之。但是我依旧觉得十分高兴。因为这件事，显明和国家领导文学艺术的思想开放政策密切相关。为研究卅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得失，能提供一些可作探讨分析的具体材料，不至于“人云亦云”，尽少数私心自用的专家权威，继续胡说霸道，还能有相当市场。我认为这种文学上市场独占的倾向，也应当结束了。徐先生全集的出版，可说是一个新的“百花齐放”春天的信息。他的故去虽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他的作品散文和诗歌，所具有的永不消失的青春热力，和特殊才华，不仅在过去五十年前鼓舞了我对生存的顽强信心和意志，使我近六十年在任何困难挫折中从不丧气灰心，直到八十岁的今天，还保持了对国家和对人充满了一种童心的热爱，且深信这些作品，在今后还能够鼓舞到更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挫折，失去生存方向的万千新一代青年，恢复他们对于国家的信心，和做人的勇气，以及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随同

社会发展，在工作中取得比我超过百十倍的成就，这都是完全可能的。

本文作于1983年1月下旬，原题为《新印〈徐志摩全集〉序》，写成初稿后因故而放弃，并于2月2日另外撰写一序文，用在当年10月出版的《徐志摩全集》中。该序文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

现据当时放弃的原稿编入，篇名为编者所拟。

① 此处作者删除约250字，系列举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历次社会大动荡中作者所闻有关方面对死亡或遭殃人数的种种说法。

无从毕业的学校

无从毕业的学校

WUCONGBIYE DE XUEXIAO

本集为新编，收沈从文 1959 至 1983 年间留下的回忆性散文，共 7 题，实收文章 6 篇。作者生前均未发表过。集名取自《从文自传》中用语。

《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已编入全集第 12 卷，本集存目。

我生长的地方

我生长的地方，是中国历史《后汉书》记载“五溪蛮”居住的地方。至今还是苗族、土家族和汉族混合居住一个自治州附近。照历史叙述，当时著名军事家马援，为征伐五溪蛮，就被围困饿死于壶头山。壶头山在沅水中下游，离我生长的凤凰厅，还远在五百里外。照过去路程计算，还得翻山越岭走两个星期——深入山区，方能到达的。因此直到十九世纪，我生长地方还始终被认为蛮荒地区。尽管公元前四世纪，楚国伟大诗人屈原被放逐出国门后，就乘过小船，由洞庭湖转入沅水中上游，写出他的名著《九歌》等作品。作品中还一再提及他本人曾到达沅陵，和出产著名中国兰科植物的沅州。更早千年的商代，从出土遗物中，知道已经开始大量应用朱砂作彩绘工艺品和宗教祭事上，朱砂产生地，就在我生长小山城附近。十八世纪以来，清王朝为了进一步残杀这个地方的苗族，免得常有叛乱暴动事故发生，除了特别筑一小小石头城，并设立一个兼管军事的兵备道以外，还设立了个“镇筸镇总兵”官，共约六千屯防军和作战防守兵士，对付苗族的暴动，所以这个方圆不及一里石头城，

住下居民不及三千人，却有六千持武器的“刽子手”。围绕这个小小城市和四郊山头，大量石头碉堡，可以说是全用人血涂过的。从我能记忆的印象说来，杀人印象几几乎占主要部分。特别是辛亥前夕，苗族为反对满清最后一个王朝的革命事件，苗族被残杀的数目之多，留下印象格外深刻。在我幼小生命中，种下了对“屠杀政治”永远怀疑的信念。

我生长地方，在十八世纪以来，苗族所有土地虽已被全部没收，再比较平均的分配给居住的各民族播种，由官方在县境内还设有许多大粮仓，将收成一半集中作为军粮储备。凡可以种植谷物的山田，均已经开发，但到处仍是半原始森林存在。且因民俗信鬼重巫，即在城区附近，凡神祠所在地方，尚多合抱大树，因此毒蛇猛兽，到处可见。一遇荒灾年分，虎豹豺狼，每到夜中，即成群结队接近城郊觅食。小孩家畜，夜半被虎狼吃去是常有事。直到廿世纪前十年，我到过的酉水上游各地区，大白天还常闻虎啸，直到廿世纪三十年代开建公路时，因受炸山影响，这些动物才逃窜人人迹不到更深山林中去。

我在作品中经常自称是“乡下人”，就包括了上述的种种事实。性格强执，和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到六七岁入私塾学时，就十分厌恶老教师教学方法的陈腐，和头脑的顽固。从学校外接受的教育，取得的经济和知识，远比学校得用。即转入公立小学后，仍习惯逃学，各处走去，看我所能看到的一切社会生活，和小市民进行生产时的过程，觉得远比那些孔孟作品有益。……

本文写于 1980 年前后，未完篇。

据初稿编入，标题为编者所拟。

无从毕业的学校

我于一九二三年的夏天，从湘西酉水上游的保靖县小小山城中，口袋里带了从军需处领来的二十七块钱路费，到达沅陵时，又从家中拿了二十块钱，和满脑子天真朦胧不切现实的幻想，追求和平、真理、独立自由生活和工作的热忱，前后经过十九天①的水陆跋涉，终于到达了一心向往的北京城。

还记得那年正值黄河长江都发大水，到达武汉后就无从乘京汉车直达北京，在小旅馆里住了十多天，看看所有路费已快花光了，不免有点进退失据惶恐。亏得遇到个乾城同乡，也正准备过北京，是任过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总长傅良佐的亲戚，当时在北京傅家经管家务，且认识我在北京作事的舅父。因此借了我部分路费。他当时已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经常往返北京，出门上路有经验，向车站打听得知，只有乘车转陇海路，到达徐州，再转京浦路，才有机会到达。也算是一种冒险，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因为到徐州后是否有京浦车可搭，当时车站中人也毫无把握。我既无路可退，因此决定

和他一道同行，总比困在汉口小旅馆中为合理上算！于是又经过六七天，从家乡动身算起，前后约走了二十五天，真是得天保佑，我就居然照我那个自传结尾所说的情形：

> ……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个乡巴老，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
>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
>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到达三天后，我又由一个在农业大学读书的黄表弟，陪送我迁入前门附近不远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一个窄小房间里，暂时安顿下来。北京当时南城一带，有上百成千大小不等的"会馆"，都是全国各省各州府沿袭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为便利入京会试、升学，和留京候差大小官吏而购地建成的。大如"西湖会馆"，内中宽广宏敞，平时可免费留住百十个各自开火的家庭。附近照例还另外有些房产出租给商人，把年租收入作维持会馆修补经费开销。我迁入的是由湘西所属辰沅永靖各府十八县私人捐款筹建的，记得当时正屋一角，就还留下花垣名士张世准老先生生前所作百十块梨木刻的书画板片，附近琉璃厂古董商，就经常来拓印。书画风格看来，比

湖南道州何绍基那种肥蠕蠕的字还高一着。此外辛亥以后袁世凯第一任总统时，由熊希龄主持组成的第一任“名流内阁”，熊就是我的小同乡，在本城正街上一个裱画店里长大的。初次来京会试，也就短期住在这个小会馆里，会试中举点翰林后，才迁入湖广会馆。

尚有我的父亲和同乡一个阙耀翔先生，民三来京同住馆中一个房间里，充满革命激情，悄悄组织了个“铁血团”，企图得便谋刺大总统袁世凯。两人都是大少爷出身，阙还是初次出远门，语言露锋芒，不多久，就被当时的侦缉队里眼线知道了消息。我的父亲原是个老谭的戏迷，那天午饭后去看戏时，阙耀翔先生被几个侦缉队捉去。管理会馆那个金姓远亲，赶忙跑到戏院去通知我父亲。他知道情形不妙，不宜再返回住处。金表亲和帮会原有些关系，就和他跑到西河沿打磨厂一个跑热河的镖局，花了笔钱，换了身衣服，带上镖局的红色“通行无阻”的包票，顾了头骡车，即刻出发跑了。因为和热河都统姜桂题、米振标是旧识，到了热河后得到庇护，隐姓埋名，且和家中断绝了消息，在赤峰建平两县作了几年科长，还成了当地著名中医。直到五四那年，才由我那卖画为生的哥哥，万里寻亲，把父亲接回湘西，在沅陵住下。至于那个阙先生，据说被捉去问明情形，第二天就被绑到天桥枪毙了。

我初初来时，在这个会馆里住下，听那个金姓远亲叙述十年故事，自然漩起了种种感情，等于上了回崭新的历史课。当时宣统皇帝已退位十二年，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亦有了好几年，张勋复辟故事也成了老北京趣闻。经过“五四”运动一场思想革命，象征满清皇权尊严的一切事事物物，正在

我住处不远前门一条笔直大街上，当成一堆堆垃圾加以扫荡。

到京不久，那个在农业大学习园艺的表弟，带我去过宣内大街不远那个京师图书分馆阅览室参观过一次。以后时间已接近冬天，发现那个小小阅览室，不仅有几十种新报刊，可以随意取读，还有取暖饮水等设备，方便群众。这事对我说来可格外重要。因为我随身只有一件灰蓝布夹衫，即或十月里从农大同乡方面，借来了件旧毛绳里衣，在北京过冬，可还是一件麻烦事。住处距宣武门虽比较远，得走廿来分钟灰尘仆仆的泥土路，不多久，我就和宣内大街的“京师图书馆”与“小市”相熟，得到阅书的种种便利了。特别是那个冬天，我就成了经常在大门前等待开门的穷学生之一，几乎每天都去那里看半天书，不问新旧，凡看得懂的都翻翻。所以前后几个月内，看了不少的书，甚至于影响到此后大半生。消化吸收力既特别强，记忆力又相当好，不少图书虽只看过一二次，记下了基本内容，此后二三十年多还得用。

当时小市所占地方虽并不大，东东西西可不少，百十处地摊上出卖的玩意，和三家旧木器店的陈货，内中不少待价而沽的破烂，居多还是十七八九世纪的遗存，现在说来，都应当算作禁止出口的“古文物”了。小市西南角转弯处，有家专卖外文旧书及翻译文学的小铺子，穷学生光顾的特别多。因为既可买，又可卖，还可按需要掉换。记得达夫先生在北京收了许多德国文学珍本旧书，就多是在那里得到的。他用的方法十分有趣，看中了某书时，常前后翻了一翻，故意追问店中小伙计：“这书怎么不全?”本来只二三本的，却向他们要第四本，好凑成全份。书店伙计不识德文，当然不明白有无第四本。书既不全，于是只好再减价一折出售。人熟了

点，还可随意借书，收条也不用给。因为老北京风气，说了算数。我就采用这个办法，借看过许多翻译小说。

青春生命正当旺盛期，仅仅这些书籍是消耗不了的，所以同时和在家乡小城市情形一样，还有的是更多机会，继续来阅读“社会”这本大书。因为住处在前门附近偏西一条小街上，向西走，过“一尺大街”，就进入东琉璃厂铁栅栏门，除了正街悬挂有招牌的百十家古董店、古书店、古画店和旧纸古墨文具店，还有横街小巷更多的是专跑旧家大宅，代销古玩和其他东东西西的单帮户。就内容言，实在比三十年后午门历史博物馆中收藏品，还充实丰富得多。从任何一家窗口向里望去，都可以见到成堆瓷器漆器，那些大画店，还多把当时不上价的，不值得再装裱的破旧书画，插在进门处一个大瓷缸中，露出大小不一的轴头，让人任意挑选。至多花钱十元八元就可成交。我虽没有财力把我中意的画幅收在身边作参考资料，却有的是机会当别人选购这些画幅时，得便看看，也从旁听听买卖双方的意见，因此增加不少知识。

若向东走，则必须通过三条街道，即廊坊一二三条，或更南些些的“大栅栏”，恰恰是包括了北京市容精华的金银首饰店铺，玉翠珠宝铺，满清三个世纪象征皇权尊严和富贵的珍贵皮货店，名贵绸缎呢绒匹头店，以及麝香、鹿茸、熊胆、燕窝、牛黄马宝药物补品店。尽管随走随停，大约有二十分钟，就可到达当时北京城最热闹的前门大街。市面所有大小商店，多还保留明清以来的旧格局，具有各种不同金碧煌煌古色古香高高耸起的门楼，点缀了些式样不同的招牌，和独具一格的商标。有的还把独家经营的货样，悬挂在最显眼处，

给生熟主顾一望而知。到了前门大街，再笔直向前走去，过了珠宝市以后，就还有上百家大小挂货铺，内容更是丰富惊人。若说琉璃厂像个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这些挂货铺就满可以说是个明清两朝由十四世纪算起，到十九世纪为止的“人文博物馆”。举凡近六百年间，象征皇权的尊严起居服用礼乐兵刑的事事物物，几几乎多集中于这些大小店铺中，正当成废品加以处理。一个有心人都可望用极不足道的低廉价钱，随心所欲不甚费力就可得到。什么“三眼花翎”，“双眼花翎”头品顶戴连同这种王侯公卿名位自来旧红缨凉帽，天青宁绸海龙出锋外套，应有尽有一切随身附件，丹凤朝阳嵌珠点翠的皇亲国戚贝勒命妇的冠戴，原值千金的“翠玉翎管搬指”，“钦赐上用”成分的荷包，来自大西洋的整匹“咔喇”，大红猩猩毡的风帽，以及象牙虬角的“京八寸”烟管，紫檀嵌螺钿的鸦片烟具，全份象牙精雕细磨而成的鼻烟用具，乌铜走银的云南福禄寿三星，总兵提督军门的整份盔甲，王公贵戚手上轻摇的芝麻雕白羽扇，以至出自某某王府祖传三代的祠堂中供奉的写真大像，都在大拍卖处理中，招邀主顾。进出店铺这些洋人洋婆子，好事猎奇，用个十元八元就可得到。天桥一带地摊上，还更加五光十色，耀人眼目，整匹的各色过时官纱、洋绉、板绫、官缎，都比当时流行的三友牌“爱国布”还不值钱，百十种摊在路边土地上，无人过问。皮毛部分则在陈杂皮货堆中，只要稍稍留心，随时可以发现天马玄狐倭刀腿七分旧的料子，还有宋代以来当作特别等级的马具狨座，经过改动的金丝猴炕垫背心，和全头全尾的紫貂北獭……这类物色，十多年前有的只有皇上钦赐才许服用的特别珍贵皮毛衣物，只要你耐烦寻觅，都无不可从一堆堆旧

皮料中发现。

这条大街可相当长，笔直走去可直达“天桥”。到天桥时，西边还有一组包括了百十个用席棚分隔，杂耍杂艺，每天能接纳成千上万北京小市民的娱乐开心的场所。有的得先花个一毛二毛，才能分别入座，有的却随意进出，先观看后收钱。照例不少人到收钱时就一哄而散。但又总有个预防措施，自己绷场面的伙计，尽先撒一把钱，逗那些新从外地来的游人，不能不丢下几个小制钱，才嘻嘻哈哈走去。这里主要顾客虽是“老北京”为了消耗多余生命，消闲遣闷的世界，却依然随处都可发现衣着单薄，不大成体统的外省大学生，或留在会馆候差的中年人。因此也不缺少本地出产的经营最古职业的做零活的妇人，长得身材横横的，脸上敷了一层厚厚的白粉，再加上两饼桂元大洋红胭脂，三三两两到处窜动，更乐意在游人多处，有意挤那些一望而知是初初来到的外省人身边去，比在公园里更大胆更无忌讳。只是最能吸引我这个乡巴佬兴味的，却是前门大街南边一点，街两旁那百十家大小不一的“挂货铺”。

我就用眼所能及，手所能及的一切，作为自我教育材料，用个“为而不有”的态度，在这些地方流连忘返的过了半年。我理会到这都是一种成于万千世代专业工匠手中的产物，很多原材料还来自万千里外，具有近古各国文化交流历史含义的。它的价值不是用货币可以说明，还充满了深厚友好情谊，比用文字叙述更重要更难得，且能说明问题的。但是当时代表开明思想新一代学人，却极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居多只当成一份“封建垃圾”看待。只觉得尽那些直脚杆西洋人，和那些来自罗刹国的洋婆子，收拾破烂，尽早把它当成无价

宝买去好。事事物物都在说明二千年封建，和明清两代老北京遗留物，正在结束消灭中。可是同样在这条大街上及后门一带，却又到处可以发现带辫发的老中幼“北京人”，大街小巷中，且还到处可以见到红漆地墨书的“皇恩春浩荡，明治日光华”，歌颂天恩帝德的门联。我就在这个历史交替的阶段中，饱读了用人事写成的一卷离奇不经的教育约半年，住处才转到沙滩附近北河沿银闸胡同和中老胡同各公寓，继续用另外一种方式学习下去。

乍到这个学府新环境中，最引起我的兴趣和激发我的幽默感处，是从男学生群中，发现大多数初来北京的土老老，为钦慕京派学生的时髦，必忙着去大栅栏西头“大北照相馆”，照几张纪念相。第一种是穿戴博士帽的毕业像，第二种是一身洋服像，第三种是各就不同相貌、身材和个人兴趣，照个窦尔墩、黄天霸、白玉堂，或诸葛亮唱《空城计》时的须生戏装像。这些戏装是随时可租，有时却得先挂上号，另外约定日子才去照的。

迁居到沙滩附近小公寓后，不多久就相熟了许多搞文学的朋友。就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学生，一部分却和我一样，有不少不登记的旁听生，成绩都比正式生还更出色，因为不受必修课的限制，可以集中精力专选所喜爱的课题学下去。也有当年考不起别的合理想学校而留下自行补修的。也有在本科中文系毕了业，一时不想就业，或无从就业，再读三年外文的。也有本人虽已毕业，为等待朋友或爱人一同毕业而留下的。总之，都享受到当时学校大门开放的好处。

当时一般住公寓的为了省事，更为了可以欠账，常吃公

寓包饭。一天两顿或三顿，事先说定，定时开饭。过时决不通融，就得另想办法。但是公寓为了节省开支，却经常于半月廿天就借口修理炉灶，停火一二天，那时我就得到小铺子去解决吃的问题。围绕红楼马神庙一带，当时约有小饭铺廿来家，有包月饭也有零餐。铺子里坐位虽不多，为了竞争买卖，经常有“锅塌豆腐”“摊黄菜”“木樨肉”“粉蒸肉”“里脊溜黄瓜”一类刺激食欲的可口菜名写在牌子上，给人自由选择。另外一水牌则记上某某先生某月日欠账数目。其中还照例贴有“莫谈国是”的红绿字条。年在五十开外的地区警察，也经常照例出现于各饭馆和各公寓门里掌柜处，谈谈家常，吸一支海盗牌香烟，随后即连声“回头见,回头见”溜了。事实上,这些年青学生多数兴趣,正集中在尼采、拜伦、哥德、卢梭、果戈里,涉及政治,也多只是从报上知道国会议员,由“舌战”进而为“武斗”,照一定程序,发生血战后,先上“医院”填写伤单,再上“法院”相互告状,末了同上“妓院”和解了事。别的多近于无知,也无从过问的。巡警兴趣却在刘宝全、白云鹏、琴雪芳、韩世昌、燕子李三,因为多是大小报中时下名人。彼此既少共同语言,所以互不相犯。在沙滩附近走走,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到校真正搜捕学生时,却是另外侦缉队的差事,和区里老巡警不相关的。

沙滩一带成为文化中心，能容下以千计的知识分子，除了学校自由思想的精神熏陶浸润得到的好处以外，另外还有个“物质”条件，即公寓可以欠账，煤铺可以欠账，小食堂也可以欠账。这种社会习惯，也许还是从晚清来京科举应试，或入京候补外放穷官，非赊欠无以自存遗留下来的。到五四以后，当时在京作小官的仍十分穷窘，学生来自各省，更穷

得可笑。到严冬寒风中，穿了件薄薄的小袖高领旧而且破灰蓝布夹衫，或内地中学生装的，可说举目可见。我还记得某一时节，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可能是来自云南的柯仲平，因为个子特别高大，长衫却特别短小，我因为陈翔鹤关系，和他有一面之缘，也在同一小饭铺吃过几回饭。至于我，大致因为个子极小，所以从不怎么引人注意。其实穿的是同样单薄，在北方掌柜眼中，实不必开口，就明白是来自南方什么小城市的。

当时不仅学生穷的居多，大学教授经常也只发一成薪水，还不能按时领到手。如丁西林、周鲠生、郁达夫诸先生，每月定薪三百六十元，实际上从会计处领到三十六元，即十分高兴。不少单身教授，也常在小饭铺吃饭。因此开公寓的，开饭铺的，更有理由向粮食店、肉店、煤店继续赊借，把事业维持下去，十分自然，形成一套连环举债制度。就我所知，实可以说，当时若缺少这个连环赊欠制度，相互依存关系，北大的敞开校门办学，也不会在二十年代，使得沙滩一带以北大为中心带来的思想文化繁荣的。

在这种空气环境中，艰苦朴素勤学苦干的自然居多数，可也少不了来自各省的大少爷、纨绔子和形式主义装模作样的“混混”。记得后来荣任北平市长的胡××，在东斋住下时，就终日以拉胡琴，捧戏子为主要生活。还有个外文系学生张××，长得人如其名，仪表堂堂，经常穿了件极其合身的黑呢大衣，左手挟了几本十八九世纪英国诗人名著，右手仿照图画中常见的拜伦、雪莱或拿破仑姿势，插到胸前大衣扣里，有意作成抚心沉思或忧伤状态，由红楼走出时，慢慢沿着红楼外墙走去，虽令熟人看来发笑，也或许同时还会博

得陌生人肃然起敬，满足自己的表演。据陈炜谟说，这一位公子哥儿，实在蠢得无以复加。因为跟一个瞎子学弹三弦，学了大半年，还不会定弦，直气得那瞎师傅把三弦摔到地下，认为一生少见的蠢材，一个学费也不收，和他分手而去。只是我看到他时，却依旧作成诗人姿势，外表庄严，内心充实，继续不改常度。和他在沙滩一带碰头时，且觉得十分有趣。扮拜伦虽不算成功，却够得上算是果戈里戏剧中成功角色之一。正因为沙滩一带候补学士、未来作家中，既包罗万有，因此自以为是尼采，或别的什么大诗人大文学家本人，或作品中角色的，都各有其人。我还发现过许多这种趣人趣事，比旧小说中的《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小说中契诃夫作品中脚色，反映的人事种种，还更精彩生动，活泼自然。因此总是用两方面得来的知识印象相互补充，丰富我学习的内容阔度和深度。综合这份离奇不经教育，因而形成我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和作人信念。

作者描写到初来北京学习生活的文字，生前发表的主要有《从现实学习》、《忆翔鹤》和《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等。编入“集外文存”卷的诸遗作，也有一些是回忆这段生活情形的。

八十年代初期，作者分别写过一些文集序言或追忆旧友文章，同时也留下若干残稿、废弃稿。本文是集这些残存遗稿中描述初到北京生活学习情况的段落，大致按时序整理而成。全部正文均出自作者手稿，标题为编者所拟。

① 十九天　与下文说法不一致，系出自不同残稿。推测一从沅陵算起为“十九天”，下文“二十五天”可能是从保靖动身时算起。

回忆黄村生

我于一九二三年的夏天到达武汉时，正值黄河泛滥，经过约十九天的沿路周折，停顿，换船转车三四次，才算到达了北京城。最先见到两个亲戚，一个是正从盐务学校毕业，无事可作，等待分配，看来毫无希望的田学曾。到京第二天，我按照通信地点，西城某某胡同门牌二十八号去拍门时，他来开门，一见我就又惊又喜，问我："为什么到北京来?"我老老实实的告他是"在军队里混不是办法，要来读读书"时，听过后他就哈哈大笑，把我让进正屋，见了我的大姐姐。才知道他们毕业后无事可作，在北京长住下去，也不是办法，正打量带了不到一周岁的孩子，回转五千里外的家乡住一年半载。听说我是要来读书，我的姐姐也大笑。因为我在民五离家从军，她连夜为我准备行李，天麻麻亮，亲自送我出门时，一切还保留在她印象中。算来已整整六年。她不久就下省考入周南女校，毕业后到北京结婚也有了三年。当时北京正是直皖两系大军阀争夺剧烈，连续换了好几个总统，内政极端腐败，教育在半停顿中时。我却异想天开，特意远远跑

来“读书”！过不到三四天，他们一家大小三人为我留下三十元钱，和一些被盖杂物，就离开北京走了。我等于失去了一根支柱，可并不丧气。因为深深记住“天无绝人之路”一句老话。若干年来，都亏得这一句话终于活下来的。

第二根重要支柱就是表弟黄村生，我三舅父家老二，比我年纪约小两三岁，却比我幸运。我在芷江作屠宰局事务员时，他由于过继给在沅州任知县的五舅父，也因此正在芷江务实书院学养蚕桑，不久就转入个新成立的中级农业学校。随后我在沅水流域各县转徙飘荡时，他却转到福建，那时八舅父正在集美商业学校作校长，入了厦门集美中学，高中毕业后，比我早一年到北京，考入当时的农业大学。是我在北京第二个见面的亲戚。年龄虽比我小，神气却比我老成懂事得多。星期天入城时，穿了身灰色羽纱洋服，到打磨厂一小客店来看我。一问每天房租得六毛大洋钱，即刻就要我结了账，陪我带了那份简单行李，同去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和管事的另一远房表亲金老表商量，就西厢房占了个小小房间落了脚。还向门房说好，一月花一元钱，每天供应热水。又为问明白了附近包伙食小饭店，一月六元每天送来一菜一汤伙食两顿。还陪我去附近宾宴华楼，补充了些必需小东西。且告我出门向西走十来分钟，就是“琉璃厂”，可看的玩意儿不少。若向东走，有三条大小不一的直街，即廊坊头条、二条和三条，随便选一条走去，二十分钟都可到达北京当时最繁盛的“前门大街”，算是北京的脊梁骨，各个著名铺子要什么有什么。一直向前可到达著名的“天桥”，那更是“国粹精华”。只是到了北京走路得随时注点意，这里可不比小城市，免得被人有意无心撞倒或撞倒别人！当天不回罗道庄，就陪

我在会馆过夜，彼此交换近五年不同的生活经验，我才明白他简直成了候补“京油子”；他才明白一个亲叔叔和一个亲哥哥，都和我同在湘西保靖军队里工作，因吸鸦片烟死去时，还都是我亲自为埋葬的。我还告他，时间虽不长，死去的家乡亲友可够多！我居然不至于在那份飘飘荡荡的各种灾难情形下胡涂死去，只是偶然的幸运。所以趁机会极力摆脱那个环境，跑来见见世面，由自己支配一下自己看看，能上学就上几年学，办不到就放弃读书妄想，不管什么事，只要能混得下去，总比在那个成天杀人的地方混强得多。

因为我看得很清楚，若只为个人出路打算，倒“满有前途”，再熬个三几年，会可升个“机要秘书”，“主任秘书”，转个什么“局长”，“县长”，都十分自然。若是从军队组织系统说，在我上面约有三十个什么长，只有改变成为某某“驸马”，才会真正把地位改变见转机！既决心不走这条路，还是出来作个“自由人”，比较合理。村生却赞同我的想法，先作个“独立人”，才能作第二步打算。

北京找工作并不容易，可是像我这么“混”，总不会饿死，因为会馆里、公寓里正住下了万千人，很少听说死去的！从他方面且明白，五四运动虽闹得轰轰烈烈，到目下其实已成了尾声，几位火烧赵家楼的知名之士，不是得本省官费出国，就是拿上海经营花纱的穆藕初奖学金出了国，有的人说是官僚军阀采用了个“釜底抽薪”巧计，有的说不是。总之，人多出了国却是事实。文学革命也成了尾声，热闹不起来。提出的理由有点落空，因为许多大学校文、法科毕业若会古文，还是古文吃香！

第二天，他正要去大栅栏西头大北照相馆照相，邀我去

看看，让我第一次开眼，见不少新自外省来的大学生，都挤在那个小小照相馆换衣服，等待按名次拍照。这是规矩，一来必照三张相寄回家中：第一，租一份黑色博士大衫和个方块帽，庄严认真照一张毕业后得学位的全身或半身相；其次租一份洋服，照个"摩登"相；第三，照个人身段和爱好，照一张模仿黄天霸、窦尔墩或诸葛孔明、杨六郎、或梅兰芳、金少梅戏装相。照当时风气，只有这样才像是个大学生！当天还到绒线胡同去看了回电影戏，我预先走到前几排去，他却拉我到正间找了两个坐位。看的是当时最流行陆克闹剧，打得一塌胡涂。我对于打打闹闹感不到什么兴趣，因为在家乡几年眼看真的打杀，实在够多了。他回学校时，约好下星期六来接我下乡，去罗道庄学校住几天。同房住了六个人，全是小同乡，另一房间，也住了六人，全是大同乡。吃大锅饭不分彼此，什么酸的，辣的，腊肉、菌子油都有，全是从家乡寄来的。住处总经常有人进城，所以总有空床位可住，只带把牙刷就够了。

我像是吃了个定心丸子，于是就在会馆住了下来，且照他说的，用琉璃厂和一条前门大街作临时学校，随意走去，令我十分满意，不多几天，就熟习了街上一切，觉得极有意思。当时东西琉璃厂加上南新华街，约有百十家大小古董店、旧书店、文具店、裱画店和修理各种乐器的店铺。我素年欢喜写写字，稍微懂点书法，仅仅是那些店铺的百十块扁额，就使我觉得十分有趣。因为上面不同题名就满有意思。记得有刘石庵、钱南园、翁方钢、潘祖荫，翁同龢、陆润庠、宝熙、何绍基、沈寐叟、罗振玉、叶德辉、康有为、梁启超、谭延闿、樊增祥、袁寒云、丁佛言，这些名字都可发现。这

些人就书法谈书法，可都还各自见出点不同艺术风格。生意人也还能严守旧风气，不仅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还不随便让之出场露面，至于黎大总统或吴大帅、冯玉祥自然更不在话下！就中似乎只见到一个铺子，有徐大总统用“水竹邨人”名款书的横额，笔干巴巴的，可见不出什么高明处。

北京虽算得是新文化策源地，名声竟像只于沙滩一带地区，其余还是在日益衰颓的一个老北京。不仅琉璃厂一带古董店给人印象是古色古香，附近小街住户人家还经常可见到“皇恩春浩荡，明治日光华”十个字的门联。至于前门大街直到天桥，各个铺子和里里外外人事社会，那就更加令人感觉到不仅像是十七八世纪的清代皇都，还像十四五世纪的明代的市容！这时节溥仪逊位虽已有了十多年，距张勋统率辫子兵复辟失败也过了好几年，可是一条前门大街上，沿街到处还可发现，摆小摊子的，头顶上多还盘了条小辫子，舍不得去掉。且随时随处还可发现中年旗人妇女，着晚清旗装，彼此在街头相遇，必相互致敬，由其中一人照规矩将对面一家人大妈、二姨、三表婶，一一致意后，再由对面另一人转问全家，最后才彼此作成略微蹲下姿式，分别走去。礼数之周到，为其他地方所少见。店铺里掌柜或二把手管事，送主雇出门，必哈腰示敬，全不含胡。这个文明古都，并且经常还可见到一小队武装人马小跑通过，末后一辆平板大车上，坐了个面目肮脏的赤膊壮汉，作成京戏中上法场的情形，或痴痴呆呆一言不发，或嘶声嚷叫“砍了头不过碗大一块疤”，“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更自得其乐是“小孙子，大闺女，来为老子送丧！”恰正是在全国任何一省都是每天发生的悲剧，同样是人人司空见惯的事情，除了少数有闲好事的人，

或在街头闲荡的小孩子，跟着车后追去，大多数人都带着一种麻木神情，等待车一过身，就又依旧做他应做的事！

由珠市口到天桥一带，还有百十个大小挂货铺，里面满是象征近二世纪皇权尊严的一切起居服用东东西西，堆积如山，用一个处理废品方式，等待主顾脱手，大都不及原来百分之一二价值，即可随心所欲得到。而进进出出这些挂货铺的，却多是些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洋人，或基督教会的办事人。为了招徕主顾，这些铺子有时挂了件十八世纪织绣旧龙袍，标明价值也不过二十元左右即可得到。至于整匹过去多出于“钦赏”品的旧纱罗，则沿“陈丝如烂草”习惯，一般花二三元即可得到。二十年前还纹银二三百两的芝麻雕羽扇、翡翠翎管和搬指，沉香木十八子手串，也不过三五元亦可随意选择。

维持市面戏院、酒馆、皮货庄或参茸庄的繁荣，除了当权的军官眷属，就是各省军阀的驻京办事处代表。著名的八大胡同，更是这些代表的活动不可少的地方。此外则名分上为各省选出的八百名众议员，报章上却常称之为大洋五千元的猪仔，也十分活跃。报章上就经常有特别消息记载，在议会因对于某某案件发生争持，继以相互殴斗，随即赶忙争去医院检查伤痕，准备正式上法院起诉，晚上却经人调停，同上妓院摆花酒讲和，一切无事。社会一切都若在一种腐烂中，发霉发臭，甚至于比我来的那个小社会，更糟糕到无可救药。我不到一月里，就从眼见耳闻接触中，得到个印象轮廓。

表弟黄村生是我许多表兄弟中，在我成年期前后最亲近的一个，也是我初到北京那几年，把三个亲戚当成三根支柱

看待，他却算得是最得力又最持久的支柱之一。

相隔了四十年，渺无消息，七八年夏天，忽然从香港来个青年，一望而知实精明能干，捎来了个村生信件，才知道他在香港住了许多年，在那边一个银行作事，和他的夫人都信奉基督教，两夫妇且作了极热心的传教士，信仰热忱，助人为乐，得到他那个社会范围内的人的特别敬重、信托。还经常去东南亚各地布道。见到香港方面翻印了我许多旧作，觉得可以代为请人办交涉，给我点应有报酬才合理。并告我若需要这些书或别的书，也可以为托人帮忙买来。不多久，果然前后就寄回了二十二本来，见到后使我有隔世感。又为寄了本大型《新旧约》，是我请他找来，想重新温习温习过去五十年曾影响到我练习用笔，起过一定好影响那一部分叙述。

乍一听到他已成了个传教士，这个消息，我并不觉得惊奇，反觉得充满兴趣，因为保留在我印象里的村生，原本是个理性比我成熟得早，办事极有头脑的人，且可说是个“无神论者”。

五十年前，他从罗道庄农业大学毕业后，返回母校集美中学去作校长，作银行行长，一切发展都和他的性情才干完全相称，工作也必然作得有条不紊，既能处理繁琐事务，应付各方面复杂人事，都可望取得应付裕如的成果。因为这份长处，从在学校时就看得出来。那时上农业大学刚满一年，还只十八九岁，其十二个湖南同乡，住在两间宿舍里，同学年龄都比他大一些，不少人且已在家乡结了婚。我还记得小同乡中有个芷江人姓唐，人胖胖的，大家就叫他“唐胖子”。又有个晃州姓唐的名叫唐伯赓，人小小的和个猴儿精一般，一面胡子，就叫“唐毛胡子”。大同乡则石门人姓詹，新化人

姓向。在这一群同乡中，他和詹姓高个子同学，两人就像是个“拿鹅毛扇”的军师，凡事和大家有关，他们就为出点小主意，或共同向学校提点什么要求，照例点子也由他提出，就容易办得通。一九二五前后，学校罢课闹事，他们的宿舍忽然于一个半夜里，由北京京师警察厅派了一排武装把两排宿舍包围，捉去了二十来人，他照例也被指名捉拿“捣乱分子”之一，在侦缉队关了经月才放回来，说是由校长谭熙鸿作保才回校的。回来时才知道当半夜捉人时，大家都不免相当紧张狼狈，他却镇静如平时，以为不碍事。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人手中，果然无事，并且过了三四次堂，却没有一个同学受过刑。共同睡在一个厢房长炕上，凡事照牢里规矩，直到睡时也得听哨子叫翻身就翻身，反而得到侦缉处头目赞赏，认为听话服管教，所以校长一保就开释了。回来听他说，最有意思是听同时被捕的艺文中学校高仁山讲政治，听北京著名大盗燕子李三讲盗窃。以为全北京的大户人家的锁都不大费事就可弄开，只有曹汝霖家的洋锁不易措手。那时大小报上经常把这位“燕子李三”本领说得神乎其神，村生表弟和他一道吃喝，一道睡在一个大炕上，只觉得这是个满有意思的懂人情、明好坏、十分家常人物。在侦缉队里办公事的，也知道他偷东西所光顾的户主，不是京里的土老财，就是卖烟土什么外来户，且从不曾伤害过户主。居多还是在天津或外县下手，严守规矩，不吃家边野食的。还和侦缉队里上下三班都有说有笑，只差拜把子呼哥称弟！所以捉了不久还是开释。至于高仁山却因为是政治犯，不久就牺牲了。

我还记得到北京不久，许多学生过广东考军校的，必先自备路费到上海，到了上海去广东，便可领路费。有个芷江

人张鼎彝过广东时，没有钱，村生就曾为他向同乡告帮筹路费。这些事他虽热心，对于现实政治可不怎么感兴味，可能和他从小即父母去世，在叔父身边受正规教育，过继五叔在芷江不久即因病死去，又依附在厦门任商业学校校长八叔读书，环境虽一再变化，却始终还有机会读书。到升学农大时，每月除了可领取廿五元公费，还不断得到八叔经济上的支持，因此经济上也比较宽裕，养成一种沉静持重性格，在一般生活上，不大像同时代的人感觉到什么直接压迫，因此尽管在五四时代后期就到了北京，却没有什么热情喷发受文化革命时代的影响，对文学政治，都不大感兴趣。但当时在本校、在城里各大学政治上活动人物，他多熟习，不少人姓名，我还从他那里才明白的。他对于新的"大政治"的集团活动不感兴趣，但对于封建性的小集团，如同乡会、同学会等等，却相当热心。所以在学校两排宿舍里住下的十二个同学全是同乡，大家都乐意共同在一处吃大锅饭，经常上也不大分彼此，日子过得很融洽。我去那里作客，初初还只算是他一人的客人，极快就成了两间宿舍共同的客人。因为照例经常有人进城，不回学校，必有空床铺可借住，我都可随意就宿。一住三几天，也从不觉得为难。

当时农业大学虽设有农、林、园艺各系，在出路上可不怎么大，教学上也不比清华、燕京要求严格，但学校却较富裕，因此在校学生也享有较多权利。农场空地多，通钓鱼台一条土路，山埂上满种洋槐，有一大片水田，接着一片芦苇水塘，学校雇有不少农人，种田栽菜，割芦苇，捕鱼，每一学生秋冬之际，都可用象征性价钱，分配三百斤大白菜，由学校为运到宿舍门前，一同用雪和砂土掩盖，可吃到明年开

春！学校正门有个大土路，每天有运煤运货的大骡车通过，有时还有三五匹小队骆驼通过，因此学校正门对面设了歇脚酒店，还搭了个凉棚，供应过路人歇脚，出售青龙桥海甸两地的莲花白烧酒，还养了三几十只小鸡。有什么城里同乡来学校玩时，怕菜不够，随时都可去那小酒店打商量，花个三四毛钱，买两只童子鸡炒青椒下酒。这事经常总是村生想主意，由毛胡子告奋勇去办交涉的。当时这两间宿舍里似乎只有二辆自行车，是唐胖子和向姓同乡所有的，因此若要从城里办点什么吃用东西时，多为唐胖子告奋勇完成。因为十二个同乡中，似乎应数唐胖子懂吃懂喝，消化力也特别好，凡是进城采买食物和作料，都由他包办。由学校入城分两条道路，从正门走路远些，从后门经钓鱼台小路入平则门，近得多，只是得从田坎上走，当时路既弯弯曲曲，又不平整，特别是冬天雪后，骑自行车得格外小心才免蹉跌，唐胖子却以为体重压车，不碍事，沿路坎坎凹凹极熟习，有时快天黑时，还从小路赶回学校。这些同乡都各具不同性格，部分和所生长地方有密切相关。如长沙、新化同乡都善于大声争吵，特别辩论国家将来问题时，经常争得十分热闹。石门詹同乡却欢喜吟诗，唐胖子会唱京戏，毛胡子可极少嗜好，不吸烟喝酒，像个实干家，说到做到。

有时几人也凑成一桌玩玩麻雀牌，直到夜深。校监循例悄悄的来查房时，几人就煤油灯下玩得极欢，直到背门那一位身后忽然伸出一只瘦手，抓面前一张红中白板，大叫一声三番，另外几人才发现原来是校监！彼此哈哈大笑一番，校监似乎记起自己的职务，才说：“天太晚了，早过了十二点，大家还是休息休息吧。”彼此相契于无言，脱了衣服上

床。村生表弟照例也是个热角，可不发迷，玩得有个节制，一到十二点就退席。我却根本不发生兴趣，因为玩的时期已过了。

本文作于 1981 年秋、冬，时黄村生已故去一年多。回忆未能完篇。据两种初稿本整理编入。

回忆徐志摩先生

我是一九二三年的夏天，由湖南湘西苗乡一个小小山城中，徒手来到北京的。算算时间，不知不觉间前后就过六十年。这半个世纪，可说是中国历史所未闻，变化最激烈动荡的一个阶段。我目击身经的种种，一一回忆起来，简直像是比《天方夜谭》内容还丰富离奇，也荒谬到匪夷所思。

从大处说，我曾看到前后两个总统忽然间成为阶下囚，一个被困在东厂胡同的总统私人住处，直到缺水断炊，才能解围。另一个被囚在中南海怀仁堂里，一切外面消息都完全隔绝。还由一群小军阀在十来个县份里的割据称霸，到大军阀统军百万，为争夺最高位置的前后覆灭。最富于戏剧性的大场面，是直奉战争的最重要一个回合，在当时统军数十万，由山东蓬莱一秀才吴佩孚任大元帅兼总指挥，沿京奉路正面率兵打出关外，正值捷报频传的关键时刻，主持北路战役，熟习《三国演义》曹操用兵策略的冯玉祥，却在古北口长城边按兵不动，忽然撤兵，于一夜间占领了北京城，迫使正在

京奉路上督战的吴大帅，进退失据，军队解体，只好宣布下野，换人坐庄。这个山东秀才，从此倒下，一蹶不振，退往湖北，先依萧耀南，再转四川，于四川地区大小军阀间作客受招待，再转徙流亡陕甘地区游荡，用讲《易经》、写对联，哄骗那些由差遣马弁出身、一字不识的“司令”“督办”、土著小军阀间，得点孝敬，维持随身一群吃闲饭的幕僚，和一营随从兵士混日子。尽管所到处，还始终要挂上“大帅行营”的帅字旗，事实上已成为一小撮流浪汉了。

冯玉祥则占领北京后不久，就得到智囊李石曾为出谋划策，一面由冯手下勇将鹿钟麟逼宫，把满清最后一个蛰居在紫禁城里，于一小群宫女和割了“麻雀”的太监中称孤道寡作“皇上”的溥仪，限定时日一律赶出紫禁城。暂时逃入荷兰公使馆藏身，过不多久就为日本人保护，设法化装逃到日租界里躲藏起来。最后终于逃到大连，种下九一八后，成为伪满傀儡皇帝的因子。至于由公开贿选而成大总统的曹锟，虽幽囚于中南海，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但在报章中给北京百万小市民以刺激兴奋的，可不是这位大总统的升沉，却是当时的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把伪总统府里在曹锟身边任总务，深得宠幸的娈童李彦青，绑赴天桥枪决，作得大快人心。

李石曾原是亡清最后一个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儿子，在法一度主持勤工俭学会，以经营豆腐生意而著名。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老同盟会一分子，为人多心计，有大野心，既作了冯玉祥的智囊，即为冯出主意，电促在广东的孙中山先生即日北上，便于在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利用冯的军

权，建立新的法统。可是奉军却占先一着棋，拥护皖系军阀头目，马厂出师讨袁有功的段祺瑞，由津到京，自称“执政”。到孙先生带病北上时，段却于铁狮子胡同旧海军部扎下执政府的营盘。但是他的主要助手，恃才傲物野心极大的徐树铮，却为当时在京握有军权实力的冯玉祥所忌，加以迫挤。只得领了一大笔费用，用个出访欧洲五国特使的名衔，带了几十个新旧僚属出国。意料不到所乘坐的特别专车刚达廊坊站时，专车就停了下来，被保卫北京的卫戍司令鹿钟麟，派了几个亲信上车，传达鹿意，请徐下车商量事情。徐还不明白已入陷阱，大模大样的回答：“有什么事让鹿总司令上车来说。”可是这几个武装亲信，却毫不客气，把徐拉下车站，即刻就地把这位“特使”枪决了。事后却托名，是鹿某某为父报仇的结果。老段明知这是冯的手法，存心设计，砍了他一只右手，却无可奈何。惨的是一群年轻译员幕僚，内中有些新由盐务学校毕业的学生，正苦于毕业后生活无出路，想方设法成为特使随员，各从亲友处举债二百元作治装费用，充满从龙兴奋随同上车，还不及天津一半路，头头一死，就被那些士兵由专车赶下，十分狼狈的回到了北京。我还有机会从一个亲戚处，亲自听过他们在专车上旅行历险的故事经过，比第二天报纸上记载有趣得多。

中山先生带病和孙夫人北上时，已难记住年月。近查一本香港出版的刊物中的孙夫人生平年表，才明白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到达天津，三十一日到达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即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故。前后只三个月。

到北京不久，虽即因病重进入医院，我还有幸在中央公园一个亭子前敞坪中（似在养金鱼处附近），看见中山先生站在亭子前台阶上，和群众见面时，作的一次讲演。讲演内容虽听不懂，衣着素朴和神态和气家常平易近人处，却留下个十分深刻印象。五十年来，我还记得异常清楚。中山先生到京以前，老北京的小市民，每提及这位推翻帝制的开国伟人时，总不免照“老北京”油嘴白舌习惯，叫一声“孙大炮”，意即中山先生建国民主主张，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这也可说正是由做皇帝梦的袁世凯以来，代表北京官方宣传的总成绩。尽管方法十分幼稚拙劣，恰正是旧北京小市民最容易接受的口头语。

我们应当明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掀下金銮宝殿虽已十三四年，整个北京里大街小巷，却还到处可见头上保留一条象征“大清顺民”的辫子。许多大户人家门前的对联，还依旧写上“皇恩春浩荡，明治日光华”十个字。

中山先生的死，停灵于中央公园社稷坛北那个殿堂中时，世界各国都特派代表来京致祭，全国各省各界，及一些“省长”“督办”，也都派有代表或亲自来京致祭。后来移灵奉安于碧云寺白塔那天，沿路有上千由芦席黑布临时搭成的祭棚，装点得整个北京城异常庄严。送葬的队伍，一直由公园门前，到达碧云寺白石塔下，三十里人流不断。这种空前的壮观，给北京百万市民一次极好的教育，影响之远大，且十分显明。因此过一二年北伐时，革命军实力还只到达武汉，河南、河北两省人民都闻风兴起，先声夺人，旧军阀不战而溃。我个人认为，这和中山先生带病来京，因病而死，留下的影响，

都密切不可分。

过不久，故宫开放，我大约可说是较早一批观众。且可能是对于故宫一切最感兴趣的观众之一。犹记得那时的御花园里，小围墙里那个小庙靠西围墙边，还有一枝高高的桅杆，上端有个方桌大覆斗形木框架，上边一点，还拉斜挂了一面可以升降的黄布带旂大旗，在微风中翻飞。御花园西边假山后，那所曲尺形小楼房，还注明是宣统皇帝学英文的地方。英文教师庄士敦，原本就住在那个楼上。假山前一株老松树上，还悬有一付为皇后娘娘备用的秋千索，坐板还朱漆灿然。西路宣统的寝殿，廊下也同样有付秋千索。隔窗向里张望，卧房中一切陈设可看得清清楚楚。靠北一端有个民初形式的普通钢丝床，床上衣被零乱。正中红木方桌上果盘里，还有个未吃完的北京苹果。方桌附近有个旧式风琴，一辆自行车，除了寝殿中照宫廷旧例的一些古玩陈设，都像是上海地方一个中等商人的卧房。内中种种景象，却可知当时是在十分匆促情形下离开的。

这地方虽极吸引观众，我却对于东路钟粹宫的字画，和另一宫的瓷器陈列特别感到兴趣。为的是可以补充我初来北京，住东琉璃厂附近那半年，每天逛琉璃厂可不易见到的名画法书。至今印象还十分清楚。范宽的《雪山图》，董源的《龙绣郊民图》，夏圭的《溪山清远图》，赵松雪的《秋江叠嶂图》，除了这些著名山水画，此外还有李成、郭熙的枯木瘦石，李公麟、任月山、钱舜举的画马，崔白、林椿的花鸟画，和相传五代契丹画家作的《秋林幼鹿图》，都深深吸引着我，

支配着我，并产生种种幻想和梦境，丰富充实了我这方面的知识和感情，甚至于也影响到后来的写作，用笔时对于山山水水的遣词措意，分行布局，着墨轻重。远过直接从文学上得到的启发还加倍多。

特别是过去谈到我的写作受水的影响极多时，其实还应当补述一笔，尚有那些在前人画迹中关于水的处理独到处，也给了我深刻教育和启发。如北宋人作的廿四种水势图种种不同的水纹，和《临流独坐图》、《溪山清远图》、《长江万里图》、《巴船出峡图》，赵佶的《雪江归棹图》，赵幹《江行初雪图》，以及朱锐、乔仲常、燕文贵等《赤壁图》，无一不各具匠心，各有千秋。王晋卿的《渔村小雪图》，赵松雪的《鹊华秋色图》，水纹都极淡薄，却仍能产生水的效果，达到不同的艺术成就。《宋人百花图》中反映水的方法更微妙，只在围绕圆荷纤细若针的游鱼，以及刘宷①作相似而不同的纤细如针追逐水面的游鱼，在画迹都丝毫不着水的渲染痕迹，却令人明确感觉到水的存在，且远比唐宋诗词用文字对于水的形容，更加具体真实存在，长远保留于我的印象中，而对我的写作，发生鲜明具体而又荒唐离奇深刻持久的影响。

我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开始用笔学习。用笔刚好得到出路时，于北京认识了许多对我此后一生工作和生活影响极大而持久的师友。这些师友中年纪最大，影响最深，关系最久，应数林宰平先生；年纪最轻，帮助最多，理解特深，应数徐志摩先生。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为良友公司编辑第一个《从文小说习作选》集时，作了个题记，末尾这么提起过这几个赞

赏过我的工作态度，支持鼓励过我工作进展，帮助过我生活稳定工作发展的几位熟人时，就那么提到过：

……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陈通伯先生，杨今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的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过北平市区里作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你们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如果觉得完全失望了，也无碍于事，不妨把我放在“作家”以外，给我一个机会，到另外一时，再来注意我的工作。十年日子在人事上不是个很短的时期，从人类历史说来却太短了。我们从事的工作，原来也可以看得很轻易，以为是制造饽饽食物必需现作现卖的，也可以看得比较严重，以为是种树造林必需相当时间的。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他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

题记中提及的人，都前后早成了古人，我的所有工作，也在社会变化发展中成了陈迹，这种新陈代谢，我认为是自

然规律，因此并不为之丧气灰心。在面对现实情况下，明白事无可为时，反而心安理得的，认为即早改业，凡事从头作起，为合情合理了。

我算是熟识志摩先生仅余的几个旧人之一，从一九二五年九月里，和他第一次见面，就听到他天真烂漫自得其乐，为我朗诵他在夜里写的两首新诗开始，就同一个多年熟人一样。第一次见到徐志摩先生，是我读过他不少散文，觉得给我崭新深刻动人印象，也正是我自己开始学习用笔时。就不知不觉受到一种鼓舞，以为文章必须这么写，不同当时流俗所赞美的桨声灯影的秦淮河一类作品，才给人眼目一新的印象。事实上我那时即乐意学习，也不会能收到丝毫效果的。那时新月社还未成立，无什么出版物。新月社同人集会，也近于散场冷落的情形时。他的住处似还在松树胡同七号一所小小洋式房子里，住处后有个小小院落，齐腰栏杆边放上几盆菊花和秋海棠。一面墙上挂满了绿叶泛黄的爬墙虎，应当是已到深秋还未大冷的时候。我这么一个打烂仗出身的人，照例见生人总充满一种羞涩心情，不大说话。记得一见他，只一开口就说："你那散文可真好！"他就明白，我是个不讲什么礼貌的乡下人，容易从不拘常套来解脱一切拘束，其时还刚起床不久，穿了件条子花纹的短睡衣，一面收拾床铺一面谈天，他的随便处，过不多久就把我在陌生人前的羞涩解除了。只问问我当前的生活和工作，且就从枕边取出他晚上写的两首诗，有腔有调天真烂漫自得其乐的念起来。因为早知道我在《现代评论》作个小工，专管收发报刊杂事，且和叔华夫妇相熟，经常在陈家作客，且可肯定叔华夫妇一定早

已在他面前说了我不少好话。有关他的为人和易亲人，不像别的《现代评论》另外几个教授，即或再熟一些，依旧令人感到拘束。不到一点钟，就把一小卷似乎用日本纸写的长信递给我来欣赏，且一面说这信是封刚从美国寄来的，你读读看，内中写得多真诚坦率又多有情！原来是他的好友林徽因女士来的一个长信。他就为我补充这个朋友的明朗热情种种稀有的性格，并告我和写信人的友谊种种。那时他还未曾和陆小曼结婚。对人无机心到使人吃惊程度……

再过不多久，就在当时新开放的北海静心斋，参加了他的婚礼。印象中回忆，犹十分明白清楚。当时的主婚人是梁任公先生，用装成异常严肃的带申斥的口吻说："志摩，你可知道你是个罪人，结了婚又离婚，现在结婚要认真对待你自己，要负责任……送你一件翠玉珮表示坚贞……"礼成完毕。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梁先生。平时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他是个才气纵横，不拘小节的大人物，听到这次致祝词，却感到一点酸秀才味，为什么这样迂腐？照当时习惯，大人物讨一两个姨太太不会有人提异议。但离婚又和一个刚离婚不久的人又结婚，却最容易成为社会新闻。好在全场沉闷空气，不久就为结婚进行曲冲散了。记得弹钢琴的是当时音乐学院萧友梅先生，拉提琴的是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引起全堂宾客欢乐，拍手送新人上车走去。

我的早期作品得到他的欣赏，实在他编辑《晨报副刊》以前。孙伏园因刊载鲁迅那首仿张平子赠爱人的讽刺诗，未能得到当时总编辑陈博生的同意，孙伏园愤怒辞职，带走了

原副刊一帮人马离职，另编《京报副刊》时，接编副刊是生手刘勉己先生，《晨报副刊》相形之下不免减色。我的小品随笔，由徐介绍，因之有机会不断发表。随后不久，又改由瞿世英负责，我的作品发表更多了些。但事实上我无从靠此过日子。每月能十元八元稿费，已能勉强生活，对我却俨然已是一条生路。……

本文始作于1981年8月，曾写出多种草稿，但均未完篇。其后作者转而为香港商务印书馆拟出版的《徐志摩全集》写序，这篇回忆文章终未写完。

据较连贯残稿整理编入，篇名为原有。涉及历史的叙述保持草稿写法，未作订正。

① 刘寀　宋画家，字宏道，工诗词，善画鱼。所作《落花游鱼》图卷，以纤细群鱼活泼体态及随波漂动的藻类落花，生动地表现并未着墨的清波流水。

怀念郑西谛

在首都中心天安门前人大礼堂对面，新的历史博物馆，新的建馆工作，由于得到全国文物部门及历史文物研究部门大协作，用不到半年时间，把九千件文物在八千平方米陈列面积内布置完成，十月初正式举行预展时，每天限制参观人数约一万，前后已接纳观众约四十万人。另外还招待了来自世界各处约八十个不同国家友好佳宾一千多人。由建筑本身的壮丽，到陈列室每一柜内，解放十年来自全国新出土文物，无不给观众一种崭新的印象，特别是来自海外的友人，更容易留下个大跃进全面开花印象。认为新中国对于古文物的保护与重视，历史文物研究工作的进展，和陈列的新方向，跃进成就也是稀有少见的。让我想起几年来领导文物工作的西谛，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新的博物馆预展时，充满愉快感情来致开幕词，就在一年多前出国途中一个偶然变故中死去了。

西谛去世消息初初从广播中得到时，我和家中人相对呆了许久，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最先还怕是其中尚有参加作家

大会的许多熟人。后来才知道是另外一行新出国的。但是我还希望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这事像是不可能的，不会有的。直到现在，我就依旧感觉到他还是活在我们朋友当中的一个生命力最旺盛的活人。也可以说他并不死。他的对国家无限热情，对新的文化事业的无限热情，他的豁达大度明朗率直性格，他对朋友长处的鼓励和尊重，……这一切，给熟人的印象，是永远鲜明有力的。人虽死去了，这种种还会长远活在所有熟人记忆中，成为一种力量，给人以长远有力的鼓舞。西谛治学为人的全部长处，虽不是一般朋友能学到的，但是那点对国家的热忱，对人民文化事业的热忱，和凡事识大体而对同志有益国家的工作永远能作有活力的鼓舞……过去对于许多朋友具有极大帮助，此后也还会发生良好的影响。正如俗话说的，热情为物是可以传染的。西谛对新社会的热情，必然将反映到许多人工作态度上，是把西谛未竟的工作担当起来，把西谛所盼望的种种加以实现。

解放以来，西谛在党的帮助教育下，在国内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大处不说，即以熟人易见的而言，在国内，领导文物工作岗位上，就团结了许多旧知识分子，为新的人民文化事业推进而努力忘我工作。在国外，又为团结国际友人反帝，争取民主持久和平，在亚非各友好国家间奔走不息，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好感。由于他的博学和热情，由于他对世界文学文化具有广泛的兴趣和理解，而且格外关心亚非友好国家旧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以及由于新的人民斗争努力兴起的更新的文化，对目前未来世界和平的贡献，使得他到每一兄弟友好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去访问时，都得到许多心心相印朋友，也就是为祖国得到许多好

朋友。通过西谛，使得这些国际友人，既容易更深一层理解中国的文化过去和未来，也更深一层感到中国对于这些兄弟友好国家，充满“莺鸣求友”团结友好的深情。西谛真不愧是个新中国“文化使节”。因此西谛的死，不仅是我国极大的损失，其实也是民主阵营诸兄弟友好国家一种不易弥补的损失。不仅国内熟人感到悲痛，许多国际友人得到这个消息时，一定和我们同样感觉到悲痛。但是也必然觉得会从他的给人充满活力的印象，得到一种新的信心，要把反帝工作和为人类争取和平友好团结工作，更好的巩固下来，为共同目的而奋斗。

西谛是为国家而牺牲的，为人民事业、为世界和平、亚非友好团结而牺牲的。西谛的死光荣而壮烈，正和一个勇敢战士在战场上的牺牲一样。当得到消息的十九早上，我过历史博物馆去，准备和同事过郑宅吊唁时，听说馆中一个年青女同志，得到消息后，即情不自禁大哭了一场。这位同志是个政治品质很好的团员，和西谛原并不怎么相熟。她的哭，我明白是因为她觉得人才难得，这一牺牲，对国家、对人民事业损失都太大了，而感到悲痛万分的。这种情感是十分自然的，其实也代表了文物界许多知道西谛几年来工作对党、对国家如何有用的年青同志共同的感情。西谛的为人种种长处，我深信在这些更年青一些的同志中，也会产生一种长远的良好影响。

我认识西谛，虽有了三十多年，过去来往实比较疏。约在一九二九前后，因同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每星期才有机会碰碰头。但是更早些日子，我还在乡下部队中时，却已从他编的《小说月报》和《文学大纲》以及后来编的《中

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版画》等书中，学了许多有用知识。不管别人对于他的编著工作如何估价，或以为粗枝大叶，学术水平不够高；或用现在观念，批评他三四十年前工作方法，但是据我想，近三十年学人作家中，一定有不少和我情形相差不多，对于西谛的工作，主要应当是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他的许多工作，实近于开荒破土，由于敢想敢干，才打开了许多人学习民族艺术优秀传统的眼睛。最重要的如像对于古戏剧和古代木刻版画，他的贡献格外大。他对文化工作的精力和气魄，他对文化事业从大处落墨的看法，也都是新中国领导文化工作迫切需要的！

在写作上，我曾和西谛打过两回交道，不易忘记。记得约在一九二六前后，西谛在编《小说月报》时，我正在北京和胡也频一道学习写作。都曾投过一二十次稿，这些习作从未刊登过。直到他去英国后，由叶圣陶先生接手，我的小说《柏子》等作才在刊物上和读者见面。使我觉得他和圣陶先生，同样对于我的工作，都起过鼓励帮助作用。到一九三四，他在北京编刊物时，我依旧是个投稿人，《湘行散记》有几篇小游记文章，首先就是在他编的刊物上发表的。在商务出版最后一集“文学研究会丛书”由他编印时，我的《湘行散记》就是由他建议收入丛书中，才和较多读者见面的。

即到后来比较相熟后，在北京，在上海，我们还是过从不多，竟可以说除业务必要联系外，很少来往。他那好谈论，爱朋友的性格，使得朋友谈问题时，在会上不易结束，还得同回家中或什么小饭馆里去继续进行，在和他相熟人中，我或许可能是一个从未同在一处看过什么戏或吃过什么馆子的熟人。主要原因或者只是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易和人

相熟，生活方式又比较简单，不大懂文化娱乐，知识领域也极窄狭，既不会交际，又不习惯在公众场合中出面说话，这正是我一生短处吃亏处。西谛为人却相反，性格外向而喜活动，文化趣味广博，又长于接近人，熟人甚多，和人可谈问题自然也格外多。西谛这些长处都是我所歆羡，想学也学不来的，但却知道，有些地方其实应当向他学习，学得好，也正是思想上一种解放。

抗战八年，我在云南复员时，和家中人初初回到上海，许多文艺界旧朋友都见了面，才又见到西谛。在几次聚餐中，曾和巴金、西谛、健吾等一道谈起此后的写作问题。我正拟北行过北大教书。当时北京本来早已成个孤城，四面全是解放军。城郊附近虽有国民党廿万部队驻守，企图保守这个大据点，事实上郊外已常有炮声可听，国民党政权已近于回光返照。熟人多劝我不必过北方，西谛即是其中一人。以为北京大学情形不怎么好，与其在那边为难，还不如留在上海，等待变化。要教书，要写作，上海通有机会。总之，比去北京为“过河卒子”点缀场面，实在有意义些。熟人朋友在一处，办刊物也热闹得多！因为他为民主运动活动，在上海接触面既广，说的话自然大有道理。我只因为不大习惯上海生活方式，也还不大明白他的好意，到后还是来北京听炮声了。

北京解放后不久，西谛即由申转香港北来，不久就作了文化部系统下的文物局长。故宫、北京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全在领导管辖范围中。我在历史博物馆搞文物研究，原属文物局直接领导，西谛因此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虽然是熟人，来往还是不多。解放九年来，由于业务关系，开会时和他见

面机会多了些，可是除去文物局或故宫因公事接触，还只是在全国政协文化组或文联什么集会上碰碰头，私人间始终还是缺少过从。西谛在政协文化组是组长，座谈会中还像可谈的并不多。事实上文物工作在中国可说还是个崭新工作，我搞的既然比较接近业务实际，具体问题可谈，应谈，必须要谈的事情倒并不少！特别是他作了文化部副部长以后，属于工作范围，即仅以一个历史博物馆研究工作，如何进展才能适合国家迅速发展需要？如何加强培养年青一代接班人，才来得及顶上去？从几年工作实践上，我应当向他提出的建议就不少！但是由于一种难于说明的个人情绪，即有机会，我还是始终不曾主动特别找他谈过一次话。虽然几年来在各方面，特别是个人研究工作上，总得到西谛的帮助和支持。其实除个人工作外，可谈应谈的事情还甚多。例如有关全国文物研究工作如何推进问题，有些文物"古为今用"结合教学和生产问题，从我认识理会到的部分，如能不断的向他深切谈几次，可能有些工作会得到比较便利的解决，对全国文物工作显明是有益的。由于他对于新的国家远景有深刻理解，新的文物研究工作求不落后于社会发展现实，应当如何办，就来得更快，成就更大，他应当比别的人更容易体会！但是，如果就照平时处理问题情形说来，西谛可不能有机会理会到某些情况的。也许在他工作中，这多是比较次要的问题。可是也并不是不足道，因为事情一耽搁就是数年！新社会既然一切事都在突飞猛进中，文物研究工作又那能例外，可以用一般步伐前进！西谛一死，我初初感到的是有些事情，或许再也不会有一个那么熟人可以商量了。例如在他去世以前，文化部为刊印全国重要陶瓷器图录卅册，曾经组织

了个编委会进行工作，在文化部大楼开过两次会。一次是讨论首先编印什么，其次是初步审定已经拟编的越州缥青瓷。记得在会上我就曾和西谛抬了一次小杠。当商量到先编什么时，好几位编委都同意用排队法顺序来，意思是由彩陶搞起，再其次商周秦汉。我意思却以为最好还是先搞近古的，且不妨先编近五百年的，明代青花和豆彩，再编近九百年的宋代，特别注意花纹和造型，用来教育启发美术教师，和各方面参加日用轻工业生产美术设计的同志，帮助目前轻工业生产比较直接。西谛就说笑："从文，你一开口总是工艺。总忘不了工艺!"我无话好说，因此就决定了还是用排队办法，一本一本的来作。虽这么决定，我却明白他并不是不关心工艺。照西谛脾气，如果我们能有机会把应当先出的照相材料准备妥当，送到他面前看看，并告他这个材料对目下生产和教学实在都有具体好处时，我相信，他还是会接受这种有益建议，并不坚持个人主张的。因为他对文化工作既热心，又敢于负责，也善于走群众路线。他一死，这工作只有暂时停顿了。当今年春天，进行十大建筑新的应用陶瓷设计举行图样鉴定，景德镇和醴陵来的设计老师傅，和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教师及年青同学，都感到花纹参考材料不足用，从设计图样中感到需用时，让我想起那个未完成的编辑任务，还应当设法完成。而我在西谛这么一个熟人面前，还不能坚持我的正确见解，真是我的缺少对人民事业责任感另一种表现。

西谛一面是为人性格鲜明豁朗，另一面却是工作十分耐烦认真。记得五六年我因参加编辑《历史图谱》工作，部分材料需要从明代版画解决，拟就他未完成在补充的《中国版

画》稿中选些有用东西时，由于材料多，一时不便挑选，他就慨然同意把全部稿子借过我们工作处去。经翻看时，才发现正和他许多藏书情形差不多，几几乎每一面都有他亲手的批注。使人不易设想，以他这么一个忙人，还能在半夜里抢时间来这么细致谨慎的整理材料。现在这份遗稿，大致也和其他书籍一样，已转到北京图书馆郑氏藏书专室中，且有专人负责整理。希望有人能继续这个补充工作，早日完成付印，和中外关心这个工作的读者见面。又西谛对文物出版工作，虽兴趣在提高，争国际地位，但也并不忽略普及。古本戏剧丛刊的陆续印行，他即极力主张过。前年轻工业部，把朱桂华先生漆工艺史资料，当内部材料印出为他看见时，就极为赞美这个工作，以为不妨多印些，供各方面参考。西谛特别欢喜买书，近几年访书且扩大了兴趣范围，特别是对于明代涉及工艺技术加工等杂著，也十分留心。藏书中记得也有好些不易见到，且对于目下研究工艺史，编写美术史都有极大参考价值的。希望负责整理他藏书的工作同志，能注意到这一点，把值得付印的都能即早印出来。因这事也让我回想起我们的小小抬杠旧事。他说的我老不忘对目前特种工艺和日用轻工业美术生产上的提高只是一时说笑，其实他就非常重视古代工艺上的生产技术，如何能在人民时代古为今用。这一点，一般习工艺的同志，大致还少有知道的！如果西谛还活着，眼看到大跃进全面开花，无论特种手工艺最古老品种如雕玉、刻漆、织锦，或金银错，还是许多新的生产，每一部门既需要具有民族工艺造型健康配色华美的传统特征，又需要结合新的材料、新的要求，特别是新的国家人民气魄感情，创造出万千种更精致伟大艺术品时，他一定会首先赞同

大量印行中国工艺美术图录，来加速促进全国这一部门学习上的普及，和生产上的提高。

郑西谛　郑振铎的笔名之一。现代作家，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10月17日率我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本文作于1959年11月。据草稿编入。

曲折十七年

这个图录的完成到付印，和读者见面，实经过许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到十七年之久，才终于得到实现的。工作的进行，实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各部门支持分不开，工作初步完成，财经出版社方面有一定贡献。工作的最后完成，实完全得力于社会科学院领导为准备人力物力的结果。若没有这些无私的赞助，这本书不可能产生的。

从一九四九年起始，我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搞杂文物研究。照规矩，经常性工作，除文物收集、鉴定，并参预部分陈列外，兼为馆中解决绘制历史人物画塑时，提供些相关材料，给美术工作者以便利。还必须面对群众，在陈列室中，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且尽力所能及，为外单位“科研”、“生产”和“教学”打打杂，服点务。虽感觉到能力薄，责任重，工作复杂繁琐而艰巨，但是若能把工作做好，却十分有意义。因为谈“为人民服务”或“古为今用”，若限于口上和纸上，是无多意义的。必须落实到具体工作行为中，才能证明得失，并慢慢得到修正机会。我深深相信，凡事从

实践出发，去坚持个十年二十年学习，总会由常识积累，取得业务上应有进展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我对于文物各部门点滴知识，一切都由常识作为基础而取得的。

近三十年新出土文物以千万计，且逐日还在不断增加，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扎实有用资料。一个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学习，博闻约取，会通运用，显明会把文物研究中的大量空白点，一一加以填补，能取得崭新纪录的。

我就从这点信念和理解出发，和前半世纪从事文学写作情形一样，不声不响，在大多数熟人难于理解情况下，守住本职，整整过了三十年。尽管前十年条件比较便利，文物各部门，大都有机会过手经眼十万八万件，只是文史底子薄弱，任何一方面，可始终都难达到深入专精程度。即对于比较熟习的绫罗锦绣而言，接触虽极多，所知究竟有限。发表过的材料，也只零星点滴，无从集中精力，更有系统的来好好作一番介绍，实在是一大憾事。

至于本书由我来作试点进行，似偶然也并不全是偶然。一九六四年春夏间，由于周总理和几个主持文化部门的人谈天，说及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个国家服装博物馆，因为可代表这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和工艺水平。一般所见，多是由中古到十七八世纪材料。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新旧材料那么多，是不是也可编些这类图书，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先生，恰在总理身边，因推荐由我来作，或许还像个样子，得到总理认可。所以历博龙潜馆长全力支持，特别为从美工组商调李之檀、陈大章、范曾三同事参加。工作方法由我为提

供图像和实物资料，按时代排定先后秩序，分别加以摹绘。我并就每一图试用不同方式，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些综合分析比证工作，各写出千百字说明。正因为当作试点性工作而着手，总的要求是希望能给读者对于中国人民古代衣着发展变迁，有个比较明确总印象。这种创始开端工作，即或做得不够完美，也不妨事。好在材料多，问题杂，我的方法不对头，还值得有许多真正专家学人，从另一不同角度作新的试探。

财经出版社原担负出版任务，主持人当时也极热心，特别是制版排印部门一些老师傅，对工作细心认真处，都给我以深刻印象。工作进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经过我重作校核删补后，本可望于一九六四年冬出版。由于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一切出版物的价值意义，都得重新考虑，自然便拖延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份待印图稿，并不经过什么人就本书内容作过具体分析，就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凡是曾经赞同过这本书编写的部、局、馆中主要负责人，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本人自然更难于幸免。在对本书支持过的部、局、馆几个主要负责人三次分别批斗中，我也沉默无言，陪斗过三次。本人虽不久即得到“解放”，却和全国百十万老年知识分子命运大体相同，接受延长十年的特殊“教育”，真应了一句老话：“在劫难逃”。所有个人进行研究工作的图书资料，既在无可奈何情况下，一律当作废纸处理完事，使得我任何工作都无

从继续进行。到六九年末，且被胁迫限定时日，疏散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到达指定目的地时，才知道“榜上无名”，连个食宿处也无从安排。于岁暮严冬雨雪霏微中，进退失据，只能蹲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折腾了约四个小时，等待发落。逼近黄昏，才用“既来则安”为理由，得到特许，搭最后那辆运行李卡车，去到二十五里外，借住属于故宫博物院一个暂时空着的宿舍中，解决了食宿问题。因为人已年近七十，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就让我带个小小板凳，去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前村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使我觉得最有意思，还是熟习宋瓷的老姚，先来半年，已成了一个捕蛇专家。房中各处都是长达二米的蛇皮，且有意把它作成种种生活姿态，沿墙附壁，十分生动。另一收集文物字画老贾，却利用湖边路坎细小竹枝，编成许多篓篮筐匣，精美程度，都超过市场上宾馆中展出的工艺品甚多。对我说来，倒真像是六十年前老军务回营归队，丝毫不感到什么委曲生疏，反而学习了不少新知识。我明白，这是在国内正在进行的一种离奇“教育”。有百十万学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各在相似或更困难情形下，享受这种特别待遇，度过每一天。内中既还有参加长征老革命，也还有各部副部长，或什么委员，以及各种雄心勃勃姚登山式“革命闯将”，和前不多久尚在天安门上雄赳赳的“革命英雄”，一过了时，就“一锅端”共同来到这地方受新的“教育”。想起这正是“亚细亚式”迫害狂

历史传统模式的重演，进一步理解《阮籍传》中“有忧生之嗟”含意，个人倒反而更十分渺小，觉得“浑浑噩噩随遇而安”为合理省事了。来到这地方生产劳动，名为“改造”，改造什么？向军管领导询问，也说不明白。一面学习“老三篇”，不少人还能开门背诵如流。但问及内中有一条说到“老弱病残不下放”是什么意思时，我这年近七十，血压经常已二百过头的老病号，学习班长既兼作医生，且明白是由于“心脏动脉粥样硬化”而起，却相当幽默的回答我：“既来之，则安之，不妨事。”……如此这般过了一个新年。

有一天，下午正在菜秧地值班，忽然有个人来通知我，限二小时内迁移住处，到五十里外双溪区后，另作安排。我匆匆忙忙赶回宿舍去，看到一辆卡车停在附近，我那些搁在屋檐下的未解开的家具行李，和放在卧室内长炕上的被盖杂物，全已上了车。只等待我一到就得开动。当时我的老伴还在相隔五里地大湖边劳动，原属挖砂连，我想亲自赶去通知一声，时间有限已来不及。幸亏得故宫一老贾，告奋勇忙匆匆为赶过红崖口报信，待家中人随同老贾赶来时，说不到十句话，只告知去处名叫双溪，离这五十里多点点，就催我快上，若再晚些，怕天黑赶到区上搬行李不方便。

车开动后，相熟司机才告给我：“到了双溪，还得赶回城里，接送故宫从嘉鱼运砖归队的唐兰等返回。来去得走百多里路。烂泥路滑得很，上次翻车即伤了五个人，这责任我那里能担负得下！”因此一到了双溪区公所门前，几个人把我同行三家六口人行李匆匆搬下，放在门堂角，车就掉头开走了。

在车中我想到古代充军似乎比较从容，以苏东坡谪海南，还能在赣州和当时阳孝本游八境台，饮酒赋诗。后移黄州，

也能邀来客两次游赤壁，写成著名于世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的浪淘沙曲子。

到了双溪，和前一次离京相同，说是住处业已安排好，凡事放心，不会为难！到了这里才明白又是空话。采煤区连上区公所，都无个住处。末后又用“既来则安”一句老话解脱，同行三家只好把未开封的行李箱柜放在门堂角落，一同爬上十八级极陡的木梯，在区公所门楼上稻草堆中摊开被盖行李，扎营下砦，住了下来。每天到附近采煤连大厨房吃三顿大锅饭，白天还可依赖小窗口微明看看书，晚上担心煤油灯小不经意出事故，不许点灯照明，一会会也就睡着了。近月来折腾得够累人，所以躺下不久，就天已发亮。

可是过半月后，又被转移到约一里远一个孤立空空小学校空教室里去，说是和区里医院邻近，看病取药方便。事实上公路对过下边一点，还有个分配棺材机关，万一突然死去，领个棺木倒也方便。我在湖北前后两年中，迁移过六次，以这个地方住得最久，约占一年时间，留下印象最深刻。因为过了春夏秋冬四季，对于大地自然风光极其熟习。为我近三十年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住处在一个丘陵地长冈高处。四周全是马尾松林，下视区中还不到一百户人家，却管领着约五万亩水田，平田尽头名象鼻滩，远近还留下些大小村落，部分村落还剩下些过百年古树，有的就只剩下些石头堆砌大宅院，都各有专名，半已废毁，一半还为生产队所占有。又有的已在旁边起了红色砖瓦新屋。我住处是当地一个小学校，三列平屋除了两个空空大讲堂，还有几列大间堆集木料，院中大坪堆了大量红砖，显然是在进行建筑未完工前，即因闹“文化革命”而停顿的。

我和区中各种人物都十分相熟友好。中西医生，邮局办事员一对小夫妇，当地唯一的小小理发馆，桥头边唯一不参加合作化的老修鞋匠兼染匠，小小百货商店的公私合营后管理员，区里专管附近田地生产队的区干部，到不多久，都成了熟人。还有管厨的大师傅和二师傅，和专管食品公司的一个退伍军人经理，小小搬运公司的几个工人，都各以业务原因和我相熟，关系都十分好。当时正是照政策办事"好药必下乡"实行时期，我由北京寄去的专用药品不够用时，医院中总为想办法接济。邮局办事处虽小，却可看到《参考消息》和别的两份报章杂志，国内外大事件总还可以知道点滴正反两面情况。理发馆还保持一点古风，一切按规矩办事，刮脸必三次，直到一再告饶，才让步减免一次。末后还要扭扭手膀，活动活动筋骨，走过场式捶捶背。这都是大城市早已失传的规则，待诏师傅执行职业时可毫不苟且。至于那个区干部也是退伍军人，每天必早起晚睡，主持一个模范生产队，轮流去各家吃"派饭"，带队伍下田，或集中于田坪中开会报告时事。晚上诸事完毕还得写黑板，摘抄些语录、时评，有时还自己写三五百字报道小说，主要原是本区属于湖北高产区，每年除上交粮食外，还有两万头肥猪，二十万斤鸡鸭蛋上缴任务。生产队属于区中直辖，各县经常有人来参观学习，重点虽在对溪另一个点，直辖队当然也不能太马虎。所以蹲点干部格外辛苦。每次到我住处休息时，疲累得很，脸色憔悴。让他喝点糖水，先还推让不肯吃，怕犯规，不得已才一口吞下。作的小说文章如照省报要求，一切照中心任务格式写，即可刊载，照实在情形写，即不合用，有时退回还加上几句批评，因此提不高。我后来是在区中大厨搭伙的，照例

吃得较好，常有活鱼吃，价格不一。掌厨老师傅总以为年到七十岁老头，不吃得好一点没有道理，常有意派到我碗里多一点，也不过多出一毛半钱就够了。至于食品公司那个经理，在军队中是个连长，人长得极挺拔，受过中等教育，相熟以后，因为对我有照顾指示，在小街上见到时，总要我去领优待券。一月二斤鸭蛋我就吃不了！人事方面尽管十分融洽，可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那个小楼房，有点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压最高时有二百五十，还只想尽我做公民的责任，从不担心会忽然间死去。至于他们那边虽然还搁下些好材料，大致不会分配到我头上，因此那些办事的每天都有机会见我蹒跚走下雨雪泥泞的斜坡，去区里取饭两次，可从不打个招呼。平时取水，也必须到区公所前面一点小溪中去提。有时水被糟房弄得污浊，还得去更远处一个水泥作成的高水柜里去取水，就更费事担心，因为得爬上六级高台阶，台阶上满是青苔，不小心会摔到水塘中去。

我于一九七一夏天，又由湖北咸宁双溪转送湖北丹江市一个采石区荒山沟去住。名为“休养区”，事实上全是文化部门老病号。离丹江大水坝约五里远近。住处计两列红瓦房子，我们住的是靠山边的一列。一出门，看到的总是手拄拐杖行动蹒跚的老朋友，和一个伤兵医院差不多。这些人日常还参加种菜、种树、搬石头任务。虽有个大厨房供应主食，副食品却不够用，各自得趁晴天上市区去采办，拿回来用自制煤油炉加工。路虽不多远，初来总易迷失方向，问人时，照例指示“向那个有白色烟筒走去不会错”。原来我们离市中那个火葬场隔不多远，快到火葬场，迈过一个小山坡就可见到住

处了；《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人先生，就是我和家中人到达后第二天故去的。当时袁牧之、冯雪峰、滑田友诸先生都住在山坡靠溪那列房子里。我平时已不大便于行动，间或拄个拐杖看病取药，总常常见雪峰独自在附近菜地里浇粪，满头白发，如汉代砖刻中老农一样。

在两年多时间内，住处先后迁移六次。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服饰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我是七二年回到北京旧居。住处前后曾经两家同事看中，且短期住下过，除原有行李外，还加了个床铺。人固然回来了，那个床铺却未迁出。商量也无结果。因为报纸有落实政策文章，最后只有代为抬出到院子中。我那个临行时被人扣下的一个大书案和书架，才物归原主。照政策，住处理应得到调整：或恢复原来住处，或改善个适合工作的新居。为省事计，我只希望能照前一方式办理。占有者却说当时是受上面指使搬来，本不出于个人意思。人既回来了，我只想争取时间做点事，主要是重新买点应用工具书要紧。当时琉璃厂古籍门市部、内部供应处及灯市口那个旧书店，还有不少图书可听人选择，又得馆中为开了个特别介绍信，所以不到一个星期，就买了不少旧图旧书，把一个小房填得满满的。且在去武英殿参观对外一次文物展中，经一同事相告，原编那个图册，又经过馆中懂业务几个人重看过，转告我都认为值得印行。另一同事且告我，目下印刷部门还空着，且有纸张，不如趁机会即早付印，再迟下去，恐就来不及了。我才把稿件从馆里取出，重新校核，约一月后送还馆中。料想不到，

从此以后即渺无消息，一再亲自并托人询问主管方面这书的下落，都得到个“相应不理”的结果。我依稀理会到，其中必还有什么和本书相联系的问题，不可能深入求理解。我高血压既时好时坏，报废是迟早间事。作为一个合格公民设想，出门赶车虽已日益感到困难，只好把我下放双溪、丹江将近二年的极端寂寞生活中，凭回忆写下的十多个以图像为主小专题草稿，重新核对补充一下，想办法为一一分别排出个秩序来，并查明出处，花点钱，想办法找人帮忙赶画出来。照我主观设想，这份图稿目前即或毫无用场，今后对于年青一代搞文物同行，总还有点用处。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另外在小卧房中，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多久，幸好得到两位同好的无私热心帮助，为把需要放大到一定尺寸的图像，照我意见为一一绘出，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图像占据了。一个领导业务的副馆长到我处见到这种情况时，就作成充满好意、充满感情，对我十分诚恳的样子，说是为我好，劝我“最好还是退休”。我没有领会他那片好意，因为急于“开会”，就走了。他开了二十年的会，事实上，什么是“业务”，业务如何才提得高，却不大明白。更不明白我为什么留到这单位三十年还不退休的原因。只有笑笑听他继续去开会。因为我一认真和他谈“业务”，对他即起催眠作用，即刻打了哈欠，说是忙着开会，便走了。另一时，又有个次一级抓业务的，见我房中灯光整夜不息情况，又劝我用不着这么干了，这有什么意思？保重身体重要！我依然用微笑作回答。这一

位是很懂养身之道的，家庭生活过得很圆满，对人也很热情，而且什么都懂，只是却不大可能懂得我这七十三四岁的人，还不顾自己，拼命作事，究竟是为什么原因。

我老伴工作上级动员，说是为照顾我身体，让她退休回来了。给个住处，尽她在离我住处约两站路的另一处小房间里住下，便于锻炼我身体，每天走去吃一顿带一顿，这样经过了约三年半时间。这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主要北房三大间，却早为文化部一个什么干部处长，代为一个未婚女儿占定了，老伴的住处约等于那个人家六分之一左右。当时大家看来，都似乎很自然。我当然不能说什么，却也增长了一份见闻，即这种中层干部的水平，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从面相看来，这一位大人即或已"靠边站"，也只是暂时间事。因为对自己子女打算如此细心周到，精明能干，不久肯定还会"禄位高升"的。

经过唐山大地震之后，家中人对我独住原处不放心，我才寄住老伴那个小房间里来。不久又经过中央人事上的大地震两次。由于房中过窄，住处有个面板作成的小条儿，天一亮我就把这份家具搬出到院子中，坐在从双溪带回的小竹凳子上，把我那份工作，照老办法一页一页翻看下去。直到阳光逼近身边时，再逐步退让到檐下。约十点半左右，檐下已呆不住时，即退到廊子下去。如此这般又过了一年。

"四人帮"垮台前几年，就听人说过，稿已送到文物出版社，没有说明文字，将作为馆中加三个绘图人名义付印。局中明白这书产生的过程，且觉得若仅是黑白图，不用说明，恐没有多大意义，搁下不印。后闻又转到人美，得到同样结

论。有人把这事告我时，我却认为用不用我名无多大关系。因为这书的编写，并不是为个人出名而作，即或加上我的说明，不让我参预其事，有人乐于负责，我也不觉得难受。正如我三十年搞文学习作--样，三十年努力，全部付之一炬，我还从未说过什么话，凡事听其自然。

直到一九七八年，由刘仰峤先生把我工作调过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后，齐燕铭先生在政协某次座谈会上，还问到这书是否已付印问题，某出版社才把那份图稿送还，并催促我争取时间，赶即改补妥当，便于向日本商讨付印合同，定时出版。且在编辑方面加上我过去工作中从未见过面的一位陌生人。过不多久，则更离奇，几几乎所有工艺美院院长、副院长、主任、教师姓名也一律加上，这作风使人感到不大可解。我不相信这件事是从未参加过这份具体工作的那些教师所乐意承认的。因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只近于和日商打交道时，夸大不实的一种虚伪宣传。并且在催促我们重改原稿时，只求早日交卷，却从不考虑到工作条件和种种费用。

代为安排于西郊宾馆的专用房间，往返交通工具的应用，全得几个得力助手的商借，社会科学院刘仰峤秘书长的鼓励支持协助，一切费用由社会科学院开支，工作才能进行，才能完成。而原某出版负责方面，大部分时间都在南方写电影剧本，很少见面机会。在香港方面宣传，却说她自己始终全面抓这一工作。且不经我们三人工作小组同意，就把人美曹洁同志为设计的封面，更改成和服装无关，且换一画得极草率的金银错车器图案代替，送去德国作预展。只图一时效果，作夸侈不实宣传，反失去学术应有实事求是严谨意义，即使

如此努力费心，仍不易取得应有效果。这本来不过是一本常识性参考图书，言过其实，便成废话。与日商谈判真正过程，也并未认真相告。我才和社会科学院梅益副院长商量，将稿取回交由商务付印。

本文原题《后记》，是作者1981年4月下旬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写。5月1日经压缩改写后，用于该书。此文系依据多种不完全连贯的手稿片断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拟。

忘履集

WANG LÜ JI

作者“搁笔”以后，提到“跛者不忘履”时曾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1949年后，他为了找回用笔能力，进行过多次试探、努力，曾写出一些未能发表或不打算发表的文学作品。

本集为新编，收作者在1950年至1982年间留下的文学试笔及创作计划，共8篇。在其生前均未发表过。集名为编者所拟。

老同志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研究院和原有人民大学研究院两校，一九四九三月间，正式宣布合并而为一，到西苑举行开学典礼日，教育长向全体同学致辞，有几句话大家听来都不习惯：

“……各位是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的，这很好。学习马列也容易，也困难，即学习方法对或不对。第一应当明确，即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以这个人的读书知识多少为准。大知识分子是并无什么用处的。比如我们这里一字不识的炊事员，因为出身是劳动人民，立场坚定，就容易领会马列思想和唯物论精义。同学应当向他看齐……”

散会后回到宿舍里，大家情感上不免受了点刺激，思想上有点儿迷乱。因为学习重联系实际，不以读书多少为准，一时难行通。学习马列不读书，图书馆那些大本本马列全集怎么来的？印出来又有什么用？明天毕业出去，又用什么去教人？问题也许就在这里，研究院同学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是各大学教书的，或准备去教书的，学习第一课碰上那么一个题目，自然想不通。

一会会，院子外值日员吹哨子集合，吃饭时候到了，大伙儿排队到饭厅里去。年青气盛，自大好强，同时又充满研究热忱的，自然都亟想认识一下教育长说的炊事员。五班二灶厨房共归六个炊事员负责，三个年青的还在上学，三个年长的不识字。大家初次共通能领会到的，却是西苑伙食比城里拈花寺的好些，分配合理些。过不久，且觉得伙食还在不断的改善，一天比一天不同。一百五十个人，天南地北来自各处，其中还有几个华侨，几个年逾花甲而且带着喘哮病、胃病、高血压病等等，在不同嗜好、不同要求中，主持大厨房事务的居然能使大部分同学满意，自然有点道理。但把他和哲学中的唯物论联系，和马列思想学说联系，可不是同学一时能领会了。因此向炊事员看齐的事情，问题虽最早提出，还是保留下来，要等到相当时间才能解决。

研究院二灶厨房，有大型锅灶四个，小型锅灶两个，烧火事务统由一个翻身老农民负责管理。这人年纪五十七岁，身材瘦而高，头大额角宽，下巴尖长。有一双茧节多筋真正劳动人民的大手。眼睛因上了年纪，瞳孔缩小，且长年被灶火熏灼，有点儿发红，常是湿濛濛的，但是皱起眉毛向人凝望时，却充满一派忠诚无邪的干净气，而且十分亲和。因为年纪长，同学都叫他“老同志”，一成习惯，本来姓名就忽略了。新来同学记住教育长的谈话，总喜欢和他谈谈，问长问短，一面是想从实证中见贤思齐的学习学习，一面却只是一点好奇。

“老同志，你家在那里，有几个人？”

“在青龙桥红山口北村子里。家里有侄儿，侄媳妇，和两

个孙娃娃。”一面回答一面屈指计数，共四位。连同自己恰好满一手。把手摊开摇摇，眯着小眼睛笑笑，到灶边做事去了。

老同志离开土地，还只两年多一点。解放前，和家中人一道在村子里住，有三间灰棚房子，两亩六分砂地，一口井。屋边还有几株枣子树，和自己年龄差不离多少。土地一半种杂粮，一半种杂菜，一家大小就靠挑水灌园过日子。每早挑菜到青龙桥镇上去卖，换点零用钱买油盐。十几年前还赶过驴，跟牲口专跑万寿山、碧云寺、香山静宜园一带，自从公共汽车一通行，生意就不用做了。农忙时经常还帮附近地主做做短工，出力换两顿吃喝，得点草烟钱。因附近田地，原本属于在旗皇庄产业，封建皇帝垮了台，土地拍卖给私人，但新地主是个大官僚，管家狗腿子仗势欺人，把附近劳苦人民，沿旧例当丁差使用，还维持了很多年。西苑地方从清末即驻兵，辛亥以后依旧作军营，采买员每天必上青龙桥买菜。不论是北洋军阀的部队，日本鬼子军，蒋匪军，作风如一，强估强买发官价。菜蔬如被看中，凭兴头付钱。卖菜人脸色稍不好，就指定要挑送到营里去，不能道半个不字。一挑菜等于白送，还贴上半天劳力，大骂一顿赶出。加之地方乡保警察的欺压，服役派差打鸡捉狗是常事。因此叔侄一家长年劳苦，和中国万万农民一样，日子还是极难过，只在无望无助中熬，干一顿湿一顿不成个生活。

解放军到了北京西郊，天下穷人是一家，人民翻了身，老同志加人了革命队伍，作了个人民勤务员。先在郊区工作，北京城解放后调入革大烧火。经过不断教育，有一定工作，一定薪资，一定例假，更重要还是在这种新型学校里，每一件事都有教育意义，个人因工作积极负责任，得到普遍应有

的尊敬。这一来，什么都对了，每天只是一声不响的低头把事情作下去。因为他明白人民既然当家作了主人，事情是越作得多越好。到月头发薪时，就把应得工薪捎回去，给侄儿贴补家用。顺便买点米花糖给孙娃娃。平时很欢喜两个孙，回去即和他们到地里去，看看地中生长的菜蔬，捉捉虫，浇浇水。间或还带点新成熟的茄子黄瓜四季豆，回学校添配到菜里去，给同学尝尝新。大家知道提出表扬时，反而使老同志感觉害羞受窘：

“新规矩，米米大人情也拍巴掌道谢。”

日常生活除欢喜吸点关东烟，十天半月喝一小杯烧酒，别无任何嗜好。手足贴近土地辛苦勤劳五十年，性情成了定型，沉沉默默，只做事，少说话。生命的火和大炉灶中的高热炉火，俨然融合而为一，永远在为一个人类崇高理想而燃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学校到北京来历史短，人手不多，经费有限，凡事都不免因陋就简，从摸索中逐渐改进。

照学校习惯，各个厨房由各个小单位分别负责，实行民主管理制，公推膳食委员轮流担当。并用伙食节余，来作本班建设工程。某一灶领导得法少浪费，节余钱数多，本班如又恰有学美术会布置的，发动大家一动手，同样是四堵墙壁，几扇窗子，一经改造收拾，这个厨房兼饭厅，就必然面目一新，变得像个大礼堂样子，既堂皇又美观。厨房中什物凌乱和怪气味，于是完全消失了，成了一所现代化的建筑物，小规模的晚会，讲演会都可用得到。有些虽同样花钱，部署不大得法，又不免显得俗气些，见出商店气，银行气，衙门气。

就从这个比赛方式下，也进行了一种政治民主的自我教育。相互比较，相互学习，并收到相互提高效果。在中共领导下的华北革大，和新的国家许多新机构一样，种种学习和创造，就这么进行，这么发展下去，一天不同一天。

五班二灶恰有两个习美术的同学，一个长于布景，一个对素描写生造诣深，因此经过改造的饭厅，大家都承认很像个样子。特点是简单，素朴，和学校校风一致。特别引人注意处，是配置在东西两墙几幅速写画像，墙东马恩列斯，人人都熟习；墙西高尔基和鲁迅，也一见十分亲切。另外还有两位却面目陌生：一个头号大胖子，脸膛黑油油的，袒露着个厚重丰实的胸脯，假如嘴上有一小撮胡须，就好像是法国近代作家巴尔扎克；还有个瘦老头子，除了那双眼睛比较小，其余和书上常见的罗曼·罗兰相貌倒挺相近。这是些什么人？思想家还是科学家？弄不清楚。

新来同学多，对着这些画像总觉得陌生中又若十分面善。仔细就题字看看，才明白，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本饭厅两个劳动模范。胖的魏同志，正在熊熊炉火边舞动锅铲掌锅，瘦的老同志，蹲在火灶前用小秤量煤。同是劳模，为人民服务，工作都十分具体。研究院同学吃得好，用得省，学习得起劲，两位劳模有贡献。特别是服务态度好，经过伙委提出，大家同意，所以当作人民功臣，画来用框子装在墙壁上。一眼看来，神气好像十分悠闲从容。其实本人长年终日工作不息，极少空闲时。但百忙中永远不失从容，和画上的倒真是一模一样。

七八月三伏天气，是北京酷热季节，来自南北各地的同

学，都觉得难于招架。每到吃饭时，百五十人挤在一个大厅子里，窗户小不大通风，屋顶铅皮罩棚被整天阳光晒得透热，热气直往下逼，几个炊事员虽时常用喷壶洒水，还是无济于事。加上几个炉灶熊熊煤火，饭厅中呆下来时间稍长，实在不大好受。特别是同学中身体虚胖的，上了点年纪血压高的，患病刚愈的，每到饭厅中时，就嚷热得想办法。一切限于经济条件，自然不容易有何改善办法。有的人就索性把饭桌抬出到大坪子里去。有的虽依旧留在饭厅里，匆匆忙忙把饭吃完，就揩着脸上汗水，赶快离开了。至于六个炊事员呢，一天三顿饭既待安排，自然得留在这个大蒸笼般厅子里，凡事照常进行。掌锅的魏同志，开饭时简直和一个真正战士一样，镇守在火灶据点边，一面扯围裙揩汗水，一面即作成鲁智深独当一面神气，舞着个油光光的铲子，为病号同学办特别菜。这人指定木须肉不加葱，那人说莴苣不能和豆腐同吃。人多意见多，不合适还得掉换，说医生不许可。且有从小到大不吃鱼虾，不吃牛肉，忌葱姜辣醋这样那样的。魏同志知道，读书人本来就娇气，离开了家到革命队伍里来，水土不服难适应，害了小病，自然不免有点小脾气，闹情绪，肝火旺，胃口坏，学习不安心，对国家对学校都是损失。特别是女同学，必须要多照顾些。说换菜，永远从容不迫，十分温和的答应“好的，是的，”有求必应。天气即再热，一个不在乎。为人民服务，必坚持到底，工作搞完才离开炉边。

老同志呢，饭上桌子时，端盆拿碗照例一大阵子忙。过后，不是赶紧蹲到炉灶边看火添煤，就得守在热气腾腾大缸开水边等待洗碗。天气那么热，任务来时，两只大手就不断在那缸滚热开水中捞来捞去。一顿饭得洗大小碗盆四百件，

过水八百回，三顿饭统共二千四百次左右，不是件简单容易事。工作中圆润额角不免满是大颗大粒汗水。水缸旁还站得有其他三位年青炊事员，年纪最小的刘万金，性情欢乐爱玩笑，工作中不是唱歌就是找人逗趣。说到老同志在工作上闹的小笑话时，老同志照例眼睛眯得小小的，瞅着年青刘万金，不作理会。有时又把他小时候作皮匠学徒，被师母赶着殴打，冬天掉到冰窟窿里故事重复提出来，作为回答。天气热，分摊到每人头上都一样。但是在炊事员一面，却从这种高度服务热忱下，说着冰呀雪呀的快乐笑话，把个三伏天满不在乎的打发走了。

吃过午饭，全校园照章睡两点钟午觉。如吃晚饭，有两点休息，就三三五五上马路吹风去了。大厨房工作虽分工，各有所事，老同志主要工作是管大灶水火，其实整天心手两不闲。不拘早晚，还得帮同年青炊事员收拾桌面。中午大家都休息，老同志责任心重，事不作完也不歇手。把时间截头割尾一算，至多不过躺个半点钟，又得起身揉面烧水了。

掌锅魏同志到饭厅旁宿舍板床上休息时，不一会儿即可闻鼾声如雷。宿舍中养了一匹乌云盖雪小花猫，六个炊事员都欢喜它，照料它，当成共同的朋友。小猫儿和魏同志情分格外好，饭后常一起午睡。有时睡不着，即在床上地下跳来跑去，抓抓咬咬自得其乐。偶尔在魏同志坦坦荡荡大腹上跳闹，人被搞醒后，魏同志必细声细气，充满父性情感，轻声的说：

“嗨，嗨，小花唉，你在干什么！一天正经事不做，大鱼大肉还吃不够？天气热，不要闹，我们睡一会儿好！”

“你说睡一会儿好，睡着有什么好！”

“睡会会好起来做事，等等又要上蒸笼，蒸狮子头！”

“狮子头，老虎头，癞痢头，都不关我的事！拿来唬我我不怕！”

“狮子头蒸不好我可怕批评！”

“你怕我不怕！”

在睡眠迷糊中的魏同志，就仿佛和小猫儿那么尽逗下去，毫无结果。小花猫的年龄，适和个六七岁生命活泼孩子一样，虽通达人性，不免稍稍顽皮。自己既不想睡，就把身子尽挨着魏同志肩膊和宽脸，憨憨的十分亲昵。并且像是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提出憋在心里不好受。一切行为让魏同志在迷糊中感觉到毫无办法。

“小花唉，是不是还要吃的？”

“吃倒早吃够了。天气热，睡不着。精神好，玩不够。陪我玩玩好！”

“一天忙到晚，那有功夫玩！”

“那也不许睡！我不睡你也莫想睡。”

见魏同志用手捂着脸，准备侧身向里再睡时，于是就用小爪子抓着魏同志大耳朵缠闹下去。这一来，大家自然都睡不成。使得魏同志不能不放弃了休息，来和这小东西周旋周旋，或动手做成要打的姿势吓吓，小猫希望就是要人答理它，胜利了，乐得到处乱蹦乱跳。如窜到老同志身边，老同志必说：

“嗨，赶快睡去，再捣乱，我把你……”

小猫知道老同志手里有个武器，小小的，相当厉害，不小心接近时，口中含着一喷，就得打喷嚏，赶快走了。

黄昏前，他们三个有时还一同出外，到校门前桥头去坐

坐，看看流水和水中生长的慈菇。看看小孩子捉鱼。小花猫照例爬在魏同志肩膊上盘旋，彼此之间充满友情的依托和信任。同学多认识魏同志、老同志和花猫，可少有人理会到，这小小生物，在二灶厨房宿舍中的特殊地位，所形成的亲切空气，和同学学习，也有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老同志身边动产，只有一个板烟斗。不叼到口中吸烟时，就在鞋底上磕磕，捏在手心里摩挲一会，赶即塞人衣袋中。平时极少说话。一天有大半时间，都蹲守在灶炉边工作。特别是半年前火灶改成电风炉，每人日用煤总量，由一斤四两五下降到七两八的纪录后，一保持这个全院新纪录，烧火加煤就得和绣花织布一样，格外细心。敲煤时照例块子都不大不小，骨牌片儿有个一定分寸，送到炉中去，火力才又猛又停匀。一天还老是提个小秤，把灶边煤称来量去，看见的人大都忽略过去，不甚明白情形。直到伙委交代账目，并作表扬报告时，才知道一百五十人的伙食节余，添制了二十五张桌面，原来就是老同志那么点点滴滴节省下来的。大家听说热烈鼓了好一阵子掌，表示感谢和敬爱。老同志呢，反而有点害羞，只觉得这是分内事情，没有什么可说的。为国家节约，难道不是应当的？

吃过饭，洗过碗，当天业务真正告了一个段落，几个年青炊事员换上干净衬衫，唱着歌上夜学去了，大饭厅显得格外空阔格外静。墙上几个伟大思想家的画像和两个劳模画像，同在哑白灯光下相对无言。彼此之间虽若言语不相通，难于开口，却贯串古今时空，充满一种相互关注默契的深挚友情。魏同志和老同志本人呢，照例在饭厅中还是这里搬搬，那里

摸摸，必须要诸事归一，才能坐下来喝一碗茶。

学校晚会多，经常过三五天还有电影放映，全校人人有份。但是晚上任何时候有人来二灶取水，必可发现老同志蹲在火灶边工作，或在案俎间默坐吸烟。

“老同志，你怎么不去看戏？今晚戏好得很！还有北京城里来的魔术，对口相声，不容易见到，快看看去！”

“我有事情，不能去！天气热，大家看完戏回来，要水喝，没有水，多不方便！”

“事情找人替替做好。我也可以替替你。只管看看去！”

“不要看！事情还不完！你瞧，还有那个……”

照着指点注注意，原来案俎间一大堆碗盏，高垒垒装着一碗一碗南扣肉、卷筒鱼，和别的什么叫不出名堂的东西。

“哈，明天又打牙祭？”

“是添菜喔！南方味道，不会做，大家学来做。指导员开会商量，南方同学多，这些日子大家学习累了，改改菜样子，换换口味试试看。赶明天早上用，不好就提意见！”

“太费心了！太累你们！我们都帮不了忙！”

“你们学习改造，学习好，为国家多办些事情。身体不好是不成的！”

老同志居多什么都不说，人问到时也只沉默的笑笑。可是心细一些的，自然就会明白是个什么意思了。二灶同学百五十个人，还有三十几位是女同志，大热天没有水喝没有水用，那里成个事情？为完成任务，老同志什么玩乐都放弃了。

老同志白天黑夜事情好像永远作不完，因为职务近于打头阵，经常还得起五更，到天亮时大家才有水用，有粥喝。

真正无事大致只是晚上八九点左右。有时还得敲敲煤，有时就蹲在饭厅外煤堆边抽抽烟。外面没有灯光，只烟斗见一点儿红火。火光在那儿，老同志也必然在那儿。听着敞坪一角歇凉的各灶炊事员谈天，他自己就静静的一面吸烟，一面屈指头计算着这一月烧煤数字。生命和烟斗一样，让它静静的在呼吸中燃烧。虽只那么一点儿火，却永远燃烧不息。一颗简质素朴的心，和工作谨严认真恰相对照，属于个人需要的那么少，提供到职务上却是无保留的热忱和全部劳动力。年青时没有机会读书认字，可是从领导干部口中听来的革命道理，就和自己心腔子里想的一个模样，事情大家办，想好就办得好。饭厅里正面墙上，有一列大字标语，写的是：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老同志的日常工作，就是照着这个标语指示的最高原则，用一个新国家主人翁态度，长年不变的为在改造中的知识分子学习示范。

学校主持教育的，提出的学马列应向炊事员看齐，也即这种实践精神的体会。但是事实呢，向老同志学习，比从书本学习的确难一些。难的是素朴和忠诚，一切为人而无我。这种无产阶级高贵品质，是不容易学到的。饭厅墙上的马恩列斯，几个伟大人物的哲学系统和政治目标，革大同学因为读了许多书，有些人都自信已懂得很多。可是到应用时不免困难。教书易犯“照本宣科”的毛病。教条似通而非通。行事更难免到处有错，掌握不住重点。至于老同志呢，却只知道几个伟大人物和毛主席一样，是革命老师，是天下老实正派穷人的真正朋友。一生都是为穷人说话，想主意，鼓动大

家来办事。中共革命由毛主席共产党来领导，主要也就是让老百姓翻身。明白国家是老百姓自己的，自己事情自己做，齐力合心好好的做，不到几年就可过好日子，大家有饭吃，有衣穿。国家在计划中建设工业，改善农业生产，就可由社会主义逐渐进步到共产主义。懂的虽若极简单，却十分具体。所以当自己的画像和世界上几个伟大人物的画像一同挂到墙壁上时，也不觉得丝毫骄傲自满，倒像是十分自然。因为明白爱国家为人民做事，大小都是一样，只要做得好，对国家有好处，就应分受尊敬，得拥护。假若事做不好呢，可就寒伧，得赶快想办法改好。

革大占西苑地面广大，和其他几个教育单位同在一起，男女老幼将近万人。既生活在同一革命气氛中，集体劳动，集体生产，日有濡染，知识分子的旧生活习惯，到不多久，自然就完全打破了。研究院同学一般说来都是比较年长的知识分子，虽自成一个单位，生活活动方式还是共同的。

二灶在校区偏东北角隅，外面隔一道水濠就是一片大平田，接连大操场。濠沟是活水，白天常有白鸭成群游泳，晚间星光下青蛙聒噪十分酣畅，操坪中则经常有公安师骑兵和步兵练习军事。濠沟中多活鱼，每到秋末各灶即分段筑坝捉鱼，年青炊事员多和过节一样快乐兴奋。有些可得百多斤鱼，还留到过年大吃几顿。老同志到革大两年，除了在这个角隅和同学每日接触三次，此外即和环境中这些自然物事比较熟习。学校其他区域很少见他的面，晚会少参加，校医处也不常光顾。本班游艺室成立，同学为答谢几个炊事员的服务热忱，特别开了个同乐晚会，一定要全体炊事员出席参加。老

同志万不得已，才换了件干净灰布制服，和魏同志一起来坐了半点钟。但是因为想起晚会完毕大家要用水，怕水不够用，闪不知还是溜走了。

革大决定修造一座大礼堂，露天座位预计可容八千人，全部设计和土方工程，都由校院同人自己动手。一个扇式高台土基，准备动员全校用分组竞赛方式来共同抬土完成时，各炊事员自成一组，都踊跃报名参加。魏同志和老同志也报了名。照习惯年纪长的工作统由年青的分劳。老同志可坚持要自己出力动手，破例离开了他的火炉，挖了许久土，并挑了十挑土。年青小伙子为争纪录，把土一倒即赶快回头跑去，老同志却把自己分上抬的土，集中作一小堆，弄得整整齐齐。工作完成，且在旁边看了好一会。心里想，毛主席说的话有道理，事情大家干，做起来就又省力又快。

年青人在工作竞赛上，照例都不下于人。因为参加了学校的建设，既体会到劳动创造一切的精神，且认识了集体主义的伟大，都十分愉快兴奋。为好胜争强，彼此之间且不免有些互不相下，到处是大笑大嚷，争纪录乱成一团。劳动了五十年的老同志，站在这个欢乐活泼群体中，却不声不响，眼看着这些年青人脸上发赤冒汗的光景，只觉得满有意思。记得开工日，教育长还说，中国有万千工厂，也要大家自己来建设，过几年老百姓就可以都有吃有穿。老同志心里估想，将来学校建工厂，就报名挑三十担土，花个半天一气完成。

学校的分段学习制，且随时总结过程，检查得失，使得各部门工作都保持一定程度联系。厨房中的工作情况，自然也应分算在知识分子改造教育计划内。厨房中的膳食民主制

和群众路线制，虽在民主学习上，对每个人都有极多启发，可是教育长的演说，在学习过程中，却始终成为一个问题，悬在共同思想上。由于认识还只停顿到从感性到理性阶段，究竟还相隔一截。用轮流参加厨房工作，突过这点认识上的障碍，自然还难望豁然贯通。读书人终究是读书人，忘不了书，所以当学习到中段，马列主义的课程正式讲授时，同学学习热情都因之骤然提高。对于讲授本题的抱有极大希望。特别是由于同一名辞在应用上界限含义新旧不同，随时随处也不尽相同，研究院有些同学，更不免抱了幻想，以为一切模糊疑难都可望迎刃而解。可是第一堂听过后，知道大本书固然要读，主要还是善于离开书本从实践取证。因之好像得到了点东西又失去了点东西。于是引起同学间广泛辩论。在小组辩论不够，还拿到饭厅中来讨论。

在改造中的知识分子，一涉辩论，照例多习惯引经据典。记下的教条有时可用作武器，有时又恰好成为观念自缚的绳索。自然不会有什么结论。但辩论本身，却形成一种热烈活泼空气，无所不在。第四桌六个学员中，有两个人争辩得特别激烈，其中一位指着墙上标语，要对方学习联系实际，另一位即从笔记本中，把开学第一回讲话提出来，证明他并不忘记这个问题，一切教条都不能帮助人理解马列，必须要从实践中锻炼。但如何学习老同志？两人似乎都限于阶级成分具有的劳动品质的认识，没有人能回答究竟。

其时老同志恰在饭厅一角大灶边，拿着那个小秤，专心一志的称煤。饭厅中种种辩论形成的热烈空气，引不起他的丝毫注意。最先吃完饭的一个同学，走过老同志身边时：

“老同志，你可学习马列主义？”

“同志，我不认字！人老了，记性不好。自己姓名也不会写。”

“我看你一天到晚总是做事，不怕烦，不怕累，实在是一个劳动模范。你工作真热心！”

“同志，你说得好。我们没有知识，一天就烧火做饭。学校好多事情要人做，大家都在忙！我的事情容易做。敲敲煤，放放水，帮他们做点杂务，不费力气的。上月里抗美援朝，好多同学都报了名，去朝鲜帮朝鲜人民打美国鬼子，把鬼子赶下海里去，多好。打仗可不容易！事情不论大小，大家齐心合力作，就好办！”稍停了会儿，似乎从同学神气中有种体会，于是问那同学：

“同志，你可是新从外国回来教书的，要去教学生马列主义？你们快要毕业了，是不是？”

那同学离开了老同志向宿舍走去时，心中重复着老同志说的话，觉得话语浅显意思深，满有道理。比起几次小组讨论道理似乎还明确深刻。以为恰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结合国际主义最好的注释。可是想起老同志最后问他的几句话，不免打了寒噤，不住骂自己混蛋狗屁，用来惩罚自己在美国大学念博士学位，多年来升官发财往上爬的糊涂思想和卑鄙打算。

马克思列宁一生关心注意的，讴歌赞美的，对之抱着深刻信任和希望的，特别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认识得极深刻，理解得极透彻，而在一个崭新的光荣伟大时代中，为了完成中国历史任务，要求于万万人民对于劳动热情的新道德品质，老同志所保有的，恰是一个全份。这种优秀的伟大的劳动道德品质，在阶级社会里，历来都被统治阶级所忽视轻视，由

压迫剥削转成为奴隶屈辱和永久苦难。虽创造了历史文化，可从不曾在历史文化中得到应有位置。现在觉醒了，明白的意识到自己作了主人，而且和万万人民来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既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的文化。老同志虽不识字，可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深信这个道理。因此话虽说得极少，事情总作得极多。而且是永远十分谦虚诚恳的，和万万翻身劳动人民一样，在沉默里工作，把时代推进。中国能够站起来，战胜一切困难，取得胜利和成功，就是因为在任何地方，在一切平凡单调艰难烦琐工作中，在一切创始的生产战线和建设工程中，在朝鲜战场，和西藏冰雪沙漠里，都有和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的为建设国家而努力。

一九五二、一、十四

四川内江烈士乡

本文初稿写于1950年作者在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期间，是自1949年病后，为恢复用笔能力而作的一次努力。离开革大后，作者又曾多次修改，并于1951年冬带着文稿到川南内江地区参加土地改革。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手稿看，注明1951年11月12日的第四稿和1952年1月14日的第七稿比较完整。

据第七稿整理编入。

中 队 部

——川南土改杂记—

……你是那里？喔喔，是的，这里是中队部！我们决定要搬吗？明天就得动吗？好好。那容易。比起这边来工作实在方便得多。典型斗争也方便。那就明天动。电话下午一定移好。房子已经看过，合用的。和乡农会只隔一道田坎，条件好得多。上级决定是对的。等等我们这边就派人去打扫，事情大家做，容易办。困难？不什么困难的。有办法，放心，保证到时完成！

……你是那里？要中队部？找谁？咋个，咋个，是啦嘛。搬好了。都归置好了。人多手多，事情只要大家一动手，很快就好了。群众力量什么事不好办？住处已经照计划分配，团长、秘书长……一间，调研组一间，通信员一间，女同志一间，正面大房子办公。人多，可并不太挤。乡下四合院子，都差不多，一般地主家庄园样子。天井坪子我已用步子量过，宽三十三步，纵深二十七步。屋前是口深水塘，塘边有五株柞桑树，三株橘柑树，一些杂木。廊子下有两个蜜蜂箱子。

屋后竹林子一大片，小山岗子月牙儿环抱，地势不坏！地主家当然讲风水，这家老一代就是个阴阳师，专靠帮地主看坟山，骗了份产业，后来自己又成了地主。老百姓来当家，逃走了。

……你说大地主肖辉重的根据地，大田村卢因寺吗？近得很，不过二里路。我们就住在山脚下，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那个堡子。很好看，可是一座真正封建堡垒喔！肖家和杨家糖房都在山脚下。上面已经看过，地主威风扫荡了，看不出。住了二十户贫农，有五万土。看到个老头子在堰塘边钓鱼。在山砦顶上钓鱼！他说："没事干，帮小猫钓小鱼。"……后来又说："也有大鱼，二三斤重，不上钓。"钓来自然就自己吃了。是个现代姜太公吗？不，不，姓尧，鲁般弟子，一个老木匠师傅！现在闲着，很快就得忙起来了。过去帮地主女儿办嫁妆衣柜，赶明天老百姓做尿桶可真得忙！

……真是好地方！四望一二十里，庄稼长起来了，豌豆油菜开了花。实在是锦绣河山！老百姓那么好，土地那么好，这些大小地主恶霸狗腿子，在这里可做了多少对不起人民的坏事，造了多少孽！斗争会就得进行吗？是的好的，就那么办。就用杨家糖房那片土地搭个台子，那片土地五千六千人够用，全区五万人大会也够用！

……你是那里？中队部吗？这里就是。找谁？我就是。住的人家情况，早了解过了，一共四户，人口大小老少二十五六，加上我们一伙，已快到半百数目。那中农是皇经坛主点传师，骗人罢了，传个什么法？已经坦白过，门前路边那口井水还干净，合用，虽当路，不会下毒药的！……是的，

也得警惕，有人注意，情况清清楚楚，不用担心。房子和高百万家当然不大相同，规模也小得多。树林子的封建性就不如那边来得显明。那几株二百年老树，早砍了，几个小孩子正在剜老根。要连根拔，一面唱一面在拉锯子，再有半天就成功了。

……贫农家庭吗？大小五口，一个半劳动力，有个十三岁男孩，挑水砍柴，编虾撮，打草鞋，事事在行。有个九岁大女孩，三年前到地主家后山去扒树叶子，被地主家恶狗追咬，摔到田坎下边，坐骨脱了臼，跛到现在。每天还背个六尺高竹笼上山扒树叶。日常家事都参加，剁青菜推包谷粉，一天忙到晚。第二家是个白糖匠，丈夫上了糖房。第三家中农，五个劳动力，四个孩子，两个上了小学，大小一共十四口。第四家成分不定，三口人，老夫妇已过六十岁，青年二十六岁。这一家是十月里才从乌龙寺搬下来的。原是个道士，看守庙宇管香火，做了点庙里庄稼。乌龙寺改了保国民学校，这一家人才下了山。要特别落后一点的，这一家就是个典型。几十年骗人的老一套没有主顾了，白天一家三个人就坐在灶房里煮豌豆烤烤吃，一句话也不说。每到半夜，总是忽然吵闹起来。有时老夫妇对骂，有时又共同骂孩子，声音和一个钝刀子在空锅里刮一样，刮刮又停停。骂得个上气不接下气。老的还半夜咳嗽，直到天明……环境就是这样，得接受，是的，得改造。可是这是小事，人民翻身才是大事情！

……你是那里？要中队部吗？是，是。我就是，你咋个不……怎么，报告得还不够清楚吗？对的。动物都得报告吗？让我算算喔：一只牛，年龄是“黑线边”。四个架子猪，还未

上膘，一窝小的，共计七只。一群鸡，阉过的三只，母鸡四只，公鸡两只。一条狗。动态也调查研究过！特征是那些鸡入冬来都毛羽丰满，脸庞红红的，到处大模大样的走动。那窝小猪都胖敦敦的，白天虽经常赶到大门外去找吃食，可是闪不知一个二个又偷偷悄悄的跳过高门坎，回到院子中来玩，口中哼哼唧唧，兴头十足的各处走动，间或又彼此停顿下来，交头接耳一会会，把头一摆，即刻又分开走去。那只黑狗，见工作同志大棉袄，不叫，大约因为老棉袄样子相同，气味也相差不太多。见外乡送信员，可得汪汪吠两声，一经吆喝，就赶忙向屋里跑去。那只水牛就只吃草，整天都在吃草，极沉静。一切的动都反而衬托出农村中特别的静。一切声音都好像出自土地，又被土地即刻吸收，转若十分沉静。特别是中午时的鸡声。

……此外还有院中一角的磨石声，大门前擂[①]谷子时的擂子声，破篾箍桶的敲敲打打，孩子们放地黄牛时时发出嗡的一声响。……大门外呢，卢音寺堡子上，经常可听到开群众大会召集群众时的喊人声，是武装队长站在那个堡子上城墙头上执行任务的。大路上经常有锣鼓声。半夜里，还可听到田坎对过乡农会斗争大会上，群众对地主的呐喊示威声音。这一切都和另外一种声音有密切联系，就是这个电话铃子的响声。

……你是那里，这是中队部。昨天的大会吗？很好。进行的十分好。堡子上山路口都有武装守卫，十一点前后人就到齐了。群众一共六千四百五十一，地主六百二，当场过关的四个，愿意谈判承认赔偿人民血汗果实的二十六个。……

天气好，庄稼经过雨都绿得发亮，油菜花开了，当真是锦绣山河。公审控诉大会就在这个背景中进行，把应当扫荡消灭的宣告死亡。一切都进行的顺利。晚上各村反映情况，都说毛主席真是为我们穷人撑腰，把大恶霸枪毙了，挪去了一个千斤大石头，翻身大事再不会有何挡路的东西了……人民动起来了，全面动起来了。是的喔，历史在改变，应当死亡的一律死亡，必然新生的得到新生。打地主吗？……是的，早纠正过来了。不过，这是斗争！不能如请客画花，可是一定得照政策行事。昨天晚上××突破了。×××分化瓦解那个小婆子，完全成功。××××老的十分顽固刁歪，麻烦，斗了三天还不成功，已经换了个方法斗。这家伙几十年老油子，老百姓做他的田，凡是田里生长的他都要，动物只不要蚯蚓，植物只不要火麻——现在还坚决不要！另外一面也就坚决的要送一点。送火麻，是不合政策的。……可是，这是斗争！纠正过来了，放心，放心！

……院子里情况吗？很好。白天真是静得出奇。依旧是箍桶破篾，磨石擂子声音低沉沉的。那几只鸡也还是大模大样的各处跑去。这几天青菜萝卜晒满了半个院子，每家都在做腌菜预备过年！……一个外来人实在看不出这是一个司令部，一个指挥作战的司令部，一个指导了五万人口广大地面，通过了大大小小一系列会议，在每一个区域里都展开对地主激烈的斗争，每一户每一人都慢慢卷入到这个斗争高潮中，无日无夜的为翻身大事而忙。六七岁大捡狗屎割兔儿草的孩子，都参加了管制地主的工作。且背了小箩兜参加送公粮，把家中养的两只小兔子捐献一只，给抗美援朝人民志愿军。

院子里虽极沉静，办公室门前那块黑板上的数字表，每天可看得出不同。原来有些地方是空的，都填上了新的数目字。特别是政治方面隐瞒埋藏枪支子弹武器的数目字，经济方面分散金银物资数目字，越来越多。

……糖房吗？五十六个糖房，有廿九个是恶霸地主的，有廿六个是不法地主的，政策上说得明白，工商业不能动。可是这些压榨农民血汗千年，把这地方农民，陷到半农奴状态中过日子，地主剥削老百姓的主要生产工具，不交还人民手中，人民是不答应的！一切发展和变动，都为的是完成一个历史使命，促进历史的向前，宣布应该灭亡的到时灭亡，必然新生壮大的新生壮大。五十六座糖房，经人民群众证实，有五十五座请求全部生产没收。……眼前并不动，只作为群众组织的合作社管理。此后还是要解决！

……你是那里，这里是中队部！一切顺利。动起来了，就必然是向前的，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的。人民聪明得很，勇敢得很。任何障碍都阻挡不住这个向前力量！……一定的，要按时完成的。乡农会吗？今晚那边休息，没有会。今天是元宵，是的，我们知道，月亮很好，是的喔！院子里大家正在开联欢大会，小朋友发起的。有些什么人嘛？团长、秘书长、中队部调研员全体、乡农会通信员全体、炊事员两位、还有小朋友八位。大家在月亮下捉猫猫，谁被捉到谁就唱歌，唱得好热闹！……春天快来了吗？已经来了。和小朋友在一块，大家都十分年青，变成了小孩子。还有两个新来的小朋友……怎么，我忘记告你了？那个老道士，刚过了年死了，当天就埋了。这家伙用他那个半游民的迷信行业，骗了几十

年的人。特别是为地主阶级服务，麻醉人民。地主阶级垮了，完了，这些家伙也功德圆满，随同消灭是很合理的。一院子都照常，只有晚上去毛房，在屋外竹林子那边，可看到一点东西，一个竹杆子扎好用白纸糊成的小灯，里面有个小碗，装了点油，有一苗苗火光，象征生死之间的一点联系，别的再没有什么。老婆子就从不哭泣。房子里反而有了生气，来了两个小外孙，很会唱歌，这时节也在院子里捉猫猫唱东方红。

……怎么，一过二十我们就得到区里集中吗？不能参加庆功大会，就得赶回北京到另外一个战场上去吗？好的，好的，是一样的！任务总是要好好完成。四个月，倒好像不多久，真是。

……你是那里？这是中队部，一切都准备好了，差不多了。是的，明天上午就上路。……怎么，电话十点也得撤吗？……是的，是的，没有必要，通知他们来撤好。

本文作于1952年，手稿上作者原署名“茂林”。

据手稿编入。

① 擂　手稿原使用“礌”字。

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

一　引子

长途汽车停到××站时，陪我同行的年青干部刘同志是本地人，熟习地方情形。因为天雨时间晚，车抵站已将断黑，怕店铺好房间早已为人包尽，住处会有问题。因此和我商量好，下车之后，预备先去找个住处再搬行李。不想一下车，就有个脚夫迎面而来：

“落店吗？保你有个好住处。”并说只有他知道。其时天已断黑，彼此面目在车站前那个灯光下看不分明。

刘同志说：“你是几号，叫什么名字？”

只听那脚夫说：“我是宋大少。”

刘同志不由啊的一声笑了：“宋大少吗？好，这担行李就归你挑。可小心莫撞坏！你说住处是那一家？”

在暗中只听那个人快乐的说：“自然是东门头那一家！”一面整理棕绳扁担，一面笑着主动把行李挑走了。刘同志安慰我似的说：

“先生，那个住处好。他说的不会错。这是我们县里的财主小员外，我小时候，看他像个烟狗子，大吃大喝，一事不作，堕落得快要到地下爬。解放一来才打救了他，烟瘾不戒而绝，劳改三年，能自食其力了。你看他多快乐，头脑想开了，做事也有劲头。”

我们当晚就歇宿到东门头那个一颗印大房子里，是第二旅馆新添的铺号。我看这个身穿蓝布坎肩，上绣“劳改”二字的人物，约莫有三十多点，长得团头团脸，在这旅馆里像是凡事熟习得很，和自己家里差不多。因问刘同志：

“这个人倒像是旅馆雇来拉生意的，活泼得很！”

刘同志笑着说：“这个旅馆原就是他的家。败了家，解放军来才把他打救了。”

二 读子曰学正心诚意

他的父亲是个土财主，名叫宋人瑞。家里有三百亩田土，五口人，和这座一颗印封火墙房子。过去时节在我们这小县里做财主，总是生根在两种土壤里：不是自己做官，贪赃纳贿刮地皮，积下些造孽钱，就是从祖先承袭一片土地，用纯粹封建性剥削方式，吃农民血汗过日子。宋人瑞能够做财主，用的是第二种办法。一家人终日不劳而食，活得十分舒泰。三十来岁时候，就在这里称“员外”，不过一般人照习惯却只叫他做“老财”。这称呼略带有乡评意味。正好像除了弄钱，没有别的事可谈，叫“老财”名实相符。因为读了几年“子曰”，记得孔子说的“治国平天下必先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所以在这方面还很下了点功夫。地主如何正心诚意，自

然一言难尽。总之事情必然是有利于己，不会白作的。但是天生一个歪心，从那里正起？至于修身方法，首先是把自己保养得胖团团的，额门上红光焕发，后脑勺上还结了个大肉瘤，照相书定名“福寿疙瘩”，象征多福多寿。为增加仪容庄严，从三十岁起，嘴上就耗子似的，挂了两撇八字鲶鱼须。在任何地方呆不多久，必从衣襟里拉出个小小牛骨梳子来，用猫儿洗脸手势，左边右边那么一下一下梳理。一天没事做，脑子里只是转念头想生财之道。手边数目字虽并不大，可是手准心狠，一下网总有鱼，决不落空。每天必上街看看百货行情，打听打听省里新闻。走路时必迈着个八字步法，这步法是模仿本地县官的姿势，县官又模仿省官，省官又模仿京官，京官又模仿宦官。宦官就是心甘情愿把自己“麻雀”割掉在皇帝身边当差的奴才。

宋人瑞这种有意模仿，和他平时读子曰，由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意识虽有些联系，可并不多。主要倒是学点官样子，唬唬县城老百姓和乡下人。这种形式上的模仿，虽并不引起本地人特别注意，可是对于宋老财本人，倒是越来越像个县里起码绅士了。

三　修身

宋老财年纪青跟老塾师读子曰时，另外就读了些石印和小字木版印的杂书，开了心窍子。如什么才子传，情史，五百家香艳诗，要懂不懂的看了一阵，于是在身心两方面，都不免受了点影响，培养了种自作多情的风流气氛，只想找机会活动活动。有一回，下乡去分田租，住在一个佃户家里，

凑巧有一个乡下地主小寡妇，沾了点远亲，也在那边庄子上住。宋老财既然年青，又有点产业，相貌也有个六分，和小寡妇蘑菇了一阵，两个地主就刮搭上了。不巧却被一些同宗好事年青子弟注了意，盯着梢。有一次，见宋老财进了小寡妇的门，过不久就去撞门。大白天把两人双双捉住。认为是破坏了本乡风水，痛打了一顿，口口声声“要沉潭”，再不然就“脱光一身到场上去公开”。总之，让他们下不了台！急得个宋老财连放响屁。随后才开谈判，问是乐意私和还是公开？凡是读过子曰的人，都知道这事情不能公开。后来亏得佃户为说情，才折罚黄谷廿石，另外还办了桌八大碗酒席，才算是包涵了事。一出马就栽斤斗的宋老财，经过这次教训，认为这全是受了诗歌小说的骗，回到城里家中，把诗词歌赋一古鲁向灶肚里塞，一把火送上天了。本人也就重新照子曰说的正心诚意起来，再也不作风流人物胡闹，再也不读什么书了。

四　齐家

自己既有了个教训经验，对妇女也算有了点实践知识。常言道，“人心都是肉做的”，将心比心，宋老财深怕家中人也会出问题，于是把修身齐家打成一片。用一个新的作风治家。

宋老财讨了一房猫猫脸的老婆，因为也是地主家的出身，不事劳动，养得细皮嫩肉的，使得宋老财心肝肉圆子一般的疼爱，日夜总是提防着，担心出事情，怕被什么山砦大王看中抢去。其实当地只常常听说军阀团长队长抢女学生，有一

时致回省女学生也不敢上路。可还不闻抢乡绅的媳妇。照地主习惯，老财把老婆叫做“员外娘子”，还要老婆称他做“员外相公”。老婆性情固执，却只肯叫“老财”，坚决拒绝叫员外相公的意见。

每当员外娘子回娘家探亲时，照规矩不得抛头露面，必坐一乘小小乌油鸭棚轿子。轿子还有两扇小门，等娘子上轿坐定后，老财才用一把小小黄铜鱼尾锁，亲手把轿门锁上，再用手摇摇，验明锁已牢靠后，才打发轿夫上路。因为轿已上锁，他还得赶到岳家院坝亲自去开锁，不嫌麻烦。有时候没有轿门，老财就忽然宣布：“不去了，不去了，”再也不说什么，当真取消这一次探亲。有时又像头脑开明了些，依旧让老婆上轿，却急中生智，计上心来，悄悄的走到灶屋里去，抹满了一手锅烟煤，到员外娘子面前去，闪不知把烟煤向娘子白脸上一抹，弄得员外娘子白蒙蒙猫猫脸，成个哇呜脸，鬼见愁。大事作完，老财随后却笑眯眯的拍着个巴掌，嗾抬轿子的说：

“燕子老表，燕子老表，你们赶快上路！不要挨，不要半路歇憩呵。”

员外娘子初次经验到这一手，真是又惊又恼，在轿子里哭闹，轿子停顿许久上不了路。在轿里猫声猫气叫嚷：

“老财，老财，你个古怪精，是在玩什么把戏！大青白日，在路上难道会有老虎吃了我不成?”

老财眼见完成了任务，只拍着双手烟煤笑笑的说：“你妇人家懂什么？这是为你好！岂不闻古人说冶容诲淫，你那么年青，打扮得花枝招展，我见犹怜，何况外人？我是为你辟邪气，邪不胜正，平安大吉！燕子老表，快走快走，不要耽

搁，好好上路呵！”

娘子于是思量思量，知道老财脾气，行为虽莽撞些，还是出于一片爱心。而且，万一路上有个山砦大王，忽然闻名而来，那可真麻烦……自己一转弯，凡事好办，气也慢慢平了，只好如此将就回到娘家去，重新梳妆打扮。恰好娘家也是个地主员外，读过更多的子曰，老是担忧世风不古，人心日坏。也以为自己饱读圣贤书，有修养，能正心诚意，不作坏事，可是家里妇人却不敢包。所以对女婿这种独出心裁的举措，竟完全表示赞同。还以为凡事能“预防”，就可以少出“大乱”。他还称引古诗“君子防未然”夸奖老财是个“真君子”。员外娘子本来又惊又气，一听这话，以为读书人那还有错？因此更加觉得老财疼她爱她，每天就为老财煮两个甜酒荷包蛋点心。此后每次回返娘家，上轿子坐定后，若老财忘了那一手，还有意提醒老财：

“老财，你那个怎么还不……路上难道不怕……”

可是也怪，如此一来，仿佛人心已转古，老财倒放了心，偏偏不来这一手了。只嘱咐抬轿子的：“燕子老表，路上小心，不要踹中糖鸡屎，叭噗一跤，不好办！”老财有老财的脾气，冲动和理性彼此交替，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五　家庭教育

过了二十年，老财儿女通通长大了，“员外娘子”回娘家时，和母猪一样，常常带了大大小小一群，自然用不着抹锅烟煤了，问题转到了儿女身上。老财还记住自己年青时代发生的不美故事，担心女儿心窍子一开，谁也难保险不会学坏

事。因此家中约法三章，第一决不许女儿读书。理由是新学堂顶靠不住，特别是北京上海和省里的大学，二十岁上下小伙子，男女不分，成天在一处研究。口中说的好听，研究什么科学，提几个蛤蟆、耗子、蛇蚤、臭虫，放在西洋镜子里看了又看，研究出个什么名堂来？都只是借故，装得蛮认真，和小尼姑念经一样，我敢打赌输个手指头，那些女学生不想偷人那才怪！研来研去，生物学，生理学，于是如此这般，研究到自己身上去，不费力气，结婚三五个月，瓜打一声，养了个私娃娃。娃娃没送处，送到洋人办的福音堂医院里，拿去熬膏药，岂不是作孽。老财由于这个理论的结果，就是决不许家中三个女儿上学，以为免得后来丢宋家祖宗的丑。其次自然也不许随便出门，只呆在家中吃白饭，做点针绣活计过日子。至于照他想的，要凭三媒六证来解决，好到那里，他可不曾仔细思量过。不过是习惯如此这般而已。

对待儿子呢，老财却另有一套教育哲学。他的办法是“推己及人”，先让儿子和他一样，入私塾读几年私学，打下个“圣贤”底子，再转入县立小学，受新教育。但也不宜学得太多，多了就会闹家庭革命。所以到儿子十六岁那年，还只在小学四年级上课，深怕在这个紧要关头，被坏人引诱学坏，将来破家。就请本地脚步勤快的张媒婆，“文王访贤”一般，访了一房小有财产的寡妇来圆亲。讨过门来，才知道年纪比儿子大八九岁，还带了个小油瓶。但对老财说来，还是认为满意。因为年纪长些可以制服儿子，到儿子过了二十五岁，不大满意家庭时，再为讨一房小，也就补了缺。

讨过了媳妇后，还不大放心。其次即照一般土财主的方法，鼓励儿子吸点鸦片烟，名义上是治咳嗽、肚寒，辟时行

春瘟，事实上却希望用这个妙计，缚住儿子的身心，挫尽了年青人的意志，使他离不了家。这个作法可不是老财发明的，是早就为一些大户乡绅采用行之有效，老财深深知道的。

六　老财的政治经济学问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如从表面看，宋老财为人倒很像有点土头土脑，而且十分忠厚诚实，知书又明理，只是拘迂古板一些，凡事不甚圆通。其实不然，这人腹中脑中却大有经纶。和天下多数地主老财一样，他有个经济头脑。生长在小小县城里，一家衣食所资，是那三百亩田地，因此对于向农民的剥削，真可说事事在行，全面理解。凡和佃户打交道，有利于己的事情，那怕只是眼屎大一点点，通不轻易放过。向农民放青苗高利贷，总扣准时间，不迟不早，赶到谷子快要垂头时，才放出去，依旧还是老办法，借一还两，不能例外。每年例租更是铁算盘，颗粒短少不得。交纳稍缓，就说"乡下人真无良心"，宣布退租。平时不论交租或还欠，在正份外，同时还迫农户得配上四色礼物送来：一块腊肉，一斤雨前茶，一包嘉湖细点，一点新上市瓜果，才算通情理识好坏。对付佃户那么苛刻，他自己还以为在做好事，不然这些乡下人只有饿死到岩坎下。

不过俗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宋老财虽主意多端，用尽心机盘算来的钱，可留不住，过不多久，又自然而然转到另外一种人手里去了。这种人不问职位大小，在旧社会里统统叫做"官"。老百姓一提起"官"，总是又害怕，又讨厌。这些人给老百姓印象是"好事不会作，坏事都有分"。

旧社会的习惯，我们知道，县里、省里、京里都住满了这种有威风有势力大小官的。这其实大都是些吃白饭过日子的人物，不剥削人根本就不能生存。其中最省事的是做大官，官越作得大，越容易赚钱。赚了钱就狂嫖滥赌，或存到外国银行里去，让外国商人再用它来剥削中国人。凡是官都各有一套不同的弄钱方法，从各方面增加荷包中的收入，最后共同的对象，还是真正在生产的工人和农民。不同处只是有些是直接压榨，有些间接叨光而已。地主面对农民，各以不同方法来挖农民的腰包，大小官吏又伸手从地主荷包中把那份钱拿去。地主和地主，官和官，彼此之间又利用社会身份和其他关系赌博，请客。送礼，开借，和用父母死亡儿女婚娶种种方法，相互掏荷包，翻口袋。这些钱还是停不住，过不多久，又要让大小资本家，奸商，特别是帝国主义者洋人开洋行的，卖补药的，经营赌场跑马跑狗的，和那些洋酒、洋烟、洋衣服料子，陆续把钱骗去，把大小荷包挖空。这个连锁式的剥削经济结构，苦透了亿万中国老百姓，却造成一些大小城市的假繁荣。照剥削寄食阶级看来，凡事早已成习惯，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满有道理的。老百姓心中虽明白，这种情形不大合道理，可是却没有办法向他们去说理。

七　小县里的政治实际

当地农民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种保守性大一些的，就觉得梁山水泊的忠义堂，早就打毁了，公道大王也成了古人，戏台上做戏，铺故事尽管热闹十分，面前社会所有，每天碰头，除了宋老财一类人物，就是另外一些催粮、抓丁、

收捐、派税、吃公家饭欺压老百姓的家伙。这些人一天在朝掌印把子，老百姓一天也就没有办法；另外一型反抗性强些的，就专和地主官僚作对过搞，可是既缺少政治理想和目标，又缺少计划，个体农民阶级性限制大，即或上山落草绑几只肥羊，究竟气候小，一时自然也搞不出什么大局面。警惕心不大，就被糊涂牺牲。警惕心高些，也还是会出事，本乡呆不下去时，只有背乡离井远远的一跑，从此没有下文。

因为本地还有那么一点问题，宋老财和本县大小官吏的关系也就复杂了起来。小县城中心人物，大多是由如下几种组成的：国民党党部，大乡绅，商会会长，退伍军官，善于夺弄，不甚正派的半知识分子。这些人自成一个集团，虽相互常有利益矛盾，却在矛盾中统一起来，承上启下，联合一气，向老百姓进攻，把聚敛收人向县长和驻军营长、连长献纳，自己也就物以类聚，或玩牌吸烟，或诗酒酬酢，不事生产，过着一种不易形容的醉生梦死腐败霉烂的日子。

每到一定时期，县里或营里，就把一二绅士头子请去“商量要公”。过不多久，照例就有商会会长和领头绅士具名，邀请大小各界便饭的通知，分送到各个有面子人物家里去。得通知时，人人心中明白，可是不能不去。一去自然就得派捐。仅仅以年终冬防清乡而言，大会中讨论到的，就有清乡费、弹药费、草鞋费、灯油炭火费、洗手费、压惊费……一共七八种。这种种名目，除了到会绅商各界，凑足一笔数目，还要作为人民公意，请求县里在本地商货税中增加一笔临时性附加捐，名义上说是剿匪，事实上却是县长生财之道。早半个月前，四乡就出大字布告，预定日期到时，县长就坐了个三丁拐轿子，前呼后拥的带了一排县警备队，到附城二十

里内外大乡绅地主家去观风拜年。每到一处停下来，乡绅必大排宴席办招待，海参鱿鱼鸡鸭鹅鱼大吃大喝几顿，再转移阵地，过另外一村去。这么如法炮制，到东西南北四乡全跑过后，时候也快近年底了。于是凯旋一般打道回衙，整队回转县城。把几个得罪过乡绅的被诬陷的老实农民，不问青红皂白，一索子绑回县里，随便问问，从中挑两个出不起钱的“法办”，其余的向监狱里一抛，本年度冬防清乡，就算告一段落。城里乡绅学警，事情可不完，还得办慰劳，按份子出钱，请酒，登报。县城里做小买卖的生意人，一见警备队兵，也得装作笑眯眯的招呼：“副爷，下乡打匪辛苦！”警备队兵却借此拿了盒自来火，吃碗饺饵面，掏掏口袋，装做恰好忘了带钱样子，记个数目，扬长走去，使得小生意人无可奈何，自认背时，清乡遭殃。

县长回来第一件事，是把从乡绅家敛回来的一二十挑风鸡、腊鹅、橘柚、红糖，从中选出一部分顶好的，派专差带下省去送礼：省府的厅长、处长、秘书长、参议长、参军长、副官长，和在省住家的本县大绅士、本县省议员、有势力又刁滑的记者，都一一点缀一份礼物，才不至于出问题。剩下的还一直可吃到次年三月里。县城里的地主绅士，都明白清乡的真实性质，不过是如此这般，可是一切还是照旧。到开会摊派费用时，尽管相互拱手托穷，到末了照俗话所说“满老爷的宴席，各自有分”，还是得挨一棒。

八　待遇地位

宋老财在本县是个中等人物，自然就有一定社会地位，

如小市民的礼貌，出城时，在城门边卖猪血粉条的必打招呼……出钱上捐时也少不了有一份，可并不大。在会上既破了钞，回家路上就对自己嘀嘀咕咕："背时倒灶不走运。"随即想起，平时专门帮同县长做"鱼鹭鸶"的商会会长，在场上钉着他出钱，心中愤愤不平：

"你个雷打火烧的，心那么狠，得了钱，明天打三年六个月阴摆子，女儿害水臌胀，儿子害黄疸病，小孙子抽羊角疯，吃一千帖官药，也不会好！这才是真报应！"

把这类非常毒恶的诅骂，一兜篓倾倒到商会会长头上去后，照习惯，再打两个酸饱喉，才把隔在胸口上的一口气和早上食物，一道送下丹田，再放两个响屁，心中也就平复了。

使得宋老财最难于招架的，还是和县里的差吏、税局签子手一类公爷打交道。偶尔因事顶起嘴来，一个"理"字即或在老财这一边，也不容易占上风。对于老百姓，老财总用一个"你不读书认字，蛮不讲理。不成的，不成的！这是城里，要讲理讲王法的！"用子曰态度压住对方，解决纠纷矛盾。一遇到这些吃衙门饭的人，可就不成了。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这些人恰好管得住老财。每到气势汹汹要决裂时，君子不吃眼前亏，老财于是连忙打拱作揖，表示让步认错，心中却暗暗地安慰自己："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输势不输理，不算什么。"只图托故答讪走开。有时当真也就那么避开了。有时神气之间口服心不服为对方发现，特别是那种"女子小人，近则不逊"不屑理会的样儿，被对方发觉时，追上去揪住了老财衣领子，迫着质问：

"老财，你口上带渣子，放什么臭屁？是在有意骂谁？你有道理，我俩上天后宫去评评理看。你有几个臭钱，摆阔，

乡下人好欺侮，我可不怕你。我要把你这个狗肏的土财主……”

这么一来，不免在稠人广众中，使得老财十分狼狈，不好下台。于是做成非常柔顺诚实的神气，向管得住他的对方表示投降求情：

“大爷，将爷，我并不说什么！不要错怪好人喔！我服了。就算我是老糊涂……老猪狗吧。……”

“你这人才不糊涂！”

“那么，是只老臭虫，老狗肏的，老……好不好？”

“你可是臭虫？真的，假的？”

“大爷，真的，真的。若说假话，到年三十夜里，颈脖上生个汤碗大落头痈，一直烂到心肝五脏。”

“你这人难道还有心肝？”

“……”

这种口舌战争当然得不到什么结果。

还幸亏旁边人作好作歹，说了几句圆成话，纠葛才算解决。遇见这种蛮不讲理的人时，老财只好自认晦气，仿佛无意中踹了一脚狗屎，自认倒霉。其实如当真是泡稀狗屎，对老财说倒是一回好运气，照例会从腰间掏出一片油桐叶，把它谨谨慎慎包藏起来，捎回家抛到粪坑里去。他身上长年都带有点破纸烂叶，专为包这类财喜用。爱惜肥料是农民美德，但是这事在老财说来，却另有一个“理”字，即大路上和别人家门前的，是“无主之财”，人人得而有之，他发现，就可以有权利占有。至于他自家门前屋后的，不贴封条也还是“有了主”，别人可动不得。谁若不尊重主权，随便动手，就算不讲道理。

九　老财的揩人艺术

老财上街买柴，看了半天，才看中一挑杂木柴，说妥了价钱，要那乡下人挑回家中付钱。半路上总觉得上了当，贵了一点，心中滞滞疑疑。正好有个卖甜蔗的摊子停在路边，就花三文钱买了根甘蔗，撇成两节，一再劝乡下人吃那段好的。乡下人心直，以为老财请客是好意，不肯接上手。后来又再三让那段尾梢，不得已才勉强接过手吃了。待把柴送到家中付款时，却扣了甜蔗钱三文。

乡下人不明白，开口问道："财主员外，你怎么少把我柴钱？"

老财故意说："你再数数看，不会少！"

"当真少，不信你自己数数。"

老财把钱接过手来，随意一数，睖起两只地主凶眼，向乡下卖柴人瞪着："嗨，你要多少？记记看，半路上你——吃过什么？不是吃过半节甜蔗？"

乡下人心实，就说："员外，你那个我并不要吃，是你再三请我吃，我才吃！"

老财说："我请你，你请谁？你说得好！我们既无亲无戚，为什么请你？你怎么不请我？那甜蔗你不是亲眼看见过？我们先小人后君子，……"

说到末了，乡下人不能不就事论事：

"你吃的是大半节好的。"

"我不是好像孔融让梨，再三让你吃那半根大的？你们乡下人，真不讲理，遇事都要占点便宜。我说，这是城里，狡

猾是不行的！学堂里有孔夫子，衙门里有县太爷，凡事都有理字，要讲理，才活得下去！不讲理，就要坐班房打屁股的！”

乡下人口拙，那说得过城里读子曰懂道理的绅士？无可奈何，只好捏着鼻子吃冲菜，不声不响，拿了钱在寒风中缩着双肩走去。

另外一回，还是买柴。回家时，老财一路和那乡下人刮叙，口气温软软的。到家里不即付钱，口上说“大哥子辛苦辛苦”，还舀了一大瓢凉水请喝。随后就要那人帮忙，把柴砍断。乡下人心实，力气出在手上，不好意思推托，就举起柴刀庞庞庞的把一担柴全斩断了。到付钱时，老财照样少付一笔钱。乡下人说：

“员外，钱不够，你数错了。”

“我不错。”

“我们说好了价，还帮你忙把柴砍了，怎么不多给点，倒扣我的钱，苛刻我们乡下干人！”

老财最忌讳人说“苛刻”，于是气愤愤的说：

“怎么，你还说什么干人湿人？我这次真上了你大当，你这个乡下人，看来满老实，可真不老实。一担柴砍下来，只这一点点，我待不要，怜念你天快晚了，卖不脱，才挑回来。砍砍也要钱？力气出在你手上，费多少事？你把我看成南京沈万三，家里有个聚宝盆，钱会自己来？你不卖，就赶快挑走，我不要，我不要！挑走挑走！赶快走你的清秋路！”宋老财明白柴已无法挑走，而且天也晚了。乡下人不知如何办：

“柴砍了，我卖给那一个？”

“柴好自然有人要。谁出大价钱，你就卖给谁吧。你有

柴，我有钱，生意不成仁义在。不卖赶快挑走！卖柴的，我告你说，这是县城里，有衙门，有官，有读书人，可不能蛮不讲理喔！不讲道理有王法的，要拿去大板子打屁股的！这可不比乡里，随你们称王作霸，遇事讹诈人！”

“你们城里有钱人才真不讲道理！总是欺侮我们乡下人，真都是……”

“我们城里人吗？做事，吃饭，都凭一个理字。一天到晚都是理字，不讲理就活不下去。那像你们苗气！……好好好，这柴不卖就赶快捆走，我不要了，不要了，家里烧三年还不完。我还有事情，没功夫和你这不懂道理的人辩嘴。”

请想想，砍过了的柴，连那条捆柴藤也斩断了，有什么办法捆去卖？乡下人口又拙，辩不过这位城里员外，末了只好自认晦气，拿了那点钱走去。

宋老财的经济手腕，就是如彼如此。极小好处通通不轻易放过。大一些事情，如买米，必到城关外三里牌去拦路，专挑选那些不大上城的老实乡下人，想方设法哄到家里去，用自备大升斗量计成交。小有不合，就竖着眼说：

“城里事事要讲理，霸蛮不得，不讲道理就上衙门打官司去！”用来吓唬卖米乡下人。

另外一时，逢节气，老财到屠案桌边去买肉，老是挑精拣肥，正值屠户生意极忙，火气旺，乱得一个不耐烦，于是放下刀子来问：

“员外，你究竟要不要？”

“嗨，怎么不要？我难道闲得没有事做，来这里和你捉猫猫玩？”

“那你究竟要什么？”屠户舞着亮闪闪的刀问老财。

老财闭了闭眼，表示读书人决不屈服于强暴神气说：

“我要好的，可不要皮包骨头。不要吹脚。不要带血夹项刀头肉。不要有猪屎臭的后墩。不要那个……总而言之，现钱买现货，不好我不要。我不是蒙鼓，皮多了有什么用？那一块全是骨头，难道要我买打鼓棒？”

“那你究竟要什么？猪没有骨头，怎么能走路？”

“那蚯蚓爬爬虫，怎么又会走路？”

“你就去买爬爬虫吧！”

生意作不成，必气愤愤的走开，口中还不住说：

“哼，发瘟的老母猪，谁吃了也会发瘟。幸好不上当。”若勉强成交，到末了，算过账后，老财还是要乘机随手，把一条骨髓，或一个尾巴括走。估计屠户赶也来不及，让他骂两句，回家好吃酸汤白菜得实惠。

若去买鱼虾，贪便宜，必不计斤论两，却托辞说买一条鱼喂猫儿吃。卖鱼人常有初次上市的，信以为真，就让他占了便宜。如遇老生意人，明白这是老财的一手花枪，就故意问他：“员外，你是喂家里的公猫，还是母猫？”

这一问，可有点不那个，话里像一根刺，签在老财心窝子上不好受。老财于是做成作古正经大绅士样子：“嗨，嗨，这件事也要你管？我喂猫喂狗，干你什么事？”

卖鱼的也是精怪：“员外，不要光棍心多，一开口就见怪！我是一番好意呀！我知道你公馆有好几只猫，我的意思若是走春的母猫，就给大的，是叫春的母猫，就给小的。若是公猫？那就……”

老财狠狠的瞪了卖鱼汉子一眼，不言不语，抓起一条早就看准了的大白鱼，向菜篮里使劲一掼，神气很像待说：“当

然是母猫，还故意问什么，讨你爹的便宜!”丢了两个铜板，就扬长走开了。可是走远了点后，口中却轻声说“喂你的老子”，觉得精神物质两方面都胜利，笑笑走了。

对于老财最上算事情，还是果子上市的季节，菜市口每天百十挑水果都放在大土坪里，且居多是新上城的乡下人，急于得钱换些油盐。老财照例每到处都要问问价钱。按本地规矩，看货时可尝尝新，老财必狠狠的剜下一大片，故意挑剔走开。是硬壳果板栗榛子，必挑选个大的嗑碎嚼嚼。瓜子类必抓一大把。左看右看，可不一定买下。碰巧成了交，总还是要占点分外便宜。

十　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话说，悖入必悖出。所以宋老财虽长于算计，总不容易如希望大大发家。多年来还只是那三百亩田，不增不减。正应合了老财自己常说的话：“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人算不过天。”

老财的天，可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倒扎扎实实摆在他眼前，很具体，就是“县里父母官”。此外家里也有一位活宝，是他指望承宗接祖的宋大少。

这事说来话长，也应合了俗话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原来宋大少把老婆一接，把大烟学得有点儿谱后，做人大志气消失了，小聪明倒发展起来。媳妇年纪大很多，又是一个大块肉墩子，红烧四方三鲜狮子头，脾气顶随和。前一回嫁的丈夫死得早，怕人说命里克夫，因此过门来把大少宝宝贝贝，宠得和亲生儿子一样，凡事百依百随。大少在县中

挂了个名，既不用心读书，也不常在家中，只欢喜和当地小军官子弟、地主家子弟、洋货铺小开，这一流不事生产的不肖子弟，一同找门道胡调。

地方不当冲，当时公路还不通行汽车，县城里虽有两三千户人家，除了百十个大小地主乡绅，就是生意人，和小城市所特有的一种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逢年过节虽有些例行热闹，其余种种长年都如在静止中，极少变化。可是附郭十里却有几个大乡镇，市面繁荣。特别是有一个离西南公路极近的村镇，五天一集，市面玩意儿也格外多。每逢场集，宋大少就像过了年。居多是三朋四友上馆子去吃喝，玩围鼓堂子，竖起一只脚坐茶馆，和三朋四友摆龙门阵。在私学读圣贤书时，看看面前形容枯槁读了一生圣贤传的老师，就十分无出息，一年孔庙春秋二祭，胙肉也分不到。转入新学堂，校长又是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什么事都不懂，只整天到县里去玩扑克，哈鸡撇兰吃份子，从不过问校事，省里登报还说是“模范”校长。大少自然也学不到什么新知识。可是一到乡镇上，学习这些歪事，要使用点歪聪敏时，毫不费力，过不多久就十分溜刷在行了。

仕绅子弟和小开间充“仁义大爷”，有一个基本条件，即撒手花钱。比起来，大少手面自然远不如本县大军官陈师长家子弟来得豪放。但年青纨绔子弟，总是有股爱面子劲儿。胡调也有胡调的面子，因此不免常有“打肿脸儿装胖子”事情。正式向老财伸手，终究有个回数，有个一定数目，决不够使用。因此不到廿岁，就学会了运用种种遗传秉赋歪聪明，使出巧计神通，从家中各方面“开源”。老财既鼓励过大少吸洋烟，大少就吸一半拿一半出去作别的用途。成婚不到三年，

就把媳妇陪嫁的体己三斤银首饰和两个压妆圆锞锭子换花了，四颗金戒指也换了两个。随后又从家中不甚当眼处东东西西下手。不问是家里日用品，还是老财囤积的白蜡蜂蜜，都悄悄拿出去抵账。到后且越来越大胆，越聪明，把祖坟山上风水树，也一株一株的砍伐卖了，却骗哄老财，说是省里过境巡防部队下手的，使得老财不敢放屁。一句话，大少和他父亲一样，头脑一转就生财有道。运用不相同处，老的是一星一点向家里扒进，大少是一份一份往外送礼罢了。父子对照，真是一对人瑞、活宝。

因此一来，老财尽管会理财，方法越来越高明，可总不聚财。一年到头盘剥他人，年终结账，还是九九八十一，相对抵消。但是旧话说，人老成精，大少的行为，对他父亲瞒得过一时，如何瞒得长远？那就言之话长，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原来老财平时不算命卜课，不吃药，不上戏馆子，认为吃这行饭的都是“马扁儿”，不会有一个好人。至于真正使用种种法子挤他荷包的大小官，他却不敢乱说一个字，因为明白“衙门”是什么玩意儿，官是什么一种货色，小心谨慎，不犯上讳。此外还有一星儿弱点，即有点和经济财富相关联的迷信。他相信本地的“霄神”。照当地传统传说，一个人的贫富，都决定于霄神的爱憎。霄神是个白胡子小老头，肩上挑了一对鸡蛋壳大的筐子，经常自由进出人家的仓库，欢喜任性。它高兴，尽把东西向屋里挑，就家发人旺；它不乐意，或什么人什么事得罪了它，东西一向外运，就只有倒霉。若眼见时不声张还好，一说出口，就准坏事。老财平时虽常用圣贤的致诚格物，向家中人宣传不相信这种事，心中却结了

个小疙瘩儿，老嘀咕到那一对箩筐。大少歪聪明，摸透了老财心上弱点，十二三岁起就常常谎说眼见一个四五寸大小老头子，挑了一对鸡蛋壳，在屋梁上一直向外跑。这个着可把老财完全制服了，只是摇手鼓眼，不许声张，以为童子眼清明无邪，见的事顶真。老财就悄悄告过大少，不许乱说话。老财这种怕霄神的小辫子，既已一把抓住，从此以后，每次查点家中囤积的东西发现数量短少时，大少一提屋梁上飞跑的那一位，老财就一面轻轻的摇手，一面支吾说：

“没有什么，是我忘记了！我真是老糊涂蛋。”把大少支使开去，话不再提，免得得罪霄神。

十一 结尾

像宋老财那么一种人，一种家庭，不是凭空产生的，因此当然也不会自然消灭。他不是中国某一省、市、县特有的土产。他的存在，在过去一时，可以说是繁殖相当普遍的，而且和我们还仿佛极熟习。许多人从自己家中的叔父、伯父，或姨舅父亲戚间，总可发现这么一两位典型。总之，面貌性情都并不陌生。他代表封建社会末期一种阶级，反映这个垂死阶级的丑恶形态。他存在于千百个县镇上，面貌都大同小异，还俨然是一时社会中坚。尽管为人十分贪婪狡诈，也依然还是叫做“读书人”或“绅士”，从这个名分下，占了人民许多的便宜，日子过得满从容自在。到军阀时代，一时节虽又成为小军阀和地方小官吏掏荷包的对象。总之，生活还是靠吮吸人民血汗过日子。平时还以“卫道”自任，事事有理，事事对头。但某些部分的愚昧，迷信，却又和他的贪婪狡猾

相互映照，显得加倍丑恶可笑。……现在，什么都完了，过去了。人民已经当了家，一切都在应当消灭情形下消灭了。想要找寻这么一个范本，供地志博物馆陈列或戏剧学校教学参考，给年青一代见识见识，也已经不容易得到了，因此我特意为宋老财这个人作一个素描画像。至于这“完了”是怎么一个过程，我想我的读者，凡参加过伟大土地改革，或读过几个有关土改著名小说的，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了，已用不着我再来废话。

我们不是在先还提起过老财原有三个姑娘，他深怕世道不古，学做坏事，不让她们上学念书吗？几个人的下落，也应在这里交代一下。原来三个女的，既没有学会宋大少那么胡闹游荡，破产败家，也还没有机会出嫁，让丈夫在面上抹锅烟子。却由于受另外一种吃闲饭说白话串门子的亲戚怂恿撺掇，以为虔求观音菩萨可保佑双亲长寿，就是孝女，二十四孝多有了三孝。因此许下愿心吃素，由初一十五吃短斋到整月整季吃长斋，由求神许愿为名悄悄向附城尼庵走动，被老财发现后大吵大闹，随后还是让步，终于长时间让她们去尼庵寄住。为的是尼庵还常有些外人接近，家中可远比尼庵苦闷单调。其中大的一位，因身体虚弱，解放前就已落发出家，还满以为这么一来，可以念观音经一世，到临死时就会有一朵方桌大金莲花来迎接她，飞往西天净土。这种愚蠢而且自私的迷信，解放一来，自然也完全破灭了。她们的师姑，却首先动了凡心，解放了自己，嫁了个作铁匠的老表，同劳共苦，养了胖头圆脸的孩子。其他两个女儿和庵堂里几个尼姑，再也不能吃白饭，共同组织成一个小小劳改队，就庙中那两亩园地种菜喂猪，自食其力。由于为人年纪青，习气沾

染少，改造快，几年来“地主女儿”帽子通摘掉了，并且还和人结了婚。至于宋大少呢，大烟自然不戒而绝，再也不瞎谈霄神挑担子的荒唐事情，只是靠自己两肩双手挑担子过日子，几年劳动，学会了明白劳动和生活的庄严意义，而且并不例外，当笔者记录这个故事时，可能帽子也已经摘掉，正式做了那个县城招待所的一个服务员了。

一九五五年写　五八年二月完成

本文原稿署名沈岳焕。编入时据内容将原稿第九、十节文字互换了位置。

创作计划

目下只希望能出去视察三两月，各处走走，看看。有关写作计划，打量到可以进行的，大致有两个中篇的初步准备，如时间能作自由支配，还容易着手：一以安徽为背景的，将来得去那边乡下住一个月，已经有了底子；二以四川内江丘陵区糖房生产为背景的，我曾在那里土改十个月①，心中也有了个数目，将来如写也得去住一二月，并在新成立大机器糖房住十天半月。这些东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时间，又有能力可到想到地方去住住，并到别的地方去，如像青岛（没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阵，工作或可望能够逐渐顺手完成。又还想试再写些短篇游记特写，照情形看来，也得在暑中或暂时离开工作，到湘西自治州或别的地方去，才有希望从比较从容情形中说动笔。如照目下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坛坛罐罐，绸子缎子，花花朵朵问题，及将来如何转用到新的生产上问题。用头脑方法不是写小说的，即拿起笔来，也难望写得出什么像样东西。（我写什么照过去经验，是要集

中来作到头脑近于疯的情况下，文字才见出生命的!）

如说希望，我还希望能在另一时，有机会为一些老革命纪录点近代史事情，例如为何长工部长记下些有关井冈山当时情况。如记下成绩还好，就再找别的一位，如记南昌起义，瑞金扎根，长征前夕，遵义情况，延安种种……或记人，或记事，用些不同方法，记下些过去不曾有人如此写过，将来也不易有人写，而又对年青一代能有教育作用的故事特写。这工作似乎不能从个人愿望出发，要看以后机会条件去了。能有机会在这个工作多尽点力，为老一代英雄先进留下些历史画像，即当成历史资料保存下来，不发表它，也十分有意义。如写得好，又还能给后一代年青同志起些鼓励教育作用，我觉得工作就更有意义了！不过我已经有近十年不曾好好的用笔，手中的笔是否还能恢复过去的活泼，并无多大把握，得先来作些习题看，再作这种工作打算好些。

博物馆文物研究工作，实在相当薄弱，太配合不上新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但是这一环继续落后，也影响到许多方面的科学进军，举例说，没有人好好的扎扎实实搞一搞丝绸服装和一些杂文物制度问题，连环画中的历史故事画，历史电影，以及旧戏改良，问题就不能好好解决，作出的东西总不免是不三不四，违反历史本来。有些还十分歪曲历史，给人一种错觉。我这方面有的虽只是一些常识，如把常识再加强扩大些，有几万材料在手边，我想这对于国家还是有很多好处，也可以减少许多人力物力浪费！其实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那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

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工作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谈到这里我脑子不免有些乱起来了，因为正像一辆破车子在烂泥中挣扎前行，许多工作好难推进！如善于使用人力物力，这边研究工作会作得更具体些，抽出部分时间来写作也就方便得多；这辆车子也许还可走好远的路，如总这么下去，恐怕什么都作不好，定的任何好计划也必然落空！

此计划写于 1957 年 3 月，原稿存中国作家协会档案。

据转抄稿编入，因故未能再与原件校核。

① 十个月　疑为“四个月”之误。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

上

（九月十四）

一九三六年七月廿三日下午四点。

天落大雨。有个便衣警察，拿了那个用卷烟纸写的字条，送到裴局长家中。上面潦潦草草的写着：

“昭毅：我完了，望代收尸，毋告吾母。咬紧牙关，抚养几个孩子，继续我的任务。鼎和留言”

字条送到裴家裴太太手中时，一看内容，即知道人已牺牲了。力作镇静，问明白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回清楚后，送了来人两块酒钱，打发走后，即要局里当差的王四带了两百块钱，去看了副寿材，办了些衣物，亲自赶去东门外收尸。时五点多些。大雨已过去。天尚闷热响干雷。

到时空坪里无一个人。尸首泡在泥水中，仰天躺着，脸白白的，子弹一从眼下部穿过，一从胸间穿过。血渍已被雨水冲去。亲自为解去缚身绳索，换更衣裳。

入棺时雨已止住，围了几个闲人看热闹，被一个警察骂着，趄趔走开了。棺木暂时停到附近一个庙后空地里。

大姐回到家里已将天黑。要局丁王四送了另外帮忙的各人两块酒钱。第二天，即写信通知乡下二姐，嘱咐用一种谨慎态度，把事情转告圩子家中，再由家里来信，要四嫂到乡下去，只说有事情商量，带孩子同去。不知何事。

孩子们都瘦得不成人样子，各剩一双大眼睛。四嫂还行动不便，腰腿伤未好，是乘了两个轿子去的。到了圩子，见老公公时，老公公即哭，老婆婆也泪眼模糊，搂着小孩子哭，说得到安庆来信，老四在牢中害痢疾死了（这是预先商量好说的）。亏得那边裴家大姐为派人照料，装殓……现停在安庆，等待过几天就起运下乡。家里遭了这种不幸，也是命，不要难过，人死就算了！四嫂听到这消息，心中绞痛，几乎昏去……

因商量运柩回乡下事，家有家长，同去聋大伯伯院子里，禀告情形。却不许棺进圩子，不许在祖坟山地安葬。说情说理都通不过，只顽固的坚持己见，以为族中有族中规矩，谁也不能违背。死的死了，生的不应跟着受罪造孽。

由进行商量，请求，到争吵，进行谈判约两个钟头，还是没有效果。大家只有回到院子里来。

大家其实都怕聋大伯伯，于是劝着，以为人死都死了，好歹要入土，即早落土为安，和老顽固争吵，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即早看块干净高爽土地，也使得死去的有个归宿处。不至于长久露天日晒雨淋。死的完事了，孩子们还小，为活的想想好。

因此打量亲自去安庆运棺柩，和婆婆商量，不得许可。一面是伤还未愈，行动不便，一面是刚出过牢狱，在家中旧规矩说来，再无到城里抛头露面必要。

母子们回到原住侧院里，打开了门，只见一片灰土中那个床铺，此外别无所有。

三个孩子一排坐在门限前石阶上，都瘦得不成人样，又饿又累，几双大眼睛痴痴的望着小院子中南瓜花上纺织娘出神。

因进行打扫房子，收拾东西。两个大孩子也帮同抬抬扛扛。小房中一片灰尘坌起。

“老二，你出去带妹妹，不要在这里！我来打扫好了。”

一面安排房中住处，一面想起这一家苦难遭遇，一面流泪呜咽。

亲戚中没有一个人来看望，似乎出痘子麻疹，深怕粘惹上身。即同圩子前后院里的妯娌行，初初也没有人来。都明知这一家人又回到了圩子里，可没人敢来。因为照习惯，这种丧事叫“红丧”，忌讳格外多。而一个女人坐牢受刑，更是十分耻辱有失体面的事情。和亲戚见面也应当难为情。

还是×家二姐为找了两个孤苦穷老亲戚来陪陪，另外为搭一铺床，住了三天，说些对实际问题毫无裨益的劝慰话，总说是“一切都是命，还是孩子要紧。”这倒也是事实。面临问题即几个孩子如何能够活下去。孩子已瘦得一把柴，自己一身又还是遍体伤痕。想起过去，想起当前和未来，一面噙着泪，一面安排孩子住处。还亏得长工××为挑了一担稻草来铺床。从老太太那边凑了两床被盖，孩子们累极，不到吃晚饭时都蜷伏在稻草窠里睡着了。在灯光下，不觉回复到初初嫁来作童养媳那时种种光景，算算时间已十×年了。

三哥静和照旧习惯，白天最早也要到十二点才起床，洗脸、理发、漱口、刷牙，家中×奶奶为把烟灯放好，燃上灯，靠灯连吸预先准备好的三十个大烟泡后，才神志回复转来。

于是再喝白木耳汤一碗，填填心上空虚。这一切规矩都……

本来同住一大院，只是上下堂屋。鼎和事也早已知道。回来时和老公公见面时大哭，因运柩事和他父亲争吵，他在房里床上都听得清清楚楚，却不见面参预，仍旧照他的老规矩，直到过足了瘾，吃完白木耳，又……才像从当天新闻纸读到重要消息一样，知道了家中出了这件大事，慢条斯理来到偏院住处：

“四嫂子，四嫂子，你回来了，孩子都好！老四事情才听大伯伯说起，人已死了，不要难过！这是张家的大不幸，世界就是这样子，走顺路，顺水行船，走逆路，逆水上滩，一不小心就会翻。鼎和为人直性，不识大势，有理想，少顾忌，一生革命，不屈服，牺牲了，已成了烈士，成仁成义，自有历史证明。社会是这样坏，还有几个孩子。我听到你哭声，真难受！兄弟骨肉心连心，一枝折来一枝伤，唉唉，真是从何说起！不要难受，孩子将来我们总会想办法，不能让他们……”

说了一套不三不四假情假义话后，又要人送茶水，问还缺少什么，要什么，只管和三嫂子说。其实话语中却一面像是在说：

“老四平时和我作对，有什么好处？为人野心大，想造反，夺江山称王作霸，闹得个圩子里鸡犬也不安宁。这一下子可好了，天下太平！”

话说得越殷勤，那些毒心和得意处，都不免自然而然流露到神情上来。但是口中又说：

“有三七白药，治跌打损伤，可和酒吃。”回去找了半天，找了一点点送来。四嫂当时就极恨他，丝毫不感谢他，可是却无从翻脸，只说什么都不要。要以瑞拿回去，说：

“不用这个，三爷留作别的时候用吧。”

“哼，哼，小土匪，不知好歹。……”

后来把送孩子一盒饼干，也要以瑛送回去，说：

“请大伯留着自己吃。这里有吃的。”

以瑛跑去放到堂屋方桌上，叫声：“三伯伯，饼干还你。”就跑走了。

既回来住，自然还是同老公公同火吃饭。每上桌子，一面吃饭一面不免伤心流泪。老太太望着几个孙子，也只有流泪。

为几个孩子赶做孝鞋，在房中小油灯下一面做鞋，一面望到瘦瘦的以瑛帮同填鞋面，心中酸楚，“以瑛，你可要为你爹争一口气！”

因为腰腿还极痛，有些地方瘀紫了一大片。亏守仓的老×懂得些草方子，十分热心为找了些草药和老糟来，一同煮热用布包好敷上，冷了又再煮重敷。痛才稍好一些。

鼎和平时和他们感情极好。多以为四老板为人随和，不拿架子，并且关心他们家里大小过日子事情。现在死了，也是为他们才被那些做官的害死的。都对长房的耸和静和不满，因为凡是他们作的坏事都明白清楚。可是生活在人名下，受制服，说不出话，翻不起身。对以瑛等同情，即时常主动的来帮忙。

老公公一面有舐犊之爱，心怀悲痛，对孩子们表示怜悯，一面却照张家族中老规矩，以为年轻寡妇若无嗜好，夜长梦多，长此下去，将会胡思乱想出毛病。因为姨太太吸烟，也借故说烟可止痛，故意要姨太太来极力劝吸一两口烟。每天都做得十分殷勤。事实上只是那个老政策，让她慢慢把烟吸上了瘾，如同老×房赵婶子，新×房王家×嫂办法，诱上了瘾，一天离不了烟，还算是防患未然，为张家族里完成了一

件功德，办了件对得起祖宗的好事。见她不肯吸烟，就骂说：

“不识好坏的东西，还想做土匪婆子。”

一个圩子三个大圩子里，一面是悲痛无告，另一面三房子弟们却还是赌兴极豪，简直像长远在过元宵节情形。嫌麻将太慢，只能磨手，不够热闹，还限制人数，所以一到夜里必玩天九牌，轮流作庄，汽油灯嗞嗞作响，亮得和大白天一样。赢了的白天作东，烤猪杀鹅，猜拳行令。仿佛对南院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关。

也背地下悄悄议论，总结下来，却不外一句话：“想造反，孽由自作。”

孩子们穿了孝鞋，走出圩子外老农××家去要药，那些叔伯辈见到时，也不理会，只作为不曾见到。背后心中却想骂骂：

“报应，父亲作孽，造反，自讨死，孩子也跟着活受罪。”

唯一有情有义的，还是那些做田的，知道四老板出了事，不幸死了，剩下一堆孩子，年纪都小，亏四少奶奶一手巴下来，常送些鸡蛋来给孩子。

四嫂每到早上，即一面做事一面哭骂，有意让上房一些人听着，以为人死了孤儿寡妇还被人欺负，不许进圩子老家，不许葬祖坟地方。聋大伯伯父子听着心烦，却只作为东风马耳不曾听到一样。心想“族里祸根已除，天下太平。你个坐过牢吃过官司的无知妇人，即再横霸些，也不会再来圩子造反。你爱咒骂，就听你骂去，横顺死的已死，是自讨的。冤有头，债有主，你有本事你就跑到南京总统府门前去骂蒋介石好！”父子谈起院子里的新的声音问题时，反而互相用得意宽容口气说：

“男不与女斗，倒像我们是蒋委员长的替身！才真是去阎王殿找上药王宫！”

老的还下令圩中，坚决不许棺柩抬进圩子。谁作谁就会挨打。

下

（九月廿一—廿一）

老六枢和从济南回合肥，照例由南京坐船从安庆转车。到安庆后，还是照老规矩在中和店落脚。那相熟多年茶房，为打开了卧房，见他随身还带了大小篾篓子，什么干的湿的一大堆。而且神气泰然，一抹完脸，赶即打开个小篓子荷叶包，取出一只小薰鸡出来吃。还举起两个手指，意思是来个青梅二两。料想到这位大少爷一定只注意到沿途路上土产，可不注意到起岸后城门旁的告示，还不知道家中出了什么事情。因一面抹抹桌上灰尘，随口攀话：

“六老板，你是放假回家吗？这是南京盐水鸭，徐州薰鸡，浦口……那是……”

“……”时正在撕下薰鸡腿往口里送，口中嗯嗯噜噜的，微微点头。额角上还冒着点汗。

“南京报上有什么新闻？我们会不会和日本鬼子打仗？”

“天下太平，打什么仗？只听人说南京那些做官的，每到星期六，就坐特别快车去上海开旅馆，跳舞跑狗，玩个痛快，赶星期天晚车回南京，一睡天亮，到地刚好坐小汽车上班。亏得路局那些办事的用心，把时间安排得那么巧！大报小报都是那么说的！嘿，嘿，这些做官的！”语意近于双关，有褒贬，却也乐意坐坐那种车子。

“做官的，就是会吃会玩，别的事可不管。我们这里也

……”茶房也若有褒贬，却厌恶多于羡企。

“安庆近来怎么样？”用手作成烟枪式，放在嘴边示意，“你们有这个店里可还公开？云土、川土？”

因为这个大少爷那么颟顸，使得茶房想起四老板的平时为人义气处。两相对照起来，不免对死去的有些感情，却对面前的一位有些轻视，心中话憋不住了，于是开门见山的说：

“六老板，你家出了事情，可知道？”

“出了什么事情？”

“四老板前不多几天，在这里东门外被警备司令部毙了！说是闹共产，带了乡下人一道革命什么的。”

“什么，你说我家老四吧！打完蛋了？”

“正是，他完了。《安庆日报》上说是共产党，回合肥去组织暴动。还听说有个什么姓金姓王女土匪，搭在一伙。他原住在我们这边，后来搬到×门里去，在那边被探子探出来，入了网。……有人还说你家四嫂子也被捉去，不肯招供，打得个不成人样子……”

先还正在品味到薰鸡的美味，正等待举起两个手指得到的应有反应，听到这些话后，不免愣住了。痴了一会，才哎呀一声不好了，即忙匆匆跑上了街，在一个停止营业的当铺高墙边，果然一举眼就看到一张雨淋过的大布告，只看到用朱檀的“共匪张……”几个大字，即知道茶房话有因由，不是胡说了。即忙赶到裴家公馆里去，查问情形。裴太太见他气急败坏神气而来，就明白一定知道这个不幸消息了，只说：

“六哥，你是从山东回来了呀，慢了一脚，你四哥……”就说不下去了，抽手绢拭泪。

“大姐大姐，我听人说四哥为人害了，是当真事情了吧。

四嫂子怎么样？”一面说，一面即情不自禁大哭泣起来。

裴太太心想：“你这人才真没有用处！活得那么软巴巴的，那像个男子汉？还不如你那哥哥到死还硬扎不低头！”

于是在客屋中坐下来，谈叙事件经过的种种。因为听说是裴太太为亲自带人去装殓的，六爷又涕泪纵横，连忙照老规矩代表家里人扑通跪到面前，连磕了三个响头道谢，总算是新旧礼节都懂！裴太太连忙把他扶起：

“六哥六哥，快不要这样。自己亲戚事情，那要什么谢？遇到这种大不幸，大家都难过。事情来得突然，你娘又回圩子里去了，张家无一个亲人在场，你裴姐夫又因公早过湖南有事去了，我只有来尽点责任，办办后事。你四哥平生为人，你都知道，总是凡事好强，闹革命就要闹到底。亲戚中过去只你裴姐夫还可和他谈谈问题，但好话也难入耳。也不看水势风势，只管张起帆往前撞。你四嫂子又劝不住，亲戚中隔一层，自然更难说了。平时又爱闹男女关系，总说是同在一道干革命，不是别的。这回却上了坏女人的当，自己吃了亏不算，还连累到你四嫂子，也从合肥捉到安庆来，关了好久，过了许多次堂，被那些坏官折磨拷打得不成个人相，手脚都快弄断了，整得好苦！逼不出供，丢在牢里等死。亏得这里还有些熟人，凭两指大脸面，请了几桌酒，为担保说情，才不致同归于尽！现在已经带孩子到了圩子里，昨天还有信来，商量盘你四哥寿材回去。圩子里明后天就会派人来。你这次来得正好，四哥灵柩回去也有个亲人相伴！死的已经死了，不要空难过，应办事情大家商量商量看。你爹娘也到了年纪，小的又小，一家全靠你撑持！我想你在这里住两天，等等圩子里来人再说。依我看，天气大热，死了的落土为安，还得

你劝劝四嫂子，事情看开一点！……还有那大堆儿女，要活下去。唉，四嫂子才真正命苦！”

“四哥还留下什么话没有？”

“就只那天送来个字条条，像是出监前临时写的。我已经把它寄到圩子里你娘老子处去了。你四哥为人性子强，总不肯向官低头。本来在法院审判时，那边司法官是裴姐夫熟人，一再开导他，只要肯自首悔过，承认××，就可望想办法，从轻减刑。他可不答应，说没有什么可自首。后来调过警备司令部，军法会审，还要你娘亲自到监牢里去劝他两回，好话说尽了头，也不理你老娘。一中校长吴道明大哥，也为他热心奔走各处，都说只要自首，就有希望。吴大哥还亲自跑到监里去告他、劝他，总是一个不理会。还把正在牢里写的上老蒋万言书念给吴大哥听，骂老蒋不爱国，把华北大片土地拱手送人。在南京，也凡事依赖美国。做官的带兵的都只会误国殃民，那像个国家政府？吴大哥劝他，矮檐下且低低头，将来爱国，还有的是机会。他就说干革命抗日救国，怎么低头？你个蒋介石杀了万万千千年青人，饿死了万万千千老百姓，我们说说你，难道就是犯罪？你说我张鼎和是共产党，要造你的反，打倒你，国家才得救，事情就是这样子。你要杀就杀，我没有什么可悔过自新处。说悔过自新，应当是你蒋介石，和手下一群又坏又不中用的狐群狗党、贪官污吏，向全中国人民悔过自新。你们这些人，只是为极少数私人权利，打了十几年内战，把中国弄得个民不聊生。让日本人占领了全个华北，只装作不知道一样，还向日本军人讲友好亲善。压迫学生，连‘抗日’两个字说来也算犯罪。北方丢了，南方又都巴靠美国混下去，预备一切送给美国。你们

做官的只要稍微有点做个中国人的良心，试想想看，被你们关在监牢里被拷打逼供的，胡里胡涂判死刑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你们对，还是他们对？吴大哥，你是开明文化人，难道做校长也预备训练亡国奴？话封住了吴大哥嘴皮，开口不得。每次会审过堂，他就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乘机说出他脑子里这些意见，教育那些穿得整整齐齐参加会审的军法官一大顿。尽管上面把惊堂木拍得吧吧的响，并大骂强霸胡说。押他的兵士，用枪托子筑他倒到地上，还用皮靴踢他，使得满门是血，过一会儿还是挣扎爬了起来，狠狠的冷笑着说，你们这些东西，就只会这样作威作福，糟蹋中国好人，见了鬼子，不是跑就是下跪！为什么不去和日本鬼子拼！……使得每次过堂，都毫无结果。一再拷问他，要他招出组织名单，还是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横顺我落在你们手里，你们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说我造反，说我卖国，都成。总而言之，抗日反帝没有罪。你们这些坏人要完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会成功。……”

裴太太还复述吴校长从军法处听来的话：

“一直到最后一堂，宣布南京电令张某某……应予明正典刑，上了绑，你四哥还满不在意的说：‘你绑我再紧些，有什么用处？绑得住我身体，可绑不住我的信心。绑不住千万有做人良心的中国人！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到了东门外空地上，知道离那不远了，就说：‘弟兄们，要干就在这里干吧。不用客气。你们都是让蒋介石这个大卖国贼唬着，以为饭碗是他给的，害怕他！共产党可不怕他。一定要打倒这个大卖国贼，中国才会好，老百姓才会翻过身来当家作主，你们也才会站起来。……’那时开始落行雨，雨越落越大。他还一

面唱国际歌，一面大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时，向后仰身躺下去，口中喷出血来，还像是有未说完的话要说，随后又补了一枪，才断了气。”……

六爷听来，先还精力集中，到后却像谈的仿佛只是别的什么人很久以前的故事，并不是自己亲兄弟骨肉的问题。只痴痴呆呆的坐在那里。裴太太发现这种情形时，才转口问：

“六哥，你可吃过了午饭？怕是饿了吧。”忙要人叫两碗面来吃吃。问问女帮工刘妈，才知道面担子早过去了。随即拿了一大盘西式杂点心出来。先还有些客气，不大好意思，随后口一吃开，几几乎把那盘洋点心通吃光了。事情总算问清楚了，因此想到天气热得难受，从徐州、南京沿路带回的那大包小包东西，不小心怕会闷坏。于是又说了些道谢套话，辞了裴太太，依旧匆忙回到中和客店去，等待圩子里来人。

第二天，圩子里果然派了个专跑城里办事的佃农来了，还带了一笔钱，一封老爹爹写给裴家道谢的信。在客店里先见到六爷，事情有个商量处，自然心中更落实了些。两人因此先买了些香酒，到东门外停柩处去吊奠一下，才同到裴家去，商量起运办法。

因为包租汽车价钱太贵，借建设厅水利局卡车也有不便处，倒不如包只篷船，由水路运××，再起旱，虽慢些，三几天还是即可到圩子。办法这么决定后，自然又分头忙了一阵，还幸得裴家有个当差的熟习规矩，还陪六爷到附近警察局，花了点钱打背手，请了个起运证明护照。又拿了水利局长片子，去水码头找管事的租船。总算第二天就上了包定的船。又照规矩请道士作法，棺材头蹲了只雄鸡，代表煞神。另外装了一碗米，煎了个鸡蛋覆在米上，压了一串纸钱，插

了个黄纸作的小心引路幡，免得亡魂失道。焚了柱香，放了挂百子鞭炮，才开船沿着×水上行，直向目的地驶去。

这一切也亏得是那个王四为办妥的。所以按规矩六爷开船前，在岸边也代表家属和死人，向王四磕了个头道谢。还预备送五块法币，请王四吃杯酒，王四却推开了这个，拔脚走了。

到得××时，六爷就打发家里来的那个人，带了路上采购的土产，先回圩子去报信，估定当天下午必可到达。圩子里人不多久自然通通就知道了。老三静和暗地里即告身边心腹赵四，万一四奶奶闹着要抬进圩子，就如此这般的阻住，再听命令行事。因为前几天听过许多咒骂，还怕临时出事。布置好后却装作有事要到局里开会，备上马带着四个局丁走到集镇上土娼家胡闹去了。

这里×房得到消息，两个老的和四嫂自然又哭了起来。四嫂赶忙为孩子们戴上孝，带着几个孩子，大的拖着，小的背着，还带了些香纸，一同赶到三里外岔路口小亭子边去接灵。天气极热。小孩子全是痱子。母亲还一瘸一拐的，上下小坡时腰膝还刺痛，手也还未好，几个指头还青肿。

除了母子几人外，便只有圩子里两个……跟着前去。别的亲人如三房、五房、平时本来还比较亲密的，也若不曾知道有这回事。有几个小孩子在圩子濠边钓蛤蟆，想跟着去，也被家中人借犯煞叫回去了。这些事情都是三爷静和早布置好了的，母子却一点不知道。当时悲痛至极，也料想不到还有这些人事机关安排。

到不多久，只见远远的×个力夫，抬着一付白木寿材来了。母子们一齐哭号着迎着跑去。小毛本来还一无所知，因见母亲哥哥姐姐全大哭着，也随着大哭起来。

棺木停到亭子里歇下来时，母子围着棺凄凄惨惨哭了好一会。才拭泪问六爷安庆方面诸事。并告六爷聋大伯伯已下过命令，不许棺材进圩子，只好先运到圩子外三里远××那个山冈上去，再想办法。明白这边办法后，六爷即借故得先去看看爹娘，禀告一切，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安慰话后，就独自匆匆赶回圩子老家去了。

这一边因天气已不怎么早，抬寿材的出力人事情作完还得赶回××镇，所以在亭子里吸了回烟，用手掬喝了点山沟水，就照预定计划，抬棺木走小路岔过那个田坝子上山。以瑞是长子，拿着那个小小纸幡在棺前带路。起动时，还照规矩叫了三声爸爸，“望安心上路！”一面叫一面大小又都哭了起来。这个小小行列，于是沿着小路，直向目的地走去。

这里离圩子已约有三里路远近，一带小山坡原来通属圩子里老×房公共产业，山上是一片供柴火使用的杂木林子，附近不多远只有五六户种田佃户茅草房子，住了十几个穷人。先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到后明白是四老板的丧事了，有的过去参加过光蛋会，听过四老板说话，抢三河镇时还分过一箩米，懂得一点革命道理，明白这次四老板的死去，也和他们翻身做人有关系，是被那些坏人坏官害的。都赶来帮忙，又还扛了几条长板凳，送了些茶水来给几个抬棺材的。乡下人口钝，不会说话，对母子虽充满了深刻感情，可不知如何启齿。

把棺材搁定后，几个出力人因为赶路，接了钱，说了几句话走了。天气已快傍晚了，母子都坐守到棺材前，作母亲的想起过去和目前的遭遇，对未来的责任，家庭的情况，又悲从中来，几天来声音本已哭哑，不免干号着。

一个曾参加过光蛋会的贫农，跟过四×……这时才结结巴巴的劝说：

"四少奶奶，听我说，你不要难过了。四老板是个好脚色。一生为人正派，闹革命，都是为我们穷人。往常和我们说道理，在一起搞××，我们懂得他好处！他早就说过，……已经死了好多人，都是为我们翻身！还要大伙儿肯参加，不怕死，才会成功。现在他又为我们死了。事情没有完！这几个小的，要你盘养大起来！……你哭四老板更不安心！事情完了你们回去吧。这里离我们家近，我们每天会来看看他！"

另外几个农民也说："我们在这里不怕什么。要栽点树，明天大家就搬几兜杉树来。"

本来四嫂打量在旁边搭个小茅棚守孝，经过这些人一劝，才放弃了这个打算，谢了谢大家帮忙好意，母子们回转圩子了。到住处时已经夜了。

此后七七四十九天，每天不是母亲背了顶小孩子，拖了四毛，来守在棺前陪伴死去的，就是大孩子姊弟二人来陪伴。附近农民第二天果然就移了好些树来。又担心孩子们在毒日头下尽晒，不是个事情，还是在棺旁为搭了个小棚子，垫了好些稻草，让母子们免去日晒雨淋。还经常送水来，送些包谷杆来给母子解渴。真应了旧话说的雪里送炭，使得母子感到……。

（九月廿一——廿二）

当地烟酒屠宰两税，因人事位置，有意分开，各有分工。

小地方烟酒局，正规收人数字不怎么多，惟范围却比屠宰税管得大。屠宰税一个县城里有一定数量，除逢年过节，

城乡金融特别活跃，有较大出入。经常四城和河边两个菜市，杀猪宰羊总共不过十来只。本地照规矩虽不得宰杀耕牛，却可到局里报瘟病，请求发个证明，再在稽查处打个背拱，塞两块钱，就可以百无禁忌，动手开刀。卫生局有名无实，也得照例检验，还是一种过门，塞点钱，即无妨碍。鸡鸭另自设行，几个酒食馆杀鸡宰鸭，却不入屠宰局范围之列。所以屠宰税是出包制度，由私人经营，按定额半年一包，每月分别缴款。承包的油水有限。而且事情自然还并不那么简单，譬如驻防保安队每星期要打牙祭，或开条子发官价委托局里办，县里有势力的人借故办什么席招待外来尊贵客人，或打条子向局里请设法，或直接从屠桌边打主意记一笔账，这笔不定量开支，也必然得加到包额赢余内填补。好在承包的照例不是县长亲戚，就是商会会长的舅爷表兄弟，结果这些需索自然还是转嫁到屠户老板头上。屠户又想办法在秤杆上做点小手脚，积少成多，把它转嫁到购户头上去。特别是生意人眼睛透亮，知见机行事。如和什么衙门中公役差弁做买卖，绝不敢得罪，总是不待招呼，就挑好处下刀。末后还常不免饶上条脊髓，或一个枕子骨，一面接钱一面还说：

"副爷，这个拿去熬汤吧，放到黄豆芽里，抵二两新鲜腰门肉！"

秤上把戏总是对乡下进城的人玩的。咔嚓一刀切下一斤半，故意把秤锤扬得高高的，乡下人口中虽尽说：

"老板，你手难道就那么准，狠一刀下去不多不少，恰恰合适？"

"不信你看，旺得多，老主顾，不好意思多要你钱，做赔本生意，你还说！"乡下人心实，只因为眼看秤杆子一头昂得高高的，

自然心满意足的走了。也有那种自己腰里别了支秤上城来的,不管买什么,都要过手告告秤的,到后还是会满意而去。因为乡下人欢喜肋条肉,一刀扎下去骨头可多可少,大老板只要手扣得稳,总是恰到好处,表面上还多个一二两。乡下人若嫌骨头多肉少,这一位老板照例会做成笑眯眯的说:

“大嫂子,老大伯,都是老主顾,不能尽挑精捡肥。猪不生骨头怎么能走路?是天生的,这不能怪我,贴骨肉又糯又浓,好肉总是有骨头的!”一个乡下人那辩得过城里市侩?所以即或上了当,也还是笑笑走去。

屠宰税到逢年过节,也会有屠户发生漏税,以多报少的事情。却只好了那些负有专责的稽查。因为只有稽查懂问题,明白究竟,到地一望而知。看出了问题,却一句话不说,只把手做个姿势,正和世界语一样,彼此都懂,笑笑走去,一会儿自会有人送关节上门,请求凡事包涵。于是稽查又提出收人一小部分,买了点节令性的酒食糖果,香烟板鸭,送到局长公馆里去,给太太少爷拜节。仿佛连环套,一环扣着一环,彼此谐和皆大欢喜。吃亏的全是乡下人。

烟酒税情形比屠宰复杂得多。酒的问题倒简单,因为种类不多。地方太小,外来洋酒消费数额有限。天主堂洋人还经常运来大箱大箱什么红白葡萄,白兰地,即眼见起运,也不能过问,做官的都怕洋人写信到省里,说“这是外交问题”。如信上再略微捎带一两句本县大小官吏营私舞弊情形,可受不了。因此这事你省里的大官既不过问,县里局上自然也不必过问。有时还借故送礼特别需要,花点法币,托人来向神父购买三几瓶,分别享受。作尽坏事的神父,也乐得攀点交情。此外附城二十里四乡均有场期,三五不等,逢场均

有乡下人用马驮子驮了家酿烧酒到场上来零售。有时把酒坛子搁在狗肉摊子边，有时却搁在牛马交易场所附近小饭铺门前。因为照规矩，作成一笔交易后，彼此双方都有喝一杯润润嗓子的习惯，也可见在这个场上讲生意时非大叫大嚷不可。也有由争吵而忽然动起武来，双方把人家货摊子上扁担夺在手里，在闹嚷嚷人丛中对劈起来的事情。结果还是吃酒和解。酒的消耗总起来说比城里大。烟酒局稽查，照例在场集上的活动也就比较多些。不仅在查税时可以上下其手，以多报少，还照例到处有人请客，吃得酒醉饭饱，醉醺醺的回去。所以很多稽查都是红鼻子，为的是好好一个鼻子被四乡烧酒糟透了。这类差事引起人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

本县烟事就更加复杂。县长自兼禁烟督办，却和县长夫人整夜靠灯打靶。与同事说笑，自己和衙门中办事的总起来，也算得是一支不大不小的武装队伍。虽出身师范，转入法律速成学堂，可是除刮钱什么兴趣都不大。也关心政局时事，只为的是怕省里政局有变化，将直接影响他这顶乌纱帽。而且上任前是花了一笔钱的，不捞回本即垮台可不干。但一个小小县分，有什么油水可刮？个中人通十分明白。照近二十年社会组织，官僚、军人、地主、奸商，相互为用的依存关系，共同用多数农民作为对象竭泽而渔的习惯，就有的是种种办法。表面上一个县长收入，还不敌一个大城市里的高级中学教员，事实上一个县长正如戏文上说的百里小诸侯，为人会夺弄，爪牙又得力，可玩的花样就真多。因为除了可向以下各部门僚属单位搞钱，还可不定时托故向四乡地主、老百姓及城中商会各店户等等搞钱。譬如带三几个县警备队下乡出巡，对于乡下就是一种灾难。在城中则由公事名分的开

清剿会议，到私人名分的为老太爷、太太做阴阳寿，帖子一发出去，都可以捞一笔数目。此外更重要一项收入，即打官司说人情和烟酒税中有关“烟”的部分，花样多，出息大。照一县说来，做局长官虽不大却是“肥缺”。所以做局长也就特别显得勤快，办事比别的人热心得多。

只因为新乡县长北伐时曾经在四老爷骑兵旅作过半年军法，且经四爷保任过一回县长，又因听说那时三爷在开封只作一年烟酒局长，即找了四五万块钱，在北京买了新房子什么不用愁。这边老爹爹着实羡慕做烟酒局长。且知道人上了年纪，谋县缺已不大好办，不如在百里小诸侯下边搞搞局缺，打算倒比较实际。在圩子里适因四爷回来，顺口说起周某新任湖南新乡县篆，即托四爷特别发了个电报并亲笔写了个信，为老爹谋这个差事。老上司的介绍，不能不在意。且因在上次县长任内为贪污事被查办时，还得四爷为写信给省里讲情，正要报答。于是电邀老爹同去。因此×月里，老爹即和家中大小，到了新乡，接办县烟酒税局。

××也一道同去，父子都各有打算。老爹希望的只是找点钱，转回圩子过一二年旧生活。××却估计到这个地区，一定还可以作点事情。更主要自然还是弄笔钱，买几支盒子，回乡重组光蛋会，和其他地区相互响应，发展组织。因为明白家乡老窝比别的地区条件好，有活动余地。发动农民也较有把握。所以同是弄钱，却各有目的。因此最先即怂恿父亲运动这件差事，到事情弄妥后，又决定自己也跟着去，好帮同爹爹一手。老父母一面明白在圩子里，不会作好事，还担心会又出乱子。不如调动调动个地方，也许会好一些。另一面自然因去那边做这种差事，如没有几个亲信帮手，如意算

盘也不大好打。因此一经××提出，即取得同意。只说：

“要去做事就好好做事，万莫在那边又出毛病。湖南地方闹革命，马日事变，常听说一县城里出外学生也被杀。再捣乱可不成！”

到了那里，××即任稽查，因为一面容易联系群众，明白问题，一面也因职务关系，可以弄钱。

张鼎和烈士是作者夫人张兆和的堂兄。为创作以他和女儿前仆后继革命生涯的长篇传记体小说，作者1948以前开始从鼎和夫人吴昭毅、长女张以瑛方面收集材料。在长时期中断文学事业后，1960年1月2日复大哥沈云麓信中提到：

“今年工作拟了个计划，请一年创作假，来完成四嫂一家的长篇小说。如批准，即可过宣化、合肥以至昆明各处走几个月，再用半年来用笔。不过就事实需要，有可能先来解决博物馆修改陈列工作一年，对国家或更有益些，写作事且待以后些日子再说。”

其后作者并未脱离原来的博物馆工作，而是间断安排过一些短期创作时间。1960年6月起，作者再次开始收集素材，曾数次去宣化记录吴昭毅、张以瑛的谈话，并从其他方面搜集历史材料，先后积累的笔记资料在十万字以上。但去安徽、昆明等实地体验考察的计划始终未能如愿。

1961年冬，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包括作者在内的一批作家、诗人赴江西各地学习、参观，并提供长住写作的条件。此行中，拟写的这部长篇虽已“充分准备了材料，一切人和事都在头脑中有个比较具体的轮廓，记录也差不多完备，只是不知从何下手……”终未进行。

这部拟作的长篇，目前仅发现作者试笔所写的一些章节，作于1960年9月间，均系初稿，文字中多处显示出尚待推敲、补充、展开的环节。写于9月21～22日的一节，疑为另一章的试笔，但初稿无标题。

现按作者注明的写作日期先后，据初稿整理编人。

青岛游记

一 青岛绿而静

我到了青岛，和卅年前初来时情形一样，青岛依旧绿而静。微风吹拂中面前大海在微微荡动，焦红山石间大片绿树也在微微荡动，一切给我的印象依旧是绿而静。我说的自然只限于自然景物。这并不使我惊奇，却引起我深思。回复到三十年前面临大海对生命存在意义及如何使用长时期的深思。和这一片土地上人民过去半世纪所受苦难屈辱今昔对照而深思。近五十年中国社会人事变化之大，是历史上空前少有的。青岛发展更经过近半世纪中华民族由酣然沉睡到觉醒奋起反帝斗争艰苦历史的全程。青岛的变化是迅速而剧烈的，青岛动荡的幅度比中国任何一个都市其实都大得多。我想且先从个人对于这里自然景物所体会到部分写下去，看看这个绿而静的海滨山岛，给我的究竟是些什么。

初初来到这个地方，我住在山东大学和第一公园之间福山路转角一所房子里，小院中有一大丛珍珠梅开得正十分茂

盛。从楼上窗口望出去，即有一片不同层次的明绿逼近眼底：近处是树木，稍远是大海，更远是天云，几几乎全是绿色。因此卅年来在我记忆和感情中，总忘不了这一树白花和一片明绿。其时公园中加拿大种小叶杨正长日翻动着小小银白叶片，到处有剑兰一簇簇白花，从浓绿剑形叶片中耸起，棣棠花小而黄，更加显得十分妩媚亲人。园林管理处正在计划开辟几条新路供游人散步，准备夹路分别栽种不同花木幼苗，计有海棠、紫薇、银杏、腊梅、木槿、迎春、紫藤……新掘好的土坑充满了一种泥土和腐叶混合的香味。现在看看，银杏路的银杏早已变成大树，有几条较小行人路，花木都交枝连荫，如同长长的绿色甬道。又有些树木且因为枝干过老生虫，管园人正在砍伐供薪炊用。山大文学院同事，连同一次暑期班从北大清华邀来的短期讲学许多熟人，或住到这小楼上，或常到这小楼来谈天的，试屈指数数，大多都已过世，希望在这里找个熟习三十年前青岛的人谈谈旧事，除了到崂山太清宫遇见一个六十三岁的老法师，还记得起好些有关青岛德日前后占领时代人民遭受苦难的事情，和康有为、傅增湘、杨振声等游人的姓名，此外即有中山路一个书店老掌柜，卖了几十年旧书，还知道宋春舫曾经有一楼关于戏剧书籍，如何由聚而散，以及闻一多在山大作文学院长买书旧事，此外即不容易遇到第三个可以谈谈老话的人。可是另外却有一个涵容广大包罗万有十分相熟的旧相识，即面前一碧无际早晚相对的大海。一个从四围是山的小乡城来到三面环海地方的人，初次来到海边所得感受是不可能用文字形容的！我这次也可说正是为要再看看这个大海，和它“温习过去，叙述当前，商量明天”而来的。三十年前约有三年时间它对于我

的教育启发实在太多了!

世界上有万千关于描写刻画海上种种壮丽景色传名千载的诗文、绘画和乐章，都各以个人一时所遇所感来加以表现，加以反映，各自得到不同的成就。我看了三年海，印象总括说来实简单之至，海同样是绿而静。但是它对于我一生的影响，好像十分抽象却又极其现实，即或不能说是根本思想，至少是长远感情。它教育我并启发我一种做人素朴不改和童心永在的生存态度，并让我在和它对面时，从长期沉默里有机会能够充分消化融解过去种种书本知识、社会经验，和生命理想，用一种明确素朴文字重新加以组织排比，转移重现到纸上来，成为种种不同完整美丽的形式，不仅保存了一部分个人生命的青春幻想和一生所经所遇千百种平常人爱恶哀乐思想情感的式样，也因之从而影响到异时异地其他一部分青年生活的取舍，形成我个人近三十年和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为特殊密切，在某种意义上又相当疏远的关系。我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造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三年。

当大暑天外来万千游人齐集海滨时，我却欢喜爬山，一个人各处跑去。正当年纪青腰腿劲健，上下山头总还像行有余力。上到山顶即坐在岩石残垒间看海。它俨然像是我当时真正的师友。因为好些在大革命前即和我从事学习写作关系密切的朋友，都各以不同情形在革命几年中牺牲了，多正当卅来岁盛年却死得极惨。还有几个热情奔放，才华出众的朋友，不死于社会变革却在另外偶然不巧中死去的。这些朋友要做的事业都还正好开始，即被骤然而来的时代风雨，把他们对于社会向前的理想，和个人不同的才智聪明，卷扫摧残，

弄得个无影无踪。我尽管相信，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对于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具有一种传染渗透性能，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舞的。可是照当时实际情形看来，不免令人格外感觉沉重。这些死者除了以不同印象给我给人一种认识，一种鼓舞，生存必须有意义，还有谁知道他们，记忆他们？另外我也邀过好几个搞文学的朋友到青岛来一同爬山看海，却极少提过另外那些死者的死在我生命中引起的沉重意义。同样是从事文学创作，照当时情形，各人的要求和从事这个工作的动力，是来自许多不同方面的。然而随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要求，又似乎有一个总的方向和共同目标，即用文学作工具，来动摇旧的腐朽社会基础，促成历史的局部或全体新陈代谢，万壑争流，各以不同速度奔赴到海！

每到秋冬之际，是青岛天气最好的季节，爱热闹会花钱的游客，多早已离开了这里。惠泉浴场一带已再无一个游人。那个皇冠式屋顶的音乐亭，也再听不到白俄餐馆乐队演奏柴可夫斯基舞曲了。日本妇人的木屐和粉脸也绝了踪。……我能单独接近大海时，照例又总是独自在静静的阳光下沿着浴场沙滩走去，到了尽头还不即转身，居多即翻过炮台前去湛山大路那道山埂子，通过现在的八关路疗养区，原来的一片小松林，一直到太平角石咀子附近才停下来。我觉得，惟有到了这里，大海的脉搏节奏才更加和个人心脏节奏起伏相应。当时八关路一带除了那条直通湛山大路，此外就全是一片低矮的马尾松林，本地人平时不常来，外来游客更较少走得这么远。松林间到处有花草丛生，花草间还随时可见到小小黄麻色野兔奔走跳跃，这些小小可爱动物，事实上就是这地区

的唯一主人。每逢见到生人时，对于陌生拜访者还不知如何正当对待，只充满一种天真的好奇，偏着个小头痴痴的望着，随即似乎才发现这么过分亲近有些不大妥当，于是又高高兴兴在花草间蹦跳蹦跳跑开了。如果被人一追，照例不久必钻人到处可以发现的陶制引水管中去隐藏起来。它如会说话，一定将顽皮地自言自语："好，你有本领你也进来吧。从这头赶来我就从那头跑去，赶不着！我不怕！"这就是这些小小可爱动物的家，到了里边以后即已十分安全，如有同伙就相互挤挨着嚼松子吃，不多一会儿，便把受惊的事情全忘了。

单独面对大海，首先是使人明白个体存在的渺小，和生命能有效使用时间的短暂，以及出于个人任何一种骄傲自大的无意义。由于海给人印象总永远是谦虚而平易的，但是海本身却无为而无不为。其次是回复了些童心幻想，即以我这种拘迂板质中材无学之人而言，仿佛也就聪明朗畅了好些，把"我"从一堆琐琐人事得失爱憎取予束缚中解放开来。对于写作构思布局格外有益。写什么？如何写？试向广和深推扩开去，头绪也像多了好些，照老话说就是"头头是道"。记得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小文章，叙述到个人写作所受教育比较深刻部分时，首先即说起一切大小河流对我生命的影响，而最大影响却是海。一个人有一个人生命的遇合，也从而部分或整个影响或决定他较后一时的工作和发展方向。我虽生长于一个万山环绕的小乡城，从小时起，机会凑巧，却有好些时间是在河边或水上船只木筏上度过的。在一条长近千里的沅水上，约五年中我就坐过好几十种船，换了无数码头，在船上过着种种平常城市里人不易设想的生活，上至军阀政客，下至土匪土娼烟贩以致玩猴儿戏的，相熟过许多我自己也万

想不到的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的人。特别和弄船的吃水上饭的人长时期在一处建立的友谊，真是一分离奇不经的教育。如把社会当成一本大书，一生工作学习主要部分和水就分不开。水的永远流动而不凝固，即告我万事不宜凝固也无从凝固，生命存在另一意义也就和“动”有密切联系。一切外物的动都有个客观原因存在，生命不可思议即主观能有目的有定向而动。海扩大了我的心胸和视野，刺激我在工作上去作横海扬帆的远梦，和通过劳动作成人世间海市蜃楼的重现。不拘泥于个人在世俗事功上的成败打算和一时物质上的得失计较，引起我充满童心幻念，去接受每个新的一天，并充分使用精力到有意义工作上去。当时所谓意义，自然就是照我能做到的理会到的问题去写作，以及如何使写作和社会发展发生应有的联系。

海另外还对我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鼓舞我去追求千百人劳动和智慧结合，积累下来的无穷无尽的各种文化成果，反映到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不同美好结构和造形，让我从其中得到许多力量和知识。海还启发我对于人在不同社会生活中繁复万状的爱恶哀乐情形和彼此关系。这种种看来似虚无飘渺，但转到生活和工作上时，即见出十分现实的意义。特别是能用文字在一定形式中固定下来的，即可望或已经肯定成为另一种现实。另外还有显明支配着我的情感式样或思想方法，反映到后来学习和工作以及对人对事关系上，也是这个大海三年接近的结果。

总之，青岛的海对于我个人的影响是长远而普遍的，比起当时我所读过的其他许多圣经贤传还得益受用。它帮助我消化一切而又通过我个人劳动创造出许多东西。而它支配我

感情且更加巨大。有许多日子，我就是这样俨然一事不作面对大海度过，生命却并不白费。海既教育我思索，也教育我行动。海使我生命逐渐成熟，把个人从事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上去。我现在又来到这个一碧无际的大海边了。我依旧乐意这样面对大海，检查过去，分析当前，商量未来。

北京鼓励我到青岛休息休息的熟人来信问我，到了青岛，旧地重游印象怎么样？心脏好了些没有？回信告给朋友，第一句话即青岛依旧绿而静。并且让朋友知道，到了这里不多久，心脏也一定跳得比较正常了，因为大海的节奏通常总是正常的。海无时不在动，由于它接纳百川，涵容广大，内部生命充实，外缘又常受日月吸引，风云变态，必然会动荡不止。然而它给人总的印象，却依旧是绿而静。名分上我是来休息，事实上我是来学习的。我还有许多事情可作待作，究竟作些什么对人民更有益？必然将在这里得到许多新的启发，新的认识。

二　青岛并不静

从人事上看青岛历史，青岛并不静。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时被压迫得不能静，回到人民自己手中赶建设不需静。

周初太公封于齐，兴鱼盐之利，胶东人民在祖国早期生产发展上，付出的辛勤劳动，对于中原汉文化的促进，无疑即曾起过一定巨大的作用。随后是齐鲁衣冠天下，临淄市租日取千金，车击毂，人摩肩，连袂成帷，挥汗成雨，反映春秋战国以来，丝织生产跃进和商业贸易发展，为同时诸邦国所望尘莫及。即墨刀规制的完整，在中国古代货币中为独出，

也间接证明物资底子扎实，货币信用亦格外可靠。而海上方士必称来自燕齐，可知早期对外文化交流，科技发明，这部分知识的取得、传播，和胶东沿海人民的勤劳勇敢也十分密切。元、明、清建都北京，军粮民食均仰给南方，元海运到每年三百六十万石，明洪武初犹有七十万石济辽东军粮，南海蕃贡也必经过胶澳，海港口外小岛星罗棋布，实为南北航海粮船避风取水的福星。至于由田横到唐赛儿，历史上一系列纪录，又都和胶东人民反封建专制暴政斗争分不开。从历史人事上看，青岛是长远在动中，它并不静。

由于天时良好，地利丰盛，人性朴质，人民在任何历史阶段困难情形下，总能创造奇迹，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总的进展作出不同贡献！它的今天的存在和发展，即和过去历史实一脉相承，不能完全分割。惟有十分具体认识青岛人民历史上的过去的成就和贡献，灾难和屈辱，才会更正确的赞美当前的幸福，并估计未来的繁荣。特别是近百年青岛的历史，是如何在世界历史剧烈变化尖锐矛盾中而生长起来的。约有半世纪之久，在国际关系位置上，它是长远在被无数现代海盗注目中一片大好河山，轮流转手了三四次，最后终于才由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夺回到人民手中的！如不明白这点过去，青岛的房屋、工厂、海港，便都像是海市蜃楼一样凭空而来了。“但使居者逸，无忘作者劳。”青岛的可爱可念，还不仅仅是一个“劳”字所能概括啊！认识得多一些，也才能够深一层来爱这个地方，并好好保护建设这个地方！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已进人垄断资本帝国主义，部分地区殖民地分割已成定局，单纯资源掠夺和本国机制品向外倾销，

已不能满足欲望，还想更进一步，在世界上各处伸展出它那个烙有现代海盗印记的毛手，争夺新的土地，干出它血淋淋的人吃人野心扩张事业。对于中国，先还震于十八世纪的国际威风，不敢冒进，到鸦片战争以后，明白这个统治上层完全是个空架子，而且地方大，人口多，物资取之不尽，因此在中国竞先下注，到处遇事生风，便于进一步豪夺巧取。各个帝国主义者间彼此虽矛盾重重，却同样妄想由蚕食进而瓜分。侵略办法虽也小有差别，而阴险、残忍、贪婪、野蛮，以及进行侵略基本手段，却差不多完全一样。先是用自由传教为名，进行有计划有目的间谍侦查，并包庇坏人，制造洋奴。其次即请求自由贸易，指定港口，便于商船停泊做生意，或上水加煤。再其次即故意利用一些小小事故，挑起民愤，彼即借口保侨为名，派军舰武装登陆，进行武力强占，再进而诱迫签订一个条约，把基地巩固下来。于是利用租借地各种特权，贩毒物、军火，办空头银行吸收中国官僚、军阀、地主存款，又用这笔钱来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开内销的纱布厂、丝绸厂、纸烟厂，及外销的各种原料加工厂，并把各种重要原料土产用极低廉价格收买运出去，却把本国多余机制品和各种消费品运进来，并用租界作根据地向内地倾销。同时又把军火掮客推荐作军阀顾问，便于推销战后过时军火，售卖给中国军阀和土匪，增加中国大小军阀的割据和长时期内战混乱。于是更扩大租界势力范围，抬高地皮价钱，收容下野的军阀，逃难的地主，让他们在建筑上投资。并培植买办、流氓，开办各种骗人的洋行，及各种下流娱乐场所，各种各式的赌场、淫乐场，和千百种消费场所，来吮吸中国人民的金钱，消耗中国人民的精力，毒化中

国人民的灵魂，堕落中国人民的志气，从而造成万千帝国主义者流氓白手成家的豪富。每当中国革命反帝进行到某一重要阶段，影响到他们的势力时，帝国主义者又即分别各派大量军舰出来干涉，或插手其间，和反动派合作，来镇压消灭革命力量，或引渡租界内革命工作者给反动统治者，进行压制革命的阴谋。凡是每一个过去有过租界的地方，无一不是这样对中国人民做了数不尽的坏事，造了说不完的恶孽。帝国主义者在青岛进行侵略阴谋和扎根得手以后的罪恶行为，和他们在上海、天津、汉口、广东……其他地区完全一样。有一些些和上海天津不同处，即当时德帝国主义者野心特大，不仅把青岛当成经济侵略据点，还同时当成一个海外海军根据地，有机会即将在东亚要更进一步插手。又因为地理条件格外好，还想把它当成各国大流氓、中国买办军阀大地主的避暑游乐区和销金窟，从这方面便于吸取更大的财富。因此住宅建筑在全国租界区算得格外讲究华美。解放前欧洲人称上海为“冒险家乐园”，青岛事实上却是这些现代海盗乐园中的乐园。这里每一所房子的基础，以及建筑用的一切，都可说完全是中国农民和工人的血汗作成的！青岛的繁荣原来就是这样生长起来的。所以青岛建筑有世界各国各时代不同式样，单独从建筑艺术设计加以批判和加以赞美，都接触不着它的本质。如从历史政治角度去注意，却容易明白，它一面实象征帝国主义过去一时在中国的各种不同势力的存在，另一面却也可反映祖国劳动人民在建筑工艺上的不同学习成就。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巧思，不管学什么作什么通能够达到一定水平。由于这些建筑过去虽属帝国主义者所有，建筑由墙基到屋顶，其实全部完成于青岛工人手中。

让我们翻翻近七十年青岛历史大事，会对青岛和人民过去的苦难有深一层认识，同时对于帝国主义者在这一地区所作的罪恶也有深一层切齿愤恨。

光绪十年因中法之战，我国才设海军衙门，购战舰，修海防，当时作中国军事顾问的外国人，同时也就是某一帝国主义的间谍和军火掮客。由于出使大臣许景澄奏议，力言胶澳形势险要，容易被帝国主义者垂涎，请辟为海军军港，以防未然。朱一新也有此议，惟二千多万两海军军费已被挪去修颐和园，事难进行。到十七年五月，李鸿章和山东巡抚张曜才来看看，随后调登州总兵章高元带兵四营驻防，建营房于青岛村天宫后边上，附近有渔村居民三四百户，现在天后太平路一带，即当日渔人泊舟晒网之处。栈桥的部分建筑，就是当时用作海军起运物资筑成的。英舰数来辟暑，俄舰即来辟寒，彼此即各有野心，当仁不让。一八八二德人且利用传教师花之安深入胶东各属，作间谍调查工作，一八九〇于兖州设教堂扎下侵略根基。一八六九既有黎希特霍芬深入调查资源、物产、气候、民情，一八九七以前且累令船队作沿海调查，又派专家佛郎求司作详密调查，巨细不遗，建议且异常详尽，企图先借口停船储煤上水，进一步再进行占据。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号，曹州钜野教案发生，人民打死了两个品质恶劣的德籍传教师，十三号德东洋舰队司令棣利司，即带军舰三艘抵青，假登岸试操为名，上岸后即不再退，并迫我总兵章高元退出。时清政府既不懂外交，又怔怯懦弱，李鸿章虽是个屠杀人民的能干刽子手，办外交却是个惧外媚外无所不至的脓包。因此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即被迫签订胶澳租约条款，让租九十九年，划定地界周围约一百里，统

属德海外领地一部分。于是德帝国主义者志得意满，设总督，辟港湾，做码头，筑炮台，俨然即将永久据为己有。并且照约强迫修筑胶济铁路，便于掠夺山东土产和地下资源。当时还指定沿铁路附近三十里所有矿产开发，也只有德人有权投资，后经力争才取消。因筑路，高密芝兰庄田地洼下，将被水淹，乡民请求修几个涵洞，不仅不允许，德帝国主义者还随即派兵戕杀了平民百多人，到后只花两千元抚恤费了事。我们打死两个传教师，即被迫割让青岛海港及地方百里，他们无故杀死我平民百多人，不过二千元即了事。（比较下，国家那里像个国家，人民又那里还算个人！）铁路于一九〇四通车，从此胶东土产皮革、花生、棉花、烟草、矿砂、食盐、鸡蛋、牛肉……无一不用着一种使人不易相信的廉价，大量被帝国主义强盗抢走。

一九一四帝国主义者间殖民地重分割的欧战兴起，到一九一五，日帝明知在青德军势力单薄，本土战争激烈而又距离过远，不易兼顾，因与德宣战，进占青岛。作为军事占领，连同胶济线也在内。一得手后，即趁此大量移民，由原来六十多人增加到一万多人，侵占土地，扩充经济势力。过不多几年，几几乎一切有利生产企业都被独占。欧战剧烈时，欧洲劳动力格外缺乏，英法帝国主义却想主意在胶东招募华工，骗去华工将近十万人，送到前线去作工，能回来的还不到半数。一九一八年战事终结，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我因为已经参战，代表力争青岛主权，日帝坚不让步，并将一九一五向中国所提廿一条有关山东四条作为借口，一切强占不放手。因之激起五四学生运动，由北京学生打卖国贼火焚赵家楼，

发展而成全国性爱国运动。我代表在和会上拒绝签字。日本还是不退兵。直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青岛才由中日直接交涉收回，改设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但是除还偿日政府四千万元，六七年来军事侵占期间所有在青岛造成的种种经济上特权，却无一不被保留下来，原封不动。凡是可以出口的土产，都被日帝国主义者组织的公司所垄断。凡是地方日用消耗品如火柴、纱布、啤酒，都由外人经营。花生榨油，鸡蛋加工，牛肉出口，无不操纵在外商手中。一个蛋厂每日用蛋由五十万到七十万个，花生榨油一天达数十吨，牛肉一年到五六万头……鸡蛋却只用二毛多一斤去收购，纱厂女工少的一天只值一毛八分钱，童工还减半。一般搬运苦力整整一天劳动才值两角钱。烟叶收价一斤二角三四分，制成的大司令牌却卖二元一听。胶东当时还用铜元，也被日商私购，销成铜块报关运回本国，每年竟达关银六七十万两！入口货奢侈品无所不有，即日常咸菜大根，也成日商市场独占。海上运输除了些山东、宁波、福建小木船，远洋大轮几几乎全在外人手中，而日本占数量也最大。至于贩毒贩军火，更是书不胜书了。收回后的青岛，事实上经济利益还是在日帝手中！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表面上青岛市面一年比一年的繁荣，事实上正反映中国由于外有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内有军阀长期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一年比一年情形严重，而胶东人民在双重压榨中，一年也比一年日子不好过！

根据一九三四年记载，从这个变相半殖民地化特别市假繁荣畸形发展，也可看出抗战前夕国家社会经济的种种面貌。青岛市除了中外资本家有万千所新房子，此外有十五个美国教堂，十四个德国教堂，八个日本教堂。外国饭店四十五，

中国饭店五十四，跳舞场正式开业的廿三处，非正式的不计其数。有跑马场一处。此外还有不易计算具体数目的妓院，和非正式营业的烟馆和吸毒所。……至于学校呢，中学始终只六所，有三所还是教会办来培养工具和洋奴的。因为在这个典型半殖民地化都市里，做生意也得懂点英文、俄文、德文和日本文！当时有个劝业商场，主要铺面均被日商占去，等于推销日货的商场。

青岛并不静！它的畸形繁荣，是奠基在胶东人民凋敝不堪情形上的。青岛市面的活泼，只是一种上层社会透顶糜烂的象征。青岛市的几百个大小工厂——棉纺厂、花生油厂、蛋厂、屠宰厂……整个说来都是外国资本家压榨胶东人民血汗的工具，这类工厂一年比一年增多，中国农村破产也即因之越加迅速而彻底。

九一八后，青岛经常即有日军舰来驻，得到庇护的日本浪人，在青岛更无恶不作。抗战事起，日敌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进人青岛。沦陷八年，人民痛苦就更不待说！

青岛有了新的不静，即周围百里人民对于敌伪的切齿与反抗。从一九四四年青岛市伪组织一本宣扬“政绩”的《四周纪要》小册子，得知这一年派出伪军警出去“讨伐”行动即达一千三百零六回。崂山白云洞原住有六个老道，两个火夫，因为协助人民抗日，把庙宇房子作为贮藏军火和修理兵器的机关，被发现后，那些爱国的出家人，不肯招供出游击队情况，就全体被杀死了。

这两件事乍一看来不会如何引人注意，因为好像并不足动摇当时敌伪的基础丝毫。但试从深远处看，却可看到青岛

人民在敌人屠杀血泊中并不屈服，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人民的任何残酷恐怖政策和怀柔欺骗政策，也无从将人民这点反抗压制下去。为了爱国保乡土，青岛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敌仇恨生长起来了，人民逐渐在觉醒中。凡是在仇恨和觉醒中站了起来的人民，他必然会万流争壑，奔赴向革命人民队伍里去，逐渐形成一支日益庞大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促进一切内外敌人腐朽集团的崩溃，而走向全面胜利。

所以抗战胜利后，青岛虽由国民党派员接收，尽管第一号现代海盗美帝国主义者，又看中了青岛，还梦想作第三位接手人，把青岛变成他的军事基地，和掠夺胶东资源财富并倾销他剩余商品的基地，把青岛用强大军事装备起来。除了四郊周围修筑有无数防御工事，空中还经常有数以百计的大队飞机飞行，海面又还停泊得有航空母舰、潜水艇等等一切现代第一流技术装备的武器，可是丝毫无作用。既不能挽回国民党在胶东军事上的崩溃，也不能免辟青岛陷于完全孤立地位。青岛被人民解放军围困起来，使得这一群野兽无可奈何。到大军渡江以后，终于只有十分狼狈从海上逃走，完成一次侵略完全失败的凯旋，记人世界历史和中国反帝斗争历史中。

真正恢复了青岛应有的人心平静，是解放。

中国再没有一个地方，比青岛对于解放感到是完全两种世界的交替如此深刻如此显明对照了。也可说青岛从此起了更新的一种不静，那就是一切工厂，生产企业和一切建筑，从前属于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军阀买办手中的，现在一律归还到人民手中，成为人民自己的财富时，如何使原有工厂

加以整理扩大，使机器转动得更快更好，生产出更多东西，供国内人民需要或供外销换取祖国工业建设所必需的物资。如何使原有建筑和公园中花木，收拾修整得更美丽一些，好在平时供托儿所万千小朋友游戏，每年夏天接待全国劳模、高干、先进工作者……和兄弟国家专家客人来度过暑天。还有就是更忙着海里富源的开发，盐产鱼产的增加，另外又开辟海带种植场，好支援全国。并加强祖国的海防，准备随时打击至今还未完全死心的现代海盗侵犯。青岛人民首先是工人为了建设一个更符合理想的青岛，待作的工作可够多！五八年大跃进平地起家，青岛人民搞的小洋群，使得青岛从过去无一斤钢的地区，忽然变成年产×万吨钢的工业区，产品除了供应四方机厂造船厂需要外，还能支援本省和外省市工农业建设需要。青岛工人忙得兴奋，也忙得有意义，因为青岛已由一个半世纪来专供帝国主义者剥削压榨胶东人民劳力、掠夺地下地面资源的港口，变成一个参预祖国建设，加速祖国工业化、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港口。而青岛的美丽建筑，无疑也将因为人民的努力，和国家的需要，将在更新计划中逐渐增加，并扩大范围。青岛明天不仅是一个全国有名工业区，同时也必然会成为世界一个有名美丽避暑名胜区。

青岛在飞跃进展，青岛不需静！

在德日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政权控制下时代，前后约六十年之久，青岛关于文化教育长远只有六个中学，三个还是德美教会办的。解放十年来，却有了三十五个中学，仅仅从这一点来看青岛教育文化事业上的跃进，我们也就可以明白青岛到了人民自己手中，凡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文化发展迅速是如何情形了。

过去人谈起世界名胜时，常说："青岛是东方的瑞士。"这种比方过二十年后，将必然会要调转来，即"瑞士好像西方的青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长在这个制度下人民的高度政治觉悟心和建设热情，以及胶东地面、地下、海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物产，三者结合，无疑在极短时期即将发展得远远超过瑞士，为瑞士所望尘莫及。即目前仅初具规模的钟表工业，以青岛工人手艺者巧，钻研热情之高，也会将在不多久时期，在国内外即将享有盛名。

近一世纪来，青岛在帝国主义手中时，被压迫得不能静。自从解放，一切归还到人民自己时，为着忙于加速建设也不需静。但这是两种多么不同的情形！

青岛市解放后由五一到五六年，就建设了约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新建筑，其中约六十万米属于工人住宅。休养区更建设了大量新的第一流设备疗养所，公园附近许多皇宫般讲究大房子，都成了本市职工托儿所，公园中的大草坪、动物园、花棚，即等于专为这些孩子们而设的。任何人来到这里，都不免歆羡青岛的一切，并觉得托儿所小朋友格外幸运。但似乎还有一个建筑计划在适当时候待进行，即一所"青岛历史博物馆"。将近百年帝国主义者在这片土地上的野蛮残暴、穷凶极恶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迫害人民的行为，和其他种种事实，以及主要建设者——劳动人民对于青岛的贡献，和在两个时代不同情况，不同的努力成就，加以具体表现和详细说明，用来教育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非及拉丁美洲各民族正在反帝反封建争取独立自由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会得极多启发和鼓舞。由于帝国殖民主义在世界上还存在，在中国的势力虽被人民的扫帚扫除了，在其他许多

国度里，却依旧还在进行奴役迫害和直接屠杀。反帝斗争也日益激烈普遍。特别是其中一个最善于伪装自由和平而事实上却最阴险毒辣，贪得无厌，而又极端狂妄自大目下头一号帝国主义——美帝，在世界上到处明目张胆的杀人放火，并进行万千种阴谋，在某些方面又还能引起我们邻近某些国家的民族败类蟊贼的幻想，或趁势分润一些唾余，或梦想依附它来恢复军国主义复燃的死灰。有这么一个专为揭示帝国殖民主义过去目前罪恶及种种阴谋的博物馆，对于今后全世界反帝的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都必然能起积极鼓舞作用。由此能够更好的团结起来，加强完全打败这个最后海盗的信心！

古巴卡斯特罗总理在六一年七月廿六在哈瓦那对群众说的极好：“帝国主义者是全世界一切剥削者、叛徒、殖民主义者和罪犯的保护者和庇护者。是以拉丁美洲人民、非洲人民、亚洲人民、西班牙人民和美洲黑人的鲜血进行交易和谋利的帝国主义海盗。”必需打倒这个海盗，世界才会得到合理正常的发展，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与和平！

八月一日青岛

三 记实——看海、看山、看市容

每个地方总有些名胜古迹，或和历史人物故事有关，或属于艺术风景性质，古代方志书里，就多特别列出一个项目，附上些前贤诗文，便于后人观赏。最著名的是“潇湘八景”和“西湖十景”。事实上潇湘八景中除了琴曲名目中的《潇湘水云》或《平沙落雁》，音乐爱好者还知道点来历，此外大致

就很少有人注意了。西湖十景却直到现在还对于玩西湖的人具指导作用。不过就中如“雷峰夕照”，原来大塔业已圮坍了四十年，不过因为戏曲中白娘娘许仙故事流传扮演，有个雷峰塔深入人心，此外试问问住在本地附近的人，“雷峰夕照”如何动人，他大致也说不出，只能用微笑相对，“到西湖来你会玩，正好各处跑去，不必问得这么傻！”可见八景十景通过了时，逛西湖也不能凭它作指南导游用了。

青岛同样有个十景名目，还保留在五八年出版的导游手册中，数字虽过了时，游玩的方法还是可以根据这个小册子得到许多便利。特别是如有机会玩崂山，照说明经济便利得多。这是一本编得简而扼要，有思想也还有艺术的小书，值得翻翻看。听说更新的手册已在编辑，不久即可出版。我却想试谈谈个人三十年前和这一回各处跑去的一点零碎印象。

由务实出发，大约可以从三个方面欣赏青岛，容易得到个比较概括的印象：一是看海上风景，二是看山中景色，三是看市容和人的活动。

看海有三种办法，六个内容，给我个人印象较深刻。

第一种是历史地看海方法。不妨到帆船集中的小港去看看。因为到了那里，就可以见到长年在海面活动的千百只小渔船及其他沿海运输帆船的情形。这些船只是从太公封于齐兴鱼盐之利，或更早得多的时期就已存在的。很多船只都还按照一种古代传统习惯，作成海鱼样子，船头两舷画了两只圆突突大眼睛。沿海航行船多有四五支桅子，便于捕捉海上来自任何方面的微风，使船只前进。桅上还悬个小小“五两”，随风飘动。用来和长江中下游船只比较，多显得方头方

腕，转动不甚灵便。可是它却耐得住海上风涛。二千多年前徐福入海，船只可能大得多，式样却不会相去太远。小舢板渔船多平底，有些住人部分在船舱尾梢一小角落，进出只靠一个不到二尺大的斗方舱孔，这大致和海上长期生活经验有关，在行进或停泊时，一般浪潮照例是不会拍上船只尾梢的。还有一种是较大的机帆船，解放前不过八艘，近年闻已增加过二百艘，这些渔船不论新旧大小，所有鱼网大部分都是崭新的，由于这类工具是统由政府按照需要供应的。海上公社合作的组织，使得生产已加倍跃进，渔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也完全改变了。这里数以千百计的船上人，和山东沿海其他渔村的渔人一样，都可说是采用最古老方式在参加最新国家建设的海上战士！他们和全国农民一样，伟大得十分素朴，大海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田地。他们在生产战线上的重要性，实不下于国防战线上的海军战士。例如海带在青岛海面的移植，还不过是近几年事情，年产量已超过二千万斤，除供应本省还大量供应全国各省市。至于捕鱼网虾的数量，自然就更加庞大得多了。北京首都四百七十万市民，每人每月定量供应的鱼类和特别供应的海带、紫菜……其中一部分就是这种海上战士长年和海风海浪搏斗得来的果实！看到那些灰苍苍的船只和船上人一身晒得焦黑、面目古质、腰腿劲健的样子，以及船只出港返航的景象，无疑都会使人感到一种严肃的敬意和说不出的爱。因为从他们身上，既可看到历史的过去，更容易体会到社会的将来。他们大部分目前虽还依旧用的是千年传来古老方法从海中捕鱼，他们的儿女却必然有机会在海洋学院读书，将学会使用最现代工具和最先进技术，从汪洋大海中取得更多的财富！

其次是采取一般游客用的方法看海，这有三个不同地方可去。

一是趁风日和美天气，从惠泉浴场雇个小白帆船去海上吹二三点钟。当小船离开岸边平平稳稳驶到海面时，可望见海上远洋大舶过后留在天际一道紫烟，必将深一层体会到世界是个整体，海水把彼此连得紧紧的。相去万里外的非洲或拉丁美洲人民反帝的斗争的进展，和我们生产建设即有着密切关联，我们这方面的建设的跃进，也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工作，对于他们是一种鼓舞。在海水轻微动荡中，仿佛感到整个大海呼吸的脉搏。青岛海面传说有一只海牛，每当海上风起前必鸣唤，可不用担心它会从船边突然出现。因为对它虽充满兴趣，也不可能有这种晤面机会！船到海上再回过头来望青岛的市容，将恰好如像我们玩颐和园坐小船进昆明湖，向龙王庙十七孔桥划去时，回过头来望万寿山前景差不多，全部重要建筑布局一例收入眼底，惟这里画面可壮观得多！至今似乎还少有画家好好画出来。最值得作的或许还是工艺研究所老师傅，能用海中各色小小蚌壳镶嵌成个画幅。

二是最一般性的看海了，即去栈桥或鲁迅公园，或好事又不怕走远路，索性走到太平角松林尽头海边去，坐在不拘什么地方，面对大海。至于所得印象，那就得看天时阴晴和早晚不同而定了。三个地方各有不同情调，各有好处。栈桥是本市居民饭后吹风纳凉方便地方，看海最群众化，所以到这里来也有意义。若乐意更群众化些，还可在栈桥北端小白亭子边买一方一磅重灰色冰砖，一面吃一面走去，“与民同乐”！潮落时海滩礁石间，将有千百小孩子拾取海菜蛤蜊的光景出现。他们年纪小小的就知道海边什么生物可吃，什么无

用，到将来入海洋学院读书时，这些知识还必然十分重要！

栈桥已算得是青岛市一个古迹，因为从光绪十七年起，登州总兵章高元在天后宫附近建衙驻防以来，即作为我国早期海军装卸材料给养而建立。虽以后累经改作，还是就旧有基础扩建的。向海中延伸约四百米长的堤坝，和其他海边一样，总有些人在那里钓鱼，钓线用附在钓竿上的转轮抛出去，远的可达三四十丈，正应合俗语所说"放长线，钓大鱼"，钓竿尖端通常还有个小小铃铛，鱼上钩时即可听到叮叮作响。设想虽够周到，但是事实上你不必希望看到有鱼上钩。虽用的是曲钩美饵，钓鱼人情趣，却比三千年前在渭水河边的姜太公从容开朗，因为太公还想钓出个非彪非熊的文王，这些姜太公后人，可什么也不希望，不过玩玩而已。通常是一坐半天，毫无所得，海风吹够，快乐回家的。这应当说是海边钓鱼真正的内行，不以得失经心！三十年前还可看到另外一种钓法，用个方尺实心木船，上竖小桅，挂上一片二尺见方小帆，船后系上蜈蚣脚式约一里长钓线，一排排短短横杆端各悬五寸长钓线，系上钓饵，把船顺风驶出海面，到一定时候才拉回，运气好常常可得五六斤赤身银鳞小沙丁鱼，若运气不巧，却得赔一斤沙蚓。这种巧作别致钓法，现在已看不到了。

若想玩得雅静一些，艺术一些，或乐意单独面对大海坐坐，又或者还有个把同伴要谈谈心，照个相，自然还是到鲁迅公园一带看海有意思。不问是在海边焦红崖石间望海，还是从上边莱阳路透过松林望海，都非常美观。

可能因为折光关系，这里海面有时像是格外明蓝。至于夜里有月亮天到这里来，看海上金波动荡，更是一种奇特享

受，不过这种享受通常总是只有住在附近的人得到方便较多一些，住在市区的人是不大需要的。

若腰腿劲健，且乐意孤独面对大海，听海波带着千古历史呜咽拍打岸边，看十来丈高大白浪进退回旋于崖际，如古人所说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景象，从中得到一种享受，一点教育，那最好是到太平角去。到那里所得到的印象，会觉得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可惜那个地区现在已不能随便进出。

还有第三种，用一个古典式幽人探胜访奇情绪去看海，照我个人记忆，最好地方是崂山白云洞前边“三步紧”那个悬崖绝壁顶端。在那里去才真像是在看海！远望一碧无际，近望则绝壁千丈直插海中，足下青红紫蓝斑驳断层崖石间，还可望到另外一批海上主人，百十种不同海鸟，分别栖息于不同层次崖石间，有白翅如雪眼红如火的，有背作浅天青和深灰色的，也有全部漆黑如乌鸦，嘴脚却浅红深黄十分突出的。这些不知名海鸟，都各自挤在一处休息或抚育小鸟，相互用着不同鸣声呼朋唤侣，有的又沉默如有所思，真正是海上奇观！机会如再好些，也许还可看到二千年前秦皇汉武均为它发过迷，太史公也记载到《史记》上的“海市蜃楼”。而且曾因这种海上三山传说，直接影响到古代宫廷园囿建筑的规模，和早期中国山水画的主题内容，及汉代工艺图案的各部门的发展；间接则首都北海、颐和园的建筑布局还受其影响！白云洞的老道，和山东沿海居住长年在大海风浪中斗争中的渔人舟子，是不会对这分空中幻景感到意外惊奇的。若一个外来客人，有机会看看，总还算得是一生奇遇！且由此会对于古代人迷信多有一分认识，明白燕齐方士的产生，也

还另有一种物质背景，不是凭空而来。一般说来，坐在白云洞三步紧大石头上如秦始皇那么想看海市、看大鱼，机会虽不多，至于看脚下海云如絮升起，白茫茫一片平布海面，如奔如驶一会儿即将海面完全笼罩，倒真是人间壮观。还有落日下沉前景象，同样够瑰丽庄严，值得看看！

至于看山，也有几种不同方法。青岛市附近的湛山，和青岛市区内的信号山，不会给游人多少启发，说看山自然还是去有风景可看的崂山。照五八年导游手册记载，有四条路可去，各有不同好处。

三十年前由海上我去过两次，坐汽车去过三次，这次只从海上去过一次。……若有适当机会，体力又耐得住海上三小时的颠簸，不妨从海上去，可到太清宫、华严寺和白云洞。太清宫是第一落脚处。临到时即可看见一小部分崂山面目，已具有范宽大痴作山头的点染章法派头，格局清而壮。庙宇在山下一个丛林洼谷里，上岸后只能说看树，还得不到崂山真正好处。不过树倒也顶值得一看，庙前的龙柏、银杏、黄杨、耐冬和几种不知名古树，有的已阅世千年，因为它的存在，这些庙宇给人印象即比较灵隐、虎丘来得古朴、大派、不俗气。古庙似乎应当这样才有意思。《聊斋志异》中提到许多花妖木魅，和崂山花木多有关系。这次去太清宫，七月里小院中紫色木笔正盛开，使我回想起卅年前在华严寺白云洞看到白玉兰谢落时，花瓣藉地下约一寸厚动人光景，深山中真是别有天地！太清宫只能说是崂山门户，要看山还得由此深入，或直翻山背过上清宫，或沿海边公路走去华严寺到白云洞山下，再沿流水沟作成的山路直爬上去。崂山和别地不

同好处是山在海边，山海相互映照。这一带山头参差耸立已大有意思，长年均若笼罩在一种粉紫和淡蓝色薄薄雾气中，随便截取一角，即远过郭熙李成的画卷。面对这些山云掩霭、树石清奇，和布置在山涧崖谷间小小村落，会提高我们几成对于中国宋元画的鉴赏力，并笑米家父子画的山景，真够庸俗臃肿，不清不透，和米颠爱石、拜石、懂石传说大不相称！不过年事较长的游客，想走这么一段长路，再直爬四百公尺的白云洞，心脏负担恐怕会相当重。并且到了白云洞，还得向山里走，才有真山可看，不是一天来回的事，大不方便！

比较一般的游览，还是一起始即坐车从旱路向北九水走，到地即可收"置身丘壑中"之妙。凡看过黄山、雁荡，游过武夷、阳朔的人，初到北九水会觉得局面狭促，平平无奇。但近海边山有一分不同处，即山石树木特别清润，即白日当空，气候晴明，山中一切依旧均若长远笼罩在淡淡烟雾中，稍稍深人，即可从崩崖奇树、崖石间细流断续，流水渟聚处随地可发现小小鱼群唼喋游漾，人被包围在这种丘壑里，实有别处所没有的清幽。沿山涧直上到大瀑布旁，算是一般游北九水的终点。卅年前我们要想到瀑布旁，得从错落崖石间或翻越或爬行，拿出《三岔口》剧中人本领，卜伏跳跃约两小时，虽不免相当辛苦，同时也增加不少寻幽访胜的兴趣。现在闻已有沿山平路可走，虽得到许多方便，可得不到这种游山时从跋涉劳动中得来的应有愉快兴奋了。

真的要欣赏崂山的好处，大致得准备在山中住三五天。据个人印象最好一次，是船在白云洞下边海面落碇，即趁势爬上山去看海，机会凑巧，看到海上白云升起，到后且逐渐封锁了洞门。第二天又看日出和海鸟。深入崂山，再住到山

中最高庙宇明道观，这里已高过海面八百公尺，更转到附近另一高处“棋盘石”去，但见群峰罗列环抱，正当中是崂山主峰，积翠堆蓝，烟云变幻，气象万千，所有山峰通像是用孔雀绿石、青精石及紫水晶混合作成的，另外还加上些金光明灭，给人印象真是不可思议。四向空寂无人，只间或闻一两种不知名清脆鸟鸣声和啄木鸟敲树声音，从远近古树丛间断续传入耳中。忽然一缕难名幽香来自近处，仔细搜寻搜寻，才知道原来近十丈高崖下朱砂色野百合一簇簇正盛开！无怪乎前人刻石称孙昙在这里采过仙药。说这里是个“仙境”，不算过于夸饰！想起丘长春、张三丰辈数百年前在这里经月坐下看山看云，不能不佩服他们地方倒真选得合式，他们都并不以山水画为名家，可是看山取材眼光，可比元明许多著名文人山水画家高明得多！我当时就和几个朋友学他们看了两天的山景，七月里还穿上庙中老道特为备办的棉袄，回明道观时，且被热情好客的老道逼着烤烤火，在火边喝了两杯老黄酒辟寒气。这种一时间和尘世真正隔绝的情境，大致却不是玩阳朔富春的人所能领会经验！

此外是从华楼洞那一路，上路容易得多，因此前人留名题诗也格外多。我的印象可被许多景物重叠起来，不易复述了。

第三是看市容和人的活动。照我想也可分成三四个部分。

一是看果园，开花摘果都好看，或南过李村，东过沙子口，到登瀛口，即十景中的登瀛梨雪，看沿海十里梨花！惟外地游人多辟暑而来，只有看果市机会，宜在八月中去好。

二是公园，青岛本身即像是个大公园。著名的中山公园占地约一百万平方米，虽部分是山地树林，还有约四十万米

空地分成草坪、动物园，和一个个用花木隔离开来的花园果圃单位，到处任意走去，随处坐下歇歇，一天两天不会使人厌烦。公园中千百种不同花木生长得都极好，走到任何一处总是一片绿色逼人眼目。更有意思是公园中总是到处可见百十成群的，来自附近大建筑中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花坛边，草地上，动物园珍奇鸟兽笼子边，到处可听见他们的嘻笑歌呼。这些孩子照例都长得胖墩墩的，眼目明秀可爱，十分愉快幸福。如说青岛目前必需有个新八景，这才是真正值得看看的一景！我们常说“儿童乐园”，我看过好些大小都市儿童乐园，就我记忆到的来说，只有这里的环境气候才真像个理想乐园！

同时在这里也和在海滨浴场及疗养区一样，最容易看出新旧社会不同处。过去游人多为压榨中国人民发了横财的外国流氓、寄托帝国主义为生的中国买办资本家，和无孽不作的地主官僚所享用，现在基本上却属于本市一般平民和外来休养的工人劳模、先进工作者、科技专家和国际友人所共有。一切旧时代的渣滓，除了将来历史博物馆或者还有几个陈列柜有他们的位置，此外再也不会出现了。

市景值得看的另一部分即建筑。如从围绕市政府及向东一部分属于如江苏路、齐东路建筑群算起，作为第一个有代表性建筑单位，部分属于机关单位，部分属于私人住宅，多为德国式样。要明白十九世纪末青岛建筑工人的成就，大致应当看看这些房子。若要明白二十世纪初一二十年代的成就，再向东些莱阳路、金口路一带的建筑有代表性。至于三十年到四十年代，则越向东发展，福山路、栖霞路，以至于八关路疗养区建筑群或可代表。这自然只是大略而言。地方既是

个典型半殖民地化海口都市，廿世纪前四十年突然繁荣起来的，除了外国资本家各以本国生活习惯爱好为主，建筑中有德、法、英、荷兰、瑞典，以至于西班牙等等不同形式，近代资本主义的什么立体派、构成派的建筑形式，自然也免不了会出现。有许多建筑，且显明由于过去滥用本地廉价人力物力，把屋基和长长围墙通用浮山花岗石砌成，和建筑比例要求不甚相称的。也有些徒具形式不大适用的。惟一般说来，不论是住宅区或疗养区的建筑，都作得相当讲究，重视艺术设计，即窗棂或小小转角楼突出部分，也可见出各有不同艺术风格，而内部应用也比较天津上海住宅合理。主要自然是地方空间多，因之利用率容易增加。至于解放后近十年的疗养区建筑，都既重实用又求美观，特别是花木种植经心注意，为国内所少见。最新作的人民大礼堂，设计素朴大方，内部装饰也十分调和，可说足代表青岛建筑工程和艺术设计新的水平。听人说八关路疗养区还有个较小礼堂，作得比这个更精美，可惜还没有机会参观。

从中部住宅区和商业区看市容看人，则有一种景象格外显著突出，即街道异常清洁，市民职工身上穿得格外整齐，仿佛准备作客一样。青岛是国内一个重要纺织工业区，不仅棉纺生产数字相当大，花布印染工艺水平，在国内也极著名，因此本市妇女穿的衣服，花色格外鲜明。近年且大量生产外销花布，得到国外好评。青岛本来不生产地毯，解放前不过六七个工人在古董商人控制下进行点修复工作，解放后生产数字已到国内第×位。青岛外销较早的麻布绣花餐巾台布，是手工艺日用品中一种加工复杂的生产，向丹麦、瑞典、英、比行销，年达三万大套还继续脱销，如人力来得及，过几年

可能到十万大关。山东出产的柞蚕茧绸，是历史上齐国一个传统产品，目下生产蚕丝大部分，也在这里加工外销。山东绣最早应数到范子《计然》一书中提起的“齐绸绣文”，当时生产经济价值即极高，反映工艺水平也必十分先进。到近四百年来明代山东线绣，故宫博物院还留下部分作品，组织壮美，布色华丽，在刺绣中别具一格，艺术水平实不下于苏绣湘绣或广绣。青岛机绣近于古绣一个分支，本属新起品种，在布上加工专作生活日用品，本来只供内销，不出省境。近年组成机绣生产合作社，却大量生产外销日用品，组织上千人生产，总还是供不应求。这部门生产无疑还要加速发展，值得艺术家注意关心！因为工艺美术不单纯停顿到手工制作赏玩品上，走向机化和日用普及方向，无疑是种健康正常发展的趋势。由于兄弟友好国家人民对于中国的爱，对于中国工业品的尊重和爱好，它的发展更是必然的。但如何使得这种生产品图案花纹更富于民族民间艺术特有的气魄和情调，更见出人民艺术的智慧和巧思，却值得进一步加强提高设计能力，国内工艺美术设计同志和中央及省市博物馆，都有义务把这问题慎重考虑，如何加强联系，协助进行，让它送到世界各国得到更多的好评。它事实也有可能今后在应用方面，将比苏绣湘绣更有广阔的前景！

青岛工厂多，除上述各部门，此外胶轮、针织、自行车、啤酒、鸡蛋加工、植物油脂……等等生产，都行销全国，部分并远及海外，对于祖国加速工业建设，起着一定作用。使青岛繁荣基础格外巩固扎实，自然还是新的在大跃进中出现的小洋群炼钢成就，听内行说是一面红旗。不仅协助了本市机车制造厂、自行车厂，和其他农具厂生产进展，也协助了

山东省其他机器厂农具厂的生产进展！解放后由五一到五六年，本市新建筑百一十万平方米，工人新宿舍即占地约六十万平方米。工人生活福利的改进，从这个数字中也可看出一点消息。

新的青岛八景十景若把这些新事物列上去，我个人认为比过去单纯从景物角度安排可有意义得多！

青岛是我国中部一个国防重要海港和海产基地，人人都知道。又是一个消夏辟暑名胜区，也是大家知道的。至于同时还是一个重要工业生产基地，而且是个在国际市场上大有前途的日用美术工业品生产基地，知道的人就还不太多。但是以青岛工人的勤快和建设祖国不后于人的热情，及地利条件而言，无疑后者的发展是会十分迅速的。新的青岛其实各方面都在跃进，我能说到的不过极小一部分罢了。至于可游玩部分，比如海水浴场这类地方，就只好让真正内行报道去了。

四　记虚——新的海市蜃楼

临离开青岛前一天，我有机会得市文联于、曾二同志陪同看了看青岛重要市容，特别感谢曾同志指点六十年前旧青岛面貌种种。例如天后宫后黄县路的村落位置，和太平路渔村时代景象，得到许多一般书中没有的感性知识。再过若干年，我若有机会重来青岛时，文化局局长和文联主席一定会劝我重新看看青岛新八景。我希望首先即参观“青岛历史博物馆”，因为到这地方的游人，必然都乐意知道这里为什么和中国别的几个沿海都市竟大不相同。即以建筑形式而言，就

似乎是一个大型世界建筑博物馆，德、英、法、日、荷、比……各个国家——包括亚非拉丁美洲各种典型建筑都有一些，要明白它的原因，并明白其他文化教育生产发展情况，最经济省事办法，自然去参观青岛市历史博物馆，用两小时或稍多点时间，即可以懂得青岛人民在近一世纪，是在一种如何不同挣扎斗争苦难过程中，来建成这个美丽都市的。博物馆地点大致即在天后宫附近，新礼堂对面。陈列面积约六千平方米。至于老营盘样子，最早海防战士生活情形，和太平路一带那三四百家渔户泊舟晒网情形，及后边山坡地最早商业区市集情形，当然在布景箱中都让人看得清楚分明。而青岛所有每一所大小公私建筑，如何为本地石工由浮山用小帆船运石头来奠基，由本地瓦匠在屋顶搭盖最初和最后一片瓦，工作辛辛苦苦完成后，这些工人又如何回到他们自己当时所住聊蔽风雨的小棚棚里去，像这类旧社会一切不合理事情，也可在博物馆布景箱中一一见到。特别是那座号称十九世纪末东方有名德国古堡式大建筑，在建造过程中，青岛工人的辛勤劳动和高度智慧，如何充分得到发挥，也应一一加以表现，使得观众明白原来一切开发都是由工人双手劳动的结果。帝国主义者不过坐享其成而已。而旧的操纵在帝国主义强盗手中的每一工厂，如何迫害虐待工人，童工在厂里又如何过着可怕非人生活；那些海上强盗一再转手，所采用的非人的残酷性，却如何大同小异；还有那些依靠帝国主义的阴谋产生的旧军阀、旧官僚、买办和地主，依附到帝国主义势力，压榨了人民无数血汗，在这里过着一种如何荒淫无耻醉生梦死的生活，也无一不加以适当表现……这些人、这些事情，在博物馆虽有陈列，还得说明员反复说明，因为到那时，一

般人已经不懂得做官的怎么可以随便杀人，而贪污是什么，做官的又怎么可以贪污，这些旧社会看来十分平常，新社会已一扫而光的种种，新社会里长大的年青人已不大能够明白理会了。另一面则陈列解放以来，政权和其他生产事业一切回到人民手中后，如何在短短年月中，即迅速改变了旧社会面貌，也有较细致全面的陈列。新旧对照，看看新的青岛的工业和文化教育与过去如何不同，对观众将更富于教育意义。总之，这个博物馆，在新的青岛市民眼中，是十分有意义的。在国际反帝斗争中，也必然会产生鼓舞促进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疗养所新区的进展，也值得当成重点看看。这是从莱阳路算起，经过第一浴场，八关路到湛山再过浮山所，延长到比目下还长×里左右。原有若干房子，好些已经用最新材料重新建造，有些又还改变不多，为的是这部分房子已成青岛“古典”式样，经过科学院历史考古所建议，认为必须保留，才不至于改建的。

湛山以东更新的建筑，已划分成好几个不同疗养区单位。第一个单位有中国南北各省市有代表性的花园庄院住宅式样，有新疆、西藏、内蒙古、海南岛、台湾及云南、广西、贵州诸兄弟民族住宅式样，甚至于还有个真正内蒙古包帐幕群在小小草原上出现，草原上还放牧有上千牛羊。在另一单位，又出现了各时代各种古典建筑群，每一建筑内部装置也是古典艺术精华，历史气息特别浓厚，但设备却完全现代化，是专为供国际友人东方考古学者来休养暂住的。在又一单位，还出现了一系列亚非和拉丁美洲典型建筑群。这些建筑和本来的都相差不多。最难得的还是那些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花园的布置，花木果树移植，真是费煞园艺工程师苦心！因为内

中既包括寒热湿诸地带不同气候，幸亏得新青岛建设委员会庭园设计科和市园林局专家，运用了最新园艺学的知识，不仅把世界上珍贵花木移植成功，同时最珍贵的果品也移植成功了。再其次即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技术，在这个新区里也得到充分运用机会。这一带还有个规模极大的世界和平图书馆，有个世界文化博物馆，有几个设备第一流的音乐院和歌舞剧院，每个容量倒不太大，不过一千零些位子，可是院中主要部分和几个休息厅，都是国内第一流青年艺术工作者的精心设计杰作。每年从七月半起始到九月底止，这两个半月内，约有十来场世界第一流的音乐和歌舞演出（最受欢迎的当然是中国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以及十来次世界最新最出色的科学艺术讲演，和三五次规模不大，但是特别精彩的艺术展览会。这都是世界文化精粹，因此科学院学部委员都争着要来参加，到那时大家趣味自然也已经开阔得多，承认艺术和科学的相互密切关系，不仅仅停顿到自己那一门尖端领域了。

第三是公园，除目下中山公园等已扩大了范围，动物园新添加了上千种世界著名的珍禽奇兽，面积也扩大两倍，建筑也改成最新式样，花木也增加了许多新品种。因为附近托儿所有了增加，每天公园中草地花棚间就约有五千左右儿童游戏。山上建筑也增多了好些，是专为初中学生实习观察中国宇宙卫星方位短期住的。浮山区方面则另有新辟五个公园，也是采纳医生意见，容量多不太大，位置即在每一新建筑区中心。

第四栈桥建筑部分，已扩大海中地基到约五万平方米左右，上面建筑也完全重新布局。主要建筑是参考唐宋人所绘

的蓬莱仙境图样作成的。具有世界性的中国古典音乐舞蹈会，每年多在这里举行。世界象棋围棋比赛，也多在这里举行。至于湛山大庙，则为了应东南亚和日本佛教徒请求和建议，也扩大了面积，更参考全国著名的五台大同诸古庙建筑，成为一个有世界性的大道场，里面有个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馆，内中陈列有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等重要石窟的模型，和上千重要有代表性画塑精美准确摹本。使国际友人最感兴趣的，是约有五百种中国著名的古塔模型，和一个收藏宏富的图书馆。每次年会都有几回极精彩高明的学术报告，例如用辩证唯物主义探讨中国医药卫生静坐导引的论文，引起国际医协体协极大的注意。因为它涉及中西文化科技史，提供了许多前人未有的精辟见解。最先提出的却是一个能读古书的道士和美术考古工作者。

第五是钟表展览馆，位置在新的工业区附近，地方并不怎么大，陈列面积不过三四千平方米，可是却引起世界钟表业专家及科技史专家热烈兴趣，因为这时青岛的钟表生产，已世界闻名。许多方面已超过瑞士。特别是东方艺术形式的造型和装饰，为亚非两洲人民格外爱好。这个展览会每年新品种展出不过三四百种，都是极高贵而艺术性特别强的。最新式流行的钟表，报时时能奏出最好的中国古典笛子和古筝曲子，亚非音乐爱好者多认为这是东方最美的音乐。这个展览会引起世界科技史专家最感兴趣的是第二部分，即古代部分，内中有中国各种计时工具的模型及运转方法，其中有许多种且是新近发掘出土的实物，如商代观察星辰运转的工具和计数法，周代的铜壶滴漏，又如取火的阳燧、指南车、记里鼓车本来式样，最早的炼铜炼铁烧水银的发明过程……它

的重要是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那么一系列的实物材料发现过，而中国却因为政府文物保护法令，人民进行得极彻底，而科学考古又格外认真，新的复原工作也格外细致认真，所以整理得条理分明，使得各国专家都羡慕重视。至于××钟表商最高设计师来偷学新产品样子，做得似是而非，一个印尼技术学校高材生也看得出错误，在论文中即指出，如像表面仿唐代细金工人十二辰阳燧刻镂，辰属龙的龙爪子也弄错了。原来这学生正研究中国龙在艺术上的运用，搜集了各个时代上万种不同形象，认识上绝不含糊。这时中国青岛牌钟表既风行世界，在经济上无疑也为本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青岛建筑发展得如此迅速，自然和它也有关系，虽然还不是主要的。

第六是青岛的工业生产，由于新的科学技术上的进展，随同产生了许多新的工业。如利用海盐和新的原子能某种放射物结合，促进新的制药业的进展，每年必有百十种新药应市，为世界公认为疗效最好最可靠的产品。又利用海水进行的许多种新的化学工业，成就也特别突出，得过好些世界性奖金。至于原有土产，如像水果中的葡萄、苹果，和几十种世界著名的酒类，虽年年增产常以十万吨计，依旧还是脱销。原有鸡蛋出口，查查一九三七材料，每天七十万枚已极惊人。新的出口数字，事实上却经常是每天三五百万枚。特别是改良来亨种成功以后，几乎有一半是双黄，产卵量等于增加一倍。至于肉食鸡种的改良，也对世界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基本上却用的是旧中国的阉割法。其他手工业生产，同样各有不同数字增加，例如盛行于六十年代的地毯机绣等，已经算是东方古典工艺美术品，其所以还在继续生产，经济意义

已并不大，只不过是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欢喜东方艺术图案的典雅，为国际文化交流，满足这种充满友谊的爱好，不能不抽出部分人力，来从事这种生产。地毯还依旧用羊毛，纯粹由手工操作完成，年约六十到八十万平方米产量。因为涉及国际艺术水平，所以国内第一流艺术家有好些是本厂艺术顾问，而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更热心协助这部门生产的推进，拿重要样子到厂中展出已成习惯。机绣也算是一项古典日用艺术，为了同样原因，生产被保留下来，约有三四千人从事这个工作，为国际友人服务。由于国际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已提到第一位，所以不仅青岛市这两种生产还保持不变，中国其他各省市也同样有些保留品种，继续生产，如像江西的瓷器、福建的漆器、北京的雕漆、雕玉和其他种种，制作技术原料处理都还采用六十年代方法，甚至于花纹造形也还采用古典艺术中具典型性的样品取法，才能满足国际友人的爱好情感。

第七是新的彩色《海市蜃楼》电影的摄制成功，也值得外来游人看看。这是本市气象台特别摄制的科学影片之一，内容包括沿海出现和捕鱼船在海面所见的约一百次不同海市景象，真是世界上少有的电影！送到国际电影节展出时，曾得到过艺术科学特等奖。但是到青岛来的游人更乐意看看的，自然还是新的青岛现代海市蜃楼制造者，因为前面七个部分的物质和技术基础，都完全建筑在这个新的现实上。我说的就是第八，世界著名的“青岛科学院”。里面组成分三个部分：即化工院、海洋院、艺术院。一共容纳了约二千个高级研究员，指导着若干研究所及全市约五十万工人，和大小约一千六百个工厂的生产，内中既有近代化的原子医药工业、

电子计算机工业、塑料钢铁合金工业，也有已经算是古典的地毯机绣手工艺。最重要将是从海洋提取各种贵重原料的新工业，占本市工业产值最大，在国内成绩也分外突出。

新的青岛科学院和大部分新型工厂，将设在市南海面对过那个岛上。来往交通除新完成那个海底隧道，一般多利用直升飞机解决。这些飞机自然也是本市工厂产品，以轻便起落迅速，任何建筑附近或屋顶小小空地上可以随便起落著名。

这个新的青岛八景，目下说来还像是海市蜃楼，但是它的成为可抚可触的现实，却不会是很久的事情。这种海市蜃楼一定在不多时间中，由青岛工人使它成为现实！或许会有人提出疑问，问我的理想基础何在？是在海上还是在沙上？我将微笑不作任何回答。因为我正想起青岛过去六十年，由三几百户小小渔村成为一百万人都市的种种经过。历史进展虽曲曲折折，然而总是不会停顿。我看到青岛万千勤劳勇敢的工人，在过去情形下，如何建设青岛。如今有了共产党，有了优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人好好组织教育起来，在一定计划下向前进展，得天独厚的青岛，一切美好进步的理想，通过业经完全解放自作主人的人民的努力，一一成为现实，我深深相信它并不什么困难！

本文初作于1961年8月，完成于作者从青岛回京以后。据原稿编入。

新稿之一

这见解倒相当新，还有点真正新认识，有思想，不随俗。并且或许还算得个真正内行，另外一时会得到社会认可的。和复旦大学那一位大教授专写《新诗指南》、《小说指南》的大不相同。我还记得前几年，为帮助你们学习，把他那个博学多能的教授编写的那些书，都买到家里，另外又还买了些别的教授兼作家写的这类大同小异写作"指南"。我因为有点好奇，又正闲着，试悄悄的先一本一本的看下去，初初还相当满意，因为内中引了许多中外重要文学家的名著节录，作为示例。可是再看下去，才发现原来多是彼此抄来抄去，千篇一律。一到自己发挥写作"秘诀"时，才知道这几几乎完全是新的江湖口诀，近于在乡镇集市上"挑牙虫"、"卖膏药"性质，应用时全用不上。照这种方式搞创作，能创作什么？但是照现在大学情形，抄抄撮撮的在什么"写作课"作为教材讲义，骗骗学生可不妨事。不少人这样就混了个十年廿年，很吃得开！学生肯定还会相当满意。因为师生当前或以后都

不是要靠写文章过日子的。文学系的学生，人乖一点的，必被系主任看中留作助教。其他将来大多数还是要回到各省去教中学语文课的。这份课外准备的教材可十分得用，受教的中学生也必能满意。因为除了可以用来教小学以外，还可照样抄抄撮撮，在地方报纸上写点有思想性的文艺论文，和什么抒情叙事散文。去到县党部里作个宣传员，也准得用！国家大，读书人并不多，有的是前途出路！这一系列的现实存在和需要，也就鼓励了这类作品不断的产生，还有个十分广大的市场待开发！所以这几年不断有新书店产生，主要就靠编印这一类“指南”、“秘诀”书和中学课本来维持，不甚费力，就可取得经济上的一本万利。办书店的多懂行情，善经营，只须再从余利中提出百分之三五，来收买国内露了面有了基本读者的作家的创作，点缀门面，在多数人印象中，就成了文化事业家。不久前，还听过在南大教书的王教授说，上海不少作家还得对于这点好处方便处感到满意！因为这就是他们目前多数的出路，幸亏有了这个新的出版业，他们中大多数人，一本创作大约可卖一百元，每个月才会有五几十元固定收人作开支，不至于会为二房东赶出那个小小亭子间，也不至于完全挨饿，陷于绝望自杀！这种失业自杀，在报纸小新闻上已日益增多，失学青年有个数字，“作家”还不多见。因为还不到绝路！近五年新书出的不少，新的文学刊物，也有办得比较有个水平的，且不断有写得较好作品出现，还都亏得是完全奠基础于这种剥削骗局上，才会形成这个局面！（若完全受国民党棍子和混混控制住了，那才真是可悲。）并且因此还保留了些社会转机的力量，不至于通通被生活所迫，或绝望自杀，或屈服于现实，被赶到南京国民党里去受训，

作小狗腿子，再披了张假虎皮，去全国各省市唬人害人！旧话说“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一比，就会承认这些人能在上海站得住身，对国家明天大有好处。给商人和文化骗子赚几个钱，是小事。

那么说，我们倒应当对这新式奸商和骗子文学教授表同情了？

若从刚才我说的去看问题，对社会有点远大理想，对文学有点抱负的青年，与其受饥寒所迫，不得不跑去南京参加那一些官僚混蛋作小爪牙，还不如在上海尽商人苛刻剥削，寄身于这种恶劣关系中还好些些。因为对于半殖民地化租界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即有机会得到深入一层的认识；对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罪恶，因之会日益增加深刻认识和反抗性；而对于国民党的上层极端腐败无能，贪污自私，和帝国主义者的相互勾结，共同来屠杀残害人民的罪恶，也将有不同的进一步理解。这就酝酿了国家今后一种转机。加上在目前全中国军阀独裁一切惟我独尊，年青人毫无思想自由情况下，租界中或多或少保留了写作自由，骂骂当前的官僚政治，对未来社会寄托了点朦胧希望，这就是明天社会转机的种子。种子虽小，而且还可说良莠不齐，可究竟是有生机的东西。可不要小看它。若稍稍注意一下我们过去卅年辛亥政治革命和五四的文化革命的影响，就会对于他们的明天，在发展中，在改造中，实充满了动摇这个旧的存在的一切。目下另一个地区革命的挫折，也可以说过分看中了局部的军事上的实力，而忽略了对于这部分知识分子的配合运用——特别是大中学生的应有理解，不善于运用他们在现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也可说对于他们还缺少应有作用的认识，不明白如何团结他们，

并提高他们对社会革命的认识。不大懂近卅年的历史，过于迷信有形实力的作用，忽略了无形实力的团结利用。这一小部分“作家”只想用宣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用恶骂压低其他存在的信誉，即可明白。都不是真正有远见的思想在处理这个问题，而是一群少数投机分子，自以为代表真理，来争权夺利。这些人一时小小得意，即以为胜利在望，不可一世，凡不属自己阵营内的人，到不多久，就得一律消灭。到革命受了一定挫折，看看风向不对，就会各以不同方式，想方设法向南京卖身投靠。只图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暂时逆流一得势，就会左右摆，且尽可能右得可观，或丧失斗志，消沉下去，表示凡事不再过问。主要还是把个人得失看得过重，革命也是从个人出发，缺少整体观念和长期性及复杂性。反而不如另外一些自由偏左的作家，工作来得持久而坚定。……王教授自己就是那么一个人，说的意见，代表了他自己对于近几年新文学运动一种看法，似乎也代表了一部分工作比较认真而对“政治”有些隔阂的一种人的看法。尽管近于客观的理解，并不够全面，说的好听些，是种新式书呆子，说的不好听，便是为人拘迂、顽固、保守，不通达世务；加重些些，就是“思想反动”了。其实从这个人一切自学、毫无依傍，而且多年一贯工作态度诚恳谨严处看来，懂的世事，或许比一些“世故老人”和鲁迅所说“左得可爱”的什么还深刻一些。从他的作品接触而之广阔，以及对于各种不同阶层人民的理解，和处理文字的能力，分析问题的细致，及语言运用的技术说来，并不是个什么“书呆子”。正相反，内聪明而外愚拙，是近卅年新作家中比较有头脑的一位。写作生命还只能说是第一个段落，前途还

远大，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一切认识是从反复实践得来的。多久以来似乎就处境在两夹攻中，还依然能坚持个人信守，在作品上不断有新纪录产生，并且在对自己新纪录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永远是文字清新，风格独具。因为个人对于文学作用、文学理想，和目前一部分只想把它当成一个梯子，一个桥梁，借此越墙过水的另一种作家，特别是十分乐意与官商合流的作家，有个基本不同见解。受的排斥、冷漠或忽视，以及批评攻击来自两方面，明白原因，也十分自然，不足为奇了。尽管同样是在上海这么一个奇怪地方工作和生活，和任何一方面都若格格不入，正是这个人的本色处。“条条路都可以通罗马”，写作方面的“一色清”，提的似乎过早了些，对明天的文学进展并无真正好处。其实这只是“势力独占”一个代名词，事实上办不到也包不下的。听说在国内，近于无出路的独自为战，在国外倒得到一些好评，以为不仅文字独具一格，内容也极其清新。特别是写乡村儿女的悲欢离合故事，写社会下层人事，反映得都比较深刻，具有民族风格，毫无时下流行虚伪做作八股气。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事情，和一些从形式到内容，直接间接撮抄外国作品的“文抄公”大不相同。对之估价大大不同于国内，倒也有趣！这个外来赞美并不能成为他坚持工作的主要力量，主要鼓动他的还是一种不同平常的爱国热情，而不是什么个人成功失败。是从生活中深深理会人民的可爱，祖国的可爱！我从你弟弟处订的几种近出文学杂志上，看了他近年写不少散文游记，写人写事写景物，表现能力和方法都有独到处。我倒觉得极感兴趣。……

父亲到这时才转换了谈话方面，问我：

你怎么才回来？在杭州可见了不少亲戚朋友吧！可记不记得今天是你满二十五岁的生日？恰好一世纪四分之一！这个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可真大得厉害，不容易为后代人所能设想！而目下，却陷在一团污泥中，无从挣扎，大小军阀都各有外国军火掮客的背景。在变动中可死了多少人！到处是军阀争夺权力，连年有大小不同战事在全国发生，每个大小军阀都有个帝国主义者作后台，是他们军事顾问，又是他们本国军火掮客。名分上有的是公使，是买办，是牧师神父。把上次欧战用不完的报废旧军火，向这些十分愚蠢的军阀推销，并且还在各个租界上，还特别为这些大小人屠户留下了些安全住处。打了败仗下野后，就带了几个副官，和一群吃战争饭的参谋军师之类，和一大群狗男女，姨太太，向租界一跑。还有不少军阀，原来彼此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打得个不亦乐乎。过不到二三年，两人都作了租界寓公，并且住处也成了近邻，于是又同在一道推牌九，逛窑子，吃花酒，吸鸦片烟。且经常共同去佛道会，听某某大德居士讲经，说易，便自以为已忏悔赎罪！将来依旧可上升天堂。还共同一道去拜××活佛（另外一种骗子），传金刚不倒秘密法，就是传房中术，买房中药，并且互相交换经验，好回去和娶自妓院的姨太太群，燕瘦环肥，每夜挑选三五个当值，自己吸了大量鸦片烟后，再用白兰地酒冲服那些花了大价钱得来的“神药”，连战个到天明，喝了一大碗人参燕窝汤后，才呼呼的和个肥猪一样睡去。直到下午三四点醒来，吃过饭后，又充满了扬扬得意“胜利将军”的神气，坐了汽车去朋友亲家处玩牌，而这些朋友亲家，却大多数是过去互相敌对过的军阀，或帮手政客。这些大小人屠户，事实上是永不死心的，

逃亡到了租界后，还时常要接见些东洋浪人，西洋骗子，兜售枪支或代运来自内地的小土军阀处鸦片，接洽办法，商量价钱的。过的日子，作的事情，都近于神话鬼话，丑恶处、阴险处，使后来人都难于想象的。甚至于有几个设自四川、湖南、广西诸省的著名的大毒品公司，主要大股东，还是当前堂堂国民政府四大家族中的主角，宋蔼龄、宋子文和当地军阀，及租界上的大流氓、旧军阀，分摊股份，而四大家族头子和大流氓，占有的都是“好汉股”，照例只挂一个什么堂名，不必出分文钱，到时就可分摊巨额红利的。有的军阀在本省占有的土地，常在十万亩以上。较偏僻的省份，军阀本人或子弟，还占有变相存在的初夜权。这那是一般从英美回来的社会学教授知道的事？并且即或一切都调查得清楚了，能有什么办法来改正吗？……这个有钱有势有代表性的“上层”，就是那么一些分子组成的，国家能像个国家吗？人民能活得下去吗？除了革命，那有个什么真正转机？再多一千倍英美公费生，每人都得个博士学位回国来，除了在国内名大学各占据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位置，每月拿三四百薪金，用学来的那一套，为各帝国主义训练“变相西崽”，或因种种旧封建关系，和那个洋学校的兄弟会一类秘密关系，在学校以外，还占据了国家政府中各种第二三级领导地位，并把持了支配各种退还庚款的委员会。社会地位越高，首先就是越只知从自保出发，从巩固同学同好私人地位权利出发，来安排处理这一笔出自人民真正血汗的充满国家耻辱符号的庚款，那里会有什么公平合理可言？若出发点都重求巩固个人地位，和本阶层的小团体利益，而在这么一个腐败残暴自私无能政权统治下，他能做得出什么真正对几亿人民有益的

事情呢？他或许始终在社会要求上还算得是个“正派人”，又热心爱我们这个国家，他还历来以敢于说话，写点批评现社会毛病文章时，也说得十分激昂慷慨，在社会知识分子阶层中具有一定威信，如像……，但是事实上能有什么办法使社会目下种种可怕情形，扭转改正丝毫？他的什么朋友，即或已在那位提倡孔孟，同时又相信耶稣的首座身旁，是否就有能力使得一到神经冲动下，就忘了他那个上帝的嘱咐，胡乱屠杀人民的蠢事愚行，顽固而残暴的脾气稍稍改变吗？能使那位一生专说谎话的提倡仁义道德的“圣人”之徒，上帝儿女迷信武力之外，脑子里还想得出什么更聪明些些别的办法，来进行他的安邦治国治天下政策吗？你那位著名的表面上受特别尊敬的朋友，包括在政府和一部分在学校里的那些名流、贤达，又真敢犯逆鳞，效法唐初的魏徵，或如过去历史上的名臣，来直言敢谏吗？你即或能代表高等知识分子，不让特务随意到学校里来捕捉相熟同事，可是什么学生忽然失踪就管不了。在另外大学里，言谈上稍微爽直些的教授，无形失踪的也大有其人，你就毫无能力来向“独夫”代为要求人权尊严，言论自由，甚至于对于这类极端不法的事情，兴趣也并不大！那位奸狡无比的“独夫”，他尊敬你，并尊敬其他，主要都只是担心你们嚷给他的主要靠山美国人听到，不利于他夫妇的说谎告帮，因此遇必要时，哄哄你们而已。假装尊敬，把你那些在学校教书的熟人，一个一个荣升为挂名中央委员，却是在哄哄以外，进一步加以利用。不答应不上套还好些，一上了套，从他们内部看来，即近于新式弄臣。所不同处，二千年前的汉代，千多年前的唐代，弄臣不会作文“圣主得贤臣赋”捧场，就得会逢场打趣，在帝王独夫面前，

或默或语，总得各有表现。新式弄臣，则至多去庐山在什么受训过程中，得学会穿上那一套灰色制服，遇到什么伟人演说时，提及独夫的姓名，必照希特勒法西斯方式，即刻立正行礼，此外的确还算“不失自由”。可是从此以后，你就绝不敢在学校什么会上公开骂四大家族中任何一人对国家的罪过，更不敢在公开刊物上，写什么文章触犯种种时忌了。因为你已经是“国府”的中央委员！尽管这只是个空衔，每个月到时寄上四百干薪，一开口就总得负点有福同享的责任！另外还有些没有得到这个空衔的，还会“见贤思齐”，在心血来潮时，邀集了些“候补弄臣”，采取个相当积极态度，来搞什么新的公开阿谀，讨独夫欢心。照老封建办法，举行什么“献九鼎”歌颂圣德方式，肯定会有不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无聊政客、下野军官来签名的。且十分盼望在大典礼上行个三鞠躬礼。事实上这些人中的饱学洋博士，大多数是不明白“献九鼎”是怎么回卑鄙到家事情。这种事情目前即或还不会出现，到另外一天，肯定会必然出现于现代历史中，值得认真仔细记下来，值得写成“儒林新史”中一章的！这个独夫一天不倒，权势日增，有钱有枪，威迫利诱，双管齐下，所谓新的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在新形势下失去一切近卅年争取得到的受人民真正盲目尊重，并寄托以种种期望。但事实上却将向相反那条路走去，一同掉入泥坑，凡是热心个人出路，胜过在大学里示范做人的兴趣和责任的，做变相弄臣的必将日益增多。而希望作“候补弄臣”的，或许还将由教授转到讲师一级。这从远处看，将是一个势不可免的民族悲剧。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最上层正在日益法西斯化，为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是更大的痛苦和不幸。为具有小聪明和世

故，善于为己的教育文化界中人，要向上爬，大致将只有这一个形式虽陈旧，作用却崭新的梯子可爬！

在这个必然行将出现的新形势下，老百姓的苦难遭遇，将更无话可说。至于这群特权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若真有灵魂，灵魂却明明白白在腐烂中，能对国家的当前和明天起什么好作用？除了在一个范围极小的圈子里，经常在一起，玩个三天五夜的桥牌大会，还有什么行动可叫作积极？有些人可真像那个作家说的：“许多在小乡镇水陆码头上用自己肉体经营处理生活，生命中的庄严处和为人可信托处，竟比许多城里高级知识分子更可爱，更值得信任！”初初读来还以为是过分其辞，近于夸大，现在看来，我倒很能欣赏这个十分素朴的提法。明天国家社会真正的转机，对外保家守国，防敌御侮，对内革命流血，真正可依靠的恐怕还将是这些还有点做人血性的大娘大嫂，拉船抬土哥子兄弟！正如二千多年前推翻秦的暴政的并不是那些被坑的峨冠大带博学多能引古证今的博士先生，却是髡头衣赭的陈胜、吴广和一群同伙！学古可以知今，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未来明天，多空洞担心害怕，事实上真正可怕的，还是目前正在出现的这一道逆行浊流，行将有大量以为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胡胡涂涂，行不由己的逐一淹没在这个污泥浊流中，没顶以前，先就死去了那个万物之灵的辨别是非爱憎的心！

十月廿六，九纸

略近奇迹，因为是廿五年后，重新开始作的一些回忆的贯串。得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写下

去，维持三两年，或者能给孩子们留下一点纪念。

本文作于1974年。手稿上无题，作者在存稿信封上注明“新稿之一”。

据原稿编入。

文学活动计划

姓名　沈从文

是否专业从事创作

久已不写小说，新的研究工作，比过去小说散文重要有用。

主要从事何种文学样式

小说和散文四十年前旧作，近在整理中。

工作单位及职务

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古代服装研究室主持人。

通讯地址

前门东大街3号（崇文门附近）507室

最近的文学活动计划和深入生活的计划

1981年香港商务馆分馆出了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计彩图约一百，大小黑白图约五百，说明文字约廿五万。英美拟

翻译成英文本印行。近正为增改彩色图约一百左右。北京方面，也在商讨印行，付印时间也得待各方面协助，把诸应换图像凑齐完成第一步后，始能作第二步考虑。这个工作待深入的，是从各大文物单位能协助，得材料，才易着手。初步估计，至少也得有三个月时间才可望将需要诸图集中。

我的旧作有机会在陆续重印，由广东、湖南、四川、北京、上海等地分别印行。由张兆和同志为整理校核。湖南已出二选集。广东拟印十二卷，已完成九卷，今年可印出一部分。北京拟印三卷，稿虽已送交，出版似遥遥无期。

照我个人理解，仅说“深入生活打算”不大可能即写得出好作品的，似乎还包括了些种种不同努力，才可望使作品显得深广有内容。

在创作、研究、学习和深入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重订本所需诸图，一时还不易集中。据十一月廿日台湾《中央日报》消息，此书已在台湾翻印①出版。详细情形还不明白，在国内搞工作困难处，就在完成后，付印时慢得可观，慢得怕人。许多工作都在折腾中落后于人。这书已积压了十七八年，国内无出版处，才在香港付印。国内还看不到，重印也不知得何年何月才可望成为事实。台湾却只一月稍多，即已重印出版。这本书算不得是完美无缺的，还是个试点性工作第一部分成果。仅以资料和对于材料的分析所得结论说来，还像是一本新的，有分量也还有内容的图书。搞美术史、工艺美术史，谈戏剧改良搞服装设计，研究中国乐舞史的，大都还值得看看。送出国外，也还像一本像样的书。改订本会更好。

对本会的要求和意见

此外还拟为体育团体出国，编了本《中国球类竞技》的较小专题性图录，已集中不少材料，还欠四五种图像即可完成。正拟和历博和故宫商洽所需图照。另外又还有些“已进行”、“待收尾”的小专题性图录，在国内还像是纯粹“空白点”，没有人肯下功夫作作，我作来大致还可望在国内外都易得到认可。困难处只两点：一是搞图像材料相当费事；二是日下住处离工作室太远，我年纪快到八十了头脑还得用，换两次公共车才能到达，挤公共车，手脚已不大抵用。因此无可奈何，无从每天看看工作室的工作，只着急，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文联方面如有能力为在崇文门一带找三几间空房，让我把工作室迁到崇文门附近，我可以每天去工作室和几个助手谈谈工作，争二三年时间，或许还可望编出几个小专题性图录出来。对各方面都还得用。也对得起国家给我这份工作任务。若继续这么耽下去，这有限生命，实在可惜。二，今夏八九月能安排我和爱人出去走走，对工作有好处。若份额有限，或这里工作分不开身，就放弃这打算。

本篇为作者1982年2月8日填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活动情况调查表》的内容。编入时篇名为编者所拟。

① 在台湾翻印　此消息所说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台湾的第一个翻印本，由龙田出版社将该书分成两卷，并从原版8开本缩为16开，删去作者姓名和郭沫若所写序言后，廉价翻印发行的。